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绪论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而遭致失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奉命留下的部分红军和党政机关人员共约三四万人（其中包括2万多伤病员），他们同苏区人民一道，在以项英、陈毅为主要领导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委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下，就地坚持斗争。在此前后，南方其他苏区的军民，也因红军主力转移或斗争形势恶化，相继转入游击战争。从这时起，迄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宣告成立，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南方八省——江西、福建、广东（含今海南省）、湖南、湖北、安徽、浙江和河南的广大农村，经过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洗礼，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各地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先后创建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当土地革命遭到挫折和主力红军北移后，留在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坚持斗争，百折不挠，逐渐形成了15个游击区。从历史渊源上看，这些游击区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苏区及其边缘游击区演变而成的，如赣粤边、闽赣边、闽西、皖浙赣边、闽北、闽东、湘鄂赣边、湘赣边、鄂豫皖边游击区；二是一直未形成苏区的老游击区或早已由苏区变为游击区的，如闽粤边、闽中、湘南、琼崖游击区；三是新开辟的游击区，如浙南、鄂豫边游击区。

赣粤边游击区 位于江西省南部和广东省北部边界，中心区域在江西信丰、大庾（今大余）和广东南雄三县交界的油山、北山地区，原为中央苏区赣南省的边缘游击根据地。1934年秋，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后不久，中央分局即派出一支部队到这个地区坚持与发展游击战争。1935年春，项英、陈毅及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部分红军与在该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会合。此后，赣粤边区军民，在项英、陈毅以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下，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由于这里是项、陈直接领导的游击区，引起国民党与广东军阀的格外注意，把它列为“清剿”的重点地区，加之叛徒作祟，斗争十分残酷。但游击区军民不屈不挠，顽强斗争，不仅巩固了原有的油山、北山、信（丰）（南）康赣（县）游击区，而且开辟了以青龙山为中心的三南（（龙南、虔南、定南）游击根据地。

闽赣边游击区 位于福建省长汀县和江西省瑞金县边界及其邻近地区，又称汀瑞边游击区。它原是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在中央苏区完全陷落前，中央分局即指示这个地区的党组织，部署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随后又调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赖昌柞到这个地区组建中共瑞西特委和军分区，统一领导汀瑞边游击战争。由于这个地区曾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反动派一朝复辟，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进行阶级报复。斗争也就格外残酷激烈，红军游击队一度濒临绝境。后来游击区军民经过顽强的斗争，终于渡过了难关，坚持到了胜利。

闽西游击区 位于福建省西南部，毗连闽赣边和闽粤边游击区，中心区域在（龙）岩永（定）（上）杭地区。这里原系中央苏区腹地，归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管辖。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闽西地区留下4个主

力红军团队。其中两个团（独立第 19、第 20 团）在福建省委和军区直接指挥下，坚守长汀县西南部的四都山区，1935 年 4 月归于失败，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等英勇牺牲，另两个独立团（第 8、第 9 团）和明光独立营等部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之命，于敌后牵制敌人，后来在张鼎丞等指导下，适时地转变了斗争方针，分散开展游击战争。随后，在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为核心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下，游击区军民广泛地开展反“清剿”斗争。由于斗争策略比较灵活，加之群众基础好，又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到抗日战争爆发时，游击区和游击队均有很大的发展。

闽粤边游击区 位于福建省南部和广东省东部濒海地区，其北部与中央苏区之闽西地区相连。开始时包括（南）靖（平）和（漳）浦、饶（平）（平）和（大）埔、潮（安）澄（海）饶（平）3 块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游击区。1934 年 8 月，以黄会聪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边特委在靖和浦地区正式成立后，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游击区，以何鸣、张长水率领的红 3 团和卢胜领导的独立营为骨干，开展游击战争。这个游击区地处东南沿海，同外界联系方便，信息比较灵通。他们根据中共中央新的政策精神，适时地转变斗争策略，把白区工作与游击战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保证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并率先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合作抗日协议。但在国民党蓄意制造的“漳浦事件”中，闽粤边游击队遭到重大损失。随后，闽粤边党组织重新恢复了红 3 团，并投入新的斗争。

皖浙赣边游击区 位于安徽省南部、浙江省西部和江西省东北部交界地区，由闽浙赣苏区演变而成。1934 年 11 月初，闽浙赣红军主力红 10 军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红 7 军团合编为红 10 军团，在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寻淮洲等率领下由赣东北进军皖浙边。另留下部分红军在原地坚持斗争。不久，出征红军失利，寻淮洲等牺牲，方志敏、刘畴西被俘（后英勇就义），以弋阳、横峰为中心的闽浙赣苏区也大部被国民党军占领。以关英为书记的中共闽浙赣省委和以唐在刚为司令员的省军区，率部转入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后来，斗争重心转移到皖赣边，并以鄣公山为中心区域，省委和游击区遂易名为皖浙赣省委和皖浙赣边游击区。这个游击区地域辽阔，游击队活动范围包括 3 省边界的数十县。先后形成的赣东北、鄣公山、皖赣边、上浙皖、下浙皖、浙皖等几个游击根据地相互策应，游击战争得到广泛的开展。后期虽然遭受挫折，但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

浙南游击区 位于浙江省南部，东濒东海，南毗闽东，西与皖浙赣边和闽北接壤，是由刘英、粟裕率领的挺进师，在浙南人民支援下创建起来的。其中心区域先是浙西南，后转移到浙南。1935 年初，进军皖南失败后的红 10 军团先头部队返回赣东北，于 2 月间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与闽浙赣的红 30 师一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挺进浙西南地区，在敌后开辟游击根据地。起初由于部队缺乏游击战争经验，又不熟悉当地方言与民俗，困难重重。后来总结经验，改变斗争方式，特别是大力加强地方工作，赢得当地群众广泛支持，才打开了局面。随后将斗争重心转向浙南，并同闽东游击区取得联系，扩展了活动范围，终于站稳了脚跟，创建了一个新的革命战略支点。

闽北游击区 由闽北苏区演变而成，位于福建省北部山区，以武夷山脉为中心，包括闽北、赣东北和浙南边境的 20 余县，其东南部与闽东游击区接壤，东北部与浙南游击区毗连。闽北苏区曾是闽浙赣苏区的一个分区，1933

年春划归新成立的中共闽赣省委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闽北红军在黄道为书记的中共闽北分区委领导下，依托武夷山分散开展游击战争。与闽东游击区密切配合，相互支援。后来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成立了以黄道为书记兼政委，包括吴先喜、黄立贵、曾镜冰等在内的中共闽赣省委和闽赣军区。他们与友邻的红军游击队相互策应，加之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有利的地理环境，灵活地运用“走藏打”战术，使游击战争开展得十分活跃。

闽东游击区 由闽东苏区演变而成，位于福建省东部与浙江省东南部交界地区，中心区域在闽东北，东临东海，南抵福州。闽东苏区原是个老游击区，形成苏区的时间不长，仍保留着游击战争的传统和经验。所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以叶飞为代表的闽东苏区领导人，主动而及时地转变斗争方针，突出敌人重围，分散开展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力量。尔后又采取“狡兔三窟”的战术，建立与依托几个游击根据地，飘忽不定，与敌周旋。同时，与相邻的浙南、闽北游击区互相策应，游击战争蓬勃开展，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闽东独立师）得到较大的发展。

闽中游击区 位于福建省沿海地区中部，其中心在福清县罗汉里和莆田县常大地区，原属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领导。1934年4月福州中心市委遭破坏，同年八九月间，原福州中心市委巡视员黄孝敏和常委王于洁先后建立了福清、莆田两个中心县委，并组织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5月，以王于洁为书记的中共闽中特委成立，统一领导闽中地区的游击战争。闽中是福建政治、经济中心区域，交通发达，国民党当局控制甚严。游击队在敌人统治中心的间隙和边缘地区机智地开展活动，保证了游击区和游击队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得以保存和发展。

湘鄂赣边游击区 位于湖南省东北部、湖北省东南部和江西省西北部边界地区，包括20余县的广大乡村，其中心区域在湖南省的平江、浏阳和江西省的铜鼓、修水一带。这里原是平江起义后逐渐形成的老苏区。1934年夏，苏区主力红16师出击受挫后变成游击区。此后，以陈寿昌为书记兼政委、徐彦刚为司令员的中共湘鄂赣省委和军区重整旗鼓，继续战斗。不久，陈寿昌、徐彦刚先后牺牲，游击区军民在新的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傅秋涛等人领导下，经过三落三起、艰难曲折的斗争，游击战争重又蓬勃开展，红军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湘赣边游击区 位于湖南省东部、江西省西部边界的罗霄山脉北段，其中心区域为武功山地区，北与湘鄂赣边游击区相邻，原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形成的老苏区。1934年8月，湘赣红军主力红6军团突围西征后，留在苏区内的红军部队担负起保卫苏区和策应红6军团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10月间中共湘赣省委和省军区率部转入武功山区坚持斗争。1935年2月，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牺牲，随后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苏区形势十分严峻，游击区军民在以谭余保为书记兼主席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军政委员会领导下，利用边界的有利地形，始终顽强地坚持游击战争。

湖南游击区 位于湖南、广东、江西3省交界处，主要区域在湖南省南部地区。是一个斗争规模较小且几支游击队在不同地区分别坚持斗争的游击区。1935年春，中共中央分局先后派出由龚楚和蔡会文等分别率领的两支部队前往湘南活动，由于龚楚叛变，蔡会文牺牲，部队损失严重，原有的几支游击队，力量均比较单薄，加之靠近粤汉铁路，湘、粤军控制甚严，未能开创较大的局面。然而，在中共湘南特委（起初还有湘粤赣特委）和彭林昌、

周礼、李林等领导下，分散在这个地区的几支游击队，一直顽强地坚持斗争。

鄂豫皖边游击区 由鄂豫皖苏区演变而成，位于湖北、河南、安徽 3 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包括 3 省边境的数十县。1934 年 11 月，红 25 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鄂豫陕边界转移后，留下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重建红 28 军，并与中共鄂东北、皖西北道委一起，领导边区军民坚持游击战争。由于这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优越的地理环境，红 28 军紧紧依靠群众，纵横驰骋，游击战争得到广泛而又规模较大的开展，红军和地方武装均有较大的发展。

鄂豫边游击区 又称豫南桐柏山游击区，位于河南省南部和湖北省西北部交界的桐柏山地区，东南部靠近鄂豫皖边游击区。1936 年初，以张星江为书记的中共鄂豫边省委决定组建以周骏鸣为队长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由于这里地处偏僻山区，起初没有引起国民党的重视，游击队利用这个机会逐渐发展起来，创立并巩固了边区游击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八省最北端的一个战略支点。后来又在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策略的同时，迅速扩大游击队，单独编成新四军的一个团队。

琼崖游击区 位于海南岛（今海南省）岛上，中心区域在琼（山）文（昌）乐（会）万（宁）地区。这里原是琼崖苏区，1933 年初，琼崖红军第二次反“围剿”失败后，在以冯白驹为书记的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转入分散的游击战争。它比大陆各苏区转入游击战争的时间早将近两年，而结束时间又晚了一年，坚持斗争长达 6 年之久。由于孤悬海岛，广东军阀又十分注重对该岛的控制，游击队不得不长期分散于四乡，将游击战争与隐蔽斗争结合起来。游击战争规模虽然较小，但持续不断，在长期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孤军奋战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和我国最南端的一个战略支点。

除上述 15 个游击区外，在福建的安（溪）南（安）永（春）德（化）地区也曾一度建立过游击区。在这个游击区开展斗争的是闽南红军游击队第 2 支队（简称红 2 支队）。这个支队成立于 1932 年 5 月，在中共安溪中心县委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活动，逐渐发展到 500 多人，开辟了 3000 多平方公里的游击区。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第 26 旅即对该游击区大举“清剿”。红 2 支队在支队长尹利东、政委李剑光（后彭德清）率领下，在根据地内与敌周旋，到 1935 年夏，斗争形势日益恶化，安溪中心县委遂决定红 2 支队分 3 路突围到外线活动。由于第 26 旅跟踪追击，红 2 支队遭到惨重损失，整个支队只剩下 30 余人，被迫分散进行隐蔽斗争。后来一部分人转到闽粤边游击区，参加了那里的游击战争。

综观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进程，尽管各游击区的斗争情况不尽相同，但除了个别新开辟的游击区外，一般都经历了 3 个发展阶段和两个战略转变。第一阶段，实行由苏区方式到游击区方式、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老游击区也作了战略方针的调整）。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南方的主力红军相继撤离苏区，留下坚持斗争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力薄难支，苏区范围日益缩小，以至全部变成游击区。这个斗争环境的变化，要求各地党组织和红军必须转变苏区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对于这个战略转变，有的地区领导人认识早一些，转变得也比较自觉，因而保存下来的力量就比较多；有的则认识较晚，因而显得被动，损失较大。但经过半年左右时间，至 1935 年春夏，大部分红色区域一般

都相继完成了战略转变。这个转变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使红军游击队走上了因地制宜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轨道，从而保证了南方各地区的革命斗争得以坚持和发展。

第二阶段，开展持久的反“清剿”斗争。这个阶段的斗争最为艰苦，时间也最长。由于国民党在“清剿”中继续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总体战”，不仅以优势兵力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持续不断地疯狂“清剿”，而且特别注重加强地方反动势力对游击区的控制，并加以严密的经济封锁，红军游击队不仅要在军事上，而且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全面开展反“清剿”斗争。在斗争中，各游击区党组织和游击队不怕挫折，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军政素质和斗争艺术。特别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挫败了国民党军和地方保安团队一次又一次“清剿”，达到了保存自己和扩展游击区的目的。

第三阶段，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斗争，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采取了“北和南剿”方针。在北方基本上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但在南方，却加紧“剿共”，企图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之前，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幸而这时多数红军游击队已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特别是通过各种渠道获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后，在斗争策略上更加灵活。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南剿”阴谋，迫使他们不得不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又耍弄阴谋诡计，企图将红军游击队“溶化”和“收编”取代合作抗日的改编。各红军游击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严正的斗争，终于在1937年秋冬，相继达成合作抗日协议，随后陆续下山，改编为新四军，实现了第二次战略转变。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不同于一般的土地革命战争。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具有自己显著的特点：各游击区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长期分散，独立支持，各自为战，并由此带来异常的艰苦性。由于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清剿”和保甲制度的控制，各游击区无法及时得到中共中央的指导，不了解斗争全局和党的政策的变化，各方面情况靠自己了解，事变发展进程靠自己判断，行动方针靠自己确定。这对游击区的领导者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各游击区在战略上互相支援，但在具体斗争上却是独来独往，无法协同行动。由于环境险恶，革命队伍中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考验而变节投敌，游击队不仅要同外部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而且要同内部的敌人（叛徒内奸）作复杂的斗争。特别是这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争，又是发生在曾经进行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复辟的地方封建势力同国民党军队相互勾结，疯狂地进行反扑。他们不仅以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兵力，围困和“清剿”红军游击队，而且采取阴险的瓦解与隔离政策，实行“连坐法”，以至移民并村，制造无人区，力图隔断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因此，各地红军游击队不得不长期生活与转战于穷山僻岭，风餐露宿，以野果充腹。然而，残酷的斗争并没有使游击健儿屈服，反而将他们磨而得更加坚强与成熟。他们与人民群众唇齿相依，同舟共济，战胜了一个文一个激流险滩，终于到达胜利的彼岸。

1937年冬，根据同年10月与国民党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琼崖除外）改编为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下辖4个支队，第1支队由赣粤边、湘鄂赣边、湘赣边、皖浙赣边和湘南等游击区的红军游

击队编成，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支队下辖第 1、第 2 两团。第 1 团团长傅秋涛（兼），副团长张玉坤（后江渭清）；第 2 团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刘培善；第 2 支队由闽西、闽粤边、浙南和闽赣边等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支队下辖第 3、第 4 两团。第 3 团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第 4 团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志；第 3 支队由闽北和闽东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支队下辖第 5、第 6 两团。第 5 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第 6 团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后吴恺）；第 4 支队由鄂豫皖边和鄂豫边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司令员高敬亭。支队下辖第 7、第 8、第 9 团和手枪团。第 7 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第 8 团团长周骏鸣，政委胡龙奎（后林恺）；第 9 团团长顾士多，政委高志荣；手枪团团长沙化雨，政委汪少川。此外，以闽中和湘南部分红军游击队编为军部特务营。全军开始时共 10300 人，约 6200 余支枪。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南方红军游击队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和主要功绩在于：第一，在初期将几十万国民党军吸引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周围，箝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了主力红军和中央领导机关的战略转移，并给进犯苏区的国民党军以打击。第二，在尔后的 3 年中，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锻炼出一支坚不可摧的革命武装。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如同经过长征的红军发展为强大的八路军一样，八省红军游击队汇合成为驰骋大江南北的新四军。第三，在南方八省保存了革命的战略支点，保持了共产党的旗帜，保护了人民群众利益，在广大地区撒下了革命火种，为尔后开展南方革命斗争，准备了基本条件。第四，在我国南方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特别是贯彻中共中央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开展抗日宣传，有力地推动了南中国抗日运动的发展。第五，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发展和丰富了革命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第六，为全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坚定的革命信念、百折不挠的意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有这些，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当代的精神与物质文明建设，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37 年 12 月 13 日通过的《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给予高度评价：“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至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他们的长期艰苦奋斗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

序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周年前夕，由《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编撰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人物谱》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纪事》等三部书，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南方三年》丛书办公室的同志在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编纂《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料丛书的同时，在编委会领导陈工显、叶飞及其他参加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老同志的关怀指导下，历经十个寒暑，在对大量史料研究考证的基础上，终于完成了这三部力作，值得庆贺。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在我党我军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34年10月，由于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他们在远离党中央领导的情况下，面对几十万国民党军的疯狂“清剿”，分散在南方八省15个地区，在项英、陈毅及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与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激流险滩，不但使自己站稳了脚跟，并在战略上策应和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行动，保存了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1937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集中改编为新四军，成为抗战中驰骋大江南北的一支主力军。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人物谱》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纪事》等三本书，翔实地记述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光辉战斗历程，展示了红色游击健儿们在这场环境艰苦异常、情况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斗争风貌，讴歌了瞿秋白、何叔衡、方志敏、贺昌、刘伯坚等一大批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和高尚情操。

当前，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拼搏。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等三本书的出版，为我们继承发扬党和红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作风，学习南方八省红色游击健儿们的革命精神，提供了大量生动的范例。愿这三本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成为珍贵的教材，广大读者能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

张万年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三日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阎景堂

第一章 原中央苏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后，以项英和陈毅为主要领导人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奉命留在中央苏区，领导中央苏区以及近邻苏区军民，就地坚持游击战争。至1935年3月，项、陈转移到赣粤边游击区止，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原中央苏区坚持了近半年时间。时间虽不长，但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斗争，并完成了由苏区方式到游击区方式、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尔后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中共中央的部署

（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中央苏区，以江西省瑞金为中心，主要包括赣南和闽西两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两块革命根据地，发端于1927年秋至1928年夏共产党人发动的农民武装起义。1929年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4军由井冈山进军赣南、闽西，以原有的游击区为基础，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不断扩大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的。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了中央苏区的建设。

1933年春，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发展到鼎盛时期，其范围包括赣、闽、粤边的数十县，基本区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在行政区划上，设立江西、福建、粤赣、闽赣4个省46个县治：江西省，辖瑞金、雩都（今于都）、杨殷、兴国、万泰、公略、胜利、永丰、新淦、龙冈、洛口、宜黄、乐安、崇仁、赤水、广昌、南丰、石城、太雷、长胜、博生等县；福建省，辖长汀、汀东、上杭、武平、永定、连城、龙岩、新泉、代英、兆征、宁化、清流、彭湃等县；粤赣省，辖会昌、西江、门岭、寻邬（今寻乌）、安远、信丰等县；闽赣省，辖黎川、金溪、资溪、建宁、泰宁、光泽等县。各省都建立了中共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军区。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辖第1、第3、第5军团和若干独立师。连同地方红军共约8万余人。至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主力红军增设第7、第8、第9军团，连同独立师、团共约10万人，另有赤卫队、赤少队等群众武装约20万人。

中央苏区以及各地苏区的发展壮大，震撼了南京国民党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集团视之为心腹之患。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蒋介石集团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和对外退让对内用兵的自杀政策，得寸进尺，在吞并我国东北后，又将铁蹄踏向华北，长城沿线告急。然而蒋介石竟置北国安危于不顾，集全力于南方“剿共”。在英、美、德、意等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从1933年9月下旬起，向苏区和红军发动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其中用于围攻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兵力，共六七十师另5个飞行中队，合计50余万人，编成北、南、西3路军（同年冬“福建事变”后，又增编东路军），对中央苏区形成严密的战略包围。在军事战略上，采取稳扎稳打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同时，蒋介石总结了过去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认为以往所取战略偏重于军事，而忽略政治，以致“师劳无功”，所以对第五次“围剿”，特别强调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实行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全面“围剿”的“总体战”。

面对强敌压境，中央苏区形势异常严峻。但根据前4次反“围剿”的经验，如果遵循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采取积极防御方针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不是不可能的。然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却从军事教条主义出发，武断地否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创造的反“围剿”的成功经验，而实行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战争指导。他们反对毛泽东的诱敌深入，伺机歼敌的思想，而提出所谓积极进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提出“不丧失根据地一寸土地”等不切实际的

1934年夏又增设赣南省，同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粤赣省即行撤销。

口号，要求红军在苏区外战胜敌人。在战争进程上，他们否定毛泽东战略上的持久战、战役上的速决战的思想，而要求战略的速决，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在战役上，却又实行持久战，“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特别是在作战部署上，他们否定毛泽东力争战争主动权的攻势防御思想，即承认在战略上敌人对我大“围剿”，但在战役上，我对敌是小围剿，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或者来个大“换防”，跳到外线无堡垒地区去作战，打乱敌人进攻部署。然而，博古、李德顽固地坚持单纯防御方针，同优势敌人死打硬拼。起初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将红一方面军主力置于敌人堡垒之间，寻求与敌人决战。结果不仅未达日的，而且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

进攻受挫后，转而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以阵地战继续同敌人拼消耗。结果日益陷于被动，根据地逐渐缩小，人力物力资源日见匮乏。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一役，红军主力伤亡50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五分之一。虽然部队兵员得到补充，但部队素质开始下降。此后，敌人加速向苏区腹地逼进。在这个时候，要在苏区内部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实际上已不可能了。此时本应当机立断，以主力跳到外线，威胁国民党“后院”，打乱国民党军既定部署。但博古、李德固执己见，幻想以硬拼挽回败局。他们虽然从同年5月起就考虑实行战略转移问题，但迟疑不决，军事指导重心仍放在同敌人拼搏上。至六七月间，战局进一步恶化。7月上旬，各路敌军向中央苏区腹地地区发起全面进攻，这时苏区的人力物力资源即将告罄。在这危急关头，红军当刻不容缓地突围，跳到外线无堡垒的广大地区，寻机歼敌，以化被动为主动。然博古、李德仍当断不断，他们虽然意识到大势已去，思想上已开始准备突围转移，但却不注意保存实力，让红军继续去拼命。8月底驿前防线被敌人突破，红都瑞金即将暴露在敌人直接攻击之下时，中革军委才干9月上旬确定以保存部队有生力量为主的作战原则。然为时过晚，老骨干已大量消耗了，加之未采取有效措施休整部队，致使部队虽然减少了一些战斗伤亡，但并未减轻战场煎熬之苦。

10月初，敌紧缩包围圈，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中央红军发起最后攻击，瑞金危在旦夕。至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已成定局。于是，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决定立即率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在被迫实行远距离的战略转移问题上，博古、李德继续失误。虽然他们事先有所准备，但由于把保密工作神秘化，加之博古大权独揽，对战略转移这样的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更未在转移前给主力红军以必要的休整。不仅红军广大指战员不了解中央的战略意图，就是中央的许多负责人，也是在转移前夕才得知战略转移的大致打算。结果形成搬家式的仓忙撤退的被动局面。

（二）中共中央对留守中央苏区的安排

中共中央在决定率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对中央苏区的留守问题也作了原则的安排：

第一，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闽北分区在内）的斗争。党的领导机关为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人组成，项英为书记；行政领导机关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以下简称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梁柏台任副主任，谢然之（后叛变）任秘书长；军事领导机关为中央军委（其具体职权和负责人，起初未明确，直到红军主力突围后，中革军委才最后确定）。

第二，原则规定中央分局的行动方针和基本任务。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训令中指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后面去进攻敌人，解除敌人武装，壮大红军，散布苏维埃影响，创立新的苏区。同时以这样的行动，吸引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于主力红军的周围，极大的便利于中央苏区内部的红军、地方部队与广大群众去开展胜利的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训令”强调指出，“这种战斗的方式，就成为党目前（前）的行动的方针”。“中央苏区党的一切组织在中央这一总方针之下，自己各种工作所环绕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而游击战争应该并且必须成为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

“训令”接着指出：正因为游击战争是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因此在苏区内部的主力红军及地方独立营团，不是与敌人进行阵地的硬拼的战斗，而应该把这些主力与独立团营去培植、发展、辅助、团结群众武装。在主力红军的周围，要团聚着强大的地方部队与广大的群众武装，充实自己的武装与弹药。“这样准备着在适当的时机重新组织大的军团，准备着胜利的反攻。”

“我们党要坚持开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来扩大主力红军与独立团营，在广泛的组织游击队与群众的武装中来组织新的师与新的军团”。在组织形式上，“训令”要求把党的领导机关变成为精悍的有工作能力的机关。被敌占领的游击区域的党的领导机关，应该立即转入游击区域去，组织游击队，发动游击战争。

“训令”规定以“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作为留在中央苏区的党组织的基本任务，以及以游击战为作战的主要方式，而“不是与敌人进行阵地的硬拼的战斗”的指示，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对事变的进程估计过于乐观，以为中央红军突围远征，将吸引住大部分敌人而缓解中央苏区的压力，大大有利于留守的红军保卫苏区。因此，不仅没有明确提出中央分局必须实行彻底的战略转变，准备长期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的迫切问题，反而要求扩大主力红军，在游击队和群众武装中“组织新的师与新军团”，“准备着胜利的反攻”。这些脱离实际的一厢情愿的指示，对中央分局对形势发展的估计和行动方针的确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第三，决定留下一部分红军，作为坚持苏区武装斗争的骨干。其中直属中央军委的有：红24师（辖第70团、71团、72团），以及独立第3团、7团、11团。属各地方军区的部队（相当一部分是新建立的）有：江西军区的独立第1团、2团、3团、4团；赣南军区的独立第6团、10团、13团、14

团、15团、16团、赣南团、登贤独立团；闽赣军区的第12团、17团、18团；福建军区的独立第19团、20团，以及原直属中革军委指挥，此时正在闽西敌后活动的红8团和红9团。此外还有各县的独立营等地方部队。以上兵力连同伤病员共约三四万人。

在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前夕，红24师和各独立团即奉命从10月7日起，接替准备撤离的主力红军防务，并伪装成主力红军，迷惑敌人，掩护主力红军转移。中革军委考虑到留守红军难于固守现有阵地，因此指示中央军区，将瑞金、会昌、雩都、宁都4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划为最基本的地区和最后的坚持阵地。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遵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逐渐将阵地收缩至“三角地区”，并据此对敌作最后抗争。

党中央还嘱咐中央分局封锁消息。必须等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全部突围到了湖南后，才能向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公开宣布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消息。在这之前，必须严格保守秘密。

二、中央分局与中央苏区军民的英勇斗争

（一）项英、陈毅等临危受命

中央红军主力的突围转移，使本已危若累卵的中央苏区腹地，形势更加严峻。然而，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和留守的红军指战员，临危受命，义无反顾。1934年10月13日，项英在瑞金县梅坑之马道口召集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各部门留下来的主要负责人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对外则保密）。这些负责人大都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同苏区军民一道，顽强地抗击与牵制进犯之敌，为保障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安全转移，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自1934年10月7日起，红24师和各独立团奉命接替主力红军在东线、北线和西线的防御阵地后，就以主力红军的姿态抗击强敌，有效地迟滞了猖狂进犯的敌人，保证了主力红军的胜利突围。

在这期间，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赣南省委及赣南军区遵照周恩来的部署，积极开展工作。一是组织军民收集物资器材，抢架浮桥，开辟通路；二是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慰问红军，鼓舞士气；三是派出独立第6团，随主力红军之后跟进，以保障主力红军侧后安全。同时沿途收容安置伤病员，并担负主力红军的后方运输任务。此外，还赋予独立第6团相机进入赣粤边游击区，开辟游击根据地的任务。这是一个有远见的决策。

为了保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转移的机密，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中央政府办事处，将中央政府原来的全套机构保留下来，各部门、各机关依然保留原先的名称。被留下来的各部门负责人，继续领导本部门照常工作，各部门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制度照旧执行。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继续照常出版，其宣传内容仍是扩红、征收公粮、优待红军家属等等。这些措施，有效地麻痹了敌人，保证红军主力出敌不意地完成突围任务。直至10月下旬，敌主力北路军才确知中央红军主力已突围西进。东路敌人至11月上旬，还以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仍留在中央苏区。至于中央红军主力西征的战略意图，直至11月中旬，蒋介石才弄清楚。毋庸讳言，上述的保密措施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它在麻痹敌人的同时，也麻痹了留在中央苏区的干部和群众，致使他们对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和艰难处境，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

当然，在领导层中，对面临的逆境，是有所预料的，只是一时未达到共识。在主力红军开始转移后的第二天，即10月12日，项英向正在养伤的陈毅传达党中央的有关部署和商讨今后的斗争大计时，陈毅就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陈毅认为，在苏区人民面前摆开了一个新的形势，过去的中央苏区是个大块的根据地，堂堂之府，正正之区，同国民党反动统治形成了大规模的政治对立。而今根据地大部丧失，苏区赖以生存的数万红军主力离家远征，敌人大军压境，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整个苏区笼罩着一片乌云，一场大的暴风雨随时可以袭来。据此，陈毅判断敌人即将进入苏区腹心地区，苏区反“围剿”失败已成定局，革命已转入低潮。他认为，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须赶快转变斗争方式，部署打游击。随后，陈毅还提出了具体建议：红24师和各独立团分散到苏区各个县去，作为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可以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力量；高级干部如瞿秋白、陈正人、周以栗等身体有病，还有一些体质不佳的知名人士，最好让他们穿上便衣，到白区去隐蔽起来。坚持打游击，他们是吃不消的。事实证明，陈毅的判断与建议是完全正确的。在苏区（包括已陷落的地区）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党中央

的既定方针，但如何开展，却缺乏明确的具体的措施。 10月18日，项英发表了题为《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文章，指出：“发展游击战争是我们中央苏区整个党与苏维埃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只有完成这个任务，才能解决我们在五次战争中‘死亡或者胜利’的历史问题。”项英在文章中还援引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10月3日宣言对群众游击战争的涵义作了解释：“群众游击战争就是苏区每个工农群众保护自己的生命、儿女、土地、财产的自卫的保护自己的最好形式。同时也是牵制、扰乱、疲惫和分散敌人，帮助主力红军取得胜利的重要工具之一”。接着，文章号召苏区工农劳苦群众“全体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加入游击小组，发展广泛的群众的游击战争，来扰乱和牵制敌人，以阻止敌人侵入到我们中心地区”。通观全文，其主旨在于动员工农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配合红军部队遏制敌人，保卫苏区。至于留守苏区的红军部队，如何投入游击战争问题，文章尚未涉及。在项英的号召下，凡是党组织尚能控制的地区大都组织起群众性的游击队或游击小组，在闽赣（汀瑞）边地区，还分别建立了瑞金、瑞西、兆征等县游击司令部，统辖群众游击武装。这些群众游击武装，积极配合红24师及各独立团（营）袭扰敌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由于形势急转直下，陷落地区的苏维埃政权解体，党组织陷入困境，失去掌握的群众游击武装遂自生自灭，未能达到“胜利的保卫苏区”的目的。

10月21日晚，中央红军主力于江西零都县西南的工母渡、新田之间，突破粤军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22日，中革军委就宣告成立中央军委和发动群众性游击战争问题致项英电：“中央军委应从即日起宣告成立，项兼军区司令员，并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24师和红10军”。关于具体的斗争任务和部队部署问题，中革军委指示：“在目前赣南开展局面下，应责成赣南军区率领各地方独立部队深入到敌人撤退的区域进行（下列任务）：1.发动群众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并抗击粤敌撤退。2.消灭铲匪，争取被欺骗的反水群众回家……3.收容与阻拦野战中伤病员及逃亡人员，并负责动员群众前运粮弹，后运伤员。各地方部队的分布如下：（1）赣县或零都独立营到王母渡下游洛河两岸；（2）独14团前出至韩坊、固陂、小盆地地域并逼近信城；（3）独立6团以1个营前出到金鸡、新田、安息地域；（4）独6团主力前至重板石、龙布地域；（5）独15团在门岭河与安远河之间深（入）门岭、安远之间活动，抗击粤敌李纵队左翼侧；（6）独16团在站塘、麻洲地域，从下面逼近门岭；（7）独10团仍留门岭、会昌以东地域；各游击队应在独立团间隙中活动。”

项英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立即向内部宣告正式成立中央军委，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军区直接指挥红24师和几个基干团，节节抗击进犯之敌，逐步退守到“三角地区”。

（二）严峻的局势与中央分局的决策

1934年10月下旬，敌北路军得悉中央红军主力已突围西进后，即在其东路军协同下，加紧向中央苏区腹地突进，于10月26日占领宁都县城。11月1日敌东路军攻陷长汀县城。中央苏区斗争形势每况愈下。有鉴于此，中共中央于11月3日致电项英，指示新的斗争方针：“1.一般的应放弃从正面的防御，而应利用敌人前进的迅速和筑堡的短促，在敌人侧翼及后方发展游击战争；2.目前已无使用24师抗击李纵队之必要，而是灵活使用……24师行动的方式主要的应是游击战争的方式，不过是在较大的范围内统一行动；3.江西、闽赣和福建军区应在敌人复杂的封锁线外行动，江西军区在石城、宁都、兴国以北行动，闽赣军区在汀州东北地域，福建军区在汀州东南及西南地域行动；4.现在中央分局及中央军区应由梅坑转移到宽田地域。”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24师从东线撤至瑞金县境，并改变正面防御的作战方式，主要采取择机伏击、袭击等战术打击敌人。与此同时，中央分局等领导机关由瑞金梅坑迁移到零都县宽田区的龙泉村和石舍村（随后复迁黄龙井塘村），并确定以宽田为中心，坚守中革军委指定的瑞会零宁边界的“三角地区”。为便于领导，中央分局还决定在驻地附近地区（包括瑞金、西江两县的部分地区）设立新的县治——瑞西县，隶属于中央分局。

国民党军乘中央苏区机关部队后撤之机，迅速推进，11月10日占领红都瑞金，17日占领零都县城，23日占领会昌县城，在这之前，闽西地区的宁化、清流、归化也相继落入敌手。至此，中央苏区所有县城均告失陷，剩下的只是远离城镇的山区。

11月中旬，蒋介石侦悉中央红军主力拟前往湘鄂西与贺龙、任弼时所部（红2、红6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后，立即调集重兵对主力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同时严令其在中央苏区周围的部队，加紧“清剿”。声言“竭泽而渔”、“铲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一时间阴霾密布，狼烟四起，疯狂的反革命风暴席卷中央苏区。这时，原先“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8个纵队数十万人，除薛岳、周浑元等纵队被抽调去追击主力红军外，大部分仍留下，继续“围剿”中央苏区。他们从北、东、南3个方向向中央苏区尚存区域进逼。采取集中兵力据守各个县城和交通要道，配以堡垒封锁的办法，将中央苏区分割成若干小块，最后分区逐个“剿灭之”。在原中央苏区范围内，除国民党正规军外，还有为数众多卷土重来的地主豪绅，流氓恶棍结成的“靖卫团”、“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等反动武装。他们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配合国民党军进行“清剿”；以凶残的手段镇压苏区军民。用活埋、挖心、肢解、“点天灯”、“凌迟处死”等惨绝人寰的酷刑，对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施行阶级报复。同时采取欺骗伎俩，诱迫一些意志薄弱者自首、“自新”，企图从政治上瓦解革命力量。对上述严峻的局势，苏区一些领导人虽曾有所预料，并设想尽早转变斗争方式，以适应新的斗争环境。然而让中央苏区军民，一朝放弃曾引以为荣的“堂堂之府，正正之区”，在心理上是难于承受的。特别是中央分局为中共中央赋予的“保卫苏区”的任务所约束，加之分局对当时斗争形势认识不足，没有清醒地估计到当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敌人绝不

指敌东路军第4纵队李延年部。

会根本放弃对苏区的进攻。同时过于乐观地估计红军主力远征湘西，将开创新局面，如中共中央 10 月 8 日“训令”所指出的那样，将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大部分吸引到湖南去，有利于中央苏区军民战胜敌人的进攻。据此，分局寄希望于配合主力红军回师反攻，恢复中央苏区，而没有适时地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当时分局领导还估计敌人只能占领城市和大的圩场，红军和游击队最低限度可以保持许多不相联系而偏于乡村的苏区。基于这种估计，为了便于分散的各块苏区独立作战，分局决定积极建立和健全各地军分区和党的特委组织，加强各个作战分区的主力——独立团。因此，实际上忽略了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的建设。在军事斗争和群众斗争方式上，基本上沿袭原苏区的方式。虽然，放弃了同敌人死打硬拼的阵地战，但仍采用大兵团作战方法。把留下的大批干部及红 24 师等基干部队，集中在“三角地区”及其周围，作消极防御。而没有在这一带以进攻手段，消灭这一地区的地主武装，争取群众，造成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基地。这是一个重大的失策。

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由瑞金梅坑迁到雩都宽田地区时，形势已异常困迫。而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工作制度和活动仍一如既往。中央分局还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训令”，不切实际地在部队中提出“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准备配合红军主力，进行反攻”等“中心宣传口号”。为此，不惜削弱地方游击队，组建独立团。并将那些勉强出院的伤病员编入主力部队，充实红 24 师。此外，还打算办军事学校、兵工厂等。一切依旧的形式，以图东山再起，重建一个大的革命根据地。这作为主观愿望，自然是好的，它反映了以项英为代表的革命者坚定的信念与雄心壮志。然而，这个构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脱离客观实际的，因而是行不通的。

11 月 10 日，敌人占领红都瑞金城后，趾高气扬，得意忘形，马不停蹄地向会昌推进。留在苏区的红军指战员，眼看引为骄傲的“红色都城”惨遭敌人践踏，义愤填膺，纷纷请战，以打击敌人嚣张气焰。红 24 师领导，针对敌人的进犯意图，提出以伏击战歼敌于运动中的设想。这正符合中央分局领导设法打一个大胜仗，以振奋士气，扭转被动局面的意图。因此红 24 师的作战计划很快得到了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的支持和批准。

这时，敌东路军第 3 师师长李玉堂正率所部两个旅由瑞金向会昌进犯。李玉堂是红军的手下败将。两个多月前（9 月初）在东线温坊战斗中，红 24 师协同红 1 军团，给李部以痛击，歼其 1 个旅，俘虏近 2000 人。李部经整补后又重新上阵。可谓冤家路窄，红 24 师遇到老对手，心中有数，斗志倍增。中央军区抓住这个有利战机，命令红 24 师赶赴会昌与瑞金之间的谢坊附近的湾塘岗设伏待敌。湾塘岗距会昌城约 10 公里，其右侧是起伏的山峦，左侧是滔滔不绝的瑞金河，中间一条大道直通会昌城，是打伏击的理想战场。

根据中央军区命令，红 24 师 3 个团埋伏在湾塘岗右侧山岗后面，担任主攻；福建独立团和地方游击队置于瑞金河左岸，负责阻击左翼敌人前进和打击增援之敌。11 月 22 日，敌李玉堂部分成 3 个梯队，各相距几公里沿瑞金大道开进。同时派出 1 个营沿瑞金河左岸与其主力平行推进，以作掩护。是日中午时分，敌第一梯队进入红 24 师伏击圈，师长周建屏一声令下，全师指战员如下山猛虎扑向敌人。敌遭突然袭击，顿时乱作一团，不知所措。不到半小时，敌先头旅便被歼过半，另一半夺路溃逃。由于红 24 师兵力不足，福建独立团又未及时赶到阻击地点，加之过早发起攻击，敌尚未全部落入伏击圈，故未能全歼。这是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后，中央苏区红军打的第一

个大胜仗，对军心民心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些同志的盲目乐观情绪。

敌人在谢坊战斗中，发现中央苏区仍留有红军正规部队后，气焰有所收敛，在占领会昌城后，暂时改变了“长驱直入”的急进战术，而采取缓进战法。一面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进一步对中央苏区分割包围；一面积极寻找红 24 师决战。

这时苏区局势更为恶化。由于敌人接受谢坊战斗失败的教训，不敢贸然猛进，这就造成苏区红军有序地实行战略转变，采取分散游击的有利时机。这时实行战略转变，虽不如红军主力刚撤离苏区，敌人尚未摸清中央红军战略意图时有利，但亡羊补牢，犹未为

晚。当时，中央分局为此曾召开会议研究，但未就实施战略转变及部署分兵游击等重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又一次因循坐误，没有适时改变大兵团作战方式。

（三）中央分局行动方针的初步转变

1934年12月中旬，中央苏区面临的局势更加严峻。在北线和东线，敌从宁都到瑞金、会昌的碉堡封锁线已基本形成。在南线粤军余汉谋部4个师已从追堵主力红军转而回防赣南；在西线，从兴国到雩都的封锁线已经形成。中央苏区已被分割成若干小块，每块都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之中。中央分局率红24师等基干部队据守的“三角地区”，虽然力量较强，但回旋余地小，尚能控制的地域南北仅50余公里，东西宽约30余公里。而敌人在这个地区周围部署了

10多个师的兵力，正准备对红24师等基干红军发动“最后一击”。至于其他被分割包围的地区，由于力量薄弱，加之固守过时的斗争方式，更是岌岌可危，有的已被敌人各个击破。此外，在革命队伍中一些意志薄弱者临危变节，投敌叛变，为虎作伥；一些落后群众也被迫反水，基本群众受到严重的威胁。这个严酷的现实，使中央分局的领导人意识到再不能照老办法坚持下去了。为此，项英接连不断地发电报请求中央指示新的行动方针。在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仍为“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着，加之长征途中遭敌人重兵围追堵截，

自顾不暇，故迟迟未予复示。

为了摆脱被动，项英于1934年12月中下旬，召集中央分局会议，研究对策。会上，陈毅等人提出应迅速转变指导思想，采取新的行动方针，依靠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清剿”的设想。经研究，分局决定放弃依赖主力胜利回师反攻的主意，提出了“独立自主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开始注意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但是由于受到认识的局限，特别是尚未接到中共中央新的指示，未能彻底放弃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这次行动方针的转变，只是初步的而不是彻底的战略转变。

中央分局主要采取了下列的转变措施：

第一，广泛进行政治动员，号召苏区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这之前，由于过分强调保密，对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和苏区面临的严重形势，未向部队和群众作深入的实事求是的宣传解释。苏区军民普遍缺乏应付严重局势的思想准备。针对这个情况，分局决定在一般干部和军民中公开地、深入地宣传主力红军突围的重大意义，讲清苏区面临的严重形势与任务。12月25日，中央军委政治部编写了《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讨论提纲》，印发排以上干部讨论。《提纲》根据中央（10月8日）训令精神，强调指出，中央苏区党的基本任务，是在党的总的行动方针之下“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游击战争是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提纲》仍受《训令》中一些抽象号召所束缚，不切实际地要求“扩大现有部队”，“号召和吸引群众到队伍中来，扩大主力红军和独立团营”。这些要求同“分散游击”的方针是矛盾的。它反映了中央分局在指导思想上还未彻底转变。

12月29日，中央分局又召开了瑞西县和瑞金县活动分子会议。项英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敌人“清剿”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具体分析了粉碎敌人“清剿”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提出了粉碎敌人“清剿”的8项措施：1.深入宣传鼓动工作，动员一切力量开展对敌斗争；2.各个地区党组织就地坚持、广泛开展游击战争；3.进行坚壁清野，准备持久战斗；4.镇压反

革命，消灭内奸，巩固内部；5.开展反叛徒斗争，但要注意政策，应把叛徒与被欺骗的群众区别开来；6.加紧被占领区工作，建立秘密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各种斗争，以配合游击战争；7.开展群众性的瓦解敌军工作；8.党的一切工作都为着开展游击战争。这些对统一干部思想起到一定的作用，只是由于形势紧急，难于全部落实。

第二，加强对敌斗争的指导和领导，对不同地区提出不同的要求。在苏区，坚持在敌人封锁线内领导武装队伍和群众，反对敌人“清剿”；在敌人后方，积极发展游击战争，抵制和吸引敌人，支援苏区斗争；在敌占区，加强秘密工作，配合游击战争。在具体部署上，要求每个地区保持一个基干部队，作为开展游击战争的中心力量，并确定各县独立营扩大到400—500人；区游击队扩大到100—150人。同时规定党政机关负责人随部队行动，以加强对游击战争的领导。为了适应新的任务的需要，分局还决定在中心区举办游击训练班，以提高游击队的战术水平。

第三，加强机关、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干部、战士对革命前途的认识，以增强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开展反对不良倾向的斗争，着重反对“失败主义”和右倾逃跑现象，努力巩固部队。12月29日，中央军委政治部发布了《巩固我们的部队》的指示，要求“每一个红色战士，都要有坚定的胜利的信心，团结一致的意志”。号召干部战士同“那些悲观失望，恐慌动摇逃跑的分子作斗争”。

第四，派出一批得力干部到各地去加强领导和开辟新区，并决定在几个重要地区建立新的特委。据此，中央分局从1934年底至1935年初陆续作出下列安排：

1.在赣粤边地区成立中共信（丰）（南）康赣（县）（南）雄特委（后改称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由曾长期在这个地区坚持斗争的李乐天任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以中共赣南省委宣传部长杨尚奎任特委副书记。其任务是率领一批干部和1营兵力，前往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界地区，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并相机与湘赣边、湘鄂赣边、闽西等游击区取得联系。李乐天尊照中央分局决定，率队从赣南省委驻地零都县小溪出发，于1935年1月下旬到达信丰油山地区，与在南雄、信丰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会合，积极扩展活动范围。这一措施，为尔后开展赣粤边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2.派原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回闽西龙岩、永定、上杭地区，领导游击战争。张鼎丞受命后，即从粤南向闽西进发，途中联系了闽西干部刘永生、范乐春、陈茂辉等数人，并从永定留汀难民中动员了一些人，带上8支步枪，机智地越过敌人层层封锁。于1935年2月初抵达岩永杭地区。随即同坚持当地斗争的党组织和部队取得了联系，重新部署游击战争。

3.人事调整。调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调原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调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长罗孟文到杨（殷）赣（县）特委书记兼杨赣军分区政治委员。

4.在赣西南和闽赣（汀瑞）边增建两个中共特委。一是公（略）万（安）兴（国）特委，设在赣西南吉安东固地区，由原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胡海任特委书记；二是瑞西特委，设在闽赣边的（长）汀瑞（金）地区，调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任特委书记。同时抽调部分武装组建汀瑞边界各县独立营，作为开展闽赣边游击战争的骨干。

此外，为减轻后方负担，对伤病员作了适当的安排，除重伤病员外，能

离开医院的，一般都动员出院，或补充部队或分散休养。

中央分局的上述措施，对精简机关和加强各地区的领导，以及尔后坚持游击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未能改变当时中央苏区日益严重的被动局面。中央分局在部署和指示各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在苏区核心地区仍沿用过去苏区的老办法，将直属中央军区的红 24 师和几个基干团继续集结在“三角地区”，进行大兵团作战，而没有分散到各地去开展游击战争。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也没有多少变化。这一切，表明中央分局还未下决心实行彻底的战略转变。

三、牛岭战斗与中央分局的战略转变

（一）牛岭战斗

为了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和寻机歼灭运动之敌，红 24 师和几个基干独立团，不断主动出击。但由于部队减员过多，新补充的兵员又多是刚从医院出来的伤病员，有的伤病尚未痊愈，被动员勉强出院后编入战斗部队，心理尚未调整过来，加之形势急剧恶化，影响士气，部队战斗力大为下降。因此，战斗每每失利。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洋陂战斗和牛岭战斗。

1935 年 1 月 12 日，红 24 师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向驻守宁（都）瑞（金）边洋陂之敌第 67 师的 1 个团发起进攻，以图遏止敌人*2 构筑碉堡封锁线。经两天一夜苦战，不仅未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红 24 师伤亡 400 余人。

继洋陂战斗后，又发起牛岭战斗。红 24 师和独立第 3 团、11 团共 5 个团 5000 余兵力及部分地方武装投入这次战斗。据侦察获悉敌粤军第 2 师部队正向赣县牛岭一带开进。中央军委决定集中兵力在牛岭地区伏击或袭击运动之敌。红 24 师和两个独立团于 1 月 28 日奉命出击。部队经大半天行军赶到目的地时，太阳已西斜，指战员十分疲劳，本应休息待机。然而，指挥员求战心切，当得悉敌先头部队只有 1 个营已到达牛岭时，前卫团既未对敌情作进一步侦察，也未作周密部署，就要求发起攻击。师长周建屏也未深加考虑，就表示同意。他除了派 1 个团置于唐村至牛岭大道一侧担任阻击援敌外，将后续的 3 个团也加入进攻战斗。以 4 个团的兵力歼击敌人 1 个营，本应稳操胜券，但由于操之过急，指挥失当，反而遭致不应有的失败。

当周建屏同意发起冲击时，部队未按战斗队形展开，仍以行军纵队一路冲向牛岭圩。驻止之敌占据村舍，先不还击，以逸待劳。等红军冲到面前时，突然以优势火力发起猛烈的反冲击。疲惫而又缺乏思想准备的红军先头部队猝不及防，很快就被冲散了，而前卫团慌忙后退又将后续部队冲乱。此时敌增援部队 3 个营冲破红军拦阻也赶上来了。他们乘胜追击，直追到红 24 师指挥所，师长周建屏中弹负伤，幸得师政委杨英率师直属队顽强抵抗，才将敌人击退。然而红军部队已全被冲散，直至第二天才集合起来，计伤亡、失踪人数约千人，损失枪支 400 余支。红军以 5 个团之众被 4 个营的敌兵打得如此惨败，在红军战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这除了指挥失当外，同当时部队的素质与士气，也不无关系。

（二）中央分局面临重大抉择

牛岭战斗的失败，再次证明，在主力红军撤离苏区后，“大兵团作战”和“保卫苏区”的指导方针是行不通的。急剧恶化的局势已把苏区军民推到了存亡继绝的紧要关头。中央分局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

这时，国民党军已开始全面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分区清剿”：北路敌军罗卓英等纵队于1月间对早被围困在宁都小布地区的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军区机关、部队发起最后攻击。2000余名红军指战员和机关干部，在突围中大部分被打散了。省军区司令员李锡凡等领导人不幸牺牲，只有省委代书记、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率一部人突围转移到了东固，但已与中央分局失去联系；中共闽赣省委和军区被迫于1934年11月率所属机关部队撤离驻地福建省宁化县城，向闽中方向突围转移。途中几遭挫折，到1935年1月间，原数团人马和机关干部共2000余人只剩下约300人，陷入敌人围追堵截之中；南路敌军余汉谋部3个师，将中共赣南省委和军区机关、部队共约1800人包围在零都南部狭小地区，并一步步地缩小包围圈，以图“一网打尽”；东路敌军蒋鼎文部以第26师及闽赣两省保安团，对固守四都山区的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军区机关及所属的两个独立团约4000人，发动猛烈进攻，虽然福建军区部队顽强抗击，但失败已成定局；闽赣边之敌对坚持（长）汀瑞（金）地区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发动了全面“清剿”。至于中央分局机关所在的“三角地区”，敌军更是不遗余力，零会河上游和下游的国民党部队南北对进，在其东线和西线部队协同下，对该地区实行夹击。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一举扑灭中央苏区的基干红军和领导中枢。

被围困在会昌县西江和零都县黄龙、宽田之间狭长地区的中共分局和中央军区领导机关，虽然还保持着相当数量的兵力（连同机关于部约1.5万人），但物资供应和财政即将枯竭，经费只能维持到2月间，粮食只够吃到3月中旬，枪支弹药的消耗更是无法补充。此外，中央分局不仅同中央苏区各省委失去了联系（赣南省委除外），而且湘赣等相邻苏区也已中断了联系。这一切表明，中央苏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时摆在中央分局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彻底转变战略方针，迅速组织突围，另图发展；一是坚守“最后阵地”与敌拼到底。事情已很明显，后一条道路必将导致全军覆没，可供选择的只有突围转移一途。

然而突围转移并非易事，首先遇到的是转移方向问题。1月30日，项英在致博古、朱德、周恩来电中提出，向“南则非大打击粤敌不能立足，西到湘赣（苏区）则转移不易，东则无大发展前途，给养甚困难。如穿袭封锁线，则部队（有）巨大不便”。因此拿不定主意，故要求中央迅速给予具体指示。电文还特意提出：请中央在“任何紧张情况下，应抽空讨论我们的问题，并迅速回电”。

曾山等转移到东固后，复遭敌人袭击，余部再次被打散。曾山于同年5月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

1935年2月下旬，敌蒋鼎文以第36师及闽赣边界各县保安团等绝对优势兵力对福建省委等领导机关、部队发动全面攻击。经激战，红军指战员大部伤亡，幸存100余人在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和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等率领下，向武平方向突围。4月10日在武平、会昌边界地区遭敌陶峙岳部包围合击，部队被打散，万永诚、龙腾云在战斗中牺牲，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必先突围后，在向江西会昌转移途中不幸被俘，后在江西九江就义。

项英未见党中央复电，旋于2月1日再电朱、周、博，请求中央迅即决定中央军区目前行动方针。电文称：“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接着电文提出中区部队集中行动与分散目标两策的利弊问题：“集中行动必有立足之地，不能长久游击，目前四周无此条件，否则一战不利，即被敌冲散”。“分散目标，便于游击，但各自为战，领导困难，有被敌各个击破”的危险。对此有关中区前途的行动方针问题，须由中央决定，故盼中央在一二日内电示。

由于情况紧急，在党中央复电前，为应付不测，项英在零都县黄龙井塘村召集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商讨行动方针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项英、陈毅、贺昌、陈潭秋，以及何叔衡、谭震林、毛泽覃、邓子恢、汪金祥、李才莲等。与会者经讨论，对面临的险恶局势取得了共识，并一致同意突围转移。但对突围方式，即集中行动还是分散行动，以及突围方向问题，意见不一。于是，项英于2月4日凌晨1时，急电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请求迅即指示。项英在电报中再次提出，“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请中央尽速定夺。

因未得到党中央指示，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对转移方式与方向问题，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于是项英又于2月5日以分局名义再次急电党中央，报告分局对行动方针的两种意见：“1.为保持有生力量，留少数部队及人员继续在中区活动，大部集中过信（丰）河。但目前情况能否过河，尚成问题。2.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主要方向为湘赣、饶和埔[埔]、闽赣。分局随部队行动，继续在中区领导斗争”。请求党中央立即复示。

饶和埔，即位于闽粤边界的饶平、平和、大埔地区。

（三）中共中央迭电指示与中央分局战略方针的彻底转变

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中旬在贵州省遵义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并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新的党中央以新的姿态投入领导工作。当接到项英和中央分局接连发来的紧急请示电后，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即行讨论，作出了“关于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并以中央书记处名义于2月5日用“万万火急”电报，下达项英和中央分局：

“（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这是中共中央自突围转移后，就有关战略方针问题，给中央分局的一个最重要、最明确的电报指示。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央分局立即决定实行彻底的战略转变，着手缩小机关，计划分散部队，开展游击战争。

2月7至9日，敌北路军加速进犯雩会河（贡水）沿岸地区，企图将中央军区机关部队围歼于雩会河北岸。鉴于这一敌情变化，中央分局当机立断，不待党中央有关“决议详情”下达，即决心采取几项紧急措施：

第一，彻底精简后方机关，妥善安置伤病员，减轻部队负担。

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时，在中央苏区留下数以万计的伤病员。这些伤病员原先分布在雩都、瑞金、会昌、宁都、西江、石城、宁化等县的红军医院中。后来随着前沿苏区的陷落，各地医院陆续向瑞金、雩都县境集中。因此，大部分休养员（约6000人）也集中到这个地区。随后一部分伤病员伤（病）愈出院归队，一部分伤势较轻者，经动员后也相继离开医院。迄2月1日，留在医院的重伤员尚有2000人，加上为这些伤病员服务的人员和后勤人员形成一个庞大的后方队伍，使部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么多重伤病员既不可能随部队突围转移，也不可能集中休养，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群众，分散隐蔽。

然而伤病员都是以红军部队为家的革命战士，一旦离开红军这个大家庭，在心理上一时难于承受。因此，分局决定由陈毅负责动员疏散工作，陈毅也是因重伤而留下来的，他与其他伤员的心情是相通的，由他做动员说服工作，易为伤病员接受。

陈毅在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凯协助下，对住院伤病员进行动员说服工作。陈毅对伤病员不是用抽象的言词予以抚慰，而是坦诚相见，将面临的险境如实地告诉他们。他说：江西根据地是失败了，但革命不会失败。革命火种不灭，将来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出现。现在是险恶的时候，同志们先疏散回家或到老百姓家里去隐蔽养伤。伤好后，种地也好，打游击也好，等革命

发展时再回来。但同志们千万要珍重，做失败形势下的英雄。万一遇到不测，不要拉拉扯扯。伤员们通情达理，他们慷慨激昂地回答说：“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就行了”，“我们宁作刀下鬼，决不向敌人投降！”“只要革命有希望，我们就安心了。”寥寥数语，表现了革命战士在危急关头的英雄本色。

伤员思想通了，还得依靠群众帮忙，把伤员交给群众。陈毅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同群众商量，动员他们为革命分忧。陈毅诚恳地对上了年纪的乡亲们说：“你们把这些同志抬回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的人！”苏区群众同红军血肉相连，一经说明情况和要求，就积极响应。一时间，在伤员休养的地方出现了动人的场面：老大爷、老大娘，或一人背一个或两人抬一个，很快就把重伤病员全部疏散完毕，为领导机关和部队解除了后顾之忧。

第二，安排年大体弱的领导人先行转移。鉴于一些高层领导人或年事已高，或体弱有病，难于随部队打游击，分局遂决定让他们经福建转到香港等地，隐蔽疗养和从事地下工作。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中央分局委员瞿秋白，党的“一大”代表、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何叔衡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副部长邓子恢等。瞿秋白、何叔衡等于2月11日在警卫武装护送下从雩都县黄龙井塘村出发，经瑞金县武阳，越过敌人封锁线，安抵四都山区，与福建省委会会合。随后继续向东南方向进发。24日在长汀县水口地区突然遭到国民党军包围袭击，何叔衡在与敌人搏斗中英勇牺牲。瞿秋白不幸被俘，并于同年6月在长汀慷慨就义。邓子恢冲出敌人包围圈，折回四都。后来，他与从雩南突围出来的陈潭秋、谭震林等一起，从四都抵达闽西永定地区，与张鼎丞会合，就地开展游击战争。

第三，分局率领机关部队迅速南渡雩会河，占领有利于转移的出发地区。2月12日前后，项英、陈毅、贺昌等率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委区机关、部队离开井塘村，安全渡过雩会河，转移到雩南禾丰地区。

2月13日、23日和28日，中共中央迭电中央分局及中央军委，具体指示行动方针和通报遵义会议精神。

党中央在13日的电报中，对中央分局的任务、行动方针和斗争方式等重大问题，作了详尽的指示。指示电首先指出：“放在你们及中央苏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忍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应该认识中区目前环境的严重性。但应该认识中区的斗争对于全国仍然有极大的意义。应该坚信如果我们能够坚持群众游击战争，其效果将使国民党无法顺利统治曾经得到解放的数百万群众，将使蒋介石许多部队受到牵制。”

关于中央分局的行动方针及具体部署问题，中央指示电明确指出：“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一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应是基干队的普通方式。这种基于队在中区及其附近，应有数百支。较大地区设置精干的独立营，仅在几个更好的地区设置更精干的独立团。依此部署之后，把那些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干是目前的原则。同时普遍发展群众的游击组，把多余枪弹分配给群众，最好的干部到游击队去”。“游击队应紧密的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而斗争，给养依靠群众及部队自己解决”。

中央指示电，还要求中央分局对中区周边地区及敌后有计划地部署游击

战争：“上犹、崇义、南山、北（山）、油山、兴、龙、饶、和、浦等处要加派精干部队及好的领导人去。在这些地方开展游击战争，将给中区的斗争以极大的帮助。湘南游击区也应由你们去加强，但不应以庞大部队远出而应以相当部队依傍着中区配合发展。依野战军及红十军（团）的经验，如你们以大部队远出，是没有胜利保障的。”

中央指示电，特别强调“彻底改变斗争方式”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明确指出“一般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方式。要加强秘密工作，使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突击运动及勉强使用纸币目前都不适宜了”。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方式，党中央要求中央分局给地方党及游击部队以极大的独立领导权，并培养他们这种能力，即使长期隔断，也能独立存在。因此，“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作为领导中枢的中央分局“手里应有一个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地方机关亦然”。

此外，中共中央还就群众工作、白军工作和白区工作等，作了具体指示，要求中央分局选派许多适宜的干部到白区去。并设法建立汕头、厦门、香港、上海及其他地方的工作。

中央分局遵照党中央指示，立即召集会议，研究落实措施。会议对中央苏区部队和党政机关工作的转移问题作了初步安排。随后，项英于2月19日和21日先后致电博古、朱德、周恩来和朱、周、张（闻天），报告中央分局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的情况和打算：部署部队主要分布于赣南与闽赣、赣粤边界的龙岩、上杭、武平、寻邬、安远、蕉岭等县，分局主要领导人率队辗转活动于赣南、闽西。

2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项英和中央分局，就分局执行党中央指示应注意的问题，作了具体的指示。其大意是：1. 深入思想动员，将行动任务与形势，向广大指战员解释清楚，并尽可能给部队以休整时间；2. 所有出发游击的部队，必须绝对轻装，一切供给均应取之于活动地区；3. 每一个部队不要拥挤很多的干部，即分局的一个团，也不应把分局的人都集中在一起。除项英、谭秋、贺昌三个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部队内负责工作。陈毅可独立领导一个独立团。分局带的工作人员全部不应超过10人；4. 苏区干部除分散到游击队去的外，应有一部分派回到被占领区去，可能时最好是自己的家乡，隐蔽在群众中，进行与建立秘密工作；5. 白区干部应尽量分散到白区，特别是邻近白区去；6. 对所有干部应解释清楚，万一被敌人冲散或隔断时，应有决心独立进行工作，顽强奋斗；7. 必须周密地建立交通网；8. 在游击活动中，必须特别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机械地使用老苏区的一切办法的倾向。应广泛地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

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2、6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委电中，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告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和纠正了博古、华夫（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及博古的“严重的政治错误”。书记处要求中央军委坚持中央苏区、湘赣苏区等游击区域的游击战争，并强调指出：“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任务。”这一电报指示，使中央分局领导明确了过去的一些原则是非，进一步增强了实现战略转变和坚持游击战争的决心和信心。

四、九路突围与中央苏区的终结

（一）中央分局的突围部署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当面情况，中央分局决定立即组织机关、部队分途突围转移，分散于原中央苏区周围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这时，滞留中央苏区最后一块“净土”——雩南禾丰、上坪地区的红军部队和机关人员共约1万余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委决定除留一部分人就地坚持斗争外，其余的分头突围，择地另图发展。具体部署如下：

1. 由少共中央分局书记李才莲率独立第7团，由会昌穿过敌人封锁线，经汀瑞边转至原闽赣军区（建宁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如有可能再转到博生（宁都）县以北，恢复和领导该地区的斗争；

2. 由分局委员陈潭秋和原福建军区政治委员谭震林率红24师的4个连，到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在闽粤边坚持游击战争；

3. 由分局保卫局长汪金祥率红24师的4个连，到寻邬以南及焦岭、安远、武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4. 由原红19师第55团团长李天柱和孙发力率红24师的4个连，依托寻（邬）南原有的游击区，向广东东江地区发展，并同在这一带领导群众斗争的古大存取得联系；

5. 以红24师的两个连，挺进赣粤边的三南（定南、龙南、虔南）地区，建立三南游击区，并争取与信（丰）南游击区打成一片；

6. 由中央军委参谋长龚楚和石友生（第71团政委）率红24师第71团（约9个连）越过安南江，经赣粤边之油山，转至湘南，收容红34师失散的队伍，并在该地区开辟游击区；

7. 由独立第3团团长徐洪（鸿）、政委张凯率该团和曾在湘赣边、湘鄂赣边工作过的同志，越过信丰河，到湘赣根据地，向湘赣省委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并留在该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正在生病的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陈正人，随独立第3团转移，待突围后赴白区隐蔽疗养；

8. 由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率独立第6团，留赣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9. 中央军委司令部直接指挥红24师第70团（周建屏兼团长，杨英兼团政委），在中央苏区穿插游击，并与各游击区保持联系，以便指导各地斗争。项英、陈毅、贺昌等领导人随第70团行动，其余机关工作人员，分别派到各地和部队中去。

从当时的情况看，中央分局的分兵部署是正确的，它体现了分局实行彻底的战略转变的决心与长远规划。然而由于时机过晚，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加之个别部队内部生变，致使突围转移计划遭到严重挫折。

红5军团第34师，于1934年12月初，在掩护主力突破国民党军湘江防线后，被截断于湘江之东，大部牺牲，小部失散于湘南。

（二）各路突围部队的结局

在项英、陈毅统一指挥下，各路突围部队从2月中下旬起，陆续实施突围转移。鉴于敌情急剧变化，项、陈对原定部署又作了适当的调整，决定所有机关、部队全部分途撤离粤南地区。

各路人马突围的情况与结局，大致如下：

汪金祥和李天柱、孙发力分别率领的两支队伍，从粤南出发，穿过安（远）会（昌）边界，于2月25日到达安远、寻邬间的清溪一带，遇粤军第4师堵击，激战3日，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汪、李等率余部二三十人突出重围，于2月底到达寻邬南部地区，利用山地隐蔽待机，徐图发展。

徐洪、张凯率领的独立第3团，从粤南小溪地区向湘赣边转移，2月25日到达信丰县桃江王母渡。当部队正在渡河时，突遭敌人袭击，部队被截成两半，徐洪阵亡。张凯率余部约六七百人转向粤南，再沿安远、信丰南部突围。3月4日，到达信丰石背，又遇敌阻击，经一场恶战，始冲破敌军包围。张凯与随独立第3团突围转移的陈正人，率突围出来的100余人，到达安远、寻邬南面山区，与先行突围至此的李天柱会合。3月下旬，活动在广东兴宁地区的原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罗屏汉率所属游击队六七十人，前来与李天柱及张凯部会合，就地开展游击战争。5月间，陈正人离开寻邬南部山区，经广东省梅县、汕头到达香港，随后赴湖南养病。在这期间，李天柱不幸牺牲。

龚楚、石友生等率红24师第71团从粤南出发，2月24日到达信丰安息、极官地区，遭粤军第2师部队前堵后追。25日，第71团同敌发生激战。尔后突破敌人拦阻，转至赣粤边之油山地区，留下两个连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其余部队在龚、石率领下，继续向湘南进发。当部队到达湘粤边境的郴县时，龚楚带1营人叛变，投向广东军阀。余部留在湘南开展游击战争。

毛泽覃率1个连从粤南突围，由会昌白鹅经井塘、密，到达闽西长汀县四都山区，与中共福建省委万永诚等会合。四都遭强敌进攻时毛泽覃率队突出重围，随后于4月下旬在瑞金黄鳝口附近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陈潭秋、谭震林率领的红24师4个连，于2月底转至长汀四都山区。尔后会同邓子恢又经河田、朱畚、才溪、紫金等地，冲破敌人重重封锁和围攻，于4月间到达永定地区，与先期到达的张鼎丞会合，坚持闽西南游击战争。

李才莲率领的独立第7团，于2月下旬经瑞金铜钵山区向博生县北部突围转移。行至瑞金九堡与敌遭遇，部队被打散，李才莲率余部转回铜钵山区，随后在安治前与中共瑞西特委书记赖昌柞领导的瑞西独立营会合，在瑞金观音嶂一带活动。同年6月，李才莲在观音嶂突围战斗中英勇牺牲。

阮啸仙、蔡会文、刘伯坚、梁柏台等率领独立第6团及赣南省领导机关、中央工农剧社、《红色中华》报社等工作人员共1800余人，本来根据中央分局部署，在粤南禾丰、黎村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后因敌情变化，遂遵照项英、陈毅指示率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转向赣粤边境的三南（定南、龙南、虔南）与信丰地区活动。3月3日，他们将突围转移的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编为3个支队。4日晨，3个支队成一路纵队，从粤南的上坪山区出发转移。当天上午10时许，阮、蔡觉得3个支队集中成一路纵队行进有危险，立即命令部队改变队形，以连或两个连为单位，分散穿越敌人封锁线。但为时已晚，部队尚未展开，即在畚岭（在今干部县境）的罗坑、金沙一带与粤军遭遇，激战

数小时，部队被冲散。随后，阮、蔡收拢部队，分成两路突围。第 1、第 3 支队为一路，在刘伯坚等指挥下，与堵截红军的粤军拼杀，双方均遭重大伤亡。7 日凌晨，刘伯坚在安远、雩都边界的鸭婆坑受伤被俘。与此同时，梁柏台也在突围中受伤被俘，后来刘、梁均遭敌人杀害。指战员也大部伤亡或被俘，只有少数人突出敌人重围。

蔡会文、阮啸仙和陈丕显（少共赣南省委书记）率领的另一路——第 2 支队，于 3 月 6 日冲破敌人马岭——牛岭封锁线，向西南转移。阮啸仙在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蔡会文、陈丕显率部队抵达信丰安远一带，又与粤军第 2 师遭遇，经激战摆脱敌人，转向定南，复转信丰，于 4 月上旬到达赣粤边界的油山地区。部队仅剩 300 余人。随后蔡会文又奉项英之命，率一部分队伍前往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三）项、陈脱险与中央分局战略转变的完成

1935年3月上旬末，中央苏区的各路突围队伍已全部离开雩南禾丰地区。这时原拟留在苏区内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所率部队，承受敌人的压力越发加重，实在难于再坚持下去了。于是，项英、陈毅和贺昌决定率领随分局行动的红24师第70团，穿越敌人会昌封锁线，向闽西长汀地区突围转移。突围前，对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整编，共编成4个大队，并确定项英、陈毅随第1、第2大队行动，贺昌、周建屏、杨英等编在第3大队；李翔吾（原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袁血卒（红24师政治部代主任）等编在第4大队，担任掩护任务。

项英、陈毅决定于3月9日率部突围转移。9日午后临行前向党中央拍发电报，报告中央分局最后突围情况和请示方略。由于电台呼号联络不上，延迟了部队出发时间。为争取先机，下午3时许，贺昌、周建屏等即率第3大队从驻地雩南上坪地区出发，先行突围。袁血卒等率第4大队跟进，其任务是抢渡安远河，尔后占领会昌县天门嶂，掩护项、陈和第1、第2大队突围。是日晚，第3、第4大队安全渡过安远河，抵达天门嶂，旋遭敌第89师部队包围合击。第4大队在掩护战斗中，大部伤亡，袁血卒、唐继章、何侠、钟伟生等少数人冲出敌人包围圈，后来辗转到了上海，从事白区工作。第3大队也遭重大损失，指战员大部分伤亡，贺昌中弹负伤，复陷敌人重围，在眼看要落入敌手之际，他高呼“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举枪自尽，壮烈殉职。杨英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只有周建屏等少数人幸免于难，摆脱敌人迫堵，到达安远、寻邬南部地区，与先期到达的张凯、李天柱等会合。

当贺昌、周建屏、袁血卒等率第3、第4大队出发时，项英、陈毅仍守候在发报机旁，一直耽搁到下午5时，才拍完电报。项英命将电台埋藏起来后，立即同陈毅一起率领第1、第2大队离开上坪，沿第3、第4大队行进路线开进。由于下雨天黑路滑，当晚未能赶上第3、第4大队。又遇上山洪暴发，安远河水猛涨，无法徒涉，加之敌人已将河两岸严重封锁。此时，抢渡安远河已不可能了。于是，项、陈只好率部折返上坪山区。由于夜暗，项英又高度近视，行路十分困难，结果他带着一部分队伍与陈毅失去联络，又走错了路，误入安远县天心圩，遭敌截击，队伍被打散。翌日天亮后，项英收集失散队伍，回到上坪与陈毅会合，重新考虑转移方向问题。

当时大体上有4个方向可供选择：一是往东，到福建西部地区去。那里是老苏区，距漳州、香港较近，便于设法同党中央取得联系。但这个方向山高路险，又逢雨季，加之敌人严密封锁，难于通过；二是向南到广东东江地区去，到那里路程不远，两天两夜可赶到，且离香港更近，但那里是沿海地区，公路网、电话网交织，敌人通讯、交通十分便利，军阀和地主武装都很强，红军难于立足；三是到井冈山去，这里地跨两省，地理位置和地形都很好，又曾是老苏区，估计还有红军游击队在活动，便于立足生根，但敌人对赣江封锁甚严，西渡赣江，毫无把握；四是向西南过五岭到赣粤边老游击区去，那个地区周围敌人虽强，但群众基础好，陈毅、李乐天等曾在此地开展过群众革命斗争。不久前，李乐天、杨尚奎等又率领一支部队回到那里，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有了立足点。

上述几个去向各有利弊，经过反复比较，最后选定了第四个方向——到

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去。稍事休整，项、陈即率领中央苏区留下的最后一支队伍再行突围。不幸，在转进途中与敌遭遇，队伍又一次被打散，在项、陈身边只剩下 100 余人。为了减轻部队压力和缩小目标，项、陈决定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跳出敌人包围圈，转向赣粤边。其中项、陈二人带少数警卫武装为一路，几次突围未果。无奈，只好准备下山暂作隐蔽，待机转移。恰好这时无意中碰上陈毅的老部属曾纪财。曾纪财原在赣粤边牛颈区任中共区委书记，后升任代英县县委书记。在“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蒙受不白之冤，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大帽子，遭残酷打击，并被“发配”到“劳动队”劳动。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他流落民间，但对革命矢志不移。后来听说陈毅仍留在中央苏区，就前来寻找，与陈毅不期而遇，百感交集。陈毅对他好言劝慰，同时欢迎他留下一起打游击。曾纪财通情达理，他诚恳地表示：“革命发生错误不能怪，特委县委哪能那么正确，现在中央苏区丢失了，很惨痛，我来算这个帐不应该。只希望将来重新做个符合实际的结论。”短短数语，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博大的胸怀和对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

曾纪财是当地人，熟悉周围环境和道路，他表示有把握越过敌人封锁线。于是，项英、陈毅等化装成老百姓，由曾纪财引导下山，夹在一群挑担赶圩的老表里面，从王母渡安全地渡过桃江，赶到长安圩找到地下党组织。尔后，在地下党安排下，项、陈等夜行晓宿，几经辗转，于 3 月底胜利到达赣粤边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油山，与李乐天、杨尚奎等会合。随后，蔡会文、陈丕显等也率领赣南军区突围的队伍前来会合。几路人马连同当地游击队及主力红军长征时留下的伤病员合在一起，共约 1400 余人，在项英、陈毅统一领导下，在赣粤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4 月上旬，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由油山转到北山后，在大庾县的长岭村召开了干部会议（史称长岭会议）。会议听取了项英作的形势报告和陈毅作的根据新的形势采取新的斗争方式的发言，批评了在新的斗争形势下出现的盲目乐观和悲观失望两种情绪。与会者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最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和面临的处境，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战略方针。同时确定了今后的任务和行动方针：以油山、北山为主要根据地，依靠群众，在赣粤边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并使整个工作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在指导思想上，以保存有生力量和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反对游击主义，防止死打硬拼和消极隐蔽倾向。在斗争策略上，要求采取机动灵活的斗争方式，学会在隐蔽条件下进行武装斗争。

至此，中央分局最终完成了由苏区方式到游击区方式、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同时也标志着中央苏区的终结。在此前后，原中央苏区的另两个地区——闽赣边（汀瑞边）和闽西党组织，也实现了与游击战争环境相适应的战略转变，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揭开了新的一页。

第二章 赣粤边游击区

赣粤边游击区，位于江西省南部和广东省北部边界，包括江西省的信丰、南康、赣县、大庾（今大余）、上犹、崇义、龙南、虔南（今全南）、定南和广东省的南雄、仁化等 11 个县的部分地区。它的中心区域在江西信丰、大庾和广东省南雄三县交界的油山、北山地区，原为中央苏区赣南省的边缘游击根据地。这里的群众基础较好，又是蒋介石军队和广东地方军阀的结合部，再加上这个地区的地形复杂，丛山密林，活动方便，便于红军和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1932 年以后，赣粤边游击区成为中央苏区的西南门户。1934 年秋，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后不久，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即派出一支部队到这个地区坚持与发展游击战争。1935 年春，项英、陈毅及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部分红军与在此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会合。从此，赣粤边军民，在项英、陈毅以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下，在极艰苦的环境中，不屈不挠，顽强斗争，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多次“清剿”，在斗争中求生存和发展，不仅巩固了原有的油山、北山、信（丰）（南）康赣（县）游击区，而且开辟了以青龙山为中心的“三南”（龙南、虔南、定南）游击根据地。

一、奠基赣粤边

（一）项英、陈毅抵油山

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中共中央分局、赣南省委为加强赣粤边的斗争，于1934年12月初，在雩都小溪成立了中共信（丰）（南）康赣（县）（南）雄特别委员会，由原在赣粤边坚持斗争的李乐天任特委书记，杨尚奎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王龙光任组织部长，刘新潮（刘建华）任少共特委书记。同时决定成立信康赣雄军分区，李乐天任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向湘林任参谋长，李国兴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分局、赣南省委还为信康赣雄特委和军分区调配了一批领导干部。

12月下旬，李乐天、杨尚奎等人率领新组建的信康赣雄特委、军分区机关和一个营的部队共700余人，在赣南军区主力部队的策应下，从雩都小溪出发，以突然的行动在赣县的大田、大埠之间，渡过桃江河，横穿信康公路，翻越信丰、南康交界的大山，经信丰县的上采村到达油山廖地村，同在这一地区坚持斗争的信康赣县委书记刘符节、工作组的叶明魁、游击大队长曾彪率领的油山游击队

1935年1月，中央苏区形势日益险恶，赣粤边游击区的形势也随着紧张起来。广东军阀余汉谋带着一个军的部队又从追击主力红军途中回到了大庾、信丰、南雄地区。随后，对游击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

3月底，项英、陈毅机智地越过国民党军封锁线，到达信丰县油山廖地，与赣粤边特委领导人李乐天、杨尚奎等会合。4月初，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赣南军区部分突围部队也到达油山廖地。至此，相继汇集到油山的红军和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总数达1400多人。

项英、陈毅到达赣粤边后，4月初在广东南雄县大岭下村召开了信康赣雄特委和军分区领导干部会议，听取了特委3个多月来的工作汇报。对于信康赣雄特委和军分区胜利到达油山，并保存了力量，站稳了脚跟，项英、陈毅给予了赞扬。但同时特委、军分区存在的盲目乐观情绪和不切实际的工作方法提出了诚恳的批评。项英、陈毅强调指出：国民党军“清剿”在即，机关要精简，部队要分散，不能搬用过去中央苏区建立政权、打正规战的做法。为了适应扩大游击区的需要，项英、陈毅决定派军分区参谋长向湘林率部分部队到信丰县与安远县交界地区去接应突围中失散的部队；派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部前往南雄县北山待命。会议还决定将信康赣雄特委和军分区改为赣粤边特委、赣粤边军分区。陈丕显参加特委领导。此后，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等即率部向北山转移。同时命令油山游击队转向信丰县崇仙一带活动，以摆脱国民党军对油山的包围。

（二）长岭会议，制定正确方针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的指示精神，统一干部的思想认识，转变斗争方式，1935年4月上旬，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在大庾县的长岭村召开了赣粤边干部会议（史称长岭会议），蔡会文、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王龙光、刘新潮（刘建华）、李国兴等近7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分兵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分析了形势，研究和部署了在赣粤边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和策略。项英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他指出：中央苏区虽然丧失了，但主力红军的存在和游击战争的进行，必将推动新的革命形势的到来，那种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悲观情绪是错误的。对于如何开展游击战争问题，项英强调说：游击战争应以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反对单纯地打土豪。打土豪要严格地执行政策。陈毅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我们要对新的形势有足够的认识，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发展游击战争，积蓄和保存力量。我们一定要插一杆红旗在山顶上，寻机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清剿”，扩大武装，扩大根据地。会议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的方针，并决定在军事上以南岭山脉为依托，以北山、油山为主要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强调在战术上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体，反对硬打强敌，要采取袭击动作和打圈子等方式反击敌人的“清剿”。长岭会议决定将赣粤边游击区分成5块游击区，即油山区、北山区、信康赣区、信南区、上（犹）崇（义）区。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会议决定红军和游击队编成4个大队和若干小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1.蔡会文率两个大队向崇义、上犹县边境和湖南的汝城、桂东县一带发展，建立游击区，并设法与奉命进军湘南的原中央军委参谋长龚楚及湘赣省委取得联系。2.李国兴率1个大队到崇义的文英、古亭一带发展游击区，把北山游击区与湘南游击区连成一片。3.一个大队到大厦的洪水寨、娘娘庙一带开展游击战争。4.一个小队到广东南雄县西部山区活动。5.一个小队留在北山随特委活动。6.黄成则、张日清率一个小队到“三南”（龙南、虔南、定南）扩大游击区。项英、陈毅和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人随特委和军分区司令部在北山行动，指挥各地的游击战争。长岭会议，是中央分局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彻底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的指示的又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赣粤边游击区新的行动方针，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坚持赣粤边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对胜利坚持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二、最艰难的日子

（一）棚洞遭袭与北山事件

1935年4月，国民党粤军第1军军长兼江西第6绥靖区司令余汉谋率3个师在保安团的配合下，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国民党军从渡口到公路，从公路到山脚下，构筑三道封锁线，村村筑堡，层层包围。还以营连为单位组成“清剿”队，采用“听响声，看烟火，跟脚印”等办法，进山“抄剿”、搜寻红军游击队，并派出便衣侦探，伪装红军，到山林中伏击红军游击队。国民党军在实行残酷军事“清剿”的同时，还采用“剿抚兼施”的手段，进行政治欺骗，企图瓦解红军游击队的军心。强化保甲制度，组织“铲共义勇队”，严密监视和控制群众的行动，切断群众与红军游击队的联系。为了配合军事“清剿”，国民党对红军游击队实行经济封锁，限制群众购买粮、油、盐，更不准往山里运送，一经发现，即以“通匪”、“济匪”论罪处决。国民党军企图通过这些手段，断绝红军游击队的物资来源，把红军游击队困死在深山老林里。

面对国民党军的疯狂军事“清剿”、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依靠人民群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领导红军游击队积极开展反“清剿”斗争，并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提高斗争艺术。

长岭会议之后，项英、陈毅率领中共赣粤边特委、军分区和游击队100余人到达北山。国民党粤军在当地土匪周文山部配合下，“清剿”北山红军和游击队。一天，游击队员运粮被“进剿”的敌人跟踪追来，直到赣粤边军分区司令部宿营地棚洞村才被哨兵发现。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等安全脱险，找到一片树林中隐蔽起来，并计划以后的行动。

在棚洞村遭袭击以后，为了便于隐蔽和行动方便，项英、陈毅决定将部队和机关进一步缩小，分散活动，派王赤带领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到文英与先前去的一个大队会合，开展游击活动。另派一部分工作人员带领一部分游击队员在游击区内恢复群众工作。项英、陈毅和李乐天等带领侦察班、特务班采用在林中搭棚打拚的办法，对付敌人的“清剿”，从此与房子告别，在山林中开展游击活动。

由于敌人在“清剿”中注重对屋场的包围和袭击，项英、陈毅等总结赣粤边游击区以往的经验 and 这次在棚洞村遭袭击的教训，遂不居房屋而寄宿于山林，由此发展成为搭棚子的打拚方式。并在实践中总结出搭棚的打拚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即：有群众基础；有森林且复杂的山；遵守一切秘密原则。根据赣粤边游击区的经验和当时国民党军进攻的情形，他们还规定了若干个搭棚打拚的原则：1.位置的选择必须要退路好而能隐蔽地退。2.要有很好观察的哨位。3.要有很好的进出道路，不至于暴露目标。4.要经常转移，不能久住一地。

为了便于指挥各地的游击战争，特别是便于与湘赣、湘南红军和游击队取得联系，项英、陈毅和李乐山等带领一部分直属队转移到江西大庾与广东南雄交界之帽子峰以西的山区，这里地形复杂，便于活动和隐蔽。项英、陈毅在斗争实践中提出了行军和保密等有关原则。行军原则是：1.行军要选择时间，不能随便行动。2.不走大路走山路，最好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以避免敌人的埋伏。3.过山坳最好从旁山爬过。4.夜间行军要慢，免失联络。5.行军距离要短，尖兵须距离在10米开外。6.行军时绝对禁止讲话。保密原则是：

生火做饭不出烟；说话须小声；出进要不留脚印；各机关无工作关系不准往来。这些原则是游击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对指导赣粤边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赣粤边红军游击队遵循上述原则，巧妙与国民党“清剿”军队进行周旋，并采取“调虎离山”、“引蛇出洞”、“化装出山”等战术，伺机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5月下旬，油山游击队在队长曾彪率领下，跳出粤军包围圈，夜袭南雄县乌迳圩，全歼靖卫团。随后，油山游击队又夜袭大庾县游仙圩，歼灭保安团一部。7月，三南游击队在队长黄成则、政委张日清率领下，进入虔南县青龙山腹地，开展游击战争。8月，信康赣游击大队在大队长肖玉山、政委康世光率领下，袭击了驻黄泥巷据点的国民党保安团分队。9月，油山游击队在（南）雄（大）厦公路，伏击粤军车队，缴获一批弹药和物资。红军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扰乱了国民党军的“清剿”部署，使余汉谋计划3个月消灭赣粤边红军和游击队的企图终来得逞。

1935年10月，余汉谋利用叛徒龚楚破坏赣粤边特委领导机关，制造了“北山事件”。早在同年5月，龚楚率部转移到湘南后，在湖南郴县黄茅地区投奔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叛变革命。10月，余汉谋令龚楚带领粤军30余人，伪装成红军游击队，深入到赣粤边游击区。到达北山后，贴了一些标语，欺骗当地群众说是湘南的红军来找关系。时值赣粤边特委后方主任何长林出来买东西，不加考查即与龚楚会面。在龚楚的威胁利诱下，何长林也叛变了。何长林带龚楚率领的伪装成红军游击队的粤军30余人进入北山天井洞附近的龙西后，以集中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一部集中围歼，除八九人冲出包围外，30多名红军游击队员壮烈牺牲。10月20日，龚楚、何长林又带粤军“抄剿”项英、陈毅驻地。途中遇见外出执行任务的侦察员，他们以向项英、陈毅汇报工作为名，要侦察员带路。侦察员机智地识破他们的阴谋，在到达营地时抢先登山，告诉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和特委领导成员听到枪声，迅速转移到一个森林里隐蔽起来，使余汉谋和龚楚的阴谋未能得逞。

北山事件之后，项英、陈毅估计龚楚可能窜到油山和信丰、南康两地继续进行破坏，立即派人通知这两地的县委和游击队作好防范，以避免损失。同时认真分析部队的思想情况，采取在游击队内部开展形势教育和反叛徒斗争等一系列措施，提高指战员的思想觉悟。项英提出把革命前途的教育放在首位，使全体游击战士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念。项英强调要在政治上坚决反对那种认为“革命前途渺茫”的悲观主义倾向，号召大家坚信，红军是土地革命战争特别是游击战争中创造出来的，同样也能在游击战争中得到巩固和发展，这就是革命的前途。项英亲自编写政治教材和文化识字课本，耐心地做政治思想工作。对那些为革命奋不顾身而英勇牺牲的人，给予高度赞扬，号召大家学习和发扬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对于那些被国民党军监禁的游击队员和人民群众，尽力设法营救；对那些错误缺点较多、思想动摇的人，则尽量避免简单粗暴的批评，而进行耐心说服教育，以增强其革命信念。陈毅指出：目前南方游击战争到了最艰苦的时候，打死、饿死、病死随时都有可能，真正的革命同志要坚定信心，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

根据革命自觉的原则，游击队正确区分和对待三种人：一是对不愿留下来的，首先从思想上进行帮助，实在留不住的就发路费送出境，劝其站稳立场，不要叛变和危害革命，这叫以礼相待，好来好去。二是对已经离队但有

悔改表现要求归队的，表示欢迎，不歧视，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三是对有—般性变节行为的，通过亲属好友做工作，争取其中立，不危害革命；对顽固不化，严重危害革命的叛徒，则坚决予以镇压。这叫善恶有分，区别对待。由于坚持进行具体实际的思想教育和反叛徒斗争教育，认真执行区别对待的政策，使赣粤边游击队指战员的思想更加—致，组织更加纯洁，大家亲密无间，生死与共，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去迎接新的战斗和考验。

（二）反“封坑”与反搜山

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在连续数月的“清剿”红军游击队活动中，未能达到目的，于是在1935年11月初，采取移民井村和赶群众出山的“封坑”手段，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更为残酷的“清剿”。

余汉谋命令所属部队将红军游击队活动的山区的群众全部强迫出境，一切粮食均要搬出，如若不肯搬出，即以“通匪”论罪，并予以枪决，妄图将红军游击队陷入无人无粮的空山中。国民党军队将赶出山的群众并于山边山外的大屋场居住，由保甲长严密监视，以断绝与红军游击队的联系。各山坑及要道经常由军队巡察埋伏，以使红军游击队无法出山。同时组织谍报队、守望队、观火队，寻找游击队的踪迹。余汉谋军企图用这种“封坑”手段把红军游击队冻死、饿死、困死在山上。

为了挫败国民党粤军的“封坑”，项英、陈毅在信丰县的潭塘坑召开中共赣粤边特委和信康赣县委、南雄县委联席会议。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王龙光、刘新潮和南雄县委书记罗世珍、信康赣县委书记刘符节等出席了会议。项英在会上指出：敌人的“封坑”是进一步的进攻，把群众与我们隔离，便于其“清剿”，陷我们于空山而饿死。他批评了有的地方党组织空喊反对出山，没有任何工作布置的做法。他强调说，目前不是空喊反对出坑，而是有计划有胆识地领导出坑的群众进行斗争。会议研究了7条对抗国民党粤军“封坑”的办法：1.有计划地分配党团员随群众出山到大村庄居住，在那里重新组织党支部或党小组，继续领导群众斗争；2.动员群众离山之前把粮食埋藏起来，留给游击队使用；3.游击队转移到边界地区埋伏，或深入国民党军后方袭扰；4.组织群众性的游击小组积极配合游击队的行动；5.动员群众以“无房住，无柴烧”为理由，开展“闹回坑”的活动；6.警告保甲长，不准他们胡作非为；7.做好少数落后群众的工作，使他们不受国民党军的欺骗和利用。

为了加强对各地反“封坑”斗争的领导，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决定分散到各地指导斗争。项英、陈毅到信康赣县委；李乐天率直属队到信丰崇仙地区，向三南边界发展新游击区；杨尚奎、陈丕显到南雄县委；王龙光到大龙中心区委；刘新潮到信丰上乐，领导游击队向大庾、南康边界活动，并在潭塘坑设立秘密交通站，建立三条秘密交通干线，以便与各地加强联络。信康赣县委和南雄县委负责人则分散到各区委，深入到山边或山外加强对新区群众工作的领导。领导机关的进一步分散，不仅加强了对各县委、区委和各地群众反“封坑”斗争的领导，而且使党组织和游击队在群众中得以保存和发展。

赣粤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广大指战员在反“封坑”斗争中，英勇顽强，机动灵活，巧妙地袭击国民党军。红军游击队针对国民党军“清剿”中早出晚归的特点，经常事先隐蔽在其回去的路上打埋伏、截尾子。有时采取调虎离山的战术，出奇不意地跳出封锁线，奔袭国民党军后方驻地。红军游击队在反“封坑”斗争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36年1月底，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政委李乐天在从油山返回崇仙区途中，在信丰县凹背村遭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一个营的包围，突围中不幸腿部负重伤，他沉着迎战，掩护战友突围，一连击毙几个粤军士兵之后，用最后一颗子弹壮烈地以身殉职。李乐天的牺牲是赣粤边游击区的一个重大损

失，他的牺牲更加激发了赣粤边游击区军民反“清剿”的斗志。

1936年春天，正当赣粤边游击区反“封坑”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获悉国民党粤军密令各地保甲组织：“要组织1万民众，自带柴刀、火柴和7天的口粮，随军‘搜剿’，违抗命令者，以通匪论罪，格杀勿论。”

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立即开会进行研究，认为这是国民党军在游击队广泛发动群众对抗“封坑”，使其阴谋破产后，施展的一个狠毒的伎俩，企图把油山变成秃山，使游击队无处藏身，从而断绝革命的根苗。

不几天，粤军余汉谋部果然要大庾、信丰、南康的群众，大举搜山，强迫群众携带斧头、火柴和粮食，分路搜山。每路有粤军或保安团一个连，并强迫群众200余人随同，对信康赣游击区进行“梳篦式”的大“抄剿”。

赣粤边特委在项英、陈毅领导下，采取敌进我退，攻其不备的战术，开展了反“搜山”斗争。首先领导机关由信丰转移到大庾、南康境内暂时隐蔽，工作人员撤到山外，动员群众把棚子全部拆毁，消灭目标。当国民党军进山“抄剿”时，红军游击队则到山外游击，突袭国民党军的后方机关，吸引“抄剿”的国民党军出山。当国民党军在上乐地区开始烧山搜山时，信丰游击队急行军80里，潜入到粤军后方的信丰西牛一带，白天隐蔽在密林里，晚上出来放冷枪，贴标语，打乡公所，抓土豪。游击队从西牛一直活动到龙回、大龙区，闹得敌人晕头转向，弄不清楚到底来了多少游击队而自乱部署。其次是组织动员群众对抗搜山。当敌人强迫群众砍树时，群众故意拖延时间。当着敌人的面，用刀砍两下；敌人一走开，就用刀背砍。当敌人强迫群众搜山，群众就用“杭唷！杭唷！”的山歌声，示意游击队隐蔽或离开。再次是组织游击小组在山外砍电线，在洋油箱里燃放鞭炮，纷纷传说来了游击队，扰乱敌人的后方，使其首尾难顾。搜山的国民党粤军害怕游击队端掉他们的老窝，便提前把部队调出山，把被他们胁迫进山的群众解散。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万人大搜山”，闹腾了几天，便草草收兵。

（三）靠人民，战胜困难

由于国民党军长期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给红军游击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那极端艰难困苦的日子里，红军游击队被围困在深山老林里，昼伏夜行，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生活极其困难。首先是断粮后的饥饿。反“清剿”前，人民群众在山上一些秘密地点给红军游击队埋藏的粮食、油盐吃光后，红军游击队只好以野果、野菜、草根充饥。饥饿折磨着红军游击队广大指战员。正如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所写的：“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其次是寒冷与风雨的折磨。真乃是“野营已自无帐篷，大树遮身待天明”。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许多红军游击队指战员几乎没有住过房屋、脱过衣、离过枪睡觉。开始时还可以搭竹棚、杉皮棚、茅草棚居住。敌人大搜山时，棚子成了敌人袭击的目标，只好拆掉棚子，几个人在大树下背靠背地睡觉，下雨天撑把伞或在树上支块布，以避风雨，但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野草丛中过夜。到了深秋和冬天，淫雨绵绵，寒风刺骨，红军游击队生活更加艰难。陈毅的《赣南游击词》再现了红军游击队夏天宿营的情景：“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浸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红军游击队不仅要同饥饿、寒冷作斗争，还要忍受着疾病的折磨，许多游击队员病倒了，一些伤员因无药得不到治疗而牺牲。陈毅的伤口因无药医治而多次化脓，1935年9月伤口再次化脓，无医无药，只好叫警卫人员将负伤的腿捆在树上，将脓血挤出来，用白布抹上万金油塞进伤口。当时的生活之艰苦，环境之险恶，可谓亘古罕闻。

在极端残酷、恶劣的环境下，在红军游击队最困难的日子里，人民群众采取种种巧妙的办法，冲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千方百计地支援、接济红军游击队。当国民党实行“移民并村”，赶群众出山之际，群众把自己的口粮、食盐等物资埋在地下，做好暗记留给红军游击队。当红军游击队处于粮缺断炊的危难之际，群众乘上山砍柴或下地种田之机，将定量配购的粮、油、盐等，想方设法送给红军游击队。在红军游击队活动的基本地区，只要是红军游击队一进坑，当地的青壮年便自觉组织起来，站岗放哨。如发现国民党军进山，即高喊“东边牛吃禾了”、“西边猪吃菜了”，暗示红军游击队隐蔽。红军游击队打土豪或袭击国民党军驻地时，群众先侦察敌情，后当向导，有的还和红军游击队一道参加战斗。为了支援和保护红军游击队，许多群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35年夏，信丰县上乐村妇女朱叶妹为掩护红军游击队脱险，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1936年6月，陈毅腿部伤口复发，住在大庾县彭坑周篮嫂家养伤。她不但精心照料，而且在危急关头，英勇机智地掩护陈毅躲过国民党军的“搜剿”。正是人民群众的支援和保护，才使红军游击队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红军游击队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游击战争就不能坚持。对此，陈毅曾在《赣南游击词》中深情地感叹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项英、陈毅十分重视群众工作，他们认为，游击战争的主要基础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就不能战胜敌人长期的“清剿”。项英经常教育周围的人说：我们进行的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我们要坚持，要生存，要发展，主要靠群众力量。为了指导大家做好群众工作，项英亲自编写了《群众工作者必读》的小册子，详尽地论述

了群众工作的性质、方针和方法，通过特委的油印处，印发给各级党组织成员和游击队员，成为大家做群众工作的指南。

三、历史的转机

（一）“两广事变”与游击区的发展

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在闭塞的山区，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只能从收集到国民党地方报纸的字里行间去揣摩和分析形势，研究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动向，从而制定斗争的方针策略，指导赣粤边游击区的斗争。“华北事变”的消息传到赣粤边后，项英、陈毅意识到中日民族矛盾正在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危机正在进一步加深。项英、陈毅以中央分局的名义提出“抗日救华北”、“实行全国联合，一致抗日”等口号，还起草了将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的布告，油印成传单，在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

1936年6月，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提出抗日和反蒋的口号，发动了“两广事变”。事变发生后，粤军暂时停止了对赣粤边游击区的进攻，并陆续从大庾、信丰等地撤走。当时许多人不明真相，众说纷坛。项英了解到事变情形后，正确分析了形势和“两广事变”性质，指出“两广事变”是两广军阀与蒋介石的冲突加紧的表现，是军阀间的战争，是两广军阀利用抗日的名义实行反对蒋介石的战争。

为了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及时在信康赣县委驻地召开了各县负责同志、游击队长以及交通站长参加的干部会议，研究对“两广事变”的认识。项英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实行抗日战争，变军阀的战争为抗日的革命战争”的口号，同时强调指出，要利用蒋介石与两广军阀的矛盾，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恢复和扩大游击区。会议发表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会后，各地游击队相对集中整训后主动出击，先后袭击了信丰、大庾、南雄县境内10多个据点，歼灭了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镇压了一些作恶多端的豪绅地主，游击区得到了恢复和扩大，出现了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少有的好形势。

在信康赣游击区，信丰游击队从游击区的上乐、潭塘坑一带分路出击：一路向大庾新城；一路向信丰大小窝、九渡、长安等圩镇；一路向南康贤女埠等地发展，打击保安团和地主武装。7月，信丰游击队夜袭驻大庾新城的保安团队部，击毙数十人，并缴获一批武器。

在北山游击区，北山游击队相继袭击了南雄上嵩围子和角湾、塘洞民团，缴获了一批枪支。

在油山游击区，中共南雄县委和油山游击队乘两广事变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打击保安团，先后袭击了大庾的青龙、长江、留地和南雄的里东、乌迳、邓坊等地的保安团和区、乡公所。1936年8月，油山游击队在群众的协助下，袭击了池江区公所，俘虏数十人，缴获一些枪支。杨尚奎在梅山黄坑一带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成立了中共梅山区委，使梅山地区成为游击队活动的基本地区之一。陈丕显率工作团在大厦的彭坑、黄种、小汾、弓里、板棚下等地积极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逐步建立党团组织，把游击区从山里伸向山外，向池江平原发展。

在三南游击区，三南游击队在龙南的下山围伏击国民党保安团1个中队，击毙10多人；在虔南的楠木山、茶坑、决坑、大竹园、松毛山、龙南的东坑等地打击地主武装，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域。南山红军游击队积极向青龙山以西的南雄县坪田、南亩、水口、乌迳一带发展。崇仙红军游击队向信丰县小江、龙洲一带扩展。1936年9月，根据中共赣粤边特委指示，崇仙游击队、南山游击队和三南游击队正式合编为三南游击支队。三南游击区的发

展，不仅牵制和分散了国民党军的兵力，而且有力地支援了信康赣和油山等游击区。

（二）挫败第 46 师的“清剿”

“两广事变”解决后，1936 年 7 月 31 日蒋介石命令驻福建上杭的国民党军第 46 师进驻赣粤边游击区，继续进行“清剿”，使赣粤边游击区的形势再度紧张起来。

国民党军第 46 师进驻赣粤边游击区后，在保安团的配合下，扼守要道和圩场，分路抄山，“清剿”红军游击队；同时强迫群众构筑碉堡，组织民团和“铲共义勇队”，指定反动豪绅充当保甲长，严密保甲制度，并用重金奖赏叛变分子，收买落后分子。1936 年 8 月底，第 46 师对赣粤边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清剿”。

针对国民党军新的“清剿”，项英、陈毅于 9 月在信丰油山召开干部会议。会议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国民党军第 46 师“清剿”的特点，研究当前的对策。项英亲自起草了会议决议（史称《九月决议》）。决议指出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动员和领导群众配合游击队粉碎敌人的“清剿”，群众工作是我们粉碎敌人新的进攻的基础，只有依靠群众，我们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要建立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巩固、扩大游击队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动员群众力量，粉碎国民党军筑碉堡、建民团、编“义勇队”的阴谋。决议还规定了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强调党既要正确执行阶级路线，又要积极做争取国民党军的工作。要求红军游击队转向白区活动，开展“两面政权”工作，开辟新的游击区。

中共赣粤边特委根据《九月决议》的精神，组成以游击队和地下党员为骨干的宣传工作队，分四路进入白区的圩镇和大村庄，进行宣传活动。与此同时，特委派出一一些游击队，跳出国民党军的“清剿”包围圈，深入到国民党军后方和非“清剿”区开展游击活动。根据《九月决议》关于在白区建立“两面政权”的精神，赣粤边特委要求各地党组织调整政策，改变斗争方式，利用国民党撤换保甲长的机会，派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和开明人士去充当保甲长，同时争取一些比较开明的保甲长，使他们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人物。把国民党的保甲机构逐步变成表面上应付国民党，实际上为红军游击队办事的“两面政权”。对于一些与红军游击队做对的反动保甲长，红军游击队坚决给以打击。由于积极开展争取保甲长工作，使有些开明的保甲长主动帮助红军游击队购买物资和报纸，为红军游击队送情报。赣粤边特委还派人员打入国民党军第 46 师开展兵运工作，秘密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宣传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两面政权”的建立和兵运工作的开展，从内部削弱了国民党军的力量，为争取反“清剿”斗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1936 年 11 月 28 日，江西省第 4 行政区保安司令部为配合第 46 师“清剿”，将赣粤边游击区划分为信康赣、信康庾、庾雄、信龙虔定四个“清剿”区，从 12 月 10 日开始，限期 4 个月肃清游击队。正当江西第 4 行政区保安司令部配合第 46 师发动新的“清剿”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第 46 师被迫暂时停止了对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

（三）正确判断形势，反击敌军新的“清剿”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赣粤边游击区后，赣粤边特委领导和红军游击队员十分兴奋。项英、陈毅从国民党地方报纸上了解事变的大概情形后，项英即以“西安事变”为题撰写了一篇长文，分析了“西安事变”的原因，指出“西安事变”是在以下条件下爆发的：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不断的侵占，使全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全国的抗日运动随着日本进攻而开展，这是最基本的条件。第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民众乃至士兵群众的反对。第三，我们党的主张取得全国群众的拥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展和形成。第四，红军到西北后，在军事上的胜利和抗日政策直接影响东北士兵和军官，张学良等在士兵的推动下而发动事变。“西安事变”的爆发绝不是偶然的事件。文章指出：“西安事变”的爆发，使中国统一战线已经成功而正式开展起来，这一形势的继续发展，必然促使抗日的革命高潮马上到来。文章号召人民群众特别是国民党军士兵起来拥护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参加这一抗日的联合，来挽救中国，保卫中国领土的完整。文章要求赣粤边党组织在群众中动员、宣传抗日救国，同时计划将游击队加以整顿，准备在这一形势发展中消灭周围的国民党反动保安团队，以开展南方联合抗日的新局面。

项英、陈毅随即召集赣粤边特委和各游击区负责干部会议，讨论蒋介石被扣后的形势，研究新的斗争方针。项英、陈毅在会上提醒大家不要对“西安事变”盲目乐观，要做好各种准备，粉碎国民党军新的“清剿”。会后，大家对会不会放掉蒋介石的问题争论得很激烈，多数同志认为不可能放掉蒋介石，项英基于全民族利益的考虑，认为可能会放掉蒋介石。一些同志说，杀掉蒋介石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放掉他等于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个别同志甚至背后说项英右倾。可是不久，蒋介石真的被释放了，一些同志不得不承认项英的远见卓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实行“北和南剿”的方针，加紧了对方南各游击区的“清剿”。1937年1月中旬，国民党军第46师在保安团和“铲共义勇队”的配合下，向赣粤边游击区又一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这次“清剿”的重点仍是信康赣地区，第46师强迫群众日夜不停地砍山、烧山、抄山，企图一举消灭红军游击队。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大砍山、大烧山、大抄山，项英写信通知各县委做好战斗准备，并指示北山游击队向南雄方向转移，以牵制和吸引敌人。同时指示信丰两支游击队秘密转移到北山开展游击活动。项英随信康赣县委在信丰坑口至大庾新城一带与国民党军周旋。3月，赣粤边特委根据项英、陈毅的指示精神，发动和组织各地群众开展闹春荒斗争，游击队积极配合，声东击西，打土豪，筹款项，开粮仓，发粮食，救济群众，整个斗争热火朝天，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军的“清剿”。

（四）梅岭事件与加强内部建设

为了进一步指导各地反“清剿”斗争，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决定将领导机关进一步分散。当项英正准备带随员去南雄的时候，从搜集到的香港《工商日报》上看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消息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这时，驻赣粤边的国民党军在群众中造谣说：共产党投降了，你们这些小“土匪”还不投降。为了揭穿敌人的谣言和欺骗，项英当即给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写了一封指示信，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抗日统一战线运动进一步开展，我们党在全国民众中取得更大的拥戴。我们党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报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提议是完全正确的，使广大群众更加认识到我们是真正的抗日救国的领导者，必然使广大群众在我党领导之下，迅速开展抗日的民族战争。国民党对于我们游击区的必然猛烈进攻，以达到其消灭红军游击队的目的。我们要坚决与敌人斗争，战胜敌人，以与全国抗日运动配合，以争取革命新的形势更大开展。

项英随后到达南雄，约陈毅到梅岭附近开会，并顺便检查在国民党军中开展的兵运工作。1937年5月1日，陈宏（又名陈海，原系湘鄂赣苏区派出做白军兵运工作的）到梅岭参加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召开的兵运工作会议，在返回途中被捕叛变，供出了设在大庾县城秘密联络站“广启安糖铺”和项英、陈毅以及特委的住地。陈宏与国民党军密谋设下圈套后，于5月2日晨返回梅岭，谎报中央派人来了，要找项英、陈毅谈话。陈毅与梅岭区委书记黄赞龙下山，前往大庾县城接头。项英、杨尚奎、陈丕显等留在梅岭等待消息。陈毅等进城后，发现有诈，即返回梅岭，隐蔽在半山腰的石洞里。陈宏在大庾县城久等不见项英、陈毅，就领着国民党军包围了梅岭。游击队哨兵发现敌情后，随即鸣枪报警，项英等闻声冲出棚子，隐蔽在茅草丛中。当天午夜，陈毅与项英等会合后，立即撤离。国民党军第46师派出5个营的兵力在梅岭山上搜索了5天，未找到项英、陈毅和特委领导的踪影，只得撤出梅岭。此即为“梅岭事件”。

梅岭事件后，项英、陈毅估计国民党军知道中央分局和赣粤边特委领导人的行踪后，必然对赣粤边游击区发动更大规模的“清剿”，于是指示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做好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同时，针对游击队中的一些逃跑现象，在党组织和游击队中开展反叛徒、反逃跑的斗争，进行政治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和游击队员的革命信心和与敌人斗争的决心，以巩固革命队伍。还针对红军游击队长期分散执行任务，一部分同志易于产生游击主义和纪律松懈现象，项英、陈毅加强对游击队进行任务和纪律教育，为红军游击队规定了五大任务：第一，做群众工作；第二，打土豪分田地；第三，消灭反动武装；第四，建立苏维埃；第五，创造红军。并为红军游击队制定了五大纪律和十项注意。五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准侵犯群众的利益；打土豪执行阶级路线；爱惜武器同自己生命一样；不准打人骂人。十项注意是：武器不能离身；说话要小声；行军不能掉队；没有勤务不准离开队伍；打土豪要归公；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搜俘虏腰包；对同志要友爱。项英还编写了《红色指挥员必读》、《红色战士必读》等教材，加强对游击队指战员进行革命教育。这些措施对于巩固革命队伍和加强红军游击队组织纪律性，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清剿”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1937年5月上旬，国民党军第46师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清剿”。第46师将赣粤边区划分为“信康”、“信南”、“康赣”3个绥靖区，重点“清剿”信南地区，计划40天内消灭红军游击队。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得到情报后立即将机关分散，并命令北山游击队离开游击区向外发展，分散国民党军第46师对“信南”地区的“清剿”力量；命令三南游击支队向龙南、虔南边境和龙南、安远边境转移。5月中旬，三南游击支队在虔南县白石下伏击国民党保安第12团一个中队，击毙10多人。5月下旬，北山游击大队在北山地区不断打击保安团和豪绅地主，恢复了南雄县澜河、白云、天井洞等地游击区，并开辟了一些新游击区。

正当国民党军第46师加紧对赣粤边游击区进行“清剿”的时候，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此形势逼迫下，国民党军第46师被迫于1937年7月11日停止了对赣粤边游击区的“清剿”。

赣粤边游击区红军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的直接领导下，先后挫败了国民党军余汉谋部和中央军第46师的五次大的“清剿”，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项英、陈毅在领导反“清剿”斗争中，及时总结和推广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原则，丰富了我军的游击战争思想。如在游击战争实践中总结出的：赚钱的就打，赔本的不来；不打硬仗，不攻坚；打不赢就走，走不赢就躲，以及有利的时候就集中来打，否则就分散；利用对方的弱点和空隙的地方去进攻；有路不走，没路就走等战术原则。为了便于不识字的游击队员记忆，项英还将一些游击战术编成歌诀：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优势敌人，决战要避；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敌人侧翼，力量空虚，集中力量，坚决猛攻；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动作突然，敌难防范；行踪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这些游击战术原则，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我军早期游击战争思想，而且对抗战时期新四军的对日游击战争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实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故略转变

（一）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新政策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项英、陈毅为了及时了解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不失时机地掌握斗争主动权，在远离中央的闭塞山区，努力了解时局和寻找各种来自中央的消息。当项英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卢沟桥事变”真相后，立即撰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一文，分析了“卢沟桥事变”的实质，指出“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续绥东进攻之事先有计划的夺取平津，以达到占领华北的既定步骤。企图再施沈阳事件的故伎，而夺取平津，进而占领华北。中国士兵在卢沟桥的英勇抵抗，表现中国士兵的英勇和他们的民族意识与抗日热情。国民党在全国民众抗日热潮压迫之下，不得不放弃不抵抗主义，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在被迫情形下的应战，否则不能继续维持他的统治。此事变的发展，发动全国对日抗战的可能性多，但和平妥协的可能性还存在。文章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力争抗日的前途，动员和领导最广大的群众来威逼南京政府实行对日宣战。保卫平津就是保卫华北，保卫华北就是保卫中国。要保卫华北就得对日实行抗战。反对一切妥协，为保卫祖国而奋斗。与此同时，赣粤边特委决定将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进行抗日武装宣传。

7月底，项英、陈毅从一本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上有关介绍中国各党派的文章中，看到毛泽东1937年5月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报告的摘要，了解到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对此，项英、陈毅如获至宝，高兴万分。他们认真研究和学习了这些指示。根据毛泽东报告的精神，结合当前的形势，项英写了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指出中国革命现在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阶段，现阶段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文章还阐述了党中央所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应遵循的保持我党的独立性、有批评自由、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等原则，游击队必须遵照中央路线争取合作抗日，在上述三个原则基础上与国民党谈判。同时强调指出，要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要重蹈陈独秀主义的覆辙。这篇文章对于转变赣粤边游击区干部战士的思想，正确认识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是指导赣粤边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的纲领性文件。

1937年8月8日，项英、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名义发表宣言，指出“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侵占华北的既定步骤。为了保卫华北和中国，就要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和平妥协。要求国民党政府宣布实行抗战，国民党军应立即停止进攻红军游击队，准许抗日自由，采取最低限度安定民生的办法。8月20日，项英以赣粤边特委名义分别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赣州专员马葆珩、第46师师长戴嗣夏以及大庾、信丰、南康、南雄等县县长，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合作抗日，以配合全国抗战之大计。随后，项英根据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精神，起草了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条件：要求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赣南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言论行动上的自由；释放政治犯；解散“铲共团”；红军游击队组成独立的抗日部队；保证部队的给养，保证游击区群众的利益等。

此时，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却借机在群众中散布红军游击队“投降了”的言论，并写信给游击队，要求游击队负责人下山“自新”，归顺国民

党军队。一些地主豪绅也乘机大造谣言。对此，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严厉斥责国民党地方当局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行径，要求他们必须改变那种“剿匪”主义的偏见，实现合作抗日。同时在群众中进行国共合作宣传及解释工作。8月25日，赣粤边特委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号召赣粤边人民和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并指出赣粤边的红军游击队已经停止游击战争，正在枕戈待命，待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达成协议后，即开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为使广大民众了解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赣粤边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广泛深入群众，开展抗日宣传。8月下旬，赣粤边特委召开干部会议，学习毛泽东有关合作抗日指示，正确认识国共合作形势，纠正和克服麻痹思想和关门主义倾向。会议决定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合作抗日，诬蔑红军游击队下山合作抗日是“要求投诚”、“归顺国民党”的言行，坚决给予回击。

（二）同国民党当局开展谈判斗争

9月3日，陈毅致函国民党大庾县县长彭育英，陈述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及红军游击队的态度，并对国民党方面的造谣诬蔑给予驳斥，要求彭育英转函国民党驻军，改变敌视红军游击队的态度，立即停止一切破坏活动。经过斗争，9月8日，大庾县长彭育英派秘书鲁炯雯到大庾池江，同陈毅开始谈判，就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释放政治犯等问题，初步达成7项协议。9月12日，陈毅由彭育英陪同前往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江西全省抗日义勇军编练处副主任熊滨、第4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举行谈判。陈毅在谈判中义正辞严地揭露了国民党报纸的恶意宣传，驳斥了国民党军第46师代表的种种谬论。陈毅将赣粤边特委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意见书草案交付赣南国民党驻军和政府当局，提出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释放政治犯等条件。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游击队停止游击活动，停止打土豪，等待改编等谈判条件。双方初步达成了停战合作协议。

随后，项英由油山到达大庾，会见了大庾县长彭育英，并由彭育英陪同到达赣州，会见了国民党第4行政督察区保安司令和第46师师长。项英于9月24日前往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到达南昌后，他致电在南京的叶剑英并转毛泽东，从而恢复了中央分局与党中央的联系。在南昌，项英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告全党同志书》。项英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与江西省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口头接受了如下条件：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游击区老租老债废除；游击队集中时期一切费用由江西省政府负担；其余问题候国共两党中央决定。谈判达成了原则协议。

（三）战略转变实现与部队改编

9月27日，项英在南昌孙中山纪念周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全国精诚团结是抗战胜利的准基，惟有全国精诚团结，方足以于谋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同时阐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持久战，我们一定要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9月29日，项英又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要求各地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抗日救国武装，以便追随八路军之后，为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项英还宣布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以联络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各项事宜。项英在南昌还给浙南游击区负责人刘英写信，代表中央分局向浙南游击区的同志表示慰问，同时要刘英到南昌或到分局讨论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项英在南昌还会见了闽北游击区代表曾昭铭，听取了他的汇报，传达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的指示。

10月初，项英带着《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告全党同志书》等重要文件，从南昌经赣州回到池江，随即召开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各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精神，讨论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具体事宜。会议决定陈毅代表中央分局到湘赣边和皖浙赣边游击区，陈丕显到闽赣边和三南游击区，刘新潮去寻邬，北山区委负责人罗绍曾去湘南游击区，分别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联络游击队下山改编事宜。项英还写信托人送往崇义、上犹一带的王赤领导的游击队，联络下山改编问题。

会后，陈毅到信丰县的小江，向信南县委书记罗世珍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精神，并指示三南游击支队开往池江改编。陈毅随后由信丰到达赣州，与国民党赣州军政当局商谈游击队改编后的给养问题。

根据中央通知精神，项英、陈毅等研究决定，项英前往延安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由杨尚奎担任，并与陈丕显一起负责赣粤边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等工作。随后，项英前往延安，陈毅赴湘赣边游击区。至此，中央分局和赣粤边游击区，实现了由国内游击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

10月上旬前后，赣粤边游击区的北山、油山、信康赣三支游击队200余人，先后集中到大庾县池江整训，并正式改名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1支队。与此同时，赣粤边的各县委、区委也分别派代表与当地国民党政府代表谈判，相应地达成了合作抗日协议。

11月初，陈丕显以江西抗日义勇军代表身份到国民党南雄县政府，商洽解除游击区的“铲共义勇队”的枪械、减轻人民捐税、释

放政治犯、惩处破坏国共合作开枪射击红军游击队员的豪绅地主等事项。中旬，陈丕显又带着项英、陈毅的亲笔信和有关抗日的文件到达三南游击支队驻地虔南县杨梅石，向三南游击支队传达项

英、陈毅有关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的指示。随后三南游击支队100余人开赴大庾县池江集中。在池江集中的江西抗日义勇军，一边整训，一边派出宣传队四处开展抗日救国宣传。

项英于11月7日到达延安。12月7日，项英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汇报，并总结了经验教训。12

月13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议对项

英和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贡献给予

了高度的评价。中央政治局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以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为委员，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任主席，陈毅任副主席。

1938年1月，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同月，项英回到赣粤边，传达了党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布置好工作后，前往南昌新四军军部工作。随后，陈毅也到了南昌，任新四军第1支队司令

员。

赣粤边游击区的江西抗日义勇军第1支队经过几个月的整训扩编发展到700多人。1938年1月，江西抗日义勇军第1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第2营，下辖第4、5、6连。2月15日，奉军部命令，第2营从大庾池江出发，经赣州开赴抗日前线。杨尚奎、刘新潮等领导人和部分干部、战士留在赣粤边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在项英、陈毅的直接领导下，不仅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多次“清剿”，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的长征，而且保存了一大批经过严峻考验的革命骨干，保持了赣粤边游击区，使其成为党在南方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章 闽赣边游击区

闽赣边游击区，位于江西省瑞金县和福建省长汀县边界，故又名汀瑞边游击区。其范围包括瑞金县的大部、长汀县的古城和四都地区，以及江西省的会昌县、石城县一部。游击队活动的中心区域在瑞金大柏地的罗汉岩、观音嶂、武阳、白竹寨和长汀县的猪仔嶂、丝茅坪、上下温地一带地区。武夷山脉横亘其间，山高路险。虽然有利开展游击战争，但也易遭敌人分割封锁。

闽赣边地区，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这里就建立了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运动，为土地革命准备了群众基础。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从井冈山进军赣南、闽西，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迅速打开了闽赣边革命斗争的新局面。随着工农革命政权的建立，根据地日益扩大，逐渐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瑞金成为红色中华的首都。毗连瑞金的长汀则是闽西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又是中央苏区的一个经济中心，商贸繁荣，素有“小上海”之称。

在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导下，闽赣边地区的工农大众进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获得了解放的劳动人民，成了社会的主人，而地主豪绅阶级则成了工农专政对象。这个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给全国受苦受难的人们以巨大的鼓舞和希望，但同时也引起了整个统治阶级深深的恐惧和仇恨。他们同共产党及苏区人民不共戴天，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作远距离的战略转移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阶级卷土重来，对留在苏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闽赣边军民经受空前的磨难。他们在血雨腥风中奋起抗争，百折不挠。在反动统治阶级复辟的土地上顽强地进行游击战争。

由于这个地区曾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成为反动派的“众矢之的”。闽赣边游击队的斗争，也就显得格外残酷。虽然地理环境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加之游击队活动地域同南方八省其他游击区比较起来，相对狭小，在强敌分割支离和严密封锁下，闽赣边红军游击队的斗争历程显得特别艰苦。游击区的几支游击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完全隔开，断绝一切联系。然而，他们虽然失去统一的指挥和协同行动，但在共同的理想和意志支配下，满怀信心，独立坚持斗争。经过顽强的努力，终于打破敌人的分割封锁，几支分散的游击队会合在一起，开创新的斗争局面，最后迎来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在历史转变关头，在项英、陈毅和张鼎丞等关怀和指导下，打破了反动派设置的重重障碍和阴谋，顺利地完成了下山改编，开赴抗日前线的历史使命。

一、苏区陷落初期的斗争

1934年10月下旬，蒋介石得悉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消息后，即令其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指挥2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苏区腹地发起最后攻击。迄11月23日，中央苏区最后剩下的几座县城——宁都、长汀、瑞金、雩都、会昌相继陷落。从此，中央苏区军民，开始遭受黑色岁月的煎熬。

（一）调整组织机构，迎接新的斗争

当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时，整个闽赣边区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斗争形势急转直下。起初，闽赣边游击区的斗争，是在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直接领导下开展的。中央分局为对付即将降临的暴风雨，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

首先是动员群众起来对敌斗争。1934年10月20日，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根据中共中央10月8日发出的训令，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了题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文章，号召苏区人民“全体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加入游击小组，发展最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来抗敌和牵制敌人，以阻止敌人侵入到我们中心地区，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其次是对党政军组织进行适当的调整。为了在被敌人分割封锁的环境下开展分散的游击战争，中央分局于10月底决定，从西江、瑞金、雩都3个县划出8个区，以雩都宽田为中心，设立瑞西县。任命原西江县委书记马德明为瑞西县委书记，并调拨100多支枪，建立瑞西独立营。12月中央分局又决定成立中共瑞西特委，以加强瑞金、瑞西、西江等县的领导，调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任特委书记，原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钟天禧和刘连标、杨世珠、钟德胜等为委员。同时组建瑞西军分区，以刘连标为司令员、杨世珠为政治委员，统辖瑞金、瑞西、西江等县独立营。当时各县独立营大的1000余人，小的四五百人。除县独立营外，许多区、乡还成立了区游击大队和乡游击队。如瑞金武阳区游击队、桃阳区游击队等。桃阳区游击队是在主力红军撤离前夕组建的，共140多人，由区乡机关于部、赤卫军和基本群众中部分男女青壮年组成。11月，桃古区奉命与毗连的福建省兆征县古城区合并为桃古区，原两区游击队合并为桃古区游击大队，共300余人。彭胜标任中共区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胡荣佳任区委副书记兼区游击大队司令员，统辖区游击大队和各乡镇游击队。

为了提高各县游击队的军政素质，中央军区于11月间在宽田举办了游击训练班，抽调各县军事骨干分子，集中学习游击战术。

与此同时，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等率省直属部队和长汀、兆征等县独立营转移至长汀、瑞金交界的四都山区与敌对峙。另一部分武装转移到瑞金、会昌边境活动。为了适应斗争需要，福建省委决定在瑞金、会昌边界地区成立瑞会县和县属游击司令部。由谢炳煌任县委书记兼游击司令部政治委员，张开荆任司令员，率领县独立营和游击队，在长汀、瑞金、会昌等县边境开展游击战争。

在这段时间内，瑞金、瑞西、西江和兆征、瑞金等县独立营和游击队，根据中央分局的指示，主要是集中行动，配合红24师正面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这对打击进犯苏区的敌人，掩护主力红军转移作出了贡献。但有生力量消耗过大，特别是贻误了由集中作战转向分散游击战的时机，为尔后坚持游击战争造成了不利的局面。

1935年2月上旬，中央苏区斗争形势愈加严峻。国民党军在对苏区分割封锁的基础上，开始对瑞金、瑞西、西江和雩都等县进行分区“清剿”。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被迫率红24师等基干红军部队向雩都南部山区转移。瑞西特委和瑞金县委及所属部队留在瑞金西部的铜钵山坚持斗争。此后，瑞西特

委与中央分局失去了联系，只好独立自主地领导闽赣边的游击战争。

（二）血腥恐怖笼罩闽赣边

国民党军占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后，唯恐留下革命火种。于是同地方复辟的封建势力相勾结，“斩草除根”，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卷土重来的地主豪绅、流氓、地痞等封建势力，秉承国民党反动派的旨意，纷纷组织“民团”、“铲共团”、“暗杀团”等反动恐怖团体，疯狂地对原苏区军民进行阶级报复。叫嚣要挖地三尺，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斩尽杀绝，以“根除后患”。他们在“茅草过火，石头过刀、人要换种”的凶残口号下，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其手段之残忍，亘古罕闻。造成许多地区“不见炊烟，但闻鬼哭”，无人荒村比比皆是。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军民惨遭枪杀、活埋，以至挖心、肢解，令人惨不忍睹。

国民党保安团，是最凶恶的地方反动势力，对革命军民特别凶残。瑞金保安团在卷土重来后，一个晚上就杀害了武阳区革命群众 500 多人。接着又伙同地主豪绅恶棍，在瑞金的菱角山活埋了 300 多革命军民。在 80 余天内，瑞金被杀害的群众达 1800 多人。许多共产党员和苏区干部全家被杀绝。长汀县楼子坝村，有 43 户人家 143 人，除一位 80 多岁的老妇人幸免于难外，全部被杀光。长汀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刘恩德一家 7 口人，包括怀孕的妻子，全遭反动派活埋，造成惨绝人寰的七尸八命案。

国民党在与地方封建势力相勾结，对苏区军民进行大屠杀的同时，又祭起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破旗，强化基层反动统治。从城镇到乡村，普遍实行保甲制度，严格控制户口，每户发一“户口证”，记载全家人口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和特征。“证”上还印着血淋淋的四个大字：“十杀条例”——窝匪者杀；济匪者杀；向匪提供情报者杀；匪来不报者杀；匪去不追者杀……同时建立保甲自卫队等反动武装。更有甚者强行移民并村，致使汀瑞边界周围好几十里的农村成了无人区。在群众集居的村落，设置哨卡，控制和监视村民活动。并明令推行“一人犯法，十家同罪”的联坐法。企图借此割断人民群众与红军游击队的血肉联系。

反动派还采取高压与“怀柔”相结合的伎俩，威胁利诱意志薄弱者自首变节，以图分化瓦解革命队伍。此外，在经济生活中，对村民生活必需品尤其是粮食，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并对游击队活动区域实行严密的封锁，妄图将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冻死在荒山野岭。闽赣边革命军民，顿时被推入血雨腥风的苦海之中。漫漫长夜，暗无天日。

（三）边区军民浴血抗争

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原苏区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和暗无天日的统治；一方面对有游击队活动的山地、要隘修筑碉堡、篱笆，架起电话，以重兵把守，层层封锁。同时协同地方反动武装不时上山“清剿”、“搜剿”。起初阶段，几乎天天出动，从山脚到山顶，再从山顶到山脚，进行梳篦式的“搜剿”。甚至放火烧山，企图将游击队逼入刀山火海。富于革命传统的闽赣边军民，从不畏死，面对强敌，处变不惊，不屈不挠，奋起抗争。同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血染铜钵山 1935 年 3 月中旬，国民党集中 3 个师的兵力围攻瑞西特委所在地铜钵山区。当游击队发现国民党军逼近铜钵山下的岗西、沙心、万田等地时，瑞西特委和直属队已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条件下，进行正面抵抗是没有意义的。唯一的办法是突出重围，保存有生力量，以待时机。由于敌情紧急，又不了解敌人的整体部署，瑞西特委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当务之急是组织突围，摆脱强敌。为便于行动和分散敌军力量，特委决定将集中在铜钵山的瑞金独立营（四五百人）和政治保卫队、侦察连等直属部队与机关干部共约 1000 余人，混编成 3 个大队，分 3 路突围。军分区司令员刘连标、政委杨世珠率第 1 大队为一路；特委书记赖昌祚、少共特委书记钟德胜率第 2 大队为一路；原瑞金独立营营长带领第 3 大队为另一路。特委约定 3 个大队分途突围后，赶到瑞金南部的安治前集中，然后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在实施突围战斗中，指战员勇猛冲杀，前仆后继，杀出一条条血路，冲出敌人铜钵山防线。但由于敌人设置重围，游击队冲破敌第一道包围圈后，又陷入敌第二道重围。第 1 大队由铜钵山突围后，转战九堡、黄柏、莲花山、罗汉岩等地，处处遭敌拦击。当穿越瑞金——长汀敌人封锁线时，遭敌猛烈阻击，部队伤亡惨重，刘连标壮烈牺牲，部队只剩下 20 余人，在杨世珠带领下向福建方向转移。途中遇兆征县独立营部分失散人员，两支兄弟部队合在一起，辗转抵达瑞金的观音峙。第 2 大队从铜钵山突围出来后，途经九堡时，复遭敌军堵截，赖昌祚、钟德胜指挥部队奋力拼杀，终于摆脱敌军围追堵截，到达目的地安治前，幸存者约四五十人。第 3 大队在突围中损失尤重，只有少数人摆脱敌人追堵，到达观音峙与第 1 大队会合，然后一起回到安治前。

当赖昌祚率队抵达安治前时，从零南突围出来的少共中央分局书记李才莲率独立第 7 团一部，也抵达安治前。李才莲按照中央分局的指示，本来是要前往闽赣省委的，因途中遭敌军堵截，而折转安治前与赖昌祚部会合，并随瑞西特委活动。这时瑞西、西江两县领导人也各自带领本县独立营突破敌军包围，相继到达安治前。与瑞西特委会合。几支部队合在一起共约 200 余人。

国民党军在血洗铜钵山后，得悉红军游击队汇集于安治前地区，立即调转头来，以两个师的兵力，外加瑞金县的地主武装，围攻安治前。瑞西特委为避敌锋芒，以保存有生力量，决定部队作第二次大转移。具体部署：瑞西、西江两县独立营返回本县，坚持分散的游击战争；将铜钵山和零南突围出来的部队，编成两个大队。第 1 大队由赖昌祚、李才莲率领、第 2 大队由钟天禧、钟德胜率领，分途向瑞金东部的观音峙转移。

部队转移至观音峙后，为了恢复铜钵山区工作，瑞西特委决定由钟天

禧、钟德胜率第2大队转兵铜钵山。第1大队暂留观音嶺地区活动，待第2大队打开局面后，再回到铜钵山，建立基本根据地，坚持闽赣边界的游击战争。

钟天禧、钟德胜率部回到铜钵山时，原有的村庄已成了一片废墟。劫后余生的群众，全部被国民党反动派赶出山区，使铜钵山区变成荒凉的无人区。很显然，在这荒无人烟的山区是无法长期立足的。加之国民党军尾追而来，游击队如果不立即转移，可能会遭致全军覆没。有鉴于此，钟天禧、钟德胜当机立断，决定带领部队转移至瑞金东部的罗汉岩山区活动。部队在转移途中，遭国民党军两个团的拦截围攻。钟天禧身先士卒，率指战员奋力冲杀，壮烈牺牲，部队伤亡惨重，但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钟德胜率余部冲出敌军重围，转至大柏地乌坑，重整旗鼓。

赖昌祚、李才莲率第1大队在向铜钵山转移途中，也遭到国民党军重兵拦截，李才莲在突围中不幸中弹阵亡。赖昌祚率部突出重围，折返观音嶺山区。

在此期间，瑞西、西江两县独立营在从安治前返回本县途中与敌军遭遇，部队一度被冲散。后来瑞西县独立营重新聚集，在县委书记马德明率领下摆脱敌人追击，转至白竹寨地区坚持斗争。1935年5月上旬，白竹寨遭敌军包围，马德明率部突围，转至黄柏地时复遭敌军袭击，部队被打散。马德明率余部转移至雩都上堡活动。月底，在一次战斗中马德明不幸被俘，慷慨就义。西江县独立营聚集后，复于汀瑞边再度被敌军打散。至此，瑞西、西江两县独立营建制消失，幸存人员或转入地下斗争，或加入兄弟游击队，继续战斗。

同特委、县委失去联系的瑞金武阳区游击队，在队长刘国兴领导下，一直在武阳地区坚持斗争。这支游击队是在1934年10月，由武阳区武装部长刘国兴奉命组建的，共100余人，30多支枪。当国民党反动派进入武阳时，游击队转入山中与敌周旋。反动派抓不到游击队，就使出毒计，向游击队员家属开刀，逼迫家属交出游击队员，家属不从，就惨遭杀害。刘国兴的母亲面对凶残的敌人，大义凛然，最后被敌人活活打死。刘的妻子被强迫改嫁。刘的刚满10岁的儿子拒绝给敌人带路，竟被惨无人道的反动派用大刀劈成4块抛入河中。刘家遭洗劫一空后被付之一炬。刘国兴一家的悲惨遭遇，激起游击队员们的深深同情和对反动派的刻骨仇恨，纷纷要求下山与敌拼命，为队长一家报仇雪恨。刘国兴悲愤交加，复仇之火在胸中燃烧。然而，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用理智克服了感情的冲动。他深知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去同敌人硬拼，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于是他强忍悲痛，力劝游击队员保持冷静，待机而动。

由于敌人在重兵“清剿”游击队的同时，加强了对武阳群众的控制，使游击队顿失耳目，并断绝了生活接济，游击队处境十分险恶，不断减员，为了有效地保存有生力量，刘国兴经与队员商讨后，决定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同时动员一些妇女和伤病体弱的队员，暂时回家或投亲靠友，分散隐蔽。经精简后，游击队留下30余个精壮队员，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时隐时现，时而分散隐蔽，时而集中袭扰敌人，搅得反动派无可奈何。

百折不挠闽赣边红军游击队，在铜钵山区遭到挫折的同时，边界其他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遭到同样的命运。退集长汀县四都山的福建军区机关和所属部队，因寡不敌众，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省直辖的瑞金县游击队在汀瑞边境也遭到了重创，幸存者仅有县游击司令部司令员张开荆、参谋长周桂生、

独立营政委张志辉等 8 人。他们在岭背一带坚持斗争。兆征县游击队余部，在张悌带领下，与桃古区游击队会合在一起，在桃阳、古城、四都等地继续坚持斗争。

由于敌以重兵“清剿”与残酷镇压，闽赣边区各县、区、乡党组织均遭到严重破坏，红军游击队损失惨重。但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游击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反动派可以凭借优势兵力而一时猖狂，但决不可能将他们斩尽杀绝。“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迄 1935 年 5 月，在汀瑞边除分散开展秘密斗争的革命者外，尚有几支红军游击队在顽强地坚持斗争。他们是：瑞西特委领导人赖昌祚、钟德胜等率领的瑞金游击队，在观音嶺山区坚持斗争；刘国兴率领的武阳区游击队 20 余人，在武阳猪坑一带地区开展活动；张开荆率领的瑞金游击队 8 人，在岭背山一带山区与敌“捉迷藏”；张悌率领的兆征县游击队余部 5 人和彭胜标、胡荣佳领导的桃古区游击队 30 多人，在猪仔嶺山区与敌周旋。以上几支游击队虽然总共只有 100 余人，而且分散于几个地区，互相失去联系，各自单独坚持斗争，但他们都是从炼狱中走过来的革命骨干，犹如经过严冬霜雪无情摧残，然生命基因尚存的种子，春天一到，就会在人民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二、开展独立、分散的游击战争

（一）丝茅坪会议，确立新的斗争方针

在黑色的岁月里，闽赣边区军民，由于事先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在敌人突如其来、势如狂风暴雨的摧残下，受到了严重损失。幸存下来的几支游击队，在敌人的分割封锁下，不仅同上级失去联系，互相间也中断了音讯，各自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这种状况，不仅不能给敌人造成威胁，而且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跌入深渊。在敌人“清剿”的第一个冲击波过后，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领导者，痛定思痛，意识到亟待冷静下来，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形势，确定新的斗争方针和任务，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丝茅坪会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

丝茅坪位于汀瑞边界的观音嶂山区。瑞西特委率直属队转移到观音嶂地区后，赖昌祚于5月间在丝茅坪主持召开主要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瑞西特委委员钟德胜、杨世珠和游击队的部分领导人。会议对游击队当前的处境和斗争形势作了认真的分析。赖昌祚指出：当前游击战争已经到了非常紧要的时刻，在反动派的几十倍于我的兵力，对我穷追不舍的情况下，我们部队集中行动，是非常危险的，这不仅目标大，易遭敌人围攻，而且难于解决粮食供应问题。赖昌祚要求与会者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转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的紧急指示，确定新的行动方针，以摆脱目前的困境。

与会者经过认真分析研究，一致认为：国民党占领中央苏区后，封建势力已经复辟，地主豪绅已恢复了反动的统治，闽赣边人民重新陷入万劫不复的苦难之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正面抗击敌人，同敌人死打硬拼，是没有前途的。会议认为前一阶段斗争，血的教训主要是对形势缺乏正确估计，麻痹轻敌。起初集中兵力，正面抵挡强敌进攻，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随后又因循守旧，选择目标突出的铜钵山作为根据地，集中力量与敌周旋，而没有及时分兵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致使红军游击队遭受重大损失。

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分散的群众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和前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立即转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实行“保存力量，分散行动，以待时机”的行动方针。在敌情特别严重时，游击队化整为零，以保存自己；在时机有利时，立即化零为整，打击反动势力。在斗争方式上，要紧紧依靠群众，建立秘密联络点，逐渐恢复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同时选择群众基础好的山区，创造条件，建立游击根据地，以便长期坚持边界游击战争。

丝茅坪会议是闽赣边游击区的斗争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是闽赣边游击队斗争由被动逐渐转向主动的起点。

在丝茅坪会议前后，一些未同瑞西特委取得联系的汀瑞边界游击队，也适时地召开了干部会议，总结经验，分析形势，确定新的行动方针。他们集思广益，正视现实，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在斗

争方式上，注意将游击队的武装斗争与群众性的政治斗争，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结合起来。同时积极恢复和建立地下党组织，设立秘

密交通站，加强情报工作，以保证对敌斗争，知己知彼，出奇制胜。

（二）充分依靠群众，加强党的建设

扎根于群众之中中共瑞西特委和闽赣各支游击队，在丝茅坪会议确立的新的行动方针指导下，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随机应变。当形势险恶时，队伍化整为零，以秘密斗争为主，或暂时分散隐蔽，保存自己，等待时机。一旦形势好转，即化零为整，适当集

中力量，寻找战机打击敌军，镇压土豪劣绅，动摇以至摧毁国民党的基层统治。

丝茅坪会议后，特委主要领导人即分开活动，各率一支武装，分别在不同地区开展斗争。赖昌祚率一部分武装留守罗汉岩山区。钟德胜率30余名指战员，转移到大柏地开展斗争。杨世珠因病留在地方上休养，随后脱离革命队伍。其他游击队分别在各自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

各游击队在分散斗争的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争取群众的极端重要性。由于敌人制造白色恐怖和造谣中伤，离间革命军民关系，造成群众思想混乱，致使一段时间内，群众不敢与游击队接触。游击队下山进村，不声张还好，如果说明自己是红军游击队，群众立刻逃散，弄得游击队员手足无措。由于失去群众支持，游击队的处境就更为艰难。因此，游击队当务之急，是揭穿敌人的阴谋诡计，恢复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为了争取群众，首先必须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钟德胜率部抵达大柏地后，立即设法找到地方党组织。然后在地方党组织和基本群众协助下，对村民开展深细致的思想工作，揭露反动派的离间计，并以实际行动还红军爱民救民的革命本色，恢复和争取群众的信任。对反动派为欺骗群众而使用的破坏红军游击队声誉的卑劣

伎俩，则给予有力的打击，让事实教育群众。

许多地方的反动势力，为破坏游击队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派人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到处“打土豪”（实是打家劫舍）；或找群众“联系”，如果群众表示对游击队的同情和帮助，即被认为“通匪”，而遭杀身之祸。反动派还广造谣言，说什么“红军变了”，“变成六亲不认，杀人不眨眼”。多数群众虽然不相信反动派的谣言，但真假红军莫辨，为安全计，对游击队只好采取回避态度。游击队一进村，老百姓纷纷跑回家里关门闭户。战士们无奈，只好挨家挨户隔着窗户宣传解释，消除群众顾虑。一次宣传不行，就二次、三次，反复进行，直到群众释疑信任为止。此外，游击队员还采取“拦路宣传”的办法，即事先隐蔽在群众往来的路旁，当群众路过时，即出来拦住，当面作宣传工作。使群众亲眼见到现在的红军游击队，面目如初，还是当年红军的老样子，和蔼可亲，因而化疑惧为信赖。至于伪装红军作恶者，游击队则伺机将其捉住，当众揭开他的假面具，暴露反动派的阴谋毒计。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的努力，游击队终于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有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游击队不仅生存有所依托，而且变得耳聪目明，做到对敌斗争知己知彼，逐渐掌握了行动的主动权和自由权。

实施正确的政策在策略上，对国民党的保甲长、联保主任及地主豪绅，采取刚柔并济政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尽可能争取其中大多数保持中立或为游击队所用。对冥顽不化者，则严惩不贷，杀一儆百。促使国民党乡村白色政权由动摇而逐渐变成“灰色政权”。建立灰色政权的一般做法是，选择一些民愤不大的保长、联保主任为对象，先把他们捉起来进行教育争取工作。

对表示愿意同游击队合作者，即放他回去，明的当保长、联保主任，暗地里帮游击队办事。如桃古区花桥乡联保主任王狗佬，游击队把他抓上山后，他表示愿意帮助游击队，游击队即对他约法五章：1.随时给游击队送情报；2.游击队在马桥一带活动时，不得报告国民党军队，待游击队离去后，可以去报告；3.不准欺压平民百姓；4.保证红军家安全；5.帮助红军游击队购买医药及其他日常用品。王狗佬全部接受游击队的“约法”。放他回去后，他果然实践自己的诺言。接着，游击队给活动地区的各联保办事处、区公所负责人写信、发传单，警告他们：不准和游击队作对，不许迫害老百姓。并申明，只做到这两点，红军游击队保证他们生命安全，否则严惩不贷。随后对少数作恶多端，顽固不化者给予严厉镇压，以证明游击队言必信，行必果。

在游击队赏罚严明的政治攻势下，靠近游击队活动区域的国民党基层政权，逐渐发生分化。一些保甲长和联保主任主动给游击队写信，表示愿意暗中为游击队效力。一些罪恶大的保长和联保主任，为了保命，纷纷弃职逃亡。游击队则乘虚而入，策划群众暗中推举自己人出来“补缺”。结果一些地方的保甲长换上秘密的共产党员或可靠的基本群众，他们仍以灰色面目出现，实为革命的两面政权。随着灰色政权的扩展，游击队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在军事上，游击队实行分散的麻雀战法，以保证有效地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他们平时隐伏山林，或隐蔽在邻近联保办事处的地方，避免暴露目标，静待时机。当环境许可时，即主动出击，集中适当力量歼击小股出扰的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由于得到群众的庇护和密切配合，游击的“藏”与“打”，一般都能如愿以偿。

在经济上，由于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并对靠近游击队活动地区的群众，实行粮食和日常生活用品配统制，严格限量购买，以图切断游击队的生活来源。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粉碎国民党的企图，游击队首先采取捉土豪筹款的办法，解决经济来源问题。然后通过基本群众远离游击区的路边商店购买衣物、药品及其他

第三章 闽赣边游击区 生活必需品，秘密送上山。在地下党有力的争取下，有的商店自愿秘密为游击队服务，不仅成为游击队日常用品的供应站，而且成了游击队的情报站和交通站。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告密，坑害群众，游击队特意给土豪施加压力，抓住他的把柄，使他不敢乱说乱动。具体做法是，让他们代购一般群众难于买到的生活必需品，并故意在大庭广众中张扬。土豪怕别人向国民党告发他“通匪”，他也就敢不敢向国民党报告群众同游击队的联系。

加强党的建设游击队的领导者，都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他们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深知党是革命力量的领导核心和生命之源。加强党的领导，是游击队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此，加强党的建设，就成了游击队一项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瑞西特委鉴于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军队党组织也被打乱现状，采取了三条有力措施：

一是迅速健全军队党组织。军队中党员比重较大，如瑞金游击队30多人中除2人外，其余全是党员。但由于部队惨遭挫折，建制早被打乱，党组织系统也随之瓦解。鉴此，瑞西特委决定在游击队中立即建立严密的组织系统，游击大队设立党的总支部，区队设党支部，分队成立党小组。这样，游击队的每一级都有党组织在其中起核心作用，成为打不垮拖不烂的红色队伍。

二是积极恢复和发展地方党组织。特委和游击队首先设法同地下党组织

或党员取得联系，帮助他们恢复活动，积极领导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并在实际斗争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对培养对象，经过严格考察，成熟一个发展一个，逐渐扩大党的队伍。尔后分区域建立地下党支部。有了党支部这个战斗堡垒，群众斗争就有了主心骨。而群众斗争的发展，党的组织也就随之扩大。这样发展群众斗争和壮大党的队伍成了良性循环。到了 1936 年夏，仅瑞金地区就发展党员 100 多人，并建立了黄柏、合龙、王田、大柏等区委。

三是大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不论地方和游击队党组织，在积极进行组织建设的同时，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他们从当前斗争实际出发，强调革命信念、气节和前途教育，以及党的方针、政策、斗争艺术和纪律等教育。为了提高党员素质，汀瑞边党组织，还在艰难的条件下，抓紧时间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学习文化知识。随着党员文化水平的提高，党组织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和斗争策略水平都有明显的提高，这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党组织的积极活动，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汀瑞边革命力量，又逐渐恢复了生机，从斗争谷底逐渐回升。

（三）在斗争中求发展

闽赣边党和游击队在重整旗鼓和转变斗争方式后，革命力量得到逐渐恢复。从1935年下半年起，游击根据地已初步稳定下来，斗争形势日渐向上，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不过在总体上，敌我力量对比，仍很悬殊，前进道路坎坷不平。然而有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又有切合实际的行动方针的指导，闽赣边游击战争已渐成气候。

瑞金游击队相机出击中共瑞西特委直接领导的瑞金游击队，在地方党组织协助下，积极寻找战机，不时主动出击。1935年10月上旬，瑞金游击队根据地下党提供的情报，得悉一小股敌兵乘车沿瑞（金）宁（都）公路开进。钟德胜当机立断，率队设伏于瑞金边界大柏地麻子凹公路旁。等敌汽车进入伏击圈后，游击队突然发起攻击，敌猝不及防，汽车被击毁，车上敌官兵悉数就歼。国民党当局惧恨交加，急调部队对大柏地地区反复进行“搜剿”，企图一举歼灭瑞金游击队。然而游击队在群众掩护和帮助下，早已从大柏地安全转移到了罗汉岩。敌在大柏地折腾一阵后，徒劳而返。

瑞金游击队转到罗汉岩后，乘敌不备，迅速消灭了当地的地主武装，镇压了一批与游击队作对的土豪恶霸，巩固和扩大了罗汉岩根据地，并以此为立足点，利用敌人地方部队的区域限制，往返于瑞金——长汀之间，同敌军周旋，时而进击，时而隐蔽。当江西之敌来“清剿”时，游击队就转移福建境内；当福建敌军来“清剿”时，又转回江西一侧。一旦捉住有利战机，就给敌猛然一击。11月间，瑞金游击队乘敌不备，突袭瑞金合龙乡公所，一举成功，俘乡丁10余人，缴长短枪23支。接着又于12月间，在地下党协助下，在大柏地的隘前伏击国民党的一辆军车，毙伤敌官兵30余人，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旋于1936年1月，袭击王田联保办事处，击毙了企图负隅顽抗的联保主任和几名反动武装分子，震慑了一方地主豪绅。游击队连连出击，相继告捷，大长了游击区军民意志，灭了反动派的威风。敌军欲图报复，又找不到游击队行踪，徒叹奈何。分散于四乡的地主武装，又处于广大群众的监视之下，一举一动，都为游击队所了解，慑于游击队的惩治，反动气焰均有所收敛。这样一来，游击队的斗争环境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武阳游击队东山再起这支游击队在头一阶段损失惨重。由于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饥寒疾病，雪上加霜，致使游击队战斗与非战斗减员时有发生，到1935年6月，100多人的游击队，只剩下区武装部长刘国兴等2人。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悲观绝望，而是抱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自强不息。刘国兴对同伴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剩下一个人就有一粒红色种子，这粒种子只要落到人民这块土地上，就必定生根开花结果。”他们接受起初阶段过于暴露的教训，改变斗争策略，由公开转入隐蔽，深入群众，扎根串连，秘密发展党员，由点到面，帮助地下党员恢复和建立党支部，并通过地方党组织寻找和联络失散的游击队员，重建游击队。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到1935年冬，在地方上相继恢复和建立了松山、安富、石水、麻田、螺石、下洲等8个党支部，并在此基础上恢复了武阳区委。游击队又以新的面貌活跃于武阳地区，斗争局面大为改观。

武阳游击队和中共地下组织重新恢复并积极开展活动，使国民党当局深感不安，并严加防患，不断派兵四出“清剿”。武阳游击队密切注视敌人动向和活动规律。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发现敌军出扰，一般都是早出晚归。游

击队抓住敌军这个活动特点，白天上山隐蔽，避敌锋芒，晚上下山，深入村庄，开展群众工作。基本群众则为深入村中的游击队站岗放哨，以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由于群众冒险庇护，游击队员常常化险为夷。一次刘国兴在秦坑黎带娣家搜集情报，保安团突然进村，并挨家搜查，情况异常危急。黎带娣情急智生，将刘国兴推倒在床上，顺手拿条被子盖上，放声大哭，边哭边诉：“儿呀，你死得大早了，妈妈今后日子怎么过呀……”保安团团丁闯进房门，见床上被子裹着一个直挺挺的“尸体”，就赶紧退出来，说碰上霉气。正好这时黎带娣的丈夫李长根外出回来，团丁即将他抓走，逼他交出刘国兴。李长根虽遭严刑拷打，但始终坚持说不知道刘国兴下落。就这样，李长根、黎带娣夫妇用智慧和顽强意志，保证了游击队的安全，有的群众还为帮助游击队购买药品和生活必需品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武阳地区基本群众钟文芳、卢衍宾到瑞金县城替游击队购买药品时，突然被捕。原来用来买药品的纸币，是游击队打土豪筹的款子，阴险的豪绅在纸币上刺了针眼作记号，并密告国民党军警暗中查缉，结果使两名为游击队购物的群众落入敌手。敌人对这两位群众施加酷刑，逼他们交待游击队下落。他们坚贞不屈，宁死而不吐露真情，最后壮烈牺牲。

在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和支持下，武阳游击队不仅生存下来，而且逐渐发展壮大。他们由隐蔽斗争走向公开斗争，抓住有利时机，主动出击，镇压恶霸，打击地主武装。1936年冬，他们成功地袭击了小布脑联保办事处，歼敌多人。当地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顿时收敛。群众受到很大鼓舞，游击队斗志更加昂扬。

桃古游击队发展壮大这支游击队是以桃古区游击队为基础，加上张梯领导的兆征县独立营余部和张开荆领导的瑞金县游击队余部编成的，是闽赣边三支基本游击队之一。原先他们实行流动游击或分散隐蔽方针，忽视了建立相对稳定的游击根据地。由于部队没有依托，常常陷入困境。1935年10月，桃古游击队领导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将注意力放在游击根据地的建设上。他们首先在活动地区深入发动群众，组织阶级力量，军民同舟共济，相依为命。游击队舍生忘死为民除害，谋求解放。而人民则以身家性命掩护游击队。一次钟春山等5名游击队员到兰田村侦察敌情时，村子被保安团突然包围，游击队员来不及撤离。如果同敌人硬拼，不仅寡不敌众，而且将殃及群众。于是他们只好扮成村民同群众在一起。保安团强迫全体村民集中一块，并将青壮年男女分开，然后命妇女去认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他们满以为这一手是暴露游击队员的绝招。因为在封建伦理意识支配下，妇女是绝对不会认别的男人作夫的。但结果敌人大失所望。在紧急关头，女青年李翠华等5名姑娘，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封建伦理藩篱，机智地将钟春山等5名游击队员分别认作自己的丈夫，大大方方地领回家中，使游击队员安然脱险。保安队找不出破绽，只好悻悻地撤走。

桃古游击队在斗争实践中，深切体会到，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须臾离不开群众的支持。而要使群众斗争得以持久深入的发展，必须有共产党组织在群众中起核心领导作用。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发展地方党组织。先后在陶朱、黄鳝口、领背山、兰田、安治等地建立了党支部，并在此基础上，于1936年7月恢复了桃古区委，由刘辉山任区委书记。为了保持游击队与地方党的联系，在通往游击根据地的要道上设立若干交通站。从此，游击队的武装斗争与地方党领导群众斗争紧密配合。桃古游击队渡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并逐

渐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

1936年秋，桃古游击队，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协助下，接连取得了袭击苦竹、兰田和黄鳊联保办事处的胜利，镇压了“模范保”（兰田）第一任反动保长曾昭波等几个恶贯满盈的联保主任，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粮食、衣物等急需物资，大大改善了游击队的装备和生活。此后，在游击队恩威并施的政策震慑下，邻近游击区的国民党保甲长为保全身家性命，不得不收敛嚣张气焰，或保持中立，或暗中靠拢游击队，成了两面政权。这样，游击队就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斗争形势大为改观。

随着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壮大和斗争的胜利发展，桃古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都深切地感到，在同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亟需加强游击根据地的统一领导。为此，中共桃古区委和游击队负责人，于1936年11月在长汀县的猪仔嶂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汀瑞县委，由胡荣佳任书记，彭胜标任副书记。同时决定将桃古游击队改名为汀瑞游击队，由胡荣佳任队长，彭胜标任政委。

汀瑞县委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敌斗争的领导。为了不断提高斗争艺术，他们认真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把斗争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通过学习，他们进一步认识到，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光有决心和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灵活的斗争策略。因此，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和实践经验，制定了切合实际的行动方针：打土豪和发动群众相结合；惩办反动豪绅与争取建立“灰色政权”相结合。同时强调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坚决依靠工农群众，争取团结大多数。对地主豪绅，除罪恶极大者予以坚决镇压外，尽可能争取其保持中立，以削弱敌对势力。群众基础好的地区，则发动群众以“合法”名义建立名为国民党实为群众服务的保甲政权。汀瑞县委还成立了没收委员会，负责打土豪分财物和解决游击队的军需给养问题。

从1936年春夏起，由于国民党的正规军陆续撤离闽赣边地区，留下的地方保安团队和民团等武装，虽然还占有相当的优势，但对红军游击队的威胁已相对减轻了。闽赣边各支游击队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活动，由山上走向山下，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协助下，积极寻找战机，打击地方反动武装，惩治土豪劣绅，逐渐改变不利于我的敌我态势，化被动力主动。到同年秋，闽赣边3支基本游击队——瑞金游击队、武阳游击队和汀瑞（桃古）游击队基本上闯过了难关，走出了低谷，在各自活动的地区，开创了新局面。红色种子遍地生根开花结果。但不幸的是，在形势日益好转的时候，闽赣边党和游击队的主要领导者、中共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却遭叛徒暗杀了。

赖昌祚，江西瑞金县人。早年参加共产党，曾任瑞金县委书记、闽赣省省委书记。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后，中共中央分局为加强基本苏区的领导，将他从闽赣省委书记任上调任新成立的瑞西特委书记。他长期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积劳成疾，重病在身，以顽强的意志带病坚守岗位。1936年10月，他在瑞金的罗汉岩地区，一边领导游击队斗争，一边养病。一天，暗藏在他身边的叛徒，乘其他游击队员外出活动之机将其杀害，使闽赣游击区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赖昌祚牺牲后，特委委员钟德胜领导和率领瑞金游击队，继续战斗。

三、开创闽赣边斗争的新局面

（一）三支游击队胜利会合

1937年1月，钟德胜率领瑞金游击队转战观音嶂地区时，获悉胡荣佳、彭胜标、张开荆等领导的汀瑞游击队活动信息，立即派人循踪寻找，很快取得了联系。两支兄弟游击队几经辗转，于4月间在猪仔嶂胜利会合。历尽劫彼喜相逢，悲欢交集。战友们互庆互贺，士气大振。与此同时，钟德胜又通过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同刘国兴领导的武阳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从此，闽赣边三支游击队在各自孤军奋战两年后，终于冲破国民党的分割封锁，摆脱了各自为战的局面，使闽赣边的游击区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三支游击队的会合和沟通联系，进一步坚定了指战员坚持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士气大振，战斗力也随之增强。为了开拓新的局面，游击队在地方党组织配合下，积极寻找战机，主动出击。连战皆捷。6月上旬，瑞金游击队和汀瑞游击队在逃方党协助下，首战青山铺，旗开得胜。青山铺，是长汀通往瑞金公路上的一个军事要地。国民党军在此设立据点，长期驻守，对游击队的活动妨害极大。因此，游击队决定拔掉这个钉子。经侦察获悉，青山铺据点，由国民党保安队的一个分队担任守备，并不时与驻古城的保安队换防。据此，游击队挑选了40余名游击队员，装扮成古城保安队，以换防名义开进青山铺敌据点。守敌尚未反应过来，就全部当了俘虏。兵不血刃，歼敌数十人，缴枪30余支，拔掉了楔入游击队活动区域的钉子，为游击队开展活动，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继青山铺胜利之后，6月下旬，汀瑞游击队又取得了兰田袭击战的胜利。兰田是瑞金县的“模范保”，兰田地区的联保办事处就设在这里，是个顽固的反动堡垒，敌气焰十分嚣张。为长游击队志气，灭反动派威风，游击队决心与敌较量。此前，游击队曾两次袭击兰田保，捕杀了反动保长。豪绅地主因此惶恐不安，惧恨交加。为报复计，他们挑选了反动分子曾广辉充当保长和联保主任，并派遣民团驻守兰田，与游击队对抗。这时，设在游击区内的反动据点之敌，已由攻势转为守势，游击队在局部地区已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为震慑敌人，汀瑞游击队决定彻底铲除兰田反动据点。6月下旬，胡荣佳、彭胜标等率汀瑞游击队40余人，在地下党的策应下，奔袭兰田，全歼守敌，毙反动保长和恶霸6人，缴枪14支。

（二）主动出击，开创新局面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浪潮，但闽赣边的国民党保安团遵照国民党反动派的旨意，顽固地坚持内战，继续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而且气焰嚣张。企图借助优势兵力彻底消灭游击队。为了挫败敌人的企图，游击队决定首先铲除保安团的帮凶——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和地主武装，削掉保安团的左膀右臂，使其陷于孤立。

游击队选择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瑞金武阳区公所。武阳是瑞金县的一个大圩镇，东与福建长汀县的四都相连，西南与会昌、西江两县相接，距瑞金城约 15 公里。国民党武阳区公所设在圩边的一个大院内，有 10 多个职员，并驻有民团一个排，担任守护。是国民党军队“进剿”游击队的一个前沿据点。为了拔掉这个据点，闽赣边游击队决定集中兵力，出敌不意给敌以突然袭击。8 月上旬的一个圩日，闽赣边三支游击队在统一部署下，兵分 3 路。两路化装成老百姓，随赶集的群众进入圩镇，其中一路由刘国兴率领隐蔽在紧挨区公所的游击队员邹日祥家中作为突击队；另一路潜伏在离区公所不远的民房里，接应突击队；钟德胜率领的一路人马埋伏在圩镇外围的一座敌人废弃的炮楼里，策应圩内袭击行动。入夜，按约定时间，潜伏在圩内的突击队向区公所发起冲击。被突然袭击打懵了的敌人，起初试图反抗，但在游击队猛烈攻击下，很快就瓦解了，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全部举手投降。此役共歼敌 30 余人，缴获长短枪 30 余支，子弹 9000 余发，手榴弹 60 余枚。游击队牺牲 1 人，伤 2 人。这次战斗的胜利，不仅拔掉了敌人一个重要据点，而且使游击队得到了较大的武器弹药的补充。这在物质匮乏的游击战争环境中，是十分可贵的。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在圩内召开了群众大会，钟德胜代表游击队讲话，揭露反动派坚持内战的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共御外侮的主张。大会应群众要求，镇压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武阳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游击队和群众的斗志，为粉碎敌人的“清剿”创造了有利条件。瑞金地区的国民党军政当局对武阳的惨败，惧恨交加，为报复计，纠集优势兵力开进武阳地区，试图与游击队一决雌雄。闽赣边游击队为保存有生力量，采取避实就虚战术。为避敌锋芒，各大队实行分散转移。1 大队（瑞金游击队）由武阳转向日东、罗汉岩和观音嶂一带活动；2 大队（汀瑞游击队）转到四都、兰田、僵田一带活动；3 大队（武阳游击队）留在武阳地区与敌周旋。8 月下旬，第 1 大队在转移途中，获悉国民党汀州专员秦振夫乘车从瑞金返回长汀。钟德胜当机立断，迅速指挥部队埋伏在汀瑞公路的险要处——山箭脑。这是从瑞金到长汀的必经之路。游击队设伏完毕，以逸待劳。不久从远处传来汽车的马达声，战士们兴奋异常，拭目以待。俄顷，一辆大汽车驶入游击队的伏击圈。钟德胜一声令下，步枪手榴弹雨点般地射向敌汽车。敌猝不及防，还未反应过来，就已全部就歼。计毙敌 7 人、生俘 1 人，缴枪 10 余支。被俘的是汀州专员秦振夫的老婆，经审问才得知秦振夫已于头一天乘另一辆汽车返回长汀。游击队员们虽然感到有点失望，但闪电般的歼灭战，还是令人兴奋不已。随着游击队的捷报频传，游击区人民精神振奋，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到 1937 年秋，游击队人数发展到 100 多人。游击队的活动地域也由山区推向平原。国民党军队（保安团）进山“清剿”徒劳无功，顾此失彼，加之举国抗战的浪潮已波及穷乡僻壤，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考虑改弦更张。

四、实现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随着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展开和国共合作抗战局面的形成，国民党地方当局不得不正视现实，被迫对红军游击队采取和谈方针。而闽赣边游击区虽因山峦阻隔，信息闭塞，但在项英、陈毅和闽西游击区的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领导人的关注和指导下，闽赣边的游击队也不失时机地登上历史列车。通过曲折的谈判斗争，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战略转变。

（一）沟通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

早在 1937 年六七月间，闽西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闽西当局进行合作谈判时，就曾提出派人去同闽赣边游击队取得联系，以使其统一下山改编，但国民党汀瑞当局不承认闽赣边地区有游击队。然而闽赣边游击队夏秋间一系列的胜利，令国民党汀瑞当局深感头痛，又无可奈何。在全国抗战的大气候下，国民党地方当局为形势所迫，不得不采取现实态度，此时闽西游击区已实现国共合作。8 月底 9 月初瑞金县长不得不写信给闽西游击区的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人，承认汀瑞地区确实还有游击队，要求张、邓派人将游击队接下山来，合作抗日。另外汀州专员也向张鼎丞等告状，说汀瑞游击队袭击了他的汽车，打死了他的卫兵，抓走了他的老婆，要求张等加以约束。张鼎丞、邓子恢从来自各方面的信息，证实汀瑞边游击队不仅存在而且充满活力，十分高兴，于是立即派遣肖忠全等前往联络。肖忠全于 9 月上旬抵达闽赣边，在当地群众帮助下，很快找到了游击队。他向闽赣边游击队领导人出示了邓子恢的亲笔信，传达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介绍了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使游击队指战员顿开茅塞。特别是得悉已同党中央取得联系，犹如漂泊天涯的孤单游子，突然回到母亲怀抱，悲喜交集，欢喜若狂。钟德胜、胡荣佳、刘国兴等领导人根据新的情况，立即决定派张志辉随同肖忠全到龙岩的雁石村，向新成立的中共闽粤赣省委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汇报情况和请示行动方针。

张志辉到龙岩向张鼎丞等汇报和接受指示后，立即返回汀瑞边向游击队的领导人传达张鼎丞对闽赣边游击队的几点指示：1. 停止游击战争，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及驻军进行合作抗日谈判；2. 保持共产党和游击队的独立性，成立自己的办事机构；3. 迅速扩大武装力量，尽快地发展党组织。游击队领导人经研究后，一致认为事关重大，对于思想上如何实行转变，怎样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等重大问题，必须继续请示上级组织，求得具体指示，才好采取实际行动。因此决定，一方面向游击队员传达张鼎丞的指示，开展学习，作好战略转变的思想准备；一方面派胡荣佳到闽西向闽粤赣省委汇报和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同时还派遣彭胜标前往赣粤边游击区，寻找中央分局，以求得分局的直接指示。

（二）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合作抗日协议

9月中下旬，彭胜标到达大厦县的池江地区，向项英、陈毅汇报了闽赣边游击区的情况。项、陈听了汇报后，对闽赣边游击队的顽强斗争，作了充分的肯定。项英说：我们离开瑞金，整整3年了，汀瑞边的人民和游击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已渡过了难关，迎来了光明，红军游击队虽然只剩下百把人，但这是革命的骨干，是中国人民抗日的中坚力量。接着陈毅介绍了与国民党江西当局谈判的情况和结果。他深有体会地说：同国民党当局谈判，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国民党在谈判中耍阴谋诡计，企图通过政治谈判达到军事“清剿”未能达到的目的。陈毅还特别指出，汀瑞边游击区的国民党驻军是叛徒王才梯（黄镇中）指挥的保安团。而叛徒比国民党反动分子更危险，谈判斗争会相当尖锐的，思想上要有所准备。

项英、陈毅还指示彭胜标回到游击区后，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强部队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积极扩大队伍，壮大党的力量。在同国民党代表谈判时，要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彭胜标深感责任重大，要求项、陈派人前去帮助。项、陈表示同意。经商议决定，派陈丕显以中央分局代表身份前往闽赣边区传达中共中央新的方针政策和项、陈的具体指示。行前，陈毅找陈丕显交待任务：除了向汀瑞边游击队传达党中央和分局指示，介绍同国民党谈判的经验外，还要同国民党瑞金当局打通关系，敦促他们认清形势，立即停止对游击队的进攻，为双方谈判创造条件。陈毅还把亲笔写给赣州专员和瑞金县长的信交给陈丕显，并风趣他说：“阿丕同志，你拿着这个东西可以走遍赣南，国民党的专员和县长都不敢亏待你。”

陈丕显受领任务后，即带两个随员同彭胜标一起从池江出发。路经赣州时，陈丕显拿着陈毅的亲笔信去会见国民党专员马葆珩。马见信后待陈丕显一行如贵宾，并再三表白：贵党陈毅先生和我们会谈刚刚结束，双方达成合作抗日协议，今后咱们就要携手抗战。他还亲自给瑞金县长打电话，告知陈等到达时间，并要求确保陈等安全。陈丕显一行告别马专员后即起程赴瑞金。瑞金县长谢寿如因事先接到其上司的指示，对陈丕显不敢怠慢。一再表示要为双方谈判提供方便条件。同时以贵宾待遇安排陈等食宿。

当陈丕显一行刚在一家旅馆安顿下来，就有一名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官前来求见。陈以礼相待。那位军官先讲了几句国共合作抗日一类应酬之话后，话锋一转，要求陈丕显告诉汀瑞游击队，赶快下山编入保安队，和他们一起合作抗日。口吻隐含威胁。陈见来者不善，遂正言相告：根据项英、陈毅与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达成的合作抗日协议，你们有义务为我方提供方便，及时与闽赣边游击队取得联系。我是奉项、陈之命而来的，瑞金游击队的行止，只能听命于项、陈。我个人无权决定。汀瑞游击队下山改编抗日，是大势所趋，但不能由你们保安队收编。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含糊。那位军官见陈丕显不买他的账，意欲再施压力。陈丕显则厉声回敬之：如果有人想借机吃掉游击队，那是与合作抗日背道而驰的，当然也是办不到的。军官理屈词穷，但还想辩解，说他是奉命行事。正在尴尬之际，瑞主县长突然进来打圆场，请陈丕显千万不要误会，并当面训斥那位“奉命行事”的军官。那军官只好悻悻地溜走了。

事情很明显，那位保安大队的军官是国民党瑞金当局放出的试探气球，

同“县大爷”一起唱双簧戏。这说明闽赣边游击队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斗争，将是艰巨复杂的。

第二天，陈丕显等随彭胜标一起由瑞金城抵达游击队驻地，会见了游击队领导人钟德胜、胡荣佳、刘国兴、张开荆等。老战友阔别重逢，百感交集，互诉衷情，同瞻前景。随后陈丕显向游击队指战员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陈毅同国民党江西当局谈判的情况，并将有关文件发给大家阅读。游击队员们庆幸几年苦斗，终于迎来了光明，欢呼雀跃。在庆贺之余，陈丕显和钟德胜等领导人教育指战员要保持冷静，不要忘乎所以，要随时准备应付复杂的政治斗争。

闽赣边游击队根据陈丕显与钟德胜等领导人商定的安排，派遣张开荆、彭胜标等人为代表，同国民党瑞金当局进行谈判。由于事先陈丕显同瑞金县长作过交涉，条件比较成熟，谈判进展比较顺利，很快就达成了初步协议：国民党方面停止“清剿”行动，释放瑞金关押的政治犯，解决游击队改编后的给养问题；游击队方面停止打土豪，集中改编为抗日武装，在瑞金城设立游击队办事处。至此，闽赣边国共合作局面宣告初步完成。

这时，胡荣佳也从龙岩返回闽赣边，带回中共闽粤赣省委对闽赣边游击区工作的意见。为了加强闽赣边人民抗日武装和群众工作的领导，闽赣边党组织根据中共闽粤赣省委的指示精神，于10月间成立了汀瑞中心县委，由张悌任书记，钟德胜任副书记，同时在瑞金城河背街设立抗日游击队办事处。

根据同瑞金当局达成的协议，闽赣边游击队于11月上旬，分别从上下温、冷背山、天门^峒等地，向瑞金武阳区的桃树排和安治（今泽覃）的兰田两地集中整编。

游击队下山集结后，瑞金县长代表国民党当局前来武阳游击队驻地，进行点验。当时游击队虽然只有百把人，但由于地方党组织事先做了动员工作，发动部队驻地农村数百名青壮年前来参加“点验”。军民站在一起，穿的都是便服，国民党县长根本闹不清哪些人是游击队，哪些人是老百姓，只好例行公事。他站在队伍前面宣布：“我们国共两党要团结合作抗战，本县长奉国民政府之命，前来点验”，接着抽了两个排的花名册，点了一遍，就算点验完毕。

点验后，游击队正式定番号为汀瑞边抗日游击支队，钟德胜任支队长，胡荣佳任党代表（政委），彭胜标任副支队长，周桂生任参谋长。支队下设3个大队：第1大队（原瑞金游击队）由杨洪才任大队长，温华桂任政委，驻兰田的石水湾；第2大队（原桃古游击队），林大福任大队长，黄存安任政委，驻兰田的桃治坑；第3大队（原武阳游击队）由刘国兴任大队长，张志辉任政委，驻武阳的桃树排。

部队整编完毕后，即大力开展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同时开展抗日宣传，发动群众参军参战。许多热血青年纷纷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入伍。汀瑞边抗日游击支队很快就发展到300多人。

在部队整编期间，中共汀瑞中心县委派彭胜标到大庾他江、张开荆到龙岩，分别向中央分局和闽粤赣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项英、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人，对闽赣边党和游击队在谈判改编和发展革命力量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并对闽赣边今后的工作作了具体的指示。这对闽赣边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起了保证作用。

（三）胜利中的曲折——“瑞金事件”

闽赣边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是闽赣边游击队顽强斗争的成果。然而前景尚不容乐观，国民党地方当局尤其是当地驻军独立第33旅旅长黄镇中，并没有捐弃前嫌，还在处心积虑地设法消灭红军游击队。他们借“抗日”之名，行反共反人民之实，或明或暗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黄镇中曾是红军的一名连级干部，后来叛变投敌。国民党占领中央苏区后，他带着保安团四处“清剿”红军游击队，疯狂迫害革命群众。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又到处收买民团，扩大实力，因此被国民党军事当局封为“独立第33旅旅长”。11月中旬，黄镇中指使其部属装扮成红军游击队，在抗日游击支队驻地一带，拦截商旅，抢劫财物，危害社会，然后嫁祸于红军游击队。企图以此破坏游击队声誉，进而借口消灭抗日游击支队。为了揭破黄镇中的阴谋，粉碎其企图，抗日游击支队派出侦察组，抓获了6名化装抢劫犯，其中为首者正是黄镇中的特务大队长。游击队把人赃一起押到瑞金城游街示众，给国民党反动的地方当局当头一棒。黄镇中阴谋败露，遭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谴责，因而对游击队更加怀恨在心，时刻伺机报复。

1938年1月11日，中共闽粤赣省委领导人谭震林及随员一行7人，从闽西前往赣南向中共东南分局汇报请示工作。途经瑞金时，谭震林在闽赣边抗日游击支队办事处召集汀瑞中心县委和游击支队负责人会议。游击支队除留下刘国兴、杨洪才等少数干部在驻地掌握部队外，张悌、钟德胜、胡荣佳、张开荆等多数干部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由中心县委和游击队负责人汇报游击队情况，研究部队整训、转移和党组织的恢复、发展等问题。在会议进行期间，黄镇中派出1个营的兵力，突然包围办事处，将谭震林和与会干部40余人全部扣押，并当场枪杀了肖忠全。

面对反动派的罪恶性挑衅，谭震林等沉着冷静，进行有利有节的斗争，义正词严地揭露黄镇中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向国民党士兵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国共两党不要打内战，要团结起来，共御外侮”等抗日救国道理。当时在场的游击队指战员对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十分气愤。当有的警卫战士欲举枪自卫还击时，钟德胜果断制止，说“我们不能开枪，不要中了坏人的奸计”。由于谭震林、钟德胜顾全大局，采取克制方针，避免了事态的扩大。

翌日，新四军第2支队秘书长温仰春带着在南昌新四军军部领取的电台、经费，同从延安派来的干部、机要员、报务员等20余人返闽西驻地，途经瑞金时，又被黄镇中部扣留。由于温仰春随身带着蒋介石委谭震林为新四军第2支队副司令员的委任状，瑞金国民党当局虽然还想耍赖作梗，但心里已发虚，不得不区别对待。几天后，设宴招待谭震林、温仰春等，表示歉意和欢送，同时归还电台、武器和款项。然而，仍借故扣押钟德胜、胡荣佳等10余名抗日游击支队干部。

黄镇中部在包围抗日游击支队办事处，扣留游击队干部的同时，还派兵奔袭兰田、武阳游击队驻地。由于地下党组织和交通员及时将瑞金事件消息

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黄道、方方、涂振农组成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

告知游击队，游击队事先作好了防范，将队伍撤离驻地，占据有利地形，严阵以待。黄镇中部见状不敢贸然进犯。后来游击队乘夜暗转移他处，避免了流血冲突。不几天，张开荆在请示谭震林同意后，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借答应同第 33 旅第 2 营营长“结拜兄弟”之机，与张悌一起赶回部队驻地，率领部队迅速脱离险境，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游击队的阴谋。

黄镇中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奔袭游击队阴谋失败后，将目标集中在被扣留的游击队干部身上。他软硬兼施，或封官许愿，以名利诱降；或百般虐待，以图逼迫就范。然而游击队干部们一身正气，既不为反动派的甜言蜜语所动心，更不为其势汹汹所吓倒。黄镇中瓦解和吞并游击支队的图谋，再成画饼。

黄镇中制造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瑞金事件后，恐遭国人唾骂，为掩人耳目，采取种种手段封锁消息，切断了瑞金通往各地的电话、电报，管制道路交通。同时造谣惑众，召开豪绅地主会议，组织所谓“协剿委员会”，扬言要以武力消灭红军游击队。然而逆历史潮流而动者，虽可得逞于一时，但最终总是要失败的。

闽赣边抗日游击支队和党组织迅速将“瑞金事件”报告上级组织。新四军大庾池江办事处和龙岩办事处，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这时，项英正在赣州，他得悉“瑞金事件”消息后，亲自向赣州专员马葆珩交涉，并给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出急电，抗议独立第 33 旅黄镇中部破坏合作协议的阴谋活动，要求他责令瑞金当局立即释放被扣人员。经过新四军抗议和再三交涉，加上社会各界舆论的谴责，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陆续释放被扣人员，全部归还被抢走的枪支和财物。反动派精心策划的这起破坏合作抗战、反共反人民的事件，终于宣告彻底破产。

（四）告别边区人民，北上抗日

“瑞金事件”平息后，项英在新四军池江办事处向闽赣边游击队派来汇报工作的彭胜标作了具体指示，要求汀瑞中心县委和游击队领导人保持清醒头脑和革命警惕，立即将游击队由瑞金向安远县移动，尔后开往大庾池江。国民党军独立第33旅黄镇中部得悉游击队将开往池江地区时，立即派兵加以阻拦。为避免正面冲突，闽赣边游击队经请示中共东南分局同意后，改向福建龙岩进发，去同新四军第2支队会合。

2月上旬，闽赣边游击队300多人，从瑞金地区出发，途经福建水口、新泉等地抵达龙岩的白上与张鼎丞部会合，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第3团第2营，杨洪才任营长，钟德胜任副营长（教导员）。另有一部分人如彭胜标等编入第4团第2营。

3月上旬，坚持闽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以新的面貌背负人民的希望与重托，与兄弟部队一起挥师北上，从闽西白土出发，徒步经长汀、古城、江西瑞金、雩都、赣州，然后乘船至樟树，改乘大车至玉山，尔后步行经浙江常山、开化、屯溪抵达皖南岩寺，加入华中抗日洪流。刘国兴等一批干部奉命留下，在瑞金、长汀两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第四章 闽西游击区

闽西游击区，又称闽西南游击区，位于福建省西南部。基本区域为龙岩、永定、上杭、连城、漳平、宁洋（今分属永安、连城、漳平、龙岩）、平和、南靖、长汀、清流、宁化、归化（今明溪）及广东省的大埔、饶平等县广大地区，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境内山峦起伏，林密壑深，极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

闽西游击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闽西就建立了中共地方组织——中共福建临时省委。1928年，在福建临时省委领导下，平和、龙岩、永定等县纷纷举行武装暴动，建立红军和革命政权。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进入闽西后，极大地推动了闽西的革命运动，并逐步创建了闽西苏区。1931年11月以后，闽西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留在闽西苏区的福建军区部队第19、第20团，在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和福建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的率领下，担负起抗击国民党军进攻、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的艰巨任务。在数十倍于己的优势敌人进攻之下，福建红军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告失败。1935年4月以后，在闽西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第8团（简称红8团）和第9团（简称红9团）以及各县地方武装，在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为首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依靠苏区的有利条件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以及运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抗战爆发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与国民党福建省地方当局进行了多次复杂的谈判斗争，终于达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闽西南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初改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开赴皖南前线抗日。

一、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的闽西形势

1934年10月上旬至中旬，驻守闽西境内的中央红军陆续转移，开始长征。数万国民党军涌入苏区，在龙岩、上杭、永定、长汀、宁化、清流、连城、宁洋、漳平、南靖、平和等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妄图将留在苏区的群众和红军游击队斩尽杀绝。

此时，留在苏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处于极端的困难之中。许多干部，尤其是一些主要领导干部，还没有从“左”倾冒险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根据中共中央保卫苏区的指示，等待主力回头的指示，指挥福建军区的两个独立团，连同机关及直属部队，约4000余人。红8、红9团则在敌后，被敌分割，无法联系。而面对的却是十倍于己的敌人。

（一）悲壮的抗争，血洒四都山

尽管闽西苏区形势严峻，万永诚和龙腾云仍以极大的热忱和忠诚，率福建军区所属各部，勇猛抗敌，保住了长汀县城直至10月底前，完成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的任务。随后，退出长汀，转移至长汀西南部的四都山区，凭险扼守。

1934年11月，国民党政府下令撤销“围剿”军各路总部，成立12个绥靖区。闽西地区为第10绥靖区（1935年2月改为第2绥靖区），以卫立煌、李默庵为正副司令官，指挥第3、第10、第36、第45、第52、第83师等部，向闽西苏区大举进攻。当月1日，第9师占领长汀。接着，第52师占领清流。30日，敌再占宁化。一个月中，闽西苏区大部失陷。

1935年1月始，敌第36师宋希濂部即依仗其优势兵力不断地对驻守四都山区的福建军区发动进攻。由于万永诚等受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头之方针和任务的制约，未能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及时作出正确的判断，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依然以大兵团作战的方式与敌在四都山区拼消耗，部队不断受到损失。2月，以项英为首的中共中央分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及时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决定将留守中央苏区的主要领导干部和部队分散活动。留守中央苏区的干部和部队于当月中下旬开始突围。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毛泽覃奉命率领一部分部队突围到达四都，与万永诚会合。此时，毛泽覃与时任福建军区后方留守处主任兼省苏维埃政府武装部长的罗化成向万永诚建议“放弃口都，将部队编成几个支队，四出袭击敌人，开展游击战争，领导中心退到闽粤赣边深山中去。”万永诚未能采纳，仍令福建军区部队在四都山区与强大敌人对抗，贻误了及时撤退、保存有生力量的有利时机。

敌第36师和闽赣两省保安团队兵分2路进攻四都，一边“搜剿”，一边筑碉，步步为营，逐步缩小包围圈。下旬，即将四都山区团团包围，并不时发起猛烈攻击。至3月中旬，福建军区所属部队已减至五六百人。万永诚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组成3支游击队突围，每队100多人。第1支队，支队长龙腾云；第2支队，支队长罗化成；第3支队，支队长毛泽覃。计划向永定突围，但未能成功。4月初，部队只剩下100余人，在长汀腊子口再次被敌包围。万永诚决定：由万永诚、龙腾云率一部向武平方向突围；毛泽覃率领一部向会昌方向突围；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必先率领一部向长汀濯田方向突围。万永诚嘱咐：突围出去的部队，不论条件多么困难，都要继续坚持斗争，等待主力回来。10日，万永诚、龙腾云率领五六十人突围到达武平、会昌边境之梅子坝山区，被敌第8师陶峙岳部一个团包围。部队浴血奋战，打退敌数次冲锋。11日，终因弹尽粮绝而不支，身患重病的万永诚与龙腾云及大部指战员，壮烈牺牲。吴必先所率部队突围至长汀濯田，稍事休整后，向江西会昌转移。途中，于长汀县鸡冠峰被敌第36师包围，全部损失。吴必先被俘，同年8月在江西九江英勇就义。毛泽覃率领的部分红军游击队突围至瑞金县黄麟口红林山区，由于叛徒出卖，被敌第24师一个团包围。26日，毛泽覃在突围战斗中牺牲。至此，福建省委、省苏维埃和军区机关部队4000余人，除百余人幸免于难外，大部牺牲。四都大地洒满革命烈士的鲜血。

（二）战斗在敌后的红 8 团和红 9 团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福建军区直属部队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烽火继续在燃烧。闽西地区还有两支生力军，那就是战斗在敌后的红 8 团和红 9 团。

红 8 团和铁鸡岭、山后村战斗还在中央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时，中革军委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根据日益严重的军事形势，决定派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优秀干部，带领精干的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中央红军作战。根据这一决定，福建军区所属地方部队的两个独立团奉命于 1934 年春开赴敌后，执行远殖游击作战的艰巨任务。其中，福建军区所属地方部队独立 8 团于 1934 年 4 月正式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 8 团。团长邱金声，政委邱织云，政治部主任魏金水，参谋长王胜。全团 400 余人。团内设立了军政委员会，主席邱织云，副主席邱金声、魏金水，负责所在地区的党政军全面工作。

根据中革军委的要求，红 8 团须在 5 月 15 日以前开抵漳州至龙岩公路（漳龙公路）沿线，破坏国民党东路军的后方交通运输，箝制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建立游击根据地。4 月，红 8 团从上杭泰拔出发，经永定金沙乡古木村，于 5 月 4 日越过敌控制的封锁线——永定到湖雷的公路，向金丰大山进发。在金丰地区活动月余，积极打击地主武装，为建立以金丰大山为中心的永东根据地打下基础。6 月 15 日，夜袭龙岩白土，全歼该镇反动民团。并袭击敌第 30 师营部，使坐镇龙岩的驻闽绥靖主任蒋鼎文十分震惊，立即调第 80 师 2 个团前来增援。而红 8 团早已撤出战斗，按预定计划进至漳龙公路沿线。随后，运用避强袭弱、声东击西等游击战术，在永定、龙岩、漳平、南靖、平和等县，神出鬼没地开展游击战争。仅短短的 8 个月，进行大小战斗上百次，毙伤俘敌 2000 余人，缴枪 1000 多支。与此同时，红 8 团发展至 600 多人。红 8 团还在所到之处，大造声势，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恢复和建立地方党组织，建立公开或秘密的革命群众组织和游击小组。至 1934 年底，初步建立了以永定县金丰大山为中心的永东（永定县东部）游击根据地；以南靖县科岭为中心的（龙）岩永（定）（南）靖游击根据地和以漳平县朗车为中心的（龙）岩南（靖）漳（平）游击根据地。牵制了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出色地完成了中革军委交予的任务。

1935 年 1 月，红 8 团为总结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集中在漳平县永福附近的朗车整训。2 月初，敌第 10 师获悉后，即以 2 个团的优势兵力从龙岩出发，分 3 路向红 8 团进攻。时红 8 团连同龙岩游击大队、岩南漳游击队共有近千入，决心选择永福附近的铁鸡岭之有利地形，进行伏击，择其一路歼灭之。红 8 团领导将游击队埋伏在山顶，打敌先头部队；以红 8 团 4 个连隐蔽在铁鸡岭半山腰待机出击。各部于翌日拂晓进入伏击阵地。9 时许，敌第 10 师之一路沿大道开来，当其尖兵连接近山顶时，游击队突然开火，尖兵连仓皇撤退。红 8 团 4 个连乘机发起冲锋，拦腰将第 10 师师部打散。该师部迅速指挥队伍，在飞机配合下，以优势兵力不断发起进攻，双方激战 2 小时。在敌强我弱形势下，红 8 团为保存有生力量，主动撤出战斗，转移至龙岩西北地区的铜钵隐蔽休整。此战，红 8 团歼第 10 师 200 余人。

铁鸡岭战斗后，红 8 团转移至龙岩铜钵镇的山后村进行休整。20 日，敌第 80 师陈明仁部 2 个团、驻小他的 1 个营和龙岩保安队 1000 余人，乘红 8

团立足未稳，由两架飞机助战，向红 8 团发动进攻。红 8 团 600 余人，在团长邱金声、政委邱织云率领下，利用山后村的大片山林作掩护，采用“麻雀战术”，四处打击敌人。激战至黄昏，歼敌 100 余人。随后撤出战斗，向上杭古田转移。

红 9 团和与朱森的斗争原属福建军区的地方部队独立第 9 团根据中革军委命令，于 1934 年 4 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 9 团。团长吴胜，政委方方。全团 1200 余人。团内设立了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方，负责所在地区的党政军全面工作。中革军委赋予红 9 团的任务是：在永安和红 7 军团换防，然后开赴永安、连城、宁洋一带进行游击战争，破坏敌漳（平）宁（洋）筑路计划，再向泉州推进，并与右侧翼、活动在漳龙公路两侧的红 8 团相呼应。方方接受这一任务后，从瑞金出发，到达永安后，与已接替红 7 军团防务的红 9 团会合，传达了中革军委的指示，然后率部队开赴至永安、连城、宁洋 3 县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首先袭击了连城姑田的华仰桥民团，随即又扫荡了连城的赖源，宁洋的大吴地，永安的西洋、林日、苦竹、大陶、小陶等地反动武装，并在活动区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11 月 7 日，在宁洋县沙田建立了以方方为主席的岩连宁边区革命委员会，创建了以宁洋成达社、陈东坑、凤林为中心的纵横 300 余里、人口约 5 万的游击根据地，为闽西后来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10 月中旬，福建军区第 3 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朱森、政治部主任赖荣传、参谋长罗忠毅率第 3 军分区余部和明光独立营（营长贺万德）从连城县南部到达岩连宁边区，与红 9 团会合。

朱森原系国民党军的中级军官，被俘后加入红军，担任过红 24 师参谋长。由于朱森受旧军队影响颇深，热衷于打正规战。他以坚持“保卫苏区寸土”是中央的决定为由，反对开展游击战争。并旧习不改，不断挑拨和制造红 9 团领导干部内部的矛盾，给红 9 团执行中革军委命令带来不少困难。为此，方方率红 9 团领导干部与朱森的错误作了艰苦的斗争。方方指出：“不让敌人侵略苏区寸土，是一句动员群众起来自卫作战的政治口号，军事上如果采用平均主义的分兵把口，一定要吃亏。”要求红 9 团领导干部在意见有分歧的情况下，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提出部队向南发展，与红 8 团取得联系，然后转到闽粤赣边开展游击战争。这一行动计划在红 9 团领导干部中一致通过。方方遂留下刘汉率领第 2 营和地方游击队在岩连宁地区吸引敌人，亲率红 9 团主力向上杭、永定方向转移。1935 年 2 月，红 9 团和第 3 军分区机关、明光独立营突破敌碉堡封锁线，穿越龙岩至新泉公路，进入龙门对面的茫荡洋山区。

二、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实行战略转变

（一）张鼎丞奉命返回闽西

原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于1934年2月调临时中央任苏维埃政府粮食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前夕，张鼎丞遵照毛泽东的“你还是回到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的建议，于1934年12月奉命由江西返回福建。

张鼎丞在长汀四都找到中共福建省委，经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同意，以中共福建省委代表的资格，联系了原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范乐春、福建军区原泰拔独立团团团长刘永生、福建军区独立第17营政委陈茂辉等干部，在永定留汀难民中挑选了10余人，组成了一支短小精干的武装小分队，携带8支步枪和几十颗手榴弹，向岩永杭进发，沿途克服了重重困难，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于1935年2月抵达永定。

（二）永定会师

张鼎丞回闽西领导游击战争的消息，象春风一样不胫而走，温暖了闽西人民群众的心。岩永杭地区的赤色武装和群众，奔走相告，敲锣打鼓地迎接张鼎丞的到来。

张鼎丞不负众望，立即着手组织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他首先了解到在漳龙公路两侧活动的红 8 团是一支英勇善战、且开辟了几块游击根据地的队伍，决定以红 8 团为骨干，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于是派中共永定县委书记郭义为前去联系。郭义为在龙岩白土找到红 8 团，传达了张鼎丞回到永定和红军主力转移的情况。根据张鼎丞的指示，红 8 团于 2 月中下旬到达永定，与张鼎丞部会

合。

此时，从岩连宁边区南下、到达茫荡洋山区的红 9 团政委方方从前来联系的郭义为那里得知张鼎丞回到闽西的消息，异常兴奋，立即率队向永定靠拢。3 月间，与张鼎丞及红 8 团在永定下洋月流胜利会师。

此外，在上杭旧县岩下山活动的钟辉元、涂坤荣领导的上杭游击大队；在双髻山活动的廖海涛领导的代英游击大队；在永定溪南活动的由范钦洪领导的永定游击大队等，得知张鼎丞回到永定，纷纷与张鼎丞取得联系，归属张鼎丞领导。

（三）闽西军政委员会成立

为解决红军主力长征后，形势骤变的情况下，如何坚持斗争的大问题，张鼎丞于1935年3月中旬，以福建省委代表的名义，主持召开了红8、9团领导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方方、邱金声、邱织云、吴胜、谢育才、朱森、罗忠毅、赖荣传、魏金水、廖海涛等人。会上，张鼎丞分析了红军主力长征后闽西苏区的形势，指出革命正处于低潮，今后的斗争环境会更残酷。同时指出有利条件还是有的，闽西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只要能紧密的依靠群众，斗争是可以坚持的。关键是要转变战略思想，将过去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指导思想和任务转变为注意保存红军有生力量，树立坚持长期的、艰苦的游击战争的思想。从而统一了红8、9团全体指战员的思想，坚定了全体指战员坚持斗争的信念。

在与中共中央及福建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会议决定成立闽西军政委员会。会议选举张鼎丞、方方、范乐春、谢育才、吴胜、邱金声、邱织云、郭义为、罗忠毅、赖荣传、魏金水、朱森、廖海涛和部分地方党组织的代表为委员。张鼎丞任主席，统一领导闽西地区的党政军工作。

红8团和红9团在永定刚一会合，国民党军即调第3师和第10师从东、北两面进行包抄，企图消灭红8、9团。刚刚成立的闽西军政委员会立即决定：以红9团东出永定，相机向南靖、平和发展；以红8团北上龙岩，扰乱第10师南进计划，配合红9团行动。红9团第1、3营和明光独立营在张鼎丞、方方率领下，进入永定歧岭，决定消灭陈东坑反动民团。陈东坑位于永定县东、金丰大山山麓南侧。镇内有几座大土楼，驻有卢坤喜民团（陈东坑乡常备队第4中队）50余人。卢坤喜民团被敌人誉为“最勇敢的民团”。因此，陈东坑成为国民党在金丰地区的重要反动据点。红9团第1、3营和明光独立营共有1100余人，首先占领陈东坑四周有利地形。团长吴胜将部队分为两部。红9团第1、3营担任主攻，在火力掩护下，将主楼及附近一土楼炸开，从民房、巷道间打开一条通路，突击队随后冲进。经30分钟战斗，攻克2座土楼，其余土楼守军被迫缴械。此战，红军共歼卢坤喜民团50余人，缴机枪1挺，长短枪数十支，子弹数万发。团总卢坤喜和联保主任卢宪文当场被击毙。与此同时，红8团北上龙岩后，不断袭扰敌人。敌第10师见红8团已北上龙岩，遂停止南进永定。闽西军政委员会扫除了永定东部的反动据点，巩固了永定游击根据地。

（四）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

1935年2月11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农检查部部长何叔衡、中共中央分局委员霍秋白以及中央政府财政部副部长邓子恢，根据中共中央分局的部署，从江西南部向闽西转移。不久，到达长汀四都，与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建军区会合。24日，福建军区派部分武装护送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前往永定张鼎丞处，途中不幸在长汀水口遭国民党军福建保安14团的袭击，何叔衡及护送人员大部英勇牺牲，瞿秋白被俘（6月18日在长汀罗汉岭就义），邓子恢脱险，返回四都省委驻地。

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分局的决定，中共中央分局委员陈潭秋、原福建军区政委谭震林率领红24师71团4个连由赣南向闽西突围。月底，到达长汀四都，与福建省委、福建军区会合。随后，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率红24师71团4个连从四都出发，东渡汀江，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于4月上旬到达永定大阜，与张鼎丞会

次日拂晓，驻永定峰市国民党军第10师1个连和峰市民团、溪南民团共380余人，兵分3路偷袭大阜村。刚刚到达大阜的红军战士过度疲劳，仓促应战。陈潭秋、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处境危险。在这紧急关头，刘永生率永东游击队赶到，一边组织反击，一边掩护陈潭秋、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撤退。文顺游击队40余人此时也赶来参战。经过3小时激战，将敌赶出大阜。张、邓、谭安全撤出。陈潭秋率领警卫班撤至山顶，再次被敌包围，警卫班战士全部牺牲。陈潭秋急中生智，冒充炊事员将所带活动经费撒在冲上来的敌军面前，乘敌军抢钱之机脱险。大阜战斗，红军游击队击毙敌军50余人。红军游击队牺牲30余人，伤70余人，失散100余人。剩余100余人，在刘永生率领的永东游击队掩护下，撤往永定赤寨。

1935年4月10日，为了研究闽西南地区的形势和今后斗争的方针、任务，在中央代表陈潭秋主持下，闽西南地区党和军队领导干部在永定溪南赤寨村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潭秋、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郭义为、朱森、范乐春、简载文、魏金水、邱金声、邱织云、罗忠毅、谢育才、刘永生、廖海涛、伍洪祥、温仰春等。

陈潭秋以中共中央分局代表的名义主持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中央军委的关于留在苏区的红军游击队，不宜再集中兵力打正规战，应当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就地分散坚持游击战争的电报指示。随后，会议就形势、斗争任务和策略问题展开了讨论。部分干部谈到了“保卫苏区”的口号和“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任务，是中央下达的，不能放弃，也不敢放弃”的思想。张鼎丞根据中央的指示和闽西南地区当前的形势，作了重要讲话。他明腑指出：“当前的形势是，中央苏区已经失守，主力红军已去贵州、云南。因此，现在还提牵制敌人，不仅没有实际意义，而且也不可能。况且，项英、陈毅的情况不明，万永诚的情况也不明，苏区已被敌人占领，还提什么保卫苏区？我们要面对现实。当前红军游击队的主要任务不是牵制敌人，而是摆脱敌人的跟踪追击，保存有生力量，坚持游击战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恢复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

张鼎丞的讲话得到了与会人员的拥护。一致认为：闽西的党和红军游击队必须转变思想，由苏区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组织方式和

斗争方式。为此，会议确定了“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在军事上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存有生力量锻炼现有部队；在政治上保持党的旗帜，保持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在组织上保持党的纯洁性、战斗性。”的基本方针和任务。

为了更好地实施对闽西南地区的统一领导，会议将闽西军政委员会改称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邓子恢，军事部长谭震林，党务部长郭义为，参谋长朱森，政治部主任方方。在闽西设立了中共永定县委，书记范钦洪；中共永东（永定东部）县委，书记马发贤；中共（上）杭代（英）县委，书记廖海涛；中共龙岩县委，书记魏金水；中共新（泉）长（汀）（上）杭县委，书记钟辉元。并成立了闽西南交通站，站长雷德兴，负责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和各县委、便衣武装等之间的交通联络。

为了执行新的战略方针，有效地开展游击战争，会议还决定把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属之红军游击队划分为四个作战分区：第1作战分区由红9团第2营和明光独立营组成，司令员罗忠毅，政委方方，活动范围是龙岩、连城、宁洋3县地区；第2作战分区由红9团第1、第3营和永东游击队组成，司令员吴胜，政委谢育才，活动范围是永定、平和以及广东大埔、饶平各县边区，并负责打通与闽粤边游击区红3团的联系；第3作战分区，由红8团和龙岩游击队组成，司令员邱金声，政委邱织云，活动范围在龙岩、南靖、漳平3县边境地区。第4作战分区，由红24师100余人、卓林大队以及永定、杭代、新汀杭等县独立营组成，在永定、上杭地区活动，由张鼎丞、谭震林直接指挥。

会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获悉福建军区全军覆没的消息，立即总结经验教训，决定领导干部分开活动，到各个游击据点领导斗争。邓子恢到永定东部金丰大山，谭震林到上杭，张鼎丞留永定，坚持斗争。陈潭秋则化装成华侨，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人护送去汕头医伤（陈后经上海赴苏联）。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属各作战分区也按照会议部署开始行动，分赴指定的军事活动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与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方针的确立，对闽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直至取得最后胜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全面展开游击战争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率领闽西游击区军民投入了艰苦的反“清剿”斗争。

（一）反第一期“清剿”（1935年1月~1935年7月）

1935年1月，国民党驻闽绥靖主任蒋鼎文集中第3、第10、第36、第45、第52、第83师等部及闽赣边各县民团、地主武装10余万人的兵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分进合击”战术，“追剿”、“驻剿”、“堵剿”、“搜剿”并用，向闽西红军游击队发动第一期“清剿”。“清剿”初期，敌进攻的重点是福建军区及其所属部队，意在消灭闽西红军游击队的指挥中枢。福建军区失败以后，敌立即转向永定，以张鼎丞为首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为目标，集中兵力发动进攻。面对敌人的大举进攻，新成立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采取避敌锋芒，分散作战的方法，令第1作战分区部队到龙岩、连城、宁洋边界，第2作战分区部队南下闽粤边，第3作战分区部队赴漳（平）龙（岩）公路两侧，第4作战分区部队留永定，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打破敌人的“清剿”。

初溪战斗，第1作战分区开赴岩连宁 1935年5月，第1作战分区在司令员罗忠毅、政委方方率领下，根据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准备开赴岩连宁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此时，敌第3师李玉堂部3个团从龙岩和南靖边界向永定东部开来，切断了第1作战分区开赴岩连宁的道路。为策应第1作战分区的行动，将敌南引，第2作战分区司令员吴胜、政委谢育才率部进驻永定初溪，占领前山高地，决定利用有利地形，袭击该敌。次日上午8时，敌第3师数百人从新楼方向沿山腰向初溪开进。当相距七八十米时，敌第3师发现有红军游击队埋伏，其先头连企图抢占前山高地，待其冲进，第2作战分区部队突然开火，将敌先头部队打退。敌第3师主力随后猛扑过来，被第2作战分区一线部队顶住。第3师后续部队跑步增援，又被第2作战分区部队用重机枪压住，无法运动。10时左右，第3师集中5挺重机枪和5个连的兵力，在500米宽的正面展开，企图以优势兵力夺取前山高地。但因受地形限制，无法组织集团冲击，而第2作战分区部队则利用有利地形，组织特等射手，捕捉运动目标，进行冷枪射击，消耗敌有生力量。战斗僵持到黄昏，第3师不再恋战，退回芦溪。此战，第2作战分区歼第3师200余人。初溪战斗，迫使第3师向南，寻找第2分区作战，让开了通往岩连宁的道路。罗忠毅和方方则在第2作战分区密切配合下，迅速率领所部离开永定金丰大山，于6月间进入岩连宁地区。与原留在岩连宁地区的红9团第2营相会合。不久，闽赣军区宁化分区司令员邱尚聪、政委温含珍率领的独立第17、第18团从建（宁）泰（宁）黎（川）地区突围出来的100余人到达岩连宁地区，与第1作战分区部队会合。随后，第1作战分区司令部在龙岩溪口召开会议，决定该100余人划归第1作战分区指挥。增补温含珍为第1作战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增补邱尚聪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会议还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将所属部队分散活动：红9团2营向永安、清流交界地区游击；明光独立营向连城、宁洋方向出击；司令部在龙岩一带建立新据点。7月，第1作战分区侦察班在龙岩雁石至白沙公路上伏击敌第10师一个通讯班，缴步枪8支，军用品若干，绝密文件1份。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第1作战分区还根据当地土匪出没无常、给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带来困难的实际情况，积极作争取和改造土匪的工作。方方提出：在上匪不受国民党收编、不抽收据点内群众保护费及不强奸妇女的原则下，可以与土匪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第1作战分区因而在改造和争取土匪工作中取得明显效果，粉碎了国民党军“以

毒攻毒”的政策，为第1作战分区扎根于岩连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2作战分区深入闽粤边根据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决定。第2作战分区的任务，是开辟永定、平和以及广东大埔、饶平等县边区，打通与闽粤边游击区红3团的联系。为解决执行这一任务部队所需的给养问题，司令员吴胜、政委谢育才决定巧袭南靖县书洋镇。5月下旬，第2作战分区侦察排约40人组成突击队，化装成挑柴、卖菜、经商的百姓，于上午10时左右，跟着赶圩的群众进入书洋镇。在接近土楼约10米处，战斗开始。镇内反动民团发现红军游击队，边开枪边躲进镇内土楼顽抗。突击队乘势拥进街道，倚墙向土楼射击。半小时后，第2作战分区主力赶到，全歼书洋镇民团数十人，筹得了相当可观的粮款，并将部分粮款分给了群众。

书洋镇战斗后，第2作战分区从永定南下，翻越永定、平和交界之象湖山，进入闽南平和县境。之后，夜行晓宿，忽东忽西，终于甩掉追敌。6月底，部队到达平和县三坪，与中共闽粤边特委和红3团会师。吴胜、谢育才向闽粤边特委和红3团传达了中共中央分局指示精神。双方对今后协同开展斗争问题达成了共识。第2作战分区部队胜利地完成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交与的“与闽南红3团打通联系”的任务后，遂与红3团分开行动，转战在水定、平和、南靖、大埔、饶平等县，开辟游击区。7月，部队到达饶平与大埔之间的下善一带。

当第2作战分区部队到达下善后，发现国民党粤军第155师李汉魂部1个加强营连同地方乡团600余人从饶平出动，向下善方向疾进。避开已来不及，吴胜、谢育才决定，立即抢占有利地形迎战。令红9团1营1连占据下善东北部的石马坑，1营主力占领616高地和茅铁里北高地，担任抗击敌军的主要任务。红9团3营1个连占领岩下、黄坡料高地，3营主力扼守坑子里两侧。红9团团部设在608高地。8时许，1营1连警戒部队在石马坑高地与敌155师先头部队接触，连续打退其两次进攻。敌在重机枪掩护下，抢占了石马坑高地，并向红9团团部所在地进攻。此时隐蔽待命的1营2连突然跃起，并与退出石马坑阵地的1连会合，杀进敌阵，迫敌退至石马坑北侧高地。3营方向也连续打退敌组织的4次冲锋。双方反复争夺坑子里阵地。后敌155师集中300余人发起冲击。在危急关头，1营2、3连赶到，协同3营夺回坑子里阵地，并实施反冲击，将敌击溃，残敌退回饶平。至此，第2作战分区部队毙伤敌200余人，俘15人，缴步枪27支，子弹6000发，手榴弹数百枚。

第3作战分区战斗在岩南漳 按照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部署，第3作战分区开赴漳龙公路两侧和岩南漳地区活动。由于敌“追剿”部队迫近。第3作战分区决定兵分2路行动。由政委邱织云、参谋长王胜率领（司令员邱金声因病暂离队休养）第3作战分区之红8团团部和第1、3、5连向漳龙公路两侧运动，以政治部主任伍洪祥率领第2、第4连掩护团部行动，向罗桥、陈坑方向运动吸引“追剿”上来的敌军，并边打边撤。伍洪祥率部在龙岩铜钵山的后村与龙岩游击大队会合后，继而南下，穿越（长）汀龙（岩）公路。此时，在多处被敌包围封锁的情况下，伍洪祥率部采取“分段猛冲”战术，沿公路打敌措手不及，终于冲破敌人的布防，到达紫金山。这时，敌又调集几个团的兵力，分数路向紫金山进攻。伍洪祥急中生智，留下一支小分队在山头与敌军纠缠，牵制敌人，转移目标。自己率部选择龙岩龙门与赤水之间一段为突破口，乘着夜暗，突破重围，摆脱尾追之敌，终于与团部会

师。留在山上的小分队，运用“麻雀战”等游击战术，与敌周旋，坚持了两天两夜。随后，于桃坑方向突围，与红8团主力会合。在这期间，红8团团部和第1、3、5连在漳龙公路两侧和岩南漳地区以“声东击西”等战术，不断打击敌人。6月，第3作战分区侦察班同龙岩游击队共40余人，在龙岩马山，以伏击战术，歼国民党军1个排，并活捉叛徒陈金财，为闽西红军游击队和游击区群众除一大害。

指挥中枢与第4作战分区 由张鼎丞、谭震林直接指挥的第4作战分区，以永定、上杭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在反“清剿”斗争开始时，发生了朱森叛变事件。5月17日，担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参谋长要职的朱森，以到龙岩巡视工作为名，向国民党第2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投降自首。随后，朱森被委任为第52师参谋长，指挥1个团的兵力，专事破坏岩永边、（龙）岩宁（化）沿线游击队的交通站和接头处。朱森一方面将红军游击队的活动情报出卖给敌人，作为投敌的本钱，一方面丧心病狂地对曾经接待过他的革命群众进行屠杀，摧残革命基点村。还写信给方方、罗忠毅等领导人进行策反未得逞。朱森的叛变，给红军游击队的反“清剿”斗争带来极大困难。因此，以张鼎丞为首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坚决采取“肃叛”措施，在揭穿叛徒丑恶嘴脸的同时，针锋相对，组织“狙击队”、“打狗队”严惩叛徒。叛徒陈金才被正法后，朱森叛变之初坐轿、骑马指挥“搜剿”的狂态有所收敛。与此同时，红军游击队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下，加紧游击活动，夜间贴标语，打击反动分子。并寻机袭敌，将敌搞得日夜不安。5月27日，第4作战分区所属之永定县独立营和卓林大队在上杭凉伞嶺与驻永定大阜的国民党军黄启三部1个连及民团300余人遭遇。红军游击队迅速抢占山头，猛打猛冲，歼敌130余人，缴枪100余支。随后，又在丰稔至汤湖的必经之路歧坑设伏，歼民团数十名。

在以张鼎丞为首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下，第4作战分区依靠人民群众，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相互策应，挫败了敌人，保存发展了自己。敌以军事为主的第1期“清剿”延至7月，以失败而告终。

（二）反第二期“清剿”（1935年8月~1935年12月）

1935年8月，蒋鼎文调集第3、第10、第52、第80、第83师及广东军一部，以龙岩、永定、上杭为重点，采取“驻剿”、“搜剿”、“堵剿”相结合，以“驻剿”为主的战术，向闽西红军游击队发动第2期“清剿”。在这次“清剿”中，敌人总结了第一次“清剿”失败的教训，改军事进攻为主力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的策略，重提“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所谓“七分政治”，归纳起来：一是“移民并村”，将百姓移驻有驻兵、有碉堡、有反动武装包围的乡村，村内，以兵驻守村口，切断群众与红军的联系；二是“连坐法”，即一户违反当局禁令，10户以至整个村庄的人均被残杀；三是利用叛徒瓦解革命；四是实行“计口售粮”、“计口售盐”等反动措施，以切断红军的粮食来源，等。在国民党军残酷的“清剿”政策下，红军游击队的活动极为困难：碉堡、炮楼林立，百姓被迫移民，断绝了红军游击队的粮食及一切接济。南瓜、野生菜成为唯一的食品。白天烧火不能冒烟，晚上烧火不能露光，走路不能留下痕迹，咳嗽不能发出声响，等等。红军游击队经常被敌跟踪，或被敌围困，长达十天半月，饥寒交迫。游击区群众受到极大限制，稍有不慎，即被以“通匪”、“济匪”论处。据不完全统计，从1935年8月至12月短短几个月中，龙岩、永定、上杭3县游击区，就有510多个村庄被迫移民，8000多座房屋被烧毁，1万余无辜群众被害，4000多名干部牺牲。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闽西红军游击队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与敌针锋相对，采取相应斗争策略，全面投入反“清剿”斗争。

第1作战分区分散应敌“以静对动”度难关第二期“清剿”一开始，国民党军第10师3个团即从龙岩白沙、雁石、溪口分3路进攻活动在岩连宁地区的第1作战分区部队，围追堵截，步步进逼。第1作战分区司令员罗忠毅、政委方方分析：敌军出动，后方必然空虚。遂率领第1作战分区部队，利用敌平均使用兵力、盲目行动之弱点，以少数兵力牵制敌人，主力大胆转入敌军背后，时而集中兵力佯攻白沙，进而以一部兵力袭扰雁石。并在漳平、安溪、龙岩等地散发传单，声称要“攻打龙岩”。进山“清剿”的第10师不到10天，发现红军游击队动向，急忙掉头集合全力对第1作战分区反复“清剿”。此时，第1作战分区缺乏思想准备和必要的措施，反“清剿”斗争遭受挫折。9月上旬，敌第10师在龙岩万安梅子坪将第1作战分区包围。第1作战分区部队虽英勇作战，但部队损失严重。

明光独立营营长贺万德也在突围中牺牲。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第1作战分区部队与敌周旋2个月。后第1作战分区吸取教训，“化整为零”，离开“清剿区”。方方、罗忠毅将部队分为4股，分别到溪

口、白沙、雁石一带游击，转入隐蔽活动，分散打击敌人。这一“以静对动”的方针，使敌人的“清剿”如同大海捞针。第1作战分区最终保存了有生力量，度过了难关。

第2作战分区闽南受挫，三菜洲战斗扭转局面活动在闽粤边境的第2作战分区部队，由于在第一期反“清剿”末期的下善战斗、刺牛岗和大小芦溪等战斗，给国民党正规军和民团以有力打击而引起敌人的震动。9月，敌第10师和粤军第155师、第157师等部8个团的兵力向广东饶平、大埔和福建平和边境之第2作战分

区的红9团发动围攻。红9团未来得及休整和采取迅速隐蔽、减少大部队行动目标的正确方针，即撤出千和，向永定东部游击区转移。由于集中行动，目标暴露，9月下旬部队行至永定湖雷的水竹里、载洋寨一带时，遭跟踪之敌第10师包围，部队被冲散。红9团政治部主任赖荣传在作战中牺牲。部队根据事先的安排在预定地点集中后，为保存有生力量，决定以深山密林作掩护，分散突围，到金丰大山集中。11月上旬，第2作战分区司令员兼红9团团团长吴胜率部在永定湖雷小坪水一带，遇叛徒朱森带领的第10师第83师各一部的包围，部队再度受挫，吴胜受重伤被俘（1936年1月被杀害于龙岩）。突围至金丰大山的部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由红9团干部、党员骨干带领，组成特务大队，大队长赵群，政委张清辉。特务大队准备重返永和靖游击区开展斗争。部队途经平和官山，遇敌第80师1个团从大小芦溪方向的跟踪包围。特务大队以一个班占据有利地形进行掩护，主力从敌之包围的薄弱点老吴子坳突围成功。部队到达永定，决定巧袭永定、平和、大埔3县交界的三菜洲。1936年4月，特务大队侦察班15人化装成挑柴、卖菜、货郎担和一对小两口回娘家的队伍，乘圩日从西南方向进入三菜洲。接近炮楼时，3个徒手的国民党军刁难“新娘”，“新郎”故意大喊大吵，将炮楼内的联防士兵引出围观。侦察班立即抽枪开火，打掉哨兵，冲进炮楼。敌联防局长赖光辉带领20多名士兵逃出炮楼，抢占炮楼背后山地顽抗。此时，特务大队主力赶到，击毙敌联防局长赖光辉，歼联防局反动武装70余人，缴长短枪50余支，子弹5000余发。此战，极大地鼓舞了困难中的红军游击队指战员，从而扭转了第2作战分区的被动局面。第3作战分区巧妙袭敌，创造“散兵群”战术敌第二期“清剿”开始时，第3作战分区的红8团正集中在永福的朗车进行短期整训，总结第一期反“清剿”斗争的经验教训。红8团认识到：红军游击队面临的将是国民党军更加残酷的“清剿”。因此，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采取以分散为主的方针。部队决定以连排为单位，开展更加灵活的游击战争。同时又决定，在分散之前，部队先向漳平、华安边境开进，深入敌区作短期行动，扩大政治影响，解决部队给养。未料此时敌新的“清剿”部署已展开，敌第10师1个旅向朗车进攻，华安方向增加了不少敌军。红8团行至漳平边境的梅营村，遇华安自卫队800余人的阻击。第3作战分区司令员兼红8团团团长邱金声率1个连猛打猛冲，将敌冲垮。14时，留在梅营的红8团部队遭第10师第56团的背后袭击，红8团与敌激战，分区政委兼红8团政委邱织云不幸牺牲。当晚，邱金声和接替政委职务的伍洪祥率部向永福方向转移。在距永福约3.5公里处的后孟村，红8团再次与“追剿”之敌遭遇。邱金声率领团部侦察排、重机枪连拚力抢占该地有利地形，打退敌1个营的进攻，掩护全团突出重围。并边战边退，摆脱敌人追击。随后，部队按照朗车整训的决定，将全团5个连分散在岩南漳边区、岩永靖边区、漳龙公路两侧和永定东部的广大地区，积极开展反“清剿”斗争。并以机枪连为主，组成由团长邱金声直接指挥的基干连，作为机动和突击连队。由于分散活动的正确方针，第3作战分区一反被动，取得一连串的胜利：

9月上旬，正当敌第2绥靖区副司令、第10师师长李默庵大肆宣传红军已被“剿灭”，并准备在龙岩召开“剿匪”祝捷大会时，红8团决定夜袭龙岩国民党陆军第13医院。红8团以1个连分成几个战斗小组，分别在莲花山下、南门桥头、东门外监视敌军动向，邱金声亲率1个短枪队30余人，化装成国民党军，以神秘迅速的动作，直奔医院。巧妙叫开大门，冲进院内，击

毙该院院长，俘虏敌军伤病员 100 余人，缴获大量药品。对敌军伤病员，教育后全部释放。离开时，邱金声用医院办公室的电话警告李默庵小心点，不要吹牛。待李默庵派援兵赶到，红 8 团早已不知去向。此次夜袭，不但在军事上给敌以打击，戳穿敌人的谎言。因龙岩是国民党军“清剿”指挥部所在地，因而政治影响也很大。

10 月 15 日夜，红 8 团一部和（龙）岩西北游击队采取“里应外合”战术，以打进龙岩湖邦考塘村驻军陈江栋民团的人作内应，利用其值岗之机，掩护红 8 团突击队架长梯越窗夺取考塘村协鸿楼，一举袭击成功。全歼陈江栋民团，击毙 6 人，俘虏数十人，缴枪 18 支，子弹千余发。

红 8 团在分散活动时，侦察发现敌第 10 师第 57 团第 3 营主力因“清剿”闽西红军游击队，大部分布防在漳（平）龙（岩）公路沿线上，在龙岩崎獭村仅驻有该营营部和留下的 1 个排兵力防守。红 8 团决定乘虚袭击崎獭。11 月下旬，红 8 团 2 个排，在龙岩山马村游击队配合下，夜袭崎獭，全歼 3 营营部及 1 个排。敌正、副营长当场被击毙。

在敌强我弱的艰苦战争环境中，红 8 团积累丰富的作战经验，在实践中创造了以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散兵群”战术。这种战术，通常是以 3 至 5 个有射击技能的、地形熟悉的、灵活机动的、与当地群众有密切关系的、政治坚定的优秀战士担任，组成战斗小组。其任务是分散袭击敌人，迷惑牵制敌人，疲惫消耗敌人，并通过散发传单，张贴宣传标语，宣传红军政治主张，瓦解动摇敌军，达到逐步消灭敌人的目的。如红 8 团分散活动在岩永靖地区的 3 连，以 17 名战士分成 4 个战斗小组，隐蔽埋伏在敌必经之路上，四面放枪，用 200 发子弹，击溃敌人 1 个团，毙伤敌 20 余人。“散兵群”战术，得到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肯定和赞扬。后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对“散兵群”战术加以分析、总结和研究，印成小册子，分发到各个作战分区，在反“清剿”斗争中普遍运用。仅几个月，敌在红军游击队袭击下，伤亡几百人，打得敌人胆颤心惊。

在各个作战分区反“清剿”斗争中，各县地方武装积极配合，形成反“清剿”斗争的重要力量。如永定县游击队在刘永生等率领下，在永定县范围内，拖住了敌人 6 个团的兵力。并在分散活动中，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仅在第二次反“清剿”斗争中，就作战 150 余次，歼敌 600 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各作战分区的反“清剿”斗争。

（三）两期反“清剿”斗争胜利的经验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正确领导，是闽西红军游击队取得反“清剿”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首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及时制定了“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这一基本方针，是指导红军游击队取得反“清剿”斗争胜利的关键。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指出：所谓“广泛性”，是指游击战争的范围不限于狭小地区，而是依靠现有地区，不断向新区发展，使得烽烟遍地，敌人疲于奔命，无法应付，逐渐削弱。而红军游击队则日益发展壮大，最后形成新的有利形势。所谓“灵活性”，是游击战争的战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声东击西，神出鬼没，使得敌人捉摸不住，而红军游击队则处处主动，立于不败之地。所谓“群众性”，是要使游击战争不限于部队的军事行动，要协同地方党去领导斗争，使群众利用合法的斗争与非法的斗争相结合，和平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多方面箝制敌人，打击敌人，配合部队作战，并使部队发展壮大。所谓“胜利的”，就是执行毛泽东多年来规定的战争原则，即敌情不明不打，无胜利把握之仗不打，有胜利把握但伤亡过大的仗不打。不仅要打全胜之仗，而且打后要使群众不受摧残或少受摧残。闽西红军游击队正是执行了这一正确指导方针，在两次反“清剿”斗争中，不论处于多么困难的情况下，都能变被动力主动，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反“清剿”斗争中，针对敌人的“移民并村”和“保甲制度”、“壮丁队”等围困、封锁政策，创造了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的行之有效的斗争方式，即：白皮红心。所谓“白皮红心”，是指乡村中“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革命两面政权。红军游击队争取乡村中的保甲长，允许他们成为“白皮红心”“脚踏两只船”的两面分子：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为红军游击队工作，保护群众的利益。对驻守炮楼的“壮丁队”，红军游击队也采取争取好的，打击反动的，团结中间的。在革命基础较好的乡村，可派党员、干部担任保甲长或参加壮丁队，经过细致的工作，变保甲制度为赤色联防，变壮丁队为游击队的辅助力量，变白色碉堡为赤色碉堡。在革命基础较弱的乡村，则对保甲长和壮丁队晓以利害，使之能够做到保护群众的斗争和掩护红军游击队的行动。这样，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就领导红军游击队巧妙地利用了敌人的规章制度和组织形式为红军游击队服务，保护了群众，掩护和发展了自己，使敌人精心制定的围困、割裂、瓦解红军游击队的各种政策，归于破产。

第三，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注意发动依靠群众，时刻把保护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红军游击队的每次作战行动，既考虑打击敌人，又考虑到保护群众的利益。红军游击队经常应群众要求，打击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红军游击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实际行动，争取影响群众。如龙岩外山前十八乡的群众，因受敌人的欺骗宣传，害怕红军游击队。第3作战分区的红8团第1次到十八乡，群众都跑光了。适逢天下大雨，红8团将群众来不及收起的、晒在场上的稻谷收好，又给群众喂鸡喂鸭。在群众家中煮了饭的就留下信和钱。第2次部队再到十八乡，大部分群众未跑。第3次部队再去，群众不但不跑，还主动招待红军游击队。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1935年下半年，群众情绪日趋稳定，对红军游击队的配合愈加有力。他们经常巧妙地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

合，将和平斗争与武器斗争相结合，来对付敌人的“清剿”政策。如：群众对敌人的红军一来就鸣锣报警的要求，采取红军游击队来时不鸣锣，红军游击队走了才“报答”，使敌多次扑空。龙岩后田中共党支部书记张溪兜，用磨洋工等多种方式，带领群众拖延敌军修筑碉堡的工程。张溪兜还在龙岩后田秘密建立了联络点和被服厂，使龙岩后田成为红军游击队的后勤补给站。在敌人“计口售粮”的“清剿”政策下，红军游击队的粮食和军需品极为缺乏。人民群众就冒着生命危险接济红军游击队，创造了“担杆装盐”、“双层桶装米”、“大蒲包装饭”等 20 多种运输方式，千方百计将粮食和物资偷运上山，歧岭山下女共产党员、秘密接头户卢春兰因多次将米菜油盐偷送给红军游击队而被捕，但她临危不惧，高歌就义。拢丘坑女英雄陈客嫫，因多次支援红军游击队和掩护红军游击队脱险而被敌发觉。被捕后受尽折磨，但她视死如归，直至被敌杀害。总之，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游击队才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克服敌人的经济封锁，坚持红旗不倒。两期反“清剿”斗争，红军游击队不但未被“剿灭”，而且在闽西南地区 10 多个县建立了 4 大块游击根据地。至 1935 年底，闽西南革命武装力量得到很大发展。除几个作战分区外，永定、上杭、龙岩等县都建立了百余人的游击队，还组建了许多游击小组。党的组织亦逐步健全。县以下建立了区委，不少乡村建立了党的支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还建立了武装交通站，在各县建立分站，由红军游击队中抽调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到交通站工作。交通站是单线联系，有严格的纪律。在各个游击区之间形成一个交通网，各种信息可以很快传到军政委员会，也保证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统一指挥。闽西红军游击队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也为后来的反“清剿”斗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四、建立抗日讨蒋统一战线与反“清剿”斗争的胜利

（一）上杭双髻山会议，贯彻“抗日讨蒋”方针

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地区的掠夺。1935年制造了阴谋吞并华北的“华北事变”，中日矛盾空前激化。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和个人，只要愿意抗日反蒋，就可以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各党派和人民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华北事变的发生，直接威胁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生存。国民政府开始调整它的对日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闽西南地区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国民政府先后从闽西南调4个师北上，留下第3、第80、第52师和从闽东地区调来的第37旅继续“清剿”闽西红军游击队。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通过地下党组织获悉中共中央关于华北事变的政治决议和关于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文件后，于1936年1月1日在上杭双髻山召开第2次全体会议。会议遵照中共中央文件指示精神，结合全国形势和闽西南地区实况，决定在闽西南地区建立抗日讨蒋的统一战线。

为适应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需要，1月3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出《为加强抗日讨蒋的领导重新改组的布告》。决定将闽西红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重新调整体制，将原4个作战分区划分为3个分区6个支队。第1分区，司令员罗忠毅，政委方方；第2分区，司令员简载文，政委黄火星；第3分区，司令员邱金声，政委伍洪祥。同时，各县游击队改称为人民抗日讨蒋游击队或义勇军。为加强对抗日讨蒋统一战线的领导，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进行了调整和充实，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简载文、方方、谢育才、邱金声、伍洪祥、廖海涛、张忠垣、黄火星等为委员，张鼎丞任主席，邓子恢、谭震林任副主席。1月5日，新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进一步作出《关于目前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的决议。决议要求闽西党和红军游击队对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有足够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指出：北上的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准备直接对日作战。闽西红军游击队的任务则是更广泛的开展群众的游击战争，粉碎国民党军对闽西南地区新的“清剿”，巩固和发展红色武装。发动群众，开辟更广阔的游击区域，创造对日作战的根据地。强调为保存抗日讨蒋的武装力量，在战术上，必须避免与敌人作大规模的战斗，“更细心的、灵活的来研究运用巧妙的游击战术”。提出必须大胆学习和运用统一战线策略。要在“武装保卫中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武装保卫福建，保卫漳（州）厦（门）”、“与红军携手北上抗日”等口号下，建立抗日讨蒋的联合战线。同时，要不断揭露敌人各种各式的欺骗，争取和团结广大群众，进行抗日讨蒋斗争。同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闽西南民众抗日讨蒋纲领的布告》，向闽西南各界人士和父老兄弟进一步阐明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抗日救国纲领。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2次会议之后，为贯彻会议精神，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将会议各项决议印发给各级组织，并及时调整政策，制订了《告闽西南民团壮丁书》、《关于争取白军工作的决定》《关于争取土匪工作的决定》等文件，明确规定：停止打土豪，把筹款改为募捐；把“拖枪过来当红军”的口号改为“与红军携手北上抗日”；变民团常备队为抗日讨蒋游击队，使之成为抗日武装；把“消灭土匪”变为“争取土匪”，以增加抗日讨蒋的新力量。实行包括地主、富农、国民党在内的各阶层、各党派在抗日反蒋的原则

下联合起来的新政策。由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抗日讨蒋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策略的制订，在闽西南地区适时地实行了由国内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转变，符合历史发展的进程和革命战争的需要，从而缓和了闽西南地区的阶级矛盾，为挫败国民党军新的“清剿”和在闽西南地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反第三期“清剿”（1936年2月~6月）

1936年2月，国民党驻闽绥靖主任蒋鼎文在闽西南地区集中第3、第80、第75、第52师及新调人的第37旅（即新10师）等部，仍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采取“驻剿”、“堵剿”、“搜剿”、“追剿”并用的战术，政治上继续推行“移民并村”、“保甲制度”，制订《壮丁队堵剿残匪办法》、《抽调壮丁队搜剿残匪办法》等政策，以壮丁队配合正规军，向闽西红军游击队发动第三期“清剿”。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抗日讨蒋方针，以“更细心的灵活的运用游击战术开展游击战争”为指针，在龙岩白土、东坑、岩山头、溪口、涂潭、宁洋小陶，连城马池塘，南靖下坎寮等地，给国民党军及其反动地方武装以坚决打击。

白土战斗位于龙岩县城以南的白土镇布防有新10师1个营部、2个连和白土民团。该部经常出动数十人到冷水坑、后田村、肖坑等地骚扰、欺压群众。国民党地方当局还提出以白土区为试点，准备丈量土地，收回土地革命时分给农民的土地。国民党省政府也派出一批丈量土地的督察员到白土。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第3支队（简称红3支队）和龙岩独立营决定歼灭该部。红3支队遂从岩南漳边区秘密转移到白土的冷水坑一带。2月9日，红3支队和龙岩独立营以“引蛇出动，’战术，派游击小组到白土镇袭击诱敌，抓敌之税收人员。敌中计后，出动1连多兵力追赶。游击小组边战边退。此时，红3支队、龙岩独立营已在白土的龙聚坑头双生公祠后山和东坑口设下埋伏。当迫敌进入伏击地域后，红3支队和龙岩独立营前后夹击，击毙敌17人，俘70余人，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100余支。敌土地督察员和叛徒朱文昭当场毙命。红3支队随后向东坑转移。

东坑、岩山头战斗白土战斗3天后，12日，敌第80师1个团在2门迫击炮掩护下，向活动在白土东坑、岩山头的红3支队发动进攻。红3支队针对第80师采取密集队形进攻、行动不灵活之弱点，以“埋伏袭击与顽强抵御相结合”战术，先在东坑、岩山头埋伏，待敌开近后，突然开火。打退敌人几次冲锋后，红3支队主动撤出战斗，退守下一个山头，占据有利地形。待给敌以坚决打击后，再退守下一个山头。直至第80师“追剿”停止，此次战斗，红3支队共歼第80师200余人，红3支队仅伤亡1人，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

马池塘战斗小陶战斗后，红1支队在连城县马池塘山上活动。3月上旬的一天，发现国民党军第52师1个营在山沟里行军。经侦察，该营是孤军，没有后续部队。支队领导当机立断，决定聚歼该敌。遂各派出一部分部队封住山沟两头进出口，集中主力居高临下，向正在行军的敌军发起猛烈攻击。敌猝不及防，阵脚大乱。红1支队全歼敌1个营，缴轻机枪1挺，步枪百余支，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溪口镇战斗5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所辖第1分区领导组织红1、红2支队200余人突袭龙岩溪口镇，攻占溪口，全歼驻溪口镇民团100余人，缴步枪60余支，轻机枪2挺。

在上述各支队作战期间，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第7支队（简称红7支队）曾袭击上杭县；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第5支队（简称红5支队）深入平和县大小芦溪活动，等等。敌“清剿”军在受到红军游

击队连续打击之后，不敢再贸然出动，各区、乡民团也较为小心，龟缩在碉堡中，不轻易下乡。与此同时，抗日反蒋斗争的武装力量得到迅速发展。闽西红军游击队不仅建立了红 4、红 5 支队，游击区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各县红色政权相继恢复和建立。从 2 月到 7 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先后领导建立了岩南漳县军政委员会，魏金水任主席；永东县军政委员会，阮文松任主席；永埔县军政委员会，郑树昌任主席；永和靖县军政委员会，李天辉任主席；岩连宁县军政委员会，罗步云任主席；新汀杭县军政委员会，钟辉元任主席；岩永靖县军政委员会，李明康任主席。1936 年 6 月，两广事变爆发。为平息两广事变，蒋介石将正在闽西进行“清剿”的第 10、第 9、第 83、第 36 师等部调往广东作战，讨伐陈济棠。由于敌大军南调，被迫于 6 月底停止了对闽西地区的第三期“清剿”。

（三）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对“西南事变”的估量和策略的失误

1936年6月，爆发了“两广事变”（亦称“西南事变”）。事变发生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即对事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于6月中旬作出了《关于西南事变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定》，并发表了《为西南事变宣言》、《西南事变与中国革命》、《为西南出师北上告白军官兵同胞书》等。在这些决定和声明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认为，事变发生的原因在于“中国民族危急的紧迫与蒋介石公开卖国投降，红军北上抗日的胜利，而促成反革命营垒的内部矛盾的爆发和崩裂。”事变的性质，是“革命的”，“救国的”，“这是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的战争，是中国民族自救救国的战争”。事变的动向是“可以发展为抗日战争”，“蒋介石大军南下，战争可能象过去的军阀战争延续下去，一年甚至一年以上。”认为事变的意义在于“它的胜利就是中国民族的胜利，它的失败就是中国民族的失败。”

基于上述对“西南事变”的认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即号召闽西南一切武装力量及各界民众起来援助这一战争。显然，这是过高估计了这一事变的实际意义和两广部队的抗日情绪，忽视了事变是国民党军阀内部斗争的实质，未能及时揭穿军阀不敢抗日的原由。这就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未能在整个西南事变发展过程中，抓住有利时机开展各项工作。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让红军游击队集中力量，打击蒋军，策应两广部队行动方面。如在统一战线方面，忽视了白军的争取工作，采取打击壮丁队、布置白色碉堡暴动，重新在游击区没收地主土地，镇压国民党乡长、保甲长和地主豪绅，使原来统一战线中某些友军因利益冲突而叛离，无疑使刚刚建立起的抗日讨蒋统一战线受到损害。对于游击区的发展，缺乏积极的布置与行动。同时，由于对两广部队抗日情绪的宣传，对群众斗争开展之不利，也造成群众对粤军讨蒋抗日的幻想。这就在实际上帮助了西南军阀，帮助他们扩大了政治影响，增加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粤军统治下争取群众的困难。因此，当西南事变很快被蒋平息、蒋介石回手抽调部队镇压游击区群众、进行残酷大屠杀时，游击区的党组织和群众缺乏足够的准备，遭受到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致使有的游击区党组织遭到破坏，有的游击区因受到摧残而缩小。

10月下旬，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永定金丰大山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在西南事变中我们工作检查与目前紧急任务的决议》，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及时对上述策略上的失误进行了总结和检讨，纠正了左的政策。此后，闽西南各项处于停滞的工作和斗争，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为直接指挥闽西南抗日讨蒋军各支队，重新配备部队，将闽西南抗日讨蒋军改编为两个纵队。第1纵队司令员罗忠毅，政委温含珍。下辖第1、第2、第3支队。在龙岩、漳平、宁洋、连城、南靖、华封一带活动，由邓子恢为军政委员会全权代表，驻龙岩进行指挥。第2纵队司令员刘汉，政委黄火星，下辖第4、第5、第7支队。在永定、上杭、南靖、平和、云霄、诏安、大埔地区活动，由军政委员会直接指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组成的军政委员会常委机关也转移至永定东部，领导全部工作。

(四) 反第四期“清剿”(1936年9月~10月)

(三)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对“西南事变”的估量和策略的失误

1936年9月,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后,蒋鼎文回师福建,着手布置第四期“清剿”。他先后召集驻龙岩的第3师师长李玉堂、独立第37旅旅长陈德法及驻上杭的第52师师长卢兴荣研讨“清剿”计划,重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剿抚并施”的战略方针,对闽西红军游击队发动第四期“清剿”。

此时,正值秋收季节。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针对敌第3师等放火烧杀,屠杀群众的野蛮行径,号召游击区军民“武装保卫秋收”,打破敌人的“清剿”。

龙岩小池战斗敌第四期“清剿”开始时,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1分区在龙岩城北禾志萍召开第1分区和中共龙岩中心县委联席会议,决定采取设伏诱敌战术,歼灭龙岩小池国民党驻军。具体部署:由龙岩中心县委所属之小池区委负责诱敌,向小池派出侦察;第1分区所辖红1、红2支队一部星夜兼程,经铜钵绕道进入小池附近的黄斜某山凹设伏;派1支部队往小池南边警戒、打援;令龙岩游击支队在预伏地域西南隐蔽,断敌退路并相机消灭可能向西逃窜之敌。红军游击队预伏地带三面环山,树木成林,杂草丛生,周围六七里地无人烟,大路由南而北从小池通向黄斜。小池区委按计划将“黄斜某山凹有游击队”的消息传出。小他驻军第3师第16团1个连及1个营部得悉后,连同民团150余人于22日上午8时许,朝黄斜开进。当敌进入伏击地域后,红1、2支队突然杀出。敌在红军游击队东西两面夹击下,晕头转向,慌忙向小池及西南方向夺路突围。红军游击队边打边跃进,紧缩包围圈。龙岩游击支队截住其退路,一面激战,一面喊话,进行战场瓦解。敌纷纷缴械投降。此战,红军游击队歼第3师1个连及一个营部,缴大批步枪和新式机枪1挺。为饱受第3师压迫的人民群众出了口气,也使(龙)岩(上)杭边和(龙)岩永(边)边游击区连成一体。

夜袭上杭草鞋岭战斗上杭草鞋岭有一碉堡,驻有敌第3师1个排。该排经常出动残害百姓,气焰嚣张,防御松懈。红7支队决定歼灭该部。经对草鞋岭驻地地形、敌活动规律、武器配备、人力布置详细调查后,认为草鞋岭虽离上杭只有5公里,敌人驰援部队一二小时内便可到达,但采取速决“战术”,便可取胜。9月一个凉爽的夜晚,红7支队1个排30余人,在新汀杭游击队配合下,从白叶出发,向敌驻地挺进。抵达碉堡附近时,以部分人员担任警戒,16人冲进碉堡,毙敌六七人,缴机枪1挺,步枪三四支。随后,迅速撤出战斗。待敌清醒准备战斗时,红军游击队早已扬长而去。

在第四期反“清剿”中,红军游击队各支队积极出击,在前后3个月中,共歼国民党军及其地方武装300余人,缴获子弹数万发。10月28日,蒋介石调蒋鼎文及其驻闽绥靖公署北迁建瓯,并将驻防闽西地区的中央军北调。闽西地区的“清剿”任务改由粤军第157师、第158师接替。至11月初,蒋鼎文部署的第四期“清剿”由于其部队换防和红军游击队的打击而告终。

粤军第157师、第158师入闽后,第157师黄涛部驻龙岩、永定,第158师曾友仁部驻上杭、武平。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认为粤军与蒋军不同,粤军参加过两广事变,经过抗日反蒋教育,受到革命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且与蒋介石有矛盾,进攻红军游击队不会那么卖力,因此将红军游击队主力第3、5、7支队集中在永定湖雷、陈东坑一带。12月间,粤军向湖雷、陈东坑发动进攻,红军游击队英勇奋战,打退粤军进攻,但自身也有较大伤亡。

（五）反第五期“清剿”（1937年1月～1937年3月）

1937年1月，粤军第157师、第158师与驻岩连宁地区的第52师协同，军事上采取“分进合击”、“埋伏袭击”等战术，政治上重演移民并村、筑堡作栅、扶植地方武装、利用叛徒瓦解红军游击队的伎俩，经济上从破坏中共后方机关及地方工作入手，实行封锁，对闽西红军游击队发动第五期“清剿”。

1月8日，红3支队在永定坎市寨背炉竹子坑遭粤军第157师938团1个营及孔夫民团的袭击，支队长阙树槐、政委邱尚聪等20余人牺牲。同月，岩连宁军政委员会主席罗步云、游击支队政委温新辉被叛徒暗杀于上杭县贴长乡（今步云乡）。由于叛徒出卖，永埔县金丰区委在岐岭下山遭粤军第158师946团100余人包围袭击，被捕17人，13人惨遭杀害。

面对敌人疯狂的“清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粤军骄纵傲慢，善长夜间埋伏袭击及远袭、搜山等特点，改变红军集中作战的办法，采用更加灵活的伏击、袭击和散兵群等战术，分散游击。疲劳、迷惑粤军，给敌以杀伤。

2月，红7支队、红4支队1个连、红3支队1个排在永定、上杭交界处的中华山东北侧大和坑休整。敌第157师469旅938团、省保安团钟绍葵部、大池、小池民团共750余人向大和坑“清剿”。时红7支队、红4支队、红3支队共300余人，在支队领导率领下，决定伏击来犯之敌。部队首先从大和坑经旱溪撤至七树坑隐蔽。主力迅速占领中华山西北制高点杀人墩。13日，敌兵分2路，分别由大和坑、旱溪杀人墩搜索前进。上午8时，敌进入红军游击队设伏地域，红7支队当即居高临下发起攻击，埋伏在两翼的红4、红3支队从两侧配合，击溃敌军数次冲锋。傍晚，红7支队绕到敌背后袭击，敌军大乱，被迫退到大池，再撤回龙岩。此战，红军游击队共歼敌100余人，打乱了敌军的“清剿”部署。

与此同时，刘永生率永东游击队在永定西溪黄汪桥伏击粤军运粮队，全歼粤军1个加强排42人，缴枪40余支。3月，红4支队在永（定）湖（雷）公路拦截伏击粤军第157师军车，歼粤军1个排，击毁军车1辆，缴机枪1挺，长短枪15支，子弹4000余发。战后，红4支队又急行军50多公里，来到闽粤边境，在曲潭附近的分水岭，袭击了粤军设在分水岭上的税务所，全歼粤军1个排，缴枪30多支，子弹4000余发。

此外，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还领导闽西红军游击队继续运用“散兵群”战术打击敌人。一次，派18人分4组和粤军作战，一日之中，消耗粤军子弹3万余发，粤军死伤40余人。

反“清剿”斗争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还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发动社会人士，揭露粤军打着“抗日讨蒋”旗号、打击抗日讨蒋力量的行径和所谓“反对移民烧杀”的欺骗宣传。向粤军大力宣传中共中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以争取、分化、瓦解、团结粤军。这样，闽西红军游击队在军事上、政治上逐渐掌握了主动权，粤军则处于逃亡、疲惫、分化、死伤的被动地位。1937年3月以后，粤军的第五期“清剿”逐渐无力，并随之结束。闽西红军游击队取得了反“清剿”斗争的全面胜利。这时，红军游击队武装已经发展到3000余人，党的组织也发展到有上杭、永定、龙岩、永和靖、永埔、岩永靖、岩南漳、岩连宁等8个县委，56个区委，400多个支部，党员3000余人。

五、贯彻“联蒋抗日”方针，开创国共合作新局面

（一）由“抗日讨蒋”到“联蒋抗日”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从“逼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于1937年2月10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以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从多种渠道获悉西安事变的消息和收到周恩来1936年9月22日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信，其中谈及“中共中央将为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和抗日的国防政府而斗争”的指示，不久，又收到由闽南转来的中共中央1935年12月的政治决议。这些使富有斗争经验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意识到时局的发展和革命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遂于1937年3月15日召开全体委员及附近地区县委委员会议。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2月28日起草的《关于闽西南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决定进一步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愿意联合抗日的党派、武装进行谈判，订立抗日协定。为了适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需要，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改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将闽西南抗日讨蒋军改名为人民抗日红军，游击队改为人民抗日义勇军，并提出派代表与国民党当局驻闽部队进行正式谈判，建立抗日人民政府和人民抗日革命军问题。这是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时局发展的关键时刻，作出的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为进一步明确中共中央的具体方针和策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派方方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闽西游击区的情况和请示工作。4月上旬方方出发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收到闽南红3团转来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3月5日《给闽粤边特委的指示信》和中共中央1936年9月17日《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重要文件。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即于4月25日在南靖县上科岭村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为执行中共中央“抗日联蒋”方针，必须首先在闽西南地区开展一场和平运动，创造和平谈判的气氛，以推动国民党的抗战。为此，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于5月15日发布了《闽西南人民抗日救国纲领》，提出“闽西南人民自救救国的根本出路”等16条款；发布了《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三致粤军公函》，向粤军方面提出了停止进攻闽西南红军游击队；驱除日寇、汉奸及浪人出境；开放闽西南人民救国运动；保证人民言论行动等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等5项要求。同时表示，在国民党军政当局接受上述5项要求的前提下，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方面愿意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武装的一切敌对行动；在抗日行动中，军事上受粤军指挥，但红军内部事务不受干涉；双方商定驻防地区，互不侵犯；在保证红军给养的前提下，红军游击队不干涉当地行政制度，并遵守友军一切关于社会的法令等4项和平条件，以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之诚意。当天，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名发表《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闽西南各界人士书》，重申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和平条件。同时强调：“我们决不能同意贵军根据南京亲日派‘根绝赤祸’宣言所提出的投诚收编办法”，“尤其不能让闽西南红军被人解散或混编”。同样，也绝不能让共产党员溶解于任何党派，更不能向任何党派“投诚自新”。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还以张鼎丞、邓子恢名义分别写信给旅居漳州、厦门

的闽西同乡和各界人士，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并派代表赴漳、厦进行闽西南和平问题的商讨和募捐红军游击队的给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动的和平运动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闽西同乡和各界人士除积极赞助闽西红军游击队外，义正词严地致电国民党福建政府，促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利实现闽西南地区的国共合作。为使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得以实现，为争取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还令各县、区军政委员会，各作战分区的红军游击队，采取写信、发传单或派代表等方式，与国民党县政府，区、乡公所或群众团体进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传和谈判，造成了广大的和平合作的社会基础。如平和的芦溪，永定的下洋、溪南，上杭的丰稔市，龙岩的自上、西山等地，都有许多联保主任、保甲长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建立了和平合作的关系。粤军第 157 师的中下级军官，也表示拒绝执行打内战的命令等。和平谈判的时机日趋成熟。

（二）龙岩谈判，合作抗日协定的签订

在举国上下一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形势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动的和平运动的攻势和压力下，福建国民党军政当局不得不坐下来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谈判。1937年5月，由和党有密切联系的、原国民党军第19路军营长谢再发从中斡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岩南漳军政委员会主席魏金水到龙岩适中洋邦，与粤军第157师469旅937团1营营长吴滇接触。魏金水力促吴琪策动粤军与中国共产党实现和谈，一致抗日。接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原红9团政委谢育才为总代表，负责与粤军及驻龙岩的国民党军政当局谈判。6月15日，谢育才与吴琪、谢再发等到漳州会见粤军第157师师长黄涛，充分阐述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关于国共合作的抗日主张。谢育才返回龙岩后，与驻龙岩的粤军第157师旅长练惕生及第6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张策安举行谈判。此时张策安等对和谈尚无诚意，他们在“和平合作”的掩护下，提出取消闽西共产党和红军苏维埃组织，发表“投降自新宣言”等无理要求，拖延谈判。同时，极力阻挠对粤军的谈判。原是19路军编制的练惕生旅长表示愿在自己的防区内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实行停战谈判后，张策安才在练惕生旅的压力下，表示愿意继续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谈判。

为了闽西南尽早实现国共合作抗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派邓子恢亲赴龙岩。7月10日，邓子恢、谢育才抵达龙岩，与旅长练惕生、参谋主任王晓侯正式谈判。经过多次协商，国民党方面大致接受了邓子恢按照《三致粤军公函》所提出的和平条件和原则立场。29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代表邓子恢、谢育才，粤军代表练惕生、王晓侯以及国民党方面代表张策安在龙岩商会签字，正式达成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

根据协议规定，红军游击队准备集结点编。在红军集中地点问题上，国民党方面指定要红军在龙岩溪南或沿漳龙公路15公里之内集中驻防。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警觉地注意到，这一集中地点，因交通方便，国民党军便于调动兵力，红军游击队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遂坚持红军游击队集中地点在不通公路的龙岩白沙至雁石一带。同时坚持部队番号不变，坚持不发恼就不停止征借经费的原则。决定将红军游击队定名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1支队”，支队长谢育才，政委邓子恢，参谋长罗忠毅。下辖3个大队。由于国民党方面不断制造事端，谈判陷入僵持状态。此时，从闽南传来红3团在漳浦被国民党军缴械的消息，邓子恢义愤填膺，向粤军提出严正抗议，指出：“由于粤军背信弃义，制造漳浦事件，部队很不放心，因此坚持两地集中。”张策安被迫同意。

8月中旬，红军游击队开始集中。国民党军仍不断埋伏、截击红军游击队。但闽西红军游击队遵照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指示，顾全合作抗日之大局，主动避免接触，取道山路集中。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人民抗日红军第1、3、4、5、7支队和各县人民抗日义勇军分别开赴龙岩白沙、平和芦溪集中待命。23日，粤军第157师代表陈柏麟在福建省第6行政督察公署保安副司令韩遇隆陪同下，由龙岩到达白沙。邓子恢、谢育才出面欢迎。30日，陈柏麟在白沙点编，闽西南人民抗日红军第1、2、3、7支队及龙岩、上杭、岩连宁、岩南漳等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1支队第1、3大队。9月4日，陈柏麟到平和县芦溪点编，将闽西南人民抗日红军第4、5支队和永定、永东、永埔等县人民抗日义勇军改编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1支队第2大队。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从4月25日作出与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谈判的决定，到7月29日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的3个月中，由于正确地执行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终于在历史转折关头在闽西南地区顺利地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三）中共闽粤赣省委的成立

1937年9月中旬，方方从延安回到闽西。10月9日至15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龙岩白沙乡南卓召开闽粤赣边区党的临时代表大会。由方方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张鼎丞作了闽西党与红军斗争的报告。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撤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及各县军政委员会，成立中共闽粤赣省委。书记张鼎丞，组织部长方方，宣传部长邓子恢，军事部长谭震林。委员17人。省委下辖韩江、闽粤边、赣南3个特委。中共闽粤赣省委成立后，继续领导闽西南地区的斗争。

（四）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疆场

1938年1月10日，中共闽粤赣省委派谭震林赴南昌新四军军部汇报请示工作，接受关防命令。谭震林返回后，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于28日在龙岩白土宣布，成立新四军第2支队。第2支队由闽西、闽粤边、闽赣边红军游击队组成，共2000余人。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邓子恢调任军政治部副主任。方方另有任用。随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率闽西抗日义勇军第1支队开赴龙岩白土集结待命。与此同时，闽粤边的闽南抗日义勇军第3支队和闽赣边的（长）汀瑞（金）游击队也相继到达白土会合。各部队会师后，正式颁布了改编为新四军的命令，调整了干部，成立了支队司令部。支队下辖第3、第4两个团。第3团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第4团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之。2月20日，新四军军部命令江南所属各部立即开赴安徽歙县岩寺集中。27日，新四军第2支队以及各界代表和当地群众6000余人在白土镇广场举行北上抗日誓师大会。第2支队指战员发表了《为出发抗敌告别父老书》，与当地父老及各界人士洒泪而别。第2支队还在龙岩白土设立新四军第2支队留守处，主任谢育才，副主任魏金水，处理后方一切事宜。3月1日，第2支队从白土出发，经连城、宁化、石城、广昌、临川、瑶里等地，到达安徽岩寺，随即投身于抗日战争中。

第五章 闽粤边游击区

闽粤边游击区，位于福建省南部和广东省东部的边境地区，其西北部多山，东南部临海。红军游击队活动范围主要在福建省的南靖、平和、漳浦、云霄、诏安、龙溪、海澄和广东省的潮安、澄海、饶平、大埔等县。境内的诨仔石山、乌山、梁山、狮子山、桑埔山、大芹山、凤凰大山等，连绵起伏，崎岖曲折。这里层峦叠嶂，森林茂密，沟壑纵横，石洞遍布，地势十分险峻，对于开展游击战争极为有利。接近游击区的厦门、漳州、汕头、漳州等城市，是国民党当时在闽南、粤东的政治、经济、文化统治中心。

闽粤边区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这里就有共产党组织的活动，边区各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进行过武装斗争。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党中央派人到漳州组建福建省委。省委成立后，即派出干部深入农村，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壮大游击队伍。1932年4月，中央红军在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之后，毛泽东、聂荣臻、罗荣桓等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击溃国民党军第49师，攻克闽南重镇漳州城，震慑福建厦门和广东东江的国民党军。闽粤边区的革命斗争顿时风起云涌，形成燎原之势。在中央红军东路军的协助下，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在闽南组建了以书记何鸣为政委的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3团（简称红3团）；中共东江特委为实现与闽西南打成一片的战略目标，在粤东成立了东江独立第2师第2团第3连（简称红3连）。从此，闽粤边的武装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1934年1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闭会后，中央为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粉碎敌人东方阵线的进攻，认为在敌人之后方与侧边须要猛烈的开展游击战争”。于是指派中共厦门市委巡视员黄会聪组建中共闽粤边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统一领导厦门中心市委属下的漳州中心县委、福建省委属下的饶（平）、（平）和、（大）埔县委和东江特委属下的潮（安）、澄（海）、（南）澳县委，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国民党军队部分兵力，以图减少对中央苏区的压力。

1934年8月，闽粤边区特委成立。不久，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闽粤边区受到了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当时，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尚未全部取得联系，无法统一指挥。红军游击队在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适时打出外线，在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残酷“清剿”下，变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为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并逐步实现了党对红军游击队的统一领导。随着外线作战的深入开展，边区军民开辟了梁山、乌山等新的游击根据地，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开展对敌斗争，针锋相对地反对国民党的全面“清剿”，使闽粤边区进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武装力量迅速壮大的兴盛时期，先后挫败了国民党军队三次大规模“清剿”。

西安事变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闽粤边特委于1937年4月接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率先派出代表与当地国民党驻军谈判，在南方游击区中较早地实现了国共合作的局面。但是由于特委领导特别是代理书记何鸣，对国民

党反共阴谋丧失警惕，思想右倾麻痹，致使国民党当局策划的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漳浦事件”得逞。在特委机关和红军游击队几乎毁于一旦的情况下，一部分红军指战员，勇敢机智地陆续逃出敌人魔掌，又迅速组织起红军队伍，重整旗鼓，同国民党中的反共顽固派破坏合作抗日的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的严正抗议和交涉下，迫使国民党当局交还“漳浦事件”中缴去的部分武器，保证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

闽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4年8月至1935年10月，组建闽粤边区特委，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实现党的统一领导；第二阶段从1935年10月至1937年2月，闽粤边军民在反击国民党军队“清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第三阶段从1937年2月至1938年3月，同国民党谈判，在曲折斗争中实现国共合作。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中共闽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在逆境中发展，在反“清剿”中壮大，历尽艰辛。她的主要历史功绩在于：政治上，保持红旗不倒，在边区始终保存着一大片有战略意义的游击区域，成为南方8省15块游击区之一；军事上，粉碎了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清剿”，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的部分兵力，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和邻近游击区的斗争；组织上，保存了党的许多基层组织，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忠于党、忠于革命，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党政军干部，最后为组建新四军输送了一个多营、400多人的抗日骨干，并留下部分武装和人员坚持原地斗争，其中有的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闽粤边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

一、建立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实现党的统一领导

（一）中共闽粤边区特委的成立与埔尖山大捷

1934年1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共厦门市委巡视员黄会聪代表厦门市委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当时闽南的政治形势是19路军闽变结束以后，国民党中央军尚未向红军游击队发动大规模进攻，闽南地方和部队工作都有了发展。党中央为了牵制敌人，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决定在闽南成立闽粤边区特委，指派黄会聪任特委书记。中央决定成立特委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统一领导闽粤边区的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并打通与闽西的联系，配合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的“围剿”。

受命担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书记的黄会聪，于1934年4月中旬到达福建省的（南）靖、（平）和、（漳）浦县委（原漳州中心县委）所在地。当时，闽粤边区的红军武装有靖和浦县委领导的红3团400余人，潮澄澳县委（1934年10月改为潮澄饶县委）领导的红3连160余人；饶和埔县委领导的一支10多人的小游击队，由于这3个县委及其所属的红军游击队彼此之间均未建立起组织联系，尚不具备成立统一领导机构的条件。黄会聪于1934年5月1日在靖和浦先行组建了有红3团政委何鸣与吴野鸳参加的中共闽粤边区临时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临委）。临委利用当时国民党军队忙于“围剿”中央苏区，无暇顾及进攻闽粤边区的空隙，一方面派出交通员联系潮澄澳、饶和埔县委；一方面在平和县的捱仔石山、三坪举办党团干部训练班，为组建特委准备干部力量。另外，在靖和浦组织赤卫队、模范队等地方武装，开展查田、查阶级，巩固老区，发展新区，保卫红色政权等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积极筹备和工作，正式成立闽粤边特委的条件基本具备。1934年8月1日，临委在平和县邦寅山召开有靖和浦、饶和埔两县委领导人参加的党代表大会。大会选出黄会聪为特委书记，何鸣、何浚、林路、许其伟、余丁仁、谢卓元、张华云等为委员。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确定红军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在靖和浦根据地周围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红色区域，借以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以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

1934年8月，红3团除留下部分兵力与赤卫队保卫靖和浦游击根据地外，分两路向外出击：一路向东南沿海推进，消灭蜈蚣山土匪，在吴松、龙潭、后井、新村一带乡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尔后，部队继续向梁山进发，在盘陀、通坑、上坪庄、社污、葛后、崎溪、庙埔一带开展工作，为闽粤边游击战争的发展寻找和创建新的游击根据地；另一路向广东方向进发，经内外东溪、龙山、南霞、峨嵋山，工作一直开展到小溪、粗坑、圆仔内、东坑、乌山一带，进入广东饶平境内，寻找潮澄澳县委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这时潮澄澳县委已将红3连和红2中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潮澄澳第3大队（简称红3大队）。为打通与闽南的联系，红3大队奉东江特委命令北上进入福建境内，在饶和埔游击队的配合下，在诏安、云霄袭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开辟了饶平的三饶和诏（安）、（饶）平边两块新的游击区，使潮澄饶和饶和埔游击区连成一片。由于潮澄澳县委的红3大队北上发展，因而红3团进入广东境内的部队未能找到潮澄澳县委，但又不便远离特委。因此，在沿途拔除了一些反动据点和消灭部分反动武装后回师靖和浦。红3团派到东南沿海活动和南下粤东寻找潮澄澳县委的两支部队，于1934年9月底回到特委所

在地平和县 旭仔石山，准备稍事休整后，再继续完成打通潮澄澳、统一闽粤边党与红军游击队的任务。

红 3 团与红 3 大队的出击，惊动了福建省国民党当局。他们急调驻闽南的第 5 保安司令部独立营前往进攻闽粤边游击区。当时，国民党“围剿”的重心是中央红军，闽粤边的形势相对而言压力不算太大。红军游击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埔尖山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埔尖山，位于福建省平和县欧寅村一侧，特委机关就驻在欧寮村。1934 年 9 月，福建省第 5 保安司令部所属沈东海独立营 500 多人，分三路直扑而来，企图偷袭中共闽粤边特委机关。特委得悉后，立刻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商量对策。与会者一致认为，沈东海独立营是闽南一带装备较好，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地方武装。打击该营，既可以压下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嚣张气焰，长边区军民的革命志气；又可以吸引国民党正规部队，达到牵制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的目的。会议分析了敌我态势，认为埔尖山地形好，山的中部高地可成为控制整个阵地的要冲，红军游击队可凭险据守，居高临下，敌够我不着，我打他则易；同时还可以在山地两侧埋伏队伍，袭击敌人。会议最后决定集中红 3 团与靖和浦的赤卫队、模范队，以诱敌上山，聚而歼之的战术，狠狠打击该敌。

按照既定的军事行动计划，红 3 团第 4 连和地方武装首先占领了埔尖山制高点，负责正面阻击敌人，其他 2 个连队和地方游击队隐蔽在两侧，形成一个张口的“布袋”，只等沈东海这头“猪”来钻。其时沈东海部驻扎在三坪书院和许霜楼一带。为了诱敌上钩，红军游击队先派了 1 个短枪班活动到三坪书院附近，突然向敌开火，沈东海不知是计，立即命令独立营上山追击。当敌人窜进预定的伏击圈时，团部立刻发出战斗信号，顿时红旗招展，军号震耳，在连长卢胜率领下，4 连的战士们向敌人猛烈射击，埋伏在两侧的部队也一齐开火。霎时间，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抱头鼠窜。沈东海见势不妙，企图抢夺制高点，布置反击。他亲自督战，组织兵力，向红军游击队阵地发动了几次猛攻，均被击溃。这场战斗整整进行了 9 个小时，敌人被压在谷底。其间，敌发动七八次反扑，均未得逞。混战中，沈东海腿部中弹负伤，由卫兵扶上马，经内东溪向文峰方向仓皇逃命。敌军失去指挥，顿时乱作一团，纷纷弃枪而逃，惶惶如丧家之犬。红军游击队乘胜追击溃敌，“缴枪不杀”的呼喊声响彻山野，跪地举手投降的敌人随处可见。埔尖山一仗，共毙伤敌 30 多人，俘敌 80 多人，缴重机枪 2 挺，步枪 100 余支，还缴获敌运输队的大批军衣、军毯等许多物资。红军游击队乘胜赶走了驻龙岭的马逢兴保安团，扫清了据点内的国民党地方武装。

埔尖山大捷，不仅使红军游击队军威大振，还保卫了秋收，坚定了游击区军民的斗争信心，为即将到来的更为艰苦的反“清剿”斗争做好了准备。

（二）靖和浦军民破敌第一期“清剿”

红军游击队的频频出击，特别是埔尖山战斗的胜利，使国民党当局深感不安，于是向闽粤边区投入了正规部队。1935年开始，国民党抽调中央军第80师陈湏部、粤军第3军第9师邓龙光部向闽粤边区发动了第一期“清剿”。闽粤边区红军游击队从此进入了艰苦的反“清剿”斗争时期，并由以牵制国民党兵力、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为主要任务的游击战，逐步向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的战略任务转变。

国民党军“清剿”闽粤边区的部署是：第80师进攻靖和浦游击区；粤军第3军第9师进攻潮澄饶游击区；福建省保安司令部独立营进攻云和诏地区。国民党向闽粤边区发动第一期“清剿”的正规军和地方武装，总兵力共有1万多人。

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总方针下，国民党“清剿”军在政治上，采取隔离瓦解的政策，强化保甲制度，实行“一人通匪，十家同祸”的联保连坐法。规定“资匪不报者杀”、“供匪粮食者杀”、“济匪窝匪者杀”。同时，还采取“移民并村”政策，强迫移走游击区群众，将小村并入大村，企图以白色恐怖隔断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联系。在经济上，实行全面封锁政策，限定游击根据地的群众只能按定量购买粮、油、盐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多购者即以“通匪”论罪；并设立层层关卡，控制圩场，严禁粮食、日用品等运入游击区，妄图困死、饿死红军游击队。在军事上，采取“驻剿”和“分进合击”并用的战术。所谓“驻剿”，即以优势兵力占领战略要地，在游击区周围建立据点，构筑碉堡，并强迫群众围篱打栅，筑炮楼，修工事，实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政策。所谓“分进合击”，就是将游击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在对游击区实行层层包围封锁之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在规定的时间内，分别向预定的目标、地点进发，对红军游击队前堵后追进行合击。国民党军所到之处，大肆烧毁山村，抢掠农民的米谷、工具和衣物，将游击区变成“无人区”，企图在4月底肃清红军游击队。

国民党军对闽粤边的“清剿”重点，首先是对准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机关的所在地。1935年初，第80师进驻福建省漳州地区，80师第238旅第476、477团、师补充团、工兵营，会同各地保安队“清剿”平和县欧寮村特委机关。敌人首先在欧寮村周围的文峰、南胜、五寨、程溪、龙溪圩、小溪等驻扎部队，形成包围圈，然后各部同时向欧寮村的中共闽粤边特委机关合击。80师第238旅旅部及其所属各团部驻扎在游击根据地周围的圩镇，一旦发现红军游击队，就兵分多路合击。

闽粤边红军游击队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在特委的领导下，运用昼伏夜出，声东击西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进行分散的、小规模出击，在国民党军布防的空隙中开展游击战，寻机偷袭敌人。1935年2月，正值农历年关，特委获悉驻象牙庄的80师部队移防，正忙着过节，于是立即组织了一支30多人的武装，乘敌不备，经龙岭突袭了象牙庄的保安团队，接着又一鼓作气偷袭了驻三坪的陈坤保安团队。这两次行动规模虽小，影响却大，敌人因此不得不增派80师第239旅，配合保安团进攻靖和浦根据地。红军游击队避敌锋芒，采取敌进我退、化整为零的战术，转入深山坚持斗争。

不久，敌人从叛徒嘴里得知闽粤边特委机关、红军医院和看守所分驻在平和县车本村附近的石洞里，便以其80师的一个团配合省保安团分3路“进

剿”车本：一路从漳浦县象牙圩经龙岭进逼车本；一路从平和的南胜向欧寮推进；一路从南靖的龙溪圩经山城，直逼车本村。敌人扬言要踏平游击根据地，不让红军游击队活到除夕夜。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红3团团长张长水指挥第4连和靖和浦游击队，连夜抢占了附近的山头。第二天黎明时分，红军游击队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集中火力突然向已进驻车本村的敌人猛烈射击。敌人顿时惊惶失措，急忙集合队伍朝着枪响的方向追击。红3团第4连边打边退，在山谷里与国民党军兜开了圈子，绕过了几个山头，设法甩掉敌人之后，又迅速转回车本村，成功地掩护特委机关和伤病员以及群众的安全转移。3月初，当敌人兵分两路进攻旭仔石山时，红3团第4连100余人神速出击，迂回攻入旭仔石山脚下的南胜圩。在南胜圩镇压了反动豪绅，筹集了一批现款后迅速撤回旭仔石山。这一仗打得很利索，红军游击队仅用了不到一小时就攻克了南胜圩，对敌震动很大，使得80师急调第479团的2个营和原驻平和永定边境的第5保安司令部独立营驻守平和县城，从而打乱了国民党军“清剿”的部署。

1935年3月上旬，“清剿”靖和浦的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和重重包围的战术，逐步封锁了游击根据地的大部分基点，一旦发现红军游击队，不管地形如何险要，付出代价多大，总要千方百计地“追剿”与截击红军游击队。红3团为了保存力量，不得不退入三坪一带深山密林中与敌周旋。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红军战士怀着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斗争意志象钢铁一样坚强。他们风餐露宿，饿了，找竹笋，摘山果，挖野菜充饥；累了，就在大树下或山洞里休息。根据地的群众和红军游击队更是心连心，他们省吃俭用，把仅有的一把米、一把菜送给山上的红军游击队。不仅如此，他们还不顾生命危险，冒死给红军游击队送情报，掩护红军游击队伤病员安全转移。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给红军游击队指战员们在精神上以极大的鼓舞，使处于逆境中的红军战士仍充满战胜敌人的信心。

随着靖和浦游击根据地被敌人逐步蚕食和分割“清剿”，红军游击队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和根据地的群众联系越来越困难，粮食和生活必需品来源也越来越少，处境一天比一天艰难。红军游击队能否保存住自己，打破国民党军的“清剿”，这一生死存亡的问题，已尖锐地摆到特委领导人的面前。特委与红3团领导再三研究，认为部队继续呆在三坪山根据地内，没有回旋余地，加上与群众失去联系，如同鱼儿离开水，树木断了根，与其坐山待毙，不如下山寻找生机。为此，特委与红3团领导派出一些小部队，冲破敌人封锁线，下山到封锁线外活动。这些小部队夜出晨归，逐渐与封锁线外的群众取得了联系，同时搜集到一些敌情，还筹集了一些粮食和生活日用品，改变了红军游击队孤立无援的处境。

1935年春末，闽粤边特委获悉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消息。于是，特委开会研究分析形势，认为红军游击队的任务已不再是单纯牵制敌人的兵力，而是要在中央红军转移之后，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因而，特委确定了坚持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冲出封锁线，粉碎敌人“清剿”的方针。这就为红3团在以后敌人多次残酷“清剿”中，能够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主要原因。

根据特委这一方针，红3团分散冲出敌人封锁线后，迅速集结兵力，在乌山重创洪之政保安团和吴玉如民团。接着由红3团第4连连长卢胜带领一支武装小分队留在乌山，与地方赤卫队一起坚持游击战争。主力分三路向外

线出击：第一路向漳浦县的象牙庄、盘陀、梁山、杜漫和云霄县的荷步、古楼一带挺进，开展平原工作，成立浦南区委和浦西区委，加强对新区工作的领导；第二路向平和县峨嵋山、小溪、文峰、山格、黄井等地发展，意在与活动在漳（州）龙（岩）公路一线的闽西红 9 团相呼应；第三路由林路和朱曼平等率领，分别到平和县的五南区、云霄县的坪水和漳州一带，恢复和发展白区工作。至此，红 3 团顺利完成了外线出击任务，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在军事斗争上出现了新的转机。

跳出外线作战的红 3 团时常出没在国民党兵力薄弱的地带，驰骋在靖和浦方圆百里的广阔地区，寻机打击敌人地方武装。1935 年 4 月，红 3 团团团长张长水率领部分指战员夜袭漳浦县马铺大土楼国民党民团，歼敌 40 余人，击毙民团团长许朴，缴枪 40 多支。5 月，红 3 团一部又攻下平和县的五寨新楼、下溪楼，烧毁石井楼，共毙敌 30 余人，俘敌多人，并镇压了民愤很大的 6 个反动乡团头目。同月，挺进漳浦沿海一带的红 3 团第 3 连主动出击，先后消灭了眉田、巷内、霞美等乡联保武装，开辟了眉田、巷内、垄仔埔、黄眉格、竹仔林一带游击区。中共闽粤边特委委员林路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在地方赤卫队的配合下，向平和县的峨嵋山、内外东溪、龙山、南霞发展，并在粗坑、圆仔山内、东坑一带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国民党军第 80 师在无法找到红军游击队主力决战的情况下，只好撤回“清剿”靖和浦的部队。这样，红 3 团不仅开辟了敌后新的游击区，而且最终又恢复了靖和浦中心区，终于打破了 80 师的第一期“清剿”。

1935 年 6 月 5 日，在中共闽粤边特委的具体指导下，靖和浦县委召开第 5 次会议，充分肯定了红 3 团在反击国民党军第 80 师的“清剿”采取外线作战的战略战术，提出靖和浦军民的中心任务是，把开展敌后猛烈的武装斗争与组织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结合起来，争取与饶和埔打成一片，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决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

（三）潮澄饶、饶和埔游击区相继受挂，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的召开

在靖和浦游击区胜利粉碎国民党军“清剿”的时候，闽粤边区的潮澄饶、饶和埔两块游击区相继受到了粤军第3军第9师等国民党军的分割“清剿”。

1935年六七月间，位于广东、福建交界的潮澄饶游击区，受到了粤军第3军第9师的疯狂进攻。敌人先是以3个营的兵力，分驻潮安登凤的赤竹棚、秋区的青岚和丰顺县的大钱、盐坪，切断潮澄饶浮凤游击根据地与平原游击区的联系。在大肆摧残位于平原、丘陵的外围游击区后，又以3个营的兵力，分别进驻文祠塘、哈溪圩和坪溪圩，对浮凤游击根据地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同年8月，粤军第3军第9师集中2个团的兵力，向浮凤游击根据地发动进攻。敌人残酷蹂躏根据地，他们到处筑碉堡，市竹签，围篱设栅，并以凤新、新东、凤潮、南溪为据点，带着军犬进行“驻剿”屠杀。叛徒为其出谋划策，采取“梳篦”成术，搜捕群众，放火烧山、烧屋，强迫山上的农民回乡“自新”。对革命基点村实行三光政策，把根据地变成一片焦土。霎时间，根据地上空乌云密布，革命群众惨遭摧残，一批干部和群众惨死在敌人屠刀下。在这样强大敌人大举进攻面前，潮澄饶红3大队、特务大队和浮凤赤卫队本可以利用深山密林的有利地形与敌周旋，或者撤出敌军包围圈，到广阔的山区或敌后活动。但潮澄饶县委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却提出了“保卫苏区”的口号，要红军游击队死守山头，结果造成被动挨打，步步退缩的不利局面。

在红军游击队连连失利的情况下，潮澄饶县委又派出小股武装埋伏在山间丛林中小道旁，拦截被国民党军逼迫迁移的群众，强迫他们回乡，有的甚至把被迫移民的群众当成“反水”分子，加以惩治，使红军游击队严重脱离了群众。到1935年8月底，潮澄饶红军游击队已伤亡近三分之一，面临被敌合围的困境。在此严峻形势下，潮澄饶县委依据特委指示的“保存实力，组织转移”的方针，决定将潮澄饶红3大队、特务大队和浮凤赤卫大队相继向闽粤边境突围，县委机关也随后转移。至此，潮澄饶游击根据地完全丧失。

而饶和埔游击区则由于县委领导未能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仅靠10多名游击队员消极地保护着县委机关，继续在游击区内强行分田分地。结果，在国民党军的“清剿”下，工作日益陷入困境。加之，闽粤边特委也未能适时派出武装予以支援、协助，致使饶和埔的游击战争陷于停顿状态。

入秋，闽西红9团团团长吴胜和政治处主任赖传荣率1个营南下闽粤边，由饶和埔游击队带路，在平和县三坪山与红3团会师。红9团向闽粤边特委转达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提出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领导闽西南游击战争的设想。闽粤边特委认为在未接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建立统一领导的时机尚未成熟。为加强闽西的联系，闽粤边特委派出一个武装排随红9团到闽西活动。后因国民党军队的分割“清剿”，在红9团回师闽西后，闽粤边派出的武装排也未能回到闽粤边区。

在潮澄饶、饶和埔游击区斗争相继受挫的情况下，特委于1935年9月在平和县魁仔石山召开了第五次扩大会议，总结过去一年来闽粤边区党和红军游击队在反“清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并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制定了“壮大反蒋抗日武装力量，在各地组织义勇军，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粉碎敌人新的‘清剿’”的方针政策。

为传达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精神，10月，特委派何鸣为特派员，前往饶和埔、潮澄饶巡视工作，传达“红3大队要靠近红3团，打通闽粤边区”的指示，并根据特委的决定改组了饶和埔县委。何鸣在前往潮澄饶游击区的途中，遇上从潮安浮凤突围出来的潮澄饶县委与红3大队、特务大队、浮凤赤卫大队。何鸣批评他们不应急躁地进行土地革命，更不能阻止群众移民。在何鸣的指挥下，潮澄饶县委和红军游击队400多人进入福建诏安境内，向乌山进发。至此，潮澄饶红军游击队正式归闽粤边特委领导，与卢胜率领的红3团部分武装一道，开始了创建乌山游击根据地的斗争。

潮澄饶红军游击队跳出敌人包围圈，向福建诏安境内乌山方向实行战略转移，标志着闽粤边区红军游击队，由单纯牵制敌人兵力转变到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完成。

从中共闽粤边特委的成立到红军游击队冲出敌人封锁线，开展敌后游击战，闽粤边特委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适时转变战略任务。在这期间，特委不但领导靖和浦军民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80师的第一期“清剿”，而且引导潮澄饶红军游击队实行战略转变。从整个游击区看，虽然潮澄饶浮凤根据地失陷了，但红军游击队保存了有生力量，并出击外线，在闽粤边区实现了特委的统一领导，这就为闽粤边区深入、持久地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

二、破敌第二期“清剿”，游击战争蓬勃展开

（一）调整部署，外线破敌

潮澄饶红军游击队进入乌山，闽粤边区实现了特委的统一领导后，特委决定把游击战争的重点放在靖和浦和云（霄）、（平）和、诏（安）两游击区，以潮澄饶红军游击队和卢胜领导的武装小分队组成独立营，在云和诏的乌山建立游击根据地。红3团在靖和浦的垵仔石山、梁山、大芹山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互相策应，开展游击战。根据特委这一指示精神，为开辟乌山革命根据地，卢胜率领的红3团武装小分队进驻峨嵋山后，开辟了东坑、寨仔尾、白楼村等游击据点，打下云霄境内的大坪水、马铺圩及平和县的田径、小角岭，拔除了盘踞在上述各地的地主武装据点，然后领导农民抗租、抗税，组织农会，建立了以云霄桥头、半岭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红3团第1连进驻大芹山，由红3团政治处主任林克明带领工作团，并协助地方干部组成了一支10多人的武装工作队，由陈天才任队长，开展大芹山工作，建立大芹山游击根据地。潮澄饶红军游击队进入乌山境内后，乘敌不备，袭击诏安县保安团，消灭了第5保安司令部独立营的部分有生力量，在乌山站住了脚跟。从潮澄饶转移过来的红3大队、特务大队、卢秋桂和邓珊部等几支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潮澄饶独立营，营长邓珊，政委贝必锡。接着，何鸣在乌山十八间召开了潮澄饶县委扩大会议，总结了潮澄饶、饶和埔失败的教训，传达了闽粤边特委关于撤销饶和埔县委、成立云和诏县委和新的潮澄饶县委的决定。并将潮澄饶浮凤赤卫队和秋区游击队合编为潮澄饶红军第1大队，大队长卢秋桂（后李金盛），政委曾才炎。潮澄饶第1大队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在适当时机打回潮澄饶，恢复浮凤游击区。

在闽粤边区调整组织部署的同时，国民党军第80师经过3个多月的准备之后，又向红军游击队发起第二期“清剿”。由于红军游击队已跳出敌封锁线，来去无踪，飘忽不定。第80师除继续使用第一期“清剿”手段外，在军事上改用“驻剿”和“搜剿”相结合的战术，将队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驻在游击根据地周围，修筑炮楼，围篱打栅，强化工事，封锁游击队的活动；一部分则分驻在机动据点内，突击搜山，用“清晨看露水，白天看烟火，晚上看青苔，密林看杈丫”等办法监视和寻找红军游击队的行踪。敌人在进驻一地或搜山时，行动十分诡密，时常伪装撤走，上午来下午走，晚上再回袭，以此迷惑红军游击队和群众。敌人还经常派出小分队，或路撒沙子探听行踪，或深夜埋伏突然袭击，或网罗反动地主通风报信，用尽种种方法搜捕地下交通员，以此切断红军游击队军事情报来源，割断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在政治上采取“全村集体自新”政策，威胁红军家属，引诱红军游击队中不坚定分子投降“自新”。敌人每到一处，大肆烧杀抢掠，不仅成年人被扣上“通匪”等罪名惨遭杀害，就连儿童也难以幸免。敌人采用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火烧水烫、砍头活埋等种种法西斯酷刑，残酷迫害、镇压红军游击队员及其家属和革命群众。根据地内的群众死于国民党暴行下不可胜数。

面对国民党军第80师新的残酷“清剿”，跳到外线作战的红军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采取分散以避免敌80师主力，集中以消灭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战术，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1935年11月，红3团跳出国民党军第80师的包围圈，先后攻打平和县白叶楼、大坑尾、壶祠、大溪坪等地，将靖和浦与云和诏根据地连成一片。1936年1月，卢胜率领独立营一部与红3团一部配合，攻打平和县龙头的南门与寨仔村联防队，毙敌50多人。1月23

日晚，红3团集中2个连的兵力，袭击南靖县洋尾溪岩前楼，消灭县保安团1个排30多人。2月，国民党军第80师和福建省保安团共7000多人“清剿”靖和浦梁山根据地，独立营跳到敌后，在平和东坑赤卫队配合下，拔掉了防守严密的民团武装的堡垒凤鸣楼。红3团、独立营分兵出击，消灭地主武装，开辟了云（霄）（平）和、（漳）浦云（霄）、（漳）埔南（部）、（平和）双格四个游击区。

（二）纠正肃反扩大化，红军游击队再度出击

正当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形势有了进一步好转的时候。1936年三四月间，闽粤边特委在总结潮澄饶、饶和埔的失败教训时，却怀疑在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内部有“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破坏。于是特委部署了肃反运动，在云和诏、潮澄饶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中进行了扩大化的“肃反”，开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搞逼供信。结果是“区一级的干部十分之七的被扣留，独立营中的队员及中队长、排长十分之五的也被扣留，所被扣留之人，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受过严刑拷打强迫供口供的”。特委委员余丁仁、谢卓元、张华云，原潮澄饶县委书记陈信胜、红3大队政委贝必锡等党组织的领导和红军游击队指战员数十人被错杀，使闽粤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遭受了重大损失，教训是深刻的。直到后来特委发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后，才明令予以制止，红军游击队才又逐渐恢复元气，陆续出击。

1936年4月，独立营在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下，采取挖地洞、炸炮楼和内外夹攻的办法，在诏安山区与敌激战七昼夜，攻破了反动据点隔背坑坝楼，迫使地主武装投降。接着部队向西北方向推进，又一举攻克了云霄的半岭，搞掉了诏安上官陂的大土楼，缴获两地反动民团的枪械数十支。5月，红3团团团长张长水率部在群众武装配合下，攻打水磨、寨仔、苦水坑、水宅、石椅等地，建立起灶山游击根据地。红3团第3连出击泽底溪、官园、东山、浮山、顶溪板一带，袭击国民党军1个连护送运输队，毙伤敌20多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20多支，子弹1000余发。继而，红3团第3连攻下官污国民党区公所，毙敌10人，俘敌20多人。同月，靖和浦县委将各路义勇军集中于平和县邦寮山，成立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由县委书记何浚任总指挥，朱增强任副总指挥，县委常委朱曼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设3个大队。这时云和诏县委所属各区组织的人民抗日义勇军已发展到4个中队，由独立营派军事骨干担任中队长。靖和浦县委、云和诏县委不仅有脱产的抗日义勇军，而且还有不脱产的农民抗日自卫军数千人。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成立后，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团数百人向靖和浦的岭后进犯，被数路义勇军击溃。抗日义勇军和农民抗日自卫军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建起来的群众抗日武装，它在反击国民党军的“清剿”斗争中，以及以后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6月，红3团在靖和浦巩固和发展了灶仔石山、梁山、灶山、大芹山等游击根据地。独立营在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后，集中兵力沿诏安东部向四都方向出击，直逼云霄县城。西部从景坑、搭桥、坪路一带出击，扫过诏安县附近的西潭、美营、湖内等平原地区。北部向诏安县的上下官陂、秀篆，一直发展到平和县的大溪，建立起以乌山为依托的广阔游击区。由于乌山和灶仔石山、梁山、灶山、大芹山等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从而使靖和浦、云和诏、潮澄饶游击区打成一片，使闽粤边游击区域更加巩固与扩大，为以后进一步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创建了可靠的基地。

（三）建立闽南抗日支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1936年6月，国民党粤军陈济棠和桂军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发动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蒋介石为平息这一事变，匆忙将第80师从闽粤边调走，准备与两广军作战。中共闽粤边特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开展广泛的反日反蒋的游击战争”的动员令，号召“各地红军部队及人民抗日义勇军更猛烈地开展反日反蒋游击战争，积极地与西南抗日救国军互相呼应地向蒋介石部队进攻，并且要在抗日讨蒋的旗帜下，普遍的武装群众，尤其是猛烈地扩大红军与人民抗日义勇军，加紧巩固与扩大反日反蒋的基本力量。”为了团结更多的反日武装力量，特委决定将所属各部红军队伍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闽南抗日支队”（简称红抗支队），下辖3个支队：原独立营改编为第1支队，支队长卢胜，政委吴金；原红3团改编为第3支队，支队长张长水，政委何鸣；原潮澄饶红军第1支队和云和诏人民抗日义勇军改编为第5支队，支队长李金盛，政治部主任刘炳勋。

在中共闽粤边特委领导下，红军闽南抗日支队与抗日义勇军，互相配合，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红抗1支队在云霄县的牛角径、诏安的梅州、上官陂一带接连打了一些胜仗，并在乌山根据地建立了红军伤兵医院、被服厂和交通站等。红3支队在靖和浦的霞美、杜浔、沙西、盘陀、公田、溪南等地打击地主武装。红抗5支队在诏安、饶平两县边境打击敌人。

白泉村战斗为执行特委关于继续开展武装斗争，进一步扩大游击战争的指示，1936年6月，张长水率红3支队300多人南出魁仔石山，计划经平和县五寨、云霄县古楼、白泉、浦中等地，直逼云霄县城，再往乌山，与红抗第1、5支队会合，采取更大的军事行动。在队伍顺利攻下五寨、瓦窑坑村之后，红抗3支队领导人在部队节节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滋长了麻痹轻敌的思想。在攻打白泉村前，由于没有掌握准确敌情，丧失了警惕，保密工作做得不好，行军路上又未作好隐蔽，泄漏了攻打白泉村的军事机密。结果白泉村的国民党壮丁队联合各地反动武装作好了战斗的准备，在红军游击队进攻前便积极修筑防御工事，在村里周围筑起三层篱笆，篱笆外面又布满了竹签，并派人到云霄县城，请求保安团增派援兵，以抵抗红军游击队的进攻。6月28日早晨5点，红抗3支队开始进攻白泉村，首先派1个连攻打，因力量太小没有攻下，便增派1个连去支援，另外又派1个连登上后山监视控制敌人。战斗到上午10时左右，在屡攻不下的情况下，驳壳枪班冲了进去，毁去两层篱笆，但因班长负伤，敌人集中火力封锁通道，一时不能攻打下泉村。正当双方坚持不下，战斗进入对峙时，敌保安团几路援兵赶到，红3支队长张长水率领1个连向山头冲去，准备夺取制高点。但保安团已从另一侧抢先占了山头，随即用机枪向游击队扫射，张长水毫无畏惧地指挥冲锋，自己带头向山头冲上去。终因敌人占据了有利

地形，居高临下猛烈射击，部队在敌人夹击下被冲散，牺牲了10余人，张长水也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张长水，山东省人。中共党员。历任中央红军排长、红3团连长、团长，闽南人民抗日红军第3支队长等职，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张长水带领一个排的兵力参加攻打漳州的战斗。在中央红军撤离漳州回师中央苏区后，张长水被留在闽南红3团任职，在尔后长达4年多的战斗中屡建战

功。张长水是闽南红军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作战英勇，身先士卒，他率领闽南红军为巩固和发展闽粤边革命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

他的不幸牺牲是闽粤边党和红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白泉村战斗失利后，红抗3支队被冲散的队伍分两路撤回梁山，由政委何鸣兼任支队长，并在梁山总结经验，整顿队伍。

7月间，国民党调遣2个保安团共2000多人的兵力向平和县九仔石山游击根据地发动“清剿”。红抗3支队跳入敌后，在东南沿海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红抗1支队在云和诏游击区积极配合作战。8月间，红抗1支队在诏安官陂一带打了出色的一仗。

智取金溪圆楼位于诏安官陂金溪圩附近的圆楼灰寨，是敌人盘踞在云和诏地区的一个顽固的联防据点。那里的七八个反动地主豢养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武器配备相当精良，整个联防区

由5座用石灰土混合建造的大圆土楼组成，四周有一道墙环绕。平时这帮家伙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群众对其恨之入骨，早就盼望有一天能除掉这个祸根。当红军游击队进入云和诏边区活动后，这股敌人气焰嚣张，设置重重障碍，不准粮油盐及药品进入游击根据地，红军游击队决心拔掉这颗钉子。1936年上半年，曾两次强行攻打金溪圆楼都未成功。8月间，红抗1支队在当地义勇军的配合下，在几次强攻不下的情况下，经过全面分析情况后，决定以智取代替强攻，用挖洞炸楼的办法除掉这颗眼中钉。在充分准备之后，一天夜里，战斗打响了，第1连战士在火力掩护下，由连长带领冲向寨墙，把50多条用水浸湿的棉被叠放在围墙和木桌上，随后组织突击队迅速进到围墙下开始挖地洞，城楼里的敌人起初蒙在鼓里，只照老办法乱放了一阵枪。后来发现红军战士在挖地洞，感到情况不妙，便集中火力射击。可是射来的子弹打在湿棉被上，几乎丧失了杀伤力，挖洞工程进展顺利。待天快亮时，红军战士已将地洞挖到接近敌人的中心圆楼，准备将装满炸药的棺材运进洞里，如敌人胆敢抵抗，即引爆炸掉圆楼。与此同时，红抗支队还派了金溪圩上的一个地主进寨，向守寨敌人发出最后通牒，告诉他们红军的政策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如负隅顽抗，立刻炸掉圆楼。一听要炸楼，寨中的地主和反动民团团长吓得心惊胆颤，不得不缴械投降，金溪圆楼灰寨终于为红军游击队所克。此役共缴获长短枪100多支，抓了两个顽固的反动地主。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对其中一个民愤极大者予以处决，并将缴获地主豪绅的财物分给当地群众。这一仗，打出了红军声威，人心大快，而金溪圩附近的地主豪绅则魂飞魄散，纷纷逃往县城。不久，红1支队在当地义勇军的配合下，又攻破敌人在诏安官陂北坑的枕头楼据点，使云和诏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在官陂周围的平原地区建立了新的游击区。

奇袭云霄城 1936年8月下旬，中共闽粤边特委在梁山召集红抗第1、第3支队领导人开会，作出了新的军事部署，决定趁敌人倾巢出动“清剿”游击根据地而敌后兵力空虚之机，袭击敌占区云霄县城，以破狱营救被捕党员和革命群众，以及解决部队经费不足的问题；同时进一步达到调动敌人，牵制其进攻游击根据地兵力这一军事目的。

1936年9月3日，何鸣指挥红抗第1、3支队主力500多人担负主攻任务，于拂晓前按计划埋伏在云霄城西门外将军山下的甘蔗园和稻田里准备行动。卢胜率领从部队挑选出来的班排干部和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40多人，组成便衣队，一大早直奔云霄城。他们有的把枪插在柴草中，扮成挑夫；有的

把枪藏在篮子里，装成小贩；有的打扮成阔佬，夹在人群中，陆续潜入城内，其任务是监视敌人和作内应。便衣队进入城后，在向导的带领下分兵两路：连长陈松带领一路秘密包围了敌交通银行，负责取款；一路由卢胜带领把住街头巷尾的有利地形，配合、掩护陈松等人的行动。原定计划上午9点钟开始行动，因一便衣队员在街上买东西时，不慎露出了短枪，老百姓一见就一轰而散。警察发现后见势不妙，急忙喊叫，正要动手，当即被便衣队员“砰”的一声，敌警应声倒地，圩场顿时大乱。

卢胜见此情景当机立断，指挥队员提前行动，组织部分人员迅速占领有利地形，控制街口。陈松带领的一路迅速占领了敌交通银行，经理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交出钥匙，便衣队员顺利地取得了银元和现钞。埋伏在城外的部队听到城里枪声大作，知情有变。何鸣急令2个中队从西门攻城，派特务班和机枪班作掩护，自己率另一部从南门攻城。因敌人已有准备，破狱计划无法实施，在缴获了银元300块、现钞10000元后，何鸣即指挥部队接应入城部队撤出县城。此时，卢胜已率部冲向西门，在接近守敌时，甩出一排手榴弹，在爆炸烟雾的掩护下，敏捷地穿过敌控制地带，冲出了云霄城。奇袭敌人腹地云霄县城的胜利，使敌人大为震惊。敌人不得不将“清剿”的部队从魁仔石山调回。

九十月间，云和诏县第2区农民抗日自卫军四五百人又在泉山东北侧击溃敌1个营，毙伤敌一批，俘敌4人。10月，靖和浦县云和区农民抗日自卫军1000余人配合红军击退进犯之敌，乘胜消灭和拔除了龙田、田贝一带豪绅地主的民团和堡垒。

（四）全面开展对敌斗争

在反“清剿”期间，闽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除了在军事上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反击国民党军的“清剿”外，还采取灵活、巧妙的斗争策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与国民党军针锋相对，全面、广泛、深入地开展反“清剿”斗争。

用集体假“自新”破坏敌人的“移民并村”国民党军在发动向红军游击队“清剿”时，常常强迫根据地的群众签名“自新”，进而组织“移民并村”。农村普通党员和基本群众一时顾虑很大：如若签名，担心将来“肃反”时说不清；如不签，敌人势必实行集体屠杀。针对这一情况，中共闽粤边特委采取特殊的政策和灵活的措施，即允许全村群众一道向国民党搞集体假“自新”（不能以个人或少数人行动），还规定凡是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也可以和群众一起签名

自新。红军游击队则化整为零分散活动，配合地方工作人员，组织工作组跟群众一道“移民并村”，深入敌人据点内发动群众，使群众消除顾虑，和红军游击队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样，国民党用“移民并村”办法把红军游击队隔离开来的图谋就不能得逞。群众常以砍柴、挖笋为名，千方百计地上山和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有时遇到敌人搜山，群众还会通知红军游击队，使其有所准备，采取对策和措施。

积极做争取守望队和壮丁队的工作敌人为了“清剿”红军游击队，往往强迫农民组织守望队和壮丁队。守望队主要任务是负责看守炮楼，壮丁队则配合守望队监视群众和对付红军游击队的活动。中共闽粤边特委利用敌人强迫农民组织守望队、壮丁队的机会，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基本群众参加守望队、壮丁队，使之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种武装组织。潜入到敌人据点内的红军游击队积极做争取守望队和壮丁队的工作，变白色守望队为红色守望队，变敌人的炮楼为“白皮红心”炮楼。一些守望队被争取过来后，以红军游击队名义打土豪，还经常将小股敌人的活动告诉红军游击队。红军游击队则在敌人的必经之路打埋伏，弄得敌人坐卧不安。由于争取了守望队，1936年夏，仅靖和浦五南区内23座炮楼，被红军游击队掌握的就有16座。守望队员晚上集中行动，张贴标语，宣传革命；破坏敌交通、通讯设施；攻击炮楼，骚扰敌营。有时还到敌据点附近放冷枪，扰得敌人日夜不得安宁。敌人若是小部队，守望队就消灭之；若人数多，守望队就迅速派人给红军游击队送情报，让红军游击队歼灭之。当一些守望队的活动被敌人发觉后，红军游击队便将他们带上山，编入到人民抗日义勇军中，将优秀分子充实到红军游击队中。如平和县五南区，由守望队转入抗日义勇军的就有100多人。龙门、龙心等乡村几乎每户都有人参加红军游击队。平和县五南区的党支部从7个发展到12个，赤卫队从400多人增加到2000多人。红军游击队“利用敌人强迫农民组织‘壮丁队’这名义，来广泛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而使之为我们领导下的群众抗日武装。正因为如此，才使敌人不能将我们的党与红军游击队隔绝，更不能控制我们红军活动的自由。”这样，党组织和革命武装得到迅速发展，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天地反而更加广阔了。

采用“两面政权”，反对国民党的保甲制度针对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中

引自《黄会聪关于闽粤边区两年余情况致陈云等转中共中央的报告》（1937年4月20日）。

共闽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对保甲长采取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政策，即争取团结大多数，孤立、打击少数反动分子。具体做法是，通过游击区进步群众去联络各村农民，由各村农民争取不与红军游击队为敌的保甲长。对于少数与红军游击队为敌，残害群众的反动分子，红军游击队则坚决予以严惩。如平和县五南区新寨乡下溪炮楼的联保主任和壮丁队教官，掌握着一个炮楼，控制着周围的村庄，与红军游击队为敌，鱼肉人民，横行乡里。红军游击队就摧毁了下溪炮楼，镇压联保主任和壮丁队教官。对于一般保甲长，红军游击队通过关系转告他们，只要不反对红军游击队，不但保长可以照当，而且可以保证人身安全。由于采取了这一政策，1936年夏，仅平和县五南区的保长就有4个被争取过来。五南区新塘村有一个保长跑到敌人据点后被敌驱赶出来，红军游击队抓住这一时机，把他争取过来后，不但为红军游击队保守秘密，还向红军游击队通报敌情，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即表面上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实际上为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办事。有些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保甲长还由地下党员担任。由于开展了两面政权的工作，国民党推行的保甲制度和“联保连坐法”逐渐失去作用，企图切断红军游击队与群众联系的阴谋也就被粉碎了。

通过创办合作社的方式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针对国民党的全面经济封锁，中共闽粤边特委先后派特委委员何浚、林路、许其伟等人分别到欧寮、三坪、山前、东楼、茅坪等地，用多种集资方式创办苏区合作社，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苏区合作社是属于消费合作社性质，资金来源除由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资助或将部分战利品拨给合作社作为商品外，还有以下几种集资形式：一是经苏维埃代表会议通过，规定每股股金限额，发动群众自愿入股；二是由苏维埃政府派遣赤卫队员到附近地区抓土豪派款；三是完全靠群众自愿认捐；四是向社会人士借资。合作社人员（包括经理、售货员）均由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兼任，而且都是义务性质的。合作社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财务制度和民主办社制度。这种合作社规模虽不大，但货物品种不少，除供应粮食、副食品、日用品和医药用品外，少数合作社还为红军游击队采购枪支弹药和军需用品。合作社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特委、县委机关、红军游击队和地方游击队，还有后方的一些单位如印刷厂、被服厂、医疗所、修械所、看守所等，同时也为广大群众服务。闽粤边特委在游击区内创办了诏安县的马东乡消费合作社，平和县的石门、东楼、欧寮、三坪、山前、茅坪合作社，漳浦县的车本、龙岭、小山城合作社和南靖县科岭、坑下合作社等。这些合作社的物资来源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办法：一是利用地下交通站将物资从白区暗中绕过敌人关卡而运出；二是委托白区的亲友秘密采购，然后按约定的时间地点交接，再绕过敌人关卡运回；三是鼓励外地商人小贩把物资运进根据地，合作社给予一定的利润或报酬；四是利用华侨、侨眷、大商人的身份做掩护，秘密将购好的物资运进来。合作社要将所需要的物资运进根据地，这在当时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不少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为此历尽千辛万苦，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随着新的游击区的开辟，特委还组织了一批以货郎担流动串乡走户为主要形式，带有“游击”性质的新型的流动合作社，这些货郎担对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军民的物资供应，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创办合作社是闽粤边军民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和敌人开展经济斗争的一个创举。它几乎动员了根据地内部各个阶层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度难关，有效地打破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保障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和工作，为巩固根据

地，坚持游击战，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这一点，坚持三年游击战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以文艺为武器，配合反“清剿”斗争针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中共闽粤边特委除了定期发行《工农报》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外，还以文艺为武器，积极开展白区工作，这是闽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不同于其他游击区的一个显著特点。特委领导下的漳州工作委员会（简称漳州工委）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作为后盾，除在城市领导学生运动、职工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外，还领导活跃在白区的芗潮剧社、龙中师剧社、毓南剧社、南靖民众剧社、平和小溪熊火剧社等文化团体，高举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大旗，以话剧等文艺形式为武器，英勇战斗，成为党在白区工作的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有力地配合与支持了游击区反“清剿”斗争。

由于同国民党第 80 师针锋相对，开展全面反“清剿”斗争，闽粤边区的游击斗争得到了顺利的发展。特委下辖的靖和浦县委、云和诏县委、潮澄饶县委和漳州工委，共建立 21 个区委，300 多个党支部，发展党员 1500 多名。红军抗日支队和抗日义勇军发展壮大到 2000 余人。同时，边区共有农民抗日自卫军 7000 多人，拥有抗日救国会和农会会员 30000 多人。两年中，红军游击队与敌作战 1000 多次，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摧毁敌堡垒 130 多座。游击区“周围横长约有五六百里。北可到漳州城之郊外，南可到广东饶平之浮山、黄岗一带，东可到漳浦、云霄、诏安之海边，西可到平和之小溪、大溪一带”。这一时期是闽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兴盛阶段。

三、抗击敌第三期“清剿”

（一）黄会聪北上寻找党中央

为了发展与其他兄弟游击区联合开展游击斗争，向党中央汇报闽粤边的游击斗争开展情况，争取得到中央的直接领导，1936年10月，特委书记黄会聪在肺病已进入晚期的情况下，毅然决定亲自北上寻找党中央。黄会聪到达上海后，因上海中央局早已被破坏，无法找到党中央。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千方百计寻找联系党中央的线索，最后在上海抗日团体的帮助下，取道北平找到中共北方局。本想亲自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可是这时他的肺病严重发作，在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北上延安的情况下，为了使党中央及时地了解闽粤边区革命斗争情况，取得党中央的帮助，黄会聪忍受着病魔带来的极大痛苦，吃力地写下了25000字的报告，详尽地汇报了闽粤边区的情况。当他写完报告交给交通员带往延安时，他的生命已处于垂危之际。党组织为了挽救黄会聪生命，把他转送到香港治疗，经医治无效，不久在港逝世。

黄会聪，海南岛万宁县人。1909年出生。1925年远渡重洋到马来亚做苦工，受尽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在马期间，他参加了华人创办的工人夜校学习，广泛接触工人群众和进步人士，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教育，参加了当地的工人运动，逐步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在海外参加了共产党。三十年代初期，他回到祖国，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到厦门中心市委工作。以后一直在厦门、泉州一带，从事党、团以及农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的工作，做出了卓越的成绩。1934年，黄会聪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了中共闽粤边区特委书记，在国内外形势多变，国民党军队重兵“清剿”的情况下，以其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信念，敏锐的政治嗅觉，坚强的斗争意志和毅力，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率领闽粤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英勇战斗，浴血奋战了三个春秋，为闽粤边区的开辟和巩固，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和壮大，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在黄会聪北上寻找党中央的同时，红5支队在李金盛、刘炳勋的带领下进入潮澄饶游击区，由于领导思想麻痹，白天行军暴露了目标，在饶平县的牛皮洞和苦竹坑两处连遭国民党军袭击，部队伤亡惨重。鉴于此次行动未向特委请示，又未与潮澄饶地下党联系，造成重大损失，特委决定撤销红5支队支队长李金盛、政委刘炳勋的职务，派邱金声任支队长。稍后，红5支队并入红1支队。

（二）红军游击队反“清剿”斗争的起落

蒋介石使用分化利诱手段平息了“两广事变”后，1936年10月，又调集粤军第157师黄涛部和第158师一部进驻闽粤边区，向闽粤边游击区发动第三期“清剿”。粤军157师师部驻漳州城，471旅共3个团7000余人，加上158师一部和广东、福建两省保安团、地方民团，总兵力达10000余人。国民党第三期“清剿”的特点是：（1）分割包围。国民党军首先把靖和浦、云和诏和梁山等游击根据地分割成互不相连的若干小块，配合地方反动武装，层层设防，步步紧缩，形成紧密的小包围圈，使红军游击队失去回旋余地。（2）大兵团作战与“游击对游击”战术并用。国民党军集中优势兵力寻找红军游击队决战，把“驻剿”、“搜剿”、“追剿”、“堵剿”各种战术一并用上，又以奔袭、夜袭等游击手段对付红军游击队的活动。（3）打埋伏，断交通。国民党军把“清剿”部队分成若干小分队，到处设伏，捕捉闽粤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地下交通员，切断红军游击队的交通线，妄图陷红军游击队于绝境而消灭之。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三期“清剿”，中共闽粤边特委决定充实和加强县委及游击队的领导，撤销了靖和浦县委，分别组建以吴庭坚为书记的漳浦县委和以林路为书记的平和县委。红抗第3支队参谋长也由闽西红8团参谋长王胜担任。紧接着，乘“清剿”之敌立足未稳，红抗第3支队第1、2两连在漳浦先后袭扰了驻霞美、刘坂、杜浔、院前、屿头、旧镇、溪头等地的157师驻军和张锡九反动壮丁队，共毙伤敌160多人，缴获步枪80多支，摧毁敌炮楼5座。从而发展并巩固了龙潭、后井、眉田、巷内、黄埔、过洋、路边、徐坎、院前等游击根据地。12月，红抗第3支队在云霄马铺圩石字村，伏击157师1个团，毙伤敌50多人。同时红抗第1支队和第3支队第1连在云霄车仔圩战斗中，打败了157师1个营。1937年1月，红抗3支队分两路出击：一部袭击南靖县程溪塔潭反动据点，毙敌40多人；一部在九龙岭南侧与马口桥之间，伏击157师1个连，歼敌2个排，缴机枪1挺，步枪30多支。

在这期间，闽粤边区的游击战争正处在胜利发展阶段，不仅红军游击队活动区域广阔，而且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但是，特委新的决策人面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上的敌我态势缺乏客观的估计，对157师中下层官兵的抗日情绪期望过高，在粤军157师的分割包围下，交通线不断遭到敌人破坏，红军游击队无法迅速集中，分散在各处的队伍均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红抗第3支队第1连在南靖坪山歼敌1个班后，遭敌追击，损失很大。红抗第3支队第3连在竹湖山被敌1个营包围，仓促应战，激战一天，撤到水晶坪时，失散了30多人。同时，红抗第3支队第1连在平和西崎头与敌遭遇，战斗中伤亡不少。此后虽有红抗3支队一部袭击梧坡壮丁队驻地，俘敌队长李湖北，红抗1支队袭击诏安盐务局、云霄梨仔坑等几次战斗的胜利，但都未能改变被动局面。尽管如此，由于红军游击队的苦斗，国民党限期“剿灭”红军游击队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四、谈判改编中的斗争

（一）特委作出同国民党谈判的决定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后，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被迫同意联共抗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闽粤边地区同全国各地一样，抗日呼声遍及城镇乡村，救亡运动深入各阶层群众。但是国民党蒋介石推行“北和南剿”反动方针，对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仍在继续“清剿”。因此，中共闽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一方面要坚决抗击国民党新的军事“清剿”，一方面要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获悉和掌握党中央的策略方针。

1937年2月，特委代理书记何鸣在平和县山内通过“白皮红心”保长收集了大量的国民党报纸，从中获悉了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党中央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主张的消息。在急剧变化的形势面前，特委及时召开了扩大会议，分析了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的形势，研究作出向粤军157师及国民党当局建议“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一致对外”的决定。并派由厦门市委来特委工作的尹林平前往香港，向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汇报特委的这一决定。同时向国民党157师及当地国民党政府领导人写信，申明红军游击队愿意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的主张。

4月上旬，尹林平带回来《中共南委给闽粤边区特委的指示信》。南委在信中指示：闽粤边区应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改为“红军、粤军联合起来一致抗日，保护福建或闽南”，并加紧争取同驻闽粤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协作谈判。对于谈判的内容，应在“不干涉政治上的活动与组织上的存在和发展，及宣传鼓动与批评自由”三原则下提出：（1）红军游击队停止游击活动；（2）红军游击队的名称可改为民族自卫军或抗日讨贼军，在抗日行动中可受粤军指挥；（3）在未得到中央红军调动集合命令以前，在原地驻守，双方不得侵犯；（4）在对日作战进入友军区域，红军给养能得到保障，红军不干涉友军地方的一切行政事务，并遵守友军一切关于社会法律的命令。

闽粤边特委在接到南委的上述指示后，即致函国民党157师，提出互派代表进行谈判的建议，正式向闽粤边的国民党军队提出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主张。在此期间，特委在漳州、厦门、石码、龙溪、漳浦、诏安、汕头等地，建立起抗日救亡组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二）同国民党谈判与“6.26 政治协定”的签订

在粤军 157 师表示接受中共闽粤边特委关于“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谈判建议后，1937 年 5 月中旬，特委派印刷部负责宣传、印刷工作的卢叨（化名王祥）为谈判代表，与 157 师谈判代表、连长伍笃祺在平和坂仔郭村会谈，双方各自阐明观点，但未达成任何协议。5 月下旬，157 师钟定天营进犯平和游击根据地时，写信给卢叨，约定谈判日期，表示“进攻不忘谈判”。由于发现国民党军正在向特委驻地平和县山内开来，特委当天开会讨论，认为 157 师重兵压境，对方没有谈判诚意，为安全起见，决定将特委机关和部队分三路分散转移。当天，何浚、尹林平、王胜带部队分两路转移。何鸣认为自己熟悉地形，不需要部队保护，也可以在平和山内与敌周旋，于是只带特委机关、政工、后勤、警卫员等 10 多人转移。26 日夜，当何鸣等人在白沙村做饭时被 157 师发现包围。27 日黎明，何鸣派卢叨以谈判代表身份与 157 师交涉无效，157 师捕去何鸣在内的 12 人。何鸣被捕后，据理抗争，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主张。特委得知何鸣等人被捕后，一面任命张敏为代理书记，一面向 157 师提出严正抗议，积极设法营救何鸣，同时宣布他为谈判代表，指斥 157 师包围闽粤边特委机关、捕捉特委领导人是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行为。在特委的抗议和广大群众的抗日呼声压力下，加之 157 师企图通过谈判改编红军游击队，于是，157 师被迫释放了何鸣等人。谈判继续进行，斗争的焦点主要是围绕部队集中地点的问题。何鸣回来时，带来了 157 师提出的要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到漳州、厦门集中的谈判条件。特委认为漳州离游击根据地较远，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没有接受，坚持红军游击队驻平和游击根据地附近，谈判双方争执不下。随后，157 师提出要闽粤边红军游击队进驻漳浦，对此特委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有的认为，漳浦东南靠海，可以向沿海发展，有一定发展前途；有的主张部队可以驻漳浦城南附近的溪南、下布和后港、口德、刘板、盘陀一带，这里靠近游击区，倘有意外，部队可以及时撤回。因为意见分歧，特委一面派尹林平去香港请示南委，一面要何鸣继续到 157 师师部交涉。在尚未获得南委指示的情况下，何鸣在谈判中却擅自答应了 157 师要闽粤边红军游击队进驻漳浦县城关孔庙的条件。为此，特委即在高坑召开扩大会议，对何鸣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但最后还是同意将部队带到漳浦城内集中。

1937 年 6 月 23 日，特委发表《告闽南同胞书》，呼吁：“在此民族危机的紧迫关头，无抗日不能生存，无联合不能抗日。”“只有不分党派，不分信仰，废除成见，停止一切内争，集中全国人才抗日，才能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号召闽粤边军民“为祖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自由民主而战！”《告同胞书》还主动提出拟将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抗日第 1、3 支队及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 月 26 日，特委代表何鸣与 157 师代表陈浚在漳州正式签订了合作抗日的“6.26 政治协定”。其主要内容为：红抗第 1、3 支队和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 157 师指挥；中共闽粤边特委在不推翻现政府方针下，有宣传、组织、独立自由批评之精神；在 157 师防区内共同组织与保证民众爱国运动自由；停止封锁游击区；释放被捕之红军人员；红军所抓之土豪也尽行释放等 11 项协议。

“6.26 政治协定”是南方各省游击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地方当局最早签订的合作抗日协定。这个协定反映了中共闽粤边特委对中共中央和南委关

于合作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示精神的积极贯彻执行；它适应了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和广大群众要求停止内战、守土抗战、保家卫国的愿望。但是，在部队集中地点这个关键问题上，特委领导在思想上丧失警惕性，没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迎合了国民党 157 师的要求：没有认识到国民党欲借谈判改编名义，消灭红军游击队的企图。这是特委领导人思想上右倾麻痹的表现，为后来“漳浦事件”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三）“漳浦事件”、“月港事件”及其教训

1937年7月初，根据“6.26政治协定”，闽粤边区红军游击队约1000人，在平和县小溪集中，改编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何鸣任大队长，王胜任参谋长。大队下辖7个连和警卫、电话、军医、宣传4个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157师借口部队要集中训练，要保安独立大队开往漳浦县城集中。此时，尹林平和南委全权代表姚铎来到小溪。姚铎传达了南委关于“部队番号可以改变，政治上要保持独立，要提高警惕，要住在基点内”的指示。何鸣却一再强调抗日战争已经开始，南委的指示不符合闽粤边的实际。当时对部队是否继续开往漳浦县城的问题，特委内部意见再度出现分歧。特委及不少红军游击队指战员，自“6.26政治协定”签订以来，从漳浦县委在下布村开会，遭157师2个连的包围袭击，平和县委又遭地主反动民团进攻等一连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挑衅事件中，已经看到了部队进驻漳浦县城的危险性。在这个关键时刻，南委代表姚铎在无法说服何鸣的情况下，让部队在小溪就地待命，只身回香港请示南委，但却未及时返回。保安独立大队在小溪驻扎10天，在没有得到南委指示的情况下，何鸣又擅自下令将保安独立大队于7月13日开进漳浦县城。在这期间，国民党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由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下令157师收缴红军游击队枪械。157师慑于全国抗日呼声高涨，未敢贸然行动。7月14日，粤军总司令余汉谋到达漳州，对157师施加压力。7月15日，余汉谋和157师师长黄涛、参谋长张光前等乘专机抵福州与陈仪密谋。张光前连夜下令157师李崇刚旅在漳浦县城布置三道防线，做好收缴保安独立大队枪械的准备。16日晨，157师2个团埋伏在漳浦城体育场四周，以点名发饷为名，要保安独立大队到体育场集中。当保安独立大队近千人进入体育场后，已被157师重兵包围。157师第471旅参谋主任陈英杰，以保安独立大队刚下山，不懂战术，先训练一个时期为借口，要保安独立大队上缴武器。陈英杰指着体育场四周露出来的黑黝黝的枪口，要红军游击队领导人考虑。红军战士见此情景，人人义愤填膺。有的战士把国民党发的衣服、帽子撕得粉碎。有的战士气得当场晕倒在地，许多人打开了枪栓，压上子弹，准备拼一死战，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何鸣在向157师抗议无效的情况下，为避免近千名红军游击队员流血牺牲，只好下令保安独立大队放下武器。计被缴去重机枪2挺，轻机枪5挺，驳壳枪200余支，步枪500余支，子弹10万多发。这就是国民党不顾国难当头，蓄意制造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漳浦事件”。

就在“漳浦事件”发生的同一天，国民党顽固派又趁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张敏在诏安县月港村召开云和诏县委扩大会议之机，密令福建省保安团派出1个武装连，在团长沈东海的亲自率领下，分兵从丘田过石溪两路直扑过来，把月港村团团围住。在敌人离村还有一里多路时，已有群众前来向张敏报告这一敌情。可是，由于张敏思想上放松了对敌人的警惕，缺乏应有的戒备，以至敌人进村包围了会场，开枪打死了云和诏县委领导罗贵炎和打伤了其他3人时，张敏还没有采取措施组织还击和突围，结果张敏与云和诏县、区级干部12人被捕。尽管张敏等在狱中进行过无数次的强烈抗议，临就义前还面对屠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的滔天罪行，但刽子手们仍将张敏等12人杀害于诏安良峰山麓，制造了又一起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月港事

件”。

“漳浦事件”与“月港事件”的发生，使闽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中边区党与红军游击队遭到极大的挫折和损失，也是何鸣、张敏等领导人思想右倾麻痹，忽视了对国民党军队中反共一面的警惕，没有坚定执行党中央和南委的指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没有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的直接结果。这是闽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中一个极为沉痛的教训。

“漳浦事件”、“月港事件”发生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和各地党组织相继在党内和对外报刊上发表宣言、文章，将“漳浦事件”详情公布于世，抗议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破坏抗战的罪行，揭露他们制造磨擦，继续挑动内战的阴谋。党中央书记处、毛泽东等对“漳浦事件”的发生十分关注，一再表示，国民党如不交还何鸣部的人枪，南方红军游击队不予集中改编。在要求国民党交还闽粤边区红军游击队人枪的同时，中共中央还告诫南方各游击队，要以“漳浦事件”为教训，在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漳浦事件”的发生，为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谈判，实现国共合作抗日，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四）组成新特委，重建红3团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漳浦事件”、“月港事件”，妄图消灭闽粤边红军游击队。但有着高度政治觉悟和坚强革命意志的红军游击队指战员，并没有因“漳浦事件”、“月港事件”的挫折而屈服。在“漳浦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在保安独立大队副大队长卢胜、参谋长王胜等带领下，红军骨干80多人连夜潜出县城。第二天，又有100多名红军干部、战士，克服种种阻力，冲破重重罗网，逃脱了敌人的魔掌。这些突围出来的红军指战员，在漳浦县溪南、石楼、下布等地党组织的积极配合下，先后到达漳浦下布的清泉岩集中。卢胜、王胜和何浚、朱曼平等人会合后，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今后的对策。会议决定成立新的闽粤边特委，何浚任特委书记，林路任组织部长，朱曼平任宣传部长，卢胜、王胜、卢叨等为委员。接着，突围出来的同志，由特委进行整编，重建革命武装，仍称红3团，卢胜任团长，王胜任参谋长，下编1个连，指战员共100多人。新建成的红3团从靖和浦游击根据地、乌山游击根据地取出保存在山洞里的枪支和银元，分兵5路，开赴魁仔石山、乌山、山内、狮头山、南乡等地，筹集枪支，解决给养，进行斗争。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为帮助闽粤边区恢复发展游击战争，于9月底派谭震林率领红9团1个加强排，到闽粤边配合红3团开展游击战争。10月，红3团改编为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3支队。同月，红3支队在云霄县仙石、四近塘抗击福建省保安团及地主武装500多人的围攻。3支队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毙伤敌30余人，缴获步枪26支，子弹300余发。“漳浦事件”后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闽粤边区广大军民。游击区群众竞相传呼，奔走相告：红军还在！特委还在！到1937年底，原红3团、独立营老战士归队者近200人，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发展到300余人。

（五）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重建后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一方面严密戒备，防止敌人利用谈判搞突然袭击，对敢于进犯的敌人，坚决实行自卫还击的原则；另一方面，深入开展“合作抗日”的群众运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广泛的合作抗日的社会基础。社会舆论更进一步地同情和支持闽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斗争。在闽粤边红军游击队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形势下，在中共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多次严正抗议和积极交涉以及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交还了“漳浦事件”中缴去的部分枪支。12月25日，中共闽粤边特委和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3支队发出《为反对内战告全闽南同胞书》，严正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救亡的种种罪行。同时进一步呼吁国民党军政当局及社会各界人士切实合作，一致抗日。

1938年1月，根据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指示，中共闽粤边特委改为中共漳州中心县委，何浚任书记，归中共闽粤赣省委领导。同月，谭震林到平和县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闽粤边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的指示。2月，400多人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正式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2支队第4团第1营，卢胜任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团团长。1938年3月1日，闽粤边红军游击队与闽西兄弟部队一道从福建龙岩白土出发，开往苏皖前线，踏上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征途。

第六章 皖浙赣边游击区

皖浙赣边游击区，位于安徽、浙江、江西3省边界地区，是由闽浙赣苏区演变而成的。闽浙赣苏区，发端于1928年1月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领导的赣东北弋（阳）横（峰）农民起义，随后开创了赣东北苏区。1930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将闽北苏区划入赣东北，并决定在赣东北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1931年中共赣东北（信河）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升格为赣东北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后来随着苏区范围的扩展，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皖南党组织划归中共闽浙赣省委领导。1933年1月红10军奉命开往中央苏区后，闽浙赣苏区又在赤色警卫师基础上组建了新的红10军。

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唇齿相依，兴衰与共。随着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两个毗连的苏区迅速发展壮大。闽浙赣苏区鼎盛时期，其范围扩展到闽浙皖赣边界的数十县。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闽浙赣苏区逐渐演变为游击区。后来以关英为书记的闽浙赣省委领导中心由赣东北转至皖赣边境的鄣公山地区，省委遂易名为皖浙赣省委，游击区的名称亦改称皖浙赣边游击区。自1936年4月，省委将领导和斗争重心转移到鄣公山地区后，逐渐地摆脱了由苏区变成游击区时的困境，进入了大发展时期。省委所辖地区，由原先各自独立支撑的赣东北、皖赣、皖南等游击区，发展成为省委统一领导下的赣东北、皖赣、浙皖、上浙皖和下浙皖等5个游击区。红军游击队以边区内的鄣公山、磨盘山、怀玉山和黄山等山区为依托，活动范围包括安徽的休宁、歙县、祁门、黟县、太平（今黄山市）、石埭（今石台）、绩溪、广德、青阳、贵池、至德（秋浦）、东流（今与至德合并为东至）、泾县、旌德、宁国、宣城、郎溪；浙江的开化、淳安、遂安、于潜（今属临安）、孝丰（今安吉）、衙县、寿昌（今属建德）、昌化（今属临安）、江山、常山；江西的弋阳、横峰、德兴、婺源、上饶、万年、余干、乐平、余江、贵溪、浮梁（今景德镇）、玉山、鄱阳、湖口、都昌、彭泽等43个县，共7万余平方公里。1937年春，斗争形势恶化，加之省委领导的失误，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遭到挫折，游击区进入极其艰难的时期。同年冬，通过谈判斗争，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合作抗日协议，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踏上抗日征途。

一、红10军团的失败与闽浙赣省委的战略转变

（一）红 10 军团的组建与苏区领导成员的调整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后，闽浙赣苏区顿失后盾，斗争形势日趋恶化。当时尾追红 7 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围剿”闽浙赣苏区的国民党军共约 20 个师（旅），平均每师近 9000 人，而闽浙赣苏区红军主力红 10 军和红 30 师连同军区独立团，只有 5000 余人，加上 11 月 1 日抵达赣东北德兴根据地的红 7 军团（由出发时的 6000 人减到 3000 人），也只有 8000 余人，抵不上敌军 1 个师的兵力。敌我兵力对比是 20 比 1。而且苏区所属的赣东北、皖赣、皖南等根据地已被敌人分割隔绝，面临遭敌各个击破的危险。

为了挽救危局，闽浙赣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军区政委聂洪钧于 11 月 2 日致电中革军委和中共中央负责人，建议由闽浙赣军区统一指挥红 7 军团。电文称：“现闽浙赣环境甚严重，为保卫并开展闽浙赣皖一片苏维埃区域，7 军团须依托闽浙赣苏区，向东北突击敌人德化堡垒线，开展在敌人侧后方的反攻，配合野战军粉碎敌人‘围剿’”。“7 军团直属军委指挥系统，为使 7 军团行动（与）保卫、发展闽浙赣皖苏区任务密切地联系起来，配合野战军进行总战略意志，我们意见还是受闽浙赣军区统一指挥更为适宜。军委指挥 7 军团，还是经过军区，军区自得保证军委命令执行。”11 月 4 日，中革军委电示项英、方志敏及闽浙赣军区和红 7 军团首长：“7 军团已进入赣东北苏区，7、10 两军团立即合编为 10 军团。7 军团编为 19 师，暂辖两个团；10 军团编为 20 师，辖 3 个团，军团部兼 20 师师部。10 军团长由刘畴西担任，乐少华任政委。寻淮洲任 19 师师长，聂洪钧任政委。刘、乐并兼任 20 师师长、政委。”“洪易留赣东北为党委书记，志敏为军区司令员，洪易兼政委。”关于红 10 军团组建起来后的任务和指挥关系，指示电规定：“1. 19 师于整理后应仍出勤于浙皖赣边新苏区，担任打击‘追剿’的敌人与发展新苏区的任务；2. 20 师仍留老苏区执行打击‘围剿’敌人与保卫苏区的任务；3. 两师执行各（自）任务时，统受军区、军团指挥并求协同动作。军区及新组成的 10 军团统受中央军委项司令员指挥，省委亦受中区分局领导并即由中央分局、军区依此电达方针，规定其具体布置”。闽浙赣军区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完成红 10 军团整编后，鉴于苏区形势进一步恶化，于 11 月 17 日电告朱德、周恩来、项英并转博古：军区决定红 19 师于 18 日晚通过封锁线，挺出浙西南江山、衢州地区，以调动敌人。如敌人不被大的调动，而继续进逼赣东北中心区时，红 10 军（20 师）亦拟跳出包围圈，在闽浙赣边区域内创造新的游击区。

11 月 18 日，中央军委司令员项英电示方志敏、曾洪易、刘畴西、乐少华、寻淮洲、聂洪钧：根据目前闽浙赣形势，红 20 师留在苏区活动将受限制与不利，两师分散行动亦不能有利地打击敌人与顺利地创造新苏区。为有利地保卫闽浙赣苏区，以调动敌人，创造新苏区，壮大红军，决定红 10 军团全部立即从玉（山）常（山）间挺出浙赣铁路以北，首先活动于开（化）遂（昌）衢（县）常（山）间，并以一部积极破坏铁道，威胁衢州，调动闽浙赣敌人。集中（红军）主力，以运动战消灭敌，以创造皖浙边苏区。为了领导红 10

指中央红军。

应为红 10 军。

军团与创造新苏区，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等 5 人组成军政委员会，并以方为主席，随 10 军团行动，军区、省委仍留闽浙赣苏区。指示电还强调：“行动须迅速，不宜再迟延”。

根据项英指示，闽浙赣军区决定，红 19 师按计划于 18 日晚开始行动。部队由师长寻淮洲、政委聂洪钧和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从上饶县的姜李村出发，先行向皖浙边进击。

鉴于闽浙赣苏区主要领导人方志敏和主力部队行将出征，苏区党政军组织须作调整，以便就地坚持斗争。省委于 11 月中旬在横峰县枫树坞村举行会议。由于省委书记曾洪易思想右倾，散布悲观、逃跑论调，已丧失威信，省委会议由省委常委、军区司令员、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主持。会议对曾洪易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斗争，并决定令其停职反省，由省委组织部长关英代理省委书记。同时决定由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余金德主持省苏维埃政府工作；原红 10 军代军长唐在刚代理闽浙赣军区司令员。会议还决定闽浙赣省党政军领导机关由德兴转移到弋阳、横峰、德兴 3 县交界的磨盘山区，领导闽浙赣苏区军民坚持斗争，等待红 10 军团胜利回师，恢复失地。

（二）红 10 军团的出征与挫折

寻淮洲、聂洪钧等奉命率红 19 师先行出击。1934 年 11 月 18 日晚通过封锁线，按计划向浙赣边的玉山、常山地区进军。当部队到达玉山之周村街时，中央军区电令红 19 师转向闽浙边。红 19 师领导考虑到闽浙边山高岭僻，人烟稀少，粮食缺乏，特别是没有地方党组织，难于开展局面，而且政治影响也小；如果转向闽东或闽北根据地又会将大批敌兵引到苏区，增加这两个苏区的困难。于是经请示中央军区同意，将战略行动方向转向北面的浙皖边。那里不仅地理条件优越，而且物产富庶，人口稠密，特别是有皖南党组织和游击区作依托，如果主观指导上不犯严重错误，开创新局面是完全可能的。

11 月下旬，红 19 师地出乎敌人意料突然转兵浙皖边。敌浙江保安纵队副指挥蒋志英急率两个团尾追，受到红 19 师坚决回击。蒋志英负伤败退常山。红 19 师缴获颇多。接着，红 19 师经衢县上方镇，北渡新安江，进抵分水（今属桐庐）地区，并于距分水 5 公里之转山浦击溃敌王耀武部，进而逼近昌化、临安，震动了浙江省会杭州。随后折向皖南，经歙县、绩溪附近，于 12 月 6 日一举攻克旌德县城。在这期间红 19 师与皖南特委及皖南游击大队会合。为了加强地方武装，由红 19 师抽调 1 个连队与皖南游击大队合编为皖南独立团，全团共 600 余人，归皖南特委领导。红 19 师在旌德县城稍事休息后，经泾县、宣城间北上，于同月 9 日抵达黄山地区，以迎接军团部和红 20 师部队。

红 10 军团领导机关和红 20 师，遵照中央军区命令，继红 19 师之后，转向外线。在部队转移前，方志敏下令，将在肃反中被囚禁的“嫌疑犯”近千人全部释放归队，随军行动。11 月下旬，红 10 军团部和红 20 师，在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及军团参谋长粟裕等率领下从赣东北苏区德兴县的重溪出发，向皖南进军。12 月 7 日抵达皖南龙湾，9 日在休宁监度全歼敌第 49 师 1 个营，俘敌 100 余人，缴汽车 4 辆，迫击炮 3 门，重机枪 3 挺和数以百计的步枪及大批弹药。同月 11 日在黄山东南的方平县汤口地区与红 19 师胜利会师。此时，蒋介石委任浙江省保安处长俞济时为“追剿队”指挥官，统率第 49 师、补充第 1 旅、第 7 师第 21 旅和浙江保安纵队一部，分多路追堵红 10 军团，企图一举歼灭之。

为了粉碎敌人阴谋，红 10 军团决定寻找有利战机，先击破其一路。12 月 13 日，红 10 军团沿屯溪至青阳公路向北转移，经乌泥关进到黄山东麓的谭家桥地区时，获悉各路敌军距离尚远，唯尾追而来的敌补充第 1 旅已抵达汤口，并继续逼近红 10 军团，显得特别突出。敌人这支部队是王耀武率领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共 3 个团，装备较好。红 10 军团两个师 5 个团，兵力与敌人差不多。唯装备不如敌军，但地形对红 10 军团十分有利，如指挥得当，有胜利把握。乌泥关是一个山隘口，东侧有一个制高点，向北一路小山坡。红 10 军团首长决定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两侧有利地形，以伏击战给王敌以有力打击。军团的作战部署：从乌泥关起，沿公路两侧自南而北，按第 19、第 20 师顺序设伏。长于野战的红 19 师配置在上峰，其中以 1 个连控制乌泥关制高点，主力部署在乌泥关以北。红 20 师以 1 个营从正面构筑工事，坚守谭家桥。计划待敌通过乌泥关，进入伏击地域后，红 19 师部队即行封锁乌泥关口，断敌退路和阻击可能增援之敌；红 20 师会同红 19 师部分兵力对敌拦腰出击，将其大部歼灭于伏击圈内。

12 月 14 日上午，当敌补充第 1 旅进入设伏区时，红 10 军团突然发起攻

击。敌猝不及防，顿时大乱，惊慌失措。敌前卫团长被击伤，其部队呈动摇状态。然而敌主力在一阵惊慌过后，立即调整部署，集中优势兵力反击火力较弱的红 20 师。红 20 师指战员英勇拼杀，但因不善于野战，红 19 师又因地形限制支援不及，以致阵地被敌人突破。寻淮洲等指战员身先士卒，勇猛冲击，终未能挽回败局，不得已全部撤出战斗。此役给敌军以重大杀伤，但红 10 军团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伤亡 300 余人，其中，包括团长黄英特等阵亡，红 19 师师长寻淮洲、军团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参谋长粟裕等负伤。寻淮洲因伤势严重，在转移途中牺牲，时年仅 22 岁。

谭家桥之役，是红 10 军团全部转出外线作战的第一个战斗，首战失利，愈加被动。为了减少指挥层次和充实作战单位，在谭家战斗后，军政委员会决定将红 19、红 20 两师改编为 3 个足营制的名义师，战斗序列为第 19、第 20、第 21 师。19 师由王如痴任师长，聂洪钧任政委；20 师由刘畴西、乐少华分别兼任师长、政委；21 师由胡天桃任师长。3 个师部队直属军团部指挥。

12 月 18 日，红 10 军团转至太平县（今黄山市）苏区柯村休整。在这里，方志敏召集皖南地方党政干部会议，指示将苏区立即转变为游击区，同时决定抽调红 10 军团侦察营充实皖南独立团，任命原侦察营营长熊刚为团长，太平中心县委书记刘毓标为政委。独立团的主要任务是在皖南特委领导下，以黄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为了加强地方党领导，军政委员会还决定将聂洪钧留下做地方工作，担任皖南特委书记。

红 10 军团在柯村休息了几天，敌追兵又至，方志敏等即率部向石埭、太平、东至、祁门、休宁一带地区转移。敌第 49 师、补充第 1 旅、第 21 旅及地方部队共近 20 个团的兵力，蜂拥而来追堵红 10 军团。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红 10 军团从 1934 年 12 月下旬至 1935 年 1 月下旬，在皖南和皖浙赣边的泾县、太平、青阳、石埭、黟县、休宁、祁门、屯溪、歙县、绩溪、婺源、开化等 10 余县，往返转移，先后进行大小战斗 10 余次。这些战斗大都是采取正规军打运动战的战法，多半是消耗战，虽然给予国民党军以相当的杀伤，但红 10 军团自身也付出很大代价。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红 10 军团处境日趋险恶。当务之急应是迅即转变战略方针，即由正规军转变为游击队，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在皖浙赣边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游击根据地，以坚持长期斗争。但由于军团领导思想上对这一战略转变未能达到共识，有的领导人对部队分散游击顾虑重重。

为了摆脱进军皖南的困境，红 10 军团领导于 1935 年 1 月 10 日决定率领部队南下，经化婺德苏区，返回闽浙赣老苏区。当部队抵达浙江开化县的大龙山王板、徐家村地区时，连遭国民党军 3 次阻击。这时，国民党“追剿队”全线南下，追击红 10 军团。另有驻赣东北的第 21、第 56、第 57 师，独立第 43、第 36 旅和总预备队封锁皖浙赣边界；驻皖南的第 64、第 65、第 78、第 88 师和安徽保安团等控制皖南和皖浙边地区，陷红 10 军团于重重包围之中。

红 10 军团在冲破敌人几次阻击后，于 1 月 12 日抵达化婺德苏区东北边缘的杨林（今属开化县）。方志敏、粟裕等率领的包括军团机关人员和乐少华、刘英等伤病员在内的先头部队 800 余人，路经杨林时没有停留，一鼓作

化婺德苏区是闽浙赣苏区北面的一个外围小苏区，位于浙江开化、江西婺源、德兴 3 县边界，直径约 15 公里，周围约 50 公里。

气翻越一个山头，进入化婺德苏区，并前进至靠近闽浙赣老苏区的港头，才停下来休息。刘畴西率领的军团主力至杨林后，顾虑部队疲劳，就地宿营休息，翌日才继续前进。这时敌浙江保安第2纵队第5团，得悉红军行踪，从星口连夜急进35公里，赶到红10军团主力前面，在化婺德苏区东面边缘的王坂、徐家村，占领阵地，进行堵截。红10军团主力在徐家村与敌发生激烈战斗。军团领导见难于正面突破，即组织一部分兵力为掩护，大部队折经南华山、王山村绕道前进，经这一波折，耽误了几天时间，直到15日，军团主力才大部进入化婺德苏区。

鉴于敌情紧急，方志敏于16日经与粟裕、刘英等商量决定，部队立即行动，先头部队先走，同时通知刘畴西率军团主力迅速跟上，要求当天夜晚全部通过敌陇首地段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中心区。是日下午6时，先头部队正要整队出发，刘畴西又派人前来告知：主力已经到齐，但过于疲劳，当晚不能走。为争取时间，以防意外，方志敏令粟裕、刘英率先头部队立即前进。他担心大部队再拖延，便决定自己留下来与主力一起行动。

这时，敌人虽然加强了化婺德苏区与赣东北中心区之间的封锁线，但兵力不足，一般不轻易离开堡垒，尤其是夜晚。当粟裕率先头部队通过封锁线时，山上敌人从堡垒里打枪，但不敢走出堡垒，粟裕派两个战斗班佯攻吸引敌人火力，先头部队加快步伐，迅速通过封锁线，安全到达赣东北苏区磨盘山根据地。

军团主力约3000人在化婺德苏区休息一天后，继续前进。当通过封锁线时，因敌人射击拦阻，即折回去改换方向。因几次改变前进方向，又延误了几天时间，追击的敌军都赶上来了，军团主力遂在怀玉山区陷入敌军重重包围之中。由于长途转移，部队十分疲劳，粮食与弹药消耗又得不到补充，加之严冬季节，雨雪交加，红10军团主力已面临饥寒交迫的绝境。然而，革命战士坚如铁，誓与敌人血战到底。他们在怀玉山区的冷水坑、玉峰、马山、玉龙山等地占领制高点，坚决抗击敌人，血战7昼夜，给敌军以重大杀伤。最后终因弹尽粮绝，伤亡惨重，而告失败。少数幸存者或乘隙回到赣东北苏区，或向北突围折返皖南。刘畴西、王如痴先后被俘，方志敏隐蔽在德兴、玉山两县交界的高竹山中，于1月29日也落入敌手。后来这3位领导人，先后在南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红10军团的失败，有多方面原因。客观上是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主观上主要是囿于“左”的指导方针，未能适时地实行由正规军到游击队、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而固守正规军的大兵团作战方法，同敌拼消耗。此外，在军事指挥上的某些失误，也是造成失败的一个原因。不过，红10军团出征虽然失败了，但在皖浙赣边界地区撒下了大量红色种子。除了有意识地留下一部分指战员在皖浙边界就地坚持斗争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伤病员和在战斗中失散的部分干部战士，散落在边界地区。这些人员，成为日后发展皖浙赣边游击战争的重要骨干。

（三）闽浙赣省委战略方针的转变

当红 10 军奉命出征时，闽浙赣苏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也决定同时转移。1934 年 11 月 24 日，在关英、余德金、唐在刚等率领下，省直机关、部队撤离苏区首府横峰县葛源镇，向横峰、弋阳、德兴 3 县边界的磨盘山区转进。在这前后，位于苏区腹地北面的皖赣分区党政军机关和所属部队也撤离了原驻地江西浮梁县程家山，转向根据地西北部的安徽秋浦（至德）地区。同月 28 日，国民党军第 21 师占领了葛源。12 月，国民党军第 55 师、新编第 7 旅及安徽保安团等数万敌军包围了皖赣分区机关驻地秋浦县大板地区。皖赣红军独立师与敌激战 7 昼夜，终因众寡悬殊而失利，分区机关和独立师被迫转向江西的乐平地区。至此，分区所属苏区大部分变成游击区或沦为白区。这时，赣东北苏区原有的城镇也都落入敌手，特别是红 10 军团出征失利后，斗争形势更是急转直下。1935 年 2 月上旬，闽浙赣省委接中央分局电报，令以返回赣东北苏区的红 10 军团先头部队为基础，组建挺进师，前出浙西南，开展游击战争和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以配合闽浙赣苏区斗争。据此，省委决定抽调红 30 师 1 个团与红 10 军团余部共 500 余人，编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以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立即按中央分局指示行动。这时，赣东北苏区已处于敌军四面包围之中，闽浙赣省委、军区与皖赣、皖南苏区联系也已完全中断。战斗力较强的挺进师又离开苏区，加之原省委书记曾洪易仍在党内外散布悲观失败论调，制造思想混乱，致使形势益发严峻。

正当闽浙赣省委处于内外交困之际，中央分局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立即转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的紧急指示。为贯彻中央指示，省委代理书记关英于 2 月中旬在横峰县的槎源坞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会议首先遵照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的指示，撤销了曾洪易的领导职务，由关英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会议的中心任务是根据党中央关于缩小机关、分散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具体部署赣东北地区的游击战争。经研究决定：1. 将赣东北地区划分为信河、乐河、化婺德 3 个游击区；2. 将机关直属队精简下来的人员编成了 3 支战斗队，由省委领导成员率领，分赴各游击区坚持武装斗争；3. 缩编作战部队建制，部队分散活动。各县独立团（营）缩编为精干的营（连）或游击队，在各县区域内坚持斗争。军区独立团和红 30 师 3 个团，以团为单位分散于 3 个游击区之间开展游击战争。

槎源坞会议落实了党中央的紧急指示，使赣东北苏区实现了由苏区方式到游击区方式，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在此前后，省委所属的皖赣、皖南苏区，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也先后转变了行动方针，所属红军和游击队相继转入分散的游击战争。

曾洪易被撤销职务后不久投敌叛变。

二、闽浙赣苏区的演变与游击战争的开展

闽浙赣苏区所属的赣东北、皖赣边和皖南 3 块相邻的苏区，自 1934 年冬至 1935 年初相继变成游击区后，即被敌人分割隔绝，除赣东北外，都同省委失掉联系。但各区的红军游击队，并没有因此而动摇，他们在所在地区党组织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求生存、争发展。

（一）赣东北游击战争的开展

为了适应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闽浙赣省委将赣东北游击区划分为信河、乐河、化婺德3块相对独立的游击区。信河游击区，包括信江两岸的弋阳、横峰、上饶、铅山4县和德兴县的南部地区；乐河游击区包括乐安江畔的乐平和万年、贵溪3县及德兴的西南部地区；化婺德游击区包括浙江的开化县、赣东北的婺源、德兴3县地区。

1935年2月槎源坞会议后，闽浙赣省委和军区紧接着在横峰的东汪村召开省直机关干部会议，传达省委会议精神。军区司令员唐在刚在会上作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动员报告，同时根据省委会议决定，对省直机关干部进行战斗编队，并从中挑选出60余名干部进行简要军事训练后，编成了3支突击队。3月6日，省委书记关英、少共省委书记邵长河、省政治保卫局局长滕国荣分别带领3支突击队奔赴信河、乐河和化婺德游击区，以加强各游击区独立开展游击战争的领导。

3月间，红30师捉住有利战机，在德兴县黄柏乡围歼国民党军第55师1个营，俘敌40余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随后，师长颜文清、政委刘永祝、军区政治部主任涂振农各带1个团分赴德兴重溪、磨盘山和开化汾河等地区，加强各游击区的作战力量。

4月中旬，关英在德兴苏家村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党政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除省委委员外还有10余县和几十个区的党委书记和政府主席，会议对游击战争的全面开展，进一步作了具体部署，并决定成立中共信河、乐河、化婺德3个特委，分别由余汉朝、程伯谦、邵长河担任书记，会议还决定省委主要负责人分散活动，各自负责指导一个游击区。这样，既加强了各区游击战争的领导，又减小了目标，保证游击战争更加灵活地开展起来。会后，省直机关140人组成的赣东北游击队和关英亲自率领的省直保卫队（短枪队），先后开赴化婺德游击区开展斗争：唐在刚和军区参谋长邹琦率军区独立团开赴信河游击区，与葛源游击队一起，在磨盘山区与敌周旋；余金德率省直机关七八十人组成的游击队，到乐河游击区，会合程伯谦领导的游击队，以贵溪、弋阳、万年3县交界的三县岭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此后闽浙赣省级党政机关基本不复存在，省直机关干部分散于各游击区坚持斗争。

5月中旬，化婺德特委鉴于游击战争的开展，决定成立开（化）婺（源）休（宁）中心县委，赵礼先任书记，同时组建起1支由中心县委领导的游击队，约200余人，邱老金任队长。6月初，开婺休游击队在开化县高田坑伏击浙江保安队，击溃其1个中队，俘敌10余人，缴获步枪20余支，机枪1挺。

由于闽浙赣省委采取正确的方针，加之敌情一度稍为缓和，1935年上半年，赣东北游击战争有所发展。自赣东北苏区中心区域失陷和红10军团失利后，“围剿”赣东北之敌，自以为“大功告成”，加之经年苦战，疲惫不堪，其主力部队遂相继撤离第一线，返回驻地休整，留下与红军游击队继续作对者，多为战斗力较弱的地方保安团队。这在客观上给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以有利条件。红30师部队和各地红军游击队，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频频出击。如葛源红军游击队凭借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于二三月间接连多次伏击小股出动的敌兵，连连得手，弄得敌人惊恐不安。游击队还乘敌人未弄清红军游击队底细，不敢轻举妄动之机，突然袭击葛源敌据点，速战速决，毙伤敌数十人后，立即安全撤出战斗。其他红军游击队也同葛源游击队一样，连

战皆捷，先后拔掉了敌人的一些堡垒和据点，镇压了一批反动的保甲势力，惩治了可耻的叛徒。整个游击区曾一度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形势。

（二）皖赣边游击战争的开展

皖赣边游击区，包括都（昌）湖（口）彭（泽）和江南一贵（池）秋（浦）东（流）两块游击根据地。它是由皖赣边苏区演变成的。

皖赣边苏区正式形成于1934年7月，是闽浙赣苏区的一个分区。党政军机关设在赣东北的浮梁县程家山。柳真吾任中共皖赣分区委书记兼皖赣军分区政委，周成龙任军分区司令员，王丰庆任皖赣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红军独立师政委，王如痴（后匡龙海）任独立师师长。皖赣边红军和游击队共约2200人。1934年冬敌集中优势兵力“围剿”皖赣苏区。分区机关部队为保存有生力量，于12月由浮梁转移到安徽秋浦地区。1935年1月又被迫转至江西乐平县朱家庙。这时，分区委与省委的联系已完全中断。为了摆脱敌重兵“围剿”，改变被动局面，柳真吾在朱家庙主持召开分区委会议，研究斗争策略。会议决定部队分兵游击，领导机关分散活动的方针。具体部署：柳真吾率分区保卫队赴都湖鄱彭地区，王丰庆和独立师师长匡龙海率独立师赴贵秋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分区机关和下属中心县委机关人员分散到乐平、浮梁、婺源一带，转入地下，进行隐蔽斗争。分区委这个从实际出发的决策，适应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严峻形势，使皖赣边斗争局面出现了新的转机。会后，柳真吾、王丰庆等即分别率队奔赴目的地。

2月初，王丰庆、匡龙海率独立师主力向贵秋东地区开进途中，与军分区司令员周成龙不期而遇，并一起到达秋浦姚黄地区，与当地党政干部黄天贵等及他们领导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随后，在秋浦的高山重建贵秋东中心县委，以黄天贵为书记。同时，在姚黄成立祈（门）秋（浦）贵（池）中心县委，黄南山为书记。周成龙、王丰庆决定留在贵秋东地区领导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贵秋东游击根据地。匡龙海率独立师主力，于同月16日由秋浦县姚黄出发，去江西彭泽地区寻找柳真吾。柳真吾于2月间到达都昌地区后，会合了中共县委书记陈开运和少共书记田英。中心县委随即决定以都湖边界的武山为中心建立游击根据地，开展都湖鄱彭地区游击战争。

3月下旬，匡龙海率皖赣独立师主力袭击东流县洋湖镇，歼灭驻镇保安中队，缴获长短枪40余支。在这前后，独立师还给秋浦的姚黄、麻石岗、金村等地的地主武装以歼灭性的打击，独立师的胜利出击，使反动势力深感不安，于是迅速调集兵力进行“围剿”。由于众寡悬殊，独立师几遭重创，到3月底匡龙海等少数人摆脱敌人追堵，到达江西的都昌县望晓源，与柳真吾等会合。为了开创都湖鄱彭游击战争新局面，皖赣分区委于4月中旬决定，在望晓源成立中共都湖鄱彭中心县委，同时组建游击大队，由田英任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匡龙海任游击大队司令员。月底，游击大队在都昌县的侧家山伏击前来“围剿”的望晓源的江西保安团1个中队，歼敌1个分队，俘敌20余人，缴枪24支。复于5月间，在都昌曹炎口再给江西保安团两个大队以重大打击，毙伤俘敌数十名，缴枪50余支。

6月间都湖鄱彭游击大队在张庄战斗中，取得了更大的胜利。张庄位于都昌县大屋地区，是国民党第四区公所所在地，在庄外山上的碉堡里驻有1个保安中队。一天游击大队侦得敌区长请客，邀请保安中队进庄饮酒，游击大队遂迅速出动，埋伏在庄外敌必经之路。当敌兵饭饱酒醉，摇摇晃晃归营时，遭游击大队突然袭击，顿时乱作一团，还未清醒过来，已被歼过半，其余的除少数弃枪逃脱外，全部举手投降。接着，游击队又收拾了留守碉堡的

敌兵。此役游击大队毙敌 30 余人，俘敌 30 余人，缴枪 80 余支。这时游击大队已发展到 100 余人，开辟了以望晓源为中心的都湖鄱彭游击区。

在这期间，贵秋东游击区的开辟，也初具规模。周成龙、王丰庆等领导的党组织和游击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活动范围从秋浦县姚黄扩展到贵池县郑家村、东流县石门口等几十个村庄。同时还先后同原皖赣分区委早先派出的贵秋东游击大队、皖赣游击大队取得了联系，逐步消灭了贵秋东边界的地主武装。为了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和红军游击队建设，贵秋东党组织于 6 月上旬在东流县石门口决定，以贵秋东中心县委为基础，成立江南特委，周成龙为书记，王丰庆、余文先、黄天贵、何少青等为委员。同时，将皖赣独立师余部、贵秋东游击大队和皖赣游击大队合编为江南独立团，杨艳溪任团长，王丰庆任政委，全团 570 余人。特委和独立团的建立，标志着贵秋东新的游击战争局面的开展。

（三）皖南游击战争的挫折与鄣公山游击区的开辟

皖南游击区是由皖南苏区演变而来的。皖南苏区，是闽浙赣省委于1934年秋，派遣部队到皖南与在此间坚持地下斗争的党组织共同创立的一个新苏区。

在第五次反“围剿”后期，闽浙赣省委和军区为了支援皖南农民暴动，先后向皖南派出两支部队。一支由宁春生率领的皖南游击大队（初称远殖游击队），约200余人；一支由倪宝树、李伯钧率领的挺进师，约2000余人。这两支部队到达皖南后，在地方党组织配合下，在太平、石埭、黟县、青阳一带打击地方反动武装，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乡村政权。1934年10月在太平县柯村宣告成立皖南革命委员会，宁春生任主席。从此形成了以柯村为中心长宽约四五十公里的小苏区，此外还有石青太和泾旌宁宣两个游击区。

1934年12月中旬，方志敏率红10军团进入太平柯村休整时，对皖南革命斗争作了新的部署，他指示皖南特委，将苏区逐步转变为游击区，以独立团为骨干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大力发展白区秘密工作。为了加强皖南特委领导，决定由聂洪钧任特委书记，原书记李杰三改任副书记。与此同时，在石青游击区成立江边特委，由随挺进师行动的原闽浙赣省委组织部长王弼任书记。挺进师改为江边独立团，倪宝树、李伯钧分任团长、政委。随后，江边特委领导人吴介唐带领洪维恭、王岐山等和青阳游击队共七八十人抵达泾县活动，并于1935年1月下旬在泾县戴杨村决定成立泾旌宁宣中心县委和游击队，洪维恭任特委书记，红10军团留下作地方工作的李步新任副书记兼游击队政委，王岐山任游击队长。泾旌宁宣游击队成立几天后，首战告捷，全歼宣城县保安队驻溪口分队，缴长短枪20余支。

在红10军离开皖南并遭到失败后，敌人将追堵红10军团的相当一部分的兵力转向皖南，皖南游击区形势日益恶化。为保存有生力量，皖南独立团离开太平柯村中心区，跳到外线，在宣城、旌德、昌化等县与敌周旋。1935年3月江边特委书记王弼等被捕叛变，倪宝树、李伯钧先后投敌，导致江边特委和江边独立团的瓦解，石青太游击区随之变质。与此同时，皖南特委内部也出现了叛徒，致使特委机关和下属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加之这时皖南特委主要负责人聂洪钧、李杰三等已先后前往上海寻找中共中央代表机关汇报工作，其他委员又多被逮捕，特委遂告解体。

在这期间，泾旌宁宣中心县委领导的游击战争取得了初步的进展，在首战溪口告捷后，接着袭击了白果乡国民党乡公所，缴长短枪10余支，并乘胜进军宁国的桃花园、太子宫、大麦坑、小麦坑和施村地区，镇压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后来部队在大王山休息时遭敌袭击，李步新负伤，离队隐蔽养伤，部队由王岐山和中心县委宣传部长王晓南率领，转向旌泾边界的杨壁、涌溪一带活动。到1935年4月间，部队发展到200余人，重返泾县戴杨村与中心县委会合。这时，泾旌宁宣游击根据地已经形成，中心县委下辖国板桥、宣泾边和旌德3个区，并发动群众组织起儿童团，妇女会，

1934年8月，皖南地区党组织发动农民暴动。8月21日，在中共太平中心县委刘毓标等领导下，柯村农民首举义旗，几天之内扩展到太平、黟县、石埭边界方圆百余里，参加暴动农民达几千人。

即石埭、青阳、太平和泾县、旌德、宁国、宣城。

赤卫队，互济会等群众组织，在游击根据地内农会已取代了国民党的保甲政权。为了扩大游击区，中心县委决定将游击大队编成3个中队分散游击。由洪维恭率领第2中队，王岐山率领第1、3中队，分赴泾宁边和宣径边发展游击战争。与此同时，皖南独立团决定分兵行动。由于失去皖南特委领导，独立团决定由熊刚和刘毓标率1个营到赣东北找省委请示报告工作；由宁春生和张世荣（第1营政委）率领2个营留守皖南坚持游击战争。

熊刚、刘毓标率队从黟县出发，经祁门、休宁、婺源，于4月下旬抵达德兴的广才山，找到了闽浙赣省委，向关英汇报了皖南斗争近况。关英指示熊、刘要独立自主地进行斗争，以黄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发展秘密工作，尔后将由省委派人联系。熊刚、刘毓标按照关英指示，精简了人员，补充了弹药后，重返皖南。当部队路经皖赣边界的鄣公山时，发现此地地形条件和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于是留下一部分人开展群众工作，为尔后开辟游击根据地作准备。部队照原计划返回皖南。

当熊刚、刘毓标率队回到太平柯村一带时，游击区已面目全非。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调集第77师、第88师部队和祁门、黟县、石埭、太平等县保安团队等反动武装共数千人，疯狂“进剿”柯村游击区。宁春生和张世荣率独立团顽强抗击，但寡不敌众，部队被冲散。宁春生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坚贞不屈英勇就义。不久留守部队余部与熊刚、刘毓标会合。鉴于皖南斗争环境恶化部队难于立足，熊、刘决定率独立团转移到鄣公山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

1935年5月间，熊刚、刘毓标率皖南独立团折返婺源、休宁边境的鄣公山区，分兵发动群众，建立农民革命团、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同时积极发展中共党员，先后建立了鄣公山、高舍、石屋、里庄等党支部。党组织率领农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惩治土豪劣绅，抗租抗税，摧毁乡村反动势力。由点到面，逐步向外缘发展。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至六七月间，初步开辟了以鄣公山为中心的游击区。

三、鄆公山游击根据地的创立与省委领导重心的转移

（一）赣东北斗争形势逆转与鄣公山游击根据地的形成

赣东北游击战争的开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于是国民党军调集第21、第55、第57师和独立第43、第46旅，于1935年7月开始，对赣东北的信河、乐河、化婺德3个游击区，实施梳篦式的“搜剿”。敌以连排为单位搜寻红军游击队行踪，一旦发现情况，立即集中优势兵力合击。7月20日，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唐在刚、参谋长邹琦等率军区独立团在横峰苏源坞活动时，遭敌第21师部队伏击，唐在刚在战斗中英勇牺牲。邹琦和随军行动的信河特委书记余汉朝、省裁判长徐炎荣等负责人被叛徒出卖落入敌手，惨遭杀害。独立团被打散，200余名战士遭捕杀，信河特委遭破坏。与此同时，乐河和化婺德两个特委也遭到了严重破坏。一时间，整个赣东北游击区陷于极度困难境地。

为了摆脱困境，争取主动，关英于7月下旬，在德兴毛家坂主持召开闽浙赣省委扩大会议，商讨行动方针。会议分析了赣东北面临的局势，认为省委活动中心必须转移到皖南地区，但决不能放弃赣东北。为了健全党的领导机关，赣东北3个特委须合并。会议决定，关英和邵长河率省委精干人员向皖南转移；余金德、滕国荣、程伯谦等人留在赣东北，就地坚持斗争；成立中共赣东北特委，余金德任书记，统一领导信河、乐河和化婺德3个区的游击战争。

会后，关英一行即向皖南进发。途经鄣公山时与皖南独立团相遇。关英得悉皖南局势恶化和独立团开展了鄣公山局面的情况后，果断地改变原定计划，决定以鄣公山为依托建立省委领导中枢。

鄣公山地处皖赣边境的休宁、祁门、婺源、浮梁4县边界，东邻浙江西部边缘，是闽浙赣3省国民党统治薄弱地区，加之地形险要，有利于红军游击队立足和发展。闽浙赣省委机关设在这里，既便于联系赣东北、皖南和浙西各地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又便于统一领导3省边界游击战争。关英作出经营鄣公山游击根据地的决定后，即着手巩固和发展鄣公山游击区。同时派人与赣东北、皖赣、皖南等游击区联系，通报省委决策，疏通上下关系，结束各自孤立状态，以便在省委统一领导下，相互配合，相互依存。

八九月间，国民党闽浙皖边“清剿”总指挥部调整兵力部署，将主力调集于浙南和闽北，重点“清剿”浙西南红军挺进师，闽浙赣边敌人兵力相对减弱。闽浙赣省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大力巩固和发展鄣公山根据地。为此关英作出了具体部署：祁门舍会山地区党组织积极向外发展；皖南独立团以营为单位，到皖南、浙西辗转游击，以寻找失散的红10军团人员和地方游击队，并了解各地党组织情况，以便省委实施具体领导。根据关英指示，舍会山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很快就将工作范围扩展到祁门、浮梁边界20多个村庄。与此同时，皖南独立团在浙皖边界不断打击地方反动势力，扩大红军游击队影响，并不时向省委报告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活动情况。12月，关英获悉浙西和皖南边界的淳安、遂安、歙县地区有红军游击队活动的信息后，立即决定抽调一批干部组成浙皖边工作队，前往浙皖边境开展工作。工作队30余人于12月28日到达歙县茗坑。他们以茗坑为落脚点，设法联系边界红军游击队，在浙皖边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以拱卫鄣公山中心区。

在这期间，国民党曾于11月间从浙南抽调第2纵队于婺源北部和休宁、开化等地布防，随后又抽调第14师第80团从浙南进驻开化、婺源、休宁，

对鄣公山形成合围态势。然而，红军游击队占有地利人和之优势，特别是闽浙赣省委采取适应游击战争环境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皖南独立团积极出击袭扰敌人，弄得“清剿”军莫可奈何。迄 1935 年底，仅半年时间，游击区域就从鄣公山周围五六个村庄扩展到 3 省边界的祁门、休宁、歙县、淳安、遂安、婺源、浮梁等县的广大农村，形成了基础牢靠的游击根据地。

为了巩固新辟的区域，1936 年春，闽浙赣省委趁势在鄣公山北部和东部的皖南和浙西地区，大力发展党组织。1 月，在鄣公山北部相继建立了中共祁门、休宁两个县委。派往东北部歙县地区的原少共皖南特委书记何英等人，于 3 月间建立起中共茗坑中心区委。4 月，茗坑区委改为直属省委的淳遂歙中心县委，何英任书记。同时建立地跨鄣公山南北的祁浮婺中心县委，肖龙开任书记。鄣公山东部和北部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游击区的开辟，不仅有利于鄣公山游击根据地的巩固，而且为后来的浙皖和皖赣游击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即浙江淳安、遂安和安徽歙县。

即安徽祁门和江西浮梁、婺源。

（二）各地斗争的起伏与各路游击队会合鄣公山

在闽浙赣省委直接创建鄣公山游击根据地期间，省委所属的其他游击区斗争出现了曲折起伏，1936年春各地游击队相继撤离本地区，汇集于鄣公山。

赣东北游击区1935年7月底，以余金德为首的赣东北特委抵达弋阳三县岭地区，决定将在这一带活动的红30师一支部队和弋阳红军精干连，合编为赣东北游击大队，由红30师师长颜文清任司令员，坚持信河地区游击战争。同时决定在三县岭的狮子岩建立中共弋阳德兴横峰中心县委，黄元金任书记，统一领导三县岭地区斗争。10月初红30师政委刘永祝率所部的另一支部队，在德兴县爆竹坑一带游击时，遭国民党军第55师第163旅伏击。刘永祝在指挥反击战斗中，英勇牺牲，队伍被打散。接着，赣东北特委委员（原乐河特委书记）程伯谦在横峰县葛源附近活动时，惨遭叛徒杀害。同月，颜文清在战斗中负伤，留在三县岭隐蔽休养。不久，叛变投敌，为虎作伥。同年12月，颜文清带领国民党军，将赣东北游击大队围困在三县岭，游击队经浴血苦战，最后只有16人突出重围，转向德兴、乐河地区，寻找特委。1936年1月下旬，赣东北特委书记余金德在德兴率游击队约40人，在地下党配合下，袭击了张家炮楼，击毙了联保主任，缴枪12支，子弹1000多发，银元300多块。随后，余金德率队转向乐平北部地区活动，并在那里会合了从三县岭突围出来的游击队。同年4月余金德率领游击队，从乐平县大坑出发，上鄣公山与省委会合。

泾旌宁宣游击区以泾县戴杨村为基地，是皖南仅存的一个游击根据地。由于叛徒作祟，1935年7月间中心县委书记洪维恭在泾县五塘里遭敌袭击，不幸牺牲。同年8月，王岐山率泾旌宁宣游击大队在宣城大麦坑、小麦坑与敌作战中，以身殉职。中心县委代理书记王晓南生活腐化，致使游击队内忧外患，处境危险。10月间中心县委副书记李步新伤愈归队后，接任书记职务，并对部队和地方党组织进行了整顿，消除了思想混乱。接着，红军游击队主动出击，连连获胜，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士气大振，乘胜逐步扩大游击区。同年冬，游击根据地由泾县戴杨村周围扩展到泾县的黄山岭、蔡坝、丁溪、曹溪、诵溪、榆桃村、鸟雀岭；旌德的大王山、十一都、三溪；宣城的大、小麦坑、朱村、青龙山；宁国的板桥等地，纵横约50余公里，游击队重新发展到200余人，此外还在接近游击区的白区，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1936年1月，国民党纠集第78师、独立第45旅等正规部队和当地保安队共3000多人，对泾旌宁宣游击根据地发动残酷的“围剿”。敌采用分进合击战术对付红军游击队，同时大肆烧毁民房，捕杀群众，制造白色恐怖。这时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晓南和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储希文叛变投敌，致使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保存骨干力量，中心县委决定，迅速突破敌人包围，回赣东北寻找省委。2月间，李步新等率领泾旌宁宣游击队180人枪，从泾县诵溪出发，摆脱了敌人，经旌德、太平、石埭、黟县到达休宁西乡的里庄，找到了省委，与兄弟游击队会师鄣公山。

贵秋东游击区起初工作开展比较顺利。江南特委为便于领导，于1935年7月决定撤销祁贵秋中心县委，另在东流县的罗汉但、秋浦县的谢家滩、贵池县的莲花山分别成立贵东、贵秋和贵祁3个县委。同月，江南独立团在贵池县的猪公山伏击安徽保安第2团的1个中队，毙伤一部分敌兵，缴获步

枪 20 余支。8 月间，独立团连续出击，在贵池县大溪岭、殷汇镇、牌楼、金塔、陈家龙等地袭击敌安徽保安队，连战皆捷，共歼敌 1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100 支。在红军游击队战斗胜利鼓舞下，地方党组织发动和组织农民实行分配土地，红色风暴席卷整个贵秋东边境，广大农民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江南特委因势利导，发动贵秋东祁 4 县边界中秋暴动。9 月 12 日（中秋节）1800 余农民，分别在高山、火龙坑、洪家堰、北山欧等纵横三四十公里的地区，同时举行暴动，推翻了反动政权，解除了反动武装。江南特委乘热打铁，于 17 日在东流县北山欧西房村，宣告成立江南特区苏维埃政府，欧阳斌任主席。江南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以秋浦高山为中心的贵秋边游击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其范围东起丁香树，南达安坡，西至高低岭，北抵殷家汇，纵横 50 公里。此后，江南独立团和分属于 3 个县委领导的 3 支游击大队，互相配合，四面出击。至 1935 年底，江南红军游击队发展到 1000 人。

贵秋东边游击战争的顺利开展，致使江南特委领导滋长盲目乐观情绪，对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当 1936 年初，安徽保安旅等反动武装集中优势兵力围攻高山游击根据地时，特委还用独立团去打硬仗，致使部队蒙受重大损失，地方党组织也遭到破坏，根据地日益缩小。最后，特委和独立团被围困在高山狭小地区。虽然高山地形险要，但部队粮食、弹药奇缺，难于持久固守。因此，江南特委于 2 月下旬决定，除留下一部分力量就地坚持斗争外，红军游击队分批撤离高山根据地，在外线与敌周旋和到皖赣边寻找省委。3 月间，江南独立团政委王丰庆率第 1 批 200 余人抵达鄣公山与省委会合。接着江南红军独立营政委江天辉、特派员倪南山率第 2 批 80 余人，于 4 月间也到达鄣公山。在这期间，江南独立团团团长杨艳溪在离队养伤时叛变投敌。江南特委书记周成龙、特区苏维埃主席欧阳斌率特区保卫队，在转移途中被敌人冲散，欧阳斌在祁门被捕牺牲，周成龙辗转到了南京、武汉，后来到了延安。

此外，都湖鄱彭游击区的斗争，虽然比较平稳，但是也遭到较大的损失。1936 年 3 月，都湖鄱彭游击大队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将驻扎都昌县张家岭的敌独 36 旅 1 个连诱入姐妹塘伏击圈内，一举歼灭该敌，缴获长短枪 100 余支。同月，领导这个游击区斗争的闽浙赣省委委员、中共皖赣分区委书记柳真吾，率部分手枪队员离开都昌望晓源根据地，去找省委汇报请示工作。当途经鄱阳县田坂街时，遭敌袭击，柳真吾不幸牺牲。此后都湖鄱彭游击区军民在原皖赣军分区司令员匡龙海、中共都湖鄱彭中心县委负责人田英等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三）鄣公山会议与皖浙赣边新的斗争部署

闽浙赣省委所属的各游击区负责人和游击队，几经曲折，先后汇集鄣公山后，为总结各地游击战争经验，确定新的行动方针，关英于1936年4月间在鄣公山村主持召开了闽浙赣省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关英、余金德、滕国荣、邵长河等省委委员，以及来自各游击区的负责人刘毓标、李步新、王丰庆、赵礼生、何英等。

会议在总结经验，分析形势的基础上，确定了总的行动方针和基本任务：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大力进行抗日宣传，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为巩固和扩大以鄣公山为中心的皖浙赣边游击根据地而斗争。围绕总的方针任务，会议从实际出发，对若干政策和策略作了调整：对土豪劣绅由一般消灭改为以罚款为主；对保甲长由镇压改为争取利用，允许他们做“两面派”；对城市商人允许他们来山区做生意，只要不搞破坏活动一律予以保护。

鉴于省委领导与斗争中心已转移到皖浙赣边界，会议决定将闽浙赣省委易名为皖浙赣省委，并组建直属省委的皖浙赣独立团。为了便于省委统一领导和各游击区独立坚持，会议根据当时的发展形势，决定将皖浙赣边游击区重新划分为5大块，即赣东北、皖赣、上浙皖、开婺休（后改为浙皖）、下浙皖。每块游击区设立党的特委，作为统一领导机关，在军事上设立军分区，建立独立营或游击大队。

为了充实和健全省委和各特委领导，省委决定以关英、余金德、滕国荣、王丰庆、李步新、刘敏标、邵长河、赵礼生、何英等人组成新的省委，以关英为书记，刘毓标为组织部长，滕国荣为宣传部长，邵长河为少共省委书记。并决定由余金德、王丰庆、邵长河、赵礼生、何英5人分别担任赣东北、皖赣、上浙皖、开婺休、下浙皖特委书记。为了确保省委领导核心行动隐蔽、灵活、安全，省委机关实行精干化和驻地流动化。省委决定由关英和滕国荣主持省委日常工作，配备八九个机关工作人员，以鄣公山村和休宁县石屋坑两地为主要驻地，不时流动。

鄣公山会议是皖浙赣边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它结束了各游击区互相隔绝，独自为战的局面，开创了皖浙赣省委统一领导下，各游击区相互配合，稳步发展的新时期。

会后，以皖南独立团为基干编成的皖浙赣独立团，在婺源水岚山宣告成立，熊刚任团长，刘毓标任政治委员，邵长河兼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营，共800余人。省委规定独立团的任务：到鄣公山根据地外围，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敌人，策应中心根据地的建设；随时随地做好群众工作，大力开展抗日宣传，扩大红军游击队影响和筹集经费。

四、皖浙赣边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

（一）皖浙赣独立团的胜利出击

皖浙赣独立团，根据省委的指示，离开鄣公山区，四处游击，寻机打击国民党地方保安团队和小股行动的正规军。1936年6月间，两广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将闽浙赣边的国民党正规军大部调走。在皖浙赣边仅留下独立第46旅。皖浙赣独立团，（以下简称独立团）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向皖南和浙西北一带积极出击。

攻克开化城7月初，独立团侦悉浙江开化县城敌兵力空虚，遂决定攻城歼敌。7月8日凌晨，在开婺休和下浙皖游击队配合下，独立团利用夜暗掩护，攀越城墙，解决敌哨兵，打开城门，一举攻克开化城，全歼守军保安队百余人，击溃敌1排正规军，共缴步枪100余支，机枪6挺，子弹4万多发，捣毁了县衙，打开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政治犯。开化大捷，使游击区军民深受鼓舞。当天，独立团撤离开化城，回师鄣公山。沿途顺便铲除了婺源源的斋官、山坑、沱口等乡公所，为游击区的发展，清除了障碍。

月岭伏击战7月间，独立团在回师鄣公山途经婺源月岭地区时，获悉敌第46旅两个连队将路经此地。独立团决定利用月岭的有利地形伏击敌人，熊刚、刘毓标指挥部队在公路两侧高地埋伏下来，以逸待劳。时值盛夏，敌冒酷暑行军苦不堪言。许多士兵光着上身，将衣服挂在枪头上，摇摇晃晃地走进伏击圈。独立团突然发起攻击，敌猝不及防，顿时乱作一团，很快就解决了战斗。此役共毙敌30余人，俘100余人，缴获步枪100余支，机枪4挺。

独立团连战皆捷，声威大震，游击区青年踊跃参加红军游击队。到8月间，独立团发展到1200余人，致使敌地方保安团队惶恐不安，不敢外出骚扰，就连敌正规军独立第46旅，也不敢轻易行动。根据这一斗争形势，省委一面告诫大家在胜利面前要防止骄傲和轻敌情绪；一面提出大胆发展要求。指示独立团到离中心区更远一些的地区去开展游击活动，以扩大影响。9月间，独立团遂照省委指示，继续向浙皖边的青阳、泾县、宁国、宣城、昌化一带游击。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

平鼻岭伏击战10月间，独立团转战皖南地区，当转到休宁县西乡溪口时，获悉驻休宁县城的国民党军独46旅1支约二三百人的队伍正在出动。独立团通过地下交通员，很快查清了敌人行进路线，遂决定在敌必经之地平鼻岭打伏击。部队隐蔽在公路两侧的山岭上，待敌自投罗网。独立团近期连打胜仗，缴获甚多，武器装备和弹药充足，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即以猛烈火力给予突然攻击。敌人还来不及组织反抗，就已解决了战斗。由于敌军人数较多，行军距离拉得较长，其先头部队得以漏网逃窜，后尾部队全部被歼。独立团缴获长短枪七八十支。

奇袭昌化城平鼻岭战斗后，独立团返回鄣公山稍事休整，尔后北出上浙皖游击区。12月中旬，部队经天目山到达皖浙边境的宁国县西南乡时，打掉了国民党的区公所，从缴获的报纸中，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大家兴奋不已。为了开展新局面，独立团决定寻机打个大胜仗，以扩大影响。经过侦察研究，决心选择城防工事薄弱的浙江昌化县城作为袭击目标。12月21日，独立团在宁（国）昌（化）游击队配合下，采取白天化装奇袭战法，一举袭入城内，守敌如梦初醒，慌忙逃窜。独立团迅猛追击，将敌围歼于城外，活捉了昌化县国民党书记长，并打开监狱，救出全部在押的政治犯。此役缴获100多支枪、8箱子弹，以及大批物资。独立团无一伤亡。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为之震

惊。随后，独立团返回鄣公山，向省委报告西安事变的重大消息。

在独立团转战于皖浙赣边期间，省委所属的各游击区相继建立和健全了党的特委，组建了独立营或游击大队，创建了新的游击根据地，将皖浙赣边游击战争推进了高潮。

（二）赣东北游击战争的复兴

1936年4月省委鄞公山会议后，余金德遵照省委的决定，于5月间率赣东北游击大队，返回赣东北游击区，重新组织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同月，在德兴磨盘山建立上（饶）横（峰）弋（阳）德（兴）中心县委，杨文翰任书记。接着以徐永鉴为书记的乐河中心县委，于6月间在德兴的桃树坞宣告成立，各地党组织也逐渐恢复。

6月上旬，余金德率游击大队抵达德兴香屯北面的三都坞时，与原省军区独立团政委夏年丰及其率领的队伍不期而遇，两支队伍会合在一起，共70余人，编成新的赣东北游击大队，夏年丰任大队司令员，余金德兼任政委。这时，根据党的地下组织提供的情报，得悉德兴有一小股敌军要进三都坞来搜山，余金德等决定以伏击战歼灭这股敌军。当敌军进山时，游击队采取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战术，埋伏在敌人必经之地待机，先让敌在山里折腾，待其疲惫归营时，乘其不备，给予突然打击。敌军30余人除3人落荒逃脱外，其余悉数就歼，游击队无一伤亡，缴枪30余支，士气大振。随后，部队在开往三县岭根据地途中，化装袭击了秧坂国民党联保据点，击毙了联保队长，活捉了在碉堡内的5名保长，缴枪14支，子弹1000余发，手榴弹40余枚，烧毁碉堡一座。红军游击队还就地召集了群众大会，进行宣传。群众欢欣鼓舞，欢呼“红军回来了！”

7月初，余金德在三县岭桃树坪主持召开干部会议。根据省委指示，宣布赣东北特委改为分区委，余金德任书记。同时成立赣东北军分区，夏年丰任司令员。分区委下辖乐河、上横弋德两个中心县委和德北县委。乐河中心县委辖乐平、兴德、余江、万年、贵溪、弋阳6县；上横弋德中心县委辖横峰、弋阳、上烧、玉山、婺源5县和德兴沙坂特区。在军事上，分区委和军分区确定，军分区直辖1个精干连，两个中心县委和德北等县委各组建1支游击队。这次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调整，为赣东北游击战争的复兴，打下了组织基础。

为了打破敌人封锁，扩展游击区，余金德于9月间，胜利地组织了洞天峰战斗。当时，国民党军第55师部队驻乐平县城，四乡各村庄路口筑有碉堡，由地方反动武装据守，配合“进剿军”行动，这对游击队形成了威胁。9月底，敌江西保安第13团1部在乐河地方反动武装（多是乌合之众）配合下，分3路进攻乐平县泗源坪游击根据地。余金德和乐河中心县委书记徐永鉴指挥红军游击队，利用泗源坪洞天峰的险要地形，伏击敌人。游击队员以勇猛、突然的动作，歼击敌人最突出的一路，一阵步枪、手榴弹，毙敌30余人，同时吹起冲锋号助威。敌突遭打击，惊恐不已，争相逃命，溃不成军。另两路敌军见状，不战而退，且自相惊扰，四散而逃，吓得连碉堡都不敢去守。红军游击队乘胜扩张战果，一个晚上就将乐平县黎家桥、倪家、万家、下流源、上流源、闵树里马家、路坞马家和德兴县的鸡公山刘家等处敌碉堡全部烧毁。

洞天峰大捷，大长了革命军民意志，灭了反动派威风。乐平、德兴、万年等县群众奔走相告：“我们的红军回来了！”群情激昂。而反动势力慑于红军游击队声威，收敛了嚣张气焰。一些保甲长和联保主任，在游击队争取下，或保持中立，或靠拢共产党，有时游击队就住在联保主任家里。赣东北分区委和乐河中心县委抓住这一有利形势，很快就恢复了这个地区的党组织和群众工作，巩固和发展了乐河游击根据地。年底，赣东北游击大队由70

余人发展到 130 余人。

在这期间，以德兴磨盘山为依托的上横弋德中心县委，在杨文翰领导下，开辟了以磨盘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杨文翰率领 1 支 30 余人的游击队，在游击区秘密党组织和基本群众支持下，一直在磨盘山区坚持斗争。

（三）皖赣边游击区的发展

皖赣边游击区，自与省委取得联系后，特别是在省委鄞公山会议确定的方针指导下，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36年5月，中共皖赣特委根据省委决定，在婺源县菖箬山宣告成立，王丰庆任书记，李步新任副书记，同时将原江南独立营改为皖赣独立营。起初，特委下辖都湖鄱彭和祁浮婺两个中心县委。后来，随着游击区的扩展，又先后建立了祁婺休和浮乐婺两个中心县委。除上述4个中心县委外，还有部昌、彭泽、乐平、休宁、祁门、浮梁、婺源等7个县委。各中心县委都组建了游击大队，下辖各游击大队和特委的独立营共约400余人，他们在特委统一领导下，独自进行游击战，但在战略上相互配合，相互支持。

1936年5月间，都湖鄱彭游击大队，在司令员匡龙海、中心县委书记田英指挥下，协同原红10军团第19师幸存的1个连队，攻克了湖口县文桥区公所，击毙国民党区党部部长和区保安中队35人，俘虏4人，缴枪30余支。接着，祁浮婺中心县游击大队，在中心县委书记江天辉等指挥下，在浮梁县瑶里，袭击了江西保安第14团一部，俘虏20余人，缴枪10余支。与此同时，祁婺休和浮乐婺两个中心县委及所属游击队，也在积极开展活动，清除基本区的土豪恶霸，打击反动的壮丁队，使整个皖赣边游击区再度出现了新的转机。各中心县委所在的基本区，普遍建立农民团、青年团、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团体，恢复和建立革命秩序。

9月间，都湖鄱彭游击大队，通过地下党员摸清了彭泽县段家店的敌第46旅1个连队的活动规律，田英即决定奇袭该敌。游击队事先秘密接近敌人据点，埋伏在山坡林间。待傍晚敌人下河洗澡时，游击队突然冲向敌人据点，给敌人打个措手不及。正在洗澡的敌兵吓得四散逃窜，逃窜不及的或被击毙，或举手投降。游击队共毙、俘敌56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30余支，烧毁碉堡2座。与此同时，江天辉率祁浮婺游击大队，两次袭击浮梁县瑶里敌据点，歼敌保安团20余人，缴枪20余支。不久又协同皖赣独立营在祁门高田凤门坳伏击国民党军第46旅的1个连队，将敌击溃，毙敌连长以下10余人，缴枪30余支。

在这期间，以鄞公山地区为活动中心的皖赣独立营，充分发挥了作为皖赣特委基干游击队的作用，积极出击，摧毁了鄞公山地区的敌碉堡据点，拔掉了周围的钉子，巩固和发展了鄞公山根据地，保证了皖浙赣省委的安全。由于得到省委直接而及时的指导，鄞公山一带群众发动得相当充分，几乎户户有人参加农民团、妇女会、儿童团。他们对天立誓：“参加革命，赤胆忠心，要是被捕，不讲别人，死就死一个。如暴露机密，全家鸡犬不留”。党支部和农民团为掩护省委和红军游击队，防止敌人袭击，到处站岗放哨，建立秘密山棚供红军游击队宿营。在尚岩里，群众还帮助游击队建立起一个能容纳50多人的红军医院。鄞公山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

即江西都昌、湖口、鄱阳、彭泽、浮梁、婺源和安徽祁门县。

即安徽祁门、休宁和江西浮梁、乐平、婺源县。

（四）浙皖游击区的演变

浙皖游击区是由开婺休游击区演变而成的。原属化婺德特委领导的开婺休中心县委，自 1936 年春特委撤销后，在开化、婺源、休宁边界地区独立坚持斗争。中心县委确定红军游击队，以分散保护群众抗丁、抗粮，集中打击国民党保安队和地主武装为主要斗争方式和任务。五六月间，开婺休游击队发动和组织群众，在开化县边缘地区的十几个村庄，打开 13 个地主的粮仓，将 10 多万斤粮食分给贫苦农民，进一步调动了基本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积极性。7 月间，当皖浙赣独立团攻打开化县城时，开婺休中心县委一方面指挥游击队协同独立团作战，一方面组织数以百计的群众为独立团运输粮食和其他战利品，使游击区军民受到了锻炼和鼓舞。

随着斗争的胜利开展，开婺休游击区以开化为中心逐渐扩展到浙江的衢县、遂安、寿昌，安徽的休宁和江西的婺源、德兴等县的边界地区。8 月间，根据皖浙赣省委指示，浙皖特委以开婺休中心县委为基础，在开化县的福岭山宣告成立，赵礼生任特委书记。同时成立浙皖军分区和浙皖独立营，邱老金任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营营长，特委辖衢遂寿和婺德两个中心县委，以及开化、休宁两个县委。为了加强游击根据地建设，浙皖特委成立后即决定在福岭山成立以赵礼生兼主席的开化县苏维埃政府。接着由开化县委和县苏维埃举办干部训练班，近百名党政干部参加了学习，有效地提高了干部素质。

在浙皖特委和各中心县委领导下，浙皖游击队频频出击。9 月中旬，衢遂寿中心县委书记严忠良率所属游击队，协同浙皖独立营，夜袭遂安上坊乡公所，一举成功，歼灭了敌乡保安队，缴获步枪 30 支，银元 700 余块。接着，赵礼生和邱老金率浙皖独立营转向衢县，在衢遂寿游击大队配合下，独立营直捣衢县上方镇敌据点，摧毁了敌上方警察分局，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这两次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推动衢遂边界游击区的发展，形成了以千里岗为中心，东西长约 100 公里，南北宽约 50 公里的游击根据地。根据地群众积极参与革命斗争，青壮年除一部分加入红军游击队外，大都参加了不脱产的“坐地红军”，他们平日在家生产劳动，有战斗时即参加战斗。特别是在协助红军游击队镇压土豪劣绅，打击反动势力，维护根据地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军游击队是游击根据地的支柱，各级党组织十分注重武装建设。中心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普遍拥有一支规模不等的游击队。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游击队不断壮大，到 1936 年底，浙皖边各级游击队人数合共约 600 人。

（五）上浙皖游击区的开辟

上浙皖游击区，是皖浙赣独立团协同地方党组织在 1936 年夏建立起来的。其范围包括浙西北的昌化、孝丰、于潜，皖南的宁国、广德、郎溪、宣城、泾县等县的边界地区，而以宁国的洪家塔为中心。

1936 年夏，皖浙赣独立团奉省委之命，北征上浙皖地区时，根据省委指示精神，派出部分得力干部加强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并留下部分武装作为组建地方游击队的骨干。7 月，独立团政治处主任邵长河根据省委决定，在宁国洪家塔正式组建上浙皖特委并任书记，第 3 营政委阙怀仰任副书记。随后又在孝丰县章村由独立团第 3 营抽出两个连为基础，组成特委独立营，阙怀仰兼任营长，协同独立团作战。由于独立团在这个地区连打胜仗，扩大了红军游击队影响，加之地方党组织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游击区的开辟进展很快。特委相继建立了宁昌和孝宁两个中心县委，以及宁广、孝广两个直属县委。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独立团还派出骨干或小分队帮助各县委（中心县委）建立游击队，使游击区很快就由宁国扩展到孝丰、昌化、于潜、泾县、宣城、广德和郎溪等 8 个县境。

特委针对上浙皖地区是个新辟的游击区的特点，采取灵活机动、四处游击的斗争方式。每到一处，在打击反动势力的同时，留下部分人员开展群众工作，建立群众组织，发展游击队。到 1936 年底，上浙皖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在宁国、广德、孝丰等县的二三十个村庄建立起贫农团等群众组织，同时发展了 10 多支游击队，共约 400 人，各县委、区委所属游击队，主要在本地区活动，配合群众组织开展斗争。特委独立营则在整个游击区内机动歼敌。1937 年 1 月，独立营抓住有利战机，从孝丰县长途奔袭于潜县四角田的浙江保安团部队，歼敌 1 个分队，缴步枪 24 支，机枪 1 挺。随后，独立营在宁国县石壁山遭国民党军第 34 师部队和浙江保安团包围。独立营机智应付，利用熟悉地形和夜暗等有利条件，采取“金蝉脱壳”战术，安全脱离险境，并毙伤敌 20 余人，还造成敌军自相交火，混战一场。

（六）下浙皖游击战争的兴起

下浙皖游击区位于浙皖和上浙皖游击区之间的浙江淳安、遂安和安徽歙县边界，也是一个新开辟的游击根据地。原先有党的地下组织和零星游击队在此间活动。后来闽浙赣省委为加强这一地区党的领导，向东扩展游击区，决定派遣原皖南少共书记何英等前去开展工作。何英与在淳遂歙边界支持斗争的刘忠林等率领短枪队，在歙县的茗坑及淳安的 共厦、茶山、樟村、扎源、枫坞一带积极开展活动，发动先进青年农民加入游击队，使队伍很快就由几十人发展到 100 多人。1936 年 3 月在茗坑正式成立中共中心区委，何英任书记，初步形成了以茗坑为中心的淳遂歙游击根据地。为了培养干部，中心区委在淳安狮古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学员经 1 个月集训后，分赴边界各地开展活动，先后在边界的青半山、南源、郭村和木旺区建立起 4 个区委。

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何英等根据省委指示，于 1936 年 4 月成立淳遂歙中心县委，何英任书记，刘中林、苏宏发任副书记。此后，中心县委活动中心由歙县茗坑转移到遂安（今淳安县）的马鞍脚村。并决定以狮古山为中心，有计划地向四周发展。由于群众发动比较充分，根据地迅速扩大。5 月，原先的 4 个区委分别升格为中心区委，并建立了茗坑苏维埃政府。

6 月，根据皖浙赣省委决定，淳遂歙中心县委在茗坑改为下浙皖特委，何英任特委书记，刘忠林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苏宏发任副书记兼少共书记。同时成立下浙皖军分区和独立营，何英兼军分区司令员，黄立义任营长，朱用地任营政委。特委辖淳遂和歙县两个中心县委。

特委采取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分散活动的方法，划分责任区域，由特委委员分片领导，分兵发动群众，先后在一百多个乡村组织起群众团体以及群众武装。基本区的大多数群众都加入了农民团。在敌我常来常往的边缘区，农民团采取半公开半秘密方式开展活动。有的地区还沿用当地习俗，入团时饮鸡血酒宣誓：“绝对保守秘密，不得走漏消息；利用亲戚关系，秘密发展组织；以打野猪名义，各人准备武器；大家齐心合力，听从上级指挥”。

由于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红军游击队如鱼得水，情报有群众提供，行动有群众掩护，作战有群众配合。在群众掩护下，他们白天侦察敌情，观察地形，夜间出其不意袭击敌人，每每取胜。7 月上旬，下浙皖独立营在霞源山一举击溃敌保安中队。接着奉命配合皖浙赣独立团，攻入开化城。八九月间，独立营和各县委所属游击队相互配合，频频袭击敌人据点，缴获长短枪 50 余支，轻机枪 1 挺，同时镇压了一批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群众拍手称快。12 月 6 日，独立营根据群众提供的情报，长途奔袭遂安余家，部队一夜行军 40 公里，在当地游击队配合下，给驻余家的国民党军第 16 旅部队以突然袭击，缴获长短枪 50 余支，子弹数箱并烧毁敌军粮 300 多石。同月，红军游击队攻打了敌碉堡两座，在花姑庵击溃敌保安分队，缴枪数支。这时，以独立营为基干的下浙皖红军游击队，已由 100 余人发展到 300 余人。

自 1936 年 4 月鄣公山会议后，到同年底，是皖浙赣游击区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皖浙赣省委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抗租、抗税、抗捐、抗丁斗争，维护了群众利益，从而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军事上，以省委直属的独立团和各特委直属的独立营为基干，并普遍组建县、区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红军游击队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伏击、奔袭、奇袭、夜袭等手段，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长了

人民的意志，灭了敌人的威风，扩大了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群众斗争的发展。整个皖浙赣边游击区扩展到以鄣公山、磨盘山、怀玉山和黄山等山区为依托的 40 多个县的广大地区，游击队发展到 30 余支，共 3000 余人；党组织除省委、特委外，还建立起中心县委、县委和直属区委 30 多个，以及数以百计的基层组织。此外，还有组织起来的数以万计的基本群众，这对尔后渡过艰难时期，起了重大作用。

五、游击区军民患难与共，击破国民党军“南剿”企图

（一）国民党军的“南剿”方针与新的“清剿”部署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倡议，在北方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和平。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反共之心不死，在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企图破产后，又采取竭力削弱共产党的方针，妄图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剿灭”南方红军游击队。于地群众发布格杀令，声言“通匪者杀，窝匪者杀，见匪不报者杀，替匪送粮带路者杀，替匪宣传、煽动者杀，当匪者杀全家……”同时派遣叛徒、特务潜入游击根据地刺探情报，造谣惑众，挑拨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以图置红军游击队于死地。

（二）皖浙赣省委的失误与挫折

正当国民党紧锣密鼓部署大“清剿”之际，皖浙赣省委却对形势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并造成行动上的失误。当皖浙赣独立团在浙皖边获悉西安事变消息，赶回鄣公山报告省委时，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蒋介石也已安全返回南京，并下令加紧“南剿”。由于消息闭塞，红军游击队不了解形势的急剧变化，还在庆祝“捉住蒋介石”。1937年1月下旬，皖浙赣省委在鄣公山召开会议，分析研究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与红军游击队的任务。会议认为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国民党阵营将出现动乱，有利于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和促进抗日救亡高潮的到来。在新的形势面前，省委必须积极设法同党中央取得联系，以便了解党的战略策略和及时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前进方向，避免在政治上犯大错误。省委这些认识，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对国民党加紧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残酷“清剿”这一形势估计不足。会议认为在西安事变彻底解决之前，国民党对皖浙赣边游击区不可能再采取重大行动，应抓紧这一时机积极出击，打击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保安团队。各特委独立营可以跳出各自区域，联合作战，扩大游击区。为此，会议决定：1. 由关英率独立团一部前往浙南找刘英、粟裕，指望通过他们的电台同党中央取得联系（其实他们的电台也早已丢失）；2. 各特委独立营可离开根据地，寻找战机打击敌人；3. 各中心县委游击队设法储备两三个月粮食，坚守根据地，等待党中央指示。

会后，关英与熊刚、刘毓标率独立团3个连从鄣公山向浙南进发，预定穿过开（化）淳（安）遂（安）边境，直插浙南。由于不了解敌是调兵遣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南方红军游击队进行残酷的“清剿”。

1937年1月6日，国民党闽浙赣皖边绥靖公署主任刘建绪，为贯彻蒋介石的“北和南剿”方针，在浙江衢州召开“清剿”军指挥官和4省边界60个县的县长参加的绥靖会议，部署对4省边界红军游击队的“清剿”。刘建绪调集正规军40个团和4省保安团队，实施分区“清剿”。要求在3个月内消灭红军游击队。在战略部署上，将4省边界划分为3个“清剿区”，其中皖浙赣边为第1“清剿区”，以第55师师长李松山为总指挥，辖第55师、独立第45旅和3省边保安团队。在战役部署上，第1“清剿区”部队分3路进兵：一路由昌化向宁国、广德、宣城、泾县、施德进击；一路由开化、淳安、遂安向歙县、休宁进击；一路由婺源、浮梁、乐平一带向休宁、祁门、黟县进逼。

1月20日，敌绥靖公署又把衢县、常山、开化、遂安、淳安、寿昌6县边界划为“清剿特区”，任命衢县公署专员兼浙江保安第5区司令鲁忠修为特区指挥官。限令40天内完成“清剿”任务。在“特区”内，除鲁忠修指挥的3个团外，还驻有绥靖公署直接指挥的10个团机动部队。至此，部署在皖浙赣边的国民党正规军共达20余个团，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形成了对皖浙赣边游击区的战役包围和严密封锁态势。

在战术上，“清剿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方针，每天只前进数里或10余里。每次前进，均以小分队先行侦察，大部队随后推进，每占一地，即驱使老百姓助其抄山、烧山，昼夜不停。在政治上，敌采取移民并村和“保甲连坐”等法西斯手段控制群众；同时强迫群众组织所谓“守望队”，以监视红军游击队活动。并由地主豪绅组织所谓“善后委员会”，对群众进

行欺骗宣传。在经济上，对物资流动严加控制，不准粮盐、药品进出山村。更有甚者，对游击根据人新的部署，2月11日，关英一行在遂安县霞源山陷入国民党3个正规团的包围中。当日，关英率部撤至遂安毛太里。第二天，关英等决定兵分3路，分别由关英、熊刚、刘毓标各带1个连分头向浙南方向突围。原计划到开化县白马镇东千里岗会合后继续南下。结果，熊刚带的1个连遭敌人堵截，部队在冲杀中伤亡严重，只剩下20余人，被迫折返鄣公山根据地。刘毓标带领的1连人，孤军深入，在白马镇附近再陷敌军重围，部队几乎损失殆尽。3月3日，刘毓标在衢县孟坑受伤被俘，后被关押在衢州监狱，直到同年夏秋间才获释。关英率领的1个连也被敌军冲散。最后，关英身边只剩下3个人，他们在化婺德地区几经辗转，均未找到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无奈，关英等4人便在玉山县的白石桥以开油坊作掩护，暂作隐蔽。从此，皖浙赣边游击区失去了省委领导中枢。

与此同时，皖浙赣边各游击区也遭到了挫折。2月中旬，下浙皖特委独立营为配合皖浙赣独立团行动，决定攻打敌第43师驻淳安县郭村的一个营部，并计划攻打遂安县城，结果战斗失利，部队在转移中又几遭敌人打击，最后剩下特委书记何英等30余人，被敌包围于淳安许家山。何英悲观失望，宣布游击队员分散回家隐蔽，而他本人下山后却暗中投敌叛变。在这前后，由于敌人残酷“清剿”，加之叛徒出卖，特委和县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领导人或被捕被杀，或自首叛变。少数幸存者，如特委副书记刘忠林等辗转返回赣东北老家，下浙皖游击区遂告失败。

在浙皖游击区，2月初，因叛徒告密，正在遂安县横源田开会的衢遂寿中心县委，遭敌突然袭击。中心县委书记严忠良在反击战斗中牺牲，县委委员和游击大队主要领导人或牺牲或被捕。衢遂寿地区幸存的革命者被迫转入地下。随后，浙皖特委书记赵礼生、军分区司令员邱老金等率浙皖独立营在开化何田活动时，遭敌第16师第18旅伏击，部队被打散，赵礼生、邱老金各带几个人在被强迫搜山的“壮丁队”掩护下脱险，转入隐蔽斗争。后来，邱、赵2人先后被国民党逮捕并惨遭杀害。

在上浙皖游击区，特委独立营于2月5日集中在宁国、孝丰交界的中村石壁山欢度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时，遭敌第34师部队和浙江保安团数千人围攻。6日，独立营奋起抗击进犯之敌，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击毙第34师营长以下20余人。是日晚，独立营巧妙地跳出敌包围圈，并造成“分进合击”的各路敌军互相攻杀。随后，上浙皖特委率独立营在浙皖边辗转游击。6月初，部队在皖南广德县野鸡冲隐蔽休整时，因叛徒告密，遭敌第34师部队突然合击。战斗中，独立营被打散，仅30余人突出重围，转到郎溪、广德边境活动。特委书记邵长河身负重伤，脱离险境后，隐居民间。游击区的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

赣东北和皖赣两个老游击区，情况稍好一些，但也遭到重大损失。5月初，赣东北分区委书记余金德，军分区司令员夏年丰率赣东北基干游击队，在乐平县鸣山与皖赣特委书记王丰庆等率领的皖赣独立营会合时，暴露了目标。敌第16师第93团及巡察队千余人，跟踪而来。至三县岭，红军游击队与敌激战一整天，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王丰庆率皖赣独立营幸存的40余人转移到德兴张家坂时，复遭敌围攻，王丰庆被俘，仅10余人冲出敌围，转入祁浮婺根据地。余金德、夏年丰率赣东北游击队余部50余人，从三县岭突围后，辗转于德兴、上饶边界。5月上旬，在德兴上杨家湾遭敌伏击，游击队

伤亡殆尽，余、夏 2 人负伤被俘，后被敌杀害。损失虽然惨重，但赣东北和皖赣边两个游击区幸存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在老区人民援助下仍在继续坚持斗争。

（三）游击区军民相依为命，共度难关

经过 1937 年春的挫折，皖浙赣游击区元气大伤。省委实际上已中止了活动，名存实亡，各地党组织均遭到严重的破坏，红军游击队损失惨重，新开辟的几个游击根据地基本丧失，老游击根据地也被分割得支离破碎。更有甚者，国民党反动派残暴地制造无人区。他们进入游击根据地后，几乎见屋就烧，见林就砍，见物就抢，见人就抓。他们还到处建立明碉暗堡，密布岗哨，对误入他们“警戒区”的生人，“格杀勿论”。一时间，血雨腥风笼罩大地，数百里山区，一片荒凉。正如当时《徽州日报》所报道的：“清剿”区域“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木，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阡陌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其惨景令人目不忍睹。

然而，富于革命传统的皖浙赣游击区军民，对革命矢志不移。国民党的残酷“清剿”与屠杀，并没有吓倒他们。他们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宁死不屈。受挫后，幸存的几支游击队——皖赣特委书记兼祁婺休中心县委书记李步新率领的皖赣独立营一部；皖浙赣独立团团团长熊刚率领的该独立团余部；原红 10 军团第 19 师干部柴荣生率领的该师余部第 10 连；都湖鄱彭中心县委书记田英率领的所属游击队；上横弋德中心县委书记杨文翰率领的赣东北游击队余部；上浙皖特委书记兼独立营营长阙怀仰率领的该营余部等，分别在皖赣边的鄣公山、都湖鄱彭的武山、赣东北的磨盘山和皖南的郎溪、广德边境等地区，与当地人民群众相依为命，同舟共济，不屈不挠地进行抗争。

移民并村和焚烧山棚，是敌人制造无人区的狠毒手段之一。为了应付敌人的移民并村，红军游击队一面发动群众先以“在山靠山吃，下山没饭吃”的实际问题为武器，抗拒敌人。到了最后不能抵抗时，为避免群众遭受重大损失，小村群众也可以暂时并到大村去，以徐图良策。另一方面，游击队也作些必要的准备，把购买来的粮食分散埋藏在山区各处，以备长期坚持。

在行动方针上，红军游击队确定，留少数人在中心区坚持，同群众保持联系，作为群众与敌斗争的主心骨，使群众感到有希望，有依靠；游击队主力转移到外线去，在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带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立足点，以牵制敌人，如都湖鄱彭游击队，不断寻找战机歼击小股分散之敌，先后在都昌县三汊港、鄱阳县庙前街和都昌县源头港等地袭击江西保安第 14 团和独立第 36 旅的小股部队，共歼敌七八十人，缴枪 40 余支。这给在逆境中坚持斗争的群众以很大的支持和鼓舞。李步新率皖赣游击队一部，从鄣公山基本区转移到祁门县舍会山与祁婺要中心县委书记江天辉等会合，以舍会山为依托，与敌周旋。由于敌人长期围困，游击队原先分散埋藏的一些备用物资用完后，就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虽然野菜、野果可以充腹，但这只能暂时勉强维持生命，而且能吃的野生植物也有枯竭之时。为了生存和发展，游击队决定留少数人在山里隐蔽坚持，其余的人跳到外线敌人空虚地带，打土豪，筹措物资，与群众同舟共济，同时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保甲长同情或保持中立。这个措施使游击队摆脱了绝境，在舍会山地区站稳了脚跟。

在这期间，根据党组织决定，留在各游击根据地中心区坚持隐蔽斗争的游击队指战员，最为艰苦。坚守鄣公山根据地的游击队，被围困在一座叫六股尖的高山上，由于山高恶寒缺衣，又不能生火取暖（为避免暴露目标），一次就冻死 20 多位游击队员。熬过了严寒，又面临着粮荒。有的游击队接连

四五个月主要以野菜充饥。由于长期缺乏营养，特别是缺少油盐，游击队员体力十分虚弱，加上缺医少药，死亡随时威胁着每一个人。然而，革命战士志坚如铁，宁肯饿死，也决不向敌人放下武器。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支持着他们向死神挑战。

为了救护子弟兵，皖浙赣边人民群众，想尽一切办法，冒着生命危险上山接济游击队。他们节衣缩食，借上山砍柴，下田送肥，或外出走亲戚之机，将自己定量配购的粮、油、盐、药等物品藏在圆竹杠里或粪桶、箩筐夹层中，偷送上山，解游击队燃眉之急。许多群众为此献出了生命。鄞公山村农民汪林美、余之发，因给瑶里游击队送粮食被敌人逮捕，敌人逼他们交待游击队营地，他们至死都未吐露半点实情。舍会山村农民汪振丰，为游击队保存粮食、枪支，自己却吃野菜、谷糠。敌人把他抓到瑶里刑讯逼供，针刺手指、跪玻璃渣、坐老虎凳，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始终未透露埋粮地点。敌人抓不到把柄，他侥幸获释后，即举家上山随游击队行动，为游击队找粮食，挖野菜。每采集一种新野菜，他都是自己先尝。确认无毒后再让游击队员吃，为此他曾几次中毒昏厥。

由于革命军民鱼水情深，相依为命，所以无论国民党反动派怎样严密封锁，残酷镇压，都隔不断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游击区人民舍生忘死支持下，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终于击破了敌人的险恶企图，度过了艰难的岁月，迎来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时期。

六、复杂的谈判斗争与深刻的历史教训

（一）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斗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驻皖浙赣边界的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相继撤走，刘建绪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计划宣告破产。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并不因此而善罢甘休。他们借国共合作之机，玩弄阴谋诡计，到处张贴布告，要求红军游击队下山，接受收编。同时派遣叛徒何英等带着国民党的委任状到舍会山进行诱骗，企图以政治手段达到其军事“清剿”不能达到的目的。对此，红军游击队保持高度警惕。虽然这时皖浙赣省委实际上已经解体，各地区的党组织及游击队又失去相互联系，但共产党员的党性和革命战士的伟大理想，无形地将大家联结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又帮助党和游击队的领导者明辨是非，这就注定了反动派的政治阴谋不能得逞，复杂的谈判斗争在所难免。

为了统一认识，协调行动，李步新、王丰庆等皖赣特委领导人于1937年10月下旬，在祁门县宋家山召开了干部会议。这时，皖赣特委已从各个渠道获悉了中共中央有关国共合作的文件精神，认识到形势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据此，会议认为，红军游击队的行动方针，必须作适应形势的转变，并决定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以求结束对抗状态，实现合作抗日。同时借谈判之机，派人出去联系其他红军游击队和寻找上级组织关系。会后，皖赣特委发表了《告皖赣同胞书》，申明红军游击队为抗日御侮坚决主张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共御外侮，要求国民党当局尽速派出代表，前来谈判。

10月底，国民党闽赣浙皖边绥靖公署派中校参议兼别动队队长张甫成为代表上舍会山与红军游击队代表江天辉接洽谈判事宜。11月初，双方代表在浮梁县瑶里正式开始谈判。红军游击队代表李步新、江天辉首先声明，红军游击队谈判条件应由中共中央统一规定，在未得到中共中央指示之前，要求国民党履行下列条款：1.允许红军方面的人员通行，以便派人联络各地红军游击队；2.停止向红军游击队进攻，撤走游击根据地周围驻军，解除移民并村和封锁，恢复群众生产自由；3.释放一切政治犯；4.红军游击队可以停止打土豪，但当局要负责解决给养问题。国民党代表则要求红军游击队尽快下山，集中改编。双方几经商谈后，达成原则协议，并决定各自向自己的上级请示报告。

谈判结束后，皖赣特委决定派李步新和江天辉到南昌找项英、陈毅请示和汇报工作。李、江在国民党谈判代表张甫成陪同下，从瑶里出发先抵浙江衢州，然后乘火车赴南昌。当途经婺源县城时，李、江经与国民党县政府交涉，当局释放了一些在押的政治犯。当时驻婺源的国民党军还企图设圈套，要求李步新、江天辉写信给山上的红军游击队，调他们下山“整编”。李、江当即据理拒绝。

李步新、江天辉到达南昌后，找到了陈毅，汇报了皖浙赣边游击队革命斗争及新近同国民党当局谈判情况。陈毅传达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解释了有关问题，并对皖浙赣边游击区军民顽强斗争的精神和皖赣特委领导人机警地拒绝国民党的诱骗给予肯定和赞扬。陈毅还决定亲自到皖浙赣边游击区指导工作。在李步新、江天辉陪同下，陈毅从南昌出发，路经景德镇和瑶里时，同国民党当局商定，在景德镇设立红军办事处，由李步新任办事处主任；以瑶里为红军游击队集中整训地点。

12月初，陈毅到达舍会山后，即召集干部会议，向与会者传达了中共中

央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指示及有关政策和策略精神。同时向红军游击队作了国共合作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要求部队迅速改编，随时听候党的指示，开赴抗日前线。皖赣特委根据陈毅的报告和指示，一面向所在地区的各阶层人民宣传国共合作抗日的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一面派人到皖浙赣其他根据地，联络红军游击队，传达党中央和中央分局关于实行国共合作抗日和游击队下山改编的指示精神。

（二）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的集结与整训

皖浙赣边各地红军游击队，根据同国民党当局达成的协议和陈毅的指示精神，于1937年12月中下旬到1938年1月初，相继集结于舍会山。计有：熊刚率领的皖浙赣独立团余部30余人，阙怀仰率领的上浙皖独立营余部30余人，王丰庆、李步新、江天辉等率领的皖赣边红军游击队40余人，柴荣生率领的原红10军团第19师余部60余人，田英率领的都湖鄱彭红军游击队150余人，共计300余人。各路游击队集结后，即暂编为江西抗日救国军第2支队，熊刚任支队长，王丰庆任政委。接着，部队开赴浮梁县瑶里整训。皖赣特委机关也随迁瑶里。

1938年1月上旬皖赣特委再次派李步新等到南昌，参加新四军军部和东南分局召集的会议。会议期间，李步新汇报了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集中整编，以及皖浙赣边各地党组织联络情况。鉴于皖浙赣省委已经解体，为了继续联系皖浙赣边尚未联络上的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项英和东南分局决定将皖赣特委改为皖浙赣特委，辖原省委所辖地区。会后，东南分局决定派陈毅再赴皖浙赣边指导工作。

1月中旬，陈毅在李步新等陪同下，抵达瑶里，同时到达的还有党中央和东南分局派来皖浙赣边工作的陈时夫、朱辉、李华楷、张振东、刘玉琳、袁大鹏等一批军政干部。陈毅在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关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决定。同时，对王丰庆在1937年5月被俘时在景德镇一度动摇自首的严重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宣布撤销其特委书记职务。新成立的皖浙赣特委由李步新任书记，江天辉、陈时夫、朱辉、熊刚等为委员。陈毅在瑶里期间，还召集了各方知名人士会议，申明中共抗战救国的主张，阐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博得各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

皖浙赣特委抓住有利时机，高举抗日救国旗帜，宣传和动员群众。先后组织了几支宣传队，分别到祁门、休宁、至德、浮梁、婺源、景德镇等地区，广泛进行抗日宣传，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特别是动员广大青年参军参战，抗敌御侮。人民群众积极响应，热血青年踊跃参军，在短短10多天就扩军200余人，使红军游击队（连同地方工作人员）发展到500余人。

为了迅速提高部队军政素质，红军游击队在瑶里整训期间，加紧对指战员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在政治上，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思想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教育。同时针对部队思想作风上存在的问题，批评了游击习气、自由主义、军纪不严和组织松散等不良倾向，要求指战员自觉地加强组织纪律观念，树立良好的革命军人作风。在军事上，着重提高射击、投弹等技术，以及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以适应抗日战争要求。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南分局。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

（三）告别山区，开赴皖南

皖浙赣特委在组织部队整训的同时，积极做好告别游击区人民和后方留守的准备工作。

首先在政治上，加强抗日救国宣传，阐明中国共产党联合各界同胞坚决抗战的政治态度和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1938年1月23日，特委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皖浙赣特委为拥护国民政府及国军坚决抗战驱逐日寇告民众书》，高度评价了游击区人民对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热烈爱护和同情”，号召广大军民发扬“同生死共患难的艰苦卓绝斗争精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文告还热烈赞扬了国共合作推动全国抗战所取得的巨大收获，申明“皖浙赣的共产党员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精诚与国民党合作到底”，“创造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新中国”。最后要求全体同胞万众一心，“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扩大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火力向着日本强盗！”其次，在组织上，为掩护地方党组织开展活动和处理部队改编后的善后事宜，诸如安置伤残人员、联络失散的红军游击队、照顾军烈属和开展抗日宣传等，皖浙赣特委决定在瑶里公开设立以李华楷为主任的新四军留守处，在内部设立祁浮婺中心县委，江天辉任书记，李华楷为组织部长；在都昌县大港设立都昌地区留守处，以田英为主任，在内部成立都湖都彭中心县委，田英为书记。同时考虑到李步新将随部队开赴前线，决定由朱辉接任景德镇办事处主任，辖瑶里、都昌两个留守处，这样，有了公开的合法的办事机构，尚处于地下状态的党组织就可以将秘密工作与公开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

鉴于部队开赴皖南前线后党组织活动范围将随之扩大，皖浙赣特委难于统一领导。于是经东南分局同意，决定分成赣北和皖南两个特委，赣北特委以朱辉为书记，江天辉为组织部长，特委机关驻景德镇；皖南特委以郑振兴为书记，李步新为副书记，特委机关驻泾县茂林丁家山。

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皖浙赣特委于2月底组织红军游击队在瑶里举行抗日出征誓师大会。会后，除留下一支短枪队和地方工作人员100余人在原游击区坚持公开和隐蔽的斗争外，其余400人在李步新、熊刚率领下，告别山区父老乡亲，开赴皖南。部队到达歙县岩寺地区集中后，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第3营，熊刚任营长。从此，这支英雄的皖浙赣子弟兵，踏上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征途。

（四）万家惨案与杨文翰错误的教训

在国共和平谈判和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皖赣特委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既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积极主动地进行谈判改编，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组织纪律性，坚持红军游击队靠山扎，等待中共中央派人指导的原则。待条件成熟时，即果断地开赴抗日前线。这对保存皖浙赣边积蓄起来的革命骨干，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皖浙赣边，也有两支游击队在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把握不住方向，或丧失警惕，或狭隘保守，以致造成重大的损失。

上浙皖游击区，在 1937 年春夏遭受挫折后，尚幸存两支各 30 余人的红军游击队。一支为阙怀仰率领的浙皖独立营余部，于 1938 年 1 月初安全抵达舍会山集结；另一支是被敌人打散后重新集结起来的小游击队，也是独立营余部，这部分游击队在失去上级组织领导的情况下，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独自坚持斗争，不屈不挠，但却缺乏应付局势急剧变化的经验。当他们得到皖赣特委派人来传达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以及请他们前往瑶里集结整编时，紧张的心弦顿时松弛，盲目乐观。他们轻信国民党宁国县保安队的花言巧语，自蹈陷阱。他们同保安队商定，部队先在宁国万家集中，然后开往瑶里。1 月 21 日，当游击队集中于万家时，国民党保安队背信弃义，利用游击队的大意，突然收缴了游击队的枪械，并惨无人道地活埋了 20 多名游击队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万家惨案”。

赣东北的杨文翰的失误，同上浙皖游击队失误的原因正好相反，他不是和平麻痹，而是怀疑一切，从而铸成大错。

赣东北游击区斗争，在 1937 年 5 月失利后，剩下上横戈德中心县委及其所属的游击队 30 余人，加上单线联系的地下工作人员 40 余人，在中心县委书记杨文翰领导下，在德兴磨盘山和三县岭一带坚持斗争。后来随着抗日救国浪潮的高涨和国民党主力部队撤出赣东北地区，红军游击队得着发展良机。到 1937 年冬、1938 年春，仅杨文翰直接领导的游击队就发展到 90 多人枪，连同三县岭、怀玉山两支游击队共约 300 人 200 支枪。但由于游击队活动在偏僻山区，处于封闭状态，基本上与外界隔绝，消息闭塞。什么国共合作，和谈改编等等新事物全不了解。加之累遭叛徒出卖，和长期残酷斗争环境造成的心理伤害，以及思想水平的局限，致使农民出身的杨文翰难于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对外界的一切变化，都持怀疑态度。虽然他主观上忠于革命，但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对周围事变的进程只凭感觉判断，而不作科学分析，加之思想狭隘偏执，结果造成重大失误，并最终导致游击队的覆灭。

从 1937 年秋到 1938 年春，党先后 4 次派人上磨盘山联系游击队改编问题，均被杨文翰拒绝了。头两次上山的共 4 人被当作叛徒杀掉了。第 3 次上山的是上横戈德中心县委所属的丁山区委书记余明兴。1937 年 12 月，从事地下工作的余明兴同大阳县国民党当局沟通了关系，尔后上山劝杨文翰下山谈判。杨虽同意同国民党谈判，但由于双方认识距离较大，结果谈判失败。杨归罪于余明兴，说余是反革命两面派，不容申辩就将余枪毙了。行刑时，余明兴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仍未引起杨文翰的反思。第 4 次上山的是原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关英自 1937 年春率所属独立团从鄞公山前往浙南途中被敌人打散后，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虽经两个多月的积极寻找，但未

达到目的，无奈只好与随员及随身警卫等 4 人，以开油坊作掩护，隐居玉山县群众家中，并借外出卖油之机，设法寻找浙南的刘英、粟裕等。1938 年 2 月，改编为新四军的刘粟所部，经玉山、开化开往皖南。关英从中得悉国共合作抗战和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的消息后，立即动身到南昌去找上级组织关系。关到南昌后即同东南分局接上了关系，并自告奋勇要求亲自到赣东北动员杨文翰率部下山改编。关英要求获准后，于 2 月下旬带着东南分局的指示，以新四军代表身分前往赣东北。当到达原赣东北苏区首府葛源时，受到当地群众热情欢迎和关切问候，并派人与杨文翰取得联系，请其来葛源会见。杨不肯，坚持要关上山。关英即决定与原赣东北少共省委儿童局书记方旋声和 2 名警卫一起上山规劝杨文翰。杨文翰事先得悉关英曾一度与组织失掉联系，隐居玉山，这次上山路经横峰县城和葛源时，又受到国民党县、区当局设宴招待和派人护送，因而怀疑关英为虎作伥。当会面时，杨虽客气款待，但话不投机，双方由交谈变成争吵。最后杨令人将关英及其随员捆起来用刑逼供。关英怒骂杨鲁莽粗暴。杨盛怒之下令人将关英等 4 人枪杀了。杨文翰杀掉关英后，心存疑惑，即派人到南昌了解情况。南昌新四军办事处负责人得悉关英被杀后，对杨文翰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让来人转告杨，令其立即率部下山改编。但杨文翰固执己见，坚持“非见到红军大部队，决不下山”。

后来，赣北特委所属的弋阳、贵溪党组织同杨文翰领导的地方党组织，同时发展到一个村庄，成立了两个不同隶属关系的党支部，两个支部可以在一起交换意见，赣东北特委想借此说服杨文翰，但未成功。此后杨文翰率领所部孤军苦战，打击土豪劣绅等反动势力。但由于脱离了党的正确领导，偏离了抗日救国这个历史主流，因而孤立无援。最后游击队于 1943 年 3 月，在江西的贵溪县禾山源陷入反共军队重围，终于被彻底打垮。杨文翰因病未随部队行动，得知游击队垮了后，潜回赣东北其亲戚家隐蔽，于同年冬落入敌手，被杀害于弋阳城外。

杨文翰的悲剧告诉人们，一个革命者，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历史转变关头必将迷失方向，而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如果离开了党的正确领导，不论他如何英勇顽强，终将难逃失败的命运。反之，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克服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以博大的胸怀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周围事变的进程，作出科学的判断，同时加强组织纪律观念，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就将无往而不胜。皖浙赣特委在谈判改编中成功的经验，证明了这个真理。

皖浙赣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继承了闽浙赣苏区创始人方志敏“积极进取”的革命遗风。在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不怕失败和挫折。在逆境中，坚韧不拔，顽强抗争；一旦遇到有利时机，即放开手脚大干，积极扩展游击根据地。在鼎盛时期，游击区范围比原苏区扩大了 10 多个县境。

皖浙赣边游击战争，所以能广泛开展，并在逆境中得以坚持，关键在于党组织起着领导核心作用，皖浙党组织形成了一个由省委、特委、中心县委、县委、中心区委和区委以及基层支部结成的组织系统网，处处有党的领导核心，对复杂多变的游击战争环境，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这是红军游击队在残酷的“清剿”与反“清剿”斗争中，得于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因素。当然，游击战争的挫折，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党组织还不够成熟。

皖浙赣边游击区发展进程，出现的大起大落的变化，固然与客观形势和斗争环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但皖浙赣省委决策的正确与失误，则是个决定

的因素。如果没有 1936 年 4 月省委鄞公山会议的正确决策，就可能无法开创皖浙赣边游击区大发展的局面；同样，如果不是省委在 1937 年 1 月对斗争形势判断的失误及由此派生的冒进行动，就有可能避免后期惨重的损失，至少可以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这里的经验教训在于，作为独当一面的党的领导核心，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历史转折关头，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地估量斗争形势，既要有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又要防止轻率的决策和盲目的行动。

皖浙赣边党组织的失误，与成功比较，是第二位的。虽然后期遭到挫折，但基本游击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骨干保存下来了，而且最后又得以再度复兴，这说明皖浙赣边党组织和游击区军民是经得起考验的。尤其是皖浙赣边党不怕挫折、勇于进取的革命精神，为中国人民积累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七章 浙南游击区

浙南游击区，包括浙西南、浙南（含浙东南）、浙东等几块游击根据地。其中心区域，先在浙西南，即龙泉溪以北，包括龙泉、庆元、景宁、遂昌、江山、松阳、云和等县及闽北之浦城县一带边区。后来转移到浙南，即龙泉溪以南，庆元县以东，包括瓯江流域下游南部的泰顺、平阳、瑞安等县及闽东之福鼎等地区。而整个浙南游击区域，则遍及浙赣路义乌——江山段和天台山以南的浙江省南半部之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等 8 个地区的 30 个县，及闽东、闽北和赣东边沿地区，纵横 500 余公里。

这个游击区，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由刘英、粟裕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开辟和发展起来的。在历时三年的游击战争中，浙南红军和游击队，进行了数百次大小战斗，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猖狂的“进剿”和两次大规模的“清剿”。不仅巩固了浙南游击根据地，而且吸引和牵制着国民党军几十个团的兵力，策应了主力红军长征的战略行动，并有力地配合了友邻游击区的斗争。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大体上经历了 3 个发展时期：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和第一次反“清剿”；开辟浙南等游击根据地和第二次反“清剿”；迎接抗日高潮，促成浙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当然，各个发展时期不是截然分开的，前后两个时期，常常是相互交错的。

一、挺进师进军浙西南

（一）挺进师组建与挺进浙西南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以下简称挺进师），始建于1935年2月。它的前身是红7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与闽浙赣苏区的红10军合编的红10军团。

1934年7月，红7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在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等率领下，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进军闽浙皖赣边界地区，以图牵制国民党军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策应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当部队经闽东苏区和浙赣边境抵达皖赣边界时，寻、乐遵照中革军委10月15日电示，率所部折返闽浙赣苏区整理补充。11月1日，红7军团进入赣东北德兴苏区。旋奉中革军委11月4日指示，与红10军合编为红10军团，刘畴西（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乐少华分别担任军团长、政委。随后又决定由粟裕、刘英分任军团参谋长、政治部主任。

1935年1月间，进军皖南的红10军团失利。刘英、粟裕率军团先头部队，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回到德兴、横峰边境的篁村一带，与闽浙赣苏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会合。突围出来的部队，计有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和21师的第5连，以及军团政治部、供给部、保卫局的机关工作人员，共400余人。

2月初，中共闽浙赣省委根据中共中央1月15日电示，以红10军团余部为基础，加上闽浙赣军区红30师第1团100余人，共538人，步枪455支，轻重机枪12挺，编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主永（蕴）瑞任参谋长，黄富武任政治部主任，刘达云任供给部长，谢文清任没收委员会主任，张友昆任卫生部长。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师下面不设团、营、连，只编成3个支队和1个师直属队。支队规模实际上相当于连队，但其主官大都由团级干部担任，师部司、政、供、卫各部俱全，但干部配备极其精干。

中革军委和中央分局赋予挺进师的战略任务是：经过闽北，深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策应邻近游击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远征行动。

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蒋介石的老巢，反动势力根深蒂固。这个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大部遭到破坏，更没有作为红军依托的革命根据地，要在这里开创斗争局面，确实困难重重。但如果设法克服困难，在浙江境内建立起新的革命战略支点，那就等于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背部插上一把尖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开辟浙江地区虽然存在严重的困难，但也存在着许多有利因素，首先是地理环境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浙江的丘陵、山地约占全省面积70%，特别是与赣闽交界的浙西南和浙南地区，峰峦绵延。仙霞岭、雁荡山、括苍山山脉横亘其间，山高林密，地形险要，环境隐蔽，便于开展游击活动。其次是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群众基础。早在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浙江许多地区就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党领导农民运动，最早发端于浙江的萧山。浙江广大工农群众，对支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大革命失败后，浙江人民不畏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奋起抗争，尤其是浙南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在中共温州市委号召和组织下，浙南瑞安县的驮山、

仙降，平阳县的矾山、马站，永嘉县的五埭、溪口等地的农民群众，从 1928 年春起，相继举行暴动，组织革命军队，开展武装斗争。并于 1930 年 8 月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 13 军。虽然红 13 军于同年冬遭到失败，被迫停止了公开的武装斗争，但一部分人员仍坚持分散的隐蔽斗争，保存着革命的火种。第三，近邻有皖浙赣边、闽北、闽东等几块红色区域和红军游击队，成犄角之势，可以互相策应，互相支持。第四，浙江局势有隙可寻。当时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被吸引到主力红军的北上途中和中央苏区周围，浙江地区的国民党兵力相对薄弱，红军可出其不意地乘虚而入。如果采取正确的方针，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挺进师在浙江适当的地方立足生根，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挺进师指战员对进军浙江，完成党赋予的历史任务，充满信心。挺进师领导人刘英、粟裕等认真地分析了浙江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后，决定选择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创建红军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这个地区除了具有前面列举的有利因素外，还有一个可资利用的因素，这就是当地有一个拥有相当力量的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青帮组织。其主要领导人松阳县的陈凤山、卢子敬，早年在外地都曾接触过进步思想。1928 年闽北崇安、浦城农民暴动，对陈凤山影响很深，使他向往革命。卢子敬早年留学日本，在进步思想影响下，归国返乡办学校，积极学习与传播革命知识。陈、卢等一些青帮首领，实际上是当地很有威望的群众领袖。他们和青帮会众都有打富济贫的要求，同红军有过一些联系，其活动区域，挺进师可借作初步依托。

挺进师根据具体的进军目标，确定了具体的进军路线，即由闽浙赣根据地南下，从上饶进入闽北苏区，同闽北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再挺进浙西南地区。

为了胜利完成进军任务，出征前，挺进师进行了短时间的整训。然后于 2 月下旬誓师出征。部队在刘英、粟裕率领下，从德兴的广财山踏上征途。为转移敌人视线，挺进师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先直逼西南方的贵溪县，袭击裴源地区的敌第 57 师部队，歼敌 200 余人。紧接着挥师东进，以一夜 70 公里急行军的速度，越过敌人封锁线。然后向南，于 2 月 27 日从乌鸦弄险道攀过灵山，南渡信江，胜利到达闽赣边界。

部队所以能顺利跳出敌人重围，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地方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帮助。国民党军为了防止红军南进，在信江以北地区设置了 4 道封锁线。挺进师很难从正面突出敌人重围。正当挺进师领导犯愁之际，中共上饶中心县委书记徐旺生亲自出来为部队引路。通过一条偏僻的小道，迅速绕过敌人封锁线，抵达信江北岸的灵山。然而，横在面前的灵山，尽是悬崖峭壁，无法攀越。就在部队焦急地“望山兴叹”的时候，徐旺生又找来了一位向导。向导是苏区的一位基本群众，上山采药为生的老者，足迹遍于灵山。他热情地引导部队走到一处叫乌鸦弄的峭壁下，只见壁陡如削，令人望而生畏。老人说，这是横越灵山的唯一“通道”。接着，老人带领几个机灵的侦察兵系上绳索攀崖而上。爬上崖顶后将固定好的绳索放下来，让指战员攀绳而上。刘英手负伤未愈无法攀绳，于是警卫员将他缚在自己身上往上攀，另有一战士在下面推着，终于登上悬崖。就这样，部队惊而无险地越过灵山。当赶到信江岸边时，恰好遇上几条路过的商船。经交涉，商人爽快地答应借船。于是在船工们的热情帮助下，挺进师顺利地渡过了信江，进入武夷山区。

3 月 1 日，挺进师在闽赣边界的铅山县石塘街突然遭到江西省保安团的伏击，电台被毁，从此失去了同中共中央分局及闽浙赣省委的联系。

挺进师在出征前，曾向中共闽北分区作了通报，请他们予以接应。但由于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的叛变，使闽北斗争形势更加恶化，加之叛徒出卖了挺进师进军浙江的行动计划，致使挺进师进入闽北后，屡遭敌人袭击。费了几番周折，才于3月上旬在崇安县坑口乡地区与闽北的党组织和红军会合，并共同商讨了开展游击战争和被此间联系与协同行动等问题。

3月中旬，挺进师在崇安县岚谷地区会合了原红7军团北上时留在闽北活动的两个连队。这支队伍留下后改为闽北红军第3团，共150余人，由原营政委洪家云任团长，会合后即归属挺进师。为了加强挺进师活动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挺进师决定成立政治委员会（以下简称政委会），由刘英、粟裕、黄富武、宗孟平、王维信、姚阿宝、刘达云、洪家云、方志富等9人组成，以刘英为书记。同时对所属部队进行了调整，将3个支队改为3个纵队；第1纵队纵队长王永瑞（兼），政治委员刘达云（兼），辖第1、第3支队；第2纵队纵队长李重才，政治委员洪家云，辖第4、第6支队；第3纵队纵队长刘汉南，政委方志富，辖第7、第9支队。师直机关人员编成1个政治连。

部队整编后，于3月20日从崇安岚谷出发，经浦城县境向东北方向进发，翻越闽浙赣边界的仙霞岭，于23日进入浙西南地区。26日，袭占龙泉县溪头（住溪），歼灭了国民党1个基于保安中队，缴枪40余支，俘敌30余人。接着又袭击了王村口镇，俘虏了驻镇警察，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从此，独立师拉开了开辟浙西南的战斗序幕。

（二）斋郎战斗

浙西南是个重要的战略地区，驻有许多保安团队。挺进师要在这里立足，首先必须给这些地方反动势力以有力的打击。为此，挺进师领导决定，部队先在外围活动，将驻守据点的保安团队吸引出来，给予各个击破，扫除障碍，而后进入腹心地区开辟根据地。

根据上述行动方针，挺进师在三四月间，往返转战于浙闽边界。在溪头、王村口战斗后，挺进师又在武夷山、洞宫山区兜了几个圈子，后来又辗转游击于龙泉河以南之庆元、景宁、松溪、政和、寿宁、泰顺一带。先后进行了小梅、沙湾、上标、潭边街、百丈口等 10 余次战斗，歼灭了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拔除了一些反动据点。挺进师旗开得胜，使浙西南地方反动势力十分惶恐，时感“凤鹤频惊”。地主豪绅们纷纷要求当局采取紧急措施，集中力量，以遏制红军。当时，国民党军政当局以为红军必将在龙泉溪以南的浙闽边境立足，遂将龙泉河以北的浙江保安团队南调，同时令驻福建的部队北进，企图南北夹击，置红军于死地。4 月下旬，当敌得悉红军正在庆元县斋郎地区活动时，即令浙江保安第 1 团团团长李秀率所部 1200 余人，福建保安第 2 团团团长马洪深率所部 1000 余人，在大刀会等地主武装近千人的配合下，从东北、东和东南 3 个方向对挺进师进行分进合击。当时挺进师兵力只有五六百人，与敌比较是 1 比 5。然而挺进师是经过长期战争锻炼的革命队伍，军政素质远远超过敌人，加之地利人和，弥补了敌我数量对比之悬殊，只要组织指挥得当，打破敌人的夹击，是完全可能的。斋郎地处浙西南庆元、龙泉、景宁 3 县边界的百山祖山区，海拔千米以上，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是进行游击运动战的理想战场。这个地区的人民群众诚实质朴。起初，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村民对红军存有疑惧。挺进师进村时，大多数群众躲进深山，只有一些老弱病残者留在家里。部队进村后，立即开展群众工作。政工干部在墙上刷标语，宣传红军宗旨；战士们为村民打扫卫生，挑水、劈柴，亲如一家；医务人员还为患病群众治病，关怀备至。这一切使村民深为感动，躲进山林的人们纷纷返回家园，从此，鱼水相依。有了群众的支持，就更增加指战员战胜敌人的信心。于是，刘英、粟裕决心借重斋郎的民心与地势组织一次战斗，“枪打出头鸟”，以震慑反动派。

敌保安团针对红军兵力有限，弹药不多，更无后方补给的实际情况，决定采取“先扰后歼”战术，即以豪绅武装打头阵，先予红军以扰乱和消耗，然后出动主力，一举歼灭之。敌人这个自鸣得意的企图正好给了红军以各个歼灭敌人的良机。挺进师在刘、粟的精心组织指挥下，迅速作好战斗准备，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

4 月 28 日上午，战斗开始了。手持刀枪的地主豪绅武装，漫山遍野地呼啸而来，挺进师指战员运用近月来对付大刀会的经验，采取武力教训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策略，不到半天功夫便将这乌合之众全都瓦解了。接着，浙江保安第 1 团李秀部骄狂轻进，一下闯到挺进师预设阵地前沿。红军指挥员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手榴弹组成的密集火网，突然泄向敌群。敌猝不及防，惊慌失措，顿时尸横遍野。被打断了手的敌团长李秀急率残部落荒逃窜。红军乘胜追击 7 公里，方返回打扫战场。此时，刚从东南方向赶来的福建保安第 2 团团团长马洪深，恐重蹈李秀覆辙，慌忙率部回窜。此役共毙伤敌 300 余人，俘敌近 200 人。

斋郎战斗的胜利，为挺进师执行开辟浙西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敌保安团队斋郎析兵，心有余悸，在尔后一段时间内转攻为守，龙泉溪以北的敌人力量比较空虚，一些反动地主豪绅纷纷逃离浙西南。这佯挺进师就获得了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有利时机。

（三）云和会议与挺进师战略方针的转变

斋郎战斗后，挺进师北渡龙泉溪。5月上旬，在云和县境召开了师政治委员会全体会议（云和会议）。会议总结了前一段的斗争实践，分析了浙西南的社会和地理环境，确定了挺进师当前的任务和行动方针。会议认为，部队进入浙西南后，连战皆捷，为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不能长期集中兵力作战。因为实行大兵团作战，不仅难于施行分兵发动群众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而且也不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环境。所以，当务之急，是将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把武装斗争与创建根据地结合起来。据此，会议决定，分兵发动群众，开创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具体部署是：

1.以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和龙（泉）云（和）松（阳）遂（昌）边两个地区作为建立第一块根据地的基本区域；

2.派第2纵队回浦城、江山、龙泉、衢州、常山等县之间开展游击战争，以迅速打通与闽北等游击区的联系；

3.成立浙西南特委，以宗孟平为特委书记，并为政委会随军代表和第2纵队行动委员会书记，随2纵行动；

4.以黄富武、刘达云、王永瑞3人组成政委会分会，黄富武为书记，领导第1纵队和师政治部全体工作人员，分布于龙泉、云和、松阳、遂昌等县之间，发动群众，建立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开辟游击根据地；

5.刘英、粟裕率第3纵队北出汤溪、龙游、金华、武义、宣平、处州之线辗转游击，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迫近杭（州）江（山）铁路（今浙赣线），威胁杭州、金华、处州等中心城市，吸引国民党军主力北调，以策应第1、2纵队遂行开辟游击根据地的任务。

云和会议，是挺进师由正规战到游击战转折点，为开创浙西游击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确定了正确的行动方针，在浙南游击区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然而正确方针的制定与贯彻执行之间，总是有一段距离。要完成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并非易事。挺进师原是一支长于野战的红军正规兵团，指战员都习惯于集中活动和大兵团作战，一旦要他们改变熟悉的方式，实行分兵发动群众和独立开展游击战，一时难于适应。加之闽赣子弟兵，入浙后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增加了做群众工作的困难。因此，一些人面对新的斗争任务和要求，产生畏难情绪，缺乏信心。对此，挺进师领导早有预料，并逐渐采取了相应措施：

一是加强思想工作的针对性。针对部队的畏难情绪，通过分析进军浙西南和开辟新区的有利条件，提高指战员信心；召开政治讨论会和群众工作经验交流会，研究党赋予的新的历史任务，学习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并强调指出，既会打仗，又会做群众工作，是开展游击战争必备的两个基本条件，使干部战士明确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努力方向。

二是调整部队编制和干部配备，使之适应游击战争环境。在部队由赣东北进入闽北时，刘英、粟裕为适应部队行将分散独立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将原编的支队升格为纵队，委派师部部门首长或师政委会成员担任纵队领导。同时，各纵队设立行动委员会，作为纵队的集体领导组织，以便在部队分散情况下，既能独立行动，又能互相配合。

三是让干部战士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逐渐熟悉和学会分散游击的方式。万事起头难，起初派一个团级干部带1支小部队出去活动，要求他半个月后到预定地点与师部会合。可是才3天时间，他就带着部队回来了，且显得很狼狈，说搞不了，死活要跟大部队一起行动。后来刘、粟改取渐进办法，即派出去的小部队，单独活动时间，先是一次三两天，然后逐渐延长到5天、7天、10天、半个月，使他们逐步适应分散活动的环境，学会独立处置情况的办法。通过这个措施，使指战员进一步了解群众的疾苦和要求，逐渐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掌握当地方言，积累分散游击和做群众工作的经验，从而保证顺利地实现新的战略转变。

二、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一）深入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局面

1935年5月云和会议后，刘英、粟裕率领挺进师主力经龙泉县源口、郑坑、小吉进抵遂昌县安岱后和松阳县枫坪，在浙西南腹地广泛开展群众工作。首先争得了以松阳县进步人士陈凤山、卢子敬为首的青帮组织的支持。当挺进师进入龙（泉）遂（昌）松（阳）边界地区时，就受到当地青帮会众的热烈欢迎。陈、卢的青帮会众，绝大多数是当地贫苦的青壮年农民，他们深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和欺凌，有朴素而强烈的革命要求，其中相当多的人曾参加过1928—1930年的武装暴动。挺进师一到，他们就积极靠拢，主动表示希望得到共产党的领导。随后，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工作，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地区后的第一批地方党员和干部。这样，挺进师就有了初步的依托。接着，部队在以安岱后、枫坪、白岩（今玉岩）为中心的松阳、遂昌、龙泉边界地区，深入发动群众，遂行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任务。

浙西南地区是个贫瘠山区，在地主豪绅阶级残酷盘剥下，群众生活极其困苦，加之连年灾荒，旱灾过后复水灾，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广大贫苦农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面对这幅惨景，挺进师提出了“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夏荒”的行动口号。这个口号反映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迫切要求，博得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挺进师如鱼得水，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这时，国民党浙江地方武装主力——保安团队，被活动在杭江铁路附近地区的挺进师主力吸引和牵制在外线，留在内地的有限兵力，集中守城尚嫌不足，更无力兼顾四乡。在内线担任开辟根据地任务的挺进师部队，置县城于不顾，分兵于广大农村，辗转游击，发动群众。部队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首先将国民党的区、乡土杂武装消灭掉。基层官吏和土豪劣绅，闻风丧胆，四处逃散。逃散不及而被红军捕获的，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于罪恶多、民愤大的，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坚决镇压，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分配给贫苦群众。如5月17日，挺进师部队袭占了松阳重镇古市，公开处决了反动镇长和巡官。复于5月21日，袭击龙游溪口，镇压了作恶多端的龙游公安第三分局局长，大快人心。对于那些罪恶较轻、民怨不深的官吏和一般乡绅，则加以警告或教育争取。这样“刚柔并济”，恩威兼施，使反动的区、乡政权，顷刻瓦解，农村的封建势力遭到严重的打击。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群众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积极投入革命斗争。挺进师因势利导，将发动起来的群众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和赤卫队，以及青年、妇女等革命群众组织。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采取革命措施，建立农村革命秩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这道发自仙霞岭的革命霞光，映得浙西南大地一片火红。

（二）粉碎国民党军“进剿”

浙西南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令国民党浙江当局震惊不已。他们在惊呼“松遂龙各县大半赤化”之余，慌忙采取紧急措施。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与省保安处负责人宣铁吾等紧急磋商，决定全力“进剿”。妄图将浙西南红军游击根据地，扼杀在摇篮里。

国民党浙江当局这次“进剿”，以浙江4个保安团为主体，同时调集了全省15个保安大队中的11个，再加上刚从南京调来的税警总团的1个团，合约八九个团的兵力，由蒋志英、陈式正统一指挥。从5月中旬开始，分4路向挺进师进攻。

刘英、粟裕处变不惊。他们根据前一段时间对付保安团的经验，决定第2纵队留在基本区继续开展群众工作，师主力分为南北两路，趁敌尚在运动中，先机跳到外线，转入敌后，威逼敌人后方据点，迫使进攻红军游击中心区的敌军回援，以保证中心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得以继续开展。

在具体部署上，刘、粟决定由师政治部主任黄富武率领第1纵队为南路军，向西南行动，在龙泉、江山、遂昌、松阳、云和等县边境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刘、粟亲率第3纵队和直属队为北路军，向北方行动。在汤溪、遂昌、金华、宣平、龙游等地发动猛烈攻势，打击和牵制敌人，挫败敌人的“进剿”计划。

根据上述决定，刘、粟率北路军由遂（昌）松（阳）边界昼夜兼程北上，矛头直指汤溪城。当敌人拼命巩固城防的时候，刘、粟又突然率部迅速折向遂昌县的门阵一带，动员群众，打土豪，斗劣绅，刷标语，搞宣传。当群众发动起来时，部队留下20多名指战员就地坚持游击活动，以掩护群众斗争。主力由群众积极分子带路，奔赴汤溪上阳村。接着，在上阳村的数十名农民积极分子配合下，进袭南坑。部队每到一处，照例发动群众，惩处土豪恶霸，动员青年积极分子加入红军，群众工作轰轰烈烈。

挺进师主力在汤、龙（游）、金、宣、遂等县之间来回游击，仅10多天时间，就将革命火焰引到杭江铁路线上，威胁敌人交通动脉。铁路沿线国民党地方当局纷纷向省会杭州告急，弄得省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黄绍竑坐卧不安。与此同时，开赴游击区“进剿”的保安团主力，处处扑空。更有甚者，由于各保安团缺乏协同行动计划，竟造成自相交火，在大龙山一次因误会引起的“自相火并”中，就死伤100余人。这更使黄绍竑增添恼恨，于是决定“御驾亲征”。他打着“推行‘新运’抚慰灾黎”的旗号，率仕官教导团到前线助战。

浙江仕官教导团，是培训浙江保安团队骨干的武装集团，成员反动愚勇，装备精良，被黄绍竑视为“怀中利剑”，特别是新近一期学员，全是浙江各县的基干队长和常备队长，是一批反共的亡命徒。6月12日，黄带着这把“利剑”由杭州抵达金华，以图振奋浙西南地区的反动势力。

挺进师得悉上述情报后，即研究对策，决心采取预为布置，以逸待劳的战法，给仕官团以突然打击。6月14日，刘、粟抓住有利战机，指挥部队突袭宣平乡，全歼仕官团的1个中队，接着又奔袭小溪口，再歼敌1个中队。黄绍竑见其基干接连被歼，十分懊丧，自知无回天之力，被迫于20日匆匆窜

即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

回杭州，宣告“进剿”失败。其秘书长在对记者发表谈话时称：“目前形势是此剿彼窜，兵去匪来”，难于对付。这是敌人无可奈何的供状。

挺进师主力外线出击的胜利，有力地掩护了内线部队群众工作的开展。留在基本区的第2纵队，一面扫除区内的反动势力，一面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分粮斗争，动员青年农民加入红军，扩大部队。同时，积极帮助地方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五六月间在龙泉、浦城边界的上王塘建立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中共县委——龙浦县委以及一些区委。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有力地保证了地方工作的开展。

为了加强根据地建设，政委会于6月上旬，决定成立地方工作团，由杨干凡兼团长，柯金发任副团长，在松、遂、龙边界开展群众工作。

（三）小吉会议与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形成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新的斗争环境，挺进师政委会于 1935 年 6 月上旬在松阳县小吉召开会议，研究新的斗争部署。会议作出了几项决定：第一，成立浙西南军分区，由粟裕、刘英分别兼任司令员、政委。军分区机关和师政委留在云和、龙泉以北，处州以西，宣平、松阳、遂昌、衢州以南地区活动；第二，由黄富武接替新近牺牲的宗孟平遗留的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职务，杨干凡任特委副书记；第三，由刘达云、许信焜、王永瑞、范连辉、王屏等人组成第 1 纵队行动委员会，刘达云、许信焜分任正副书记，率领 1 纵到永康、缙云、处州（今丽水）、青田、永嘉、仙居、东阳等县边境活动；第四，第 4 支队扩编为第 4 纵队，王裔三任纵队长，李凡林任政委，辖第 10、第 12 两个支队。4 纵的主要任务是，在龙泉溪以南的庆元、龙泉、云和、寿宁、政和、泰顺等县边境开辟游击根据地，争取与闽东游击区取得联系。此外政委会还决定组建独立第 15 支队，刘文生任支队长，柯金（勤）发任政委，以松阳安岱后、枫坪、玉岩为基地，开展松（阳）遂（昌）龙（泉）边境工作。

根据小吉会议的部署，挺进师展开于浙西南各县边界，将伺机歼敌和发动群众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在主力进行反“进剿”的武装斗争掩护下，地方工作团和各部队的群众工作，很快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除成立中共龙浦县委外，还在竹溪、白岩、王村口、住溪等地，相继成立了中共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在小吉、枫坪、斗潭、高亭、安岱后等地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群众武装和各种群众组织。这样，挺进师自进军浙西南后，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努力，迄 7 月间，就在松遂边界的安岱后、大潘坑、大横坑、苏马坪，龙遂边界的王岩、枫坪、小吉、上田、东畚，遂西南的王村口、独口，龙西的碧蓉、住溪，闽北浦城的毛坪，以及处州的雅溪、曳岭、丽云，龙南的上田、季山头、黄桶等广大农村点燃起革命火把。各地群众普遍地开展了抗租、抗捐、抗债、抗税运动。在条件成熟的基本区，苏维埃政府或农会开始进行查田、量地、插标，准备分配土地和青苗，拉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

在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的基础上，各基本区相继建立了游击队，积极发展群众武装，并以地方游击队作为红军的后备兵员，源源不断地补充挺进师。7 月间，以独立第 15 支队为基础，吸收松阳地区的部分游击队，编成了挺进师第 5 纵队，刘文生任纵队长，柯金发任政委，辖第 13、第 15 支队。为了协调和推动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师政委会还决定成立松遂龙游击总指挥部，以松阳群众领袖陈凤生、卢子敬分任正副总指挥，辖游击队员 1000 余人。

为了纪念“八一”建军节和震慑地方反动势力，挺进师于 7 月底 8 月初发起了“八一”大示威，开展“缴枪扩军”活动。根据师政委会部署，第 1 纵队袭击了仙居秦章；第 2 纵队袭击了遂昌、汤溪敌据点和衢州火车站，直逼杭江铁路；第 3 纵队袭击了遂昌、汤溪、金华敌军；第 4 纵队袭击了龙泉、八都镇，占领了住溪、王村口；第 5 纵队占领了龙泉、松阳的一些敌据点，并破坏了云（和）龙（泉）公路。这次行动挺进师共缴获长短枪 100 余支，轻机枪 2 挺；扩军 400 余名；破坏了龙泉、浦城、松阳、遂昌、龙游、云和、汤溪等县的一些公路和敌电话线；张贴和散发了标语传单数万份；筹款数万银元，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有力的打击，致使浙西南反动当局复感“风

鹤频惊”。这一胜利大长了部队的志气，振奋了民心，扩大了红军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游击根据地建设。

到八九月间，挺进师已发展到近千人，连同地方工余人员共计 2000 余人。领导中枢（师部和政委会）设在遂昌县的王村口。王村口是蔡溪东岸山谷中的一个村镇，有 100 多户人家，20 余家店铺。小镇傍山面水，来去只有一条通道，易守难攻。镇后山地形更为险要，师后方基地就设在这里，设有军需物资供应站、军械修理所和伤病员休养所等后方勤务机构。

自 5 月师政委会云和会议后至 9 月中旬，在短短四个半月内，挺进师在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发动群众，胜利地达到了挺进师在浙江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边境地区建立起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基本区域纵横百余公里，红军游击队活动范围则扩展到北抵杭江铁路，南达浙闽边界北段，西及赣闽边境，东至丽水、宣平的广大地区。

独立师在开辟新的红色根据地过程中，正确地把握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集中打击敌人和分兵发动群众的辩证关系，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粉碎敌人“进剿”和打击地方反动势力，为创建根据地开通了道路，提供了保障；而分兵发动群众，加强根据地建设，又反过来支持了武装斗争，保证红军游击队进退有据。这是挺进师在浙西南创建游击根据地的成功之道。

有了根据地，挺进师在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就有所依托，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也就有了保证。但也从此进入了更为艰苦的斗争阶段。因为在全局上处于优势的敌人，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必然以更大的力量 and 更残酷的手段对付红军游击队。

三、抗击国民党军第一次大“清剿”

（一）国民党军重兵压境

挺进师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创立，犹如在国民党统治中枢的后院煮上一把火。素以“平安之区”自诩的浙江省，顿失“太平”。国民党在浙江的喉舌《东南日报》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患已涉及全浙。以目前形势而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国民党浙江当局，并非无动于衷，早在1935年7月间就在遂昌县城设立了以省保安处长宣铁吾任指挥的“浙南剿匪指挥部”，以图遏制红军。但无济于事。致使南京统治集团深感不安。蒋介石鉴于地方保安团队对付不了挺进师，遂急忙决定调遣“中央军”入浙进行“清剿”，企图在保安团队配合下，一举扑灭其“后院”烈火，摧毁浙西南红色游击根据地。

8月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第18军军长罗卓英为“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以下简称“四省剿总”）的正副总指挥。指挥部设在浙西南的江山县城，随后移驻衢州。同时调遣“中央军”主力第18军入浙，施行“清剿”任务。第18军是陈诚赖以发迹的蒋介石嫡系王牌军，其师、团长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柯、胡璉、阙汉騫、高魁元等是清一色的黄埔校友，后来都成为蒋嫡系著名干将。

“四省剿总”制定的《第一期清剿计划》，规定以主力配置于浙西南边境，担任主“剿”，并“以各边区大部（兵力）对付粟、刘”，由罗卓英负责统一指挥。当时，福建、江西、浙江、安徽四省边区受“四省剿总”节制的部队共有63个正规团，“清剿计划”拟以其中的一大半对付浙南游击区。

罗卓英受命后，即率所部主力第11、第14、第67、第94师由江西向浙西南开进。同时作出了具体的“清剿”部署：第14师3个团在北面的遂昌，第94师3个团在东北面的松阳，第67师3个团在东南面的云和，浙江4个保安团在南面的龙泉，从闽北调来的第3师李玉堂部2个旅5个团在西南面的浦城毛坪、花桥和龙泉八都一线，“剿匪第二纵队”部子举部4个团在西北面的江山、衢县以南地域，构筑堡垒工事，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形成四面包围；另从北面的遂昌县溪圩经东舍到南面的龙泉构筑一条策应各方的堡垒线，将整个包围圈分为东西两半，以第11师3个团由龙泉向北机动；第18军军部率特务团驻丽水。此外，还从福建调遣第56师刘和鼎部2个旅6个团，由浦城下向东南经花桥、庆元至泰顺，构筑第二道封锁线，以切断挺进师转向闽北、闽东的退路。以上兵力共32个整团，连同当地豪绅土杂武装，号称40个团，共约六七万人，数十倍于浙西南红军游击队兵力。无怪乎卫立煌限令在11月20日前“肃清”挺进师。

对敌人发动新的“清剿”，挺进师领导虽早有察觉，但判断有误，以为是新任浙江保安处长兼“浙南剿匪指挥部”指挥宣铁吾故技重演。五六月间黄绍竑与宣铁吾策划的“进剿”受挫后，复于7月间，宣亲自出马，指挥4个保安团和10余个保安大队，以遂昌为核心，构筑封锁线，围困红军游击队。并扬言采用“回环压迫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直捣松遂边界红色根据地。对此，挺进师指战员不怎么在意。他们对浙江保安团队的战斗力心中有数。特别是经历了胜利的反“进剿”和“八一”缴枪扩军行动，鼓舞了士气，并取得了对付保安团队的实战经验。因此，部队多少存在着麻痹轻敌情绪。直至9月中旬察明面临的敌我态势后，才感到局势严峻。

9月上旬，国民党浙南“清剿”军，按计划部署完毕。同月11日，“四省剿总”由江山移驻衢州，“浙南剿匪指挥部”由遂昌南移龙泉。在这之前，第18军军部已由金华移驻丽水。从19日起，敌各师按预定的“清剿计划”开始进行“清剿”，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二）挺进师破敌部署

1935年9月20日，刘、粟指挥挺进师主力在松遂龙游击队配合下对驻龙泉上田之敌，发起猛攻。守敌是第11师的1个团。经一昼夜激战，挺进师将敌击溃，毙伤敌100余人，俘敌40余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从俘虏口中得悉守敌是国民党的中央军，同时获悉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清剿”的军事部署。挺进师领导感到问题严重，遂于21日在龙泉上田召集政委会议，分析当前敌我形势，以确定破敌方针。

会议在判明面临的严峻局势后，借鉴了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灵活机动破敌的历史经验，以挺进师的实力和面对的险恶环境出发，实事求是地确定以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大规模“清剿”。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敌进犯我根据地，我则进击敌人后方。在战术上，当敌人进攻时，应绝对避免正面战斗和对峙局面，必须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给敌以奇袭、伏击与侧击。同时采取声东击西战法，突袭敌人后方。在根据地内深入动员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给敌人制造困难。

根据上述方针，政委会决定留下第2纵队和第5纵队的第15支队以及地方工作团，协同地方游击队，在浙西南特委统一领导下，就地坚持斗争；师主力迅速跳出敌人包围圈，向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地区进击，以吸引和调动敌人。同时大力开辟新的游击区，创立新的游击根据地，从战略上粉碎敌人“清剿”之企图。在具体部署上，决定第1纵队转向浙东行动，即北渡瓯江，转入青田、永嘉、丽水、永康、缙云、武义、仙居、新昌、天台、黄岩、盘安等县的广大农村活动。第3、第4纵队和第5纵队第13支队及师直属队由刘英、粟裕率领南下，到浙南的庆元、泰顺和闽东的寿宁地区活动，并伺机进逼平阳、瑞安、温州，与第1纵队遥相呼应，吸引“清剿军”主力向东南调动，以解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之围。

根据政委会部署，9月25日，刘英、粟裕率师主力由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中心区南下，在龙泉县境的哈湖渡过龙泉溪，突破国民党军第67师的云（和）龙（泉）封锁线，抵达浙闽边境。在突围战斗中，第3纵队纵队长刘汉南英勇牺牲。突围后，刘、粟采取“避实就虚，避强打弱，避（敌）正规军，打（敌）地方武装”的作战方针，在边境游击与敌周旋。

第4纵队在突破敌人封锁线后，遵照刘、粟指示，转入闽北游击区，在崇安岚谷与闽北独立师第4团第1营合编为闽北独立师第2纵队，王裔三任纵队长，在邵武、顺昌、建阳等县边界地区开辟游击区，坚持游击战争。与此同时，第1纵队在纵队行动委员会书记刘达云、纵队长王屏、政委杨金山率领下，按计划挺进浙东，牵制敌人。

然而，罗卓英老奸巨猾，当他获悉挺进师主力已突围进入浙闽边境时，虽然不胜抱恨，但方寸不乱。他自知以数万大军追击分散活动不足千人的红军游击队，犹如“拳头打跳蚤”，难于奏效。因此，只以1个师约5个团的兵力负责“追剿”红军游击队主力，其余几十个团的兵力，仍按原计划死死掩住浙西南红军游击中心区，企图彻底摧毁红军游击队赖以生存的根据地。

（三）血战浙西南

留守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第2纵队和第5纵队第15支队，在地方游击队和农民赤卫队配合下，决心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根据地。在兵力部署上，以第2纵队第6支队坚守遂（昌）龙（泉）边界的住溪、王村口一线；第5纵队第15支队坚守松（阳）遂（昌）龙（泉）边界的玉岩、安岱后、小吉、枫坪、斗潭一线；第2纵队第4支队由纵队长李重才、支队长余龙贵率领，跳出敌人重围，进击江山、衢州地区，以牵制敌人，配合内线部队作战。

罗卓英不为红军外线部队所惑，按既定计划，以围追、堵截、搜山等手段“清剿”内线的红军游击队。10月间，罗敌已占领了大部分游击区，但仍不放松。几万大军“步步为营”，紧缩包围圈，凡有5户以上的村子，都派1连兵力驻守，不足5户的村子，则强迫居民搬迁，房屋茅棚付之一炬。同时还限制群众食盐和粮食定量，以切断群众对红军游击队的接济，企图陷游击队于绝境。

坚守浙西南基本区的红军游击队和广大群众，在浙西南特委领导下，不畏强暴，奋起抗敌，浴血拼战，在浙南斗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其中松阳县玉岩，龙泉县菜园坑、住溪，遂昌县王村口等根据地保卫战，尤为壮烈。红军游击队决心以命相拼，致使敌人每占领一块地区都得付出惨重的代价。10月5日，敌进攻龙浦游击根据地，挺进师第3纵队政委、龙浦县委书记黄志富领导根据地军民顽强抗击。在龙泉县香炉坑、五里亭间的菜园坑战斗中，黄志富身先士卒率领红军游击队与敌拼杀，杀得敌人尸首狼藉。但游击队也作出了重大牺牲。拼到最后，只剩下黄志富一人，且左手负伤，他拾起阵亡战友的枪支，以独臂轮换使用两支枪射杀敌人，直至壮烈牺牲。敌人虽占领了一个地方，但却心有余悸。

王村口苏维埃政府为了争取时间安置伤员，发动群众砍倒树木作路障，横断交通，滞敌前进。同时在山崖上垒造石垒（滚木礮石），扎口子，利用木石等“天然武器”，协助红军游击队打击敌人。当敌人进攻王村口时，第2纵队政委洪家云率领所部的一个大队30余人，扼守王村口河对岸的堡垒，封锁进入王村口的道路；赤卫队据守王村口一侧的馒头岭隘口，利用居高临下的险要地形，运用“石垒战”，“吊木排”滚乱石等原始战法，配合游击队作战，砸得敌人死伤一大片。在我军民协力抗击下，敌人攻了三天三夜，寸步难进，一筹莫展。最后不得不调来钢炮助战，同时在当地土豪指引下，绕道爬上毗连馒头岭的大乌尖高地，拊赤卫队侧背。在堡垒被敌炮轰垮，馒头岭隘口又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洪家云为保存有生力量，果断地指挥队伍转移阵地，继续战斗。

与此同时展开的住溪战斗，同样壮烈。防守住溪的挺进师第2纵队第6支队指战员，在支队长崇安佬、政委王春华指挥下，依托堡垒工事抗敌，掩护群众转移。敌凭借优势火力向第6支队发起猛烈攻击。6支队指战员沉着应战，待敌迫近时，集中火力予以突然还击，打得敌兵人仰马翻。几经拼搏，敌我伤亡都十分惨重。第6支队自支队长以下的大部分指战员英勇牺牲。幸存者最后由支队政委率领转移到龙泉县的青龙源，与从王村口转移来的纵队政委洪家云会合。随后，洪家云又汇集了一些在各地战斗中失散的战士，共30余人，在龙泉、浦城边境的碧蓉、青龙源、叶岭头和毛坪、兰花蓬、金竹岗一带辗转游击，并想方设法与先行突出重围的纵队长李重才及第4支队会

合。

留在内线坚持斗争的领导干部和游击队，处境异常险恶。挺进师政治部主任、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于10月30日在遂昌县淤头乡馒头岭落入敌手。敌人将他押赴第18军军部驻地丽水，利诱与酷刑并施，企图迫他就范。然而，黄富武铮铮铁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最后于12月12日慷慨就义。

坚守松遂龙边界基本区的第5纵队第15支队，是以浙西南根据地的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和青年先进分子为基础组建起来的浙南子弟兵。为保卫根据地和保护乡亲，他们大部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包括第5纵队政委柯金发。幸存者就地转入隐蔽斗争，少数人冲出敌人包围圈，加入兄弟部队战斗行列。

土生土长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同老红军一样，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原松阳县群众领袖陈凤山、卢子敬是其中的典型。挺进师入浙西南后，陈、卢积极靠拢红军，并加入了共产党，分别担任了松遂龙游击总指挥部正副指挥、中共玉岩区委书记兼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和玉岩区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们虽然入党时间不长，但对革命事业忠贞不二。卢子敬于10月底在松阳县被捕，英勇就义。陈凤山于11月初在龙泉县洋庄源被捕后，身陷县狱。敌人对他软硬兼施，逼他招供。他大义凛然，横眉以对。后来敌人残暴地将他钉在墙上，他依然故我。最后，敌人歇斯底里地将他杀死，曝尸街头。然而，敌人的疯狂镇压并没有吓倒共产党的干部和基本群众。他们凭着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继续同敌人斗争。

（四）不屈不挠的斗争

由于寡不敌众，到 1935 年冬，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基本丧失。但革命火焰并没有熄灭。留守基本区的红军游击队余部在浙西南特委副书记、地方工作团团长杨干凡 的领导和群众支持下继续坚持分散的游击战争，并结合开展秘密工作，闹得敌人不得安宁，尤其是宣（平）遂（昌）汤（溪）边界的门阵、银坑一带游击区，由于平时工作比较隐蔽，主要骨干没有公开暴露身份，加之处在敌人重围之外，所以损失较小，斗争更为活跃。

先后冲破敌人包围的第 2 纵队第 4 支队和第 6 支队余部，分别在李重才、洪家云率领下，几经周折，于 12 月间在江（山）遂（昌）边界的陆坑源胜利会合。这时第 2 纵队虽只剩下五六十人，但都是经过血与火锻炼的英雄好汉。他们决心依靠人民群众，再展雄风，在江遂边境重建游击根据地。

第 2 纵队纵队长李重才与政委洪家云研究决定，率领所部在以遂昌县胡岱口和江山周村为中心的江遂边界开展活动。这一地区不仅有 20 年代末农民武装起义的深刻影响，而且有 1934 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留下的足迹。广大群众对红军有良好的印象，加上挺进师在浙西南的威望，只要做好工作，红军游击队一定会赢得群众的支持。据此，第 2 纵队指战员十分注重宣传群众，部队每到一处，头一件事就是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严格遵守群众纪律。这样，部队很快就同当地群众建立起鱼水关系，军民相依为命。部队四出活动，惩治土豪劣绅，为民除害，而群众则想方设法帮助部队解决困难。当时部队开展游击战，枪支倒不缺，就是子弹消耗得不到补充。群众得知这个情况后，即广泛收集散藏于民间的弹药，或无偿送给部队，或代为购买，陆续收集了不少弹药。其中有的是整箱原封未动的机枪子弹和手榴弹。当群众见指战员感到诧异时，诙谐地解释说：“这是白军留给红军的。”原来是 1934 年 9 月间，国民党军追踪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路过江山周村一带时，为减轻负荷，扔掉了许多弹药。老百姓将它拾起收藏起来，今天就派上了用场。

部队充实了弹药，如虎添翼。施即在群众协助下，拔掉了游击区内最反动的一个敌据点——举淤口，活捉了罪恶累累的乡队附和乡长，并根据群众要求，就地正法。此举，震慑了周围的保安基干队。接着，2 纵队乘胜奔袭了江山峡口镇敌区公所，歼敌区自卫队 1 个班，焚毁区公所抽捐征税等文书档案，并将地主豪绅的粮食、衣物分发给老百姓。群众拍手称快。峡口战斗还达到了两个预期目的。一是从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中获悉刘英、粟裕率挺进师主力部队胜利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使干部战士大受鼓舞；二是通过峡口战斗，扩大红军游击队声威，戳穿敌人“浙西南共‘匪’已被‘剿’灭”的谰言。同时让挺进师首长得悉第 2 纵队仍在江山、衢州、遂昌边境坚持斗争。

第 2 纵队在江遂边境连战告捷，使当地群众大为振奋，一些青年积极分子踊跃报名参军，第 2 纵队很快发展到 100 多人。有的地方自动组织起农民游击队，要求红军派人去领导他们打土豪分田地。有的地方还恢复和建立了中共党组织。这派喜人的革命形势，犹如在浙西南夜空中升起一颗启明星。

然而，黎明前更显得黑暗。“四省剿总”在惊愕之余，于 1936 年 4 月，

杨干凡于 1937 年 3 月在浙西南龙泉县凤凰山战斗中牺牲。

纠集江（山）浦（城）遂（昌）等县反动武装，配合“清剿军”4个正规团，对江遂边界的胡岱口、陆坑源、周村、东坑一带红军游击队进行“围剿”。为保存红军骨干，第2纵队领导决定，趁敌合围之前，撤离江遂边界，经龙浦老根据地毛坪向浙南转移，以期同师部会合。转移途中，几陷敌人重围。在苦战中，纵队长李重才、政委洪家云，先后在浦城县庆元山、青草坪地区和茶坪地区英勇牺牲，部队伤亡惨重。幸存的20余名指战员，在当地党员帮助下隐蔽于山林待机。尔后在闻讯赶来营救的闽北游击区广浦独立营接应下，摆脱了敌人围困，转向龙泉高山、东坑桥一带活动。

在这期间，刘英、粟裕从敌《东南日报》上得悉第2纵队在浙西南与敌苦战的消息。于是粟裕亲率一部兵力前来策应。5月间在龙浦边境的青草洋、岙头山地区与2纵队余部及闽北广浦独立营不期而遇。这时恰好侦得敌福建保安团一个连正从庆元县方向朝岙头山开进。于是闽北广浦独立营与粟部立即投入战斗。广浦独立营与2纵队余部在正面伏击，粟部从侧后夹击，一举将一连敌兵歼灭于运动中，生俘敌排长以下30余人。随后，广浦独立营返回闽北游击区，2纵队余部随粟裕回到新开辟的浙南游击根据地。不久，“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为对付两广势力，不得不重新部署兵力，决定从浙西南撤出其主力军。罗卓英在浙江折腾了8个月，最后“功败垂成”，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态率部撤离浙西南。浙西南游击区的党政军民在经受8个多月凄风苦雨的考验后，终于迎来了晴朗的黎明。敌人第一次大“清剿”，虽然一时占领了浙西南红军游击根据地，并给浙南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但是并没有吓倒更没有“剿”灭革命军民。敌军主力一撤离，浙西南游击区形势立即出现转机。从此走出低谷，进入重新发展时期。

四、开辟浙南、浙东与恢复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一）寿宁会师与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的成立

1935年9月下旬，刘英、粟裕按照“敌进我进”方针，率领挺进师主力撤离浙西南基本区，进军浙闽边界，与敌周旋。10月5日，刘、粟率部抵达浙南、闽东交界的福建省寿宁县郑家坑，与中共闽东特委主要负责人叶飞及其率领的闽东独立师胜利会师。这是继上年北上抗日先遣队路经闽东时，两支兄弟部队会师后再度会合。战友重逢，格外振奋。为了协同对敌，双方领导人随即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对当前斗争形势和斗争策略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敌人为了协调行动，成立了“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统一指挥配属的“中央军”和四省反动势力，对付四省边区的红军游击队；而闽浙边各红军游击区，自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中断联系后，即失去上级统一领导中枢，相互隔绝，各自为战。这种状况，对开展斗争十分不利。如果浙江、闽东、闽北3个游击区能取得密切联系，即使一时难于统一行动，但只要能在战略上相互协调、相互策应，就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和开创新局面。基于这一认识，双方领导人都感到有在闽浙边建立一个统一领导机构的必要。经商讨，一致同意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作为两个兄弟游击区和兄弟部队的统一领导机关。临时省委由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临时省军区由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治委员。

随后，部队到浙江泰顺县境活动。11月初，刘、粟率挺进师主力一部进击泰顺白柯湾浙江保安第10大队。经一场激战，全歼敌1个连，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80余支。11月7日，刘英、粟裕、叶飞等领导人在泰顺玉西乡白柯湾举行了第二次联席会议，进一步作了人事安排。正式确定临时省委委员人数为11人，由刘英、粟裕、叶飞、黄富武、刘达云、阮英平、范式人、许信焜、洪家云、方志富和许旺组成。同时明确临时省委辖浙西南和闽东两个特委。在干部交流方面，决定调挺进师政委会秘书许信焜和第3纵队纵队长王武礼到闽东独立师，分别担任师长和参谋长，并由挺进师调拨一部分武器加强闽东独立师，拨现款13000元给闽东特委。此外，联席会议还决定将原由闽东特委领导的（福）鼎平（阳）独立团划归浙南，由临时省委直接领导。

为了便于指导闽浙边的斗争，临时省委决定，将领导中枢放在闽浙边界浙南泰顺、平阳、瑞安县和闽东福鼎县之间的边缘地区。刘英驻临时省委机关。当时临时省委的中心任务是，以全力整理与开展福鼎、泰顺、（福）鼎平（阳），及瑞（安）泰（顺）地区工作，恢复和建立党组织，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为了配合中心任务的开展，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在中心区周围与敌周旋。到1936年春，就初步打开了浙南的局面。

临时省委成立后，对推进浙闽边的游击战争和游击根据地的建设曾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挺进师和闽东特委领导人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1936年4月，闽东特委宣布退出临时省委。同年秋，挺进师领导人在浙江省庆元县南阳村约见闽东游击区领导人叶飞以及陈挺等人时，扣押了叶、陈，在押送途中遭国民党军袭击，叶、陈乘机脱险。这一事件，使双方关系完全破裂，给闽浙边地区的游击战争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当时不知道方志富已牺牲。

（二）大力开辟浙南区和浙东区

临时省委鉴于敌人集中力量，实施摧毁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反革命计划，浙西南基本区暂时的丧失已在所难免，因而决定在敌人兵力薄弱的地区另辟新的游击根据地。由于浙闽两省敌人兵力集中于浙西南，所以紧连闽东的浙南以及浙东地区的反动势力就显得相对空虚，尤其浙南，远离浙江交通动脉杭江铁路线，敌人统治向来比较薄弱。于是临时省委确定在这两个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重点放在浙南地区。

浙南，不仅社会环境对红军游击队开展活动有利，而且这里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30年代初在浙南农民武装暴动基础上组建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13军，曾威震瓯江两岸和雁荡山麓。后来红13军虽然失败了，但影响尚存。转入地下的共产党员继续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并逐渐恢复了党的组织。1935年夏，中共鼎平县委及其下属平阳中心区委等党组织，还公开发动和领导当地群众成立农会和赤卫队，为建立游击根据地准备了群众基础。挺进师凭借这个有利条件，在浙南大显身手，于11月初一举攻占了瑞安的珊溪镇。尔后以福鼎、瑞安、平阳、泰顺边界为基点，向东南和东北发展，先后攻克了瑞（安）平（阳）泰（顺）外围敌人许多重要的乡镇据点。如景宁的东坑、梅歧、沙湾、渤海，青田的大顺、小顺、南田、西抚、黄坦，瑞安的大玉壶、营前、高楼、马屿、陶山、平阳坑，泰顺的百丈口、左溪、泗溪、仕阳，平阳的水头街、山门、莒溪、腾蛟，福鼎的南溪等地，进击锋芒直指瓯江南岸与东海之滨。为创建浙南游击根据地，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挺进浙东地区的第1纵队，于11月间在东阳良坑和缙云玉环岭与浙江保安第2团激战中，纵队长王屏、政委杨金山英勇牺牲。余部在刘达云、张文碧带领下，于永康、缙云边界的金竹嶂与当地一支游击队（原红13军第3团余部）30余人会合。随即两部合编为第1纵队的两个大队，就地坚持斗争，逐渐创建了一小块游击根据地，并成立了以刘达云为书记的中共浙东特委，统一领导浙东游击区对敌斗争。

1936年2月初，临时省委在泰顺峰文召开会议，总结与部署工作。会议确定了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并使之与群众工作紧密配合的方针。同时要求将公开发动群众与开展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据此，决定以挺进师第3纵队第7支队和第5纵队第13支队为基础，临时组建成浙西南独立师（以下简称独立师），粟裕为临时省委代表兼师长，谢文清任政委，张友昆为政治部主任，其任务是往返活动于浙西南和浙南之间，打击和牵制敌军与地方反动势力，掩护临时省委在浙南开展工作。同时，刘英考虑到他主要精力放在临时省委和地方领导工作上，一般不随主力部队行动，他提议并经会议决定，由粟裕接替他任挺进师政委会书记。

会后，粟裕、谢文清等率独立师西进。2月下旬在泰顺国岭地区全歼福建保安团1个连，缴长短枪50余支，重机枪1挺。4月上旬，又在缙云下丁击溃了前来袭击的民团1000余人，生俘其首领国民党军第46军秘书处处长陈仿苟和大土豪李志仁。

在这前后，独立师在浙闽边进进出出，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到浙江，以此吸引和打击敌人，掩护临委创建浙南根据地，支援浙西南游击区的斗争。

3月上旬，刘英率特务班配合地方干部和游击队40余人，在泰顺县富坪

车头，歼灭浙江保安第4团一部，缴枪30多支。在此前后，特务班和地方游击队，还在福鼎王家山，泰顺排头、南溪等地袭击了分散孤立的保安团队，拔掉了基本区内的一些“钉子”，为浙南根据地建设扫清了障碍。同月，临委鉴于浙南局面已经打开，遂决定成立中共浙南特委，郑宗毓（玉）任书记，辖福鼎、鼎平、瑞平泰3个县委。临委机关从泰顺移驻福鼎地区，并将鼎泰区划为临委直辖区。临委工作团与地方党组织紧密配合发动与组织群众，到四五月间，鼎泰区普遍地建立起贫农团、妇女团、赤卫队、少先队等革命群众组织，初步地巩固了新的阵地。

与此同时，浙南特委也全力投入根据地建设工作，以保证红军游击队进退有据。他们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各种革命群众组织，为红军游击队建立后勤保障。在泰顺双溪口等地建立的山洞医院，到5月间，就收容了200多名伤员，解除了机动作战的主力部队后顾之忧。迄1936年春夏之交，以泰顺、平阳、瑞安、福鼎边界为中心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就初步形成了。

在这期间，浙东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也初步取得成功。在大盘山南麓的缙云、仙居、永康3县边界地区建立了基本区。至于游击区范围则逐渐扩展到浙东南的广大地区。为了适应这个发展趋势，在3月间，临委就决定将中共浙东特委改为浙东南特委，仍由刘达云担任书记，下辖瑞青泰、丽青云、青景泰等边区县委。这样，新建立的浙东和浙南两块根据地就成犄角之势，相互策应，保证游击战争持久地开展下去。

（三）适应斗争形势，调整党的政策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为对付两广派，将“进剿”挺进师的罗卓英第18军从浙江调往湖南，浙江反动统治顿失支柱。这在局部上给浙南红军游击队带来了十分有利的时机。在全局上，抗日民主浪潮正在席卷全国，“抗日救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主题。刘英、粟裕从敌人的报刊和进步刊物（如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永生》等杂志）上看到了这个大气候。尤其是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抵达陕北，并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以及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潮等振奋人心的信息，极大地鼓舞了“天崖孤旅”。刘、粟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适时地调整政策和策略，以推进浙南红军游击队的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在这期间，刘英、粟裕分别以临时省委和挺进师政治部名义，在浙南和浙西南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内用兵，对民压迫。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团结抗日。

在具体政策和策略上，临时省委也作了一系列的调整：1.将“没收委员会”改为“征收委员会”，把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改为征收“抗日捐”；2.对国民党的乡镇、保、甲长由严厉惩治改为尽可能予以争取；3.对地方上的土豪和中等商人区别对待，进步的表示欢迎，中立的也允许来去自由，其营业不受侵犯；4.对白军政策，由“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同红军一起共同抗日”；5.推行“白皮红心”政策，采取拉出来打进去的策略，争取保甲长为我所用。或派中共地下党员去当保甲长，变反动政权为革命的“两面政权”；6.争取团结城市知识分子；7.争取团结工商业者，欢迎平原城镇殷实客商进山做买卖，发展山区经济，改善群众生活，等等。

临时省委还总结了前一段开辟新区的实践经验，为了使公开的武装斗争用隐蔽的群众工作进一步地给合起来，在组织形式和力量配置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临时省委直属队和挺进师主力分别组成“突击队”与“牵制队”。“突击队”即武装工作队，以便衣队、短枪队组成，其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进行游击根据地建设。“牵制队”即挺进师的主力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机动地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和打击敌人，掩护和保卫游击根据地，并发展新的游击区。在领导成员分工上，刘英带领“突击队”和临委机关，坚持浙南游击根据地；粟裕带领“牵制队”，在浙东南和浙西南的广大地域开展游击战，扩大游击区。

同年八九月间，临时省委又通过浙南地下党员叶廷鹏等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叶廷鹏自红13军在浙南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经过一番“孤军”奋斗后，于1935年冬，团结了吴毓、黄先河、杨进、陈铁军等一批革命青年，建立了一支武装小分队（初称“肃反队”，后改称浙南红军游击队），逐渐发展到近百人。1936年5月，成立了以叶廷鹏为书记的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7月中旬，叶派杨进到上海，与坚持上海地下斗争的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潘子康取得了联系。潘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等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的文件交给杨进，要他设法找到刘英、粟裕，并将文件转交给刘、粟。8月间杨返回浙南，同临时省委取得了联系。刘英随即向党中央写了有关挺进师进军浙江情况报告，

于9月间派林秋侠送到上海，请中央特科转呈党中央。从此临委经过中央特科恢复了同党中央的联系。

临时省委根据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精神，进一步调整了斗争策略。决定将工农红军闽浙军区（即临时省军区）改为人民红军闽浙军区；工农红军挺进师改称人民红军挺进师；赤卫队改称人民抗日义勇队；各个苏维埃政府统一改称人民革命委员会。同时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闽浙两省各界人民书》，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各界人民团结起来，组成抗日阵线；呼吁国民党军与红军携起手来，一致抗日。在浙南具体贯彻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

（四）积极开展斗争，巩固与扩展游击根据地

临时省委和挺进师在新形势下作出的政策和策略的调整，反映了浙南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而获得了各界群众的广泛支持，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权，有力地推进了游击根据地的建设。从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到同年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浙南红军游击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发展时期。

在浙南地区，刘英直接领导的“突击队”广泛而深入地发动和组织群众，相继建立起一批县、区、乡民主政权。6月间，临委决定成立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简称浙南人委）作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最高行政机关。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和保卫根据地，临委还于8月初决定成立浙南军分区，罗连生任司令员，谢文清任政治委员，龙跃任政治部主任，统一领导和指挥浙南根据地各县地方武装。8月下旬，浙南人委在福鼎县李家山正式宣告成立，郑丹甫为主席，陈辉、蔡爱凤等为委员，下辖平泰、鼎平、杨鼎、桐霞、泰顺、平阳等6县人民革命委员会和16个区的民主政权。各地民主政权和党组织积极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群众基础比较扎实的福鼎、鼎平、平泰和桐霞等县，应群众要求，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普遍地进行土地（包括青苗）分配，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对敌斗争与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在一般的县、区、乡，则广泛地开展“四抗”——抗租、抗债、抗税、抗捐运动。通过实际斗争，锻炼基本群众，逐渐削弱农村封建势力，巩固和扩大游击根据地。

在军事斗争方面，各特委配备了200~500人的正式部队，另有广大的地方武装配合，随时可以应付敌人两营以至1个团的兵力。有力地保证了各块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开展。

与此同时，粟裕带领“牵制队”，频频出击，将敌军牵制在游击中心区以外的地方，并寻机予以打击。如7月9日在福鼎青山岭歼敌福建保安第4团1个连。8月19日又在福鼎前歧全歼浙江保安团队1个连，计毙伤俘敌110余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和一批弹药。9月28日攻克宣平县城，歼灭敌保安队，并从监狱救出80余名政治犯。挺进师主力在外线活动中，不仅有力地打击敌人，而且将“战斗队”和“工作队”双重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一面打仗，牵制敌人，一面进行开辟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基点的工作。他们在根据地中心区周围的一些重要地区，拔除敌人据点，而后选择条件较好的村庄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由一个村庄扩展到若干个村庄。几个或十几个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连成一片，就形成一个游击基点。尔后在相隔10多公里处再建立一个游击基点，一步步地向边缘地区发展。几个相邻的游击基点联系起来，便形成一个小小的游击根据地，它的外围还有一些分散的游击基点。这些小块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不仅像众星拱月那样，护卫着中心区，而且使活动在外线的主力部队，就近有所依托，进退自如。部队征战疲劳或伺机歼敌时，可随时找到隐蔽休息和待机之地。特别是伤病员能及时得到妥善安置，大大减少了部队负担。后来在敌人进行第2次大“清剿”中，挺进师得以减少损失和挫败敌人企图，在很大程度上借重于这些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

在闽浙临时省委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外线和内线部队紧密配合，利用国民党“中央军”主力撤离浙江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切合时宜的政策和策略的威力，争取广大群众以及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当面最反动的敌人，有力地推进了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到1936年底和1937年初，在浙南、浙

东和浙西南地区，形成了几块相对稳定的游击根据地。

浙南游击根据地两广事变后，临委“突击队”在“牵制队”掩护和策应下，首先集中力量打通了根据地内各县区之间的联系，使基本区连成一片。尔后调集一批力量，发展新区，扩大根据地范围，

打通了温州地区沿海的部分交通口岸。8月间，与活动在平阳县北港地区的老共产党员叶廷鹏领导的1支游击队会合，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由平阳南港扩大到平阳北港一带。迄同年11月，浙南根据地幅员由浙闽边境东段向北扩展到飞云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包括瑞安、平阳、泰顺、福鼎的广大农村，以及青田、景宁、丽水、寿宁、霞浦、庆元、永嘉等县的部分地区，纵横200多公里。地方党组织有中共浙南特委及其所属的福鼎、平阳、泰顺、桐霞、霞鼎泰、鼎泰、瑞青泰、永瑞青、庆景寿、丽云边等10个县委和瑞平泰中心县安。

浙东游击根据地挺进师第1纵队挺进浙东，在永康、缙云边界落脚后，逐渐扩大活动范围，出没于瓯江北岸的仙居、温岭、三门、天台、东阳、永康、缙云、丽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并以永缙边的金竹岗、黄弄坑、东坞、央田为中心，建立起一块根据地。主要活动区在仙居、天台、东阳、永康、缙云5个县交界的大盘山区。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1936年6月，临委决定恢复遭敌第一次大“清剿”摧残了的浙西南根据地。首先恢复浙西南特委，由许信焜任书记；同时在浙南重建第2纵队，赵春和任纵队长，张文碧任政委。旋由粟裕率2纵队重返浙西南，乘敌军主力他调之机，向地方反动武装发动猛烈攻势，接连收复了龙泉住溪、遂昌王村口等原根据地中心区。随即恢复龙浦、龙遂、江浦等县委及其下属的王村口、住龙等区委。在主力部队掩护下，以松（阳）遂（昌）龙（泉）边界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逐渐得到恢复，只是考虑到浙西南位处浙闽赣边境通道，敌人势所必争，同时接受上年受挫教训，浙西南特委决定以秘密工作为主。表面看来不如过去那样轰轰烈烈，但工作更加扎实，干部和基本群众更加成熟，对付敌人“清剿”也就更有办法。

宣遂汤游击根据地这是一小块新辟的游击根据地，它位于浙西西北部的宣平、遂昌、汤溪3县交界的三角地区。这个地区地形险要。它以门阵为中心，坐南朝北，背靠大岭，面瞰金（华）汤（溪）平原，左右群峰矗立，森林茂密，构成一道天然屏障。挺进师在1935年春初进浙西南时，曾在这一带开展过工作，并在银抗、芝肚坑、龙葱、周坞、黄塘井、小洋坑、紫坑、溪口等村庄，发展了20多名中共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和遂汤区委。由于这一地区党组织工作比较隐蔽，又远离浙西南游击中心区，在敌人第一次大“清剿”时，未遭受大的摧残。1936年秋冬，粟裕率挺进师主力重返浙西南时，按照在根据地中心区外围开辟小块游击根据地的构想，先后派出了两支部队进入宣遂汤边区，协同当地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首先选择条件好的村庄，建立游击基点。尔后由几个邻近的游击基点逐渐形成小块的游击根据地。起初，这块根据地是秘密的，即政权由共产党掌握，但不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宣遂汤党组织认真执行临委制定的新的政策和策略，不仅赢得了群众拥护，而且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水陆交通便利的中心点门阵（北临杭江铁路，东西两侧有公路相通，还有可供竹木放筏的溪流通往金华），商业繁荣，群众称之为“小上海”，金华等平原客商带来大批布匹和医药等山区

紧缺物资，进山交换土特产，致使金华商埠实际上成为挺进师的“军需补给基地”。

此外，还有浙东南地区青瑞边之梅山、李山，飞云江边的五云山等小块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

随着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日益发展壮大。挺进师兵力，在敌人第一次大“清剿”时期，由近千人减至 300 人枪，到 1936 年底发展到 1500 余人枪，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发展到数千人，党员发展到 3000 余人，地方干部 500 余人，加入各种革命群众组织的人数，总共达 10 万之众。红军游击队活动范围扩大到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等地区所属的 30 多个县境。这是浙南游击区的鼎盛时期。

五、挫败国民党军第二次大“清剿”

（一）国民党军新的“清剿”部署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被迫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的主力红军的军事进攻，并许诺联共抗日。这样，在北方基本上实现了和平。然而，在南方，国民党军不仅没有放松而且进一步加紧了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企图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将坚持南方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剿灭”。在这个“北和南剿”的反动方针下，国民党集团根据既定部署加紧对南方红军游击队进行大规模“清剿”。

1936年12月间，国民党决定调第4路军总指挥刘建绪率所部从湖南进驻闽浙赣皖边区，并在浙江江山设立“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以下简称“四省边署”）以刘建绪为主任，取代原“四省剿总”。

刘建绪就职后，立即制订“闽浙赣皖边区绥靖计划”。其中将浙南地区划为第3“清剿”区，在云和县设立“清剿”指挥部，同时命浙江保安处副处长蒋志英到温州主持“清剿”。

敌人这次大规模的“清剿”，集中了6个师、2个独立旅、连同地方保安团共计43个团，10余万兵力，比卫立煌、罗卓英指挥的第一次大“清剿”多三四万兵力。然而这时浙南红军游击区已由浙西南扩大到浙南、浙东的广大地区。刘建绪已不可能再采用罗卓英对游击根据地重重包围“竭泽而渔”的方针。他针对红军游击区大为扩大的现实，在军事上改取“拉网聚歼”的战略战术。即采用拉网式推进战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由外围到中心，逐渐将红军游击队逼向东南一隅，而后在浙南飞云江以南、沙埕港以北的濒海地区聚而歼之。

根据上述方针，刘敌作了具体的兵力部署：以第63师等部由杭江路一线压红军游击队南撤；以新5师、第52师及赣闽保安团置于江（山）浦（城）公路及松溪、庆元、政和之线，由西面逼红军游击队东移；以第56师由闽北伸向庆元等地，阻止红军游击队转移闽北；以两个保安团置于泰顺、寿宁，封锁浙闽边界；以独立第9旅控制飞云江；以第19师置于温（江）瑞（安）平（阳）一线，构成东西沿海封锁线；以第80师1团置于福鼎，以阻止浙南红军游击队进入闽东。为协调东线部队作战行动和切断红军游击队向福建方向机动，在平阳县设立“闽浙边清剿指挥部”，以第19师师长李觉和永嘉保安司令许蟠云为正副指挥。

在政治上，软硬兼施，胁迫群众参加反共行动：一是强迫群众组织“联甲”和“剿共义勇队”、“壮丁队”，协助军队“进剿”；二是移民并村，焚毁边缘地区零散民宅，强迫居民移住大村，并按人头定量逐日配给油盐柴米，以杜绝群众对游击队的接济；三是造谣惑众，歪曲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真相，谎称“共产党和朱毛红军投降了”；四是威胁利诱，声言凡捉、杀共军头头者重赏，凡“窝匪”、“通匪”者“杀无赦人耍尽阴谋诡计，妄图彻底破坏红军的军民关系。”

刘敌部署就绪后，即下令对红军游击队发起攻击。1937年2月2日，敌第80师1个团和浙江保安第3、第4团，共约3000多人，向泰顺峰文游击根据地发动进攻。刘英、粟裕指挥部队在筒墙大山峡伏击进犯之敌，一举歼敌1个加强营。敌发现红军游击队主力后，蜂拥而至。战斗至第3天，敌对游击队形成两头夹攻之势。刘、粟机断地指挥部队，趁大雾迅速悄悄转移，导致敌军自相交火。当挺进师转移到平阳县玉仓山（今属苍南县）时，敌军

又集中优势兵力发起进攻。为保存有主力量，挺进师果断地撤出战斗，与敌脱离接触。在这次战斗中，浙南军分区司令员罗连生被俘后叛变。随后，刘敌令第 19 师、独立第 9 旅和浙江保安第 2、第 3、第 4 团，与第 80 师相配合，企图将红军游击队主力围歼于瑞（安）平（阳）泰（顺）之间。

（二）牛童往会议，制定新的斗争方针

对“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军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清剿”，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事先思想准备不足，缺乏准备和预见。此前，曾利用有利时机，以挺进师主力向当面之敌发动猛烈进攻，迅速扩展了游击根据地，但同时也又一次暴露了红军游击队的力量。1936年底，省委为迎接抗日的新形势，曾宣布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19师番号，并重新打出北上抗日先遣队旗号，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待到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对游击区再次发起大规模“清剿”时，临时省委的头脑才开始冷静下来，重新认识面临的局势。

1937年2月中旬，临时省委在泰顺县上仁乡（今安东乡）牛童往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确定对策。会议认为浙南游击区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从全国政局发展趋势看，国共合作抗日，将是历史的必然。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深怕共产党力量发展壮大，于是，企图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前，一举歼灭南方红军游击队，以削弱中共力量。从全局看，抗战的曙光已照耀中国，从局部看，浙南地区尚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为了保存红军游击队，坚持浙南这个新开辟的革命战略支点，不能单纯地实行军事抗击，同敌人拼消耗，而应着眼于保存党的力量，采取灵活的破敌良策。据此，会议确定了隐蔽精干、保存力量与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相结合的反“清剿”方针。

根据上述方针，挺进师针对敌人“大拉网”战术，采取化整为零，与敌相对进，将主力转到敌之侧后，易地而战的战略战术。敌“网”过来，我则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以我之分散对敌之集中，以我之集中对敌之分散。敌采取大兵团进攻，挺进师则将战斗单位逐渐分散，由开始的百把人集中行动，逐渐分散到几十人一队，十几人一队，甚至几个人一组，组自为战，人自为战。必要时又集中起来，歼击分散之敌。有分有合，灵活机动，使敌人难于捉摸。

在具体部署上，留下一部分兵力配合地方干部在浙南根据地内坚持斗争；刘英率领临时省委直属队和部分主力部队共七八百人，东进永（嘉）瑞（安）平（阳）泰（顺）边界活动；粟裕率挺进师一部由浙南泰顺根据地绕道瑞安和青（田）景（宁）边境前出浙西南地区活动；一度聚集浙南的1纵队和2纵队分别返回浙东和浙西南游击区与敌周旋。

在政治上，省委坚持团结抗日旗帜，向国民党发动政治攻势。敌军进攻一开始，省委和省军区就发表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告各界人民书》、《致国民党官兵的一封信》等文告，呼吁停战议和。刘建绪慑于抗日怒潮，曾一度表示愿与浙南红军游击队停战谈判。虽然这时刘建绪毫无和谈诚意，并另有企图，但红军游击队可利用战事暂歇之机，调整力量部署和扩大政治影响，这对打破敌人的大“清剿”，起到一定的配合作用。

红19师由浙南部分红军游击队（挺进师主力和各特委直属部队除外）编成，罗连生兼任师长，谢文清任政委，辖3个团，第1团团团长柯学良，第2团团团长郭金明，第3团团团长程娄兴。不久红19师番号自行撤销。

（三）最艰难的日子

牛童往会议后，刘英率临时省委机关和直属队，北渡飞云江，进入浙东南瑞安的沙门山、肇平及永嘉纸山一带活动。1937年3月间，临委决定由龙跃任浙南特委代理书记，统一领导浙南根据地各县工作。同时根据叶廷鹏、陈铁军等人的要求和中央特科指示，叶、陈等领导的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和浙南红军游击队正式归属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坚持浙南内线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在浙南特委统一领导下，组成武装工作团，辖各地区武工队、组，武工队时而化整为零，避敌锋芒，时而集零为整，袭击分散之敌，化被动为主动。在浙东南，省临委还组织了1个白区工作团，由黄先河任团长，秘密进入温州市，开展工人和学生工作，推动城市抗日救亡运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配合红军游击队斗争。

正当浙南红军游击队展开艰苦斗争之际，闽浙临时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兼浙东南特委书记刘达云继罗连生之后投敌叛变，为虎作伥，给浙南根据地军民带来巨大的危害。然而富于革命传统的浙南人民，并不气馁，他们紧密团结，互相支持，不屈不挠地与强敌周旋。

粟裕率领挺进师一部与敌人主力相对进。由浙南挺进浙西南地区。途经瑞安潮岭、潮际时，留下部分人员在梅山、李山地区，依托游击基点村打游击。主力部队取道青（田）景（宁）边境西进，直抵杭江铁路南侧。随后回到龙泉溪以北的松（阳）遂（昌）地区活动。3月11日，在遂昌门阵与坚持浙西南斗争的谢文清、刘亨云率领的红军游击队会合。旋以宣遂汤边游击根据地为依托，开展游击战。

宣遂汤边游击根据地，邻近杭江铁路线，周围交通便利，由于党组织发挥了政策和策略的威力，争取了不少保甲长站在红军游击队一边，区乡长也往往保持中立。他们虽然了解红军游击队一些情况，但不向其上级当局报告，因为报告了，反遭上司责难和“进剿”部队勒索，同时还要受到游击队的惩处，两头不讨好。所以对游击队的活动，总是睁只眼闭只眼。至于敌军，先前进山骚扰的部队屡遭游击队打击后，心有余悸。小股敌人畏歼，再也不敢贸然进山；大股敌人又难于上山，因为山路崎岖，施展不开，给养又难于接济。这样，这块在敌人跟前的小块游击根据地就成了红军游击队比较稳定的后方。这个后方，在反对敌人第二次大“清剿”时期，成为挺进师在杭江线以南和浙西南地区坚持斗争的重要基地之一。

有了类似宣遂汤这样的后方基地，挺进师的反“清剿”斗争，就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权。他们借助各游击基点村和基本群众的掩护，隐蔽自己的行动和意图，一旦捉住有利战机，即给敌人以突然袭击。速战速决，迅速转移。他们在实践中总结了兜圈子战术，采取大小圈、“8”字形、“S”形、回马枪、早出晚归、东去西返等许多形式与敌周旋。部队飘忽不定，出没无常，敌人难于捉摸。

然而，由于敌人依仗其绝对优势兵力，在地方反动势力协助下采用“拉网”战术，加之采取强迫移民并村，对群众严加控制等残酷措施，给红军游击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斗争十分艰苦。虽然红军游击队机动灵活，不易为

设在上海的中央特科，于1935年7月和11月两次遭受大的破坏，但幸存者一直坚持上海地下斗争。1936年7月，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成立后，特科归囑上海办事处领导。

敌人发现行踪，但敌人多势众，撒开大网，致使红军游击队常与敌发生遭遇。敌人一旦发现游击队踪影，就立即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使游击队陷入困境。一次粟裕率部由浙西南庆元、景宁边境北进，当到达云和与松阳交界地区时，突然与敌遭遇。敌立即收拢“大网”，将挺进师部队围困在龙泉溪和松阳溪之间10多公里的“三角架”里。挺进师虽然施展了忽南忽北、打回马枪等战术，但仍难于甩掉敌人，并几度误入敌人的伏击圈，几陷绝境。幸好，大多数指战员都具有打游击的丰富经验，熟练地运用打、藏、走相结合的战术，并可组自为战，人自为战。能打就打，打不了就钻进荆棘丛中躲起来。任凭敌人在跟前吼叫，沉着以待。由于敌人在明处，害怕游击队打冷枪，心虚地咋呼一阵，乱放一阵枪，就悻悻地走开了。游击队员瞄准空隙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就这样，打打藏藏，边打边走，一昼夜走了90公里，连打7仗，才摆脱了敌人。

由于敌人逐渐摸到了红军游击队的一些活动规律，一旦发现游击队踪影，就死缠下放。为了甩掉前堵后追之敌，红军游击队常常整日整夜穿密林，走山径，绕圈子。有时连续几天几夜得不到喘息机会。当找到可隐蔽休息的游击基点时，指战员一觉就睡几十个小时，还不知醒。如果有了伤员就更难办了。因为敌人搞移民并村，一些游击基点被并掉了，游击队怕连累群众，不便把伤员安置在群众家。隐蔽在山洞里也不安全，因为那里是敌人搜查的重点目标。抬着伤员行军打游击更不堪设想。没办法，只好在野地里向死人“借房子”。即将坟墓掏开，把尸骨移置他处，在棺村里垫上干草，将伤员安置进去，暂时隐蔽养伤。

这个时期，是挺进师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最艰苦的时期。为保存革命力量，部队不断地在敌人的“网眼”中穿梭。除短时间转到游击基地休息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风餐露宿。“青天作帐，大地当床”，枕戈待旦。更为困难的是，常常缺粮断炊，不时以野菜、草根、树叶充饥。当弄到粮食时，又苦于没有炊具，如果敌情稍微缓和，尚可在山林中用茶缸野炊，若敌情紧急，为避免暴露目标，不便生火，只好吃生谷子。生谷子消化不了，难于排泄，大便时只好用棍子扒。这样，饥难忍，饱也难受，反复折腾，许多战士身体垮了，加之缺医少药，非战斗减员时有发生。但不论如何艰苦，除个别动摇分子外，广大指战员为人民解放事业，矢志不移。因为他们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

（四）人民群众对游击队的大力支援

浙南红军游击队，所以在数十倍于己的敌军撒下的“天罗地网”中，得以生存，并最终挫败了敌人“聚而歼之”的险恶企图。除闽浙临时省委和挺进师实行反“清剿”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外，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民群众的拼死相助，这对浙南红军游击队挫败敌人的大“清剿”，具有决定意义。同时形势与地势对游击队也有利。当时全国已掀起了抗日救亡浪潮，在这个大气候下，国民党坚持内战的政策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而红军游击队哀兵自卫却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浙南险要的山地又有利于红军游击队与敌周旋。如果没有这些有利条件、特别是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红军游击队要打破敌人大“清剿”是不可想象的。

浙南人民在反对敌人大“清剿”中，以舍己为人的崇高品德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保护着共产党，保护着红军游击队，为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保守机密，是红军游击队在敌人拉网“清剿”中保存自己的重要一环，根据地群众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平阳县工凤乡半山村游击队长潘世雅和做地下交通的妻子王玉英，都是共产党员，在反“清剿”中不幸被捕。在潘遭敌枪杀后，王玉英忍着巨大的悲痛，为保护党和红军的机密，乘敌看守懈怠时，毅然用剪刀剪断自己的舌头，使敌人无法从她口中获悉任何材料。云和县燕田的一位游击队员不幸落入敌手后，敌将他押到云和七溪，用吊打、熏辣椒粉、坐老虎凳等酷刑对他逼供，他始终坚贞不屈，直到被敌人枪杀，都没有吐露党和红军的半点实情。类似的刚烈事例举不胜举。正由于群众舍命掩护，红军游击队的行踪秘密才得以保守，使深入游击根据地的敌军如同聋子瞎子。红军游击队常常隐蔽在与敌军近在咫尺的村落，而敌人却不知晓。例如，1937年3月，挺进师第2纵队政委张文碧带1个小分队到平阳县找刘英、粟裕未遇。当时正值国民党军麇集平阳，几乎所有路口都布满岗哨，对行人严加盘查。张文碧等是外乡人，很容易暴露。为避敌锋芒，在当地党组织协助下，小分队分散在几个村子的群众家里隐蔽。张文碧隐蔽处，可看到敌人操练，听到敌人口令。由于群众全力掩护，虽处敌人眼皮底下，却安若泰山。这就给挺进师部队创造了保存自己和打击敌人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掩护红军游击队伤病员，是群众作出的又一个重大的贡献。在反“清剿”的艰难时期，红军游击队的伤员，几乎全部是靠地方党员和基本群众拼着身家性命掩护养伤的。如1937年2月，当挺进师主力从泰顺太平区根据地转移时，双溪口村党支部书记黄明星和他的妻子卢桂莲，动员村里群众，将几十个伤员分散隐蔽治疗。不久，黄明星夫妇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伤员。夫妇俩机智应付，没露半点破绽。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代价，保护了数十名红军战士的生命。这批伤员在群众精心护理下，全部养好了伤，并安全归队。再如同年二三月间，江（山）浦（城）县委书记宣恩金等，在随部队转战中身负重伤，留在青田县叶山地区养伤。这在基本群众中，是公开的秘密。而敌人又不时上山、进村搜查，并乱捕群众，严刑逼供。伤员的处境确实令人提心吊胆，然而却有惊无险。这全仗群众的庇护。叶山有一位知情的共产党员，几次被敌人抓去拷打审问，甚至累及他的儿子、媳妇，但全家守口如瓶。最后连家也被敌人抢劫一空。然而他毫无怨言，而且想尽一切办法照顾宣恩金等伤员，直至伤员伤愈归队。

红军游击队经常遇到的一个大难题，是粮食问题。尤其是在反“清剿”斗争最紧张的时刻，游击区的交通要道和大多数村镇为敌军所占领或为地方反动势力所控制，生活与战斗在深山密林的红军游击队，没有地方购买和筹集粮食，除了依靠群众没法接济外，别无良策。然而民以食为天，群众食粮受到敌人严格限制，自身难保，那还有能力接济他人？况且敌人严厉禁止“通匪”，违者将遭杀身之祸。敌人这一手确实狠毒。然而老百姓与红军游击队患难与共，特别是贫苦民众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身上。他们宁肯自己忍饥挨饿，将省下的几根红薯、几斤谷子或几个饭团，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敌人封锁线，送给红军游击队。这种舍己为人的鱼水深情，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上，堪称楷模。

在浙南人民的冒死支援下，浙南红军游击队经过 8 个多月的艰苦奋斗，终于挫败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大“清剿”，迎来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时期。

六、进行谈判斗争，实现国共合作抗日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挺进师同国民党四省边署的谈判斗争，始于第二次反“清剿”斗争中期。谈判与反“清剿”交错进行，呈现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复杂局面。先后历时4个月，才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一）开展政治攻势与首次和谈

早在刘建绪发动大“清剿”之初，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与省军区，在奋起抗敌的同时，就向国民党发起了政治攻势。尔后，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不断加强这个攻势，迫使刘建绪不得不表示休战谈判。

临时省委继发表《致国民党官兵的一封信》，又于1937年3月，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和闽浙两省当局快邮代电》。与此同时，浙南党组织派往上海同中共中央特科联系的吴毓，从上海带回转给刘英的《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文件。由于敌军严密封锁，吴无法进入刘英所在的平阳北港地区，遂折返温州市，同临委派出的白区工作团商定，根据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文精神，以“快邮代电”方式向国民党的四省边署，第19师师部、浙江省政府、省党部、温州、处州、衢州等专署及其所属各县政府、县党部等机关发出呼吁：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共双方应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提议双方迅速派出代表举行和平谈判，并保证双方代表人身安全和来去自由。这件“快邮代电”是以临委和临时省军区名义，于3月25日分别从温州、瑞安、乐清和上海等地邮局发出的。

临时省委“代电”发出后不久，国民党当局即作出反应。于5月2日在《浙甌日报》上以“紧急启事”形式，暗示赞同红军提议，要求红军派人联系。“启事”大意称：兄等有日（3月25日）代电收悉，请派要员来温州×旅馆面洽。吴毓见到“启事”后，在临委地方工作团协助下，以浙南红军联络员名义同国民党军第19师旅长唐伯寅以及刘建绪派出的正式代表邓韧取得了联系。并商定先停战一周，以便红军商派正式代表。会谈地点定在平阳县北港区。接着吴毓和白区工作团的黄先河、陈铁军，借停战之机，迅速进入浙东南游击区，向刘英汇报。

刘英赞扬了吴毓等人的临机决断，在平阳北港山门乡大墩村召集临委会议，商讨同国民党谈判事宜。会议确定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为谈判的基本条件，只是缩小范围，把全国性改为地区性，如将“中华民国特区”的提法，改为“闽浙边特区”。同时决定以吴毓、龙跃和陈铁军3人为谈判代表（吴毓为首席代表）。后因龙跃有事不能离开，改由参谋董启文代替。吴毓等经与国民党方面联系，确定第一次谈判于5月7日起在平阳县山门畴溪小学举行，国民党方面代表、四省边署政训处上校处员邓韧带1个参谋和随从人员如期赴会。吴毓为了扩大影响，建议邀请中间人士列席会议，征得邓韧同意，双方一致邀请畴溪小学副校长邓扫空（邓野农）、教师林书合（林伊红）、当地中医师陈鸣玉等3人以地方公证人士身份列席会议。会议开始时，双方代表交换了对国内时局的看法与和谈意向。邓韧在讲话中流露出当时国民党军在浙南被拖得很苦，想早日离开山沟的思想情绪，因此希望和谈能成功。然而国民党内部对这次和谈意见不一。在内战前线的官兵想借此摆脱苦境，而南京当局则企图迫使浙南红军游击队就范，这就注定谈判必将出现曲折。对此，临时省委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刘英在谈判前夕，即离开险境，并借暂时停战之机，重新调整力量，以应付不测。

谈判第二天，开始触及实质性的问题。吴毓先提出闽浙红军愿意改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苏区改为特区（包括平阳、瑞安、泰顺、福鼎、寿宁、柘荣

6 县)；停止武装暴动；停止没收地主财产；闽浙红军改编后立即集中特区内，准备对日作战等 5 项保证。接着提出 5 点建议：1. 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一致抗日；2. 召集各党派各武装部队代表商讨抗日救亡大计；3. 开放言论、集会、出版、结社自由；4. 释放政治犯；5. 改善人民生活，并保护红军家属不受侵犯。吴毓发言完毕后，邓切不置可否，接着休会。邓立即打电话请示其上司。复会后，邓表态说，除划出 6 个县为特区外，其他几条都可以接受。然而特区问题，对红军游击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条，红军游击队就将失去立足之地。所以红军代表据理力争，而国民党方面不仅不肯让步，而且还提出了一些苛刻条件，特别是其中两条：一是闽浙边红军接受收编，统一归国民政府领导和调遣；二是红军所有政工干部要全部集中南京受训，另行分配工作。这样一来，双方分歧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这暴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只有消灭红军的险恶用心，而无合作抗日之诚意。当时列席会议的中间人士被夹在中间，难于从中调解。谈判未果。

谈判中断后，吴毓、陈铁军、董启文 3 位代表，为避免暴露目标，没有直接返回临委驻地，而随同邓切等到了平阳鳌江。在鳌江，吴毓提出双方先行停战，其他政治问题待后协商解决。邓切表示同情，但他说他不能作主，须请示上司。随后得到答复是，蒋介石电令“停抚进剿”。于是历时 17 天的首次谈判宣告破裂。

（二）重开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定

首次谈判破裂后，刘建绪奉蒋介石令偕第19师师长李觉等到浙东南内战前线瑞安、永嘉一带“督剿”。战火再次燃烧。临委谈判代表陈铁军在青田战斗中负伤被俘。陈以谈判代表身份指责“清剿”军逆潮流而动，并要求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当面理论，后被送到衢州四省边署关押。与此同时，浙西南游击区也在进行恶战。挺进师政治委员会主席、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焜在龙泉县锦旗乡龙殿坑战斗中以身殉职。

临时省委在领导红军游击队以游击战进行自卫的同时，继续发动政治攻势。当谈判破裂，刘建绪再开兵衅时，临委和临时省军区发表了《为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以及和平谈判破裂后告各界人士书》，进一步申明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争取实现国内和平与团结抗战的决心与诚意，说明谈判破裂的真相，同时再次呼吁国民党当局重开谈判。在这期间，临时省委还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与刘建绪代表谈判的情况。党中央十分关怀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命运。在得悉浙南红军艰难处境后，即请贺龙以刘建绪早年同学的关系，写信给刘，阐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政治局势的新变化，对刘晓以民族大义。同时以乡情旧谊动之以情，劝刘化干戈为玉帛，“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和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

6月中旬，临时省委再次发出《呼吁各界人士要求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以借社会力量迫使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七七事变爆发后，临时省委直接向刘建绪发出通电，敦促他以民族利益为重，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刘为形势所迫，加之他的部队陆续奉命调往淞沪杭前线，遂表示愿与红军重开谈判。他释放了临委谈判代表陈铁军，让陈转交他写给刘英、关英（中共皖浙赣省委书记）、黄道（中共闽赣省委书记）等人关于停战谈判的信。同时把贺龙写给他的信也一并交给陈铁军送交刘英，以表示他的诚意。刘英收到刘建绪信函后，即派陈铁军往衢州联系，经双方磋商，确定8月24日起在温州重开谈判。临委谈判代表为吴毓、陈铁军和黄耕夫；国民党代表仍为邓切。在这次谈判中，临委鉴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在坚持共产党独立与批评自由，以及保持红军武装的独立性等项原则下，作了适当的让步，主动放弃了第一次谈判时提出的划闽浙边6县为闽浙边特区的要求。国民党方面也不再坚持原先的苛刻条件。这就使谈判得以较顺利地进行。经过反复协商，初步达成了5项协议：1. 闽浙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待遇与国军同；2. 闽浙红军在瑞安、平阳、泰顺3县边界以山门为中心的地区集中，集中时间以半个月为限；3. 红军集中时，如遭国民党的军队与地方部队攻击，由四省边署负责，如红军发生暴动，则由共方负责；4. 无条件释放政治犯；5. 一切政治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初步协议签字后，临时省委和省军区立即发布《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司令部通告》，要求所属各部队迅速向军区所在地集中；各游击区对国民党驻军及一切地方部队，要注意团结；对碉堡、电线和各种交通工具，须予保护。同时，临委还发出了《为巩固和平坚决抗敌告全国各界男女同胞书》，表现浙南红军游击队与全国军民团结御侮的态度和决心。由于四省边署没有及时通令浙闽边各县国民党军政当局，致使红军行动发生困难，一时无法集中。为此，刘建绪于9月16日，又派政训处上校处员王裕先、中校处员詹行烈两代表到平阳接洽。刘英亲与会谈。经磋商，于17日在原拟协议基础上，形成了7项协定：1. 闽浙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

并根据任务确定编制；2.红军集中地点在平阳县的北港区；3.红军军需与给养，根据任务发给补充；4.红军集中时间自9月17日起至10月1日止；5.国民党当局无条件释放政治犯；6.一切政治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7.目前的宣传工作，根据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原则进行宣传。

在这期间，浙西南根据地由于与临委失去了联系，加之消息闭塞，还不知道国共两党已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不时听到从金衢平原上传来的谣言，说什么“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粟裕等领导人经过仔细分析，作出了国共两党可能合作了的判断。为此，派了一个小分队下山了解实情。这个小分队化装成国民党军，大摇大摆地开进龙游县溪口镇，到镇公所声称“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抗日前线，要与县长联系，了解情况”。镇长帮助挂通了县长的电话。县长说：“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要开拔抗日了……”小分队摸清情况后，迅速返回汇报。粟裕立即向国民党遂昌县党部和县政府发出《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遂昌当局很快响应，并定于9月19日在遂昌县门阵举行谈判。红军代表为谢文清，国民党代表为朱镇山。谢文清向对方提出3个谈判条件：1.红军将开赴浙南根据地，沿途（当局）不得留难；红军已经停止打土豪，国民党当局须给红军补充弹药、给养；3.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合作，要保持红军的独立性。朱镇山将会谈情况，向其上司作了报告。遂昌县国民党当局答复：全部接受红军所提条件，欢迎红军下山。至此，在整个浙南地区实现了和平。虽然后来国民党当局在一些问题上横生枝节，但国共合作抗战的历史潮流终究不可阻挡。

（三）胜利改编，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9月17日，闽浙边国共谈判达成最终协定后，临时省委即由青田、永嘉、瑞安边境赶回平阳北港，以集中部队与布置新的工作。约半个月时间，散布于瑞、平、泰、青、丽、温等县的红军游击队，基本集中完毕，连同机关工作人员共约300人左右。随后，刘英派人分途前往浙东和浙西南游击区，联系粟裕、谢文清、张文碧、范连辉、赵春和等负责人，向他们通报谈判情况和传达临委关于集中部队改编的指示。

10月初，刘英接到了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9月28日写来的信。信中告知，分局遵照中央指示，决定将一切游击队改为抗日武装，并交待了有关谈判、改编原则和实施办法。随后又收到了中共中央代表博古于南京写来的信，信中传达了中共中央于8月1日发出的《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央和分局的指示，使临时省委进一步掌握了党中央新的政策和策略精神，更加主动地推进浙南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加速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整编。在浙西南游击区，粟裕派代表同遂昌当局达成协议后，即率部队从门阵南下，经石练、湖山、王村口、大潘坑、船寮、青田、大岙，向临委驻地开进，当到达飞云江南岸时，与刘英派来的联络员相遇，随即一同奔赴平阳北港，与坚持浙南游击斗争的部队胜利会师。在这前后，临时省委所属的其他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相继到达集结地区。全部兵力合计约四五百人，相当于挺进师进军浙江时的人数。但成员有很大的变化，原红10军团的老骨干不多了，新成分主要是浙南、浙西南和闽浙边的工农子弟，另有一部分是上海、温州等城市的知识青年。这些新成分，经过艰苦的游击战争的锻炼，大部已成长为成熟的革命战士。此外，还发展了数千名党员，发动了数十县的民众，其中加入各种革命群众组织的达10万之众。浙南红军游击队于10月间在平阳集结完毕后，即正式宣布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支队和1个教导队，后来随着部队的扩大，又成立了1个新兵队。同时在温州设立了以吴毓为主任的总队办事处。部队改编后，就地进行军政训练和开展群众工作。

11月，中共闽浙临时省委在平阳北港凤林村召开扩大会议。粟裕在会上作了抗战形势的报告，刘英作了三年游击战争最后8个月的斗争总结和抗战新形势下的新任务的报告。为了加强抗战力量，临委还决定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和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加强干部培训。

1938年2月底，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到平阳山门街，向刘英、粟裕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东南分局的指示：浙江地位重要，原来的游击根据地不能放弃，要留下一些人在浙江继续坚持。在人事安排上，决定刘英留下，领导浙南斗争。撤销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浙江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粟裕带部队北上抗日。部队编入新四军战斗序列。

3月上旬，刘英随曾山赴南昌，向东南分局请示今后工作，途经金华时，刘英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行了会谈。经刘提议，黄同意在丽水设立“新四军驻丽水办事处”，在温州设立“新四军驻温州通信处”，在平阳设立“新四军平阳后方留守处”。发给抗日游击总队子弹5万发，军衣1000套，每月发给补充经费1.5万元。随后，省委决定由黄先河（后黄耕夫）任设在平阳北港水头街三桥堂的后方留守处主任；吴毓任设在丽水县城关高开巷19号的丽水办事处主任；周饮冰任温州通讯处主任。

3月18日，粟裕奉命率领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583人告别浙南人民，从平阳山门出发开赴抗日前线途。经丽水时，黄绍竑从金华专程赶到丽水碧湖会见粟裕，并在大港头向部队作了团结抗日讲话，给部队补充了部分弹药和军装。部队途经遂昌县时，经交涉遂昌县政府释放了部分在押的政治犯。4月18日部队胜利到达安徽歙县岩寺，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第3营。粟裕任第2支队副司令员。

部队北上后，刘英带领龙跃、谢文清、林辉山、吴毓、叶廷鹏、郑丹甫、张麒麟、郑海啸、黄先河等地方领导干部和部分武装人员，继续在浙南坚持斗争。

以工农红军挺进师为主体的浙南游击战争，在广大群众参与下，以百折不挠的坚韧精神，顶住了国民党军一再掀起的“清剿”恶浪，终于迎来了胜利。在这场极其艰险的斗争中，浙南革命军民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仅挺进师就有1000余名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烈士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它浇灌了浙南广袤沃土，培育出丰硕的果实，除了保存挺进师有生力量外，还发展了4000余名中共党员，建立起40多个县区级的党政组织和30多支县区级游击队，以及众多的革命群众组织，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形成了一个新的革命战略支点，这对尔后浙江乃至华东的革命斗争，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八章 闽北游击区

闽北游击区位于闽浙赣三省边界，以福建北部为主，包括福建省的崇安、建阳、建瓯、政和、松溪、浦城、光泽、邵武、顺昌、南平、将乐、建宁、泰宁、屏南、古田、周宁、寿宁和浙江省的江山、庆元、龙泉以及江西省的金溪、贵溪、资溪、广丰、铅山、上饶等26个县近4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具有开展游击战争的各种有利条件。这里地势险要。西北部是雄伟的武夷山脉，山高林密，峰危隘险。以武夷山为依托，北可达浙江，西可去江西，南可下闽中，东可至大海，有广阔的回旋余地。这里物产丰富。肥沃的建溪平原卧于境中，盛产粮食、竹木及茶叶。在秀丽的武夷山区，飞禽走兽和野生植物，应有尽有。这里还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早在1926年7月，崇安和建瓯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28年9月，中共崇安特别支部书记徐履峻领导了著名的以崇安上梅为中心的崇（安）浦（城）农民武装起义，震惊了闽北反动当局。1929年1月，中共福建省委特派员杨峻德、崇安县委书记陈耿以及徐福元等又领导崇（安）建（阳）浦（城）松（溪）铅（山）等县农民武装在崇安上梅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成立了闽北红军第55团。1930年5月，建立了崇安县苏维埃政权。闽北苏区初步形成，不久，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闽北苏区与赣东北苏区合并，成为闽浙赣苏区。闽北成立了中共闽北分区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闽北军分区，领导闽北地区的革命斗争。1931年至1932年，方志敏曾两次率领红10军入闽作战，攻克崇安、浦城、赤石、星村等重要城镇，促进了闽北地区革命斗争和武装力量的发展。1933年4月，闽北苏区划归新成立的闽赣省委领导，成为中央苏区之一部。1934年2月始，闽北分区委和军分区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下，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积极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是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之后，国民党军即调集重兵，对闽北苏区发动了反复的“清剿”。闽北红军游击队在黄道、黄立贵、吴先喜、曾镜冰等优秀领导人的领导下，依靠闽北地区的有利地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其斗争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935年1月红军游击队主动撤出大安、转入游击战争至7月游击战争取得初步胜利为第一阶段；1935年8月黄龙岩会议确定红军游击队实行内外线结合、兵分三路打出外线至1936年12月开辟新区和坚持原有游击根据地为第二阶段；1937年1月国民党军发动新的残酷“清剿”至1938年2月红军游击队力促国共和谈成功、实现北上抗日为第三阶段。

闽北三年游击战争，不但钳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而且保存和锻炼了闽北党的各级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作出了贡献。

一、撤出大安，转入游击战

（一）中央红军主力转谷后的闽北形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前，由于国民党军在占领了黎川、光泽后，又沿江西南城，经黎川、光泽、邵武、顺昌至福建的南平，构筑了数道封锁线，切断了闽北苏区与中央苏区的联系。主力红军转移后，国民党军为消灭留在闽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即开始部署对闽北苏区的“清剿”。11月，蒋介石将闽赣两省划分为12个绥靖区，并将闽北分割为3个绥靖区：崇安、建阳、建瓯、政和、松溪、浦城等为第9绥靖区，司令官刘和鼎（1935年1月改为福建第1绥靖区）；光泽、邵武、顺昌、资溪、将乐、建宁、泰宁、上饶、广丰、铅山、贵溪等地，分别划入第7、第8绥靖区，司令官分别由张钊、赵光清担任。在上述绥靖区内，敌部署有第56、第21、第76、第12、第57师、新编第11师、独立第45旅、“剿匪”军第2纵队和福建、浙江、江西3省保安团共10万余兵力。12月，驻闽“绥靖”主任蒋鼎文、驻赣绥靖主任顾祝同指挥所属各部，南自崇安、建阳，北从上饶、铅山，东经广丰、浦城，西由邵武、光泽，采取“四面兜剿”“节节推进”战术，以闽北苏区首府崇安大安为总攻击目标，大举“清剿”闽北红军游击队。

此时，中共闽北分区委、闽北军分区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有红58团（原属红7军团建制）、独立1团（即红1团）、独立2团（即红2团）、广浦独立营、西南独立团以及各县独立营等地方武装，共计5000人左右，其中大部红军主力在敌后作战。由于敌人的“清剿”和封锁线的隔离，无法实施统一指挥。因此，在反“清剿”斗争开始后，红军游击队虽英勇奋战，并于二都桥、三都圩、青山、渔梁等地给敌新11师、第56师及独立第45旅等以打击，但终因寡不敌众，难以遏止敌人的进攻。敌先后占领了崇安县城和星村、黄坑、石塘、二都镇等地。至年底，闽北苏区大部丧失。仅有以大安为中心的一块狭长地带还掌握在中共闽北分区委、闽北军分区和红军游击队手中，形势十分严峻。

（二）大安紧急会议，作出战略转变决策

闽北苏区首府大安即将兵临城下，闽北分区委内部的思想斗争亦日趋尖锐。为统一思想，确定下一步行动方针，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于 1935 年 1 月初在大安主持召开闽北分区委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德胜、曾镜冰、曾昭铭、吴华友、王助等领导干部。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关于原地坚持游击战争、等待中央红军主力总反攻的指示，结合闽北地区面临的形势和斗争实际，进行分析讨论。

对于如何坚持斗争，会议产生分歧意见。以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为代表的极少数人，认为应采取不放弃苏区寸土的方针，主张重新组织力量，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在洋庄、小浆、紫溪岭、车盘等地区，分兵把口，与敌决战，死守大安。以黄道为首的多数人则认为：当前形势是敌强我弱。闽北苏区以 5000 之众对 10 万强敌，是力不从心，要想处处设防，必然是防不胜防；过去闽北苏区所以能够取得历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主要取决于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闽北的形势就发生了变化，闽北苏区失去了固守的条件，因此，大安是守不住的。与其与强敌争夺大安，白白消耗有生力量，不如主动撤出大安，保存现有力量，以期以游击战争与敌作长期周旋，图生存求发展。黄道还针对李德胜等的错误观点，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赣东北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及闽北前一段斗争实践为例，指出：由于中央红军主力已经离开中央苏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也已离开了赣东北苏区，敌人即集中力量向闽北猛扑。在这种情况下，依靠打阵地战保卫苏区肯定要失败。因此，必须准备在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都被敌人占领的情况下，将主力撤到深山中去，依靠武夷山区，依靠人民群众，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黄道的意见获得大部分与会同志的赞同。会议作出如下决定：

第一，闽北党政领导机关及直属单位随军分区分批撤出大安，在原苏区地盘内坚持游击战争；

第二，撤退已公开身分的干部，留下地下党员，建立秘密的党组织和交通联络网，继续领导斗争；

第三，加强四渡桥阵地的防守力量，阻击敌之正面进攻，同时通知各主力团在大安外围牵制国民党军，以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转移；

第四，各县、区可根据实际情况，改变领导方式，就地坚持游击战争。

会后，分区委立即在党政军干部和红军游击队中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做好撤退前的各种准备工作。为了留下一些同志坚持隐蔽斗争，分区委采取特殊办法，给这些同志创造条件。如对党员张采姬，分区委在撤离大安前，故意开支部大会，批评她“政治动摇”，宣布开除其党籍，遣送回家。会后，曾镜冰亲自与她谈话，发给党籍证明，布置秘密斗争任务，让其深入洋庄一带，坚持地下斗争。此外，分区委还帮助群众坚壁清野，迅速疏散等。

大安会议，是在强敌压境的关键时刻，作出了闽北由苏区斗争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斗争方式、红军游击队由阵地战转变为游击战的正确的战略决策，从而为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以退为进，撤出大安

四渡桥阻击敌大安会议期间，铅山方面敌第 21 师、第 12 师由北，崇安方面敌独立第 45 旅等部从南，以钳形攻势逼近大安，并加快了推进速度。大安会议后，闽北分区委为保证党政军机关安全撤出大安，令军分区教导 1 中队在四渡桥阻击第 45 旅的进攻。四渡桥位于崇安黄石街与五渡桥之间，是敌进入大安的通道。因此，敌欲进攻大安，必先夺取四渡桥。军分区教导 1 中队在指导员陈仁洪带领下，迅速接替了四渡桥防务。其 2 区队进入四渡桥东侧高地；1、3 区队潜伏在北侧高地坚守，并保证 2 区队侧、后翼安全。临时指挥所设在中央的炮台处。部队按照部署，加固工事、备粮备弹：炒米放在炮台里，弹药扛进工事，敌我阵地交界处布上雷区，埋下许多拉发和压发地雷。树林和草丛里埋上绊雷。从雷区到阵地前沿，挖下陷阶。陷阶里插上锋利的竹签。1 月 6 日拂晓，战斗打响。敌独立第 45 旅以 1 营兵力开始发动进攻。1 中队拉响雷区 18 颗地雷，将敌炸得血肉横飞。连续 3 天，敌在 1 中队地雷、滚雷、手榴弹打击下，不能前进半步，几百具尸体躺在阵地前。此后，敌改变战术，集中兵力进攻第 1、第 3 区队扼守的四渡桥北侧高地。在敌重兵反复进攻下，第 1、第 3 区队所在阵地被烧焦，战斗持续 2 天。第 1、第 3 区队指战员大部牺牲，余部退守分水关至温林关河流西岸。10 日拂晓，敌约 2 营兵力，再度转向四渡桥东侧高地，边搜索边前进，并由第 56 师拨炮 2 门、轻机枪 4 挺参战。敌在炮火掩护下，疯狂向四渡桥东侧高地进攻。2 区队全体指战员居高临下，用冷枪射击、手榴弹和滚雷相结合，打退敌数十次冲锋。在敌兵力不断增加、阵地工事逐渐被摧毁的情况下，顽强坚持到夜幕降临，敌暂时停止了进攻。陈仁洪鉴于阻击任务已完成，遂率部乘阵地烟雾弥漫之际，悄悄撤出战斗。11 日拂晓，敌第 45 旅的炮火从南、北、东三个方面对着无人坚守的阵地猛烈轰击 2 小时后，方提心吊胆地进占四渡桥阵地。

四渡桥阻击战，军分区教导 1 中队共歼敌 500 余人，粉碎了敌人迅速夺取四渡桥阵地的企图，掩护了闽北党政军机关安全转移。此役及随后进行的阻击战，为闽北苏区由苏区斗争方式到游击区斗争方式的转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独立第 45 旅占领四渡桥阵地后，复向五渡桥进攻。闽北独立第 1 团在五渡桥东侧阵地阻击，歼敌 300 余人。

15 日，敌独立第 45 旅继续向大安推进，沿途遭到红 58 团等闽北红军游击队的节节阻击。

路口截击战根据大安会议决定，红 58 团于洋庄、小浆一线，在地方武装和赤卫队配合下，以袭击、伏击、骚扰等战术，阻滞敌人前进，争取时间，掩护领导机关转移。当独立第 45 旅继续向洋庄、路口、小浆一线进犯，距大安仅 2.5 公里时，红 58 团团团长黄立贵令所部和奉命刚刚从分水关赶到这里的原红 7 军团第 19 师第 53 团第 3 营（营长饶守坤，留在资溪、光泽、贵溪、邵武几县交界地区坚持斗争）迅速抢占位于大安南部的路口两侧山岗隐蔽。当敌尖兵排开过之后，红 53 团第 3 营和红 58 团立即拦截其中间部分，两面夹击，使敌首尾不能相顾。经激烈战斗，歼敌 1 个营，击溃敌 1 个团。

与此同时，闽北军分区独立 1 团在崇安老鼠排设伏，歼独立第 45 旅 1 营多人。

由于红 58 团等主力部队的奋力阻击，敌在 10 天内只前进了 15 公里。25

日，当敌到达小浆时，闽北党政军领导机关及直属部队、工厂、医院等单位1000多人，安全撤出大安。 26日，敌军占领大安。

撤出大安，标志着闽北红军游击队以退为进，向山区进军，从此转入全面游击战争。

（四）长涧源整编，闽北红军独立师成立

1935年2月，当闽北分区委领导机关转移至崇安长涧源、坑口一带时，收到中共中央分局转发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就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对照指示，闽北分区委肯定了撤出大安这一行动的正确。并就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就地开展游击战争问题，仔细分析研究，在大安会议的基础上，作了如下新的部署：

1. 在组织领导上，实行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体制。即进一步精简党政军领导机关，本着一切服从游击战争作战需要的原则，压缩非战斗单位和工作人员，充实战斗部队，撤销重叠机构。具体作法是：将分区领导机关，包括直属队在内，由原来的1000余人，减至约400人；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办事机构合并，成立分区政治部，曾镜冰任政治部主任，王助任副主任；军区医院、被服厂缩编；兵工厂只保留几十人的枪械修理所。各县、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也进行精简。在闽北游击区各地，相继成立游击司令部或指挥部，由县、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书记，分别任游击司令和政委，以利于游击战争的开展。分区委还决定成立崇安中心县委，由曾昭铭任书记，领导大安以东的崇安、广浦地区的斗争；成立西南战区委员会，以汪林兴任书记，领导大安西南的崇安、建阳老区的斗争；从分区领导机关抽调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温卿绍、总工会主席吴华友、总工会青工部长王荣生等，到建阳、邵武、广浦等地，充实和加强各县的领导。这样，分区委就在实际斗争中，把群众斗争、秘密斗争、武装斗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结合起来，既能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又能有效地开展游击战争。

2. 在军事上，重建闽北红军独立师。2月12日，闽北分区委将闽北军分区所属各部在崇安长涧源集中，进行整编，重建闽北红军独立师。黄立贵任师长，卢文卿任政治委员，张燕珍任参谋长。独立师下辖4个团，每团编制3个营。第1团由红58团第1、第2营为主编成，张燕珍兼任团长，卢文卿兼任政委；第2团由独立1团为主编成，胡佑民任团长，刘胜任政委；第3团由红58团第3营、闽北军分区警卫营第2、第3连、教导1中队和部分机关工作人员编成，祝为根任团长兼政委；第4团由独立2团为主编成，丁日升任团长，彭喜财任政委。全师共2000余人。闽北分区委要求闽北红军独立师在敌强我弱情况下，既能分散隐蔽，又能集中歼敌，机动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

（五）独立师主力向闽赣边境进军

闽北红军独立师成立后，立即根据分区委的决定，按计划分散活动：独立师师部和第1、第3团到江西的铅山、上饶、贵溪一带活动；第2团到崇安、广浦地区活动；第4团到建阳、邵武、光泽地区活动。各团在当地独立营和游击队配合下，依靠山区，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对付敌人的“清剿”。其中，师长黄立贵所率师部和第1、第3团在闽赣边境连战皆捷。

偷袭紫溪 1935年2月，向闽赣边境深入的闽北红军独立师师部及第1、第3团为打击国民党军“清剿”的嚣张气焰，扩大红军游击队的影响，决定首先攻打江西铅山县紫溪。部队一出温林关，师长黄立贵就令警卫营侦察排40余人，化装巧取了通往紫溪的必经之路——下渠，切断了紫溪和石塘镇（驻有敌第21师大部队）的联系。并从俘虏口中获悉驻守紫溪镇敌驻军第21师的布防情况。师部经过研究，决定偷袭紫溪。14日晚，部队悄悄从下渠出发，经过车盘，进抵紫溪。3团1营侦察排和2连摸掉通往车盘方向路口的哨兵，出敌不意，一脚踢开紫溪镇山上碉堡之大门。正在喝酒猜拳的敌人被突然出现的红军游击队吓呆了。侦察排和2连收缴了敌人的武器，将守军全部俘获。接着，燃起3堆熊熊大火，发出攻击信号。担任攻打紫溪街的第3团2营、3营和担任攻打外围据点的第1团一齐打响，将敌全部歼灭。独立师攻占紫溪。此战，独立师共歼敌第21师1个营部和2个连，毙伤敌100余人，俘敌80余人，缴枪200余支，取得了独立师成立后的首战胜利。紫溪战斗后，独立师第1团乘胜扩大战果，在铅山县杨村，歼敌第21师100余人。

突袭盖竺、涂家村紫溪、杨村战斗后，独立师第3团从杨村直插盖竺，准备歼灭盖竺之敌。盖竺共有守军第21师1个营，分别驻守在盖竺村村东北的大碉堡、黄沙坑和涂家村。3团团部决定，以团部和直属队攻打盖竺；2营攻打大碉堡；3营攻打黄沙坑。1营攻打涂家村。涂家村守军1个连分为两部：2个排驻村中，1个排在村西虾蚣山上碉堡内。1营兵分两路，以突袭动作，山上山下同时进攻，涂家村守敌全部就歼。之后，1营奔赴盖竺，增援团部。盖竺守军正凭借有利地形顽抗。1营配合团部、直属队以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将盖竺守军劝降。与此同时，3营攻下黄沙坑，这次战斗，独立师第3团共毙敌100余人，俘200余人，缴枪300余支。

巧袭陈坊盖竺、涂家村战斗后，黄立贵师长率独立师师部和第1、第3团在元宵节前，到达铅山县石垅村宿营。当了解到当地元宵节有舞龙灯的习惯时，师部决定巧袭陈坊。翌日下午，第1、第3团急行军至傍晚，赶到陈坊镇。部队化装后跟着群众舞着龙灯穿过敌第12师的碉堡封锁线，冲进街道。抓住敌哨兵充当向导，向陈坊驻军突然发动攻击，全歼敌第12师1个连100余人，缴枪100余支。之后，迅速撤出战斗。夜幕中，敌目标不清，胡乱开枪射击。而独立师一面嘲笑敌人在鸣枪为红军游击队送行，一面继续向邵（武）顺（昌）建（阳）大踏步前进。

在独立师师部和第1、第3团转战闽赣边境，扫平武夷山北麓数镇之敌，歼敌正规军和地方民团近千人时，独立师第2、第4团也在崇安、浦城、建阳、邵武、光泽等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乱了敌人的分区“清剿”部署。这一系列的胜利，证明了闽北分区委主动放弃大安、适时领导闽北地区实行战略转变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六）反叛徒斗争与三港整顿

独立师各团分散后，分区领导机关和直属部队在黄道率领下，由崇安出温林关，沿着武夷山脉，进入铅山县境。此时，发生了李德胜叛变投敌事件。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他仍然坚持王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左”倾政策，不顾闽北敌大军压境的实际情况，坚持死守大安、不失苏区寸土的主张。当闽北红军游击队撤出大安后，他又在敌军围追堵截和由此所造成的各种困难环境下，一筹莫展，悲观失望，以至由动摇而叛变。当部队行进至距望村7公里左右的铅山县东坑时，李德胜借口侦察敌情，只身在篁村投靠了国民党军。

李德胜“侦察敌情”一去不回，富有斗争经验的分区委书记黄道预感到李德胜有叛变的可能。遂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写信给独立师师长黄立贵和中共光泽中心县委书记吴先喜，嘱其提高警惕，凡军分区司令部命令，未有政委签名，一律无效，以防不测。另一方面立即行动，率分区领导机关和直属部队，冒着倾盆大雨，向崇安方向星夜转移。即便如此，也没有完全脱离险境。当部队行至桐木关附近时，李德胜引国民党追兵跟踪而至，将黄道及其所属部队分割包围，情况十分危急。此时，在三港（距桐木关约3公里左右）活动的吴先喜获知后，立即率独立师第4团前来救援。经过激烈战斗，在独立师4团奋不顾身掩护下，分区领导机关和直属部队终于突出重围，到达三港。但部队已遭受惨重损失，不少伤病员因无法突围，被李德胜放火烧死，部队的军需辎重和生活必需品全部丧失。闽北军分区所拥有的唯一一部电台，也为免落敌手，被战士们扔至山涧中，闽北分区委和闽北红军游击队从此失去了与中央领导机关及兄弟部队的联系。

李德胜的叛变，在军中引起了不小的波动。加之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的失利和方志敏不幸被捕的消息传来，像一片乌云笼罩在闽北红军游击队指战员心中。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国民党反动宣传和残酷战争的考验，或逃跑，或叛变，致使军心不稳。同时，部队撤出大安后，频繁的行军和作战，使部队和机关迫切需要进一步精简。黄道认为：部队在实行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战略转变的同时，必须实行思想上的转变。遂于2月末，在三港对机关部队进行整顿。

首先是组织上的整顿：开除李德胜的党籍，撤销其军分区司令员的职务，任命吴先喜为军分区司令员；分区领导机关进一步精简，压缩非战斗人员，充实独立师各团，轻装灵活，以适于游击战争的需要。接着是思想上的整顿：为肃清李德胜叛变造成的恶劣影响，利用战斗间隙，开展“反叛徒、提高革命信心、坚持革命斗争”的教育。黄道亲自写了一首《骂叛徒李德胜歌》，在部队中教唱。歌中除历数李德胜的罪行外，提倡“革命同志心如铁，任何艰苦不变心，为着工农的利益，不顾一切的牺牲”。指出“最后胜利属于我们”。通过反叛徒斗争，革命光荣、叛变可耻的思想深入人心，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迅速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组织上也更加精干，为闽北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继“三港整顿”后，闽北游击区各地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也按闽北分区委的指示和做法，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坚定了革命信心，从而使部队的战斗力大为增强。在随后进行的两次激烈的战斗中，充分反映了“三港整顿”的成效。

一次是五里考遭遇战。4月2日，闽北独立师第1、第3团约500人，在师长黄立贵率领下，从资兴县辗转作战至建阳县五里考，与国民党“清剿”军新编第11师周志群部两个团遭遇。敌以优势兵力占领五里考四面山头，深知遇上的是闽北红军游击队的主力部队，不断增强兵力，企图将闽北独立师一网打尽。经过“三港整顿”的闽北独立师，战斗力更加顽强。在被敌人团团包围、九死一生的情况下，师长黄立贵身先士卒，一马当先，率部拼搏，反复冲杀，激战两昼夜，突出重围。部队翻过几道山梁，不料又与敌第76师遭遇，激战10小时，终于摆脱敌军纠缠。这次遭遇战，独立师伤亡100余人，但毙伤第11师、第76师300余众，体现了独立师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对革命无限忠诚的精神。5月，黄立贵率部冲破敌设置的多道封锁线，深入到建瓯、松溪、政和地区、访贫问苦，帮助当地党组织开展工作，恢复和发展武装。更重要的是，在两个月的艰苦斗争中，取得了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宝贵经验。

另一次是金钟山伏击战。在闽北独立师第1、第3团转战于建阳等地时，独立师第2、第4团根据闽北分区委的指示，深入到崇安、浦城、铅山等地活动，寻机歼敌。部队到达铅山王府岗山下的金竹排，侦察到距此20多公里的甘溪镇驻有国民党“剿匪军”第2纵队1个营，兵力薄弱，估计天亮前有可能出来“搜剿”。黄道、吴先喜决定采取“诱敌深入”战术，在金钟山和甘溪镇之间打一伏击战，歼灭“搜剿”之敌。4月29日凌晨，独立师令侦察排悄悄下山，向甘溪镇方向鸣枪，吸引敌人。敌“剿匪军”第2纵队果然有1000余人出动。当敌过甘溪河，进入金钟山“之”字形山沟时，埋伏在两侧山上的独立师第2、第4团突然跃起。第2团从正面猛烈开火，第4团从侧后包抄，切断敌之退路。敌依仗人多势众，武器精良，拼命组织反扑，但在独立师猛烈夹击之下，渐成败势。经3小时激战，独立师歼敌200余人，缴枪200余支。独立师伤亡20余人。是闽北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以来以最小代价获最大战果的一次胜利。

二、黄龙岩会议，开辟游击新区

（一）国民党军大举“清剿”

由于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领导闽北红军游击队从大安会议后，及时实行了思想、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战略转变，不但稳定了队伍，有效地开展了游击战争，且游击区域不断发展扩大，这不能不引起国民党军的重视。

1935年7月15日，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闽赣浙皖4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重点“清剿”闽北红军游击队。卫立煌将总指挥部由南平迁至浦城。为扭转前段“清剿”中出现的“派部进剿时，兵多；入山后，由于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给养困难，则兵少；更由于山高林深，路少险多，易受匪暗算。故此剿彼窜，肃清极难”的局面，决定采取政治、经济、军事全面封锁策略。军事上，令第56师驻松溪，第3师驻浦城，第21师驻铅山河口，第76师驻光泽，新11师驻建阳黄坑，独立第45旅驻崇安。以崇安、铅山、浦城等红军游击队主要活动区域为重点，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圈内设置层层封锁线，构筑碉堡，密布哨卡，企图将闽北红军游击队消灭在崇建浦公路为封锁线的封锁区内。政治上继续推行“移民并村”和“保甲制度”，“一户通匪十户连坐”，实行“连环切结”。经济上，严格控制粮食、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上山，以“抽干池水捕鱼”，断绝红军游击队的生路。并以“铲共义勇队”配合，使红军游击队不但作战艰难，生存亦受到极大威胁。红军游击队只能隐蔽在深山密林中，以野菜、生笋为粮，蓝天作被大地当床，岩洞、树兜作房；为了躲避敌人的袭击，必须早晚易地相处；饥饿和疾病伴随，红军游击队过着野人般的生活。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时期内，红军游击队非战斗减员不下千人，仅地方县一级、部队团一级干部，就有20多人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斗争虽然艰苦，但红军游击队指战员斗志顽强。黄道十分重视艰苦条件下的思想工作。他鼓舞大家说：“游击战争，是一次艰苦的、残酷的、长期的斗争，我们都要经得住考验！”“像筛米一样，先筛掉的一道是糠，再筛掉的是米，最后剩下来的，就是谷子。这是硬骨头，咬不动的。我们都不要做糠，不要做米，要做留下来的硬骨头谷子！这是我们未来的革命力量，我们要注意保持自己的这个力量。”

（二）黄龙岩会议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重点“清剿”，摆脱被敌包围之困境，闽北红军游击队迫切需要研究制定一有效的行动方针。1935年8月，黄道在崇安县岚谷乡黄龙岩主持召开闽北分区委扩大会议（简称黄龙岩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黄道、黄立贵、吴先喜、曾镜冰、曾昭铭、卢文卿以及饶守坤、王助、彭喜财、叶全兴等人。会议首先肯定了大安会议以来，闽北红军游击队在闽北分区委领导下，适时实行斗争策略的转变以及长涧源整编、三港整顿，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客观上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支援兄弟地区的革命斗争等方面的正确。同时指出了不足，即闽北各地目前游击战争发展还不平衡，有些地区因仍坚持苏区原有政策和固守“原地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因此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等。接着，会议围绕如何打破敌人政治、经济、军事三管齐下的“清剿”和如何图生存求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独立师师长黄立贵根据在建松政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说：鉴于局势危急，部队应积极地打出外线，到敌人后方去，实行战略退却和战略进攻相结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结合的方针，以调动敌人。避免打硬仗，打消耗仗，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既可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又可打破敌人的“清剿”。

这一建议，得到黄道及与会同志的赞同，一致认为：黄立贵率部向敌后挺进、开辟游击新区的作法，开拓了游击战争的新思路。在此基础上，会议对黄立贵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 and 金钟山战斗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制定了以革命老区为依托，保存有生力量，积极向外发展，开辟游击新区的总方针。会议决定采取如下几项政策和措施：

第一，在军事战略战术上，采取防御和进攻相结合，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方针，向敌后挺进，开辟游击新区，强调保存有生力量，尽量避免打硬仗，打消耗战，学会在分散的条件下，抓住有利战机，打击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势力。

第二，在政治上，实行“白皮红心”的两面政策，争取和多数保甲长、大刀会建立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打击少数顽固的敌对分子。

第三，在经济政策上，变打土豪为向土豪筹款，改分田地为减租减息。会议还作出了联络闽东红军共同抗敌的决定。

由于会议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符合闽北的实际斗争情况，闽北游击战争得以由被动转为主动、迅速展开。这次会议就成为闽北游击战争的新起点。

（三）开辟新区，恢复和巩固老区

黄龙岩会议后，闽北红军独立师主力即根据会议决定，兵分三路出击外线，如蛟龙入海，开辟了闽东北、闽中、抚东等几块游击根据地，并使闽北原有的游击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闽东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 1935 年 9 月，饶守坤、王助率领独立师第 2、第 3 团（次年 6 月改为独立师第 1、第 3 纵队）为第 1 路，从崇安岚谷出发，向闽东北进军，执行开辟闽东北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并为联络闽东红军创造条件。东进途中，遭到敌第 3 师、新 11 师和反动地方民团的围追堵截。部队尽量避免与敌接触，翻山穿林，走隐蔽小路。并采取忽东忽西，欲南却北之战术，终于摆脱尾追之敌，于 10 月进至闽东北，到达建（瓯）松（溪）政（和）边境的川石村。建松政边区，原是闽北苏区一部分，有一支 10 几人的队伍在这里坚持斗争。5 月间，黄立贵曾率独立师第 1、第 3 团主力在这一带活动，建立了中共建松政中心县委，任命洪坤元为书记，发展了地方武装，游击区扩大到千仙岗、西洋河对岸等地，有一些群众基础。饶守坤、王助率部到达这一地区后，为便于与闽北分区委联系，缩小目标，减少给养困难，利于开辟新区，决定再次分兵：留下第 3 团，在周汝春、叶全兴带领下，与地方武装相配合，建立和扩大游击根据地；第 2 团则在饶守坤、王助带领下，继续东进，选择有利地区开辟新区。

第 2 团日夜兼程，跋山涉水，辗转进入建瓯、屏南、古田 3 县交界之地村（属建瓯县玉山乡）。这里山深林密，人烟稀少。又因处于几县交界，国民党军防守兵力薄弱，开辟新区较为有利。但饶守坤、王助等开始工作时，遇到不少困难。这里群众不比老区，由于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欺骗，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凡窝匪、通匪、济匪、当匪者杀无赦”的血腥政策的镇压，不敢与红军游击队接近；这里反动民团、大刀会猖獗，依仗人多势众，常常出其不意地袭击红军游击队，使独立师处于被动地位。饶守坤、王助为站稳脚跟，决定采取“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方针，把发动和争取群众放在开辟游击新区的首位。具体做法是：白天，部队以连为单位集中，随时准备抗击敌人的骚扰和袭击。晚间，分散深入到农寨中，走家串户，宣传党的政策，了解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的困难，使群众逐步认识到红军游击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群众渐渐消除了恐惧，同情并支持红军游击队，局面有所好转。与此同时，饶守坤、王助还运用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团结、利用大刀会。他们从群众中了解到，建瓯、屏南、古田等县，村村都有大刀会，尤其是以林熙明为首的大刀会，势力颇大，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操纵利用下，经常欺骗压榨群众，袭击红军游击队，成为独立师开辟新区的障碍。他们决定采取打击与争取相结合的办法解决这一障碍，并使其成为可以联盟的力量。11 月中旬，林熙明大刀会徒 500 余众向独立师 2 团进攻。独立师 2 团在地村北面山上设伏，四面合击，俘大刀会徒 100 余人。之后，饶守坤派人送信给林，说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红军游击队的任务及对大刀会的态度，表示愿意与大刀会互不侵犯，联合对敌。如同意，所俘 100 余人立即释放。林很快复信。下旬，饶守坤与林熙明在政和县宝岱村会谈。林熙明接受了饶守坤的提议，双方缔结了友好联盟，决定互不侵犯，互相支援。之后，第 2 团利用林在大刀会中的威信和地位，争取了他手下 1000 多名大刀会徒，使其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成为独立师第 2

团不可忽视的一支联盟力量。

大刀会问题解决后，红军游击队解除了后顾之忧，着手集中力量打击当地的反动民团和土豪劣绅。当了解到有张春光和徐邦基两股反动势力后，又采取分化瓦解办法。与张春光订立“君子协定”，要求他做到三不“捞”：一不要捞穷人，要捞地主老财；二不要在游击区捞，要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捞；三不要“捞”人，即不能抓老百姓去当土匪。双方签了字。对徐邦基也采取了大致相同的办法。对这两股反动势力的解决，维护了群众的利益，解决了部队的经济来源。同时，用“又打又拉”政策，在闽东北争取了一半以上的保甲长，使他们为红军送情报、筹粮食、打掩护，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人物，对独立师2团坚持游击战争起了重要的策应作用。

统一战线政策的运用，使独立师2团改变了在闽东北阶级力量的对比，形成了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数力量，由此度过难关，建立了以玉山、迪口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独立师2团还领导群众开展抗丁、抗租、抗捐斗争，由此，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也得到了迅速开展。1936年1月，独立师2团乘张发奎接替卫立煌任4省边区“清剿”总指挥、各“清剿”部队换防之机，袭扰屏南县城，扩大红军游击队的政治影响。接着，在大刀会的配合之下，连续袭击棠口、葛畚、筹岭、大嵩、千仙岗等地，给国民党反动民团以很大打击，游击区域也随之扩大。至年底，独立师第2、第3团开辟了包括福建东北部的建瓯、松溪、政和、周宁、寿宁、古田、屏南、南平和浦城千仙岗以南及浙江龙泉、庆元以西广大地区在内的闽东北游击根据地，打开了能够联络闽东红军的通路，第2、第3团也发展到1000余人。

闽中游击根据地的建立黄龙岩会议后，闽北红军独立师师长黄立贵将所属第1团和第4团第1营以及由闽北方面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王裔三纵队（活动在闽浙边境）合编为闽北红军独立师第2纵队，纵队长王裔三，政委吕生子，下辖3个支队。尔后，根据闽北分区委的指示，黄立贵和王裔三率第2纵队作为打出外线的第2路，挺进邵（武）顺（昌）建（阳）地区，开辟闽中游击根据地。部队从岚谷出发，绕道闽赣边境，连续摧毁岭源一线敌之碉堡，又袭击紫溪，攻占杨村，造成北进之势，以迷惑敌人。然后，部队突

然掉头南下，甩掉追击的国民党军，直奔邵顺建。

邵顺建地区，位于国民党军新编第11师和第76师交界处，属两不管地区，敌之防守力量较薄弱。各村镇除有限的民团外，大部是受保安团和土豪劣绅控制的九仙会、大刀会。这里已有中共邵顺建县委领导下的邵顺建独立营，在建阳的麻沙、界首、茶等地活动。黄立贵师长决定，先与中共邵顺建县委及邵顺建独立营会合，然后在他们的配合下，充分利用3省交界的复杂地理环境，坚决打击顽固的封建势力，争取群众，瓦解大刀会、九仙会，开辟游击新区。但当部队进入邵武时，发现福建的保安团纠集建阳麻沙地区的九仙会、大刀会数千人，在东起营口，沿麻沙、江坊、界首，西至邵武晒口一线分兵把口，层层布防，控制了建阳至邵武的交通线，堵住了第2纵队南下的通路。黄立贵与曾镜冰研究决定，必须先是在麻沙给大刀会、九仙会以打击，然后才能视情况开展工作。9月中旬，独立师第2纵队在麻沙后山设伏，派一支小部队向麻沙佯攻。麻沙的大刀会、九

仙会果然出动 400 余众，采取“集团进攻”方式，先排成方队，再吃符念咒，在民团支持下，向麻沙后山蜂拥扑来。当其进入第 2 纵队伏击圈后，第 2 纵队向四面包围，将其全歼。此战，不仅彻底揭穿了会徒头目所宣传的“刀枪不入”的骗局，也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黄立贵师长率部进村后，及时作好善后工作，一面派人保护佛堂，宣传红军游击队保护宗教信仰的政策；一面又指出，只要大刀会、九仙会不与红军游击队作对，红军游击队也绝不将大刀会、九仙会视为敌人。在我军宽大胸怀政策的感召下，终于消除了这一带大刀会、九仙会会徒的敌对情绪。第 2 纵队遂穿过建（阳）邵（武）公路南下，在华家山与邵顺建县委和邵顺建独立营胜利会合。

邵顺建县委，原是 4 月间黄立贵师长率部在这里活动时领导建立的，并将当时的邵武独立营扩建为邵顺建独立营。由于邵顺建独立营在中共邵顺建县委领导下，经常配合闽北红军独立师开展游击活动，因此，在开展游击战争方面有一定基础。黄立贵师长决定，自己率领独立师第 2 纵队 2 支队（原独立师 1 团）主力向闽东北地区挺进，执行联络闽东红军的任务。留下第 2 纵队第 1、第 3 支队与中共邵顺建县委、邵顺建独立营相配合，在邵顺建地区坚持斗争。

黄立贵率部出发后，第 2 纵队第 1、第 3 支队在邵顺建地区，军事上采取积极向外出击、扩大游击区域的方针，政治上运用打击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与反动分子，争取一般豪绅地主和保甲长的政策，使地方党组织、红军游击队和游击区域都得到迅速发展。建立了中共邵顺建县委领导下的饶坝、贵溪、东游、华家山几个区委；成立了南门丁盾、西门丁厝、花园岭、贵溪、岭板桥、蔡墩、华家山、东保、上方等地的党组织、游击队和赤卫队，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游击战争。10 月，邵顺建独立营攻打建阳县宫口南部的重要集镇茶 ， 攻占茶 。1936 年 1 月，独立营和地方游击队，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在界首附近的田塘下击溃民团 20 余人，乘胜追击，攻入界首，俘镇内反动民团 17 人，缴枪 17 支，毙伤援兵 30 余人，有力地配合了闽北红军独立师第 2 纵队开辟游击新区的活动。8 月，独立师第 5 纵队成立。纵队长吴元林。10 月，第 6 纵队成立，纵队长林老生，政委柴金林。随后，第 5、第 6 纵队各抽出一部，由曾昭铭、马长炎、柴金林等率领，开辟了将（乐）建（宁）泰（宁）游击区，成立了中共邵将泰和建泰县委。年底，邵顺建、将建泰游击区连成一片，闽中游击根据地形成。

抚东游击根据地的建立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率领独立师第 4 团（1936 年 6 月改为独立师第 4 纵队）为出击外线之第 3 路，目标是向资（溪）光（泽）贵（溪）挺进，开辟抚东游击根据地。

资光贵地区，曾是闽北苏区之一部，1934 年 2 月，闽北分区委就在这里成立了中共光泽中心县委，吴先喜任书记，领导了资光贵地区的革命斗争，吴先喜对这一地区十分熟悉。闽北分区委撤出大安后，资光贵地区也为国民党军占领。中共党组织和游击队即转入山区、乡村隐蔽活动。通过发动群众和争取、联合大刀会，打击反动势力，扩充了队伍，将这里的邵光独立营扩建为邵光独立团，由中共光泽中心县委军事部长刘文学任邵光独立团政委。1935 年 9 月，吴先喜率独立师 4 团到达建阳县黄坑，与邵光独立团 80 余人会合后，召开光泽中心县委会议，吴先喜传达了黄龙岩会议精神，群情振奋。随后两部 400 余人向资光贵进军。几天后，攻占光泽县柴家。第 4 团以柴家为立足点，在邵光独立团配合下，发动群众，开展军事活动，打击反动地方

武装和民团。当月，成立了中共柴家区委，刘文学任书记。之后，第4团继续向资溪、贵溪边界前进，开辟新区。1936年初，吴先喜率第4纵队离开资光贵地区后，刘文学率邵光独立团，在资溪、贵溪边区游击新区基础上，按照独立师4团制定的以隐蔽斗争为主、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作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和逐步向抚东发展的方针，在金、资、光、贵4县边界地区积极开展工作。具体作法是：哪里敌人力量薄弱，就向哪里发展；在敌占领的集镇周围，发展游击区。先后建立了中共昌坪区委、冷水坑区委、陈坊区委等。是年春，又在柴家、昌坪、冷水坑、陈坊4个区委基础上，成立了中共资光贵中心区委，刘文学任书记。6月，吴先喜率独立师第4纵队再度深入资光贵地区，在闽坑附近与邵光独立团会师。7月，吴先喜乘此时国民党军将大部力量集中于金溪、贵溪一线，资溪县城防只有少量民团时，率第4纵队300余人，袭击资溪县城，全歼守军70余人，缴枪70余支，占领资溪。但当部队撤出城后，在金溪五里峰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第4纵队几经血战，方突出重围。8月，黄立贵师长获知第4纵队损失较大后，派陈仁洪带领第2纵队第1支队到资光贵地区增援。第2纵队第1支队经长途跋涉，翻过武夷山，到达江西境内，在贵溪县板石坑附近与第4纵队会师。吴先喜把两部合编为第4纵队，纵队长吴德初，政委吴先喜兼。原第2纵队第1支队编为4纵队1支队，原第4纵队编为4纵队2支队。整编后，部队接受攻打资溪后被围的经验教训，重申以隐蔽斗争为主的方针，部队每到一处，即深入发动群众，发展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山民入党。同时减少敌对势力，增加同情和支持的力量。如对甲长，要求他们：第一，不准欺压群众；第二，保证红军游击队和安全工作人员的安全；第三，不向敌人报告红军游击队的行动等。对于保长，则再加三条：敌人来“清剿”时，尽早向红军游击队报告；国民党抽壮丁时，尽量到外地去买，对逃回来的壮丁，不准追查；设法给红军游击队送粮食等。红军游击队则保证其本人及家属的安全。部队本身也将打仗与休整相结合，每打一仗后，争取进行20天左右的休整，以提高部队战斗力。这样，经过一段扎扎实实的工作，第4纵队不但发展了200多名党员，还建立了昌坪、马斜、丰上、闽坑、茶山、下张、横坑、五里山、下源、上源、窖下、冷水坑、饶桥、高埠等地党支部。成立了中共资光贵中心县委，吴先喜任书记，刘文学任副书记。中心县委下辖柴家、昌坪、冷水坑、茶山、马斜、闽坑、金资贵8个区委。中心县委下设组织、宣传、民运、青运各部。游击区发展为包括金溪、资溪、光泽、贵溪4县广大边区的抚东游击根据地。

闽北游击根据地的恢复与巩固闽北是指崇安、建阳、上饶、广丰、浦城一带的原闽北老苏区。在独立师兵分3路打出外线、开辟新区的同时，黄道领导闽北分区机关和中共崇安县委，在闽北地区坚持斗争，恢复和巩固闽北游击根据地。

闽北分区委撤出大安后，国民党军即占领了闽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城镇和乡村，并采取“移民并村”、“保甲制度”和经济封锁政策，“搜剿”、“堵剿”红军游击队。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无辜群众被杀害，大部群众被移民，造成一块块“无人区”。黄尤岩会议后，中共闽北分区委机关和各地党组织决定从解决群众利益入手，恢复和巩固闽北游击根据地。首先，是调整政策和策略。不再称下山回乡的群众为“反水”。在游击根据地内部，对保甲长和土豪劣绅实行争取和镇压相结合的方针。即一面对那些“白皮红心”的保甲长给予肯定和鼓励，一面镇压出卖革命和危害群众的首恶分子，坚决

打击“铲共义勇队”和反攻倒算活动，维护群众的利益。这些措施实行以后，不但教育了群众，而且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人民群众知道红军游击队缺粮缺盐，就冒着生命危险，偷着出村上山，给红军游击队送粮送盐。并主动为红军游击队站岗、放哨，递送情报。遇到危险，宁可牺牲自己，也不出卖红军游击队。如岚谷区游击队队长郑乌肝的妻子王瑞娇，因经常接济红军游击队，被敌人捕去吊打，房屋被敌人烧毁，丈夫被敌烧死，小儿子被扣作人质，但她宁死不屈。被释放后，继续为红军游击队筹粮筹盐。邵武地区的方嫂，夫妇俩因不断给红军游击队筹办各种物资，被敌抓去，严刑逼供，企图获知游击队和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为此，敌将方嫂丈夫活活打死，所怀胎儿当场打掉，还将方嫂未成年的5个孩子带进监狱，威胁方嫂，如若不说，就将5个孩子处死。方嫂肝胆俱裂，但为了革命，为了红军游击队的安全，毅然同5个孩子一起赴难。方嫂一家8口，就这样全部献出了宝贵生命。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留在闽北游击根据地的分区委和崇安县委，不但挫败了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全面“清剿”，而且使游击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活跃起来：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重建党的支部，恢复基层苏维埃政权以及妇女、青年、儿童团组织，领导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等等。青壮年踊跃参军，红军游击队迅速扩大。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游击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巩固，成为闽北三年游击战争的领导核心。黄龙岩会议所制订的兵分3路打出外线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着。正如下棋一样，这一着使闽北全局皆活。有人形容：闽北游击根据地像一只大磨盘，是领导核心。闽东北、闽中、抚东三大游击根据地则是这只大磨盘的外延，外延围着中心转，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开展游击战争可以互相支援。调动了敌人，也保护和发展了自己，扭转了被动局面。

与此同时，汪林兴、左丰美领导的西南战区，也在崇安南部的程墩、曹墩、吴三地和西部的将口一带，建立了拥有120多人枪的游击队，开辟了崇西南游击区。

（四）克服困难，联络闽东红军游击队

黄龙岩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之一，是联络闽东红军游击队共同抗敌。黄立贵师长受领这一任务后，率独立师第2纵队第2支队于1935年10月离开邵顺建地区，向古田、屏南方向开进。

屏南突围，会师禾坪11月上旬，第2纵队第2支队横跨建溪，甩掉数倍“迫剿”之敌，进入屏南县的上楼村。这里因是新区，消息闭塞，12日部队刚一进村，就遭到国民党军第56师1个营和新11师1个营的包围。第2支队在危急之下，退守村内炮楼，依托高墙抗击，连续打退敌多次进攻。战至下午，敌改变战术，兵分2路，挖墙突破。黄立贵师长用“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之办法，指挥第2支队用开水往下浇，敌被迫退却。至夜，敌改用火攻。黄立贵师长乘敌在四周点火，大门前暂时兵力薄弱的空挡，一脚踢开大门，率部边打边冲出炮楼，越过门前开阔地，奔向大东山。这次战斗，第2支队在极不利的情况下，毙伤敌第56师、新11师两部400余人，本身伤亡70余人。第2支队全体指战员以其勇猛果断、智慧灵活，绝处逢生。

第2支队突围后，辗转抵达政和，进入洞宫山下的禾坪村。部队一面向当地群众打听闽东红军游击队的消息，一面就地消除附近村庄的反动势力。此时，叶飞领导的闽东独立师正在这一带活动。1936年1月30日，两支部队在古田县禾坪村会师。黄立贵、曾镜冰和叶飞会晤，双方介绍了游击战争开展以来的情况，表达了两块游击区联合统一、互相支撑的共同愿望，还就召开双方领导人联席会议的时间、地点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界首反击，胜利回师黄立贵师长率第2纵队第2支队完成联络闽东红军的任务后，于2月初离开禾坪，回师崇安。部队进至建瓯县境，即被敌周志群新11师发现。敌立即“跟踪追击”和“分进合击”。黄立贵师长见状，立即决定：由曾镜冰率一部兵力先回崇安，向黄道汇报和叶飞会谈情况，自己则亲率第2支队主力，用“叫花子打狗”游击战术，边走边打，拖住敌人。将周志群部从建松政地区拖至邵顺建地区，又由邵顺建地区拖到资光贵地区，牵着周部兜圈子，行程约500多公里，拖垮周部1000余人，余皆精疲力尽。这时，黄立贵师长抓住战机，在建阳界首以逸待劳，组织反击，一举歼灭周部300余人，残敌狼狈溃逃。周部因伤元气，从此望而却步。第2支队胜利返回崇安。

三、洞宫山会议与中共闽赣省委、省军区的成立

1936年4月，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在闽北红军独立师掩护下，从崇安县到达政和县境，在洞宫山与闽东游击区领导人叶飞会见。双方在洞宫山仰头村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黄道、叶飞、黄立贵、吴先喜、曾镜冰等人。会期3天。双方先就闽北、闽东、浙南3块游击区相互配合与统一指挥等问题进行讨论研究，鉴于成立闽浙赣省委条件尚不具备，转而磋商成立中共闽赣省委和省军区问题，以统一领导闽北、闽东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会议对成立闽赣省委和军区以及领导成员的组成事项，原则上达成了共识。但会后，由于斗争环境险恶，联系困难，在实际斗争中，无法实现统一领导，仍旧各自独立坚持本地区的游击战争。

1936年6月，黄道在崇安岚谷宣布中共闽赣省委和省军区成立。黄道任闽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叶飞任省军区司令员（未到职），曾镜冰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稍后，成立了省肃反委员会、共青团闽赣省委、闽赣省工会联合会等组织。闽北方面担任闽赣省委、省革委员、肃反委员会、省工会联合会领导或重要职务的有黄立贵、吴先喜、曾镜冰、曾昭铭、吴华友以及王助、汪林兴等人。此外，还成立了闽赣省委、省军区下辖的4个分区委和军分区：1分区（闽北分区），书记汪林兴，军分区司令员熊家才，辖崇安、建阳、广浦、广丰县委和西南战区委员会；2分区（闽中分区），书记黄立贵兼军分区司令员、政委，辖邵顺建、建泰、邵将泰县委和邵光特区委；3分区（抚东分区），书记吴先喜兼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副政委刘文学，辖资光贵中心县委；4分区（闽东北分区），书记王助，军分区司令员饶守坤，政治部主任左丰美，辖建松政中心县委、迪口县委。闽北红军独立师保留，隶属省军区。师长黄立贵，政委吴先喜。下辖各团一律改为纵队建制。各纵队领导同时受军分区领导。独立师第1、第3纵队属闽东北军分区，第2、第5、第6纵队属闽中军分区，第4纵队属抚东军分区。

接着，中共闽赣省委分别以省军区政治部、省肃反委员会、共青团闽赣省委、闽赣省工会联合会等组织名义，连续发布《闽赣省军区政治部布告》、《闽赣省肃反委员会布告》、《闽赣省工联合会告工友书》和《共青团闽赣省委告青年群众书》，号召“一切红色指战员勇敢、坚决、巧妙、顽强作战”，“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派”和号召“广大工农劳苦群众，配合主力红军与国民党斗争”，以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争。年底，在闽赣省委和省军区领导下，闽北红军游击队坚持、开辟了包括福建省崇安、建阳、建瓯、松溪、政和、浦城、光泽、邵武、南平、寿宁、建宁、泰宁、周宁、屏南、顺昌、将乐、古田，江西的资溪、广丰、铅山、金溪、上饶、贵溪，浙江的江山、龙泉、庆元等26个县的广大游击区。闽北独立师由4个纵队发展为6个纵队，近3000人，成为闽北三年游击战争的鼎盛时期。

四、挫败国民党军残酷“清剿”，开创国共合作新局面

（一）国民党军增兵闽北，红军游击队遭受挫折

正当闽北红军游击队活跃地开展游击战争、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之时，日本军国主义以咄咄逼人之势，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继吞并东三省后，又策动了华北事变，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这个形势下，爆发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形成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但蒋介石在被迫接受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同时，又玩弄“北和南剿”阴谋，集中兵力，加紧向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进攻。企图利用这一机会，在合作之前消灭红军游击队。1937年1月，国民党驻闽绥靖主任蒋鼎文遵照蒋介石旨意，坐镇建瓯（1936年10月，驻闽绥靖公署由漳州迁至建瓯），调整对闽北红军游击队的“清剿”部署：在原有的第3师、第75师、第76师、独立第6旅、第45师、第52师基础上，增兵第16师、第63师、第80师各一部，编成“清剿”、“搜剿”两部，采取“分进合击”“跟踪追击”等战术，在闽浙赣3省保安团、地方武装和反动民团配合下，分别从光泽、邵武、建阳、浦城、广丰、崇安，向资光贵、邵顺建、建松政等游击根据地大举进攻。同时实行“军政合一”，颁布“十杀令”，强化保甲制度。继续推行“移民并村”、“计口售粮”、“计口售盐”的封锁政策，企图困死、饿死红军游击队。敌人还施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仅崇安一县，就有300多个自然村被毁灭，4600多户被杀绝，3.4万多人被杀害。敌人还组织训练大大小小的壮丁队、乡村通讯队、守望队等。建瓯一县，敌人就组织了壮丁队6个区队，118个连队，675个小队，计6万多人。乡村通讯队，用来侦察本村方圆5至10公里间红军游击队的活动；乡村守望队，用来在本村昼夜巡望，一旦发现红军游击队，便夜晚举火，白天鸣枪，严格盘查过往行人；组织秘密特工人员，扮成各种商人，串村走乡，搜集各村守望队掌握的情况；严厉惩办“剿办不力”的官兵，扬言“二三个月内消灭红军”。敌人的“清剿”决心和行动，无疑使闽北红军游击队进入了最严重的困难时期。

此时，闽北红军游击队正化整为零，分散在各地开展游击战争。1月22日，闽北红军独立师第1纵队在政和县后宝岱伏击福建保安第8团第3大队，毙伤敌90余人，缴枪100余支。中旬，独立师第4纵队第1支队袭击贵溪花桥，歼反动民团近60人。但由于闽北地区各地一些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负责人对新形势下敌“清剿”的迅猛之势和残酷性思想准备不足，致使各地红军游击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2月，独立师政委、抚东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吴先喜率领的第4纵队，在光泽北乡柴家遭敌第52师3个团的包围，激战中吴先喜壮烈牺牲。

吴先喜，江西横峰县人。1908年生。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方志敏领导的弋横起义。历任中共横峰县区委书记、上饶县委代理书记兼独立团营教导员、铅山县委书记、光泽中心县委书记、西南独立团政委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闽北坚持斗争。

吴先喜的牺牲，是闽北游击区的重大损失，使闽北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闽赣省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分析敌“清剿”的严峻形势，重申“基本任务是保存有生力量”这一基本方针，强调不得打硬仗，打消耗仗；要求注重斗争策略，做到“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

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遵照闽赣省委的指示，刘文学在接任抚东军分区司令员和资光贵中心县委书记后，即将中心县委领导成员分散到各地活动，坚持斗争。活动在“闽东北”游击区的独立师第1纵队，也及时将“消灭敌人为主”改为“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采取“走、藏、打”相结合，将部队分得更小，强调以“藏”字为主，分散隐蔽，频繁转移，避免同敌人拼消耗。实在无法避开，就打几仗，打也是为了保存力量。与此同时，闽中和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等几个游击区，也分别转入隐蔽斗争。部队进入山区后，生活十分艰苦。没有粮食，就用竹笋、树叶、野菜、野果维持生命。指战员每人只有一身军衣短裤，因爬山钻林而破烂不堪。大量伤病员因无法跟随红军游击队转移，在山洞里一呆就是几个月，缺医少药，过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生活。但指战员们在革命必胜坚定信念的鼓舞下，顽强坚持斗争，度过了三年游击战争最困难的时期。

（二）成立抗日军政委员会，实行政策转变

长期战斗在深山野壑中的中共闽赣省委，时时刻刻盼望着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以便早日得到党的指示。为此，曾多次派黄立贵师长率部渡过富屯溪，经过将乐、顺昌、泰宁到黎川一带，寻找中共中央分局，但都失望而归。1936年8月，闽赣省委再派省委委员、省工联主任吴华友携带闽赣省委组织名单和有关闽北游击战争开展情况的报告，到上海等地，通过白区组织关系，寻找党中央。

在吴华友北上，千里寻找党中央的日子里，黄道及闽赣省委委员都十分注意从缴获、收集来的报纸、杂志中，了解国内外大事，以便对形势作出正确的估计、分析，指导部队的行动。1937年1月，黄道在一张包盐用的上海《新闻报》上，看到一醒目标题：“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劫持统帅”，从而获知西安事变的消息。接着，又从截获的国民党福建省银行的汽车上，发现了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日记》，得知1935年北平发生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为了进一步弄清形势，黄道还令人通过一家地主，订了一份《福建民报》和一份《民国日报》，和闽赣省委成员一道，从敌方报纸的字里行间寻找有用信息。通过这些渠道，分析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抗日救国势在必行。因此，叮嘱部队要注意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

2月初，经过千难万险终于和党中央取得联系的吴华友，从香港致信黄道，叙述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并随信寄来密写的党中央文件：中共中央1935年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和1936年作出的《中共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中共中央这些文件，针对日本侵略军策动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国内形势，提出了在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及其方针、政策，指出了党和红军的斗争策略及其任务。黄道在领导闽赣省委成员认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的基础上，结合闽北的斗争实际，统一了思想。

2月7日，中共闽赣省委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号召“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不论职业、团体、宗教信仰、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并广泛吸收工农群众、学生、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参加抗日救国会组织。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共闽赣省委于3月7日成立了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黄道任主席，曾镜冰、曾昭铭任副主席。当日，即以军政委员会政治部名义发布《训令》，提出目前党的任务“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国民族一切力量，去对付当前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进一步号召：“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都应该联合起来，使全国人民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都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并提出了政策上的五个转变：一、一切知识分子，不论什么成分，只要不是“反动领袖”，都要加以保护，并吸收其加入反日阵线；二、保护小工商业者。禁止向大商家罚款，可接受大商家捐款。极少数反动头子的商店可以从政治上没收；三、保护富农利益；四、白区的小地主，只要民愤不大，同情抗日并自动捐款的，不得没收其财产；五、对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官，应给予抗日教育并予以释放。随后，闽赣省委又向江西、福建两省国民党当局发出“快邮代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但是，国民党蒋介石置闽赣省委的呼吁于不顾，于5月2日令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及各“清剿”部队，在一个月內“肃清”闽北红军游击队。6月上旬，国民党当局在建瓯成立了“闽北搜剿指挥部”，以第80师师长谢辅三为总指挥，由第75、第3、第80师各抽2个营组成3个“搜剿”队，日夜不停地对闽赣省委和闽北红军独立师围追堵截，不给红军游击队一丝喘息的机会。并悬赏重金捉拿黄道、黄立贵。此时，师长黄立贵正率闽北红军独立师一部在邵顺建一带活动。为摆脱敌第76师的前堵后追，部队以排为单位，分散活动。黄立贵亲率一个排由顺昌出发，在敌疯狂的“追剿”中于深山密林里艰苦转战2个多月，常常一连几天吃不上一口饭，睡不上一个像样的觉，疲惫至极。7月13日，当部队刚到邵武县梧桐际山厂稍事休息时，即被敌第76师便衣队发现，旋即被第76师一部和福建保安第5团700余人包围。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闽北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卓越领导人黄立贵，在掩护战友突围中，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黄立贵，江西横峰县人。1905年8月31日生。1925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方志敏领导的弋横起义，任第3路军指挥。此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特务营营长、闽北红军独立团团团长、闽北红军独立师师长。1933年5月任红7军团第21师师长兼第58团团长，奉命调往中央苏区参战。1934年初重返闽北，开辟了以西表为中心的建松政革命根据地。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闽北坚持斗争。他的牺牲，是闽北游击区又一重大损失。同期，在敌全面、残酷的“清剿”下，闽北红军游击队人数骤然下降，由3000人减至700余人。闽赣省委也被迫转移到光泽与建阳边界的猪母岗高山上，在敌重兵围困下坚持斗争。

尽管如此，以黄道为首的闽赣省委仍以民族利益为重，一方面指示闽北红军游击队，面对敌人的屠杀政策，要勿急勿躁，保持冷静，切忌盲动，一方面揭露蒋介石不抗日、“清剿”红军游击队的罪恶，宣传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注意恢复党在白区的工作。团结和组织各阶层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建立歌咏队、“七七抗日剧团”、“抗日巡回演出队”等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建瓯县委成员、《闽北日报》主编张沐就根据闽赣省委的指示，用《闽北日报》作为宣传工具，将各界呼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文章传播到闽北各地，唤醒人民的抗日意识，启迪国民党官兵的抗日热情。当时，在闽赣省委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军第75师某部第3连1个班就向邵光特区委游击队投诚，表示愿意与闽北红军游击队停止内战，携手抗日。

（三）大洲谈判，达成联合抗日协议

1937年8月13日，战火燃烧到上海。蒋介石被迫抗战，将正在闽北地区“清剿”的第3、第75、第76师等主力部队，先后调走。闽北游击区国共双方武装力量对比相对缓和。闽赣省委为求得早日实现与国民党闽赣当局的合作，当日就以“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名义，致函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南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9月20日，又通过光泽县长高楚衡转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明确表示：“我们向以抗日救国自任，对于救亡图存决不后人”。函中提出合作抗日3点意见：第一，同意将抗日红军改为抗日义勇军，并在划定的区域内实行抗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第二，要求允许和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信，以求得党中央的指示与领导；第三，在谈判未确定之前，决定首先停止军事行动，停止打土豪。要求福建军政机关从崇安城至分水关一线、崇安城至岚谷一线以及建阳之杜潭、邵武之二都桥等地撤兵，以利双方洽谈。表示希望熊式辉派代表前来谈判。随后，派出光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蔡诗山与光泽县长具体接洽。9月底至10月初，在闽赣省委不断敦促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强大舆论压力下，国民党江西省当局派江西第7保安副司令周中诚、光泽县长高楚衡为代表，与闽赣省军政委员会代表黄知真、邱子明在光泽县霞洋乡的大洲举行会谈。谈判中，黄知真等挫败了国民党方面代表企图将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省保安团的阴谋，在红军游击队的驻防地点、粮饷和军需供应以及集中时间等问题上也作了坚决的斗争。通过1个星期的谈判，双方达成协议。规定：国民党方面作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划出江西省铅山县为红军游击队集结、驻防地点；负责集结期间红军游击队的粮秣、军需供应；保证红军游击队一负责同志前往党中央请示工作的安全等。红军游击队方面作到：停止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减租减息；停止建立苏维埃政权；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赣闽边抗日义勇军”；其他听候中共中央指示。协议还指定吴仰山负责铅山防务的交接事宜。随后，闽赣省委领导下的建松政、邵顺建、资光贵等游击区，根据闽赣省委的指示，先后同各县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

（四）三战三捷，以斗争促联合

大洲谈判后，闽赣省委和国民党江西省地方当局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停战协议，但福建省国民党当局却不执行此协议，不但不按协议撤兵，且不断向红军游击队进行挑衅。崇安、邵武、建阳等地的国民党军经常袭击闽北红军游击队。为此，黄道决定，一方面加紧联合抗日的宣传，揭露国民党军不遵守协议的阴谋，一方面令饶守坤、王助、马长炎、左丰美等率部进行自卫还击，迫使国民党军停止袭击游击根据地，按照协议撤军，实现真正的抗日合作。

10月13日，饶守坤等率闽北红军独立师第1、第6纵队300余人，从光泽县猪母岗出发，一日急行军，到达邵武县大山村。经对敌情详细侦察后，14日凌晨3时，突然向邵武二都桥敌据点袭击，经30分钟激战，歼守军2个排。之后，部队撤出战斗，向建阳县开进。途中，前卫伪装成国民党军开路，翻过大岭岗。上午10时，巧袭建阳响古村，歼灭村保安武装后，继续进军。下午3时，到达建阳县杜潭村，向驻扎在祠堂内的保安队发起攻击。保安队凭借高墙顽抗，长坪方向又有国民党增援部队开来。饶守坤等当即决定：第1纵队一部边战边退，造成撤退假象，纵队主力在距祠堂10米左右处设伏。第6纵队扮成黄坑方面增援之国民党军。当祠堂内保安队、长坪援军中计，全部暴露在第1纵队伏击阵地前时，第1、第6纵队两面夹击，全歼保安队1个连。独立师在24小时内，三战三捷，歼敌200余人，缴枪200余支，并获大量弹药，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迫使国民党方面停止武装挑衅，遵守停战协定。

（五）石塘整编，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8月下旬，黄道从报纸上发现叶剑英在南京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的消息，异常兴奋。9月24日，便与曾镜冰联名致信叶剑英，就闽赣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请求中央的指示。大洲谈判后。闽赣省委又派曾昭铭去中央汇报，途经南昌，见到陈毅。陈毅对闽北若干问题给予了具体的指示。黄道、曾镜冰也收到叶剑英的复电。从此，闽北游击区党组织恢复了与中共中央分局失掉2年多的联系，并按照中央分局的部署开展工作。

10月，黄道、曾镜冰在温林关下的和尚坪与国民党联络官吴仰山会晤，商谈在铅山县石塘镇集结红军游击队和军需供应等事宜。会谈后，将情况向中央分局作了汇报。

11月，闽赣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指示，通知闽北各游击区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整编。并派陈仁洪、谢忠厚（谢锐）带1支小部队到铅山石塘镇做好部队集中前的准备工作。下旬，各地游击队陆续到达石塘镇，总计不足800人。其中有200多名从始至终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老红军战士，荣获黄道亲自颁发的闽浙赣边区坚持斗争纪念章。为了扩大抗日武装，闽赣省委决定补充兵员，号召游击根据地青壮年为抗日救国参军参战。经各级党组织的充分动员，部队很快发展到1500人，并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军事训练。

1938年2月9日，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在江西铅山石塘主持召开大会，由闽赣省委书记黄道宣布新四军军部命令：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3支队第5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参谋长杨元三，政治处主任刘文学。第5团下辖3个营和1个机炮连。2月25日，第3支队第5团奉命从石塘镇出发，经弋阳、横峰间的浙赣铁路，再经德兴、饶家坂、铜埠、白沙关到达浙江开化，在华埠镇与闽东红军游击队组成的第3支队第6团会合。3月上旬到达皖南歙县，随即投身于抗日战争中。

第九章 闽东游击区

闽东游击区，位于福建省东部与浙江省东南部交界地区，靠山面海。中心区域在闽东北，活动范围包括福建省的宁德、福安、霞浦、福鼎、柘荣、寿宁、周宁、屏南、古田、罗源、连江以及闽侯、政和、松溪、建瓯、浦城和浙江省的泰顺、庆元、景宁、平阳、青田、龙泉、云和等 23 个县境，与闽北和浙南两个游击区毗邻。境内山岭耸峙，白云、太姥、鹞峰等山脉绵亘其间；海域辽阔，岛屿众多，有著名的三都澳、沙埕港等港口。这里居住着畲、汉两族人民，畲族人口占畲族全国总数的一半。

闽东地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早在北伐革命战争时期，就有了马列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6 年，中国共产党就在闽东建立了连江、古田特别支部和福安党小组，领导发动农民群众开展“五抗”（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抗粮）斗争。1931 年至 1932 年间，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先后派邓子恢、陶铸、叶飞等到闽东指导农民革命运动，帮助组建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33 年底至 1934 年初，闽东地区共产党组织和各地工农武装利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行第五次“围剿”和 19 路军发动“福建事变”，闽东防务暂时空虚的有利时机，发动了全区武装暴动。1934 年 1 月，闽东党组织在闽东工农游击队基础上成立了红军独立第 2 团和第 13 团，作为闽东革命斗争骨干。同年 2 月，在各县普遍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成立了以马立峰为主席、叶秀蕃为副主席的闽东苏维埃政府，创立了 11,000 多平方公里的苏区。1934 年 4 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被破坏。为统一领导闽东苏区的武装斗争，同年 6 月，在福安柏柱洋成立了中共闽东临时特委，书记苏达（10 月赴上海寻找党中央关系，由詹如柏代理），委员马立峰、詹如柏、叶飞、曾志、阮英平、阮仓、林孝吉等。8 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红 7 军团）途经闽东，在闽东红军游击队的配合下，攻克罗源县城和福安穆阳镇，并与叶飞等领导人在宁德赤溪会师。先遣队从闽东苏区补充兵员数百人，并留下一批伤病员和武器弹药后继续北上，9 月，闽东特委于宁德桃花溪支提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独立师由闽东红军独立第 2 团、独立第 13 团（大部）及红 7 军团留下的部分人员组成。师长冯品泰、政委叶飞、副师长赖金彪。下辖 3 个团，2 个独立营，共 1600 余人。

1934 年 10 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闽东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 1934 年 10 月至 1935 年 3 月，为由苏区方式向游击区方式转变阶段；1935 年 4 月至 1937 年春，为游击区恢复、发展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阶段；1937 年春至 1938 年 2 月为贯彻执行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现国共和谈和合作抗日阶段。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中共闽东特委审时度势，在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自觉实现了从苏区方式到游击区方式，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实事求是地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切合闽东斗争实际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紧紧依靠畲、汉两族人民群众的支持，独立自主地领导红军游击队，恢复发展游击根据地。利用闽东重山叠岭和海域辽阔等天然屏障，成功地运用“狡兔三窟”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与国民党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有效地反击和挫败了国民党军发动的多次“清剿”，牵制消灭了

大量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有力支援和配合了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闽东特委和红军游击队适时转变策略，积极主动地领导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坚持原则，以打促谈，与国民党福建省当局进行谈判，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达成了停战和合作抗日的协议，取得了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闽东游击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

一、闽东独立师突出重围，分散开展游击战争

（一）闽东苏区反“围剿”斗争的失利

1934年，闽东地区土地革命的胜利和各县苏维埃政府的普遍建立，红军力量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闽东独立师的成立，连同各县游击队、赤卫队、红带会等武装力量达万余人，震撼了闽东广大农村的反动统治，反动派深感恐慌。国民党当局为了镇压闽东的工农革命，在北上抗日先遣队北进浙江后，陆续调遣第87师等部连同原驻守闽东的新10师、海军陆战队等数万之众，集中“围剿”闽东苏区。

闽东广大军民在中共闽东临时特委领导下，立即投入反“围剿”斗争。10月，闽东独立师从宁德桃花溪挥戈北击，全歼石堂守敌，攻克咸村，占领周墩（今周宁城），随后转战柘洋（今柘荣），攻占柘洋城。闽东红军海上独立营则以霞浦西洋、浮鹰、四霜列岛等岛屿为据点，截击国民党运输舰，缴获“万茂”号汽船，并奇袭“通济”号军舰。

10月中旬，闽东苏区党政机关所在地福安柏柱洋被新10师3团攻陷，党政机关迁到福（安）霞（浦）交界的岭面村。接着，福安的甘棠、溪柄和柘洋等其他部分县、区苏维埃政府驻地亦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闽东独立师两度谋求收复柏柱洋，均未成功，11月2

日，闽东独立师主力从周墩、霞浦回到福安，向柏柱洋发起进攻。国民党军抢先一步，占领溪柄山头，独立师第2团遭国民党军两路火力夹攻，伤亡很大，团长潘伯成牺牲，部队被迫退守洋溪。独立师第3团攻打柏柱洋楼下村，由于国民党援军驰至，也未能攻克，遂撤兵岭头。随即各团立即向霞鼎地区撤离。11月19日，独立师第1、2团再次攻打溪柄，与守敌新10师第3团激战半天，未能攻下，遂向大象转移，这时闽东红军西南团（11月成立，团长杨采衡，政委陶仁官，辖5个连1500余人枪）3个连在连江长龙的山头面，与国民党军第87师1个营激战受挫，向深山转移。

1934年11月24日，蒋介石下令调整闽赣绥靖公署，将两省改设12个绥靖区，闽东被划为第12绥靖区（1935年2月下旬改为第4绥靖区），以第87师师长王敬久为司令，辖87师，新10师，78师第465团，保安第1、2、3、11团，保安特务团，保安特务大队等部。28日，又调来第49师一部。12月，第12绥靖区在宁德三都镇设立“围剿”指挥部。26日，王敬久令所属各部及各县清乡队、民团、大刀会等武装10万之众，采取“分进合击”等战术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兵分三路大举进攻闽东苏区。第一路是新10师、78师第465团及保安第1、2、3团、保安特务大队和所属5县清乡队进犯福安、宁德、福鼎、霞浦、寿宁；第二路是87师第261旅、保安特务团和所属各县清乡队，进犯屏南、古田、闽清；第三路是87师第259旅、保安11团以及所属三县清乡队进犯闽侯、连江、罗源。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军事专家林知渊也前来闽东召开“清剿”会议，采用堡垒政策，计划从宁德到浙江泰顺沿途构筑800座碉堡，以限制闽东红军游击队的行动。新10师师长肖乾还急电国民党南昌行营，要求调派驻漳州空军第5队来闽东侦察轰炸，配合地面“围剿”。同时还派军舰封锁连江海面，占领鹤屿厦官等地，将苏区分割成零星小块。另派新10师追击闽东红军独立师，企图将闽东红军一网打尽。

闽东苏区面临国民党军大规模的“围剿”，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形势十分危急。中共闽东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由于与党的上级机关失去联系，不

知道中央红军长征的情况，更不了解国民党军的“围剿”部署。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通过闽东《红旗报》连续发表文章和十条紧急动员令，要求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加紧工作，动员全区军民武装上前线；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为粉碎敌人“围剿”、“为土地为苏维埃”斗争到底。这些通令和号召在苏区得到迅速贯彻执行。独立师和各县独立营先后在寿宁三角林地区打垮国民党军1个营的进攻；在寿宁龟岭击溃新10师1个连；在霞（浦）（福）鼎长岭山上拦截新10师1个营，毙敌7人，伤敌6人；在寿宁岗垄击毙国民党军营长1名，伤敌二三十人；还攻下福安北区岭兜、霞浦岚下、溪浦等地。但是这些局部的胜利未能改变闽东红军游击队的被动局面，形势继续恶化。闽东红军西南团攻打连江透堡、官坂、黄歧等地，均因敌强我弱而失利。

1935年1月上旬，国民党第12绥靖区所属各部已全部进入闽东地区。国民党军第87师第259旅进驻连江，派舰艇封锁了东冲海面，切断了罗源、连江县委和特委的联系，使连罗地区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福安、霞浦、寿宁等苏区遭到国民党军新10师、87师和保安团全面进攻。闽东党政机关临时驻地福安岭面、周厝坑、官洋、雷柏洋等地也相继失守。闽东特委撤往福安洋面一带。新10师师长还在福安召开“清剿”会议，将闽东划为东、西、南、北4个区，兵分4路，分区进行“清剿”，实现了对闽东苏区的分割包围。进攻福安地区的敌人主要是新10师肖乾部；进攻连江、罗源地区的是87师王敬久部；进攻寿宁地区的是从山东调来的刘珍年师；另一个师（刘和鼎部）和40师一部兵力在闽浙赣三省边境构筑封锁线，将赣东北、闽北、闽东地区加以分割。并于福（安）宁（德）、福（安）寿（宁）边境各设一联防主任，专门负责配合堵截红军游击队。新10师紧追红军独立师不放。独立师处于敌军重重包围之中，形势非常严峻。

（二）洋面会议与独立师分路突围

洋面会议面对苏区被分割封锁，独立师处在国民党军重重包围之中的严峻现实，闽东特委一些领导人开始意识到亟需改变斗争策略，以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和被分割包围的困境。为此，闽东特委于1月中旬在福安洋面山召开紧急会议，这是独立师和地方党组织领导人的一次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闽东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副主席叶秀蕃，独立师政委叶飞，师长冯品泰，副师长赖金彪等闽东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会议由叶飞主持。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对付国民党军大规模军事“清剿”的对策。会上在如何对付敌人的大举进攻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苏区人民刚刚获得解放，分到土地，党和红军应广泛动员群众，不惜一切牺牲，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果实，主张“不丧失苏区一寸土地”，提出“和苏区共存亡，与敌人决一死战”的口号；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面前，红军主力应避敌锋芒，保存实力，提出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口号，主张撤出苏区，开展游击战争。叶飞在发言中回顾了闽东苏区建立前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分析了敌我双方态势，指出当前苏区已陷入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独立师的力量只有国民党军的几十分之一，敌我双方力量极为悬殊。只有暂时的退却，保存武装力量，才是最重要的。如果硬拼，不但保不住苏区，而且红军游击队有被消灭的危险。因此必须下决心转变斗争策略，独立师立即摆脱国民党军的包围，转移到苏区外围开展游击战争。经过一夜激烈争论，与会者一致同意叶飞的意见，统一了思想。会议最后决定：迅速转变战略方针，变苏区为游击区；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县独立营和区中队）就地坚持斗争，上山打游击；独立师在给予敌重创后，迅速撤出苏区，开辟新的游击区，保存实力，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洋面会议是闽东特委在反“清剿”斗争处于严重关头时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闽东三年游击战争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会议统一了闽东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认识，转变了单纯保卫苏区的指导思想，确定了变苏区方式为游击区方式，保存实力，开辟新区，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对于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深入开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洋面会议结束后，詹如柏、马立峰、叶秀蕃等立即分赴各地，贯彻会议精神，部署地方工作，发动群众坚持斗争。叶飞、冯品泰、赖金彪等率领独立师主力组织突围。

西竹岔战斗根据洋面会议决定，闽东独立师组织突围。1月12日，闽东独立师和赤卫队2000多人，从福安洋面出发，分两路向柘洋山区转移。13日拂晓先后到达洪坑。当天，独立师得到敌情报告：新10师一部从石二、西洋分向佳浆、沙坑“搜剿”红军。独立师领导分析敌情后认为：这是一股专门追击独立师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尚未确切侦知独立师已抵达洪坑，误以为独立师向沙坑、佳浆转移。根据洋面会议决定精神，独立师正好可利用洪坑一带有利地形和当地群众的支持，以及战士们求战情绪高等有利条件，反击敌人“追剿”，然后撤出中心区，向外线转移。遂决定采取“引鳖入瓮”的办法，将敌诱到西竹岔进行伏击。

西竹岔位于柘洋城西侧，是社坪、洪坑、佳浆三个村的交界地，北面葛藤山，南面大湖岗，中间一条小路穿过谷底，通往桂洋桥。再分别通向社坪、苏家洋、葛藤山和大湖岗。这里树木丛生，山势险要，是个打伏击战的好地

方。

14日凌晨，新10师第3团第1、2营由南岩出发，午时路经苏家洋瓦窑岗时，游击队在西竹岔方向打了一枪，吸引敌人。敌不知是计，听到枪声，即回过头向西竹岔方向拥来。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独立师在当地游击队和赤卫队的配合下，居高临下，集中火力

向敌军猛打，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顿时，敌兵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抱头鼠窜，狼狈不堪。此时敌营长才知中计，马上组织反攻，又被红军战士用手榴弹炸得乱成一团，留下一片尸体。敌人在红军两面夹击下，被压在谷底，战斗打得很激烈，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

多钟，敌援兵赶到。独立师领导认为，重创敌人目的已经达到，况且部队弹药也已不足，为了保存实力，遂主动撤出战斗。当晚独立师

由堵坪经福安上白石向寿宁边界转移。

西竹岔战斗，是闽东独立师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战斗，毙伤敌500多人，独立师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共伤亡200多人。但这次战斗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给进犯苏区的敌人一个迎头痛击，扭转了被动局面，对于以后坚持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有着重要的意义。

独立师突围1月25日，王敬久赶赴福安赛歧，下达“变换方略，重新部署”的命令，以新10师和保安团计6个团的兵力，采取“追剿”、“防剿”、“堵截”同时并举的战术，限于27日到达指定地点，分兵合击，围追堵截红军独立师。王敬久调新10师第3团专事“追剿”；调福建省保安第1团堵防三望洋、望竹岭，保安第2团增防西塘、上南岸一带，与推进到泰顺的浙江保安团形成南北夹攻之势，妄图在最短时间内消灭红军独立师。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独立师主力迅速转移到寿宁三角林，利用有利地形，打了一个胜仗，冲出包围圈，向吾岗亭方向转移。当经过周墩赤林坪进入政和时，又遇国民党军堵击，遂折回寿宁，经福安向宁（德）屏（南）古（田）地区进发。新10师第3团紧追不舍，企图将红军主力逼到福安下白石予以围歼。3月1日，独立师第2、3团转移到宁德与福安交界的官岭附近的茶洋岭头时，遭新10师第3团4个连的包围。独立师英勇还击，激战2小时，因弹药不济，伤亡过大，决定撤出战斗。副师长赖金彪率狙击队，担任掩护任务。他们利用复杂地形，击退了新10师第3团的多次进攻，掩护部队迅速突破敌人包围圈，但赖金彪却在激战中不幸中弹牺牲。

赖金彪是瑞金彭杨学校（中央苏区的军事学校）毕业的干部。1933年夏秋间受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遣来到闽东，同范式人等一起创建了威震闽东的红16连，为创建发展闽东苏区做出了很大贡献。红16连后来编入闽东红军独立团，一直是独立团的主力。他的牺牲，使闽东红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指挥员，这是闽东红军的一大损失。

3月3日，独立师退到宁德溪里，利用夜幕打击追敌，向屏南及宁德霍童方向转移，6日，新10师第3团继续“追剿”。16日，独立师在宁德坑子里与新10师第3团激战后，终于甩开国民党军的追击，转移到宁德杨梅岔隐蔽。这时，独立师主力只剩下200多人，组成若干小分队和特务队分散隐蔽活动。

与此同时，在原苏区内就地坚持的红军游击队也经历了一场残酷的斗争。

红军西南团和海上独立营受挫战斗在连（江）罗（源）地区的红军西南

团迭遭国民党军的进攻。1月24日，国民党军第87师1个连、常备队1个排、水警队和兵舰2艘由连江黄歧出发“清剿”奇达。西南团英勇反击，激战5小时后向厦宫、初芦方向转移。1月31日，中共连江县委在下屿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西南团撤往连江丹阳一带山区打游击。会议刚结束，下屿即被国民党军包围，红军西南团指战员沉着应战，奋勇突围后剩300余人，分别由团长杨采衡和政委陶仁官率领分两路撤往霞浦西洋岛和连罗山区。陶仁官率3个连向丹阳一带转移，在连江青塘附近，遭敌截击，遂开往罗源飞竹分散隐蔽。不久，陶仁官被捕牺牲，2月1日，杨采衡率西南团2个连穿插迂回到厦宫，据险阻击87师259旅517团第3营一部。激战2小时后，西南团撤出战斗，向家奢方向转移。2月8日，闽东临时特委委员、连江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林孝吉在连江鹤屿被捕（6月被杀害）。2月中旬，在海上游击独立营的掩护下，杨采衡率部撤到霞浦西洋岛后疏散隐蔽到其他岛屿。

此时，以西洋、浮鹰等岛屿为依托的闽东海上游击独立营也遭到国民党军的“清剿”。3月14日，国民党军派出两架侦察机盘旋在西洋岛、浮鹰岛上空，并用军舰“楚同”号、“海明”号、“通济”号封锁海面；另以海军陆战队配合87师259旅517团，连同一些民团包围了西洋岛和浮鹰岛。闽东红军海上游击独立营奋起抵抗，损失很大。营长柯成贵被捕（后壮烈牺牲）。西南团主要骨干20多人由杨采衡等带领，驾舟辗转到闽中后，和闽中红军游击队会合坚持游击战争。

闽东苏区大部丧失，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自独立师洋面山突围，红军西南团、海上独立营等相继遭受国民党军残酷“清剿”，到1935年3月，闽东苏区大部分丧失，各县独立营、游击队也遭受重大损失，仅剩下宁屏古、福寿、霞鼎3块被国民党军分割开的小块根据地。闽东各级党组织遭受严重摧残。地主豪绅和各地民团、清乡队等对根据地人民疯狂反扑，反攻倒算，实行白色恐怖。一方面扶植地方反动武装，设立联保，不断搜山，企图断绝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另一方面，强化法西斯统治，设立联保处，编制保甲连坐，残酷屠杀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及其家属和群众。霎时间，根据地内腥风血雨，乌云密布，革命群众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仅福安、宁德、霞浦等县部分区乡先后被毁村庄150多个，被杀害干部、群众达3000余人，被围困致死者近3万人。骇人听闻的 屿惨案，一次就被反动派打死打伤120多人，其中全家被杀害的达20多户。留在连江的100多名北上抗日先遣队伤病员在转移时，亦全部惨遭杀害。整个苏区，哀鸿遍野，凄惨景象，令人目不忍睹。

独立师突出重围后，转战在深山野泽中。时值初春季节，阴雨连绵，寒气袭人，红军游击队指战员昼伏夜行，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加之缺医少药，还要忍受疾病和伤痛的折磨，处境十分艰难。在残酷斗争形势面前，革命队伍中一些投机分子和革命意志不坚定者，经不起失败、艰苦和生死的考验，悲观动摇，叛变投敌。安福独立营营长、安德独立营营长和政委、罗源独立营参谋长等先后投敌叛变。更为严重的是独立师师长冯品泰也阴谋投敌。鉴于当时斗争形势复杂、环境极其险恶，经闽东特委决定，予以处决。

在这种形势下，詹如柏、马立峰、叶秀蕃以及坚持各地斗争的负责人阮英平、范式人、许旺等人，根据洋面会议精神，一面深入各地帮助群众疏散隐蔽，一面带领各县、区、乡干部和部分红军游击队上山打游击，隐蔽在宁

屏古、福寿、霞鼎等边沿地区坚持斗争。根据地群众更是与红军游击队鱼水相依，并肩战斗，共度难关。各地群众节衣缩食，克服重重困难，想尽一切办法，冒死掩护和支援、帮助红军游击队。范式人和独立师特务队队长陈挺等患病、负伤后，就是在寿宁北区坑口和宁德霍童大坪岗等地群众的掩护和精心护理下才得以康复。

由于叛徒的出卖，一些领导人相继遇害。2月8日，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被叛徒杀害于柘洋陈家山凤落坝；3月1日，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在化装寻找独立师的途中落入敌手，18日在福安赛歧镇英勇就义；闽东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叶秀蕃也于5月24日被反动派杀害于寿宁官宅的深山密林中。闽东革命领导力量受到重大损失。

自反“清剿”斗争以来，闽东红军独立师和各地游击队，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英勇反击了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残酷“清剿”，连连突破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更重要的是，闽东地区实现了由苏区方式向游击区方式的战略转变，保存了骨干力量，为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基本条件。

二、恢复与开辟游击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清剿”

（一）重建中共闽东特委，恢复与开辟游击根据地

1935年4月，国民党军以为闽东革命力量已被消灭，便放松对闽东地区的“清剿”。继而抽调大批兵力，进抵寿（宁）庆（元）边境托溪、溪底、南阳一带，阻击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闽东地区。坚持在闽东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迅速行动起来，发展武装力量，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宁屏古地区新的游击根据地发展起来了；福寿地区重建了官宅、含溪周围的党支部，恢复了含溪区委，成立含溪中心区苏维埃政府；霞鼎地区也恢复了4个区的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中共霞鼎中心县委，并把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游击队200余人合编为独立师第4团（简称红4团）。

独立师得知各地逐渐有所恢复的情况后，决定返回原苏区，帮助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进一步恢复和发展根据地，开创新的斗争局面。叶飞率领独立师首先同坚持在福安、宁德边区斗争的阮英平会合，留下一部分部队在宁屏古地区活动，由阮英平指挥。独立师主力继续向苏区挺进，到达福安、寿宁地区，与在福寿边区坚持斗争的范式人会合，又留下一部分部队由范式人指挥。叶飞进一步摸清根据地的情况后，得知许旺在霞浦、福鼎边区坚持斗争，便率部去霞鼎，与许旺等人及红4团会合。不久，独立师特务队和红4团在福鼎地区的枫岔头打了一场伏击战。

枫岔头伏击战5月中旬，敌浙江保安旅自恃武器精良，加之没有发现红军主力部队前去，妄图以1个加强连袭击许旺领导的游击武装。叶飞得知敌人出发的时间、人数、路线的详细情报后，经与许旺、陈挺研究决定，在敌人必经的枫岔头设伏歼敌。

枫岔头位于福鼎县蒲林东，南邻霞浦县。这里是两座相连的大山，中间有一条200多米长的通道，形同壕沟的狭窄石板道，是沟通霞鼎两县唯一的通道。通道两边多是陡坡和树林，敌人一旦进入这个地方，红军把窄道两头一堵，料敌插翅也难飞逃。这天拂晓前，独立师第4团和特务连悄悄运动到枫岔头埋伏起来。到上午9时，敌军大摇大摆开过来了，待敌人都进入伏击圈，红军游击队发出攻击信号。顿时，两侧山上所有武器都开了火，红4团和特务队的战士们犹如猛虎一般，从山坡上冲杀下来，敌军一下子乱了套，倒下了一大片，活着的想掉头往后退，退路已堵死；想往前窜，又遭到迎头痛击，1个连的敌兵被压在窄道上。红军战士插进了敌人的队伍，与敌展开了白刃战。经过1个小时的激战，全歼了这股敌人。计毙敌40多人，俘60多人，缴获步枪100多支和机关枪1挺。红4团2连连长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枫岔头伏击战，是反“清剿”斗争以来打得最利索、伤亡最少而战果最突出的一仗。这一胜利极大地提高了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斗争勇气，对于鼓舞群众信心，恢复和发展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

枫岔头大捷后，红军游击队乘胜扩大战果。红4团南下福安，袭击茜洋民团，摧毁敌炮楼。不久，又在霞浦北部桃坑附近，打垮新10师1个连，歼敌1个排。在此期间，叶飞带着独立师特务队离开霞鼎去（福）鼎平（阳）地区，在那里又组织起一百五六十人的独立师第5团（又称红5团）。

含溪会议鉴于闽东主要领导人詹如柏、马立峰、叶秀蕃等先后牺牲，闽东特委机构已不健全，为了加强对游击战争的领导，1935年5月底，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召集隐蔽在各地坚持斗争的负责人在寿宁含溪举行会议。会议总结了反“清剿”斗争以来的经验教训，主要对重建闽东临时特委，加

强党的领导，研究制定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关方针政策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重建中共闽东临时特委，由叶飞任书记，委员为阮英平、范式人、许旺等；确定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一方面波浪式向外发展新区，一方面对内恢复老区”；调整了有关政策：对抓土豪、筹款和商业政策等作了转变；提出了实行“白皮红心”政策，以对付敌人的保甲制度，等等。

含溪会议是闽东转入游击战争后的一次重要会议，主要从组织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以及有关政治经济斗争的政策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为恢复和发展游击根据地，坚持长期游击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含溪会议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史上是又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

会后，特委委员即分赴各地“开辟新区，恢复老区”。范式人、许旺分别到福寿、霞鼎地区开展恢复老区工作；阮英平率领独立师一部到屏南、政和一带开辟新区；叶飞率独立师一部在太姥山脉闽浙边区开展游击活动。6月，叶飞率独立师特务队在霞鼎游击队的配合下，在福鼎白林郭阳乡流坑亭村，袭击国民党军第87师521团运输队，击溃敌人1个排，缴获军用品30多担。紧接着又化装奇袭了福鼎港口重镇沙垵，全歼守军水警队，俘敌10余人，缴枪70余支，子弹数千发，占领沙垵一天，震惊了福鼎敌人。并和在鼎平地区坚持斗争的鼎平独立团郑宗毓会合。6月17日，独立师主力和霞浦游击队集中500多人的优势兵力，在福鼎桑园附近伏击前往霞浦步竹“搜剿”的薪10师1个连，毙、伤敌营、连长等30余名。7月，陈挺率独立师主力在福寿地区岗垄又伏击了国民党军陈式正部数百人，击毙敌40余人，缴枪70多支。独立师的这些行动，打通了原先被敌人分割的宁屏古、福寿、霞鼎、鼎平4块地区之间的联系，开创了闽东游击区坚持斗争的新局面。

堵坪会议随着游击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中共闽东临时特委决定充实和健全特委领导机构，书记叶飞，组织部长阮英平，宣传部长范式人，委员许旺、陈挺、范义生、郑宗毓、詹嫩弟等。根据当时各块地区斗争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批准设立宁屏古、福寿、霞鼎、鼎平4个特委办事处，分别以阮英平、范式人、许旺、郑宗毓为书记，负责领导各地区的斗争。会议还确认把独立师分为三个纵队，以纵队为单位在各个地区活动，恢复和开辟地方工作。并决定叶飞任独立师师长兼政委，范式人任政治部主任。中共闽东特委的充实、健全，特委办事处的建立和独立师建制的调整，有效地加强了党对游击战争的领导，使闽东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会后，独立师第1纵队、第3纵队和周墩独立营在周墩的肖家岭，伏击福建省保安第8团300余人，毙伤敌连排长等40多人。这是堵坪会议后的第一次战斗，首战告捷。肖家岭战斗后，3个纵队分赴各地，为进一步恢复老区，开辟新区进行斗争。

开辟新区，发展老区独立师各纵队在开辟新区、发展老区的过程中，采取外线出击与内线作战相结合，恢复老区与开辟新区相结合，武装斗争与建立根据地相结合，在开辟新区时，部队行动与地方工作相结合，部队每到一地，先培养一批骨干，再发展党员，成立支部、区委，然后发给枪支，成立游击队，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开始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再逐步发展成大块游击根据地。红军游击队昼伏夜行，来去无踪，飘忽不定。每次从一块根据地出发袭击敌人，完成任务后回到另一块根据地隐蔽休息，夜里又一个急行军，跳到另一个根据地，部队行动不走回头路。这种“狡兔三窟”的战术，

使国民党军摸不清红军游击队的行踪。在具体战斗中，红军游击队“吃软不吃硬”；避强击弱，避实就虚，与敌迂回周旋，促进了老区的恢复和新区的开辟。

第1纵队以福寿边区为依托开展活动。首先在福寿后溪头、洋溪、霞鼎桃坑、杉洋、王宿地、玛坑等地歼灭了国民党守军和地方民团。福寿地区的游击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建立了50多个村的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含溪中心区委和区苏维埃，恢复了寿宁县委。1935年秋，福寿县委从福安北区迁往寿宁含溪，充实扩建为福寿中心县委。尔后，第1纵队向浙江的泰顺、景宁、庆元、龙泉、丽水一带发展，建立了寿泰、寿景庆等县委，开辟了寿景庆游击区。

第2纵队在各地迂回牵制敌人，减轻老区的压力，保障老区的恢复和发展。1935年9月，叶飞和陈挺带领第2纵队到达周墩地区一带活动，先后恢复了碧岩、茶广、梧柏洋、芹太丘、桐子坑等20多个村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周墩县苏维埃政府。1935年9月，在周墩紫云成立了中共周墩中心县委。尔后，转战到太姥山脉的鼎平地区，在那里建立了鼎平中心县委，发展武装力量，打通了闽东与浙西南的交通线。

第3纵队回到宁屏古地区后，很快恢复和新建了古田谈书店、毗源、杉洋、章地等交通站，沟通了古田、连江、罗源、宁德之间的联络线。在政（和）屏（南）边区先后建立了岩后、仰头、文山、牛山、东盘等10多个党支部，成立了政屏中心区委和政屏游击队，开辟了政屏游击根据地，成为闽东、闽北红军来往的依托。

中共闽东特委重建后，加强了党对游击战争的领导。独立师以纵队为单位分散活动，有力地支持了各块游击根据地的斗争。红军游击队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基本上以宁屏古、福寿、霞鼎、鼎平4块根据地为依托，长期坚持斗争。含溪会议、堵坪会议期间形成的适应当时斗争形势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对粉碎国民党军残酷“清剿”，恢复和发展游击根据地，产生了积极影响，形成了闽东游击区斗争的新格局。到1935年底，独立师发展到4个纵队。寿宁、福安、罗源、古田、政屏、霞鼎等地恢复建立了11支游击队。还组织了福安上白石、下白石到宁德三都一线的船民武装队伍，在沿海的宁德斗帽、三都等地建立了秘密交通站，开辟了直达福州、长乐地下航线。从而使红军游击队更充分利用闽东江海优势抗击国民党军的“清剿”，保障了游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二）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建立与闽东特委的退出

寿宁会师与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1935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率领挺进师一部，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到达寿宁郑家坑村，与叶飞、范式人等率领的闽东独立师一部会合，双方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鉴于当时各自都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为了能在战略行动上互相协调，互相策应，共同反击国民党军的“清剿”，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刘英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粟裕任组织部长兼军区司令员，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11 月 7 日，临时省委在浙江泰顺县白柯湾村召开会议，调整充实省委成员。由刘英、粟裕、叶飞、黄富武、阮英平、范式人、许信焜、洪家云、刘达云（后叛变）、方志富、许旺等 11 人组成。临时省委辖浙西南特委和闽东特委。临时省委决定调挺进师原政委会秘书许信焜担任闽东独立师师长。闽东特委将鼎平地区连同鼎平独立团划归临时省委直接领导，支援挺进师恢复浙西南根据地的斗争。独立师与挺进师的会合，临时省委的成立，加强了闽浙边地区反“清剿”斗争的领导。

闽东独立师与挺进师在反“清剿”斗争中协同作战闽东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闽东独立师的不断壮大，和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建立，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1935 年 11 月，国民党驻闽第 4 绥靖区增调第 9 师 25 旅 2 个团到闽东，由旅长张琼亲临“督剿”，重拟“清剿”计划。布置了福鼎到寿宁、福安到霞浦两道封锁线，以 6 个团的兵力加强对上述 4 个县的封锁、“清剿”。福建省水警总队也调派海岛警艇开抵闽东沿海“协剿”。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封锁，独立师与挺进师协同作战，相互支援。粟裕、刘英率挺进师以鼎平地区为依托，在浙南开展游击战争，恢复和发展浙南游击区。活动在福寿、霞鼎地区的独立师部队则积极向浙江边境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挺进师收复浙西南根据地的斗争。叶飞率闽东独立师主力昼伏夜行，采取快速猛进、外围歼敌、长途奔袭、化装奇袭等战术，转战宁屏古地区，经古田、闽清到达闽江边，拟渡闽江向闽中地区挺进，打通与闽中地区的联系，并恢复连罗根据地。后因缺乏渡江船只而转抵福州近郊，接连袭击闽侯、连江、古田、宁德等地国民党军。这些行动打乱了第 4 绥靖区的“清剿”部署。

1936 年 1 月，国民党调整闽浙边区的“清剿”部署。调张发奎接任闽浙赣边区“清剿”总指挥，驻闽绥靖区由 4 个缩为 3 个，闽东划为第 2 绥靖区，由第 56 师师长刘和鼎任司令。2 月，增调第 56 师一部，从鼎平地区起，经浙江平阳、丽水、龙泉直到庆元设置封锁线，企图围困独立师和挺进师。闽东特委派福寿边区各部队迅速挺进寿政庆边界活动，牵制国民党军，配合挺进师粟裕部转战浙江遂昌、龙泉一带，与国民党军兜圈子，相机歼敌。挺进师另一部和闽东红 5 团以鼎平地区为依托，袭击了平阳、丽水的国民党军。7 月，独立师一部从闽浙边直插霞鼎根据地，进逼霞浦城郊，派侦察班化装袭击塔头尾街守军，迫使进山“清剿”的国民党军撤兵回防。8 月，又在福寿游击队和群众的配合下，于寿宁仙宫岗伏击国民党军 1 个连，毙俘伤敌连长以下 40 余人，缴枪 70 多支和一批弹药。

红军游击队出没无常，行踪不定，使国民党军无法捉摸，陷入被动，其“清剿”计划终于被打破，游击区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至 1936 年冬，闽东游击区范围扩大到南抵福州附近，北至浙江的龙泉、青田、庆元，西达闽北政和，东及东海之滨的广大区域；各地党的基层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仅福

寿、宁屏古、霞鼎 3 个地区即新建 260 多个支部，发展党员 1000 多名，各个游击根据地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意见分歧与闽东特委退出临时省委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成立，对于加强闽东和浙南游击战争的领导，互相配合，协同作战，起到了积极作用。后来在建立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等指导方针上，临时省委内部逐渐产生分歧，无法统一。临时省委主要领导人要求闽东独立师离开闽东游击区，到浙西南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闽东游击区领导人则认为独立师在闽东土生土长，与当地群众有着血肉相连的联系，只有坚持在有深厚群众基础的闽东游击根据地，才能与国民党军周旋。如果闽东独立师离开了闽东老区，闽东根据地就无法坚持，而且有垮台的危险，因而不同意独立师离开闽东游击区。根据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时即已提出的待与闽北游击区取得联系后，由闽北、闽东、浙南三方面共同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的意向，1936 年 4 月，叶飞与闽北游击区黄道、吴先喜、曾镜冰等主要领导人在政和县官洞山仰头村会晤，商讨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有关问题。由于条件不成熟，双方只就成立闽赣临时省委问题进行了磋商。后来在闽浙边临时省委的一次会上，由于对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以及闽浙边临时省委的组织人事安排等问题，闽浙边临时省委内部又发生严重分歧，无法取得一致意见。闽东特委遂宣布退出闽浙边临时省委。随之，许信焜也离开闽东独立师，返回浙南。

1936 年 6 月，黄道在崇安县岚谷宣布成立直辖闽北、闽东两游击区的闽赣临时省委。但由于各种原因，在实际斗争中，闽赣省委并未对闽东游击区实施统一领导。闽北、闽东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仍然各自独立坚持本地区的斗争，只是双方联系配合更为密切。此后，原闽北独立师政委卢文卿到闽东任独立师师长。8 月，闽东独立师主力与闽北独立师一部联合攻打周墩葡萄洋，卢文卿与闽东独立师第 1 纵队队长范义生在战斗中牺牲。

1936 年秋，挺进师领导人在浙江庆元县南阳村以宴请为名，约见闽东领导人，不料在宴席上挺进师方面突然武装扣押闽东游击区领导人叶飞以及陈挺等人。后在押送途中遭国民党军袭击，叶、陈乘机脱险。挺进师的这一错误作法给闽浙边地区的游击战争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从此，双方关系就完全中断了。

（三）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克敌制胜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被迫接受国共合作抗日，但却坚持“北和南剿”方针，继续派兵“清剿”南方各省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1936年12月，国民党当局取消驻闽绥靖主任公署，成立闽浙赣皖四省边区绥靖公署，闽东被划入闽浙边“清剿”区。该区指挥官第19师师长李觉率第19、52、16师、新编34师及80师王继祥旅、63师118旅、整编11旅、独立旅等部，配合闽浙两省原有驻军和保安团、民团，向闽浙边发动大规模“清剿”。第80师、新10师、独立旅周志群部、福建保安第2旅等部，由民团、清乡队为向导，重点进攻福寿、霞鼎、宁屏古根据地。

国民党军这次“清剿”，采用移光、并光、烧光、杀光、抢光的“五光十杀”政策，用斩首示众、分四腿、挖心肝、火烧、碎割等惨绝人寰的法西斯手段，疯狂屠杀根据地军民。仅霞鼎地区据不完全统计，被杀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群众就有700多人，被烧房屋3200多间，70多个村庄被毁。所有游击基点村几乎被烧光、抢光。在白色恐怖下，革命队伍中又出现了一些叛徒，给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面对敌人的残酷“清剿”和疯狂屠杀，闽东红军和游击队在特委领导下，紧紧依靠畚、汉两族人民，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福寿、宁屏古、霞鼎、鼎平等4块游击根据地为依托，在遍及闽浙两省20多个县的广阔游击区域内与国民党军周旋。1937年1月，国民党军万余人分5路“清剿”寿宁岗垄地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红军游击队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狡兔三窟，来去无踪；相向对进，易地而战；避实击虚，避强击弱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相机歼灭敌人。独立师第1、2纵队在负责掩护驻扎岗垄的特委办事处和群众转移后，在原地坚持斗争，并向浙江庆元、龙泉方向挺进，接连袭击国民党区公所、联保处、民团，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清剿”部署，减轻了岗垄的压力。在宁屏古地区活动的独立师第3纵队则西出政和、屏南，袭击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地方，伺机歼灭小股国民党军。2月，与闽北独立师一部在屏南节桥头联合击溃87师1个连，毙伤敌10余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

在国民党军占领区内，闽东特委还发动群众挖敌人炮台，砍电线，破坏国民党驻军的据点和通讯设施，粉碎国民党军的“联防”。1937年1月间，国民党军独立旅“进剿”宁屏古周墩一区，屯兵碧岩和沈洋两地，强迫群众修筑炮台，架设电线，团团包围一区游击根据地。周墩一区的岭头、溪底、梧柏洋等13个村的党支部，在区委的统一指挥下，先后5次把国民党军架设的从犁坪到咸村长20余公里的电话线全部割断，砍倒并运走电线杆，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通讯设施。2月，桐子坑等村的群众被迫在沈洋修筑碉堡炮楼，在党组织领导下，白天采取“磨洋工”的办法消极怠工，晚上将碉堡挖掉，并贴上红军来过的标语，使碉堡迟迟筑不起来，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红军游击队的反“清剿”斗争。

由于根据地内军民团结一心，在特委和各县、区委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军展开英勇顽强而又机智的斗争，致使国民党军的“清剿”计划一再受挫，不能得逞。

（四）采取正确的政策与策略，开展对敌斗争

在反“清剿”斗争中，闽东特委在领导红军游击队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反击国民党军事“清剿”的同时，还领导根据地军民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与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含溪、堵坪会议期间制定和形成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斗争的政策、策略，在斗争实践中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政治斗争方面，针对国民党推行的保甲制度、联保连坐的法西斯统治，采取革命两面派的斗争策略。特委对保甲长、联保主任等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即镇压反动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团结同情分子。允许中间立场的保甲长、联保主任充当“两面派”。古田大甲珠洋的联保主任和程际村的保长，不但为红军游击队购买弹药和医药用品，还经常到古田、福州等地探听敌情，为红军游击队通风报信。国民党军占领根据地后，即强制群众登记户口，编制保甲连坐，实行移民并村。各地县、区委和乡村党支部则组织群众干扰户口登记，安排一些不脱产、尚未暴露身份的村干部用假姓名、假年龄、假分家，认孤寡老人为父母等办法去登记，破坏保甲连坐，掩护红军游击队。同时派一批忠诚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去当联保主任、保甲长。这种“白皮红心”两面政权，明里应付国民党，暗里进行革命活动，负责交通联络，收集传递情报，变“白色保甲”为“红色联防”。各地群众在有组织地分散转移到根据地边沿居住时，仍然和红军游击队保持联系，在深山密林里建造了许多“秘密寮”和地洞，埋藏粮食财物，实行坚壁清野，反对国民党军的集中并村和封锁围困。

在经济斗争方面，针对国民党军的经济封锁，各地区严格执行特委制定的抓土豪筹财政的政策，即区别根据地和游击区的不同情况，采取向土豪派款或赎款办法解决财政问题。对根据地内的土豪采取派款办法，由县、区政府确定派款对象后，发给筹款通知单，限其在规定时间内交纳一定数额的款项或粮食；对国民党军占领区内的土豪抓到后限期交纳赎款，过期不交者坚决镇压。各地区的党组织还发动群众拒绝向国民党政府、地主豪绅交纳粮税租债。坚决镇压催粮、索税、逼租、讨债的反动分子。在商业政策方面，允许国民党军占领区内的商贩来根据地经商做生意，保证安全，来往自由，买卖公平。通过这些商旅活动，不仅供给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群众许多军需和民用物资，有的还为红军游击队提供情报。

通过以上政策的实行和根据地广大军民的坚决斗争，有效地打破了国民党的政治围困和经济封锁。

（五）畚族群众对游击战争的贡献

在红军游击队深入开展游击战争，反击国民党军“清剿”的斗争中，闽东人民群众特别是畚族群众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给了闽东独立师和游击队以极大的支持。闽东系畚族群众聚居地，人口占全国畚族总数的近一半，1700多个畚族村庄分布在各县交界的偏僻山区里。这些地方山势险峻，岩洞沟壑众多。畚民多散居在穷乡僻壤，远离县城，交通十分闭塞，具有隐蔽性，有利于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有利于游击战争迂回战术的开展，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反动军队与当地民团武装，是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依托地。畚族人民在历史上深受多重压迫，倍遭歧视和凌辱，他们最痛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在斗争中团结一致、保守秘密，革命十分坚决。红军游击队的后方医院、“秘密寮”、兵工厂等大部分建在畚乡，广大畚乡成了红军游击队的可靠后方基地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死亡陷阱。

畚乡是闽东重要的游击战场，数百名畚族青壮年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广大畚族群众投身反“清剿”的斗争。1935年5月的枫岔头战斗就有福鼎后溪等村的畚族游击队配合独立师作战，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在最艰难的岁月里，畚族群众对红军游击队支持很大，独立师和红军游击队正是依靠了畚族人民的支持和掩护才得以坚持。在1936年到1937年初的反“清剿”斗争中，国民党军包围了竹洲山、亭园坪一带畚村，隐蔽在那里的红军队伍和伤病员在畚族群众的掩护下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国民党军扑了个空，抓走雷银弟等8位老人和妇女，逼问红军医院和兵工厂在何处，用放火烧房子和马刀砍头相威胁，但雷银弟等畚族群众守口如瓶，使国民党军一无所得。不久，国民党军又以更大的兵力合围竹洲山，枪杀苏维埃主席雷良俊，烧毁全部茅房，把躲避在山林的群众赶下山，实行并村，编保甲，订连坐。但是畚族共产党员雷成波等仍冒着生命危险，活动在群山密林之中，掩护着红军后方医院和兵工厂。1937年2月，安德县苏维埃政府主席、60多岁的钟曰住，为掩护红军伤病员转移，不幸被捕，在国民党军的严刑拷打和残酷折磨威逼下，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最后英勇就义。西胜乡南山村13岁的雷石祥，敌人要他带路寻找红军，他故意把敌人引向险路后自己跳进将军潭壮烈牺牲。像这样可歌可泣的事例举不胜举。许多畚族妇女和儿童在斗争中也不畏艰险，积极为红军游击队担任秘密交通员传递情报，站岗放哨，购买物品，直到献出宝贵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共有5600多名畚族革命群众、干部和党员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闽东特委和红军游击队正是在广大畚、汉族群众的支持下，英勇反击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清剿”，取得了游击战争的胜利。

三、适时转变策略，实现国共合作抗日

（一）转变斗争策略，成立闽东军政委员会

1936年冬，闽东特委在长期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通过多方努力，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等多种渠道，获悉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发布的《抗日救国宣言》等文件。根据这些文件的精神，闽东特委意识到国内外政治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中日民族矛盾正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为此，决定改变斗争策略，在反击国民党军事“清剿”的同时，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随即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群众书》，指出：中国民族危机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独霸中国的野心，发动了对中国新的进攻，而国民党南京政府不但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反而“调动其全国一切军队来阻止中国工农红军的北上抗日作战”；并且残酷“镇压与摧残全国反日运动及舆论”。因此，全中国民众必须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争取反日运动的权利与自由，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号召闽东各界民众迅速自动地组织起来，反对国民党军阀卖国辱国的行径，实行对日作战。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动员和领导闽东人民投入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闽东特委于1937年2月10日发表《关于成立闽东军政委员会的通令》，阐明了闽东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任务是：“坚决地发动与领导广大的群众斗争，粉碎敌人的进攻，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决定将军事机关与政权机关合并成立闽东军政委员会，以叶飞、阮英平、范式人、许旺、缪英、叶藩、范振辉、龚口、戴品辉、许冬年（后变节）、谢作霖（后叛变）、缪富弟等人为委员，叶飞为主席，阮英平、范式人为副主席；将闽东红军各纵队番号一律改为“中国人民红军闽东抗日纵队”。军政委员会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和肃反委员会，由阮英平任司令部参谋长，范式人任政治部主任兼肃反委员会主任。同时将闽东分为3个分区：霞鼎、福霞、安富、霞鼎泰4县为第1分区；宁德、罗源、周墩、安德、宁屏5县为第2分区；福寿、寿庆景、松政庆、寿政庆、龙庆景等县为第3分区。以许旺、缪英、叶藩分别为分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并责成各分区成立各县、区军政委员会。

然而，国民党当局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呼声，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镇压各地抗日运动。1937年春，蒋介石继续调兵遣将，“清剿”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对闽东游击区根据地的群众和红军游击队更是变本加厉地残酷“清剿”和疯狂屠杀，斗争极其尖锐、残酷。闽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谢作霖于4月间叛变投敌。6月，闽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第1作战分区军政委员会主席许旺，被叛徒出卖惨遭杀害。在此期间，闽东特委和各级军政委员会领导闽东红军游击队，紧紧依靠畚汉两族人民的大力支持，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略战术，和正确的对敌斗争政策和策略，在遍及闽浙两省20多个县的广阔游击区内与敌周旋，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国民党军的“清剿”。

1937年6月，闽东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进一步转变斗争政策，以闽东军政委员会名义发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闽东军政委员会布告》，阐明了闽东特委与红军抗日救国的严正立场，

呼吁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宣布改变苏维埃时期的部分政策，使之更适合当前抗日民族革命斗争的需要。即：一切同情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富农等爱国人士，不问其过去出身如何，均予以保护并望其积极参加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个人、团体、政治派别、武装部队等均愿与之联合，一致抗日。《布告》最后号召各界人士一致行动起来，“有钱者出钱，有枪者出枪，有力者出力，有知识者出知识，共赴国难”。7月5日，中共闽东特委又发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告民众书》，强调“用民众的力量逼迫南京政府立刻放弃对日投降政策，立即停止内战”，“集中全国人力、兵力、财力立刻发动抗日”，呼吁“全中国民族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一致联合团结起来，结成坚固的、宏伟的民族阵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闽东抗日军政委员会的《布告》和特委的《告民众书》，在闽东游击区以至国民党统治区内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各阶层人民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浪潮中。闽东独立师和游击队积极宣传中共闽东特委和军政委员会的方针、政策，到处张贴特委《告民众书》和军政委员会的《布告》，散发传单，书写标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大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闽东各县还组织了抗日巡回宣讲团、晨呼队、妇女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先进群众团体，在广大城乡通过刊物、标语、墙报、戏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中共福安县委争取团结了国民党县政府秘书，通过其安排郭文焕等10多个共产党员到国民党当局组织的抗敌后援会工作。“八一三”淞沪激战时，前线急需补充兵员，闽东特委从民族利益出发，通过在后援会工作的共产党员动员了600多名青壮年应征入伍。福安赛江两岸100多名船民加入了船舶中队的救亡工作。连江、福安、霞浦等县积极开展抵制、销毁日货活动。在闽东特委的政策感召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国民党原19路军的一个排长于七七事变后，带了一个班起义参加红军。

几个月来，闽东特委、军政委员会和广大军民为制止内战、抗日救国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英勇抗击和成功地挫败了国民党军的“清剿”。特委和军政委员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广泛动员了一大批爱国人士积极参加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停止内战，实现国共和谈和合作抗日，创造了必要条件。

（二）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斗争，达成合作抗日协议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进一步了解全国形势的变化，弄清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消息是否确切，8月，叶飞率独立师主力打下宁德八都重镇，缴获了大量国民党报纸。从《申报》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就职通电》等党的公开文件，了解到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准备开赴抗日前线。闽东特委即由“反蒋”、“逼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正式向国民党福建当局提出停战谈判，合作抗日的要求。但是国民党当局仍然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继续对闽东红军游击队进行军事“清剿”。闽东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一方面积极争取和平谈判，一方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坚决实行自卫反击，以打促谈。亲母岭一仗就是一次漂亮的反击战。

亲母岭，位于宁德北部无坪山东面的邑堡村约一公里处，这里是红军游击队的基点村，群众基础很好。1937年8月，叶飞率独立师主力在这一带活动，陈挺带的第2纵队就驻扎在邑堡村。一天，得到群众报告说，洋中敌人出动，企图袭击邑堡。下午两点多钟，敌人已到邑堡对面山上的胡坑尾村。邑堡和胡坑尾村都位于海拔很高的两座大山上，直线距离只有2000米，但两山之间却隔着一条很深的山沟。从胡坑尾过来，先要走5里的下山路，过沟底一条小溪，再爬上5里很陡的上山路才能到达邑堡。第2纵队在邑堡这边，可以清楚看见对面山上的省保安旅士兵一个个沿着那条又小

又陡的山路蠕动着，粗略估计有100多人。除了眼前这股敌人外，其它方向没有听到敌人出动的消息，于是叶飞下决心要打掉这股敌人。他命令陈挺迅速带队伍到亲母岭，这里是从胡坑尾村到邑堡村的必经之地。陈挺把第1支队隐蔽到岭头上，第2、3支队埋伏在岭前上山路边的杂树林里，待敌人快要爬到岭头时，小路边的第2、3支队突然开火，紧接着就冲锋。由于敌我距离本来就很近，一冲就把敌拦腰切断。岭下枪声一响，岭头上的第1支队也猛冲下来，半岭以上的四五十个敌兵顿时乱作一团，被打死打伤十几个，其余的进退两难，很快被缴枪当了俘虏。后面的敌人被第2、3支队冲得四下逃散，直往岭下山沟里躲藏。这时敌人已丧失了战斗力，战士们边搜索边喊话，邑堡村许多自动赶来助战的群众，拿着梭镖、扁担、锄头、柴刀等帮助拦截搜索残敌。这次战斗进行得很顺利，红军游击队仅以几个人轻伤的代价，全歼了省保安第2旅1个加强连。计毙敌40多人，俘敌连长以下70多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亲母岭这一仗给闽东国民党当局震动很大，对于国民党当局坐下来同红军游击队进行和平谈判，起到了促进作用。

此外，在寿宁、庆元等地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独立师一部，也遭到浙江省一个保安团的进攻。独立师被迫应战，在庆元、南阳击溃了该团。

由于闽东独立师坚持自卫反击，使国民党当局企图消灭红军游击队的阴谋难以得逞。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进一步高涨，加之上海战事紧张，国民党军第70、80、87等3个师相继调往上海，福建军事力量减弱，福州直接受到闽东红军的威胁，国民党福建军政当局不得不停止对闽东游击区的全面“清剿”，同意与闽东军政委员会举行合作抗日的谈判。

国民党当局提出由叶飞亲自前往谈判。闽东特委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派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范式人作为全权代表，与国民党福建军政当局进行

谈判，并由郭文焕从中斡旋。同时确定了和平谈判的五项条件：1. 闽东抗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支队，干部由共产党委派，保持共产党的领导；2. 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释放一切政治犯；3. 宁德、屏南、福安三县划为红军驻区，如果日军进攻福建，红军主动配合反击；4. 根据地已分的土地维持现状，不能强迫农民退还已分得的土地；5. 国民革命军抗日游击支队应按国民党军队供给标准发放给养。特委还决定将独立师各纵队迅速向宁德桃花溪根据地集中，以防止国民党当局在停战谈判中的不测。

1937年8月底，范式人前往宁德霍童，与国民党福建省当局代表黄苏举行谈判。谈判中范式人阐述了闽东特委关于谈判的五项条件。国民党方面对于和平谈判并无诚意，妄图在谈判桌上获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黄苏坚持要把闽东独立师收编为福建保安师，范式人坚持闽东独立师只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抗日游击支队，保持共产党的领导，拒绝将闽东红军收编为保安师的无理要求。一方坚持改编，一方坚持收编，一字之差，相争不下，而这一字之差正是合作抗日的原则问题。谈判陷入僵局。

国民党亡我之心不死。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不久，国民党福建当局派王调勋（叛徒）到桃花溪红军驻地附近一个村子向叶飞面陈意见。闽东特委识破国民党当局的阴谋：此举旨在刺探军情，妄图偷袭闽东红军领导机关，迫使闽东红军就范。闽东特委遂将计就计，命令独立师主力在会谈村子附近设阵以待。次日拂晓，福建保安师果然出动1个加强连前来偷袭。独立师当即出击，不到一小时即全歼来敌，次日，闽东特委派范式人下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提出继续谈判。此役，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是政治上的重大胜利。

9月，在宁德县城东门外马祖庙继续举行谈判。由于国民党代表继续玩弄“收编”阴谋，拒绝接受闽东特委提出的条件。黄苏采取封官许愿等手段，妄图用高官厚禄收买红军游击队，理所当然地遭到闽东代表义正辞严的拒绝。继而，国民党代表又提出要闽东特派人到福州，与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面议，又把谈判拖延下来。10月，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张云逸来福州，准备到闽东与闽东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但国民党当局以种种借口加以阻挠。

在此期间，闽东军政委员会还分别与闽浙边区国民党驻军第82师、70师、独立6旅以及闽东各县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国民党方面不但拒不接受合作抗日提议，而且继续对抗日红军实行封锁，破坏抗日组织。10月4日，闽东军政委员会致函国民党浙江省庆元县政府，重申闽东特委和军政委员会对合作抗日谈判的立场和条件；指出和谈所以迟迟未能实现，责任全在国民党军政方面；要求以民族利益为重，取消一切成见，立即停战，互派代表，约定地点商谈；强调闽东红军为实现合作抗日，巩固抗日后方，对一切破坏、镇压抗日运动的顽固分子将予以严惩。

11月下旬，范式人前往福州谈判。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和斗争，终于在以下几个条件上同国民党福建当局达成合作抗日协议：

1. 闽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第2支队；
2. 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支队由共产党领导；
3. 划屏南为闽东红军驻区，100里内国民党不得驻兵；

4. 以中共闽东特委名义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宣言》，并公诸报端。

至此，经过几个月艰苦复杂的谈判斗争，终于胜利告一段落。闽东国共和谈的成功，是闽东特委在谈判过程中，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正确方针、政策的结果，是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闽东的胜利，也是闽东军民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

（三）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闽东特委和国民党福建省当局达成协议后，斗争并未停止。在部队集结、整编过程中，还充满了一系列矛盾和斗争。首先遇到的是部队点编问题。国民党当局要求闽东红军游击队开往宁德县城集中点编。这时范式人带回了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在县城集中被国民党军队缴械的消息，引起了特委和独立师领导的警惕。在部队集结地点上，独立师坚持“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方针，不开到县城集中，而在宁德的游击根据地中心桃花溪集中。关于点编的方式，国民党方面坚持全体集中点编，独立师则强调场地小，部队还必须担

负驻地周围的警戒任务，不同意全部集中，只能一个连一个连地点编。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国民党点编官员无可奈何地只得照独立师的意见办，避免了“漳浦事件”在闽东的重演。

部队集中在桃花溪以后，独立师按照协议规定，停止了打土豪筹集经费，因此部队给养发生困难，就向福州国民党当局提出解决给养问题的要求。国民党当局以为有机可乘，又故伎重演，老调重弹。要挟地提出以独立师改称保安师为条件，才予解决。独立师当然不予理睬，提出用暂借的办法解决，国民党当局依然不肯。独立师针锋相对，表示要“自由行动，自己解决给养问题”。国民党当局当然懂得这话的含意，这意味着红军游击队又要打土豪筹款了，于是慌张起来。在此情况下，才不得不借给独立师700套棉衣和5000块钱，迫使国民党当局履行了协议，解决了部队在集结期间的经费给养问题。

12月，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派参谋顾王良到达闽东，向闽东特委和独立师传达中共中央有关国共合作谈判和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等问题的指示，并陪同叶飞下山经福州赴江西省南昌市新四军军部接受任务。在此期间，闽东红军游击队从宁德桃花溪开赴屏南待命改编。

12月31日，《福建民报》全文发表《中国共产党闽东特委共赴国难宣言》。《宣言》郑重指出：鉴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民众只有不分民族、不分党派、不分阶级，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才能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够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才能够取得中华民族的完全自由、独立与解放”。同时宣告：“改变闽东人民抗日红军的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第2支队，取消中华苏维埃闽东军政委员会组织，停止争夺政权与苏维埃运动的游击战争，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与财产的政策”。

闽东国共和谈和红军游击队的改编，经历了艰苦曲折的过程。闽东特委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挫败了国民党当局企图“收编”红军独立师的阴谋，保持了共产党的独立性，取得了和谈和改编的胜利。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

1938年1月下旬，叶飞从南昌新四军军部接受任务后，陪同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到达屏南棠口，传达了新四军军部命令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决定：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3支队第6团，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调整中共闽东特委组织机构，范式人任书记；设立新四军第6团后方宁德留守处。2月14日，1300余名闽东游击健儿告别了闽东人民，由叶飞、阮英平率领从屏南双溪、棠口出发，奔赴皖南抗日前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是“革命战略支点”的指示精神，留下一部分武装力量和党的骨干，在特委领导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直到全国解放。

第十章 闽中游击区

闽中游击区，位于福建省沿海中部，包括莆田、福清、永泰、仙游的大部和闽侯、长乐、惠安的部分地区。这里西面靠山，东面临海，福（州）厦（门）公路横跨其中，水陆交通方便，又是福建著名侨乡之一，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但西部的莆（田）仙（游）永（泰）边和莆（田）永（泰）福（清）边地势起伏，高山连绵，便于开展游击战争。

早在 1926 年的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共莆田支部和中共莆田特区委，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适时转入农村，积极领导闽中各地举行了规模不等的农民暴动。1928 年 3 月，莆田县建立了闽中第 1 支工农游击队。随后，仙游、惠安等县也在农民暴动的基础上建立了红军游击队。1930 年 10 月，中共福建省委派邓子恢到莆田，创建了中共莆属特别委员会和福建红军游击队第 2 支队，在莆田、福清、仙游、惠安等县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并在莆田外坑乡建立了闽中地区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不久，红 2 支队和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遭敌疯狂围攻而解体，闽中地区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但党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未熄灭。各地的农民暴动和小规模的游击活动，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最著名的有 1931 年 12 月福清县龙（田）高（山）暴动，歼敌 800 余人，震动八闽。

1931 年中共福建省委被敌破坏后，闽中的党组织中共莆田县委隶属于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翌年秋，又改归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领导，并将县委升建为中心县委。1934 年初，中共福清县委成立，直属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不久，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遭破坏，书记陈之枢等被捕叛变。脱险后的市委常委王于洁和市委巡视员黄孝敏分别转移到莆田和福清，并于同年八九月先后成立了中共福清中心县委和整顿重建了被破坏了了的中共莆田中心县委。1935 年 5 月，以王于洁为书记的中共闽中特委成立后，统一领导闽中地区的革命斗争。他们在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充分依靠人民群众，以莆（田）仙（游）边、福（清）永（泰）边和莆（田）永（泰）边的常太、罗汉里等游击根据地为依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无数次“清剿”，独立坚持了近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

一、福清、莆田两个中心县委成立，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一）中共福清中心县委的成立

1934年6月，中共福清县委在南西亭地区发动和领导百余农民举行暴动，收缴土豪劣绅步枪20余支，开仓分粮100余担。事泄后，县委书记何文成被捕，投入福清监狱。翌年2月在福州就义。何文成被捕后，县委工作一度陷入瘫痪状态。此时，原福州福利会主任、共产党员刘突军在福州脱险后返回福清，接替何文成任县委书记。8月中共福州市委巡视员黄孝敏从上海返闽，获悉市委遭破坏，遂转移至福清。黄孝敏曾是福清党组织创始人之一，对福清情况十分熟悉。他的到来无疑大大加强了福清党组织的领导力量。黄孝敏与刘突军会合后，在角楼村召开会议，分析当前形势，一致认为在城市党组织被破坏后，唯一出路是扎根农村，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会议决定将福清县委改为中心县委，以便领导福清、长乐、闽侯和永泰等县边界地区的斗争。会议还一致决定，黄孝敏任中心县委书记，刘突军、何胥陶、余长锁、陈金来、陈炳奎、陈振芳、池亦妹仔等为委员。陈振芳兼任福清共青团书记。

（二）中共莆田中心县委的重建

1934年4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被破坏后，叛徒练文澜（原福州中心市委巡视员）带领宪兵破坏了设在涵江镇的中共莆田县委机关。接着又破坏了仙游县委和莆田、仙游两县的共青团组织。5月下旬，原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常委王于洁由福州返回莆田。王于洁曾任中共莆田中心县委书记，对莆仙地区情况十分熟悉。王于洁回到莆田后，几度冒着极大风险赴厦门，试图通过厦门中心市委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但由于市委所属组织遭破坏，领导核心已不健全，虽接上关系但随即中断。在此情况下，王于洁决定留在莆田坚持与开展游击战争。他与原莆田中心县委书记潘涛等一起，首先着手对遭叛徒破坏十分严重的原莆田中心县委进行思想与组织上的清理整顿，并在此基础上于9月重建了莆田新的中心县委。王于洁任书记，潘涛、林阿郎、黄国璋、郑金照、陈建新等为委员。

（三）常太游击根据地和莆田游击队的创建

新的中共莆田中心市委重建后，当即组建了莆田工农游击队，以郑金照为队长，潘涛为政委。并决定在常太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常太，是莆田西部与仙游东部交界的山区。这里山高岭峻，林深路滑，交通不便。由于土地贫瘠，加上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当地群众的生活极度贫困。正因如此，群众易接受革命思想。1933年至1934年春，中共莆田县委曾派郑主照在常太区的利车、古坑、漈川、金竹坑、顶外坑等村开展革命活动。9月，中共莆田中心县委重建后又派陈建新来常太从事党的工作，并着手建立游击武装。这里的外坑村有个雷觉苍，原是民军一个营长，后来由于派系斗争被国民党杀害。他的儿子雷光熙藏有一批枪支弹药，与国民党对抗，欲报杀父之仇。县委分析后认为，通过细致的思想说服，可以将雷光熙争取过来。果然争取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雷表示愿意投身革命，并当即献出10余支枪及部分弹药。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常太游击队。此后，常太地区便成了中共莆田中心县委和莆田游击队的主要依托地。

（四）福清游击大队的成立和罗汉里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1934年9月，中共福清中心县委成立后，随即决定以斗垣、玉瑶、江境、角楼等村为基点，大力发动群众。11月，以海口塔坪寺准备举行暴动的骨干为核心，在西区成立了30余人的中国工农红军福清游击大队，刘突军任大队长，黄孝敏兼政委。

1935年初，原闽东苏区连江“西南团”在敌重兵“围剿”下失败。3月，中共连江县委书记魏耿、团长杨采衡和共青团书记陈云飞等20余人，由西洋岛（今属霞浦县）渡海辗转抵达海口镇，与中共福清中心县委接上关系，随后加入福清游击大队。连江西南团骨干的到来，加强了闽中红军游击队的力量。

4月，中共福清中心县委派陈云飞只身前往罗汉里。罗汉里位于福清、闽侯、永泰三县交界处，方圆百余里，虽然尽是深山密林，但羊肠小道四通八达。在这里建立游击根据地，可以把闽中几县连接起来。而且，这里物产丰富，可以解决游击队的给养。这里原为土匪刘春水部所盘踞，不久前刘春水被国民党以收编封官的名义诱杀。其妻何兰英和其叔父刘阿和带10余人枪藏匿在山上。陈云飞到达罗汉里后，通过细致入微的工作，终于使何兰英等归顺。这样，福清游击大队终于在罗汉里站稳脚跟，并以此为依托，在福（清）闽（侯）边和福（清）永（泰）边开展了游击战争。

二、中共闽中特委的成立，统一领导闽中斗争

中共福清中心县委和莆田中心县委及其所属游击队成立后，仍各自在本地区分别坚持小规模斗争。为了统一领导闽中地区的革命斗争，开展游击战争的新局面，1935年5月，中共莆田和福清两个中心县委在福清西区的樟溪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闽中地区的形势，制定斗争的方针和策略。出席会议的有王于洁、黄孝敏、潘涛、刘突军等。会议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率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西去，各苏区正遭国民党军重兵围攻，城市党的领导机构又迭遭破坏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很难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得到指示。因此，闽中党组织应立足本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从闽中地区的情况看，这里虽距中心城市福州较近，且敌军的兵力较强，但莆田和福清的两支游击队已分别开辟了常太和罗汉里两块游击根据地，且游击区内有许多基点村和地下交通站。因此，在闽中地区坚持与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是具备的，路子是宽的。会议一致认为，闽中地区的当务之急是两个中心县委联合起来，实行集中与统一领导。只有这样，才能步调一致，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会议决定，重建中共闽中特委，以王于洁为特委书记，黄孝敏、潘涛、刘突军、余长锁等为委员。同时决定福清游击大队和莆田游击队分别整编为特委领导下的闽中工农游击队第1支队和第2支队。

樟溪会议后，特委领导人分赴莆田和福清传达会议精神。黄孝敏、刘突军等回到罗汉里后，宣布福清游击大队整编为闽中工农游击队第1支队，魏耿任支队长，黄孝敏兼政委，吴德标任副支队长，杨采衡任参谋长。王于洁、潘涛等返回莆田后，召开中心县委扩大会议，根据特委决定将莆田县所属的两个游击队集中整编为闽中工农游击队第2支队，以郑金照任支队长，潘涛兼政委。

中共闽中特委的成立，是闽中党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一件大事，它对于闽中地区的斗争结束分散状态、实施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要意义。也是闽中三年游击战争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中共闽中特委成立后，狠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大力加强红军游击队的建设。原莆田和福清游击队除少数指挥员和战斗骨干外，基本上是由不脱产的农民武装组成，往往是有战斗任务就临时集中起来，打完仗就又分散种田和做群众工作。这是和当时的客观条件相适应的。即当时未形成割据式的稳固的游击根据地，以及部队的给养、驻地不好解决。随着罗汉里和常太游击根据地的日趋巩固，才有可能建立正规的红军游击队，并通过游击战争的深入开展和在游击队中大力加强革命理想、革命信念和革命纪律等教育，使闽中的两支游击队逐渐成熟起来。

二是大力加强党和群众组织的建设。中共闽中特委成立后，首先决定原福清和莆田两个中心县委改为县委，以陈炳奎任福清县委书记，以林阿郎为莆田县委书记；同时成立永泰工委，以陈云飞为书记。不久，又决定成立广（业）常（太）兴（太）特别区委会，由陈建新负责。1936年11月，特委又决定成立了福州工委（黄尔尊任书记）和惠安特别支部（曾炉任书记）。在常太和罗汉里游击根据地各村建立赤卫队、贫民团、妇女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他们站岗放哨，或帮助游击队到白区搜集情报等。

三是大力开展农民运动。首先是在游击根据地内领导农民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时称“四抗”）斗争，并注意在斗争中提高农民的觉悟，同时又密切了党组织和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

四是开展统战工作。主要做法是争取有影响的开明绅士和注意团结愿意靠拢红军游击队的保甲长和“二地主”，允许其“白皮红心”。如常太有个蔡春腾，原来是民军一个营长，后来隐居在家。此人在当地颇有威望，一些头面人物都看他的眼色行事。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他与红军游击队关系处得很好。许多人见状纷纷表示愿意为红军游击队做事情，从而打开了常太的工作局面。

三、粉碎国民党军“清剿”，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

（一）国民党军的“清剿”部署

由于闽中游击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向来为国民党福建当局十分重视并严密控制之地。早在 1934 年 9 月“闽南剿匪司令部”在泉州成立时，就部署两个保安团分驻莆田和福清两县。福州的宪兵第 4 团也在闽中各县派驻分队，而各县的保安队、民团常备队以及警察等更是遍布城乡。1935 年 1 月，国民党军又将闽中划入第 11 绥靖区，并派第 9 师第 25 旅进驻莆田，负责对闽中游击区的“清剿”，并把地方武装划归绥靖区司令部统一指挥。同时在闽中各县进一步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

从 1935 年 10 月至 1937 年 2 月，第 11 绥靖区司令部以第 49 团为骨干，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先后 5 次发动对罗汉里和常太游击根据地的残酷“清剿”。他们烧杀抢掠，昼捕夜搜，妄图将红军第 1、2 支队一网打尽。然而，他们费尽心机，到头来只落得个损兵折将，以失败告终。

（二）游击战争的广泛展开

闽中工农红军游击队第1、第2支队成立后，遵照中共闽中特委的指示，以“飘忽不定”的战术，广泛出击，开展了蓬蓬勃勃的游击战争。

肃清股匪，站稳脚跟罗汉里游击根据地开辟后，使红1支队有了落脚处，但原土匪刘春水残部仍出没在罗汉里周围的晨钟、大化、东山等处，不但残害群众，且对游击队构成威胁，因此红1支队决定对其采取因地制宜、各个击破和招抚与打击相结合的策略。刘春水的胞叔刘吓和与刘春水的妻子何兰英加入游击队后，即动员他们去说服刘春水的父亲刘哈哈和胞弟刘金木等10几人归顺游击队。但刘哈哈自恃有几十条枪而十分狂妄。游击队采取先将刘金木抓获，而后乘刘哈哈尚无准备之机，直捣其大化附近的老巢，一并将其击毙。此股土匪被消灭后，游击队又将吴守师、黄阿大等另两股土匪瓦解。这样红1支队就解除了后顾之忧。

二度出击琯口镇 1935年7月，红1支队得知福清与闽侯交界的琯口镇聚集有股匪30余人，欺压群众，无恶不作。当即决定乘夜幕奔袭琯口，歼灭该匪。翌日晨，当土匪尚在梦中时，红1支队如天兵而降，迅速将该匪全歼，缴枪30余支。

1936年11月，闽中红军游击队第2支队，由吴德标率领再次袭击琯口镇，镇压了一向与游击队为敌、清乡队的鹰犬、该镇联保主任潘德仁，缴枪11支，并在大街上公开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袭击一部联保处一都有一支十余人的联保处武装，他们身置一都，但将其触觉伸向四乡，特别对进出罗汉里的群众盘查逼问，对红1支队造成威胁。为此，红1支队于1935年9月的一天，采取突袭方式一举将其歼灭，缴枪10余支。

奔袭大洋田赋处大洋田赋处位于莆田和永泰边界的莆田境内，该处粮务队武装横行乡里，四处敲诈勒索，农民苦不堪言，红1支队决心为民除害。1935年10月4日夜，红1支队80余人由罗汉里出发，经数小时奔袭，拂晓前抵达大洋：并迅速将其田赋处粮务队包围。在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之下，敌人未敢顽抗，乖乖投降。此战，击毙铺差1名，俘敌10余人，缴枪8支。尔后，红军游击队迅速撤离，返回罗汉里。

东山寨坚守战 1935年11月，我红1支队前出到东山发动群众与征集粮食。时近中午，正当红军游击队将地主的一部分粮食分给贫苦群众，并放火焚烧从地主家搜出的山契、田契、厝契时，国民党军和永泰保安队闻讯赶来“清剿”，将东山寨团团围住。此时，转移已来不及，游击队当机立断，迅速将寨门紧闭，并冲上寨门顶，居高临下，以机枪向敌猛扫。其他队员也分别在山寨四周利用门窗做掩护，向敌射击，迫敌不能靠近。面对坚固可守的山寨，敌保安队无可奈何。这样一直对峙到夜幕降临，敌被迫悄悄撤离。晚9时许，游击队安全离开东山，返回罗汉里。

攻占闽侯大义乡 1935年11月，红1支队派出10余人组成的先遣小分队化装潜入闽侯大义乡，侦察和摸清了驻该乡十八姓祠堂内的民团武装的哨位和周围地形。当晚，刘突军率红1支队主力60余人进抵该乡时，先遣队已将敌哨兵解决。红1支队主力一到即将祠堂团团围住。接着喊话令敌投降，面对红军游击队的紧紧包围，祠堂内的民团欲逃不能，反抗无用，只好缴械投降。这样，红军不费一枪一弹，解除了团丁的武装。此战缴枪20余支，解救

被该民团扣押的壮丁六七十人，烧毁了壮丁册，并在大街上张贴宣传标语。尔后，游击队安全返回游击根据地。

攻破紫来庵，占领沪屿镇位于闽侯县境内的沪屿镇的豪绅地主，与驻该镇附近紫来庵保安队相互勾结，欺压百姓。在 1936 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更是肆无忌惮地逼债催税，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怨声四起。红 1 支队决心为民除害，歼灭该敌。某日夜，游击队兵分两路，一路由吴德标率领主力 60 余人负责攻打紫来庵民团，一路由刘突军率领 10 余人的精干小分队深入沪屿镇。当我主力包围紫来庵后，庵内的民团、保安队便在楼上架起机枪疯狂扫射。我游击队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匍匐到楼墙下，并迅速登上竹梯，将一捆手榴弹扔进敌楼内，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游击队乘机冲进楼内，全歼该敌。此战缴长短枪 40 余支、机枪 1 挺和弹药一批，并解救被关押的群众 30 余人。与此同时，刘突军率领的小分队，在当地数百名群众的支援下，一举占领沪屿镇。当即打开豪绅的粮仓，分发给群众。翌日拂晓，游击队怀着胜利的喜悦，返回罗汉里。

河村桥伏击战 1936 年 2 月下旬，红 1 支队接到中共闽中特委送来的情报，获悉国民党福建省银行副总经理韩疆士等人携带一批钞票于 24 日由泉州返回福州。为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并解决红军游击队的给养，红 1 支队决心予以伏击，并选定河村桥为伏击点。23 日下午支队领导作了战斗动员，部署战斗方案，宣布行动纪律。傍晚，由 72 名全副武装的游击队员分成 3 个战斗小分队，在吴德标、杨采衡率领下，顶着寒风，穿过山坳，进抵天竹寺休息待命，翌日晨天刚蒙蒙亮，3 个游击小分队，就全部赶到河村桥，进入预定阵地。第 1 小分队在桥北时洋村附近灌木丛中，准备迎击可能从福州闻讯赶来的敌人，第 3 小分队在桥南埋伏，准备对付可能从宏路或琯口方向来的保安队。第 2 小分队为主力，担负截击汽车的任务。中午过后，一辆客车从南驶来，游击队边开枪边冲向车前令其停车。同时，命令车上的人举起手来下车接受检查，并警告说：“谁敢反抗，死路一条！”就这样，车上的 30 余人依次下车，其中有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内弟、省银行副总经理韩疆士，大田县县长萨桓，国民党“五大”代表郑其妙，以及国民党宪兵 4 人等。他们一下车即被解除了武装。此战，缴短枪 8 支，子弹 1000 余发，钱钞一批。傍晚，经过审讯释放了 4 名宪兵和一般人等。而将韩疆士、萨桓等 7 名重要官兵带回根据地。

（三）罗汉里游击根据地的丧失与红 1、红 2 支队的合编

闽中红军游击队广泛开展的游击战争，使福建省国民党地方当局及驻军，尤其是莆田、福清等闽中各县地方当局十分惊慌，他们调兵遣将，加紧对闽中红军游击队的“清剿”，而将进攻矛头首先指向红 1 支队所在的罗汉里游击根据地。1936 年 2 月下旬，以国民党军第 9 师第 25 旅第 49 团及保安第 1、第 5 团，宪兵第 4 团等共 3000 余人向罗汉里发起了大举“清剿”。敌一进山就用枪逼着群众带路，并砍树烧山。“清剿”部队搜索到那里，晚上就在那里宿营布哨，以图紧缩包围圈，将红军游击队一网打尽。

面对敌人穷凶极恶的“清剿”，中共闽中特委及时召开红 1 支队领导人会议，研究反“清剿”措施，决定：将重要文件和物资立即转移隐藏到安全地点；派出游击队员分头到各基点村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分散隐蔽；化整为零，把游击队分成 3 个分队，与敌周旋于山间密林之中。会后，红 1 支队按会议部署立即分头行动。当时正处春寒，淫雨绵绵，寒风刺骨。战士们衣着单薄，饥肠辘辘。每逢敌人搜山，战士们只好潜伏在又冷又湿的灌木丛中，随身携带的干粮吃完了，就以竹笋、野菜充饥。而最为苦不堪言的还是伤病员，由于缺医少药，伤病无法得到医治。而为执行隐蔽纪律，疼痛难忍时连呻吟都不敢大声。但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使红色游击健儿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团结一致，矢志不移。在支队政委刘突军率领下，一面机智地引诱敌人在山上盲目乱转，一面选择时机予以伏击。一天晚上，大雨滂沱，战士们手脚都冻僵了。刘突军将小分队带到下堡溪附近的一座庙宇里烤衣取暖。天将拂晓时由于不小心漏出了火光，被对面山里的敌兵发现。敌人马上集合，从一座竹桥上猛扑过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突军将游击队分成两组，一组抢占有利地形对正在过桥之敌猛烈射击，一组带伤病员迅速撤离。此时，前面的几个敌人被击毙，而后面的敌人仍拼命向桥上拥，由于人多将竹桥压塌，几十名敌人葬身于洪流之中。此战，敌伤几十人，而游击队仅伤 1 人。

国民党军对罗汉里的“清剿”不但一无所获，而且损兵折将。于是把仇恨发泄在手无寸铁的根据地群众身上，他们抽出一批保安队和民团，由反动的联保主任带领，惨无人道地洗劫各基点村。据不完全统计，仅角楼、罗汉里等村民房就被烧 147 间，群众被抓 200 余人，被杀 12 人。敌人的暴行和倒行逆施不但没有使游击根据地的人民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斗争决心。不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为游击队送粮报信。

罗汉里持续近两个月的反“清剿”斗争终于坚持了下来，唯支队长魏耿和何兰英经不起考验，叛变投敌。何兰英曾随夫刘春水在罗汉里一带为匪数年，对这里的每一个山头、每一条山路和隐蔽点等都十分熟悉。参加游击队后又跟魏耿同居，对游击队内部情况了如指掌。因此他们二人的叛变无疑对游击队威胁极大。1936 年 4 月底，当特委得知他们叛变的消息后，立即采取应急措施，派黄孝敏回福清通知刘突军、吴德标等把队伍整顿好，并迅速向莆永边转移。同时由王于洁率红 2 支队一部到福莆边接应。5 月上旬，红 1、红 2 支队在福莆边胜利会合。此次反“清剿”斗争虽然使罗汉里游击根据地丧失，但红 1 支队得以保存下来。

1936 年 5 月中旬，中共闽中特委在福莆边的后溪红前仑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斗争方针和策略。会议认为，由于魏耿、何兰英的叛变，罗汉里游击

根据地一时将难以恢复，应把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到莆仙边开展斗争。同时决定红 1 支队并入红 2 支队，由吴德标任支队长，刘突军兼政委，雷光熙、王铁成任副支队长，杨采衡任参谋长。会后，王于洁、刘突军等率部进抵常太濑川与原红 2 支队主力会师，两个支队正式合编为红 2 支队，随即开始了新的斗争。

（四）常太游击根据地的丧失与新的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新的闽中红军游击队第2支队编成后，领导和力量均得到加强，他们以常太游击根据地为依托，积极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游击战争。

早在国民党军集中兵力“清剿”罗汉里时，就曾派一个连进驻枫叶塘镇，以封锁常太游击根据地的出口，并在常大西北的仙游驻兵一营，随时可配合“清剿”。为了摆脱这种腹背受敌的状况，红2支队领导决定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法，把游击战争引向莆田平原和沿海腹地去。1936年6月中旬，刘突军亲率20多名精干的游击队员从常太根据地出发，直插福厦公路上的长岭，突然袭击驻该镇的保安队据点，缴枪18支。接着又越过福厦路，经木兰溪进至兴化平原和沿海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是月24日晨，80多名游击队员分别伪装成客商和肩挑各种山货的农民，袭击了驻黄石镇的国民党莆田县第3区公署，缴枪30余支。战后，游击队打出红旗，在大街上进行抗日宣传。国民党万万没有想到红军游击队敢到这平原上的水镇来活动，于是急忙调兵前往“搜剿”。待敌援兵到达时，红军游击队早已转移到灵川一带去发动群众。当敌追到灵川时，游击队已沿丘陵小道撒返常太游击根据地。

在中共闽中特委的领导下，在各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闽中红军游击第2支队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频频出击，使国民党驻军及地方当局防不胜防，处处被动。为了消除隐患，1936年7月下旬，国民党军驻莆田第49团第1、2营和莆田、仙游两县保安队共700余人，由东、西两面夹攻常太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漈川和金竹坑等地。由于敌人此次“清剿”来势凶猛并十分突然，红2支队未来得及做相应准备，所以当转移到山上后所带粮食很快吃完。当时正处盛夏，蚊虫叮咬，大雨浇淋，疾病孳生，环境十分恶劣。为此，特委决定部队转移到广业区的白沙、庄边一带分散隐蔽。部队转移后，常太游击根据地即被敌人占据。

由于常太游击根据地丧失，中共闽中特委和红2支队的当务之急是立即寻找一个新的立足点。经分析后认为，莆田西北部与永泰交界的杉溪地区，山高林密，交通不便，长期被黄开元股匪盘踞，国民党统治势力薄弱，只要做好黄开元的工作，红军游击队完全可以在这里建立新的游击据点。于是，特委一面派人与黄谈判，一面将队伍开了进来。黄见游击队已“兵临城下”。只好接受“共同抗日，互不侵犯”的条件。红军游击队进驻杉溪后，一面休整，一面积极对周围的开明绅士、保甲长和大刀会首领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从而使红军游击队在杉溪初步站稳了脚跟。岂料，国民党永泰县当局得知靠近其边界有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消息后，立即在靠近杉溪的蕉坪筑堡设岗，派保安队和民团日夜驻守，给红军游击队造成极大威胁。红2支队设计将其拔除后，永泰保安队恼羞成怒，向杉溪发起进攻，被红2支队一举击溃。时值国民党军换防，第80师接替第9师进驻闽中。而该师第239旅接替第25旅驻莆田（后移泉州）。第239旅旅长钱东亮一到莆田，即令其第478团分三路“清剿”驻杉溪的红军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保存有生力量，红2支队转移到莆田和永泰边界的宁里和旗插安地区隐蔽。

宁里位于莆田西北部与永泰南部接壤处，为闽中游击区北部环形山区的中心。早在闽中游击区创建时，特委就派人到这里发动群众，建立秘密联络点。红2支队来到这里后，立即分成几个工作组，深入各村做群众工作，并很快将这里建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游击根据地。同时，为引开敌人视线，由

雷光熙率队佯攻常太，由吴德标率队奔袭琯口镇。红军游击队的这种声东击西、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弄得敌人晕头转向，无所适从。

在闽中反“清剿”的艰苦岁月里，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唇齿相依，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如国民党军在“清剿”杉溪芹石村时，抓到地下交通员、60多岁的洪攀老人要他带路。他装聋不予理睬，敌人割掉他一只耳朵后，他故意把敌人引向歧路。敌发现上当后又将他的另一只耳朵割掉，逼他说出红军游击队的去向，他仍闭口不语，最后惨遭杀害。又如敌围困罗汉里游击根据地时，女交通员棋山妹不顾身怀六甲，冒险与一游击队员进山给红军游击队送粮送信。返回时不幸被保安队抓捕。敌人逼她带路找游击队被断然拒绝后，当即杀害了那位游击队员，并剖腹取肝，进行恐吓。但她仍面不改色，骂声不断。保安团长气急败坏，一枪将其打死，并下令割下她的首级悬挂示众。像这样的一些例子，在游击区内不胜枚举。许多群众为了支援游击队，宁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把粮食送给游击队。不少人冒着全家被杀的危险掩护游击队伤病员。正是闽中人民的大力支援，才使闽中红军游击队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多次粉碎敌人的疯狂“清剿”，在闽中这块土地上立足、生存、胜利和发展。

四、“泉州事变”与红军游击队开赴皖南

（一）特委主要领导成员被害与闽中工委的成立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后，全国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赴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的中共闽中特委委员余长钺，由沪经桂林转赴香港。10月下旬，余写信给特委，说已与设在香港的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接上关系，南委要特委派人前往联络。于是特委经研究后派黄孝敏赴港。11月下旬，黄、余由港返闽，向特委报告了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陕北的喜讯，并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特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不再提“反蒋”的口号，暂时停止袭击国民党的军事据点，将部队隐蔽在莆永边休整、训练。

1937年1月，中共闽中特委从南委寄来的《救国时报》上获悉西安事变发生及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2月16日，王于洁在莆田县洪度村特委交通员薛宝泉家中召开特委会议，学习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研究特委今后工作。当晚，与会的王于洁、黄孝敏、潘涛、余长钺被薛带往邻近的林外村薛的妻弟家住宿时，一进村便被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宪兵逮捕，并当即被解往团部。接着，敌人又诱捕了中共福清县委书记陈炳奎。事后才得知原来薛宝泉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叛变，而会议地点与会后的投宿地点都是他与敌人密谋策划好的。王于洁等5位闽中党的主要领导人被捕后，在狱中坚贞不屈，大义凛然。1937年6月23日，他们昂首挺胸地走向福州西湖鸡角衙刑场，高呼口号，英勇就义。他们的牺牲，给闽中的游击战争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同时亦是闽中党的历史上一次极为惨痛的教训。

中共闽中特委4位领导人被捕后，因率游击队执行任务而得以幸存的特委委员刘突军立即召开地方和游击队主要领导干部紧急会议。鉴于特委遭破坏，为接替特委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闽中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由刘突军任工委书记，黄国璋、苏华为委员。1937年4月，工委派黄国璋赴香港与南委代表姚铎接上关系。姚讲述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和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策略，并认为闽中红军游击队应统一编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闽中工委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抗日合作的谈判。黄由香港返莆田路经厦门时，会见了中共厦门工委书记肖林。肖建议将晋（江）南（安）工委划归闽中工委领导。6月中旬，中共闽中工委在莆永边的宁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黄国璋传达的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以及南委对中共闽中工委的具体指示。会议认为，党中央提出的“联蒋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并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做好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准备。但从目前闽中地区的实际情况看，国民党尚不承认闽中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马上举行谈判的条件还不具备。只能是一边呼吁、促进，一边观察、等待。会议决定，将闽中红军游击第2支队改编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7路军第1纵队，吴德标任纵队司令员，刘突军任政委，雷光熙、王铁成任副司令员，杨采衡任参谋长。会议还决定，晋南工委负责人李刚为中共闽中工委委员兼晋南工委书记。

（二）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谈与“泉州事变”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随后又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从而掀起了全国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在这一新的形势下，中共闽中工委发出《为反对日寇进攻华北告民众书》，呼吁国民党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与共产党通力合作，共赴国难。

为了更多更快地从南委那里获得党中央的指示和有关讯息，1937年8月中共闽中工委派政治交通员金贯一赴香港。不料金从莆田刚出发即被县警察局逮捕。工委获悉后，于8月12日以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7路军第1纵队指挥部的名义致函国民党莆田当局，要求无条件地将金贯一释放，并表示愿就合作抗日问题与其举行和平谈判。8月18日和20日，《莆田日报》分别发表了国民党驻军第478团团团长李鼎彝和国民党县党务指导员黄土豪同意与闽中红军游击队谈判的意愿。闽中工委当即决定派参谋长杨采衡进城，先就释放金贯一问题与国民党当局接触，以试探其诚意。杨由黄土豪引见莆田县县长夏涛声，夏答应立即释放金贯一。随后，工委拟定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红军游击队可改变番号，但组织独立，干部不能动；军事上接受统一抗日的指挥；红军游击队停止打土豪，军饷由国民党政府拨付；释放政治犯；保证抗日言论

自由”等谈判原则，并派杨采衡为红军游击队正式代表同国民党代表黄土豪举行正式谈判。经过一番争论，国民党方面不得不同意了红军游击队的基本条件，双方初步达成了原则协议。8月26日，杨采衡在黄土豪的陪同下赴泉州与国民党驻军第239旅旅长钱东亮面述谈判结果，钱无异议。9月上旬，中共闽中工委书记刘突军又亲自到莆田与夏涛声和黄土豪协商义勇军集中地点及安全等问题，并达成义勇军正式改编前先在莆田庄边集中，国民党驻军和保安队等要绝对保证义勇军集中途中和集中地的安全；在义勇军集

中地方方圆50里内不得驻扎其他军队；为便于双方联络，闽中义勇军在莆田城关设立办事处。

和谈达成协议后，闽中义勇军即集中到莆田庄边赤石（今尚书桥）安口村集中整训，队伍扩大至200余人。10月中旬，刘突军率义勇军在莆田城郊接受了第239旅代表的点验。之后，部队被指定在莆田广化寺驻防。接着，国民党陆军第80师师部正式公布闽中义勇军改编为该师特务大队，任命刘突军、杨采衡为正、副大队长。此时，中共闽中工委尚不知7月闽粤边发生的“漳浦事变”以及中共中央对“漳浦事变”的有关指示，以至对国民党吞并红军游击队的阴谋及实施手段缺乏应有的警惕，这就不可避免地酝酿后来发生的血的教训。

11月初，国民党军第80师师部以金门沦陷、闽南时局紧张为借口，下令调已改编为特务大队的红军游击队驻防泉州。为此，中共闽中工委召开会议研究对此事应如何处置。会上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是不能离开莆田游击区。因为一旦离开游击区开到泉州，势必完全被第239旅所控制，这样风险很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泉州是闽南8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去了可以扩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政治影响，推动城市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同时还可以乘机恢复安（溪）南（安）永（泰）游击区。再者，如不去，会

给国民党以不执行军令、不真诚合作的口实。最后，第二种意见被采纳。工委决定部队开赴泉州。临出发前部队进行整顿，将部分老弱和离家确有困难的战士留在游击区继续开展群众工作，其余 160 余人于 11 月中旬开抵泉州，进驻承天寺。12 月，当张云逸在福州得知闽中红军游击队就编于 80 师的消息后，立即派人通知闽中工委“不应单独就编”，但事情已发展到这种地步，已无法挽回。

早在 10 月中旬闽中红军游击队接受点验并被改编为第 80 师特务大队时，中共闽中工委就派黄国璋赴港向南委汇报并请求指示。黄到港后即向南委负责人薛尚实汇报了闽中工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和部队改编的情况。薛对闽中的和谈与部队改编表示满意，但强调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同时决定把闽中工委划归闽粤赣省委领导，并建议由黄国璋任工委书记。黄回到厦门时获悉部队已开赴泉州，便直接抵泉，向刘突军等传达了南委的指示。此时刘也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要黄国璋赴闽西向闽粤赣省委汇报闽中的工作，并请求省委给予指示。1938 年 1 月，黄抵达永定省委机关。张鼎丞、邓子恢、方方等省委领导听了黄的汇报后，立即分别向中共中央分局项英和南委报告闽中红军游击队被编入国民党军第 80 师后调往泉州的情况，请求上级向国民党当局交涉收回这支队伍。同时要黄携带省委给闽中工委的书面指示速返泉州。黄回到泉州后，立即在工委会议上传达了省委的三点指示：（1）鉴于“漳浦事件”的教训，工委应提高警惕，特别要防备国民党制造事端来消灭我们的武装；（2）考虑到闽中红军游击队已编入第 80 师并进驻钱东亮的防区，现在还不宜立即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归还新四军，而要设法和国民党方面搞好关系，避免磨擦，以麻痹他们；（3）应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和生产运动。工委讨论中着重研究了应付突然事变的措施；决定将未暴露身份的干部和好的短枪抽回游击根据地，以防万一。

为了阻止闽中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国民党采取一系列阴谋手段妄图吞并这支部队。起初，钱东亮提出将闽中红军游击队扩编为一个正规营，让刘突军任中校营长。遭到拒绝后，又扬言调游击队去浙江前线。钱还指派其部下假冒游击队在东街抢劫商店，企图嫁祸于人，被刘突军当场抓获并予以揭露。这些接连不断的异常情况，使刘突军意识到在此之后国民党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阴谋。为了挽救危局，刘突军决定派雷光熙等赴龙岩向张鼎丞、邓子恢汇报情况并请求让闽中红军游击队跟随新四军第 2 支队一起北上抗

日。同时，自己亲赴福州请求新四军办事处向国民党福建当局交涉，将闽中红军游击队收归新四军。然而，在刘突军尚未动身之前，

国民党已密谋将其调出密杀，尔后将闽中游击队包围缴械。3 月 10

日，钱东亮趁刘突军向其请假赴福州之机，密令部下在莆田将刘扣押并当即被秘密处死。随行的青年部长高万里和 4 名战士亦同时遇害。3 月 11 日，钱东亮以 1 个团的兵力突然包围承天寺，把闽中红军游击队强行缴械。然后由第 239 旅参谋长侯炯宣布所谓“刘突军违反军令，携款潜逃”的罪名。这就是继“漳浦事件”之后国民党制造的又一起新的罪行，史称“泉州事变”。

（三）正义的伸张与游击队编入新四军

“泉州事变”发生后，杨采衡当即向侯炯提出抗议，并提出：必须绝对保证刘突军大队长的安全，立即将他送回大队部；绝不允许把我们的队伍分散；将我们部队送往新四军。杨还草拟了两个电报稿，分别发往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和龙岩第2支队留守处。同时还设法将泉州事变的情况报告中共闽中工委设在莆田的秘密交通站。中共闽中工委获悉泉州事变的情况后，立即开会研究营救措施。一是派黄国璋先到福州向新四军办事处报告，再转赴龙岩向闽粤赣省委报告；二是派李刚赶赴泉州，设法与杨采衡取得联系，并动员泉州社会各界予以声援。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负责人王助、范式人听了黄国璋的汇报后，同时致电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又先后找“绥靖公署”参谋长赵南和第80师师长陈琪交涉，赵、陈矢口否认暗杀刘突军的罪行，但表示发还武器一事可以考虑。最后又找到福建省主席陈仪，陈同意把闽中红军游击队送到福州，由办事处负责将其送往新四军。黄国璋在福州汇报后又转赴龙岩向中共闽粤赣省委常委方方报告，方当即电告中央，请求将闽中这支武装编入新四军，并以“华”的笔名在《前驱》上发表评论文章，揭露国民党当局制造“泉州事变”的罪行。黄国璋返榕后，王助、范式人令黄以新四军代表的身份前往泉州，将部队带往福州。

1938年3月下旬，钱东亮派汽车将闽中红军游击队160余人全部送到福州洪山桥，并清点交还了被缴的武器装备。王助、范式人代表新四军军部将新四军臂章发给每位指战员。部队在洪山桥稍事休整后，于5月开抵安徽太平县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受到了叶挺军长和张云逸参谋长的亲切接见。除杨采衡、雷光熙等20多人由军部分配工作外，其余编为军部特务营第2连，连长吴德标，指导员翁鸿镗。从此，这支出生入死、历经坎坷的闽中红色游击武装踏上了抗日征途，汇入到了全国抗战的洪流之中。

第十一章 湘鄂赣边游击区

湘鄂赣边游击区位于湘东北、鄂东南、赣西北的交界地区。这个地区恰好处在长江、赣江、湘江3条水系，南浔、粤汉、株萍3条铁路和武汉、南昌、长沙3个省会之间，是湘鄂赣3省的枢纽地域。由于这个地区离大城市较近，且水陆交通便利，从而易遭军事上处于优势的国民党军的进攻，但这一地区又万山绵亘、峻岭环峙。地势险要复杂，有利于红军游击队隐蔽分散，同国民党军周旋，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

湘鄂赣边游击区是由湘鄂赣苏区演变而来。1927年秋，湘东、鄂南、赣西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在该地区组织工农群众，参加秋收起义，并先后建立起几支游击队，从此开始了湘鄂赣边地区的游击战争。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在这一地区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同时，在中共平江县委和红5军党委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决定建立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并首先建立以平江东乡的长寿街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力争在最短的期间，从平江开始，建成湘鄂赣3省边界革命根据地。12月，红5军主力前往井冈山，与红4军会师，其余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湘鄂赣边支队，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1929年8月，红5军主力由湘赣边返回湘鄂赣边地区，湘鄂赣边支队随即编回该军。1930年6月，湘鄂赣苏区发展到全盛时期，包括河南、湖北、江西3省边界地区20余县的大部或一部分地区。与此同时，红5军与由原第5纵队扩建的红8军，

合编成立了红3军团。7月，由中国工农红军湘鄂赣边独立师扩编的红16军也编入红3军团。不久，红3军团奉命开赴中央苏区，红16军继续坚持湘鄂赣苏区的斗争。至1932年，湘鄂赣苏区形成了以小源为中心的万（载）宜（春）萍（乡）浏（阳）苏区，以幽居为中心的平（江）浏（阳）修（水）铜（鼓）苏区；以黄沙港为中心的修（水）铜

（鼓）宜（丰）奉（新）苏区和以龙港为中心的鄂东南苏区等互不相连的4块较大的苏区及若干小块苏区。翌年2月，在湘鄂赣苏区又成立了红18军。后来，红18师（由红18军改编）转往湘赣苏区，红16师（由红16军改编）则继续战斗在湘鄂赣苏区。

1934年六七月间，湘鄂赣苏区和红16师在国民党军反复围攻下遭受严重损失，苏区大部被国民党军占领，后逐渐演变为游击区。此后，中共湘鄂赣省委、省军区及所属武装转入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经历“三落三起”的跌宕起伏，即：从龙门山转移失败到红16师的恢复和发展；从麦市突围受挫到深入敌后游击；从三界尖失利到抓住时机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谈成功并开赴抗日前线三个阶段，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在艰苦的游击战争中，以红16师为主力的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以平江为中心，游击区域包括湖南的平江、浏阳、湘阴、岳阳、临湘；湖北的阳新、大冶、通山、崇阳、通城、鄂城、咸宁、蒲圻；江西的修水、铜鼓、万载、萍乡、宜春、分宜、宜丰、上高、高安、奉新、武宁、瑞昌等县的大部或一部地区。在这片土地上，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中共湘鄂赣省委率领红军游击队，与敌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他们从失误的启迪中找到正确的途径，从失败

的教训中总结出克敌制胜的方法，曾几度给国民党军以重创，也曾辗转于国民党军 60 余团的重兵之间。虽然也曾数次遭受重大挫折，但却没有丧失对革命的信念，始终高举革命的旗帜，保存了这块游击区，保存了一支有生力量。当抗日战争到来之时，通过谈判斗争，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合作抗日协议，为新四军输送了一支 1100 余人的队伍，奔赴抗日前线，胜利地结束了湘鄂赣边游击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

一、六七月事件

1933 年秋，国民党军在以主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其西路军总司令何键调集第 2、第 3 纵队向湘鄂赣苏区发动了“围剿”。红 16 师为配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遵照中革军委指示，在中共湘鄂赣省委领导和人民群众支援下，英勇抗击和袭扰国民党军。经过几个月的苦战，虽给敌以重创，但红 16 师也付出了伤亡 800 余人的惨重代价。

1934 年 1 月，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向湘鄂赣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小源发起攻击。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共湘鄂赣省委决定将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机关撤离小源。由省委书记陈寿昌率领，向铜鼓的幽居地区转移，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率红 16 师第 47 团转移至鄂东南地区活动。1 月 28 日，国民党军占领小源，这使湘鄂赣苏区失去了巩固的中心区域，红 16 师失去了可靠的后方依托。

2 月，撤离小源后的湘鄂赣军区为便于领导各小块游击区的武装斗争，成立了 3 个作战分区。第 1 分区司令员邹之谟、政委黄加高；第 2 分区司令员方浩然、政委涂正坤，第 3 分区司令员邱金生、政委傅秋涛。5 月，陈寿昌率领的省党政军领导机关，几经辗转抵达修水画坪，不久红 16 师也转战至修河西岸的金丰、画坪一带。

然而，未待湘鄂赣省委和红 16 师稍作休整，国民党军即以第 26、第 33、第 50 师及驻修水的吴抚夷保安团扑向修河西岸，向金丰、画坪实施合围。红 16 师第 46、第 48 团虽浴血奋战，掩护省级机关安全转移至鄂东南，但自己却损失惨重。师长高咏生亦于 6 月

9 日在突围途中被俘，后在被押往修水县城途中乘机逃脱，在敌人追捕时，不幸失足跌下山崖牺牲。此后，红 16 师第 46、第 48 团余部转至鄂东南与省委会合。不久，徐彦刚率第 47 团也开抵鄂东南。

省委、省军区遂将红 16 师进行整编，由徐彦刚兼任师长、陈寿昌兼政治委员。尔后，省委、省军区率红 16 师和省级机关移师南下，六

七月间，抵达龙门山区的奉新百丈、西塔一带。

湘鄂赣省委、省军区率红 16 师和省级机关进抵龙门山区后，拟以此地为依托，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但是，敌第 18、第 50、第 62、第 77 师很快逼近，在百丈、西塔立足以休养生息的计划已无法实现，省委决定由龙门山西出，向平江黄金洞转移。这时，敌第 50 师已在龙门山附近的肖家、栈桥、九仙汤地区布置了包围圈。省委决定分两路突围，由徐彦刚率红 16 师第 46、第 48 团向靖安、永修方向突围；陈寿昌率第 47 团和省级机关干部组成的特务团向宜丰、铜鼓方向突围。徐彦刚部在突围中于斜岭地区遭敌第 19 师夹击，伤亡甚重，待进至永修云居山时，部队只剩下三四百人，而敌军又合围而来，徐彦刚遂决定将部队分成若干小队分路突围。结果，在突围中大部指战员牺牲。徐彦刚带一部分人员历尽坎坷，转移至黄金洞，另有一部转移到高安、奉新边的集林山区。陈寿昌部突围移至宜丰高视时，遭敌第 50 师第 300 团伏击，伤亡惨重，遂决定部队分 3 路突围。结果，在突围中，两路队伍被打散，只有少共省委书记刘玉堂率领的手枪队，保护双脚发烂行走困难的陈寿昌，在高视山中隐蔽，躲过敌人的巡逻搜查，后穿过敌人封锁线，回到黄金洞地区。

龙门山地区的血战中，湘鄂赣省级机关干部和红 16 师共 1000 余人虽浴

血厮杀，奋不顾身，但终因敌我众寡悬殊，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失散，使湘鄂赣苏区遭受严重损失。这次军事行动，史称“六七月事件”。“事变的结果，红 16 师损失只剩一营兵力，苏区受到敌人的蹂躏和摧残，分隔成为十一块，最大的为平江黄金洞，横直二三十里，小块只有几里宽。然而湘鄂赣工农群众及其领导者——共产党，在此坚决困难的奋斗中，表现了最英勇壮烈的牺牲精神。”在这次事件中，省委的电台被打掉了，因而从此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这次事件标志着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同时也揭开了湘鄂赣边地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帷幕。

二、童建红 16 师，开创新局面

（一）8月紧急会议

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导致了原来的例（阳）宜（春）万（载）、万（载）宜（丰）上（高）、宜（春）萍（乡）、平（江）浏（阳）长（沙）、浏（阳）醴（陵）、临（湘）湘（阴）岳（阳）、平（江）修（水）铜（鼓）、修（水）铜（鼓）宜（丰）奉（新）、万（载）铜（鼓）宜（丰）、修（水）武（宁）崇（阳）通（山）、咸（宁）蒲（圻）崇（阳）通（山）等苏区相继陷入敌手或变为游击区。加之国民党军为彻底扑灭湘鄂赣边的革命火焰，在重创红16师后，并未收兵，而是继续加紧对湘鄂赣边区的“清剿”，致使湘鄂赣军区下辖的各作战分区及各县委所属的地方武装也相继受挫，有的损失殆尽。国民党军的暴行侵入湘鄂赣苏区的国民党，军因数年来对该苏区屡剿屡败而恼羞成怒，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狂叫着“宁可错杀一千，不要漏掉一个”，不管男女老幼，皆不放过，杀人的手段极为残忍，如刀砍、火烧、活埋、枪决、开水灌、烟熏、钻子钻、躺钉板床、零刺碎刮、铁丝穿手心、钉手掌脚掌等数十种，先是以人头来计杀人数量请功，后来杀人如麻，就以耳朵来计数报功。有一次，仅割下的耳朵，就装了两箩筐，对物品牲畜能带的抢走，不能带的打烂毁坏杀掉，对建筑、田园、竹林一把火烧光或摧毁，使许多地方人亡物毁，一片荒凉。如平江的辜家洞，原有3700余人，500余栋房子，30多家商店，国民党烧杀掳掠后，只剩下两间半房屋，人烟皆无，成了“孤家洞”。在游击区内国民党军还实施堡垒政策，凡属战略要道、重点地区、高山隘口、大的集镇都构筑有碉堡作为支撑点，派兵驻守。对游击区人民实行强迫移民，移到县城、碉堡附近和公路边以便控制，同时对游击区及其边缘区的人民实行保甲制度和联防政策，规定五家一联，十甲一保，一家与红军有联系，十家“同祸”。在游击区内还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禁止游击区与白区通商，对群众实行生活必需品限购。不仅如此，敌人还采取分化和攻心政策，在游击区周围，设立“招抚”机关，利用叛徒“现身说法”，进行“招抚”。总之，敌人是想彻底断绝红军武装的群众基础和物资来源，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从而使湘鄂赣边游击区笼罩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下，革命斗争转入低潮。

省委紧急会议面对国民党军的残暴行径，经过革命战争血与火锤炼的游击区军民并没有丧失对革命的信心。为总结“六七月事件”导致湘鄂赣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深刻教训，寻求将游击区的革命局面由低潮推向高潮的正确途径，鼓舞游击区军民的斗争信心，粉碎敌人关于湘鄂赣红军已被彻底消灭的谣言，中共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黄金洞召开了紧急会议，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陈寿昌主持会议，与会者有：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省委副书记傅秋涛、省委组织部长涂正坤、省委秘书长钟期光、少共省委书记刘玉堂、省少先队总队长谭启龙、省政治保卫局分局代局长邓洪、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曾国祺等，以及转移到黄金洞的一些中心县委和县委书记。会议指出了“六七月事件”的原因及教训，检查了省委在第五次反“围剿”工作中的错误，“并集中火力反对因六七月事变暂时局部的损失而失却对整个革命战争与湘鄂赣前途发展的信念的右倾机会主义”。指出湘鄂赣游击区党目前的最主要的任务是：“恢复与壮大红军主力，保卫并联系苏区。”会议作出了抽调干部到各地搜集武装，开展扩红运动，发展红16师的决议。

这次会议是湘鄂赣游击区三年游击战争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对推动湘

鄂赣边游击战争走出低潮，振奋游击区军民革命斗志，促进红 16 师的恢复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这次会议没有认识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受中共中央“左”的进攻路线影响，机械地执行向敌军密集的东南方向发展的方针，以及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死打硬拼，是“六七月失败”的主要原因，反而认为省委错误的中心，是没有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所以尽管会议没有再强调向东南发展，提出了巩固和发展平江黄金洞苏区，但是会议仍坚持进攻路线，没有从严重挫折的实际出发，正视苏区已变为游击区的事实，而未能适时地转变原来的正规战的战略方针，提倡并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

（二）米筛锅会议和重建红 16 师

8 月紧急会议后，省委着重致力恢复红 16 师的工作，为此派省委副书记傅秋涛和鄂东南道委书记兼第 1 作战分区政委黄加高分别赴湘鄂边和鄂东南收集失散的红 16 师余部和地方武装，拟重建红 16 师第 47 团和第 48 团。由于黄加高前往鄂东南后，没有积极执行省委决议，致使鄂东南地方武装独立 1 团及游击队未能及时集中，遭敌各个击破而完全损失，恢复红 48 团的计划未能实现，黄加高因此受到省委的撤职处分。担负恢复红 46 团任务的傅秋涛率 7 人短枪队从黄金洞出发后，经平江南江桥到达通城云溪，在此地遭到 200 余敌人的围攻，他们打死 10 多个敌人后，冲出敌围。尔后他们又绕过通山县城，到达湘鄂边的药姑大山，在这里遇见了湘鄂边中心县委，由县委书记钟期光派游击队将他们送到崇阳县，接着崇阳县委书记王全德又派游击队护送他们至通山县冷水坪。此前，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省委巡视员方步舟、红 16 师参谋长谭凤鸣等率领的一支 800 余人的部队已集聚在冷水坪地区。严图阁是率在“六七月事件”中被打散后在鄂东南收集起一部分武装来到这一带的。方步舟是在 8 月紧急会议之前受省委指派到咏生县和鄂东南联系谭凤鸣带领的咏生县独立营及鄂东南红 3 师第 7 团的。他在咏生县找到谭凤鸣率领的独立营后，与谭率部到鄂东南与红 3 师第 7 团余部取得联系，并把独立营并入第 7 团，不久，又与严图阁所率的部队在冷水坪会

9 月上旬，傅秋涛等到冷水坪后，即遇上严图阁、方步舟、谭凤鸣所率的部队。随即，傅秋涛向他们传达了省委 8 月紧急会议的精神和关于恢复红 16 师的决议及计划。他们一起研究后决定部队边打仗，边扩大队伍，返回黄金洞地区。傅秋涛、严图阁等旋即率这支部队南下，由通山向崇阳、临湘、平江方向挺进。部队在经过平江的伍公市、新墙、新市街、南江桥等地时，捣毁了许多国民党区、乡政府，连续打了几个小胜仗，其中击溃了敌新 7 旅一部，在南江桥歼敌驻军 1 个排，俘敌七八十人，缴枪百余支和大批物资，并在沿途动员了许多群众参军，部队扩大到 1100 余人。在黄金洞的湘鄂赣省委十分关注恢复红 16 师的工作，因为这关系到湘鄂赣游击区的革命红旗能否继续举下去的问题，于是省委很多领导同志都要求到前方去做恢复红 16 师的工作。陈寿昌身体虽然不好，也坚决要求上前线。10 月，省委在黄金洞米筛锅召开会议，陈寿昌、徐彦刚、刘玉堂、涂正坤等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 8 月紧急会议以来的扩红运动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去前线领导红 16 师恢复工作的人选问题，最后决定调傅秋涛回黄金洞主持省委工作，由陈寿昌、徐彦刚去前线领导恢复红 16 师。

11 月初，陈寿昌、徐彦刚率省军区独立营 100 余人由黄金洞向西南行动，在平江斑鸠坳与傅秋涛、严图阁率领的部队相遇后，向他们传达了省委米筛锅会议的决定。傅秋涛即按照省委的意见，把部队交给陈寿昌、徐彦刚，自己率省军区独立营返回黄金洞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当月，陈寿昌、徐彦刚率部队北上，又向鄂东南开进，行至平江献钟时，与敌遭遇，损失了一二百人。以后，在平浏一带集中了地方游击队 400 余人补充到队伍中。继而，部队开抵通山冷水坪。陈寿昌、徐彦刚与中共鄂东南道委商量后，决定将这支部队编为红 16 师第 46 团，以正式恢复红 16 师，部队约有 1200 人。由徐彦刚兼任师长，方步舟任师政治委员，魏平任副师长，谭凤鸣任师参谋长，袁洪国任师政治部主任，石成富任第 46 团团团长，梅子益任副团长。同时，师下还辖

1 个特务营，张玉清任营长。

这时，陈寿昌、徐彦刚从国民党报纸上获悉进入湖南的中央红军正继续西进，遂计划指挥红 16 师从牛牯山西出，经崇阳、蒲圻到临湘、岳阳、平江一带活动，以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11 月 21 日，当陈寿昌、徐彦刚等率红 16 师第 46 团及特务营进抵崇阳、通城之间的老虎洞、老鸦尖一带时，遇敌第 33 师两个团的袭击。双方战斗得十分激烈，红 16 师虽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但自己伤亡亦很大。战斗中，陈寿昌亲自登上前沿阵地察看敌情，不幸右膝中弹，徐彦刚亦中弹负伤，在这种情况下，红 16 师在减员至 700 余人后，被迫撤出战斗，由方步舟、谭凤鸣率领到崇阳金塘休整。负伤的陈寿昌从前线被秘密送至大门坳红军医院抢救，终因失血过多而牺牲。湘鄂赣边游击区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对该区的游击战争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后来，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为纪念他，决定在崇阳、通城之间划出两县各一部建立一个新的县，定名寿昌县。

在湘鄂赣省委致力于恢复红 16 师的同时，省委领导下的游击区各级党组织，无论是与省委有联系还是断绝了联系的，在国民党军残暴行径造成的白色恐怖下，仍振奋精神，积极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在原来领导的地方武装遭受损失的情况下，他们重新组成许多小股的游击队不断地袭扰打击敌人，有时还深入外线活动，建立新的游击区。一些在“六七月事件”后散失在游击区内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原红 16 师指战员，也自发地互相联系组织起来，开展斗争。如原红 16 师第 47 团 8 连指导员汪克明，就在高安华林寨一带主动收拢失散和负伤的战士，发动群众，建立武装，成立了修铜宜奉游击第 3 大队，在高安、奉新、宜丰三县交界地区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原省军区通讯班长王义勋在龙门山突围失败后，也带领重新聚集在一起的部分战士成立了靖（安）奉（新）高（安）边游击队，在靖奉高边不断地打击敌人。游击区的干部、战士就是这样为重新开展这一地区的武装斗争而不惧艰险、不畏流血牺牲地努力奋斗着。

（三）杨雀坦会议和扩红运动的深入开展

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牺牲后，为确定新的省委领导人和研究下一步战斗部署，省委于1934年11月下旬在黄金洞的杨雀坦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由傅秋涛代理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由涂正坤任省委副书记，刘玉堂任省委组织部长，钟期光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谭启龙任省少共省委书记，秦化龙任省少先队总队长，邓洪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同时决定仍按米筛锅会议的精神恢复和扩大红16师，学习和推广原中央苏区的扩红经验，把扩红工作列为目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并作出了1个半月的扩红动员工作计划，拟将东南地区的一部分地方武装补充进新恢复的红16师第46团。还决定抽调干部成立扩红突击队，深入游击区各地开展扩红工作，会议同时决定开辟平（江）修（水）崇（阳）通（城）游击区。

杨雀坦会议后，在省委及各特委、县委的切实领导下，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在游击区内普遍开展起来。尽管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湘鄂赣游击区的人民群众遭到了国民党军的野蛮镇压，并处在其残暴的统治之下，国民党军就是想利用白色恐怖这种手段来断绝人民群众与红军游击队的联系，但革命必胜的信念在人民心中没有消失，对红军游击队的情感仍是他们心中最珍贵的东西。党组织的努力工作和人民群众对革命的热情，使扩红动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仅在平江、浏阳、铜鼓、修水等县，就“补充了前方战士371名。此外，还有3个不满1营兵力的独立营自动要求加入主力”，使红16师第46团得到了扩大，到12月，红16师又发展至1200余人。

湘鄂赣边游击区扩红运动得以顺利开展，除主观努力外，还有有利的客观因素，这就是到1934年底，国民党军为集中兵力“追剿”中央红军和红2、6军团，不得不暂时放松对湘鄂赣边游击区的“清剿”，将驻扎于这一地区的第26、第50师调往湘黔边境，同时其第33师也被北调至湖北阳新、大冶，这样湘鄂赣边游击区的敌情顿时缓解。湘鄂赣省委虽因电台损坏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系，不明其中缘由，但明显感到敌人兵力的减少和“清剿”次数的减少。于是，省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猛烈扩红。

1935年初，湘鄂赣省委继年前1个多月的扩红运动后，又提出“一二三月扩红战斗计划”，号召最好的党员、最好的干部到红军中去掌握部队，进一步推广学习平江游击区前一段扩红工作的成功经验、并在前线 and 后方开展杀敌、扩红竞赛，提出“前线消灭两团敌人，后方动员两团新兵”、“前方飞兵前进，后方跑步扩军”的口号。地方干部积极开展扩红工作，游击区群众踊跃参军，出现了许多母送子、妻送夫加入红军的动人事迹，游击区内再度掀起了扩红运动的高潮，在1935年的头3个月里，仅西北的修通等县就扩红700余人，东南的平江、浏阳、长沙、咏生、宜萍、万载、修水、铜鼓8县扩红1200余人，使红16师扩大到2500人，1400支枪。4月，省委为推动扩红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在平江黄金洞召开了总结经验、表彰先进的扩红总结大会。傅秋涛在会上讲话指出：当前形势与去年同期相比，已有基本好转，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要进一步巩固中心区，恢复边缘区，还要领导和开展好敌占区的工作和斗争，但这些工作与突击扩红、补充主力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会议又提出了“红五月扩红冲锋计划”，并任命在前一段扩红工作中成

引自《中共湘鄂赣省委给任弼时转中共中央的信》（1935年6月30日）。

绩显著的东南军分区副政委江渭清为省扩红突击总队队长。

扩红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了红 16 师的发展壮大，先是该师进入湘鄂赣的药姑大山后，于 4 月收编了廖海清带领的一支约有三四百人的绿林武装，并以该部为基干，编成红 16 师第 48 团，由廖海清任团长，赵改中任政委。继而，在省委提出扩红的“红五月冲锋计划”后不到两个月，全游击区又动员了 2500 余人加入红 16 师。于是，6 月下旬在平江县小水岭又成立了红 16 师第 47 团。至此，红 16 师 3 个团建制全部恢复。徐彦刚仍兼师长，方步舟任师政委，魏平任副师长兼第 46 团团团长，谭凤鸣任师参谋长兼第 48 团团团长，钟期光任师政治部主任；赵改中任第 46 团政委；钱林往第 47 团团团长，曹茂柏任团政委；袁洪国任第 48 团政委。全师发展到 5000 余人。

省委在大力开展扩红运动及恢复红 16 师的工作中取得显著成效，这无疑对湘鄂赣边游击战争的开展极为有利。1935 年上半年，红 16 师的伤亡在千人以上，如果没有扩红的成效，红 16 师是难以生存的。但在扩红这一工作中，对于“赤卫队组织的扩大与动员仍然被放松”，特别是强调并将各军分区、县委所辖的地方武装编入红 16 师后，忽视了地方武装的发展，这不利于造成广泛的游击战争的局面，至使红 16 师仍孤军作战，这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强调的所谓“正规化”的影响在该游击区的反映。

（四）红 16 师威震湘鄂赣边

在自身通过扩红运动不断壮大的同时，红 16 师在湘鄂赣省委、省军区的指挥下，抓住战机，不断打击国民党军，并连战连捷，再度扬威湘鄂赣边游击区。

进击鄂东南 1935 年初，湘鄂赣省委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 2、6 军团的行动，箝制国民党军，决定利用敌情缓解的有利时机，要求红 16 师主动出击，向湖北扩展游击区，破坏长（沙）武（汉）铁路，摧毁国民党军在游击区边界构筑的碉堡封锁线。于是，红 16 师第 46 团从平江黄金洞向鄂东南行动。1 月 1 日，红 16 师向在通山县大屋场构筑碉堡的国民党军新 3 旅第 1 营实施攻击，歼其一部，俘其 28 人，缴枪 28 支。尔后，红 16 师为巩固修（水）武（宁）崇（阳）通（山）游击区，打击构筑碉堡封锁线的国民党军，拟经杨芳林到通山敌人后方活动。3 日，进至杨芳林的红 16 师与敌 8 个连激战一日，红军将敌击溃，迫其退入工事内，并消灭下铺增援的 1 个连敌兵。尔后，红 16 师挺进通山敌后开辟新区。1 个月之内拔除碉堡数个，缴枪 100 余支，其中有 4 挺轻机枪，并缴获一批弹药，改善了红 16 师的装备，第 46 团此时兵力已发展至 4 个营。

大源桥歼敌红 16 师第 46 团挺进鄂东南的作战行动，引起国民党军的注意，他们即调动第 50 师及新 3 旅的 3 个团向红 16 师进逼。2 月，红 16 师第 46 团除留下 1 个连在崇阳金塘执行保卫鄂东南道委机关外，全团开往崇阳大源桥，拟向西挺进，以配合红 2、6 军团的行动。然而，在红 16 师第 46 团到达大源桥的第 2 天，敌第 50 师第 300 团即气势汹汹地由修水的芦坊闻风追至。该团是在“六七月事件”中导致红 16 师严重挫折的敌主力之一，且装备精良，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十分骄横，企图在大源桥重演“六七月事件”。游击区军民义愤填膺，提出“留下开花子，去打三百团”，红 16 师领导人决定在大源桥阻击第 300 团，打击其嚣张气焰，振奋游击区军民斗志。战斗打响后，红 16 师先以第 46 团特务营从左翼向敌先头营猛攻，立足未稳的敌先头营迅即溃败，逃窜中冲乱了自己后续部队的阵脚，敌军心为之动摇，而红 46 团主力乘胜分两路夹击占领大源桥附近山头阵地的敌 3 个营。受到夹击的敌军士气顿失，四散逃窜，其右翼部队很快被红军歼灭。接着，红 46 团占领了敌机枪阵地，控制了敌制高地，残敌凭借最后一个山头负隅顽抗待援，徐彦刚遂组织突击队向敌人冲击，并集中全部轻重机枪掩护突击行动。正当双方激战甚烈、相持不下时，留守金塘的红 46 团的 1 个连及时赶至，从敌后发起攻击，敌不支溃退。此役，红军毙伤俘敌约 2 个半营，缴长枪 300 余支，重机枪 5 挺，红军自己亦伤亡 1 营余人。“此一役是十六师的重要关键，胜利后敌人约月余没有大的进攻”。

一战高视大源桥战斗后，红 16 师抓住敌人暂时不敢来犯的有利时机，在寿昌县一带积极开展新区工作，动员青年参加红军，捣毁敌人堡垒。接着，红 16 师为将修武崇通游击区联成一片，拟歼灭地处 4 县交通要道上的崇阳高视构筑碉堡的敌人。红 16 师通过侦察得知：敌人在高视依着险要山势修筑了一个大碉堡，驻有敌地方武装 1 个保安中队，而在高视附近的敲响岭方向驻扎着国民党东北军第 105 师第 3 团。红 16 师遂决定实施围点打援战术。2 月

18日，红16师以侦察连将高视敌之碉堡围困起来，而主力部队却埋伏在鼓响岭通往高视的大路两旁的山上。数小时后，驻鼓响岭之敌果然派其第2营1个连赶往高视增援。该连进入红军伏击阵地后，红军突然出击，敌猝不及防，欲掉头逃跑，却被红军侧翼部队截住而陷入红军包围之中。红16师领导人从俘虏口中了解到被围的敌人属东北军第105师，而该师自东北沦陷后，被千里迢迢南调至反共前线，蒋介石企图使其与红军两败俱伤，以实现借刀杀人，排

除异己的阴谋，而这些情况，东北军官兵心中清楚，加上和沦陷日军手中的故土亲人失去联系，厌战思乡情绪严重。因而，红16师指挥员决定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开展政治攻势，瓦解这股敌人。红

16师敌工人员遂到前沿阵地喊话，唱抗日救亡歌曲。该连东北军官兵果然被感召，全部弃械投降。高视碉堡守敌得知这一消息，也在傍晚交枪投降。此战，红军无一伤亡，缴轻机枪10挺，步枪70余支。战后，为进一步瓦解敌军，扩大政治影响，红46团杀猪备酒款待东北军官兵。除自愿留下当红军的，其余人员一律由他们连长率领徒手返回崇阳县城。

二战高视国民党军武汉行营获悉1个连官兵被红军遣返崇阳的消息后，深为惊诧，即派一个高级参谋前往高视调查该连被红军缴械情况。3月3日，这名高参在驻鼓响岭第105师第3团1营的护送下进至高视。这时，一战高视后进至崇阳附近活动的红16师又由崇阳向通城行动，恰又经过高视，得知敌1个营已到此地的情况后，遂迅速占领高视两侧高地，乘该敌在高视峡谷休息吃饭之机，出其不意地居高临下发起袭击。敌顿时乱作一团，很快被悉数歼灭，其营长被击毙，敌高参等200余人被俘。红军二战高视，计缴获机枪36挺，步枪200余支。战后，俘虏经过政治教育，大部自愿加入了红军。

回师黄金洞红16师在高视二度获胜，引起国民党军恐慌，其第4绥靖区司令官陈继承即调集第85师、第33师、第37旅、新3旅的9个团“进剿”红16师，第50师的2个团也在修水、渣津之线实施堵击。红16师旋即南下，3月下旬，在修水、渣津一线国民党军间隙之中穿插而过，并歼灭敌第50师1个营，缴轻机枪11挺，迫击炮1门及一批弹药。尔后，进至平江黄金洞地区。这时，红16师人数已至一千五六百，轻重机枪已有40余挺，战斗力大为提高。“进剿”红16师之国民党军追至通城、修水，即停足不敢再进，只在这一带构筑堡垒。月底，红16师由平江地区南出浏阳，对东门北沙张家坊约1团驻军实施围攻，因敌第19师成铁侠旅3个团增援而至，红16师遂撤出战斗，向湘赣边挺进，欲通过湘赣游击区与党中央、中革军委取得联系，并与该区红军武装配合前出至长沙附近行动，以策应红2、6军团的作战。但红16师经宜春、安源、茶陵、莲花进抵武功山地区后，在此停留3天，未能与当地党组织及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加之该地区国民党军碉堡稠密，成铁侠旅又紧追不舍，故即北经萍乡、万载返回平江黄金洞地区。

虹桥战斗4月下旬，在黄金洞休息补充后的红16师第46团及新成立的第48团一起前出至黄龙、幕阜山地区，以开展扩大游击区、摧毁敌碉堡的工作，并决定寻机求歼尾追之敌。同时，红16师的2个团在木爪歼灭国民党地方武装湖南保安团1个营，尔后进至平江虹桥休整。这时，敌第19师成铁侠旅之2个团及湖南的2个保安团闻风从长寿街东南向虹桥进逼，扬言要“活捉徐彦刚、消灭16师”。成铁侠旅被第19师视为“常胜军”，此次进攻红军，似乎势在必得，每个士兵都备有一条绳子，说是准备捆绑活捉的红军官

兵的。红 16 师得悉敌之行动后，鉴于全师连战连捷，士气旺盛，虹桥又原是老苏区，群众基础好，红 16 师又熟悉当地地形，便决定在此求歼来犯之敌。虹桥是通向幕阜山地的要冲，两侧起伏的山丘上草深林密，又有敌原先在此构筑的防御工事，便于部队隐蔽设伏；虹桥正前方是一大片开阔地，阡陌纵横，中间有一条河流，利于防守者封锁来犯之敌。红 16 师根据地形布兵，将第 48 团第 2 营及师部重机枪连置于河西岸的虹桥东北面小山上，利用那里原有的工事作正面防御，师部、第 46 团及第 48 团另 2 个营隐蔽在虹桥后山东侧高地鞍部森林中，准备从侧后突击来敌；师后勤机关在后山上开展活动，诱惑敌人。25 日上午 10 时，来敌进抵虹桥后即分两路开始进攻。一路由成铁侠指挥 1 个团扑向红 16 师正面防御阵地；一路由团长周琨源率领本团及 2 个保安团从右翼向虹桥西端高地进攻。红 48 团第 2 营及机枪连凭借工事向敌人猛烈射击，把正面敌人压在山下，成铁侠气急败坏，急将侧翼部队也调往红 16 师正面防御阵地。当敌主力进入虹桥正面开阔地带时，红 16 师师长徐彦刚一声令下，第 46 团及第 48 团的 2 个营突然直扑敌人侧后，进行猛攻，红 16 师的 40 余挺机枪也向开阔地带集中扫射。经过 4 个多小时激战，成铁侠旅 2 个团被击溃，死伤惨重，红军俘其 500 余人，缴枪 400 余支。结果，敌人带来的绳子，最后用来捆绑了自己。此役之捷，沉重地打击了“清剿”游击区的国民党军，极大地鼓舞了游击区军民的斗志，促进了正在开展的扩红运动。

乘胜再歼敌虹桥之役，使国民党军恼羞万分，调来飞机对驻虹桥的红 16 师连日轰炸。红 16 师离开虹桥进至南江桥后，敌机仍跟踪轰炸，红 16 师遂向岳州挺进。途中，红 16 师对驻岳州黄岸国民党军 1 个营的守军实施围攻，经一昼夜激战，守军悉数被歼，红军缴枪 200 余支。4 月底，转兵向鄂东南推进的红 16 师，在崇阳与通城交界处的三界尖与敌第 50 师第 300 团、301 团遭遇，红 16 师挟连战连捷之勇对敌发起冲锋。结果，歼敌 1 个机枪营，将敌 2 个团击溃。尔后，红 16 师转战于平江、通城、湘阴、岳阳地区，在 5 月的短短 1 个月中，扫平敌碉堡 30 余座，开创了这些地区斗争的新局面。

1935 年上半年，红 16 师利用敌军兵力空虚之机，采取积极的行动方针，在省委、省军区的领导下，一面通过扩红壮大自己的力量，一面主动开展军事斗争，打击敌人，在大源桥、高视、木瓜、虹桥、黄岸、三界尖等战斗中连战连捷，重新威震湘鄂赣边区，使游击区人民更加关心爱戴这支自己的军队，推动了游击区青年的参军热潮，也促进了游击区域的发展。到 6 月底，不仅红 16 师的 3 个团建制全部恢复，整师已发展至 5000 余人，而且以黄金洞为中心的湘鄂赣边游击区也逐步恢复扩大，游击区域的版图已恢复扩大到 6 块，最大的是平江长寿、修水、通城和岳阳之间的游击区。此外，还有平（江）浏（阳）长（沙）、大围山、药姑大山、修（水）武（宁）崇（阳）通（山）、修（水）通（城）崇（阳）游击区，从而开创了湘鄂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鼎盛时期。

尽管 1935 年上半年湘鄂赣边的游击战争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但省委、省军区未能根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斗争形势的变化，自觉地实行由苏区方式向游击区方式，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在王明“左”的战略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只想搞正规军和大兵团作战，这不能不使湘鄂赣边游击战争潜伏着危机。

三、麦市河突围受挫，转入敌后游击

（一）长庆会议

1935年上半年红16师的连战连捷，固然开创了湘鄂赣边游击战争的新局面，然而游击区领导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产生了盲目乐观和麻痹轻敌的思想，没有认识到从大局上看，国民党军仍是力量强大，红军大量部队的长时间集中行动必然引起国民党军的注意和进攻，而从1935年5月起，将省级机关和红16师集中到平江之虹桥、长庆、南江桥一带休息整训、演习攻打碉堡和其它战术动作达1个多月之久。而这时，国民党军震惊于红16师的壮大和连续作战的胜利，将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汤恩伯、樊松甫等部调至湘鄂赣边区，会同湘军何键的部队及湖南、湖北、江西3省保安团，向湘鄂赣省党政军机关及红16师以虹桥为中心的集中地实施大举“清剿”。在敌人逐步逼近之时，湘鄂赣省委、省军区由于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难以从大局上掌握国民党军的调动情况；同时白区工作又没有得到恢复，难以获得确切的敌之情报；加上战略思想没有转变到游击战上来，仍继续把游击区各地的一些小游击队升级或编入到红16师中来，使红军失去了耳目，对敌人的大举“清剿”全然不知，当省委、省军区领导从黄金洞、浏阳的老百姓的反映中察觉到敌重兵已逼近之时，敌人的合围计划已接近完成了。

敌人在西起平江、浏阳，东至铜鼓、修水、武宁，南起株萍铁路，北至通山、崇阳的广大区域内构筑了大量碉堡，大小道路要道关口设有防御工事和障碍物，建立了一个大包围圈和三道封锁线，大包围圈内又有许多小包围圈，形成层层包围、连环包围的态势。这个包围圈逐步向虹桥、长庆一带紧缩，意图十分明显，即是把湘鄂赣党政军机关及红16师困在层层包围之中而置于死地。湘鄂赣边游击区又一次走到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6月底，面临敌大军压境的险恶形势，湘鄂赣省委、省军区在平江长庆召开紧急会议。徐彦刚在会上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提出为保存湘鄂赣边的有生力量，必须转移战区。会议认为这个意见正确，遂决定坚决突出敌围，并制定了两个突围方案：一是向东从修水方向突围，到修铜宜奉边，尔后取道高安、奉新，争取打开几个县份的局面，开辟一个新游击区，情况如允许，就在此地坚持下去，如果情况严重，就沿罗霄山脉暂时到湘赣游击区或中央苏区，以后再视机打回湘鄂赣边来；第二方案是向北往通城方向突围，经崇阳、通山、阳新、鄂城过长江，到鄂豫皖大别山去，如果在湖北不能突过长江，就改由修水、武宁到赣西北的永修、瑞昌、德安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

（二）麦市河三路突围

长庆会议确定了突围方案后，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完全合拢，从通城的麦市到修水的白沙桥一线还留有缺口，如果省委、省军区指挥部队即刻突围，行动将会顺利得多。然而因为省委决定咏生县除由县委书记江渭清率部分干部及精干武装留下坚持斗争外，该县的县、区级干部与省级机关干部与红 16 师一起突围，结果又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进行突围的准备和动员，并等待咏生县的县、区干部集中，结果更加贻误了时机，导致了更加严重的被动局面。

7 月中旬，按第一个突围方案，红 16 师掩护着省级机关及由省保卫大队、咏生县区干部和家属组成的特务团共三四千人马向修水方向突围，部队进至修水渣津西北一线时，遭到敌火力的严密封锁，敌人在此筑有好几道碉堡封锁线，构成严密的交叉火网，红 16 师在大白天集中机枪硬冲了数次，在第 48 团政委等牺牲的很大伤亡后，一道碉堡封锁线也没有突破，而且敌人第 4 师又从通城方向赶来增援，红 16 师在此突围的阻力更大了。当夜，红 16 师只好折回白沙桥。途中，又同第 4 师激战了四五个小时，红 16 师虽给第 4 师以严重杀伤，自己亦伤亡 300 余人，被迫撤出战斗。

从修水方向突围不成，省委、省军区遂决定采用第二方案，率领部队于 7 月 16 日夜改向西行，越过幕阜山，再由天岳关北行进入通城的盘石、云溪地区，在此地将 300 多名伤员分散安置在群众家里后，决定分 3 路由通城的麦市突围，通过麦市河，向崇阳方向进击。按照部署，徐彦刚、明安楼率领第 46 团为中路；严图阁、刘玉堂率领红 47 团为右路；方步舟、魏平和钟期光率领红 48 团为左路，傅秋涛率领省级机关和保卫大队组成的特务团随中路跟进。黎明前，中路、左路顺利渡过麦市河，而傅秋涛部在途中休息时，由于疲倦耽误了时间，没有跟上中路的行动，待赶至麦市河边时，天已大亮，敌人用机枪封锁了河面，无法过去，右路第 47 团和左路第 48 团的 1 个后卫连也未能过河去。

傅秋涛率领的特务团在麦市河突围不成，即返回通城云溪白石岭，在这里与第 47 团和第 48 团后卫连会合，几部加在一起共有 1700 余人。这时，国民党军发觉红 16 师仍有一大部分没有突过麦市河，立即以 1 个师从白沙岭追来，以 1 个师从天岳关前来堵击。傅秋涛率领这 1700 余人遂从云溪南行，翻山越岭与敌人周旋作战，饥疲交加。幸好，在翻越幕阜山后，在洞口截击了敌人 1 个运输队，缴获了一些大米充饥。在麦市河突围不成的第 4 天，傅秋涛部转战至平江的周坊、横江山区时，敌情更加紧张，天上有敌机轰炸扫射，地面敌人从燕岩、团头、三眼桥、钟洞围攻过来，驻三眼桥的敌军团长甚至派人遣给傅秋涛一封劝降信，似乎胜利在握。在此紧要时刻，傅秋涛等指挥员即加强政治工作，对部队进行了突围动员，又下了只许前进、不许后退的严厉命令，制裁了动摇分子，而后率部从三眼桥、燕岩之间乘夜色悄悄步地穿过敌六七个土围子和碉堡，在雷家滩渡过一条河后，终于突出敌围，且只有省委妇女部长曾湘娥不幸牺牲外，再无伤亡。傅秋涛部突出敌围后行至爽源休息时，敌大部队又追来。追踪数十里后，大部队停下，只派 1 个营继续追击。在乎例边界之芦洞，傅秋涛等指挥部队，利用有利地形回头迎击追敌，将 1 营迫兵击溃后，率部安然返回黄金洞地区。

徐彦刚、方步舟等率领的中路、左路部队渡过麦市河后，因不见右路和

特务团过河，加之敌人以主要兵力迫击未过河的红 16 师部队，他们未遇大股敌人的追击，便在通城与崇阳交界地带等候右路和特务团。五六天后，敌军数路人马包围过来，徐彦刚遂率部队向阳新方向转移。部队进至阳新太子庙后，在下一步向何处行动的问题上徐彦刚与方步舟发生意见分歧。方步舟主张从阳新黄颡口横渡长江，取道黄梅、蕲春到大别山去；徐彦刚则认为红 16 师是湘鄂赣游击区的主力红军，不能离开湘鄂赣游击区，主张从黄颡口沿长江而下，经瑞昌码头镇，到靖安、奉新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多数指挥员赞同徐彦刚的意见。于是，部队在太子庙稍作休整后，以红 46 团组成先头部队，由徐彦刚率领，红 48 团和师机关组成后续部队，由方步舟率领，两部先后由太子庙向黄颡口开进。徐彦刚率 46 团到黄颡口后，找到一些船只，即乘船顺流而下，并拟登岸后，再由这些船返回运载师部和第 48 团。然而，当方步舟率师部和第 48 团赶至黄颡口时，船只尚未返回，追兵已近，方步舟只好率部返回太子庙，并拟经凤凰山向黄金洞靠拢。在途经凤凰山的凤凰寺时，遭敌堵击，后面敌人又挥兵追上，在敌前后夹击下，师部和第 48 团指战员虽奋勇冲杀，但终因寡不敌众，部队大部伤亡，只有方步舟、钟期光、魏平等十余人突自至大冶龙角山隐蔽起来，方步舟被认为在突围过程中指挥失误而因此降为师参谋长，尔后至 11 月，这支部队余部历经艰险，辗转返回黄金洞地区。

徐彦刚率领红 46 团从黄颡口顺江而下后，在瑞昌茅头镇码头登岸，并消灭了当地国民党一股地方武装。为了等红 48 团，徐彦刚率部在茅头镇又逗留了几日。国民党军发觉后派兵追来，徐彦刚遂率部向修水、铜鼓、奉新边界转移，转移途中，恶战不断，红 46 团损失很大。后徐彦刚率部转战到永修、靖安一带时，又陷敌包围，战斗中部队又遭很大伤亡，徐彦刚亦负伤，他遂将部队交给团政委明安楼，叮嘱其一定要把部队带回黄金洞，尔后，徐彦刚带一排人到永修县云居山养伤。9 月，徐彦刚身边的警卫人员在战斗中牺牲或失散后，徐彦刚只身一人被歹徒黄盛彬三兄弟发现，他们为向国民党军邀功请赏，用牛角斧将徐彦刚杀害。徐彦刚的牺牲，使湘鄂赣边游击区失去了一个文武双全、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对当地游击战争的开展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明安楼率领第 46 团与徐彦刚分手后，即指挥部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结果被敌分而击之而又遭损失，全团仅存六七十人由明安楼率领于 10 月返回黄金洞地区。

（三）红 16 师余部向东南行动受挫与国民党军的分区“清剿”

指挥失当，东南折兵麦市突围中，红 16 师的第 46、第 48 团兵员基本损失，全师 5000 余人只剩下 1700 余人。1935 年 11 月下旬，湘鄂赣省委待红 16 师 3 个团余部全部集中至黄金洞后，将省委驻地迁至平江、浏阳交界的连云山辜家洞。此后，湘鄂赣边省委、省军区领导人为改善斗争局面，求胜心切，于 12 月命令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黎申庚率领部队向东南方向挺进，拟与湘赣游击区建立联系。但由于对敌情掌握不确切，且不讲究战术，在敌人的碉堡封锁线内横冲直撞，结果在敌人的重兵围攻之下，部队遭重大损失。此后“经各方面动员及西北几次战斗胜利，又扩大了四五百人的实力”。

1936 年 1 月，湘鄂赣省委、省军区又令红 16 师参谋长谭凤鸣率领部队再一次向东南行动。此次行动仍蹈上次向东南行动时的覆辙，继续在敌人碉堡封锁线下左冲右突，结果再度陷入敌重兵之围，整个部队伤亡惨重，只剩下七八十人。几块较大的游击区，如鄂东南、平修铜、例宜万等又被敌人分割。湘鄂赣边的革命斗争再一次转入低潮。

国民党军的“清剿”部署在湘鄂赣边的红军武装再一次遭受挫折之时，国民党军没有忘记红 16 师东山再起的教训。1936 年 3 月，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当局召集“剿共”联席会议，把湘鄂赣边地区划分为 3 个“清剿”区，调集 11 个师、3 个省的保安团及 11 个别动队对湘鄂赣边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的分兵、分期、分区“清剿”。第 1“清剿”区，以平江、浏阳、铜鼓、修水边区为主，“清剿”重点是平江县的黄金洞、义江、芦洞、辜家洞、徐家洞、白水、胡坪、周坊、横江；浏阳县的大江洞、茆火洞、金坑、桃坪、大围山；铜鼓县的双坑、幽居；修水县的台庄等地，由罗霖指挥，配备有第 15、第 4、第 77、第 63、第 19 师及湖南的几个保安团和 7 个大队，另外还有 1 个由叛徒编成的特务队；第 2“清剿”区，重点是阳新、大冶两县交界的土峰山、大湾、小湾、龙角山、百庄园，武宁、通山交界的九宫山、三界尖、冷水坪，临湘、岳阳交界的药姑大山等地，由陈继承指挥，配备有第 40、第 30、第 35 师及 1 个纵队，还有部分地主武装；第 3“清剿”区，以万载、宜春为主，重点是万载的小源、株木桥，铜鼓的高村，宜春的慈化、桐木及修铜宜奉边的铜宫山等地，由谭道源指挥，配备有第 16、第 18、第 50 师及江西省的保安团。另外每县还有 1 个保安团和地主武装。

国民党军此次的分区“清剿”较之以往对游击区的大举围攻手段更为毒辣，除以重兵分期分区“清剿”外，还以小股部队进山埋伏、搜山，进行“进剿”；派遣叛徒、特务、便衣队，深入山区，坐山“驻剿”；利用地主武装挨户团、靖卫队挨村挨户“搜剿”。敌人打破了省与省、县与县、支点与支点之间的界限，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在“清剿”中，敌人大肆砍树烧山，以使红军武装无藏身之处；在山顶派侦察了望哨，寻找烟火，以图发现并摧毁红军武装及党政军机关的宿营地；在游击区四处设伏，捕捉共产党干部、战士；偷袭游击区党政军机关和后方兵工厂、医院；派便衣跟踪红军运输队，破坏红军粮食供给；化装成共产党方面的人员，刺探情报，试探、陷害游击区人民；乘扩红机会混入红军队伍，以策动拖枪逃跑等；大肆利用叛徒“招抚”诱降，瓦解革命队伍。总之，在“清

剿”中，敌人种种恶毒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在革命斗争处于困难的时刻，省委、省军区更感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与支持的重要，急切盼望能与党中央建立联系。实际上，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后，省委就多次派人寻找党中央，林瑞笙在途中牺牲，黎申庚、陈龙彪无功而返，只有庄构丰经过半年苦寻，于1935年11月在湘西永顺找到红2、6军团领导人任弼时等，得知党中央已转移到陕甘。庄构丰带回的任弼时给徐彦刚、傅秋涛的信及《任弼时同志在红六军团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粉碎敌人“围剿”教训的报告》、《中央关于粉碎五次“围剿”的报告提纲》，进一步增强了湘鄂赣游击区军民的斗争信念，对湘鄂赣省委制定今后的斗争方针起了较好的指导作用。1936年初，省委又派出赵德兴去陕甘找党中央，不久他在途中牺牲。此后，黎申庚等5人受命寻找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行至万载县黄茅西北之石窝时遇敌袭击牺牲。但这些没有动摇在艰苦环境中顽强地领导游击区军民的省委、省军区寻找上级党的希望，他们继续派人走出游击区，渴望得到党中央的指示。

（四）盖板洞会议与实施战略转变

红 16 师的连续受挫及国民党军的分区“清剿”导致湘鄂赣边游击区斗争形势的再一次恶化，使湘鄂赣省委、省军区领导人认识到这主要是由于自己没有及时地看到红军主力长征后，敌人仍会大举进攻游击区，大块的苏区要转变为小块的游击区，老的局面要转变为新的局面，继续采取老观念、老方法来对付敌人是不行的，在敌强我弱的现实面前，必须要实行战略转变，老的斗争方法要转变为新的斗争方法，正规战、运动战要转变为游击战，这种及时的转变，是关系着红军游击队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3 月 27 日，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黄金侗的盖板洞召开执委扩大会议，讨论部署对付敌人三省联合“清剿”的问题。会议认真总结了麦市突围的教训，对以后的行动方针达成共识，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用盘旋式兜圈子战术对付敌人的紧缩，遇强敌包围时，即向敌后进军，调动敌人，寻找战机，打击敌人，才能粉碎敌人的“清剿”，有效地保存并发展自己，巩固游击区。因此，必须转变战略，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各地独立营、游击队要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会议发出关于粉碎敌人“清剿”的第 3 号训令。为了纠正过去忽视游击运动的倾向，会议提出了创建 10 个独立营的计划，并要求广泛组织群众性的游击小组，开展游击战争。为便于领导和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会议决定进一步精简各级机关，实行军事化，将原来的省委所辖的平修铜、修铜宜奉边、浏宜万、修武崇通、湘鄂边等 5 个特委重新划为 4 个特委，即：鄂东南、修铜宜奉边、浏宜万、平修铜特委（不久，又改为东南特委、东北特委、西南特委、西北特委），并相应设立 4 个军分区，由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各县委书记兼游击队领导。省委还决定实行干部地方化，是哪个地方的干部回哪个地方去工作。这样，人地熟悉，有群众基础，易于对当地游击战争实施领导。

盖板洞会议标志着省委开始转变战略方针，正如傅秋涛所讲的：“我们被形势所逼，被动地转变，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然而，无论如何，此次会议确定的方针对湘鄂赣边游击战争的开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为了落实会议精神，省委提出把工作开展到外线去，为红军武装深入敌后打击敌人创造条件。为此，省委和各特委先后派出一批干部到万载、宜丰交界的丰顶山，宜春、萍乡边界的小洞，修铜宜奉边的龙门山，鄂东南的九宫山，湘鄂边的药姑大山等地，建立外围支撑点，加强同白区的联系，掌握敌情。还派出一批坚强的干部深入白区，秘密建立革命组织，发展党员，将在白区搜集到的情报和有关国内政治形势动态，通过地下交通员送往游击区的领导机关，极大地帮助了省委对游击战争的部署指挥。如：奉命到益阳、湘阴、长沙等地的干部就在中共湘江特委的协助下，秘密发展 380 多名党员，在长沙县铜官镇建立了 1000 多人的陶业工会组织，还建立了湘江地下游击队，打通了平浏长边区到长沙市的交通线。

省军区在司令员徐彦刚牺牲后，1936 年由严图阁继任司令员。为了贯彻盖板洞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省军区注意发展地方武装，对各特委和军分区的地方武装的组织任务、战术以及政治工作提出具体的要求。1936 年 9 月，省军区司令员严图阁、政委傅秋涛联名撰写《地方游击队的建立和战术问题》

一文，对军区、军分区、各县委建立游击队提出明确要求，论述了游击队应采取的区别正规红军的战术，对各游击队如何开展政治工作和目前存在的问题作了指示。在省委、省军区领导下，省军区和军分区迅速组织了 17 支游击队及独立营。游击队人数 30 至 50 或 50 至 100 人。省军区还动员了两三百名新兵，组建了魏平兼营长、刘玉堂兼政委的军区独立营。各游击队、独立营不断总结和摸索自己的游击战法，如出没无常，飘忽不定、大游小击、专打弱敌；敌人进山，游击队出山，向敌铁路边、公路边、大城市附近进攻；敌人集中，游击队分散，敌人分兵，游击队集中，以各个击破敌人；化装扮敌、守望队或老百姓，实施侦察、偷袭、奇袭；大敌来了，游击队就走，小敌来了，游击队就打；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设置圈套，诱敌上钩等。对敌人的“保甲联防”制，用攻心战术，争取保甲人员变“白皮红心”为红军游击队服务；对地主豪绅，只要不是罪大恶极，就不采取肉体消灭政策，而是限期送粮交款资助红军；并团结争取开明绅士为红军游击队提供情报和急需的物资等等。

湘鄂赣省委、省军区在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中，重视群众工作，坚决依靠群众，党的干部和红军武装始终与群众打成一片，同甘苦、共患难，红军游击队每次打胜仗、打土豪获得的粮食、衣物总要分一部分给当地群众；敌人强迫群众移民，党组织的秘密党员干部也跟着移民一起走，群众到哪里，就把工作做到哪里；对被敌人强迫领取“白符号”的所谓“反水”群众，理解他们的处境，区别情况，仍团结教育他们；对被敌强迫去当“守望队”的群众争取教育他们变替敌守望为替红军游击队守望。对群众的秋收实行武装保护，打击收租抢谷的地主武装，组织领导群众抗租抗债抗捐抗税。人民群众从切身利益中深切体会到共产党、红军游击队是他们的贴心人，他们不断把自己的亲人送去当红军，他们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口粮、食盐和衣物冒着生命危险送给红军游击队；他们给红军游击队送情报、作向导、抬担架，配合红军作战，在党的干部、红军战士及伤病员处于危险时，他们不惜以全家、全村的生命进行保护。在敌人残酷的“清剿”和烧杀抢掠中，游击区群众始终真心实意地支持红军，用各种办法帮助红军游击队开展工作。他们是红军游击队克服艰难困苦，顽强地坚持游击战，始终保持湘鄂赣边革命红旗不倒的后盾和保证。

（五）再次恢复红 16 师，三度深入敌后

“打到敌人屋檐下去”根据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省委、省军区在大力建立发展地方武装的同时，还以积极的军事行动，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提出“打到敌人屋檐下去”的口号。随后，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傅秋涛、省军区司令员严图阁都各率一部分部队离开省委、省军区机关驻地，向外开展游击战争。傅秋涛率领省军区独立营一部进至平江的芦洞、白水、义口、周坊一带进行游击活动，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展游击队。接着，又分兵在平江、修水、铜鼓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在这几县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把修水的靖林至铜鼓的山溪拗、幽居、胆坑、虎拗一带数十座敌人碉堡悉数摧毁。严图阁则率部分兵力进至长沙、醴陵一带活动，尔后转战至万载的上坪，宜丰的侗上、直源、港口、蕉溪一带，将当地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靖卫队消灭。接着，又挥兵向铜鼓、修水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各特委、军分区也积极组织自己的独立营、游击队同“清剿”的敌人周旋，伺机打击敌人。东北军分区独立营和修铜宜奉县游击队一起，打击进犯的敌人，粉碎了敌人企图在修铜宜奉一带建立“模范清剿区”的计划。东北军分区还组成有五六十人的赣东北游击大队，向南浔铁路、长江流域活动，调动牵制敌人。东南特委、军分区领导在万载金钟湖一带活动的游击队化整为零为数个游击小组，破坏株萍铁路，以阻塞敌人的军事运输线，还化装袭击座落在万载株潭、黄茅一带的敌碉堡群，打通通往丰顶山一带的交通线。

遍地开花的游击战给“清剿”敌以很大的威胁。当敌人以重兵扑来时，游击队则化整为零，分成小股散去；敌人分兵来寻时，游击队又化零为整抓住弱敌而歼灭之。活动在各地的红军游击队，除适时集中打击“清剿”之敌外，还组织游击小组分散配合地方干部，深入发动群众，领导群众开展抗租抗债，反抽了纳税、反移民并村和保甲联防的斗争。在游击战争中，全省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都十分注意将游击区的中心区建在地形险要、群众基础较好的山区。因而，湘东北的黄金洞、连云山、大围山、幕阜山；鄂东南的九宫山、七峰山；湘鄂边的大药姑山；赣西北的黄龙山、丰顶山、龙门山等，都成了游击区的中心区域，而省委主要活动在有纵横交错的崇山峻岭的平浏地区，这里也就成为游击区的中心。

饥寒交迫，矢志不移由于敌人不仅在军事上“清剿”，在经济上也实行严密封锁和控制政策，加之游击区内由于战争频繁，人烟稀少，田地荒芜贫瘠，游击区的党政军民吃穿住异常困难。如 1936 年问，领导机关和部队有半年时间几乎没有吃上一顿饱饭，有时候 200 人仅有两升米，只好煮米汤喝，常以野菜、山果、竹笋充饥。没有油，更苦的是没盐，只好用山上的五倍子花泡出的有点咸味的水当盐吃。有时即使搞到米，也难吃上熟饭、热饭，因为白天的烟、夜间的火光都能使敌人发现红军的踪迹；穿的是破烂衣服和草鞋；山岩下、石洞里当褥子，茅草当褥子，树叶当被子；缺弹药，缺药品。即使这样，他们仍对革命矢志不移，坚定的信念产生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频繁的战斗间隙，坚持学文化、学革命理论。特别是那些女干部、女战士，虽然她们遇到的困难比男同志更多，但她们和男同志一样，在恶劣的环境中行军、打仗，做群众工作。

深入敌后 1936 年 6 月，“两广事变”发生后，“清剿”湘鄂赣边游击区的国民党军主力部队调往他处，留在游击区的大部分是保安团队，兵力薄弱，

省委抓住这一时机，一方面发表了《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对两广出师抗日讨蒋宣言》、《湘鄂赣军区对两广出师抗日讨蒋宣言》，表示支持两广军队的抗日主张；一方面准备采取进攻姿态打击敌人，决定以省军区警卫营为基础，并从各机关抽调少数人，组成以方步舟为队长、刘玉堂为政委的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

7月初，方步舟、刘玉堂率领游击队从省委、省军区驻地辜家洞出发，深入敌后作战。离开辜家洞不久，游击队即在连云山南麓初战获胜，歼敌湖南保安第4团1个加强连，缴枪70余支，极大鼓舞了部队士气。接着，游击队进军万载，在黄茅、书堂一线，击溃江西保安团2个连。而后，游击队经小源转回浏阳东门和官渡一带，接着取道铜鼓的排埠、宜丰的潭山，进抵奉新的罗坊，突然袭击罗坊镇守敌保安队，歼其30余人。然后，转兵南经华林山，于中旬进抵敌后高安之灰埠、黄岗岭一带。侦察得知灰埠镇守敌只有1个20余人的保安队，红军直扑灰埠，顺利全歼守敌，筹得一些款项、药品、布匹等物资，并在此作短暂停留。尔后，游击队向处于白区纵深的分宜进发。进抵分宜城下已是半夜，游击队利用黑夜，用稻草捆填入城外的护城河，向守敌发起攻击，因守敌不多，又未料到红军能进抵白区攻城，守备松懈，游击队很快攻入城内，鉴于分宜离驻有敌较多兵力的宜春太近，游击队在缴获一大批物资后，在天大亮前撤出该城，向西顺利通过宜春、万载之间的公路，进入游击区。攻下分宜，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游击区军民的斗志。此战后，敌人由万载向潭埠调兵向游击队追来。游击队进抵潭埠南面的乱石岭后，决定在此以逸待劳，伏击敌人。当敌约1个营追来时，红军以小股部队将敌引诱进埋伏圈，并很快将敌营部和1连歼灭，又经1小时激战，将余敌击溃。战后半小时，又有1营敌人从潭埠逼近，红军再度设伏乱石岭，并从三面向进入伏击圈的敌人猛攻，不到1小时，红军将该营击溃，并乘胜追歼其七八里。两度设伏，红军计毙伤俘敌200余人，缴枪200余支，并于战后第二天即返回辜家洞休整。

重建红16师再度深入敌后湘鄂赣军区直属的红军游击队第一次深入敌后并连续取得胜利的同时，亦十分注重发展自己。由于沿途贫苦群众踊跃参加红军，队伍迅速扩大。于是省委、省军区于7月底决定再次重建红16师。重建的16师没设团的编制，只辖3个营和1个侦察大队，另有师部直属的1个重机枪连和1个通信排。全师约700余人。方步舟任师长，刘玉堂任政委，谭凤鸣任参谋长，黄加高任政治部主任。

8月中旬，重新组成的红16师从辜家洞出发，向铜鼓方向挺进，实施第二次深入敌后的游击行动。部队行至离铜鼓十几里的石桥附近时，与敌保安第9团1个连遭遇，走在前面身着便衣的红16师侦察大队先发制人，冲入敌群，很快将敌全歼。从俘虏口中得知，在铜鼓城内驻有敌保安9团2个营和1个重机枪连，在附近黄岗口还驻有该团1个营。该团是江西境内敌战斗力较强的1个团，红16师决定避开该敌，化装袭击敌设防较弱的大垅镇。进入镇子后，消灭了正在换防的1个班敌人。镇上5座碉堡发现红军已进占镇子，拼命射击，红16师考虑到铜鼓保安9团可能尾追，在没收了镇上地主豪绅的一些财物后，撤离该镇。

果然，保安9团2个营在红16师刚刚撤离大垅，即进入大垅，并继续尾追红16师。红16师决定在运动中寻找有利地形，消灭尾追之敌。当部队进至铜鼓、修水、武宁交界的桔家桥时，师部鉴于该地有利于红军设伏，遂将

部队隐蔽在一座森林茂密的山脚下，并以少部兵力诱敌前进，当敌迫近时，红军主力向敌冲去，短兵相接后，红军很快将敌击垮。此战，红 16 师歼敌团部和 1 个营，缴长短枪 100 余支，重机枪 2 挺。

战后，红 16 师挥兵南下，经靖安西头、宜丰的大田村到达奉新的东坑地区。该地南临越山、北靠仰山，有利于红军活动，且群众基础较好，是奉靖宜中心县委所在地。红 16 师在此休整了两天，师部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对敌情进行了分析，认为经过一系列的战斗，敌人会了解红 16 师的实力，定会派正规部队进行尾追，要做好打大仗的准备。

9 月，敌正规部队第 36 旅 1 个团约 2000 余人，从宜丰方向追来。当敌进到离东坑三四十里的大田时，红 16 师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先向观下前进，造成已撤离东坑之势。行至观下，全师南行翻过越山，尔后向西，乘夜秘密回到大田通往东坑的必经之地拗头，利用这里山高路狭，林深草密的地形设下埋伏。将 1 营、侦察大队布置在第一线，2 营、3 营布置在第二线，并向观下、罗坊、大田村方向派出侦察员，监视敌情。当敌前卫营刚刚通过红军伏击阵地，敌团部和直属队走近时，红军突然出击，将敌拦腰切成两段，在奉靖宜县红军游击队配合下，经半天激战，毙敌团长、参谋长以下官兵 600 余人，俘敌 600 余人，缴长短枪 600 余支，重机枪 3 挺，红军伤亡 100 余人。

战后第二天，红 16 师拟由观下至西头，取道沙窝里、黄沙岗向平创游击区回返，行至观下时，遭到昨日伏击中脱逃的敌前卫营阻击。由于刚刚打了胜仗，部分同志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思想，不经组织即向占据有利地形并已构筑工事的敌阵地强攻，结果，红军伤亡几十人，师政治部主任黄加高、1 营营长石祥富在战斗中牺牲。部队只好撤出战斗，经靖安，到武宁，转阳新、通山至大幕山休整。在 1 个多月的休整期间，省委于 10 月对红 16 师领导人进行调整，由明安楼接替负伤离队休养的刘玉堂任师政委，由王义勋代理师政治部主任（不久方天宝任师政治部主任），赵改中任师参谋长。此时，全师又发展至 1000 余人，恢复了第 46、第 48 两个团的番号，每团辖 3 个连，同时又增编了 1 个特务营。赵改中兼第 46 团团团长、何平波任团政委；王清云任第 48 团团团长、方天宝兼团政委，吴光明任特务营营长。

第三次出击敌后 11 月，天气转冷，为解决部队的冬装，红 16 师决定第三次出击敌后，向瑞昌、阳新一带行动。当部队经修水的渣津、三都，逼近武宁的澧溪镇时，得知该镇驻有敌一支海军陆战队，为扩大红军影响，红 16 师决定袭击该镇。经战斗，红 16 师消灭了敌海军陆战队几十人，占领澧溪。尔后，部队进至阳新龙港山区作短暂休息后，经柯乐源、红花园，奔袭瑞昌县城。首先，红 16 师侦察员化装挑着柴担粪担混进城人群中，当靠近城门哨兵时，迅速将其缴械。尔后全师分两路冲入城中，将守城的敌 1 个连封锁在城角的碉堡内，然后打开监狱，救出 100 多个地方革命干部和基本群众。然后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抗日主张，公审枪毙了作恶多端的敌县长宋友梅。在没收了豪绅和好商的一批布匹、棉花、药品及银元后，部队迅速撤出瑞昌，经半边山、长乐源，进抵七峰山的罗口。在这里，群众纷纷要求红军拔除驻有地主武装 100 多人的罗华口敌大碉堡。这支地主武装在“清剿”中猖狂向游击区人民反攻倒算，屠杀红军和革命群众。红军决定为民除害。鉴于敌碉堡牢固，周围有一人多深的壕沟及鹿砦，遂决定迫近敌碉堡，实施火攻。在群众的配合下，红 16 师用边挖边铺板盖土的办法，挖了一条 S 型的坑道，通过坑道靠近敌碉堡堆柴放火。在凶猛的火势中，敌纷纷跳出碉堡逃

命，结果或摔伤或烧死，侥幸活下来的便成了俘虏。后来，部队向大冶刘仁八方向行动中，一路上采用火攻罗华口敌碉堡的方法，摧毁了沿途许多敌碉堡，有时一天即烧掉敌堡垒 20 多个。11 月底，红 16 师由药姑大山转至通城麦市一带活动。

在红 16 师深入敌后作战的同时，各军分区的地方游击队、独立营也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广泛开展游击活动，积极配合红 16 师作战，不断取得胜利。全游击区仅在 10 月至 11 月的 40 天内，就击溃敌人 8 个团，仅在鄂东南地区就摧毁敌碉堡 100 多个。游击区再一次度过艰难的岁月，改变了麦市突围后的被动局面，以平浏为中心的湘鄂赣边游击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红 16 师和各地区独立营、游击队亦更加壮大。12 月，省军区从西南、东南各县抽调部分地方武装，加上军区直属机关一些人员，组成了省军区独立团，方笑桃任团长、吕建章任政委。

（六）三界尖会师

1936年12月中旬，第三次深入敌后的红16师返回通城地区后，从群众口中得知通城、崇阳一带敌兵力空虚，方步舟遂派人去通城侦察，去人带回了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的“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方步舟当即写信给省委书记傅秋涛，建议省委乘机出山，前往鄂东南与红16师会合，以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接到方步舟信后，傅秋涛即召开省委会议，讨论省委是否前往鄂东南与红16师会合问题。与会的涂正坤、刘玉堂、谭启龙等鉴于以往大集中曾招致的损失，认为省委暂时不应出山，部队应分散转向各地发展小规模游击战，以达到保存自己、恢复和巩固游击区的目的。但是，傅秋涛等坚决主张出山与红16师会合。会议经过争论，最后决定省委出山，前往鄂东南。

然而，当省委决定要前往与红16师会合时，湘鄂赣游击区的形势又风云突变。原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虽被迫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则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他们在北方继续与中共中央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在南方则集中优势兵力“清剿”各游击区，企图在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以前，尽快消灭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在湘鄂赣边游击区，国民党军又集中几个师的兵力，以刘兴任湘鄂赣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对该游击区实行进一步“清剿”。12月25日，刘兴颁布了新的“清剿”计划，将湘鄂赣边区划分4个“清剿”区：第1“清剿”区，在万载、宜丰、观前、安峰街、界排埠、三界、全丰、温塘、小源、黄茅之线内，由朱耀华指挥第18师负责“清剿”；第2“清剿”区，在宜丰、奉新、靖安、著溪、柴杂贩、太平山、界牌铺、安峰街、观前之线内，由熊滨指挥江西保安第3团负责“清剿”；第3“清剿”区，在界牌铺、洋港、阳新、姜桥市、金牛、咸宁、蒲圻、羊楼司、保安关、全丰、三界尖之线内，由猷国才指挥新编第8师、第121师负责“清剿”；第4“清剿”区，在黄茅、温塘、全丰、保安关、平江城、浏阳城、大瑶铺之线内，由罗树甲指挥湖南保安第4团负责“清剿”。对于国民党军新的“清剿”部署，深居连云山辜家洞的湘鄂赣省委尚无所知，因而仍按原计划，由傅秋涛率省级机关和军区独立团前往鄂东南去会合红16师。

对于国民党军重新调集重兵“清剿”湘鄂赣游击区，方步舟率领的红16师亦全然不晓。为同省委会师，全师转战于鄂东南的大冶、鄂城、崇阳、咸宁、通山之间。1937年1月，方步舟率红16师由通城白虎桥转往大幕山时，行至通山梅县与新调来的国民党军新8师1个团遭遇。交战中，由于敌强我弱，红16师受到不少损失，遂撤出战斗，向湘鄂边行动，拟返回平创地区找省委。

2月，湘鄂赣军区司令员严图阁因战伤加肺病，无条件医治，在平江逝世，这对面临严峻形势的湘鄂赣边游击区无疑又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3月14日，傅秋涛率领的湘鄂赣省委机关、省军区独立团和方步舟率领的红16师在通城与崇阳交界的三界尖会师。尔后，傅秋涛主持召开会议，对方步舟进行批评，并以方对梅田等战斗指挥不力为由，撤销其红16师师长职务并开除党籍。同时，省委作出了《中共湘鄂赣省委为加速扩大军团在红五月底作一个步骤总结的指示》，要求各军分区、各县广泛开展扩红运动，开展外线猛烈的游击运动，加速粉碎敌人新的进攻。3月21日，方步舟只身脱

离红 16 师，5 天后在龙港叛变投敌。此后，冯育云任红 16 师师长。

方步舟叛变后，省委没有及时改变方步舟知道的原定的行军路线及目的地，傅秋涛、冯育云等率领部队仍按原计划行动，即拟经过通城到平江，而后西行经新市街、过平江河，回黄金侗。而国民党军将 4 个区的“清剿”部队加上新调回的第 50 师，组成 6 支“追剿”部队，追击红 16 师和各地红军地方游击队。当红 16 师行至崇阳、通城交界地带时，遭到国民党军的袭击。红 16 师虽全力抗击，仍受到很大损失。3 月底，红 16 师转战到铜鼓虎坳时，又遭敌 2 个营的袭击，部队损失严重，随部队行动的省军区参谋长魏平亦在战斗中牺牲。此战后，傅秋涛率红 16 师余部 200 余人返回辜家洞休整。

4 月，以傅秋涛为主席、邓洪和刘玉堂为副主席的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为号召全游击区军民粉碎敌人新的“清剿”，发布了《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对动员粉碎敌人新进攻战斗要令》。指示红军游击队加强自己的力量，采取远殖行动，深入敌后方打击敌人；各地方游击队应积极配合红军主力行动，机警灵活地到敌人后方捣毁敌空虚的碉堡，钳制敌人的行动；要动员武装游击区的男女老幼起来保卫游击区，以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当月，红 16 师向修、武、崇、通一带游击，沿途经过扩红，部队又增加到了 400 余人。可是不久，由于敌我众寡悬殊，红 16 师在当月于铜鼓胆坑和宜丰同安两度与敌交战中伤亡很重，全师再次减员至 200 余人。月底，红 16 师由师长冯育云、政委明安楼率领在与敌人周旋中，先在华林山遭敌袭击，继而在潭山又与强敌打了个遭遇战，师参谋长赵改中牺牲，师长冯育云叛变投敌，政委明安楼率余部百余人几经周折，与东北特委及军分区会合。5 月初，东北军分区参谋长吴詠湘代理红 16 师参谋长，协助政委明安楼指挥这支部队绕道修、武、崇、通转移到河西咏生县，与省军区独立团合并，尔后返回辜家洞。

外患内忧是红 16 师再度受挫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国民党军重兵“清剿”的情况下，游击区一些重要军政干部的叛变，对革命斗争的危害更大，继方步舟、冯育云叛变后，这一期间红 16 师政治部主任方天宝、东北特委书记赵龙、军北军分区司令员聂海如、政治部主任樊哲军（叛变未遂被枪决）、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张玉清等先后叛变。同时，军事指挥员的缺乏，打败仗时缺乏及时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及消极避战，没有收容工作等等，也是几次作战失利、部队受挫的重要原因。这一次挫折，不仅使整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仅余 500 余人，200 余支枪了，省委和地区特委、县委等地方干部也损失很大，由千余人损失到 400 余人，妇女干部由几百人只剩几个人，各级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红 16 师的建制从此再没有恢复，游击区的斗争形势又一次恶化。但是，挫折和失利并没有使湘鄂赣省委、省军区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低头，他们仍怀着对革命坚贞不渝的忠诚和必胜的信念，顽强地坚持斗争。不少在战斗中与部队失散的红 16 师指战员和伤病员，就在各地发动群众建立武装，仍以红 16 师的名义开展活动，一直坚持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

四、实现合作抗日，奔赴抗日前线

（一）申明抗日救国主张

1937年上半年，当红16师又一次受挫，湘鄂赣边游击区军民仍顽强地坚持游击战争时，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动日趋升级，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一步高涨，国共两党的合作谈判也正在进行着。此时，湘鄂赣省委虽然没有接到党中央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但从国民党的报纸上陆续了解到一些中共中央对时局的主张，初步了解了中共中央不计前嫌，争取实现国共两党停战议和、携手抗日的主张。省委对这些消息进行分析，认为经过共产党的努力，有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可能。于是，省委在5月间，多次开会研究局势，讨论湘鄂赣游击区下一步的斗争方针，最后决定，一面派人向党中央请示，一面向社会申明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抗日主张，并准备与湘鄂赣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

为了适应合作抗日的需要，省委于5月10日成立了“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军事委员会”，傅秋涛任主席，徐正坤、邓洪、刘玉堂、谭启龙、张玉清、明安楼、郑宝、钟期光为委员（后张玉清叛变、郑宝被捕后，增补江渭清、谢乾为委员），统一领导湘鄂赣全省人民和一切抗日武装的军事行动。5月18日，中共湘鄂赣省委发布了《中共湘鄂赣省委为挽救中国只有抗日告民众书》，指出：“共产党湘鄂赣省委要在一切服从抗日的口号下，拥护本党中央之主张，再三唤醒我全省人民，不分党派、阶级、信仰、性别、职业、宗教，各界、各军联合起来，组织救国联合会，中国人不应打中国人，集中国力、团结一致，实行共同奔赴抗日。如果能遵守本党主张，并欢迎在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指导下的人民抗日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抗日红军订立作战协定。”当月，省苏维埃政府又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对全体人民及一切白军武装部队宣言》，要求白军立即停止内战，联合红军，集中武力，一致抗日，收回失地；希望各党各派各界弃嫌合作，集中全国人力财力共同救国。

6月，省委派罗其南、李楚民赴延安寻找党中央，请示和汇报工作。7月，省委鉴于以往数次派人寻找党中央未果，又派出邓洪、李明秋赴延安寻找中共中央。结果，他们于7月上、中旬先后到达延安，见到了毛泽东、董必武、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他们向党中央汇报了湘鄂赣边省委、省军区领导游击区军民坚持游击战争的情况，请示了有关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问题，并要求中央派一批军政干部去加强湘鄂赣边游击区的领导力量。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湘鄂赣省委和红16师坚持游击战争的业绩作了充分肯定，并对游击区怎样同国民党谈判、如何建立统一战线和发展队伍等问题作了指示。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一方面要搞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在搞统一战线的过程中，要防止敌人收买、分化瓦解我们的队伍。8月4日，邓洪、罗其南、李楚民、李明秋与党中央派回湘鄂赣边组编抗日游击队的张正坤、胡荣等，带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返湘鄂赣边。8月23日，邓洪等回到平江嘉义镇。他们向省委汇报了延安的情况和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省委还专门安排了会议，由从延安回来的同志向省委机关和附近的干部作了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的报告。

游击区的军民经过多年与国民党你死我活的斗争，特别是经过三年艰苦异常的游击战争，很多人对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思

想上抵触很大；加上叛徒大肆造谣，散布红军已“投降”，将被“收编”等谎言，使游击区一些军民一时难辨真假，甚至发生误解。因此，省委先后召开各种会议，反复进行宣传解释。5月27日，省苏维埃政府召开主席团会议，发布了《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关于执行策略方法的决定》，以清除那种以为转变策略是向敌人屈膝求怜的错误思想。对于敌人的造谣破坏，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布告，揭穿其阴谋，对个别破坏停战议和与挑拨内战者，则予以严厉镇压。经过省委的努力工作，游击区军民逐渐统一了认识，积极拥护合作抗日的政策。

为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于8月20日发布了《为和平合作联合宣言》。翌日，省委又发布《中共湘鄂赣省委为国共和平合作的政治决议》。指出：“目前国内中日矛盾是主要的，阶级矛盾是次要的”；“中国需要和平合作，一致抗日，实现民主政治，保障抗日的彻底胜利”；“目前党的中心口号是拥护国共重新合作，一致御敌救亡，一切服从抗日，为和平统一而奋斗”。这些和平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对促进湘鄂赣边国共两党两军停战议和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文件中提出的，只要国共两党停战合作，一致抗日，共产党就可“停止阶级斗争”的口号，则是违反了客观实际，是不正确的。后经中央指出，省委及时纠正了这个口号。

（二）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谈成功

湘鄂赣省委在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及社会各界申明自己为民族利益而不计前嫌，愿意停战议和的同时，针对国民党军第50师等部仍不断进攻游击区，拟通过军事手段肃清该区红军武装的情况。强调在积极准备进行和谈工作的时候，部队亦应随时准备应战。并告诫各地游击队和地方干部要提高警惕，没有接到省委的亲笔信，不要轻易集中，不要中敌人诡计。省委还要求各地积极扩大红军，动员老兵归队，并派人率便衣队深入到白区的湘阴、岳阳附近活动，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以造声势。根据省委的指示，平修铜、修铜宜奉、浏宜万、鄂东南、修武崇通等地的党组织，都加紧进行了抗日宣传，把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宣言文告、标语传单散发到游击区和白区的城镇乡村，分发给当地各界爱国人士、民主人士，号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号召进攻游击区的国民党军停止内战。在国内抗日高潮迭起及共产党造成的强大政治攻势形势下，湘鄂赣边国民党地方当局被迫停止进攻游击区，寻求与共产党进行和谈。但是，在谈判中，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立场是收编红军武装的企图多，合作诚意少。谈判中，不是降低代表规格，就是拒绝合作条件，或以武力相威胁，企图迫使共产党方面接受他们苛刻的条件，谈判桌上表现了复杂和尖锐的斗争。

为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湘鄂赣省委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合作，其条件是：（1）划湘鄂赣游击区为特区；（2）湘鄂赣红军改为抗日军；（3）释放所有被捕的革命同志；（4）发给经费。另一个方案是停战，其条件是：（1）撤退对边区进攻的部队，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2）把平江县的嘉义市让出来给红军游击队，便于与武汉行营谈判；（3）我方集中部队时要通行无阻，不得逮捕和杀害我方的人员；（4）发给经费；（5）停止诱降行为，如叛徒来“招抚”，就将其正法。

8月11日，国民党方面派了两个连长到平江县义口找红军游击队谈判，省委予以拒绝。指出这个谈判是一件大事，只能同国民党军武汉行营谈判。13日，省委派宣传部长黄耀南前往平江献钟（今献冲），与武汉行营派来的两位高参文镇藩、罗世忠进行初步接洽。经商谈，双方同意18日在义口的陈家大屋正式谈判。正式谈判如期举行，国民党方面参加者有文、罗两位高参及第50师的1个副团长，湘鄂赣省委方面参加者有黄耀南等人。谈判中，湘鄂赣省委方面的代表提出了自己的4项合作条件和5项停战条件，经商谈，国民党方面接受了停战条件，初次谈判获得了进展，双方并约定22日在平江嘉义镇继续谈判。

22日，在平江嘉义镇关帝庙继续进行谈判，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为武汉行营的两位高参、第50师旅长朱刚伟、平江县县长夏正尤和县党部姓何的委员；湘鄂赣省委方面的代表为傅秋涛、涂正坤、刘玉堂、钟期光等。为了防止意外起见，红军部队在外线布置了警戒，作好了应战准备。谈判过程中，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开口闭口强调所谓“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一个主义（三民主义）”，共产党方面代表傅秋涛等予以严正驳斥。这次谈判只解决了一些非实质性的问题，双方同意其余问题留待下次谈判解决。

8月26日，傅秋涛、涂正坤、刘玉堂、钟期光等人如约赴浏阳县城，在国民党军第50师师部与该师师长岳森进行谈判。经过针锋相对的争论后，达

成初步协议：（1）释放在押的政治犯；（2）在浏阳建立红军办事处；（3）红军部队集中，番号改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对于划定特区、部队驻扎地点、改编后的红军经费问题，因岳森无权定夺，双方商定由湘鄂赣省委派代表赴武汉行营继续谈判解决。

8月底，湘鄂赣省委派刘玉堂、黄耀南前往武汉，与国民党武汉行营代表作进一步的谈判，并正式签订了和平合作协议。确定武汉行营下令停止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划平江县的长寿、嘉义两地为红军游击队集合改编的地点，并发给给养，承认红军游击队改名为湘鄂赣“抗日军第1游击支队”。

在湘鄂赣省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同时，游击区的东北特委和西北特委在无法取得省委指示的情况下，也先后派出代表，与国民党军南昌行营和武汉行营进行了接触和谈判。西北特委书记江渭清在游击队驻地及湖北通城、武汉与国民党岳阳警备军、武汉行营、通城县政府等代表先后三次接触和谈判；东北特委宣传部长曾金生、游击大队政委刘珍吾和省委“集中专员”吴泳湘在铜鼓县带溪镇等地与国民党南昌行营代表熊式平先后进行了三次谈判。经过谈判桌上的斗争，东北、西北两个特委就双方停战、军需供给、游击队下山集中改编的地点等问题与南昌行营和武汉行营达成协定。

湘鄂赣边国共两党的和谈成功，标志着这一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是，湘鄂赣省委由于对党的政策了解得不够，在与国民党和谈中也产生了一些失误和错误，如允许国民党军在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抗日军第1游击支队”中安插副司令、参谋长、副官主任、军需主任、副官等6人。并且防区有一部分与保安团混驻一地。刘玉堂、黄耀南先后用电报和书信将湘鄂赣边国共谈判的情况向党中央做了汇报。党中央对湘鄂赣省委与国民党方面签订的协议非常重视，周恩来、秦邦宪等及时写信给湘鄂赣省委。9月中旬，毛泽东亲自致电驻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董必武，指出了湘鄂赣省委在谈判中存在错误，指出：“请董老到鄂后，立令湘鄂赣代表回去，由傅秋涛换任新代表，否认旧谈判一切不利条件，重新提出有利条件”，并要求坚持“部队包办，国民党不得插一个人”。“一定防区，此防区背山地，有险可守，不与国民党军队民团混杂，不争移驻大地方”。湘鄂赣省委按中央的指示，在董必武直接指导下，及时纠正了谈判中出现的失误，对国民党军派来的人，或用下层群众反对的态度予以驱逐；或将他们束之高阁般地孤立起来；或用各种办法迫其辞职，最后一个不剩地让他们离开了游击支队。

（三）嘉义镇集中，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

湘鄂赣边国共停战议和的协议签署后，驻守和平江嘉义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撤走。1937年9月15日，“抗日军第1游击支队”以“快邮代电”的形式，向社会宣告成立，指出该游击支队是由湘鄂赣边所有红军改编而成，现部队正在集结，表示：游击支队将在抗日场合中誓以百折不挠之民族精神，“效命疆场，歼灭日寇，保卫华中，收回失地，复兴中国，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下旬，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机关陆续迁至嘉义镇，中共中央派往湘鄂赣边加强领导工作的李涛、罗梓铭也抵达这里。尔后，省委在嘉义万寿宫召开有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等领导人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做了几项重要决定：一是将省委改为中共湘鄂赣特委，直属中共长江局领导，特委书记涂正坤，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罗梓铭，宣传部长骆奇勋，保卫部长谢乾，妇女部长冯杏娥，青年部长谭启龙（后为罗其南），民运部长黄耀南，傅秋涛、邓洪为特委常委；二是整理巩固扩大各地武装，派干部到各县动员群众参军；三是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派李辉到宜春慈化、罗益成到例阳、谭启龙到平江、邱炳到通城、李成铁到修水去成立通讯处或办事处，做为共产党在当地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机关，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宣传抗日的方针、政策，交涉释放我方被捕人员等事宜。

为贯彻万寿宫会议精神，明安楼、张藩、吴湘等人奉特委指示到各地去集中扩编游击队。在各地游击队的扩军整编中，遇到了一些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阻碍，外部的如一些地主豪绅、反动分子的造谣惑众和暗中阻挠破坏；内部的由于有些干部不了解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而对游击队的集中改编有抵触行为，如赣北游击队队长竟把省委派来的红16师政委明安楼和平修铜中心县委书记林海清作为叛徒误杀。但在湘鄂赣特委领导下，各地党组织终于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扩军任务，如吴湘、张藩等率领的东北军分区游击队由三四十人扩大到300多人，并编为红军抗日游击队第1支队第9大队；江渭清等领导的西北军分区游击队也新扩充了200人。10月至11月，经过扩大补充的各军分区和各县游击队陆续到达嘉义镇集中，全体干部、战士约有900余人。经过整训，各游击队集中后，统一编入“抗日军第1游击支队”，傅秋涛任支队司令员，刘玉堂任副司令员，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支队下辖3个大队，第1大队主要由省军区直接领导的红军武装和罗益成等率领的东南军分区游击队组成，第2大队主要由吴咏湘、张藩率领的东北军分区第9大队组成，第3大队主要由江渭清等人率领的西北军分区游击队组成。第1大队大队长熊应堂、教导员汪克明；第2大队大队长吴咏湘、教导员王义勋，第3大队大队长赵勤、教导员汪其祥。

12月，傅秋涛受湘鄂赣特委委派赴武汉，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叶挺、项英等领导同志，向他们汇报了湘鄂赣边游击区的工作，并请示了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如何改编等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将该部编入新四军。

1938年1月，抗日军第1游击支队在嘉义奉命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陈毅任支队司令员，傅秋涛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1团团长，张正坤（后江渭清）任副团长，王怀生任团参谋长，钟期光任团政治处主任。下辖3个营，第1营营长熊应堂、教导员魏天禄，第2营营长吴咏湘、教导员汪克明，第3营营长丁麟章、教导员张藩。部队此时已扩大至1100余人。当月，在

嘉义设立了以黄耀南为主任的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留守处。

2月10日，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从平江嘉义出发，向皖南抗日前线挺进。3月初到达安徽歙县潜口。

1938年1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听了傅秋涛关于湘鄂赣边游击区三年游击战争中党和军事工作的报告以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对鄂豫皖、鄂豫边、湘鄂赣三区目前党的工作决议草案》中指出：“湘鄂赣、鄂豫皖、鄂豫边三区的同志在劳苦群众积极帮助之下，数年来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完成了党中央给予的任务。”

以陈寿昌、徐彦刚、傅秋涛、严图阁等组成的湘鄂赣边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无比坚强，不怕失败和挫折，在逆境中不气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正确的行动方针，不断提高斗争艺术。这是湘鄂赣边游击区取得胜利的決定因素。此外，红16师等革命武装的英勇奋斗，广大人民群众舍身忘死的支援与奉献，无疑也是湘鄂赣边三年游击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原因。

第十二章 湘赣边游击区

湘赣边游击区，位于湘赣两省交界、延绵数百里的罗霄山脉中北段，包括江西省的安福、莲花、永新、宁冈、遂川、万安、泰和、吉安、萍乡、分宜、新余和湖南省的酃县、茶陵、攸县、醴陵等县。境内拥有武功山、大平山、柑子山、棋盘山、九陇山、铁镜山、五里山、陈山、杨梅山等数十座大小山峰。其中心区域武功山，横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整个武功山区方圆约有400公里，地势险峻，有利于红军游击队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

湘赣边游击区，原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的一块老苏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深厚的党和群众工作的基础。早在1927年秋，毛泽东就在湘赣边界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并率部来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尔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4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留守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和地方武装继续开展武装斗争，粉碎国民党军的“会剿”，建立了以永新为中心的宁冈、莲花、上犹、崇义等十几个县的革命政权，形成湘赣革命根据地，部队也得到了扩大，成立了红8军。1931年，中共中央派王首道等赴湘赣边，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创建了湘赣苏区。湘赣苏区全盛时期辖有20多个县，拥有赣江以西、袁水以南、大庾（今大余）以北、粤汉铁路以东的广大地区，成为当时中央苏区的重要战略侧翼。1933年6月，湘赣苏区红军与湘鄂赣苏区红军一部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成为主力红军之一。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湘赣苏区是中央苏区的辅助方向，在钳制与吸引敌人方面，湘赣苏区相当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是，湘赣苏区本身紧缩了，敌人加紧对湘赣苏区的封锁与包围，特别是加强其西边的封锁与包围，企图阻止红军力量向西发展。在此情况下，红6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的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资的供给也将发生很大的困难，红军及苏区的扩大必将受到很大的限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于1934年7月23日发出了关于红6军团转移湖南中部创立新苏区，湘赣军区留下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

1934年8月，根据中央“7.23”训令，红6军团奉命撤离湘赣苏区，突围西征。留在苏区的武装，即在新组建的中共湘赣省委（后为临时省委）和湘赣军区领导下，紧紧依靠边区人民，历经艰难险阻，顽强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34年8月至1935年6月，红军游击队反“清剿”斗争遭受严重挫折；1935年7月至1937年9月，游击战争大发展；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游击队下山改编，开赴抗日前线。

湘赣边的三年游击战争，有效地钳制和打击了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保存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骨干，保卫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在湘赣边界的伟大革命成果，在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一、红 6 军团西征后湘赣边的形势

（一）“7.23”训令与红6军团奉命转移

1934年7月，鉴于第五次反“围剿”后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的斗争形势，为了给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探索战略转移路线，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于7月23日发布训令。指示红6军团及红军学校等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区，并沟通与红2军团（当时称红3军）的联系。决定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组成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领导红6军团的行动；湘赣军区所属各独立团、游击队，留在现有苏区内，继续开展游击战争，捍卫苏区；原中共湘赣省委常委陈洪时留任省委书记，领导湘赣边区党和军队工作。

7月31日，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湘赣军区司令员王震就执行“7.23”训令情况复电报告中革军委：确定湘赣省委常委由陈洪时、旷光明、谭余保、姚原德（未到任）、旷金媛、王用济、张云一（即张云逸，未到任）组成。

8月7日，红6军团9700余人，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率领下，由遂川县的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从湘赣边根据地南线的衙前、五斗江之间突围西征，实行战略转移。12日，红6军团在湖南省桂东县寨前圩召开西征誓师大会，正式宣布红6军团和军政委员会的成立及其领导人员名单。任弼时为军政委员会主席，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

留在湘赣苏区的武装，即在新组成的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领导下，就地开展游击战争。

（二）红6军团西征后湘赣边敌我态势

1934年8月，红6军团离开湘赣苏区之后，中共湘赣省委即在永新牛田召开扩大会议，着手建立、健全湘赣苏区党政军领导机构。宣布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7月23日训令中指定的省委书记以及任弼时、王震7月31日给中革军委报告中确定的省委常委名单，增补彭辉明为省委常委。会上还作了工作分工：陈洪时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谭余保为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湘赣省苏维埃（以下简称省苏）政府主席，彭辉明为军区司令员。此外，还有省委常委、少共湘赣省委书记王用济，省委常委、湘赣省委妇运书记旷金媛，省委白区工作部长刘炳高，省委秘书长龙承绪，省苏副主席肖行麟、刘燕玉，省政治保卫局长刘发云，军区参谋长周杰，政治部主任旷光明（后贺振芳）等。

此时，能与湘赣省委保持联系的地方党组织有：莲（花）安（福）萍（乡）中心县委、永新中心县委、遂（川）万（安）泰（和）县委、攸县县委、吉（安）泰（和）县委和新（余）峡（江）清（江）县委等。留下的武装部队主要有：湘赣军区下辖5个分区、5个独立团和军区直属队。除独立第5团外，第1、2、3、4团分属4个分区。1分区和1团（团长刘日，后何振元，政委旷彪兼任，后朱凤园）活动范围是永新、安福、莲花边境；2分区和2团（团长朱何子）活动范围是分宜、新余一带；3分区和3团（团长刘启明，后周杰兼，政委刘培善）活动范围是安福、萍乡、宜春等地，以后又转移到湖南攸县、醴陵一带；4分区（司令员张通）和4团（团长李宗保，政委旷珠权）活动范围是吉安、泰和、遂川、宁冈和湖南的酃县、桂东一带；5团（团长曾开福、政委谭富英）直属湘赣军区指挥。5个独立团和军区直属队共约3000人。其中独立第5团1000余人，独立第4团600余人，独立第1、2、3团和军区直属队，分别为三四百人不等。加上分区机关和各县、区武装，以及省委机关武装（教导队、特务队、保卫队）总兵力5000余人。

当时，国民党部署在湘赣边区各县的正规部队有：朱耀华的第18师，驻分宜、新余；李云杰的第23师，驻吉安；王樊德的第28师，驻万安、遂川；李抱冰的第53师，驻安福；陈光中的第63师，驻莲花；罗霖的第77师，驻遂川、泰和。地方反动武装有莲花的保安第10团，新余、分宜的保安第8团，萍乡的保安第4团，茶陵和攸县的王炽昌、曹湘澜的两个保安团。还有逃到赣州、吉安等城市又跑回来的地主恶霸组织的地方民团、“铲共义勇队”等名目繁多的反动武装。他们以几倍、十几倍于红军游击队的优势兵力，从四面八方一齐向苏区扑来，苏区大部分失守；原来连成一片的根据地，被分割成无法联系的十几小块，一时间乌云密布，阴霾笼罩着整个湘赣边区上空，广大劳苦群众又陷入暗无天日的白色恐怖和水深火热之中。

二、国民党军大规模“清剿”，红军游击队严重受挫

（一）国民党军重兵“清剿”，湘赣省委转至泰山

1934年八九月间，在红6军团离开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国民党军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突围西征的红6军团。这时国民党将原先“围剿”湘赣苏区的湘军主力均调去尾追红6军团，而江西敌人尚不知边区留守部队的虚实，也不敢贸然行动。这就使湘赣省委驻地的永新牛田地区，在这段时间局势相对稳定。但是，省委没有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改变斗争方式，制定切合实际的指导方针，实行分散游击的战略转变。仍然采取苏区的一套斗争方式，坚持武装保卫苏区，等待主力红军回头的方针，命令部队四处活动，打土豪，烧碉堡，贴标语，同敌人打阵地战、消耗战，并无应付突变的准备。结果，过早地暴露了边区的实力，招来了敌人的重兵“清剿”。

9月中旬，敌人以罗霖的第77师打头阵，向边区袭来，其“清剿”部队除77师外，还有第18、23、53、63师等，他们在众多的地方保安团、“铲共义勇队”的配合下，采取“分进合击”、“于塘捉鱼”等战术，将苏区分割包围，逐块“清剿”。湘赣省委和军区命令独立第1、2、3、5团和永新县游击队等，分别在永（新）安（福）边界、宁（冈）茶（陵）一线和遂万泰及新余、分宜等地抗击敌人的进攻。独立第4团奉命掩护红6军团西征，仍在湘南打击和钳制敌人。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予敌以重大杀伤，取得了反“清剿”斗争的一些胜利。独立：团和永新游击队在水新周家坊击败国民党军第53师一个团，独立第3、5团在古安县车陂击溃国民党军第23师一个营；遂川碧江洲挺进队击退国民党军第77师一个营和地方保安团的一次联合进攻。但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难以相持下去，敌迅速突破各独立团、游击队的防线，加快了对指挥中心——永新县牛田地区的紧缩包围。在强敌大举进攻面前，省委为避敌锋芒，不得不放弃永新县牛田等几小块被分割的苏区，率党政机关、独立5团和后方医院、修械所等向武功山区转移，以凭借有利地形，同国民党“清剿”部队周旋。

9月下旬，独立3团在团长刘启明、政治委员刘培善的率领下，奉命从永新县石灰桥驻地首先突围，向武功山下的安福县泰山（亦名大山）区转移。10月上旬，途经安福县钱山时，与国民党军第63师一部激战近10小时，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团长刘启明壮烈牺牲。独立3团被迫撤出战斗，转移到萍乡青龙山一带活动，于下旬到达泰山区。

10月18日，湘赣省委、湘赣军区率领党政军机关和独立5团，从永新县牛田突围转移，经吉安县天河、敖城、官田和安福县的金田、洲湖、坪桥、严田、浒坑，到达安福县的杨梅山时，省委为了加强这里的工作，成立了路北特委，由省苏副主席肖行麟任特委书记（后因肖叛变，特委遭到破坏）。接着，省委继续向武功山区的泰山根据地进军，于31日到达安福县的泰山区，在泰山区的袁家村与第3分区、莲安萍中心县委和先期到达的独立第3团会合。这时，省委所能指挥的武装力量只有独立第3、5团和莲安萍中心县委的游击队，兵力近2000人。其他分区、县委和独立第1、2、4团，已被国民党“清剿”部队分割，先后同省委失去联系。

泰山区是当时湘赣苏区仅存的一小块根据地。为了保住这块红色地区，加强对该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决定，在原莲安萍中心县委的基础上，成立莲安萍特委，调省保卫局长刘发云任特委书记兼第3分

区政委，军区参谋长周杰任第3分区司令员兼独立3团团长，省保卫局长由谭汤池接任；并从保卫局抽调部分人员充实到莲安萍游击队，加紧修筑碉堡工事，加固泰山区的防守。

高峰伏击战 10 月底，湘赣省党政机关和独立第 3、5 团转移到泰山区后，首先打了一个漂亮的高峰伏击战。高峰，位于安福县城西北面的泰山区，紧挨着省委机关驻地袁家村。11 月上旬，萍乡保安第 4 团两个中队袭击泰山区的袁家村。为了痛击尾追独立 3 团的这股敌人，省委和军区决定，在袁家村附近的高峰布下伏兵，撒网歼敌。这天天刚亮，200 多敌人便悄悄摸下山来，他们满以为独立 3 团仍在村子里，径直朝袁家村奔来，结果敌人扑了个空。独立第 3、5 团在“武装保卫苏区”口号的激励下，奋勇反击，埋伏在两边山上的战士和机关人员一齐冲下山，喊声震天，刃起头落，杀得敌人鬼哭狼嚎，抱头鼠窜。这次伏击战共毙伤敌保安中队 80 余人，缴获机关枪 1 挺，步枪 40 多支，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民心和士气大振。但也暴露了省党政军机关和部队实力，不得不向泰山区长源头、芦台村一带转移。转移中，独立 3 团奉命向分宜、宜春一带开进，在宜春地区找到了独立 2 团仅剩的 100 多人，两支队伍会合后，一同回到泰山区，省委、军区决定将独立 2 团余部并入独立 3 团，撤销独立 2 团的番号。

三女跳崖就在湘赣省党政军机关和部队从永新县牛田向武功山区泰山转移时，从永新、安福、莲花、茶陵等地逃出来的苏区群众（通称“难民”），吃尽了反动派的苦头，不甘心在敌人的屠刀下苟且偷生，便跟随红军游击队一起转移。这批“难民”大多是苏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他们中有许多人还挑着孩子跟着一起走；在过敌人封锁线时，怕小孩的哭声惊动了敌人，有的忍痛把孩子的嘴捂住，活活把孩子闷死。他们无处安身，没有粮食，就靠吃山上的野菜度日。尽管环境如此险恶，这些群众还是表示坚决要跟红军走。他们说：“生死都要跟红军在一起，共产党消灭不了，红军消灭不了，革命一定会胜利。”可是作为边区最高领导人的陈洪时，不但没有保护这些干部和群众，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游击战斗；或者进行说服教育，做好疏散隐蔽工作。相反，陈洪时把他们当做“包袱”，借口防止暴露目标，在转移时，不准通知，致使不少干部、群众落入敌手，许多好同志惨遭杀害，给红军游击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与陈洪时相反，莲安萍中心县委和县苏的同志们，和群众患难与共，在撤退到安福泰山区时，为了防止敌人突袭这批难民，专门抽出人做好难民的转移安置工作。1935 年 12 月，一个漆黑的夜晚，红军女战士李发姑、刘断英、郁怡花带领一批难民在转移途中，不幸被前来“清剿”的安福县保安团发现，在遭受敌人包围的情况下，三位女战士为掩护难民脱险，将敌人引开，被保安团追到悬崖边。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她们宁愿玉碎，不为瓦全，毅然纵身跳崖，刘断英当场牺牲，李发姑、郁怡花身受重伤，谱写了“三女跳崖”的悲壮诗篇。

（二）苏区全面失守，红军损失严重

省委转移到泰山根据地后，湘赣苏区的其他地方均被国民党军占领。泰山地区东西有 100 多公里，南北也有数十公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便于红军游击队隐蔽自己，打击敌人，开展游击战争。但当时的省委并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没有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将近 2000 人的部队分散活动，以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而是继续命令部队在各个山头修工事，筑碉堡，以阵地对阵地，结果部队越打越被动，越打伤亡越大，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

长源头阻击战 12 月下旬，国民党军第 53 师一部在莲花县保安第 10 团、安福县保安队、萍乡保安第 4 团、宜春保安队等地方反动武装的配合下，步步紧逼，气势汹汹地直扑湘赣省党政军机关驻地长源头和芦台村。独立第 3、5 团在长源头一带进行顽强阻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战斗从上午 9 时打响，双方相持到下午 3 时左右，敌军越来越多，人力也越来越猛。4 时左右，各路敌军开始发起总攻，重机枪、迫击炮对前沿阵地狂扫滥炸，阵地上弹片横飞，红军游击队的土碉堡和工事全被炸毁，机枪手英勇牺牲，弹药手也大多负伤。战斗持续到下午 7 时，终因敌众我寡，部队伤亡较大，被迫撤出战斗。独立第 3、5 团随省委越过武功山主峰金顶，向深山区观形（亦名观音形）、双园坪转移。途中，与从宜黄、乐安地区突围过来的原江西军区第 1 分区近 200 人的队伍相遇。省委、军区将这支部队整编成一个连（后称为“宜乐连”），编入独立第 5 团，原分区司令员肖杰任第 5 团副团长，原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罗维赋任第 5 团副政委。这样，独立 5 团兵力达 1400 余人。省委撤离芦台村、长源头一带山区时，莲安萍特委和游击队也被迫放弃泰山地区，转移到莲（花）安（福）边界的五里山区，至此，湘赣边的最后一块苏区也丢失。

武功山区反“清剿”12 月底，国民党军第 23 师、28 师、53 师、63 师等，相继奉命尾追主力红军，留在湘赣边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尚有第 18 师和第 77 师。1935 年 1 月 18 日，77 师颁布了《武功山附近地区清剿工作计划》，任命该师第 230 旅旅长胡良玉为“清剿”指挥官，限 2 月 15 日前“肃清”红军游击队。1 月 30 日，胡良玉率旅部进驻安福县的洋溪镇，实施对武功山的全面“清剿”。胡良玉以第 462 团之一营，第 461 团，第 459 团之主力和萍乡保安第 4 团为“堵剿”部队；以第 460 团和洋溪民团之主力为“进剿”部队；以师部工兵营为“驰剿”部队。此外，还有宜春保安第 9 团，宜南“铲共义勇队”等，分别扼守交通要道。第 230 旅的“清剿”部署，以武功山（安福、萍乡境内一段区域）为中心目标，围追堵截并举。他们在军事上实行“分进合击”和“篦梳”战术，到处放火烧山，构筑碉堡，不分昼夜地对红军游击队进行“追剿”、“堵剿”、“驻剿”和“搜剿”；在城关市镇、交通要道、大村庄、小山头，到处筑碉堡、设据点，布下了层层封锁线；在政治上，推行隔离政策，强迫“移民并村”，强化“保甲联坐”制度，实行“一家通匪，十家联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的株连法，常以“通匪”、“济匪”等罪名，任意屠杀边区乡民。保安团地主武装还经常化装口出侦察，在山区见房就烧，见人就抓，见东西就抢，稍有反抗，就遭枪杀。他们还到处设立“联保办事处”、“清乡委员会”，散发传单，张贴布告，威逼红军游击队员的家属上山喊话，引诱红军游击队员中的不坚定分子投降；在经济上，实行严密的封锁政策，按人口限量购买粮食和物品，禁止群众携物上山，妄图割断

人民群众与红军游击队的联系，把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冻死在深山密林中。

面对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和残酷“清剿”，陈洪时不是充分利用武功山的有利地形，根据敌情的变化，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而是仍然指挥部队集中行动，盲目突击，致使红军游击队被动挨打，陷入空前困难的境地。少数投机分子在革命遭受挫折的危急关头，乘机投敌叛变，加剧了斗争形势的恶化。

虎头岭反击战与彭辉明牺牲虎头岭是一个小村庄，位于江西省莲花县城北面的五里山区。1935年2月初，中共湘赣省委获悉莲花县国民党军防守比较薄弱，没有正规部队，便决定由湘赣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率独立第3、5团向莲花县的五里山方向突击。莲花保安第10团闻讯，急忙联络萍乡保安第4团，分几路向五里山区“进剿”。独立第3、5团到达虎头岭时，保安第10团及莲花县“铲共义勇队”400余人，已从安福县的月里经莲花县的南肢、瀑水岩赶至虎头岭，抢占制高点。天刚破晓，保安团就向独立第3、5团发起进攻。彭辉明见地形不利，一面指挥部队沉着应战，一面果断地组织火力掩护，并亲自带领部队实施反击。在这处境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彭辉明镇定自若，不顾个人安危，将手枪一挥，喊道：“同志们！冲呀！跟我把前面的敌人消灭掉！”战士们在彭辉明的带领下，一个劲地往前冲，敌人在猛烈的攻击下，阵脚大乱，开始往后撤。突然，彭辉明身体一晃，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但他清楚地意识到，在这时候，如果自己一旦退下火线，将会影响部队士气，于战斗不利。他咬紧牙关，仍然从容指挥战斗，带领部队一举攻下了虎头岭前面的几个山头，将敌人压到山下。前来增援的萍乡保安第4团见势不妙，慌忙退逃。独立第3、5团乘机杀向敌阵，乘胜追击，将莲花保安第10团和莲花县“铲共义勇队”击溃。

这次战斗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共歼灭敌保安第10团两个大队，缴获长短枪四五十支。但独立第3、5团伤亡很大，特别是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在战斗中，身上5处中弹，由于未能及时抢救，流血过多，英勇牺牲。

彭辉明，广西人。早在1929年12月，就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的百色起义，1931年2月到达湘赣边革命根据地。他是一位富有军事才能的优秀指挥员，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指挥沉着果断，很能打仗。彭辉明的牺牲，使红军游击队在重要时刻失去了一位骁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这对湘赣边区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精简机关充实部队虎头岭战斗后，独立第3、5团折回省委驻地观形附近，凭借有利地形抗击敌第460、461团的“进剿”。2月8日，湘赣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振芳等叛变，于次日带领第460团偷袭观形，省委、军区领导仓促组织部队应战。在战斗中，仅有的一部电台损失了，从此，湘赣省委和军区便与中共中央及红6军团失去了联系。独立第3、5团由于连续行军，频繁作战，又得不到给养，常常几天吃不上一顿饭，只能靠山上的野果、竹笋充饥。加之时值残冬，干部战士身着单衣，夜间露宿，怕暴露目标，不敢生火取暖，只能撑开雨伞遮挡风雨。这种恶劣的环境，造成部队严重减员。2月中旬，省委率部向茶（陵）攸（县）莲（花）方向转移，到达莲花县的棋盘山后，为增强部队战斗力，决定精简机关，将机关中有作战能力的人员充实到独立5团，在茶陵、莲花等地坚持斗争。将独立3团、省直机关部分骨干组成挺进队，由刘培善任队长兼政治委员，开往攸县一带筹粮筹款。

在这期间，独立第1团、第4团，在反“清剿”战斗中遭到严重挫折。2月间，国民党军第77师在围攻武功山的同时，派出第459团向陈山“进剿”独立1团。他们在永新、安福、莲花保安团队的配合下，封锁交通要道，把山上的群众赶下山，集中在大村庄居住，无休止地反复搜山，轮番“搜剿”。独立1团屡陷重围，特别是在回陈山坚持斗争的一个多月里，1团有两次被敌包围，减员严重，损失很大。一次是在陈山的上等村，敌人把全团包围住，在突围中人员被打散，战斗结束后，部队集中起来清点，只剩下100多人；另一次是在石门山，部队被敌包围，经过激战，损失惨重。正当部队危难之际，代理团长何振元和政治委员朱凤园先后投敌叛变。这两次战斗使200多人的部队，几乎损失殆尽。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独立1团由数百人的队伍战斗到最后只剩下6个人。

独立第4团于1月间离开遂（川）万（安）泰（和）地区，经江西上犹、崇义，进入湖南的酃县，然后到了桂东、汝城、资兴、永兴等地，一路与国民党地方武装作战，打土豪筹款，宣传群众。国民党粤军第1军军长兼江西省第6绥靖区司令官余汉谋，急忙调兵“驰剿”，国民党郴州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欧冠，坐镇资（兴）永（兴），指挥“清剿”。3月下旬，独立第4团近600人在资兴的壕仁圩，遭国民党地方武装欧阳归和欧九如部的联合伏击，虽顽强抵抗突出重围，但伤亡很大。团长李宗保带了一个连和一个自动步枪班约50人，向国民党青腰乡区公所投降。不久，政治委员旷珠权也在桂东沙田圩投敌叛变。独立4团剩下130余人，其中100余人分别加入湘南的东边山和西边山红军游击队，另30余人找到了原湘赣军区第4分区司令员张通，继续活动在湘南新田等县。

划归独立第4团指挥的湘赣省保卫局第2中队70余人，在遂万泰地区坚持斗争，同样也遭到国民党军严密封锁和“清剿”，剩下30余人，独立活动于遂川县的良碧洲一带。

（三）省委部署分兵，独5团转战湘南

湘赣省委在反“清剿”斗争不断失利的严酷现实面前，多数人从斗争实践中初步意识到，继续集中兵力与强敌死打硬拼，难以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必须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和策略。为此，省委于4月初在莲花县棋盘山附近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对部队的行动方式、活动范围以及如何发展地方武装、发动群众、开展党的地下活动等，进行了研究。决定缩小目标，分散行动：省苏副主席刘燕玉到五里山，加强党对该地区的领导，发展地方武装；原莲安萍特委改为湘东南特委，由刘发云、周杰等领导，在醴陵、攸县边界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谭汤池、旷金媛等到攸县漕泊地区，发动群众，秘密建立党组织，开展斗争；独立第5团在茶陵等地分散游击，同时设法恢复与上级党组织或友邻的联系；省党政军机关则向攸（县）醴（陵）萍（乡）边界的大平山转移。

会后不久，湘赣省委从湘南游击区负责人蔡会文、方维夏派来的一支小分队获悉：中央红军已于1934年10月进行远征（即长征）；中央苏区于1935年2月全部失陷，中央分局留守部队已分路突围转移；蔡会文率领的部队就是其中的一路，突围中部队损失严重，4月间到达湘南桂东的东边山，与坚持在该地区的方维夏领导的部队会合，等等。这些消息对省委震动很大，主要领导人产生悲观，从而作出了独立5团全部撤离湘赣边开往湘南，寻找蔡会文、方维夏部的错误决定。

4月中旬，独立5团在团长曾开福等人率领下，向湘南进发，途经茶陵晓田村，遭国民党军第18师截击。这次遭遇战虽经指战员的奋勇拼搏，但由于地形对独立5团十分不利，5团损失严重。尤其是第2营，为了掩护全团，占领阵地，伤亡更大，剩下不足百人，分别编入第1营和第3营。这是独立5团向湘南转战途中第一次战斗失利。此后，为了摆脱强敌的围追，当部队到达湖南的安仁和桂东边界时，为进一步缩小目标，决定兵分两路行动：1营向桂东方向行动；3营向桂阳方向行动。由于部队在湘南转战，既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法解决给养，特别是经常遭到敌军围追堵截，战斗频繁而激烈，加之疾病和饥饿的折磨，伤病员日益增多，且缺医少药，使部队严重减员。1营在赣南和湘南征战两个多月，未能与蔡会文部取得联系，处境十分艰难，便决定返回武功山区。途中，在桂东打了一仗，营长戚云芳在战斗中牺牲，队伍被冲散，最后只剩下100多人，又与团部失去联系。后于6月初陆续回到武功山区，湘赣省委将其改编为湘东南大队，活动于茶攸莲边界柑子山一带，这时1营由出发时的500多人，只剩下71人。

3营到达桂阳一带，在新田与蔡会文的一支部队会合。转战中，在湖南省临武县歼灭当地保安团一个营大部，俘敌近百人，缴枪数十支。两支兄弟部队在一起活动一段时间后，蔡会文部去赣南，3营仍在新田、嘉禾一带转战。不久，又在新田县与张通率领的独立第4团30多人会合。此时3营已由刚进入桂阳时的300多人，减至100多人。此后，部队又从宜章县的良田，穿过粤汉铁路，向湘南的桂东和赣南的上犹、崇义一带转移，想再找蔡会文的部队一直未找到，只好决定返回武功山区。行至莲花龙口时，又被敌击散。再集结时，只剩下60多人，在张通的率领下，到达棋盘山，于7月中旬才与省委取得了联系。

独立5团是当时湘赣军区唯一的一支主力部队，本应留在边区，利用武

功山区的有利地形和条件，分散游击，坚持斗争。但陈洪时和湘赣省委的一些领导人，不从实际出发，轻率地将部队派往湘南，结果使 5 团由出发前的 1000 多人锐减至 100 余人。相反，刘燕玉在五里山与当地党组织密切配合，将原有的地方武装组成一支游击队，分散行动。分别建立了攸醴萍、五里山、茶攸莲游击根据地，并在谭余保的指导下，成立了茶攸莲县委。这就为后来的游击斗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有益经验。

（四）陈洪时叛变，游击战争面临严重危机

4月下旬，湘赣边党政军机关，从棋盘山转移到攸醴萍边界的大平山后，陈洪时悲观动摇的面目开始暴露出来。他玩弄两面手法，以自己是省委书记、军区政治委员的身份，利用地下党组织的关系，设法和家人（萍乡人）取得联系，密谋策划，积极为其日后的叛变投敌做准备。在一次会议上，陈洪时借口目标大，不利于隐蔽，极力主张把省委搬到萍乡、安源去做城市工作，以掩饰其害怕艰苦，退却逃跑的失败主义情绪和贪生怕死的阴暗心态。当即遭到省委多数同志特别是谭余保的坚决反对，使陈洪时的阴谋暂未得逞。

5月底，湘赣省委在大平山再次召开常委会，陈洪时、谭余保、王用济、谭汤池等参加。会议分析研究了当时的形势，考虑必须设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鉴于独立5团派往湘南后尚无音信，会议决定，由谭余保、刘发云去湘南找蔡会文、方维夏，了解独立5团的情况，并设法恢复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派王用济、谭汤池到湘东南特委工作，加强那里的领导；陈洪时留在原地，指挥湘东南特委及其部队，并向攸县、醴陵、萍乡一带开展白区工作。这次会议作出的一系列决定，实际上掺杂了陈洪时个人动机。他利用大家急欲了解外部形势和迅速得到上级指示的心情，借口省委和省苏分开行动，支走了谭余保、王用济等人。会后不久，又将旷金媛和刘炳高，派往萍乡一带，将省委特务连派住攸县，省委机关只剩下十几个人。这时陈洪时见时机已到，便通过家人暗中与国民党萍乡县县长、江西省第2区“剿共”司令官危宿钟沟通了关系。6月14日，陈洪时带着龙承绪等十多人，携带枪支弹药、译电密码、文件，以及红军游击队为省委筹集的黄金、银元、纸币等，在萍乡投靠了危宿钟。他投敌后为邀功请赏，带领国民党军队上山“清剿”，使党的各级组织除茶攸莲县委外，均遭到严重破坏，根据地的许多群众和大批革命同志惨遭杀害。不久，陈洪时当上了国民党军队的上校“招抚员”，更加积极地为国民党政府的“招抚”政策效劳，充当了敌人的鹰犬。他利用各种手段，挑拨红军游击队内部，以及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制造思想混乱，妄图分化瓦解红军游击队。

陈洪时叛变前，还有肖行麟、谭富英等十多名独立团和县以上的负责人背叛了革命。这些叛徒由于掌握着游击区的大量内情，成了湘赣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使湘赣边游击区的斗争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峻。特别是陈洪时叛变后，省委一度瘫痪，红军游击队被敌打散，相互无法联系，使湘赣边游击斗争濒临溃散的严重境地。

陈洪时叛变后不几天，和谭余保一道去湘南的刘发云，又在茶陵县的尧水附近投敌。因刘发云熟悉游击区情况，为防其破坏，谭余保决定放弃去湘南的计划，回武功山区找省委，以采取对付叛徒的紧急措施。

三、棋盘山会议与游击战争的转机

（一）棋盘山紧急会议和重建省委

1935年6月底，谭余保从湘南回到武功山后，找到了茶攸莲县委机关，得知陈洪时已经叛变，省委常委只剩下王用济、谭汤池和谭余保等三人。因情况不明，他们一时无法联系；加之陈洪时等叛徒，除带领国民党军大肆“进剿”湘赣边区外，还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造谣惑众，制造混乱，使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处境越来越险恶，越来越困难，不少干部、战士都在考虑着今后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在革命处于危急的历史转折关头，谭余保挺身而出，决心重整旗鼓，继续领导边区军民坚持游击斗争。他多方奔走联络，并派人四出寻找省委其他领导人和失散的干部、红军游击队员。经过一番苦心筹划，于7月间在莲花县的棋盘山主持召开了干部紧急会议（通称棋盘山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曾开福、王用济、谭汤池、周杰、段焕竞、朱水生、刘培善、龙珍、颜福华、陈珍媛、吴金莲、陈永辉、罗维道、徐德甫等近30人。会上，谭余保通报了陈洪时叛变的情况，批判了陈洪时背叛革命、投降敌人的可耻行径。他要求红军游击队坚决肃清陈洪时叛变的恶劣影响，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在游击队内部开展反动摇、反叛变斗争，纯洁和巩固组织，把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继续坚持斗争。他说：“湘赣苏区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走了陈洪时，带不走老百姓的心，竖在这里的红旗决不会倒”。同时，谭余保还提出了“不怕死，不动摇，执行党的方针，紧紧依靠群众，坚持斗争到底，胜利必属我们”的口号。

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统一了思想认识，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把巩固内部、反对叛徒的斗争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同时，确立了游击斗争的方针，即以武功山为依托，建立游击根据地，隐蔽分散，保存实力，开展群众性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会议决定继续派人外出寻找失散人员，恢复和建立党和各级地方组织，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揭露叛徒丑恶嘴脸，揭穿叛徒阴谋，开展群众性的反叛徒斗争。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湘赣省委、省苏政府和湘赣军区，成立临时省委，以谭余保为书记，曾开福为副书记，谭余保、曾开福、王用济、谭汤池、周杰、段焕竞、朱水生、刘培善、龙珍、颜福华、陈珍媛等为常委，确定王用济兼任少共省委书记，谭汤池为省委组织部长，周杰为省委宣传部长，陈永辉为省委秘书长，陈珍媛兼任妇运书记，颜福华兼任肃反委员会主任；成立湘赣省军政委员会和游击司令部，谭余保兼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游击司令部政治委员，曾开福兼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段焕竞任游击司令部参谋长，朱水生任游击队政治部主任（后刘培善）。根据会议决定，会后发表了《告群众书》，告诉人民群众，敌人是消灭不了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革命是必然要胜利的。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坚持斗争。

棋盘山会议，是在湘赣边区革命斗争遭受严重挫折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挽救了湘赣边区的革命，挽救了湘赣边区的党和红军游击队；是湘赣边区游击战争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重大转折，为开创湘赣边游击战争的新局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组建游击大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

根据棋盘山会议精神，湘赣临时省委和游击司令部，将已联系上的红军游击队进行整编，组成第2、3、4三个游击大队（后4大队改为1大队）和一个教导队，并作了部署。决定将湘东南大队改编为第2大队（邱仁标任大队长、罗维道任政委），在茶攸莲地区活动，以发展革命力量为主要任务；独立5团3营和独立4团剩下的30余人，编为第3大队（钟××任大队长，林少甫任政委），在攸醴萍地区活动，以筹款为主要任务；省委挺进队和莲安萍游击队一部编为第4大队（刘培善任大队长兼政委），主要担负作战和开辟游击根据地的任务。此外，还组建了一个教导队（彭士元任队长，颜福华兼政委），随省委行动。整个游击司令部共有兵力300人。

与此同时，临时省委派谭汤池、段焕竟等去萍宜安地区寻找失散人员，扩大游击力量。他们先后在永新、安福、萍乡、分宜等地找到了一部分失散的人枪，充实到各大队。又在一些边远地区先后组建了地方游击队，如莲（花）永（新）游击队、攸（县）莲（花）游击队等。派王用济再度去湘南找蔡会文、方维夏部。王历经艰辛，终于找到了方维夏。但不幸的是，当他们于10月间准备返回武功山时，途经湘南桂东沙田的仙背山遭敌突袭，王用济和方维夏一起壮烈牺牲。

游击大队组建后，临时省委在各大队中开展了反动摇、反叛变的教育，以增强指战员的斗争信心，激发革命热情，从而稳定了部队情绪，坚定了革命斗志，为坚持边区游击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陈洪时叛变后，国民党“清剿”部队声称，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已被“肃清”，因而第18、77师先后撤离边区。但为时不久，国民党湘赣两省政府发现红军游击队并没有被消灭，便又急令两省保安处长在茶陵召开了湘赣边“清剿”工作会议，拟定了对湘赣边区的“清剿”计划，成立了以湖南第二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肖训为指挥官的“清剿”指挥部，又一次对湘赣边红军游击队进行大规模的“清剿”。一时间，湘赣边界各地的保安团队，层层设防，构筑碉堡，派叛徒、密探进山，搜寻游击队踪迹。一经发现便倾巢出动，进行封山、搜山。对此红军游击队利用边区有利地形与敌人展开了灵活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通常的战斗方式是，白天隐蔽，夜间出击，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采取伏击或诱敌出来进行围歼；有时乘敌不备，远道奔袭。在战斗规模上，红军游击队以小分队的形式，分散活动，避免与强大之敌正面接触，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给予打击，严惩叛徒、密探，消灭敌人耳目，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智擒敌探罗根元棋盘山会议后，湘赣边游击战争的形势逐渐好转，游击区域不断扩大。但红军游击队仍经常遭到敌人的破坏，特别是攸县一带有个敌探头目罗根元，无恶不作。他手下有四五个亡命之徒，暗中操纵着当地的“挨户团”、“守望队”、“清共委员会”等反动组织，对游击队进行破坏，危害很大。仅罗根元一人就亲手杀害干部、群众十多人，红军游击队决心要除掉这个祸害。但这家伙出没无常，行踪不定。8月，游击司令部第2大队经过研究，制定了一个里应外合活捉罗根元的方案，决定让李发姑和冯秋姑两名女战士，化装潜入到罗根元家侦察情况，做内应，游击队则埋伏在罗家周围，以事先约定的联络信号待机行动。第二天下午，在第2大队政委罗维道的率领下，按预定计划执行任务。李、冯二人扮作商人的女儿，先闯进官

田罗根元家歇脚，讨水解渴。当罗根元回到家里后，冯秋姑便佯装上厕所发出信号。埋伏在罗家周围的游击队，便马上冲进罗家屋内，用手枪对准罗根元：“不准动！我们是游击队！”这时，李发姑和冯秋姑已将罗的两只手牢牢地揪住，一举活捉了敌探头目罗根元，并就地处决了这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这次战斗，不仅打击了反动地主和敌特侦探的嚣张气焰，拔掉了对游击队危害很大的一个钉子，而且对地方上的保甲长也是一次严重的警告。这是棋盘山会议后对敌斗争取得的首次胜利。

不久，游击队小分队在莲花县门塘村烧毁“铲共义勇队”碉堡一座，击毙其队长贺长发，缴枪5支，手榴弹30余枚，子弹350余发。不料这时，省委宣传部长周杰在陈洪时等叛徒策划下投敌叛变，带着莲花县保安团，将仅有40余人的省委机关和教导队围困于茶攸莲边界的柑子山一条狭长的山沟中。周杰叫嚷要用5000块银元悬赏捉拿谭余保。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谭余保利用大茅山作掩护，巧施调虎离山计，指挥省委机关和教导队与敌周旋，终于跳出敌包围圈，安然脱险。为扰乱叛徒注意力，临时省委和游击司令部还命令活动在永新县境内的游击队轮番出击，调动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利用叛徒围歼省委机关的阴谋。

潞江袭击战潞江位于江西永新县城西面，距县城22公里，系永（新）花（陵）公路必经之地。10月，活动在永新县铁镜山的湘赣游击司令部第4大队和永新游击队，得悉宁冈县保安大队100余人前来永新县增援“清剿”，遂决定在其必经的永新县潞江实施袭击。游击队经过周密部署，在保安大队刚进入潞江的当天黄昏，乘敌不备，予以突然袭击，毙其指挥官及队员20余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给予敌人严重打击，取得了出击潞江的胜利。接着，游击队又冒雨夜袭潞江“铲共义勇队”驻地，击毙其队长盛孝生，缴枪10余支。11月，游击队又攻入永新县的达屋，活捉当地民团团长尹茂官，摧毁敌碉堡数座。这一系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叛徒和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嚣张气焰，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影响，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斗志。

1936年1月，湘赣临时省委和游击司令部，将从各地寻找回来的失散游击队员，组建了一个第4大队（大队长黄锡元，后王萱春；政委王只谷，后刘别生），原第4大队改为第1大队，同时对第2、3大队进行了调整充实。将宜萍游击队充实到第3大队，并调整了大队的领导，由刘保禄（又名刘群）任大队长，郭猛任政委。这时，游击司令部下辖4个大队。2月，根据临时省委决定，由司令员曾开福率领一支小分队，到茶陵八团的龙头铁矿，抓来了大土豪周纪勋，迫使其交出医药、军用品、银元等价值万余元的钱物，解决了游击队的给养，极大地震慑了当地的地主豪绅和保甲长，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5月，根据临时省委的意图，1大队一举摧毁了安福严台、烟竹等地的碉堡，建立了安福罗家屋游击根据地。第2、3大队分别在莲花县棋盘山、安福县谷源山、牛路和永新县的铁镜山一带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从而为游击队提供了赖以休养生息的可靠后方和开展游击战争的立足点。此后，游击队以这些根据地为依托，开始逐步渗透到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封锁线以内，经常乘其不备，突然袭击一些中心据点和国民党乡（镇）公所。

奇袭油田油田，距江西吉安县城约45公里，是该县北面的交通咽喉。由国民党地方保安团一个中队扼守。1936年6月23日夜，湘赣游击司令部参谋长段焕竞、政治部主任刘培善率第1、4大队、自安福县罗家屋的车田出发，经该县烟竹、严台和分宜县的大岗山等地，夜行36公里，拂晓前赶到油

田，趁守敌酣睡之际，将敌区公所、碉堡、岗楼分割包围。红军游击队迅猛发起攻击，首先摸掉敌岗哨，烧毁了岗楼、碉堡，冲进了区公所。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全歼守敌一个中队，缴长枪 30 余支，短枪 5 支，子弹 1000 余发，军眼数十套。返回途中，游击队又化装成保安团，在安福县的陂头村，一枪未发，即巧俘当地地主武装一个分队，缴枪 12 支，子弹数百发。坪桥退敌坪桥，位于江西安福县城以南约 15 公里处，是该县南、北乡往来必经之路。当时，北乡一带的山区是游击队的根据地，南乡则是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巢穴。12 月初的一天，湘赣游击司令部第 3 大队 30 余人，从安福县七都山出发，经连村、新背，过芦水河，到南乡的下路筹款。因天已渐亮，不便返回驻地，只好隐蔽在坪桥附近的谷源山上，待天黑后再返回根据地。但由于游击队在下路打土豪筹款的行动被安福县的保安团得知，敌人估计游击队可能干第二天夜深返回，便决定前往坪桥设伏。次日晚，当夜幕降临，游击队行至坪桥时，恰与前来设伏的保安团 300 人遭遇。游击队趁对方立足未稳，先发制人，发起进攻。利用夜黑视线不良，采取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的战术，到处打枪，四处吹号。不知虚实的保安团以为遇上了游击队大队人马，吓得仓皇奔命，红军游击队英勇机智地将敌击退。这次战斗俘敌 20 余人，缴枪 20 余支，子弹数百发，打了一个以少胜多的漂亮遭遇战。

随着红军游击队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和战斗力的增强，湘赣临时省委于 12 月 12 日，在安福县的三江村召集游击司令部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为扩大红军影响，决定将部队改编为湘赣红色独立团，段焕竟任团长，刘培善任政治委员。原来的 4 个大队改称为连。部队改编后，临时省委即由深山区迁至罗家屋游击根据地。

为了配合边区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1937 年 2 月，根据临时省委的决定，活动在永新铁镜山一带的红色独立团第 3 连，趁元宵节闹龙灯的机会，袭击永新县里田区公所，击毙区长漆伯昂，缴枪 30 余支。接着，红色独立团又取得了奔袭洲湖镇的胜利。

奔袭洲湖镇洲湖镇，是江西安福县城西南面的一个重镇，距离县城 26 公里。该镇敌人布防森严，筑有坚固的碉堡和炮楼，镇上设有区公所，由国民党地方保安团一个中队驻守。这个敌据点就像一颗毒钉，嵌在安福、吉安、莲花、永新游击根据地中间，不仅妨碍红军游击队活动，危害人民群众，也是红军游击队发展斗争形势，扩大游击根据地的一个严重障碍。1937 年 3 月上旬，湘赣红色独立团获悉国民党安福县长朱孟珍正在该镇“巡视”、“督剿”的情报。经临时省委和游击司令部研究决定对该镇予以突袭，决心拔掉这颗毒钉。于是从湘赣红色独立团的第 1、3、4 连中挑选出 100 余人，组成了一支精干的突击队，在团长段焕竟、政委刘培善的率领下，于 9 日晚由安福七都山的章庄出发，经杨梅山，渡芦水河，穿过大同坑、诸村桥，一夜冒雨奔驰 40 公里。10 日凌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进洲湖镇。随即兵分两路，刘培善率第 1、4 连的战士围住保安中队岗楼；段焕竟带第 3 连直捣区公所。刹时间，整个洲湖镇枪声、拼杀声四起，敌人吓得昏头转向，四处逃窜，不到一小时便结束战斗。游击队共缴获长枪 30 余支，短枪 10 支，机枪 2 挺，子弹数箱，击毙敌中队长欧阳根，活捉并当场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反动县长朱孟珍。其余所俘 30 余人，经教育后全部释放，将没收的财物就地分给群众。红军游击队无一伤亡。洲湖一仗，使敌人惊恐万状。国民党安福县政府急电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惊呼：“千余共匪，进攻安福，县长殉难！”

曾开福叛变，游击队再次战胜风险洲湖战斗的胜利，使游击队声威大振，也使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安福县政府十分震惊，一面下令保安团队加紧“清剿”红军游击队，一面利用叛徒陈洪时等人的“招抚”活动，配合保安团对游击队实行“剿抚兼施”。早在1936年12月，陈洪时就派遣了两名密探，假装携枪投诚，打进了游击队内部。陈洪时对游击队当时的几名主要领导人十分了解，深知曾开福比其他领导人容易得手，他通过两名密探暗中与曾开福勾结。曾开福虽是游击司令部司令员，却早已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他有意将两密探安插在自己身边的教导队，以便保持同陈洪时的联系。陈洪时通过潜入游击队内部的两名假起义人员，采取挑拨是非、制造矛盾和诱以高官厚禄等手段，终于使曾开福动摇，寻找时机叛变。1937年6月，省委机关在安福县城附近山上宿营时，曾开福借口检查岗哨，携带枪支和600元纸币，向国民党安福县政府投降，后当上了国民党江西调查大队大队长。谭余保在曾开福出走不到一小时便敏锐地觉察到了险情。为了防止意外，及时率领机关和部队向陈山、铁镜山游击根据地转移。同时，派人通知各有关联络点，作好应变的准备。曾开福叛变后，与陈洪时、周杰一起带保安团3000多人，对安福县罗家屋等游击根据地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封锁“搜剿”。曾开福熟悉游击队活动规律，派出大批密探到游击队联络点，谎称与谭余保接头，企图诈捕地下党组织的干部和游击队员。游击队在谭余保的直接指挥下，改变过去的活动规律和联络办法，规定了一整套行军宿营纪律，并不时制造假情报，让叛徒扑空。游击队还化整为零，深入各地配合地下党组织，秘密发动群众，严惩叛徒密探，打击其嚣张气焰。七八月间，正当叛徒带着保安团疲于搜山，一无所获时，游击队却在离武功山的九陇山一带频繁出击，接连袭击了永新县的秋溪、文竹、潞江、澧田等区公所，并恢复了九陇山游击根据地，部队活动范围扩大到井冈山、宁冈等地。

（三）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开展对敌斗争

红军游击队在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的同时，还采取了十分灵活的政治斗争策略，开展对敌斗争。

第一，开展兵运工作，分化瓦解敌人。在群众的掩护下，湘赣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派出地下党员打入敌人内部，把工作做到敌人的碉堡里。对分布在游击根据地周围的小型碉堡内的乡丁，民团，以开展宣传教育和争取工作为主。莲花县垄上有一座敌碉堡，就在临时省委驻地附近，1936年7月，当地党组织通过宣传党的政策，做教育争取工作，使碉堡里的“铲共义勇队”逐步消除与红军游击队的敌对情绪。从开始和游击队达成默契，互不侵犯，进一步发展到为红军游击队传递情报，代购物资。明里替敌人站岗，实际上为游击队放哨。当这些行动被国民党莲花县政府发觉后，“义勇队”根据临时省委的安排，毅然决定就地举行起义，加入了游击队。

第二，对地主豪绅的政策，变“肉体上打击”为“经济上惩罚和精神上感化”。红军游击队抓住地主豪绅后，反复讲明政策，晓以利害，只要他们不再鱼肉乡里，就不伤害他们。1936年2月，游击队抓获茶陵县大土豪周纪勋，谭余保亲自为其松绑，以礼待之，促使其交出近万元的现金和物资，并表示愿意继续为红军效劳。

第三，在赤白交界的地方，建立“白皮红心”据点。针对国民党推行的保甲制度，临时省委和各级党组织选派一些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去当保甲长，表面上挂着国民党的招牌，实际上为共产党办事，即以合法身份掩护所从事的革命活动。1936年2月，谭余保指示中共攸县3区区委书记曾茂林和少共区委书记曾祥林，利用当地政府选任甲长之机，分别当了皮家南源保第一甲长和第二甲长。他们为游击队筹办禁购物资，发动群众抗租抗粮，以合法身份探听敌情，传递情报，掩护同志，秘密发展革命组织，还秘密处决了南源“铲共义勇队”小队长陈瑞昌。这类两面政权，在莲花、安福等地也都建立过，为配合红军游击队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改造收编土匪。对于土匪，只要不与红军的游击队为敌，就积极进行争取教育。湘赣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九陇山地区成功改造收编了一支40多人的土匪武装，这支武装在红军游击队恢复九陇山根据地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

所有这些灵活的政治斗争策略，不仅在政治上分化瓦解了敌人，缩小了对立面和打击面，而且在经济上也扩大了物资给养的来源，使红军游击队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有利于游击战争更加广泛深入地蓬勃开展。

（四）恢复与建立地方党组织，广泛开展群众工作

由于国民党军队和保安团的反复“清剿”，加之党内又出现了叛徒，使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永新县委机关几乎损失殆尽；遂（川）万（安）泰（和）工委被敌人搞垮；莲花县委也受到敌人摧残；杨梅山区的北路特委和下属组织全部遭到破坏；茶陵党政军机关在秩堂地区之东坑陇上遭到敌人伏击，全体同志壮烈牺牲。

棋盘山会议后，以谭余保为书记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在领导开展游击队战争的同时，积极恢复和建立地方各级党的组织，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35年7月，谭余保等人以棋盘山为中心，首先在攸县东乡金子岭，将茶攸县委扩大为中心县委，由吴金莲任书记。随后，又在莲花县建立了南村区委；在攸县恢复了皮家区委。9月，临时县委派出龙珍等人到铁镜山恢复和建立了党的组织。年底，以安福县泰山的大江（亦名高峰），建立了萍宜安中心县委，书记周道益（后龙珍、韦一平）。1936年6月，萍宜安中心县委派李发姑等人，到安福壶丘、江口、七都山一带恢复了宜南区委，并建立了一些党支部。11月，又以大平山为中心，将原攸醴萍区委扩大为攸醴萍县委。1937年2月，又在九陇山成立了永新临时县委。这些地方党组织恢复建立后，在湘赣临时省委统一领导部署下，分别派出大批干部到各地开展群众工作，开辟和加强游击根据地的建设。1935年冬，原省委特务队队长傅茨喜为组长的省委工作组（后改为工作队），到茶（陵）永（新）宁（冈）边界的九陇山区一带开展工作，开辟新的活动区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建立了一些农会、妇女会、共青团等组织和地下交通站。1935年春，萍宜安中心县委下辖的3个区，都设立了一至三个群众工作团，负责开展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工作。李发姑等几位女干部走村串户，与群众一起劳动，促膝谈心，宣传党的政策，联络骨干，建立关系，发展党员，足迹遍布村村寨寨。女干部冯秋姑等在攸县一带开展白区工作，到1937年初，先后发展了100多个党员，建立了3个区委。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在反“清剿”斗争中，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鱼水相依的密切关系。人民群众把自己的命运与红军游击队的存亡紧紧地连在一起，为红军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红军游击队斗争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送粮食、衣物、药品和情报，掩护红军游击队伤病员。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边区群众常以“济匪”、“通匪”等罪名惨遭屠杀。红军游击队活动过的长源头和芦台村，一次就被国民党“清剿”部队杀害群众数十人，烧毁房屋40余幢。吉安县一位秘密交通员的母亲，因掩护了取情报的游击队员，被国民党保安团团丁吊在房梁上拷打，宁死不屈，被活活烧死。莲花县一个叫王桂莲的妇女，多次为游击队执行联络任务，帮助游击队及时脱离险境。一次，保安团抓她带路进山“清剿”，她故意带着保安团兜圈子，保安团头目发觉后，将她捆绑起来抽打，鲜血淋漓，遍体鳞伤，仍坚贞不屈。保安团头目恼羞成怒，下令剥光她的衣服羞辱，被惨无人道折磨而死。永新县上埠村群众贺香益，因不肯为国民党军带路“迫剿”红军游击队，被国民党军割断脚筋，直至摧残身亡。这些可歌可泣的事例，充分说明了湘赣边人民群众有着优良的革命斗争传统，生动地表明了湘赣边人民的爱憎；人民群众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掩护和支援红军游击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游击战争就无法坚持、发展和取得胜利。

棋盘山会议后，由于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红军游击队在军事上、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斗争策略，使游击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至 1937 年 10 月，在湘赣边十多个县，恢复和建立了明月山、棋盘山、杨梅山、五里山、大平山、九陇山、铁镜山等大小十余块游击根据地，开创了游击斗争的新局面。

四、执行中共中央指示，游击队下山改编

（一）“卢沟桥事变”后湘赣边的状况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人民进入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新阶段。为适应全国形势和政局的变化，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中共中央于8月1日，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号召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与国民党当地驻军或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在此前后，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先后同国民党军政当局展开了谈判斗争。9月下旬，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在南昌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达成协议，发表宣言，宣布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抗日武装。要求各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改编，为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

但是，湘赣边的临时省委和红军游击队，由于长期战斗在深山密林中，这时仍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不了解全国形势的变化和党中央关于时局的主张及其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加之国民党军并没有放松对湘赣边游击区的“清剿”，以致有的游击区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停战协议后，湘赣边的红军游击队和国民党军仍在酣战中。七八月间，湘赣红色独立团先后袭击和攻克了永新县的一些区公所。直到11月上旬，红色独立团还攻打茶陵高陇区公所，歼敌70余人，缴枪百余支，独立团第2连连长邱仁标和10多个战士在这次战斗中牺牲。10月，湘粤赣边游击支队副支队长赵书良奉命前往湘赣边游击队传达有关国共合作与游击队下山改编的指示。但是，由于湘赣边三年来遭受国民党连续残酷的“清剿”，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特别是七七事变前后，又有一些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密探和叛徒，冒充游击队上级党的联络人员，以“国共合作”或其它花言巧语，诈捕边区干部和游击队员，使红军游击队在心理上与之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对实行国共合作，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样重大的转变难以置信，因而当赵书良奉命来联络下山抗日时，在游击队又无法证实赵的身份的情况下，怕上当受骗，而把赵书良当作国民党的说客，加以处决，游击队还认为是打击了敌人的劝降阴谋。以致后来陈毅上山传达党中央指示，也经受了一场风险，闹了一场误会。

（二）陈毅上山传达中央指示

就在项英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谈判，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达成协议的同时，国共两党中央代表于9月底10月初，达成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协议。10月初，项英从南昌返回赣南后，为落实南昌协议，决定派陈毅去湘赣边传达中共中央有关国共合作指示，联系游击队改编事宜。10月4日，陈毅奉命由赣州来到吉安，同国民党吉安行署专员刘振群就湘赣边游击队改编事宜进行谈判。双方就停止军事行动、游击队集中整编的地点，部队给养以及设立新四军通讯处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下旬，陈毅为了向湘赣边红军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和吉安谈判情况，装扮成绅士和商人的模样，带着项英的亲笔信和《抗

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其他有关国共合作的文件等，从吉安出发，经安福、莲花、永新等县，于月底到达九陇山，首先找到了湘赣红色独立团。这时，红色独立团的干部、战士，虽然偶尔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过有关“西安事变”、“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消息，但由于斗争形势的错综复杂，又无法得到上级党组织证实，因此把这些消息视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临时省委要求游击队员对敌人报纸的宣传绝不可轻信，对外来人员要保持高度警惕。陈毅在红色独立团首先见到了段焕竞和刘培善，由他们传达中共中央指示，解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重大意义。段焕竞、刘培善认为，陈毅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是一位党的高级干部、有名的红军指挥员，这次又是带着项英的亲笔信来的，虽一时难辨真伪，但事关重大，不能贸然处置。因此他们决定派人将陈毅护送到永新县境内的铁镜山临时省委驻地，让陈毅直接和谭余保面谈。

在铁镜山，谭余保对陈毅的突然到来满腹疑虑。他见到陈毅的穿着十分阔气，便不分青红皂白把他当作叛徒粗暴地捆绑起来，硬要他交待叛变的经过，并几番威胁要把陈毅当作叛徒和国民党说客来处置。陈毅毕竟是一位有胆有谋，经验丰富的革命家，他镇定自若，一面热情赞许谭余保坚定的革命立场，一面耐心宣传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通过分析国内外形势，阐述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党中央依据形势变化，制定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意义；同时，指出了湘赣边游击区必须从全局出发，跟上全国斗争形势，服从党的决定。陈毅以自己坦诚的胸怀和雄才大略，显示了一个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政治风度。双方的反复交谈和陈毅精辟的见解，使谭余保逐渐意识到，事情可能会出乎自己的想象和预料。谭余保几次“审讯”陈毅，但每次都被陈毅所讲的革命道理和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家的博大胸怀以及坦诚的态度所折服。谭余保出身农民，文化水平虽不高，但看问题比较尖锐、深刻，只是一时难辨真伪，所以相持了几天，对陈毅既不敢杀，也不敢放。后来经过深思熟虑，他接受了陈毅的意见，决定派人去莲花、吉安了解情况。结果证实了国共合作确有其事，陈毅是党组织派来的人。谭余保是在危难之际擎起湘赣边游击斗争的大旗，是在群众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群众革命领袖。在这次重要的会见中，显然由于特殊的斗争环境和个人经历、认识的局限，一时产生过误会，做过错事。但他毕竟是一位久经锻炼考验的、具有高度组织纪律观念的忠诚的共产党员，在他一经弄清事实真相后，便幡然悔悟，当即坦诚地向陈毅赔礼道歉，果断地表示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愿意

带领游击队下山改编。

11月中旬，陈毅返回吉安，正式成立了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陈毅的湘赣边游击区之行，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历史使命，结束了湘赣边游击区与外界隔绝长达三年之久的封闭状态，促进了湘赣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顺利实现。

（三）游击队下山整训编入新四军

陈毅离开湘赣边后，谭余保为了统一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思想认识，尽快适应历史性转变，跟上党中央的步伐，于 11 月下旬在铁镜山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组织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中央其他有关文件。他强调指出：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在这国家危难之际，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绝对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拥护国共合作，摒弃前仇，一致对外。党员干部要带头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顾全大局，愉快地接受改编。会议决定立即将党中央指

示迅速传达下去，并通知各游击队下山整编。11 月底，湘赣边各路红军游击队分别从五里山、九陇山、铁镜山、棋盘山、柑子山等地下山，来到莲花县垄上村整训改编。为了加强部队整编工作的领导，党中央还从延安派来李忠民、张秀、彭汉元 3 位八路军干部，参与指导部队的集训改编工作。1938 年 1 月中旬，项英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来到垄上看望部队，并作了重要讲话，将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 1 支队 2 团队 1 大队。

在此期间，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改为中共湘赣特委，谭余保任书记。湘赣特委利用合法斗争方式，派人前往茶陵等县同国民党县政府谈判，争取释放了被捕人员，还派出一批干部到邻近各县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抗日武装力量。通过宣传动员，边区群众踊跃参军，游击队很快发展到 400 多人。由于特委和游击队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广泛同情和支持，就连莲花、永新、安福、茶陵等县的国民党官员，也不得不派人到部队表示慰问和祝贺。

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整训，除留下 80 多人在湘赣边区继续坚持斗争外，300 多人在刘培善、段焕竟率领下，于 1938 年 2 月，奉命开赴皖南抗日前线。之后，遂川县良碧洲游击队 20 余人，经过整训也离开湘赣边区，开往抗日前线。谭余保等留在湘赣边区，领导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工作。至此，湘赣边区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宣告胜利结束。

第十三章 湘南游击区

湘南游击区位于湖南、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处，总面积数千平方公里，以湖南南部广大地区为主，主要包括湖南省的桂东、资兴、汝城、郴县、宜章、临武、嘉禾、桂阳、耒阳、常宁、永兴、安仁、衡南、衡东、酃县，江西省的崇义、上犹，广东省的乐昌、乳源等县的一部或大部地区。这里山岭绵亘、峰峦起伏、沟壑纵横，有利于部队的分散与隐蔽，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

湘南游击区在苏区兴盛时期隶属于湘赣苏区，是湘赣苏区外围的游击区域。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湘南地区开展革命活动。1925年6月，在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下，中共湘南特委在衡阳成立。此后，湘南的革命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北伐战争时期，中共湘南特委及其领导的各地党组织率领各县农民自卫军积极支援配合北伐军的进军作战。大革命失败后，又积极响应与参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朱德、陈毅等领导的湘南起义。起义军进军井冈山后，湘南特委曾两度遭到敌人严重的破坏。1931年1月，在中共两广省委的领导下重建湘南特委，并组建了主要活动在湘粤边的湘南红军游击队，开始了湘南特委领导下的游击战争。同年6月，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将湘东南、湘南两特委和赣西南的西路、南路、北路3个分区委所管辖的区域合并成立湘赣省，建立湘赣苏区，并成立中共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斗争。此后，湘南特委及湘南地区的游击战争即归属中共湘赣省委领导。但由于斗争环境恶劣，湘南地区始终没有发展成为苏区。

1934年8月，湘赣苏区的主力红军红6军团奉命由湘赣苏区西征。此后，湘赣苏区的革命斗争即转入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隶属湘赣苏区的湘南游击区也同时进入了新的斗争阶段。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湘南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除原有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2大队、湘南赤色游击队第3大队外，还先后成立了湘南红军支队、湘南赤色游击队、湘粤赣边游击支队等游击武装。由于形势恶劣，湘赣省委在与湘南游击区几乎断绝了联系的情况下，很难对该游击区实施领导。即使中共湘南特委及后来成立的中共湘粤赣边特委也没有形成对全游击区的统一领导，两个特委虽曾一度建立过统一的中共湘南军政委员会，但在严峻的斗争环境下，很快解体。而上述几支游击队都各自在所在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下，独立地开展游击战争，并逐渐分别形成了东西边山、湘粤边、耒安永和茶安酃4块游击区。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各支红军游击队面对国民党正规军及地方武装重兵“清剿”，虽数度受挫，但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及时地总结经验，并抓住战机，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始终擂响着该游击区的斗争战鼓，保存了该游击区。至抗日战争到来之时，仍保存了3块游击区，并通过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湘南3支红军游击队共500余人，先后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

一、红 6 军团西征后湘南的斗争

（一）红军长征两度过境，湘南红军支队的成立与失败

1934年8月至11月间，长征中的红6军团和中央红军先后经过湘南的桂东、汝城、资兴、宜章、郴县、桂阳、嘉禾、临武、蓝山等县。主力红军的两度过境，对湘南游击区的影响很大，主力红军每到一地都积极宣传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并为加强地方革命武装，向游击队赠送一批枪支。同时帮助地方党组织加强建设。如：中央红军过宜章县时，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弼庭就约见中共湘南特委负责人。对湘南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发展等问题作了指示。同时，红军主力在宜章、郴县等地留下了七八百伤员，他们有一部分伤愈后归队，有一部分则留在湘南坚持斗争，充实了湘南游击武装的力量。红军主力过境时，湘南党组织积极配合红军的战略行动，为迎送红军，筹集了大批粮草、款项，发动群众打制大批草鞋给主力红军，并率游击队，配合主力红军在宜章、汝城等县境内摧毁了许多国民党军及其地方武装修筑的炮楼。同时，在为主力红军带路，安置红军伤员等方面亦做了大量工作，并动员一批工人、农民参加红军，为红军输送了一批有生力量。时任湘南特委书记的王涛，也随主力红军长征离开了湘南。湘南党组织的积极配合，为主力红军顺利通过湘南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军长征过境后，11月中旬，中共湘南特委进行了人员调整，由原特委副书记彭林昌接替王涛任特委书记，陈梅连任组织部长，尹志进任宣传部长，刘霞任军事部长，徐克全、余稼生、谷子元、林长春（即张春林）等为委员。湘南红军游击队的武装斗争在过境主力红军的帮助和影响下蓬勃地开展起来，引起了国民党湖南当局的重视。12月7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为重点“清剿”中共湘南特委驻地及红军伤病员集中地——郴县、宜章边界的五盖山、骑田岭地区，特将郴县、宜章划为“剿匪”特别区，由国民党湖南保安第8区司令欧冠任该区绥靖处主任，下设“清剿委员会”，调集1个正规师，会同该区所属各县保安团、“铲共队”，向该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清剿”。面对扑面而来的白色恐怖，当月中旬，中共湘南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特委机关迁往耒阳，另设湘南特委郴宜办事处领导当地斗争。会后，徐克全、刘霞率特委机关向来阳转移。兼任郴宜办事处书记的彭林昌随即召开办事处领导成员颜赤爱、余稼生、谷子元、黄体国、林长春、肖良略等开会，决定以伤愈的红军伤病员为主体，加上部分地方干部和地方游击队员组成湘南红军支队，由原红军某部营长颜赤爱任支队长、余稼生任政治委员、谷子元任政治工作团主任。支队下辖3个大队，总计有150余人枪。同时，扩大以张东任大队长的郴县游击队，并组建肖福生任大队长的宜章县游击大队。

湘南红军支队成立后，根据郴宜办事处的指示，决定前往临武开辟新区，以将“清剿”郴宜地区的敌人西引，减轻骑田岭、五盖山的压力，并由郴县、宜章两支地方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并照料红军伤病员。湘南红军支队随即西行，经东溪、南溪、野牛岭、大山岭及桂阳县的杆塘、新塘，最终抵达临武县之水银山、香花岭，驱逐了香花岭的伪警察，镇压了当地银矿的反动头子，并在征战途中扩大游击队员200多人。然而，正当湘南红军支队西进临武时，12月下旬，在国民党军及地方武装的重兵“清剿”中，五盖山、骑田岭地区的革命力量却遭受到严重损失，郴、宜两县游击队被打散，在郴县、宜章两县山上养伤的红军重伤员几乎全部遇害。中共郴县县委书记陈文光叛变，杀害了特委书记彭林昌与郴宜办事处的2名干部，使郴宜办事处遭彻

底破坏。此后，即由徐克全继任湘南特委书记。

1935年1月，欧冠调集桂阳、嘉禾、蓝山、临武等县的保安团约2000人，向临武地区的湘南红军支队实施“清剿”，在临武地区立足未稳的湘南红军支队鉴于敌强我弱，部队又多为刚刚伤愈的战士，大多体力不支，战斗力较弱，且弹药衣食匮乏，遂决定停止西进而回撤，并派第3大队先行返回郴县，拟向特委请示。孰料该大队返回五盖山后，因不了解情况的变化，被已任国民党“铲共义勇队”队长的叛徒陈文光率部缴了械。

湘南红军支队第1、2大队在临武地区补充部分人员后，边打边向郴宜地区回撤，行至郴县、桂阳交界的正和圩、十字邓家附近的五路击鼓寨子时，遭到桂阳、郴县反动武装的前后夹击，队伍被打散，全支队仅余40余人。后经支队领导研究，决定由余稼生、谷子元等7人回五盖山寻找第3大队，并向特委郴宜办事处汇报情况；而由颜赤爱率余下的30余人到郴县、桂阳、临武3县边界地区的南溪、观音山、野牛洞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同年4月，颜赤爱率部转战至桂阳毛栗区活动时，部队仅余10余人，又遭到国民党军保安团包围。突围中，负伤的颜赤爱和余下的几名干部战士全部被俘。至此，湘南红军支队全部失败，番号不复存在。

余稼生、谷子元等湘南红军支队余部7人回到郴县后，得知了特委办事处被破坏，湘南红军支队第3大队被缴械的情况，随即经宜章转移至广东乐昌地区，并于5月成立了中共湘粤边工委，由谷子元任书记，贺畔朵、余稼生、肖良略、林长春为委员，继续领导和开展当地的游击战争。

（二）湘南赤色游击队第 2、第 3 大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主力红军长征后，湘南地区原有的两支红军游击队，即活动在茶（陵）安（仁）酃（县）永（兴）边境地区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 2 大队和活动在耒（阳）安（仁）永（兴）边境地区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 3 大队，分别在中共茶安酃永边委、中共耒安永中心县委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灵活机动地不断打击敌人。

1934 年 11 月下旬，正在永兴县大岭地区活动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 3 大队发现永兴县保安团 1 个连向大岭进犯，第 3 大队立即在耒安永中心县委书记谢竹峰及大队长刘德兑，政委刘厚总的指挥下，从三面向敌人包围。敌人一触即退，结果第 3 大队俘敌 2 人，缴枪 2 支。此时，第 3 大队已发展到 80 余人，枪 60 余支。12 月中旬，中心县委鉴于敌人 1 个正规连驻守在安仁县华王庙，对游击

队在耒安边界的活动是一个大障碍，决定袭击华王庙。25 日晚，第 3 大队冒雨赶至华王庙附近。26 日清晨，按计划 12 名游击队员利用赶集的日子化装潜入华王庙镇内，趁集市之乱，在毙伤敌 10 余人、缴枪 8 支后，迅速撤离，给敌人以很大震动。当月，中共湘南特委派刘厚春任湘南赤色游击队第 3 大队政委，原政委刘厚总改任大队长，原大队长刘德兑调任耒阳县竹市区委书记。同月，中共茶安酃永边委书记李运田携款潜逃，即由陈梅连兼任书记。

1935 年 1 月，国民党湖南保安第 5 区副司令王炽昌率保安第 14 团另 1 个连，对活动在茶陵、安仁、酃县、永兴边界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 2 大队实施“清剿”。2 月，湖南保安第 5 区司令段珩率 1 个整编旅在耒阳、安仁、常宁、衡南、永兴 5 县保安团配合下，对活动在耒阳、安仁、永兴边界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 3 大队大肆“清剿”，敌人兵力 60 余倍于第 3 大队，约 5000 余人。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第 2 大队、第 3 大队决定一面伺机打击敌人，一面化整为零，避敌锋芒，到敌后开展游击活动。2 月 4 日，游击队第 3 大队利用春节敌人疏于防范的时机，袭击国民党驻耒阳县八焦的“铲共义勇队”，击毙该队队长，俘敌 30 余人，缴枪 30 余支。3 月上旬，游击队第 2 大队在酃县袭击地方保安团碉堡 2 座，毙伤敌数名，缴枪 2 支。中旬，谢竹峰在董溪主持召开耒安永中心县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粉碎敌人的“清剿”，会议分析了红军长征后湘南的斗争形势，研究了当前的任务，决定：积极扩大游击队；开辟新的游击区；游击队由公开转为隐蔽，由集中转为分散；加强思想教育，防止内部人员叛变投敌。尔后，鉴于敌人“清剿”日紧，为避其锋芒，保存实力，游击队第 2、第 3 大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分散转移至国民党军力量较弱的永兴、衡山、衡南等县的偏僻深山中隐避活动。

中共耒（阳）安（仁）永（兴）中心县委及湘南赤色游击队第 3 大队，在斗争中认识到光钻深山躲起来是不行的，要改变被动局面，必须相机主动打击敌人。1935 年月，湘南赤色游击队第 3 大队一部在耒阳县龙塘孙家桥伏击敌巡逻排，毙伤敌 3 名，缴枪 3 支和弹药一批。随后，又奔袭常宁县荫田国民党警察所，全歼该所之敌，缴枪 8 支。湘南赤色游击队第 3 大队另一部则袭击耒阳县坪田敌碉堡，毙敌 1 名，缴枪 8 支。之后，大队长刘厚总集中全队力量，利用夜暗，在耒阳县黄狗恋窝伏击湖南国民党保安第 14 团 1 个搜剿连，毙敌 8 名，伤 30 多名，缴枪 12 支、子弹 1000 余发。经过艰苦的斗争，

湘南赤色游击队第3大队建立了以耒阳竹市区为中心的游击区。湘南赤色游击队第2大队以安仁县潭湾为中心，在茶安酃永边境地区亦积极开展游击活动。通过不懈的斗争，湘南赤色游击队第2、3大队的游击活动区域很快就发展到耒阳、安仁、永兴县大部 and 衡南、衡山、酃县、茶陵一部。

（三）湘赣独4团等部进入湘南

1934年8月，红6军团西征时，留在湘赣苏区坚持斗争的湘赣军区所辖的红军独立第4团奉命开往湘南，掩护红6军团的行动，进抵湘南资兴地区后，红6军团继续西进，军团领导人鉴于独4团已完成掩护主力的任务，令该团返回湘赣游击区。独4团在回返途中，在永兴东北的八面山一带与国民党军一部遭遇，行动受阻，遂转移至酃县地区活动整顿。尔后，该团返回湘赣游击区的遂川、万安、泰和地区活动。然而敌人“清剿”频繁，独4团难以在这一地区立足，遂决定再度前往湘南活动。

1935年1月，独4团600余人，在团长李宗保、政委旷珠权指挥下，经江西的上犹、崇义，进入湘南的酃县、桂东、资兴、汝城，当时，原湘赣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部长方维夏、湘赣军区第4分区司令员张通、中共湘赣北路特委书记陈山等亦随独4团开往湘南。进军湘南途中，独4团连续与反动地方武装作战，并进行打土豪筹款、宣传群众等工作。独4团的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国民党粤军第1军军长兼江西第6绥靖区司令官余汉谋，急忙调兵“驰剿”，湖南保安第8区司令欧冠，坐镇资（兴）永（兴），指挥“清剿”。3月下旬，独4团在资兴的壕仁圩，遭国民党地方武装欧阳归和欧九如部的联合伏击，部队虽经奋勇拼搏突出重围，但伤亡甚重。翌日，独4团团团长李宗保在资兴青腰圩叛变投敌，被国民党委任为上校招抚员，并带着敌人“清剿”独4团。在这种形势下，团政委旷珠权、团参谋长龚正芳、团政治部主任徐紫等也先后叛变投敌。危急时刻，方维夏挺身而出与陈山整理部队，并率尚有近百人的独4团余部转移至东边山，与桂东县游击队队长罗荣所部会合，两部计有160余人，在东边山地区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在李宗保叛变前，张通带着独4团的一个连欲往湘赣寻找省委。后该部活动在湘南的新田等县。

在湘赣军区独立第4团开抵湘南后，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根据中央分局的指示，率领红24师第71团从中央苏区突围，经赣粤边转向湘南。后来龚楚带余部100余人抵达湘南桂东的东西边山地区，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

二、两个特委并存与合并，各支游击队独立坚持斗争

（一）中共湘粤赣边特委与游击支队的建立

蔡会文等率部进抵湘南 1935 年 4 月，原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根据中央分局指示，率领所属部队及红 24 师第 70 团余部一起编成的两个大队约 300 人，由赣粤边经崇义、上犹，到湘东南的汝城、桂东一带巩固发展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并设法与突围至湘南的红 71 团及中共湘赣省委取得联系。不久，红 24 师第 70 团政治部主任游世雄也遵照项英、陈毅的指示，率领赣粤边游击区北山红军游击队 100 余人由广东南雄进入湘南地区，以求与蔡会文部会合。游世雄率部进入湘南后，即在桂东县西边山吊古寮遭国民党湖南保安第 5 区副司令胡凤璋部 1 个营和资兴、桂东等县保安团计 800 余人的进攻。经激战，游世雄部在毙伤敌多名后，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赤水仙会议与游击战争的开展 4 月下旬，蔡会文率部在桂东的东边山地区先后与红 24 师第 71 团余部、方维夏和罗荣率领的湘赣独立第 4 团余部及桂东县游击队、张通率领的湘赣独立第 4 团 1 个连、游世雄率领的北山游击队等部取得联系，各部游击队集中在东边山地区。蔡会文召集各游击队的领导人在桂东县东、西边山交界的赤水仙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分局长岭会议精神，研究了如何开展湘南游击区游击战争的问题。在分析了湘南地区的形势后，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湘粤赣边特委，将各部游击队合编为湘粤赣边游击支队，以东西边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以巩固和扩大湘南游击区。湘粤赣边特委以陈山为书记，李国兴任组织部长，方维夏任宣传部长，蔡会文、龚楚（不久，率部分人员在郴县投敌叛变）、游世雄、罗荣，张通、王赤等为委员；湘粤赣边游击支队以蔡会文任支队长兼政委，游世雄任副政委，罗荣任参谋长，李国兴任政治部主任，支队部设在赤水仙，支队下辖 7 个大队，共七八百人。

赤水仙会议后，东、西边山的各红军游击队有了统一的指挥，加之国民党军此时集中兵力“追剿”长征中的红军和“清剿”原中央苏区及湘赣游击区等，湘南地区的敌武装相对减弱，湘粤赣边游击支队即利用主客观条件有利的时机，活跃地开展着东、西边山的游击战争。根据赤水仙会议的决定，游世雄、李国兴各率 1 个大队到西边山活动，张通率 1 个大队到酃县、桂东、资兴交界地区活动，蔡会文则率领主力留在东边山。

中共湘粤赣边特委和游击支队成立后，蔡会文即派人到赣粤边的油山和湘赣边界地区，分别向中央分局及中共湘赣省委报告东、西边山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情况。湘赣省委亦积极设法与湘南游击区的党和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在得到蔡会文的报告后，即令湘赣独立第 5 团前往湘南，寻找湘粤赣边游击支队。5 月，转战至湘南的独 5 团第 3 营，在汝城与桂东接壤的八面山与湘粤赣边游击支队一部会合。尔后，两部共同行动，在湖南临武县歼该地保安团 1 个营大部，俘敌近百人，缴枪数十支。此后，湘粤赣边游击支队这一部分转往赣南，独立第 5 团第 3 营继续在湘南活动，并在新田与张通带领的湘粤赣边游击支队一部会合，尔后两部一同返回湘赣游击区。

湘粤赣边游击支队分头行动后，各部都积极寻找战机，打击敌人。5 月，国民党粤军第 1 军军长余汉谋令其第 1 师副师长彭霖生率部“清剿”东边山红军游击队。蔡会文率领湘粤赣边游击支队的两个大队在江西门两侧的山脊上设下埋伏，毙伤进入伏击圈的彭霖生部多名后，主动撤离战场，转而突袭余汉谋老巢——江西省大厦县城，余汉谋即下令彭霖生停止“清剿”，返回

保护大庾，彭霖生部对东边山的“清剿”即告破产。

在余汉谋部“清剿”湘南游击区的同时，国民党湖南保安第8区司令欧冠、保安第5区副司令胡凤璋再度调集所部“清剿”湘南游击区。7月，湖南保安第17团及桂东县保安团共2个连的兵力。在第17团团长沙宗汉率领下向东边山发动进攻。蔡会文得到群众送来的这一情报后，即率3个大队在桂东县显垅、刘家排地区进山的要道两侧设伏，在毙伤敌多名后，击退了敌人的进攻。8月中旬，何宗汉不甘心失败，率1个团再度进犯东边山。蔡会文率5个大队在显垅、刘家排再次设伏，经激战，敌军在伤亡惨重后，再度溃败，红军游击队俘敌6人，缴枪20余支。当月，湘粤赣边游击支队的1个大队在崇义县高山松地区与敌1个保安团交战，毙伤敌20余人，缴枪5支。9月，中共酃县县委书记周礼接到蔡会文的指示后，率酃县游击队新9营到东边山编入湘粤赣边游击支队。因李国兴已去西边山，周礼即接任湘粤赣边特委组织部长兼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10月，何宗汉率所部及吴亮明为团长的桂东县保安团共1个营的兵力，再次“清剿”东边山。蔡会文集中游击支队6个大队的兵力埋伏在显垅、刘家排、五里拗一线要道的两侧，以1支小分队与何宗汉部交战，即佯装不支而退，将敌诱至伏击圈，仅经半个小时激战，红军游击队即歼敌1个连，击溃敌两个连，缴枪40余支。战后吴亮明被撤职，何宗汉亦受到其上司的训斥。

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在积极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湘粤赣边游击支队还大力开展游击区的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打土豪。游击队惩治了一批平日欺压百姓，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将他们家中的大批粮食、布匹分给群众。同时，游击支队在游击区帮助建立党、团组织，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东、西边山大部分村寨中都发展了党员，建立了一批党的基层组织。游击队还在自己内部进行了群众工作和群众纪律的教育，他们帮助在敌“清剿”中被敌人烧毁住房的群众盖新房，将游击队自己准备购置被装的钱拿出来救济群众。无论斗争环境多么艰苦，红军游击队都严格遵守红军纪律，购买群众的东西按市价付款，损坏群众的东西照价赔偿。平时，宁愿自己露宿山上，也不进驻民房。游击队的行为，赢得了游击区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他们积极参加中共基层党支部建立的游击小分队，专门执行为红军游击队带路、侦察、警戒等任务。游击支队还利用战斗间隙广泛开展练兵活动，各部队开展了伏击、夜间突袭、迂回穿插、射击、投弹、攀山等战术技术科目的训练，并组织干部学习各种游击战法。同时，党和游击支队的领导还十分注意部队的思想教育，蔡会文、方维夏等领导人经常亲自给党员上党课，给部队讲形势、任务和光明的前途，从而提高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湘粤赣边特委和游击支队的努力下，以东、西边山为中心的方圆数百里游击区的游击战争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不仅游击支队始终保持在千人左右，各县党组织所辖的地方武装也普遍恢复建立起来。

（二）潭湾会师，湘粤赣边游击支队受挫后继续坚持斗争

游击支队受挫湘南游击区的蓬勃发展，使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十分震惊。1935年11月，国民党先后从广东、江西、湖南调集正规部队和10多个地方保安团、“铲共队”共5万余人的兵力，实施政治、军事、经济“三管齐下”的方针和杀光、烧光、抢光的残酷手段，又一次大规模“清剿”湘南游击区。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采取“围剿”、“驻剿”、“追剿”、“搜剿”相结合的方法。在政治上，采用移民、并村、封山等方式，千方百计隔断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实行严密的保甲制度，规定：“一家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利用叛徒在游击区各地设立“招抚”处，对游击队实行“政治瓦解”，引诱游击队干部队员叛变投敌。在经济上，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限制群众只能购买一定数量的粮、油、盐和日用品，多买了就以“济匪”论罪，规定：与匪买粮油者杀，与匪买日用品者杀，与匪买药者杀等。

国民党军的大规模“清剿”，使游击区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中。各游击队的斗争环境更加艰苦，特别是湘粤赣边游击支队是湘南游击区规模最大的红军游击武装，因而引起敌人的格外注意。在“清剿”中，敌人调集近3个师的兵力将蔡会文率领的游击支队领导机关及主力包围在东边山地区的朱冠山一带，游击支队虽浴血奋战，予国民党军以重创，但终因寡不敌众，在突围中，游击支队大部壮烈牺牲，蔡会文、陈山、周礼等领导人各率突围出来的一部人员分散行动。不久，蔡会文率领的10余人在朱冠山与中共湘赣省委派来联络的湘赣少共省委书记王用济率领的1个班会合，蔡、王遂决定避开敌人的围追，到湘赣游击区的武功山，与湘赣游击队会合。然而，他们派下山购买食品的一个管理员被俘后叛变投敌，并带敌人1个营于12月4日前来赤水仙偷袭蔡、王所部，蔡会文遂率部奋起抗击，欲冲出敌围，但敌蜂拥而至，除蔡会文警卫员1人脱险外，蔡会文受伤被俘，其余30余人全部遇难。敌人俘获蔡会文后，兴高采烈，用竹椅抬着蔡，拟送往江西赣州邀功，蔡宁死不屈，拼命抗争，当即被敌人杀害。他的牺牲，使湘南游击区的游击战争遭受重大损失。

湘粤赣边游击支队主力虽然遭受严重挫折，但分散在东、西边山的游击支队余部没有被吓倒，他们时时寻求战机，打击敌人，坚持斗争。1936年2月，游世雄、李国兴率领西边山的湘粤赣边游击支队的2个大队突袭资兴县青腰圩敌“铲共队”，俘敌20余人，缴枪21支，鼓舞了处在白色恐怖中的游击区军民的斗志。3月上旬，敌调兵将游世雄、李国兴所部包围在西边山上，游、李遂率部突出敌围，转移至酃县地区活动。下旬，周礼亦率湘粤赣边游击支队一部由东边山经西边山转移至酃县西坑，与游、李所部会合，两部共200余人。这时，因蔡会文牺牲，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亦负伤离队休养（后陈山于3月被俘在衡阳投敌叛变），周礼遂召集党的干部会议，研究下一步如何坚持开展斗争等问题。会议决定由周礼接任湘粤赣边特委书记兼湘粤赣边游击支队政委，游世雄任支队长。鉴于得知湘南特委及陈梅连领导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2大队活动在安仁县潭湾，会议决定为保存和扩大有生力量，特委和游击支队撤至潭湾。会后，周礼、游世雄率部在酃县击退叛徒李宗保率领的从东边山追来的“铲共团”，毙其10余人，摆脱了尾追之敌。不久，湘粤赣特委宣传部长、在党内德高望重的方维夏，在仙背山养病时被叛徒杀害。使湘南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继蔡会文牺牲后再次蒙受了重大损

失。

潭湾会师 4 月上旬，周礼、游世雄率部进抵潭湾，与以徐克全为书记的中共湘南特委和陈梅连领导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 2 大队会合。此前，第 2 大队以潭湾为中心，一直在茶安酃永边境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斗争。两个中共特委和两支游击队在潭湾会合后不久，国民党军粤军第 1 军第 1 师副师长彭霖生在桂东县沙田召开湘粤赣三省“清剿”会议，扬言 3 个月肃清省境内的红军游击队。为了对付敌人新的进攻，研究两部会合后游击战争如何开展等问题，5 月 27 日，湘粤赣边特委和湘南特委在潭湾杉木坑召开联席会议，湘粤赣边特委的周礼、游世雄、李国兴、王赤及湘南特委的徐克全、刘霞、陈梅连等参加了会议。会上，双方汇报了各自的工作情况，分析了湘南游击战争的形势和敌情，研究了下一步游击战争的任务。会议为加强和统一湘南地区党的领导，决定撤销两个特委，成立湘南军政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新的湘南特委，徐克全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周礼任副主席兼湘南特委书记，刘霞任特委组织部长，游世雄任特委军事部长，李国兴任特委宣传部长，陈梅连等为特委委员。

湘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正准备根据潭湾会议精神，以潭湾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党的组织，扩大这块游击区时，国民党湖南保安第 5 区司令段珩得知了湘南党的领导机关和两支游击队汇聚潭湾的情况，便于 6 月上旬调集保安第 14 团全部、保安第 9 团一部及附近各县保安团共 2000 余人兵力“清剿”潭湾地区。面对强敌，党和游击队中的少数意志薄弱者发生了动摇，首先是徐克全以下山了解情况为由弃枪逃跑，继而军政委员会机关部分人员亦逃跑或叛变，导致湘南军政委员会的解体。危急时刻，湘南特委在潭湾土坡里召开紧急会议，批判了徐克全等贪生怕死、丧失革命信念的行径，认为应面向湘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而不应局限在以潭湾为中心的这一小块地区内。于是，会议决定特委领导各游击队到湘南各地区分散活动，确定：游世雄率湘粤赣边游击支队返回桂东、汝城、资兴地区，巩固和发展东、西边山游击区；刘霞、李国兴、陈梅连率湘南赤色游击队第 2 大队到茶陵、安仁、酃县边境活动；周礼去寻找和领导在耒阳、安仁、永兴地区活动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 3 大队和于 1935 年 3 月成立的李林等领导的活动在郴县、宜章及广东乐昌、乳源一带的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

坚持东西边山的斗争游世雄等根据潭湾紧急会议决定，率湘粤赣边游击支队 100 余人返回西边山后，即于 6 月中旬，召集干部会议，成立了中共西边山区委，游世雄任书记，杨汉森任副书记，赵书良、王赤、顾星奎等为委员，并组建 3 个工作团，分赴桂东、汝城、资兴等地，恢复建立各地党组织和游击武装。同时，会议还将湘粤赣游击支队整编为 1 个大队，赵书良任大队长，游世雄兼政委，王赤任副政委。7 月，湘粤赣边游击支队又发展至 200 余人，扩编为 2 个大队，第 2 大队由王赤率领到东边山开展游击活动。10 月，叛徒陈山受敌委派遣回西边山活动，因湘粤赣边游击支队领导人不知陈叛变真相，遂被其骗取了湘粤赣边游击支队党的领导权。

1936 年冬，国民党军再次以重兵“清剿”东、西边山地区，并利用叛徒带路，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搜剿”，企图与陈山里应外合，消灭湘粤赣边游击支队。“清剿”中，敌人强迫大批群众烧山伐树，企图使游击队无藏身之所，游击队面临着少吃缺穿，缺弹少药等严重困难，且天天为躲避敌人而连续行军转移，疲惫不堪，但支队干部战士在困难面前，没有丧失革命的意

志和信念，顽强地坚持斗争，他们以野菜、野果充腹，敌人把山烧光了，他们就藏进山洞，不仅和困难斗，而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与敌人斗，他们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西，时而东，不断地袭扰“清剿”中的国民党军，打击逼迫群众烧山的反动乡长、保长，处决叛徒。1937年1月，游世雄等率湘粤赣边游击支队一部先在西边山木丘袭击国民党军1个排，毙伤敌5人，俘敌10余人，缴枪10支及一批弹药和军用物资。继而，湘粤赣边游击支队一部又袭击西边山龙溪场下国民党1个保安团，毙敌20余人，俘敌15名，缴枪45支及一批弹药和军用物资，打击了敌人的“清剿”锐气，改善补充了部队的武器装备，解决了目前游击队的供给。不久，游世雄等得知了陈山叛变革命的真相，即处决了他，同时在西边山洪水山召开游击支队班以上干部整顿会议，以消除陈山给游击支队所造成的一些危害。

4月，游世雄以湘南特委代表名义致信在东边山领导游击斗争的王赤，指示成立中共东边山区委和重建西边山区委，由王赤任东边山区委书记，邹云雄任西边山区委书记，并组建以顾星奎任书记的中共资（兴）汝（城）桂（东）特委，还调整了游击支队的领导，以湘粤赣边游击支队第1大队大队长赵书良兼任支队长，罗新成代理支队政委，游雪高任第2大队大队长，王赤任第2大队政委。信中还指出，东、西边山区委及支队一切工作均由特委和游世雄领导指挥。6月，胡凤璋率600多人马再次“清剿”湘粤赣边游击支队，游世雄等指挥游击支队的2个大队在东、西边山地区与胡凤璋部兜圈子，并寻机打击胡部，终使其连连受挫，铩羽而归。东、西边山的红军游击队就是这样顽强地坚持斗争，使敌人彻底消灭湘粤赣边游击支队的企图一次次地破产。

（三）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的成立和反“清剿”斗争

1935年3月，原湘赣军区独立第4团干部队队长李林，率领红军长征留在湘南的6名红军伤员在郴县组成湘南赤色游击队（一称湘南红军独立大队），李林任队长。尔后，游击队即积极活动于郴县、宜章地区。至下半年，湘南赤色游击队发展至30余人。

湘粤边游击队的成立同年7月，由于敌人的重兵“清剿”，郴州、宜章地区的斗争形势日趋严峻，李林遂决定部队撤至宜章、广东乐昌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于是，湘南赤色游击队一部首先转移至乐昌地区，并找到了谷子元为书记的中共湘粤边工委。随即，湘粤边工委在湘南赤色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了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亦称湘南赤色游击大队），由肖良略任大队长、林长春任政委、蒋玉林任副大队长，计有20余人。9月，李林率领湘南赤色游击队其他人员也到达广东乐昌县，在坪石与谷子元等及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会合，李林部即编入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李林被增补为湘粤边工委委员，并接替肖良略任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大队长，肖良略改任副大队长。随后，游击队深入群众，开展广泛的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组织，并努力扩大游击武装，当年冬，游击大队即扩大到90多人枪，在湘粤边境的宜章、郴县、乐昌、乳源边界地区建立了自己活动的基本区域。

反“清剿”斗争国民党军在“清剿”湘南游击区其它游击队的同时，亦未放松对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的“清剿”。由于敌我众寡悬殊，游击大队在反“清剿”中迭遭损失，使全大队只余10余人。1936年2月，李林率游击大队根据获得的情报，在郴县良田到廖家湾的公路上伏击了一辆反动资本家到坪石贩卖食盐的汽车，击毙押车的敌兵后，缴获13000枚银元。尔后用这笔钱款，从广东韶关买回了20多支枪和一批弹药，改善了游击大队的武器装备，游击队作战能力明显加强，并积极打击国民党地方保安团。国民党立即调集粤北保安团“清剿”正在乐昌地区活动的游击大队。李林等遂率游击大队转移到郴县、宜章活动，并先后镇压了一批叛徒、恶霸和反动保长，到下半年，游击大队又发展至20余人。到郴宜地区后，李林遂率游击队一部，携带一批钱款，前往耒阳找到了徐克全为书记的湘南特委，向特委汇报了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的情况，上交了一笔钱做革命经费。返回郴宜地区后不久，李林又率1个班携带一批钱款，再度前往耒阳，与湘南特委联系，结果，途中遭到叛徒李宗保“铲共团”的围追。他们边战边走，在耒阳没有找到特委，只得回撤，结果待返回坪石，与谷子元率领的留守人员会合时，前往耒阳的部队仅余李林等3人。这时，游击大队尚有10余人。

1936年9月，湘南特委书记周礼在坪石与谷子元、李林等取得了联系，并在周礼的主持下，召开了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周礼留在当地主持工作，与李林等领导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坚持游击斗争，谷子元到湘南临武、嘉禾、桂阳、宜章地区恢复发展党组织，开辟新区，不久，即在当地建立了一批基层党组织。与此同时，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也在乐昌等地宣传发动群众，领导农民抗租抗税，打土豪筹集经费，动员广大青年参加游击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游击大队又发展至60余人。一次，敌人从乐昌县城调2个连前往坪石“清剿”。游击大队昼伏夜出，声东击西，使敌防不胜防，坐卧难安，只好收兵而归。游击大队还组织游击区内的群众配合游击大队连续拔除了数

个敌人碉堡，缴获了一批枪支。1937年春，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在粤北国民党军和欧冠部联合“清剿”下，部队再次减员至二三十人，随即分散隐蔽在岩洞、丛林中，伺机打击敌人。9月，李林率游击队在离宜章县城很近的官坵冲处决了一个曾向敌告密，使游击队20余人遇害的反革命分子，游击区群众拍手称快。总之，尽管在敌人屡次的重兵“清剿”中，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虽数度受挫，但他们没有丧失革命斗志和对革命未来的坚定信念，始终在湘粤边境坚持着艰苦的游击战争。

（四）湘南赤色游击队第2大队失败，第3大队继续坚持斗争

1936年6月以后，由于国民党湖南保安第5区司令段珩调集重兵“清剿”，活动在茶安酃地区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2大队和活动在耒安永地区的第3大队日益感到行动困难，他们千方百计设法改变被动局面，但由于敌我众寡悬殊，收效甚微。9月，在湘南特委书记周礼的主持下，刘霞、李国兴、谢竹峰等在衡阳、衡山、安仁3县交界的四方山开会，决定特委机关和各游击队避开强敌，在四方山等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偏僻地区活动。会后，周礼前往宜章、乐昌地区指导检查李林部的工作。

10月，在耒阳县竹市地区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3大队得到耒阳县工委关于相机袭击耒阳县城的通知。原来，耒阳守敌大部分赴各区，乡催征粮钱，只留下保安团一个连驻守。于是，第3大队随即向耒阳挺进。途中在廖家冲消灭了10余个在当地催征田赋的挨户团团丁。正当第3大队准备由廖家冲前往袭击耒阳县城时，由于当地地主劣绅告密，耒阳县保安团从县城及江头、敖山、芭蕉、竹市调集保安团、挨户团400余人，将第3大队包围于廖家冲附近的铁杆坳。在突围中，中共耒阳县竹市区委书记刘德兑、第3大队副大队长雷秀炳等8人牺牲，3人负伤，加上散失人员，使第3大队由80余人减员至四五十人。但损失并没有阻碍游击队抗敌的勇气。此后，第3大队汲取教训，相机打击敌人，接连打了几个好仗，歼敌近200人。

11月，湘南赤色游击队第2大队副大队长周二苟经受不住艰苦斗争的考验，叛变投敌，并勾结敌人杀害了中共茶（陵）安（仁）酃（县）永（兴）边委妇女部长肖三妹等12人。

1937年2月，国民党军对湘南游击区再次实行新一轮大规模“清剿”，红军游击队的处境更加困难。当月，湘南赤色游击队第2大队被敌包围于茶陵县仙背地区，第2大队虽拼死突出敌围，但部队伤亡大半，主要领导人陈梅连亦负伤被俘，不久被敌杀害。此后，第2大队未能摆脱困境，在永兴、安仁境内屡遭敌人袭击，大队政委谭绥眉、大队长谭经武先后牺牲，该队余部失去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在山上坚持斗争，后散失，番号不复存在。

3月，中共湘南特委机关在安仁县境内被敌围困，经激战，大部人员突出敌围。但突围出来的特委机关及武装护卫队共40余人刚转移至衡南、耒阳县交界处的一座山上时，再度被追踪而来的敌保安团包围，战斗中，30余人壮烈牺牲，特委机关遭到彻底破坏。后来，留在耒阳活动的特委组织部长刘霞又因叛徒、原湘南团特委副书记王崇甫的出卖被捕。他宁死不屈，并在狱中秘密写了一封信给党中央，汇报了以周礼为书记的湘南特委还在领导当地游击斗争的情况，直至被敌杀害。

1937年春，湘南特委书记周礼从乐昌回到耒阳，再次指示湘南赤色游击队第3大队避开强敌，化整为零，隐蔽活动，以保存革命有生力量。此后，第3大队即分散至耒阳、安仁、永兴等县的偏僻乡村活动，在这些地区建立农民革命组织，发动农民抗租抗债，打土豪，袭击敌人的武装关卡，并寻机打击敌人的地方组织。6月，第3大队向驻有敌保安团一个排的国民党耒阳县仁义乡乡公所发动袭击，毙敌3人，余人全部被俘缴械。在强敌一次又一次的“清剿”，面前，第3大队尽管受到了一些挫折，但他们始终怀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顽强地坚持游击战争，适时地改变斗争方式，终于使敌人消灭这支游击队的阴谋屡告失败，第3大队胜利地渡过了游击战争中最艰苦的

岁月。

三、实现合作抗日，游击队下山改编

（一）湘粤赣边游击支队的改编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欲在国共合作未达成协议前，消灭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武装的企图破产后，又变换手法，想在国共合作的大趋势下，将红军游击队收编为保安团，以改变红军游击队的性质。1937年春夏之间，叛徒李宗保受国民党委派找到东、西边山的湘粤赣边游击支队，转达了国民党想收编红军游击队的意图，当即遭到游击支队的斥责。湘粤赣边游击支队由于失掉了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又长期处在国民党的封锁下，转战在深山密林中，和外界几乎断绝联系，因而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势不甚明了，只是从主观上认定决不能投降国民党。

1937年9月，项英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写信，并派人将信送至湘粤赣边游击支队，信中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决策和将南方各游击区红军武装改编为抗日武装的决定，并指示游击支下山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求得停战合作抗日。接到信后，湘粤赣边游击支队领导人立即开会，认为这又是敌人的欺骗花招，大家都不相信国共会携手合作。但支队中有人认识项英的笔迹，肯定信是亲笔信。同时支队派出去寻找湘南特委的人回来又带回了报纸登载“西安事变”及毛泽东、朱德发出统战号召的消息，于是支队领导人转而半信半疑。为了彻底搞清情况，游世雄随即派人到江西池江与中央分局取得了联系，证实了项英信中指示。于是，湘粤赣边游击支队领导人召开会议，统一了认识，会议决定：1.以桂东县沙田为支下山集中地点；2.支下山集中前，先派人与当地国民党政府和地方武装谈判，首先要求驻沙田的国民党部队撤离，并保证游击支队的给养供应；3.游击支下山前进行国共合作、军容、群众纪律等方面的教育。会议还决定派游击支队支队长赵书良前往湘赣游击区送中央分局的指示信。后赵书良带信在武功山找到中共湘赣省委，却被误为叛徒而遭杀害。

游世雄与顾星奎等3人下山至桂东县桃素，与国民党代表、郴州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郭大为等就双方停战合作抗日，游击支下山集中等问题进行了谈判。接着，游世雄等人又到汝城与国民党湖南保安第5区副司令胡凤璋及汝城县县长进行谈判。谈判中，游世雄等揭穿和谴责了国民党欲将湘粤赣边游击支队收编为国民党保安团的企图，并不顾国民党方面的威逼利诱，坚定而明确地表示红军游击队只能改编为抗日武装的立场，迫使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改变态度。双方经过谈判桌上的斗争，终于达成合作抗日协议，主要内容是：1.双方停止敌对行为，国民党军让出桂东沙田作为红军游击队集中地点，该区60里范围由红军游击队设防；2.红军游击队集中期间，国民党方面如数提供给养；3.释放狱中所有在押的共产党员、红军游击队员及革命群众；4.国民党派郭大为任国民党常驻沙田代表，以便双方联络交涉。10月8日，游世雄率湘粤赣边游击支队200余人的武装从东、西边山集中在沙田整训，并改编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游世雄任总指挥，下编两个支队，原第1大队为第1支队，游世雄兼任支队长和政委；原第2大队为第2支队，方志明任支队长，王赤任政委。在沙田，红军武装一面加强自身的政治教育，认清新形势，明确新任务，进一步理解学习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决策，并针对部分干部对改编在感情上一时扭不过弯的情况，在部队深入开展了改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思想工作；一面抓紧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召开各种会议，制定群众工作计划，组成群众工作

小组，深入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并在群众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军工作，许多青年踊跃参军，部队迅速扩大至 500 余人。附近各县、乡群众闻知红军下山抗日的消息，纷纷前来慰问，部队收到不少锦旗、对联和慰问品。在部队集中整训的同时，党组织也加强了自身建设，在沙田成立了中共资（兴）汝（城）桂（东）中心县委，顾星奎任书记，彭寿琪任副书记，同时撤销了中共资汝桂特委及东边山区委、西边山区委。1938 年 1 月，游世雄派人到江西他江，向项英、陈毅等领导人汇报了湘粤赣边游击支队集中改编的情况。2 月 13 日，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除留第 2 支队 4 中队暂驻沙田外，主力在游世雄的率领下根据中央分局集中池江的命令，经崇义、上犹，开抵池江。3 月上旬，2 支队 4 中队亦开赴池江集中。接着，部队又经赣州、樟树、玉山、开化到皖南岩寺，编入新四军第 1 支队第 2 团，随即投身于抗战的革命洪流之中。

（二）湖南赤色游击队第3大队和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的改编

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和湘南赤色游击队第3大队,虽然从1937年秋开始从国民党的报纸上陆续看到了一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及游击队下山集中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消息,但数年艰苦复杂的游击战争环境养成的高度警惕性,使他们无法相信这些消息,认为这是国民党想消灭红军游击队所玩弄的又一个花招,因而他们一直在山上独立地坚持着斗争。

中共中央收到湘南特委组织部长刘霞在1937年9月就义前于狱中写给中央的信后,中央分局即设法与湘南红军游击队联系,但由于湘南特委早已遭到破坏,一直未能联系上。与中央分局已建立联系的湘粤赣边游击支队亦曾派人寻找湘南特委负责人,以传达中央分局关于游击队下山改编的指示,也未果。在这种情况下,原湘南特委书记王涛受中央委派,于12月由延安返回湘南地区,寻找湘南特委负责人和红军游击队。1938年1月王涛几经周折,终于在乐昌坪石找到了周礼、李林等领导的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王涛向周礼、李林等介绍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传达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说明他受中央委派回湘南的任务是推动湘南的国共合作局面的实现,把湘南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王涛、周礼、谷子元、李林等开会商议后,即开始对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的干部、战士进行下山前的动员教育。王涛并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先后与国民党乐昌、宜章、郴县等县政府谈判。谈判中,王涛详尽阐述了中共中央团结抗日的主张及红军游击队下山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为国共双方最高当局谈定的协议。经过严正交涉,双方就湘粤边赤色游击队下山改编等问题达成了协议。随即,以王涛为主任的新四军驻郴州通讯处成立。2月,中共湘南特委重新组建,由王涛任书记,周礼任组织部长,卢文任宣传部长,蔡坚任职工部长,谷子元、谢竹峰、顾星奎、林长春为委员,特委机关设在郴州,并以领导湘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事宜作为特委成立后的首要工作。当月,分散在乐昌、乳源、宜章山区活动的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在坪石附近的坳丘集中,尔后经郴县良田开往宜章赤石三望坪学校集中整训,并改名为湘南红军游击队第1大队,李林任大队长。随王涛而来的新四军干部谢忠良等4人担当教员,对部队进行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严格整训和教育。同时部队还大力开展了扩军工作,队伍很快扩大为130余人。随后,湘南特委书记王涛前往耒阳领导湘南赤色游击队第3大队的改编工作。

在湘南赤色游击队下山改编的同时,谢竹峰、刘厚总等领导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3大队也独立地开展了谋求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合作抗日的工作。2月5日,谢竹峰在耒阳天门仙主持召开了第3大队活动的耒(阳)安(仁)永(兴)常(宁)酃(县)衡(南)地区党的干部会议。会议通报了从国民党报纸上获悉的全国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国共合作抗日已经实现的消息,认真分析了全国及游击区的形势,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作出3项决定:1.为恢复对游击区各县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成立中共耒(阳)安(仁)中心县委,谢竹峰任书记,刘厚总任组织部长,李振鹏任宣传部长,林长春、唐明煌为委员;2.派人到长沙与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联系,同时派党的骨干赴各县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发动群众,扩大游击武装力量;3.为适应斗争需要,将湘南赤色游击队第3大队改编为湘南赤色游击队后方抗日除奸队,刘厚总任队长,林长春任政委。会后,与会的各县党员干部回去后,立即以标语、

传单、布告等形式，在人民群众中间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救国宣传工作，并从群众中吸收了一些革命积极分子加入红军游击队。谢竹峰也在会后以耒安中心县委代表名义，向耒阳、安仁两县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发出公开信，陈述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希望他们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停止一切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与共产党团结起来抗日救国。不久，中共湘赣省委派人到耒阳与谢竹峰等领导的耒安中心县委取得了联系，传达了中央分局及湘赣省委关于实现湘南国共合作，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的指示精神。其后，谢竹峰派人与中共湘赣省委的来人作为中共耒安中心县委的代表赴安仁县城与该县国民党政府代表就双方停止敌对行为、游击队集中整训和参加抗日等问题达成协议。

2月下旬，王涛在耒阳天门仙与谢竹峰领导的耒安中心县委取得了联系。随即在天门仙召开了耒安中心县委扩大会议，王涛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进一步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研究布置了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并决定由王涛和谢竹峰同去耒阳县城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会后，王、谢即赴耒阳县城，与国民党县政府、县保安司令部进行谈判。谈判中，王涛、谢竹峰谴责了国民党县政府无团结抗日诚意、诬蔑共产党和游击队的言论，并揭露了国民党大肆捕押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和无辜群众的行径，迫使国民党方面首先答应释放狱中政治犯。接着，王、谢提出了停止对游击队的进攻，保证游击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证抗日自由等几条要求；国民党方面也提出了游击队停止游击行动、停止打土豪，游击队集中北上抗日等几条要求。经过谈判桌上的交锋，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停止敌对行为，团结抗日；2.红军游击队下山整训，开赴抗日前线，国民党保证其安全；3.游击队北上抗日，在县城设立后方留守处，负责处理遗留工作及照料游击队家属等事宜；4.共产党派一全权代表常驻县城，以便协商两党今后有关事宜。

湘南游击区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完全实现后，刘厚总率湘南赤色游击队后方抗日锄奸队从耒阳天门仙到江头刘家祠集中整训，由新四军派来的3名教官对部队进行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严格训练教育。经过1个多月的整训，部队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其间，部队驻地周围群众纷纷前来慰问和要求参军，部队从中挑选了一批人，使自己很快扩充至一百七八十人。4月上旬，李林奉命率湘南红军游击队第1大队也从宜章赤石经郴县良田开至耒阳江头刘家祠。随后，李林部改编为新四军暂编第1大队，刘厚总部改编为新四军暂编第2大队，两部共计300余人。11日，李、刘两部告别了他们坚持了三年多艰苦斗争的湘南游击区，经东湾、毛栗冲、竹塔市、锡里洞、灶市、株洲，南昌、岩寺等地，抵达安徽太平（甘棠），编入新四军特务营，踏上了抗日战争这个新的革命征程。

湘南游击区的三年游击战争，是在该游击区的党组织在这一斗争阶段之初即与上级党组织——中共湘赣省委失去联系情况下开始的。并且，在主力红军长征前，该区即是游击区，因而无论是从群众组织基础、党的组织基础及红军武装的基础都较由苏区转为游击区的那些游击区更弱一些，同时由于斗争环境的恶劣，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湘南党组织对各游击队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领导。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湘南各红军游击队分别在蔡会文、方维夏、彭林昌、周礼、谷子元、陈梅连、游世雄、林长春、李林、谢竹峰等领导下，独立地开展游击战争，他们在艰苦异常的斗争条件下，始终注意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和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对游击战争的领导；在对敌斗争

中，注意避强击弱，隐蔽发展，善于依据地理条件和敌情的变化，实行灵活的斗争策略和方针，并注意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在斗争中，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坚决为人民除害，并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各游击队虽在敌重兵反复“清剿”中，都先后受到较大的挫折，但他们始终保持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不为困难所动摇，一有机会就迅速地扩大自己的武装，积极打击敌人；各游击队之间一旦建立了联系就能紧密团结、互相配合。正是由于这样，终于取得了湘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为新四军输送了近千人的队伍，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十四章 鄂豫皖边游击区

鄂豫皖边游击区位于湖北、河南、安徽3省交界的富有悠久历史和革命传统的大别山区。主要包括湖北的黄梅、广济（今武穴市）、蕲春、浠水、黄冈、英山、罗田、麻城、黄安（今红安）、黄陂、孝感、礼山（今大悟）；河南的固始、商城、潢川、光山、经扶（今新县）、罗山、信阳和安徽的霍邱、六安、立煌（今金寨）、霍山、舒城、岳西、潜山、太湖、宿松等近30个县。是南方15块游击区中较大的游击区之一。地势险要，巍峨的大别山雄踞游击区中央，东接江淮平原，西挟京广线北段的平汉铁路，北有淮河，南临长江。鄂豫皖3省的重大城市，如湖北的武汉，安徽的安庆、合肥，河南的信阳等地，均在其俯瞰之中。地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鄂豫皖边区的人民富于革命传统。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董必武、陈潭秋等以武汉为中心，深入四乡宣传马列主义，建立党的组织。北伐战争时期，党在这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革命武装。1927年八七会议后，党在这里发动和领导了黄（安）麻（城）起义、商（城）南起义、六（安）霍（山）起义，开辟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2年10月，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率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越平汉铁路向西转移后，中共鄂豫皖省委以留在根据地的红军5个主力团为基础，重建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独立在鄂豫皖边坚持斗争，打破了国民党军大规模的划区“清剿”。1934年11月，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率红25军长征后，留在皖西北地区的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根据省委指示，重建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始建于1933年1月，不久编入红25军）。在与中共中央和鄂豫皖省委失去联系的困难条件下，率部坚持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鄂豫皖边游击区的三年游击战争，经历了1934年11月至1935年7月的重建红28军、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斗争；1935年7月至1937年4月的确定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灵活开展游击战争；1937年4月至7月的游击战争最艰苦时期和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的谈判改编、奔赶抗日前线的4个阶段。由于红28军高举中国共产党的旗帜，紧紧依靠游击区广大人民群众，和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地方武装、便衣队的协同配合下，以不足2000人的兵力，转战于边界四五十个县，抗击了国民党军多次“清剿”，牵制了国民党大量正规军，最多时达68个团、约17万人，歼敌18个营零15个连和大批反动民团武装，使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烈火始终燃烧不灭，血染的红旗始终在大别山上飘扬。不但有力地支援了红25军的长征和配合了全国的战略行动，而且也锻炼和造就了一批智勇双全的领导干部和优秀指挥员。以及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队伍。这支队伍于1938年初编入新四军第4支队，是后来坚持敌后抗战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继续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重建红 28 军，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斗争

（一）红 25 军转移后鄂豫皖边区的形势

1934 年 11 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与鄂东北道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西南部的花山寨会合。根据中共中央 1934 年 7 月 26 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7 月 29 日《致鄂豫皖省委训令》等文件精神，于 11 月 11 日举行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第 14 次常委会议。会议根据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转达程子华带来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结合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实际，分析了鄂豫皖苏区两年来的斗争形势，认为：鄂豫皖苏区军民虽然进行了极其英勇艰苦的斗争，但是苏区内人力物力已被敌严重摧残，当前敌我力量过于悬殊，鄂豫皖苏区的严重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在边沿地区恢复老苏区和开辟新苏区，实践证明成效不大；红 25 军继续在苏区内坚持斗争已难以有所发展。遂决定红 25 军向西进行战略转移，创造新苏区。留下红 82 师及一部分地方武装在老苏区进行游击战争和秘密工作。16 日，红 25 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罗山何家冲出发西进，开始长征。鄂豫皖苏区自此逐渐转变为游击区，红军游击队转入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红 25 军西征后，盘踞在鄂豫皖边区的国民党军除调正规军 18 个团进行尾追外，仍留有正规军 56 个团、10 多个保安团和许多反动民团，向鄂豫皖边区发动“清剿”。国民党鄂豫皖“清剿”总指挥梁冠英将鄂豫皖地区划分为 4 个“驻剿区”，分片“清剿”。第 1“驻剿区”由国民党第 25 路军负责，梁冠英兼任总指挥，指挥部设在罗田县；第 2“驻剿区”由国民党第 67 军负责，总指挥王以哲，军部驻演川县；第 3“驻剿区”由国民党第 57 军负责，总指挥何柱国，军部驻黄安县；第 4“驻剿区”由国民党军第 11 路军负责，刘茂恩代理总指挥，指挥部设在霍山县。梁冠英限令各部于 3 个月内将鄂豫皖边区红军游击队消灭。

当时留在鄂豫皖边区的中共党组织领导机关，主要有中共鄂东北道委和中共皖西北道委，下辖少数武装力量。中共鄂东北道委领导下的党组织有：罗（山）（黄）陂孝（感）特委及红安、光山、麻城、新集等县委。拥有罗山教导营、光山独立团 1 个营、光西战斗营和武装工作便衣队（以下简称便衣队）等 1500 余人的武装力量，分别活动在黄安、礼山、罗山、经扶等县山区的被敌分割的小块苏区内。中共皖西北道委下属的党组织有：中共赤城县委（在商城、固始、金寨 3 县边区）和中共赤南县委（在商城南部）。所辖一路游击师、二路游击师、三路游击师、道委特务队、商北大队、银沙畷战斗营以及少数游击队、便衣队，另有红 82 师，共计 1300 余人，在赤城、赤南、六安六区、六安三区、霍山六区等互不相连的 5 小块苏区内坚持斗争。

国民党军为了消灭存留在苏区内的中共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所划“驻剿区”内，采取了极残酷的“清剿”手段。军事上，“严令督促”发展碉堡。仅皖西一处，就在原有 2 万余座碉堡基础上，又构筑新碉堡 4000 多座，纵横交错，形成一道道封锁线，以优势兵力依托封锁线，分片包围，以达“彻底扫荡、以绝根株”之目的。政治上实行“户籍连座”，“一户通匪，十户问罪”。以割断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经济上严密封锁，在一切通道、隘口设置关卡，严禁生活必需品如粮、油、盐进山，以断绝红军游击队的生路。国民党军还控制了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对苏区人民进行血洗：见人就

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扬言要把苏区变成无人区。河南省商城县反动民团头子顾敬之猖狂地叫嚣：要“开人肉案子”，在其周围百十里之内，铡死苏区军民数千人。在立煌县南溪，国民党军队一次齐肩活埋 200 多名群众，然后用牛拉铁犁将人头犁去。后因杀人太多，便将割人头领赏改为割耳朵领赏。惨绝人寰，令人发指。在国民党军疯狂屠杀下，苏区的红色政权受到极大摧残，党员、干部、群众遭受严重损失，各级党政军机关和红军游击队不得不转入深山密林坚持斗争。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形势转入低潮。

（二）中共鄂东北边委和鄂东北独立团的恢复

中共鄂豫皖省委在率红 25 军西征前，决定在鄂豫皖边区重建革命武装，反击敌之“清剿”，坚持鄂豫皖边的斗争。对于这一问题，由于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正带领部队在皖西北地区作战，未参加花山寨会议，省委遂对鄂东北地区党组织负责人作了布置。指示由鄂东北道委派人去寻找高敬亭，传达花山寨会议精神，责成高敬亭组织鄂豫皖边区党的新的领导机构，并以红 82 师为基础，加上地方武装，重建红 28 军，继续在鄂豫皖边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和进行秘密工作。

为执行中共鄂豫皖省委的这一指示，1934 年 11 月 17 日，原鄂东北道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福明在河南省罗山县金竹林止止洞召开会议，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同时，鉴于红 25 军离开鄂豫皖边区时，将鄂东北地方武装主力大部编走，鄂东北道委主要负责人也随军行动，所以会议重点讨论了组织建设和坚持斗争问题。会议作出 4 项决定：1. 调整和充实鄂东北道委，王福明任书记。道委常委由王福明、徐成基、何耀榜、吴光陆、罗厚福 5 人组成。2. 调整罗（山）（黄）陂孝（北）特委及地方党的组织。3. 加强地方武装和便衣队的建设。4. 成立少共鄂东北道委，方永乐任书记。会议还要求尽快健全党的各级组织，领导地方武装和便衣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以牵制国民党军，策应红 25 军转移，并迅速安置好红 25 军留下的伤病员。

11 月底，中共鄂东北道委将河南罗山教导营、光西战斗营、红 25 军西征后留下的鄂东北独立团指战员 30 余人及部分伤愈人员，组成鄂东北独立团，共 300 余人。团长熊失春（去皖西时为陈守信），政委徐成基。为将省委指示早日传达给高敬亭，12 月下旬，鄂东北道委派少共鄂东北道委书记方永乐和陈守信、徐成基率领独立团前往皖西，寻找高敬亭。

独立团出发后，为坚持鄂东北地区的斗争，道委于 1935 年 1 月上旬，将原光山独立团留下的 1 个营、道委特务营和部分游击队、便衣队合编，再次组建鄂东北独立团，共 200 余人。团长熊先春，政委张生先。随后又相继组建了特务 1 营、特务 2 营。为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鄂东北道委还将所属的各级党组织进行了调整，并以便衣队形式开展活动。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兼任便衣队的领导。强调采取重点打击反动地主武装、争取持中间态度的保甲长、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斗争策略，开展游击战争。在鄂东北道委领导下，鄂东北独立团于 1 月 19 日奔袭礼山县二郎店，全歼反动民团段绪志 1 个中队，缴枪 100 多支。29 日，中共罗陂孝特委以群众为内应，集合黄安、罗山、经扶 3 县便衣队和道委特务营，冒雪夜行 20 公里，奔袭光山、经扶、罗山 3 县交界的香炉寺，全歼反动民团 40 余人，缴枪 50 余支，活捉团长陈治忠。在此期间，道委还组织各便衣队，将红 25 军留下的 200 多名伤病员进行了安置。便衣队也与地方武装相配合，炸毁公路桥梁，割电线，击汽车，破坏敌通讯联络。便衣队长胡金先还率队在汉（口）罗（山）公路上巧妙地击毁了 12 辆国民党军车，缴获大批弹药、粮食、布匹等军用物资。红军游击队的游击活动，不仅牵制了国民党驻军，掩护了红 25 军的转移，而且给处于低潮的边区人民带来了希望。为了更好地团结群众，共同对敌，鄂东北道委及下属党组织，从实际情况出发，转变了政策。如将原来的“不间贫富，见粮就打”的“打粮”，改为凡是穷人的粮食一律不“打”，就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粮食，也不“打”尽，只取其一部或大部的“征粮”。这样做的结

果，群众倍受鼓舞，也起了瓦解、分化敌人营垒，孤立顽固势力，争取其中较为开通人士的作用。部分国民党联保主任、保长，还直接或间接表示了他们愿意保持中立，并为红军游击队的活动随时提供方便的态度。此间，鄂东北道委还派何耀榜和罗山县委书记张家胜化装到宣化店，巧施反间计，争取保甲长，从监狱中解救出 200 多名被关押的群众。2 月 27 日，鄂东北道委书记王福明在反击国民党“清剿”中被叛徒出卖被捕，惨遭杀害。后由光山县委书记芦丛珠接任道委书记，继续领导鄂东北地区的游击战争。

（三）红 82 师苦战皖西北

当红 25 军西征时，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正率领红 82 师等武装在皖西地区固守深山，保卫苏区。红 25 军西征后，斗争形势更加严重。1934 年 12 月 3 日，红 82 师和皖西 3 路游击师在霍山县长山冲遭国民党军第 65 师第 387 团和霍山县黄英反动民团的伏击。红 82 师师长周世觉在突围战斗中牺牲。

周世觉，安徽金寨县人。1901 年 10 月生。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 5 月，参加金寨地区武装暴动。后任乡自卫队中队长。1930 年秋，任地方独立营营长。1931 年 8 月任独立团团团长。1932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西征后，留下坚持斗争。后任新组建的红 25 军第 74 师副师长，率部转战于皖西北、鄂东北地区。1934 年 8 月，任红 82 师师长。他的牺牲，是鄂豫皖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的一大损失。

1934 年 12 月下旬，高敬亭为了集中兵力对敌斗争，并解决面临的装备、给养等困难，将分散活动的红 82 师、皖西 3 路游击师和红 25 军留下的 2 个连集中整编为红 218 团，团长罗成云，政委熊大海。下辖第 1、第 2 营和苦工队。全团 700 余人。25 日，红 218 团在皖西北道委交通队配合下，于霍山县下骆山设伏，全歼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团 1 个营，缴步枪 100 余支。战后，高敬亭以此战缴获的枪支装备了红 218 团苦工队，组成红 218 团第 3 营。

1935 年 1 月上旬，国民党军第一次“清剿”开始。国民党鄂豫皖“剿总”，根据蒋介石 1 月 8 日命令，调整“清剿”部署，将第 67 军调离鄂豫皖苏区，进驻宜（昌）（武）汉公路沿线及其北侧地区，而将追击红 25 军的第 11 路军调回，重点进攻皖西北道委和红 218 团活动地区河南省赤城县（今商城）一带。21 日，国民党军第 106、第 108 师各以 1 个团的兵力向红 218 团驻地熊家河地区发动进攻，红军坚守阵地，顽强抗击，经过 3 昼夜激战，寡不敌众。敌军占领了皮坊、铁冲，红 218 团第 1 营撤至熊家河，第 3 营退至杨桃岭。24 日，国民党军独立第 5 旅一部向红 218 团右侧后袭击，红 218 团被迫向朝阳山方向撤退，又遭国民党军第 106 师第 626 团包抄。高敬亭率红 218 团且战且退，几经辗转冲出重围，向潜山、太湖方向转移。2 月 1 日，到达立煌县抱儿山。

奉命寻找高敬亭的方永乐、陈守信、徐成基率领鄂东北独立团经过艰苦转战，冲破敌人层层封锁线，也于 2 月 1 日到达抱儿山，与高敬亭所率部队会合。两支部队会合，悲喜交加。方永乐向高敬亭传达了中共鄂豫皖省委临行前的指示。高敬亭此时方知红 25 军已经西征。

（四）凉亭坳会议，重建红 28 军

1935 年 2 月 3 日，高敬亭率部转移至国民党军防守力量薄弱的太湖县凉亭坳，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党的干部会议。会议分析了红 25 军西征后边区的斗争形势，作出了开展游击战争、大胆寻求新的立足点的决定。并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的指示，将红 218 团和鄂东北独立团合编，重新组建了红 28 军。由高敬亭担任军政治委员（未设军长），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红 28 军下辖第 82 师和手枪团。第 82 师师长罗成云、政委方永乐，手枪团长余雄（手枪团团长的姓余，但不知其名，因作战骁勇，指战员称他为余雄）。红 82 师下辖第 244 团和一个特务营。团长徐贤才，政委徐成基。手枪团下辖 3 个分队，全军 1000 余人。红 28 军重建后，以高敬亭为书记的中共皖西北道委的职能随之停止。凉亭坳会议和红 28 军的重建，标志着鄂豫皖边区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的形成和以红 28 军为主力红军的武装力量的形成，是鄂豫皖边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起点。

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高敬亭等军师领导干部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军、师、团、营各级设立了政治委员，连队建立了党支部，政治指导员兼任支部书记。红 82 师设立了政治部。并及时印发《红军政治教材》、《红军须知》等政治教育材料，供干部阅读，要求各级领导和政治工作干部联系思想和斗争实际，向部队反复讲形势，讲斗争前途，宣传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启发部队阶级觉悟，增强斗志。

（五）红 28 军重建初期的游击活动和游击根据地的建立

28 军的重建和革命武装的壮大，使国民党感到不安，于是，国民党军调第 32、第 64、第 65 师，分别从霍山、立煌、太湖向凉亭坳一带合围“清剿”。红 28 军向霍山方向行动，1935 年 2 月 6 日、9 日、12 日，分别于潜山县分水岭、霍山县长岭庵和黄泥榜连续 3 次突破国民党军的拦截，红 82 师师长罗成云在黄泥榜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接着，红 28 军翻越了海拔 1774 米的皖西最高峰白马尖山，到达马家河地区，摆脱了敌人，并伺机击敌。

巧袭王庄，活捉余谊密 2 月 14 日，红 28 军得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余谊密和他的儿子（潜山县保安大队副）带着一伙护员、马弁回潜山县王庄祭祖过年之消息。高敬亭决定抓住机会，给敌以打击，扩大红军游击队的影响。15 日拂晓，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王庄。经不到半小时战斗，歼敌 20 余人，缴枪 20 余支，并活捉余谊密，后将其处决。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白果树会议，建立舒霍潜边游击根据地鉴于红 28 军处于流动作战，物资补充和伤员安置等问题亟待解决。2 月 16 日晚，当红 28 军到达舒城县和潜山县交界之驼岭附近的白果树时，高敬亭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皖西特委，由徐成基担任特委书记。并从红 28 军中抽出 200 余人，组建红 246 团，徐成基兼任红 246 团政委，统一领导皖西的斗争，谋求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会后，中共皖西特委积极发动群众，打土豪，筹粮款，袭击民团；加紧整顿党的组织，与以刘敏为书记的中共皖西北特委取得联系，协同配合，与潜山等地下党组织建立了工作关系；组建了 4 路游击师和精干的便衣队，秘密串联群众，安置伤病员，支援红军作战。不久，党的工作扩大到舒城、霍山、潜山、英山、太湖、蕲春、黄梅、广济等县广大山区，开辟了东西约 60 公里、南北近 40 公里的舒（城）霍（山）潜（山）边游击根据地。3 月，成立了舒霍潜边区苏维埃政府，李清明任主席。从此，红军游击队有了既可作为依托出击袭扰敌人，又可休整补充的立足之地。

黄毛山分兵，桃岭歼敌舒霍潜边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为游击战争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是年 2 月 21 日，红 28 军游击至霍山县黄毛山，高敬亭决定部队分开行动。由方永乐率红 28 军主力到霍山、潜山、太湖、舒城一带活动，高自带红 244 团第 2 营和手枪团第 1 分队回赤城、赤南地区了解情况。部队首次分开行动，连续取得立煌县梓树坪歼敌 1 个营、鸡冠山歼敌 300 余人和霍山县界岭歼敌 1 个营的胜利。4 月 6 日，两部于太湖县泥头店会合。高敬亭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拟先进攻敌守备薄弱的宿松县城，以补充装备给养，尔后到黄梅、宿松、蕲春 3 县交界的罗汉尖一带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会后，部队向宿松运动，行至二郎河，与国民党军第 95 旅第 190 团遭遇，随即改向西南进军。又在蕲春县毛家咀遭国民党军第 32 师第 192 团和太湖保安团一部的袭击，伤亡 70 余人。

4 月中旬，红 28 军进至潜山县境，国民党军第 32 师紧紧咬住不放。高敬亭率部拖住该敌向北急进，牵着其鼻子转了几天几夜的圈子。20 日，部队来到潜山县汤池畈附近的桃岭，高敬亭、方永乐等军师领导发现桃岭主峰 600 多米高，地势陡险，松林蔽日，决定利用其有利地形进行伏击。遂将特务营隐蔽在山坳口正面，其余部队埋伏在桃岭左侧的山坡、树林中。当日 16 时，第 32 师第 95 旅第 190 团先头分队进至我特务营阵地前沿，特务营立即开火。

敌以为红军是小部队阻击，蜂拥上前，被特务营阻挡在山坳里。此时，高敬亭命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顿时呼声震天。方永乐率埋伏部队冲向敌群，将敌冲切成数段。林维光率特务营跃出阵地，与敌展开白刃格斗。在红 28 军夹击下，尾追多日、疲惫不堪的 190 团 2 个营全部被歼，敌营长包士信被击毙。红 244 团团长徐贤才在战斗中牺牲。桃岭大捷后，国民党军 3 个月消灭红军游击队的计划遂告破产，敌第一次“清剿”结束。

红 28 军在三年游击战争初期的游击活动中，集中主力行动较多，虽然有时能狠狠地给敌一击，但更多的时间处于被敌围追堵截、被迫转移的境地。红 28 军军、师领导正在摸索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以更好地反击敌人的“清剿”。

（六）黄尾河会议与西进桐柏山

桃岭战斗，给国民党军政当局以震动。4月24日，蒋介石急电“鄂豫皖剿总”重新划分防区，更改“清剿”计划，将兵力增加到13个师、1个独立旅，共61个团的兵力，以皖西地区为重点，向鄂豫皖边区发动第二次“清剿”。梁冠英遵旨，将原来的4个“驻剿区”更改为3个“清剿区”，分别由第57军、第11路军、第25路军一部为3个“清剿区”的“驻剿”部队。另以第25军主力组成“追剿”部队。责令各“清剿区”不分界限，跟踪猛追。若执行不力，“以纵匪论罪”，并限令于6月底前“肃清”鄂豫皖边区的红军游击队。

在国民党军新的“清剿”下，红28军辗转作战，于1936年5月7日到达霍山县黄尾河地区，与中共皖西特委领导的红246团会合。高敬亭在黄尾河主持召开会议。首先肯定了红246团建立舒霍潜游击根据地、组建游击队和红28军转战皖西的成绩和战果。接着，重点分析了国民党军这次重点“清剿”皖西的严峻形势。为了保存红军力量和新创建的皖西游击根据地，会议决定：高敬亭率红28军离开鄂豫皖边区，西进桐柏山，寻找红25军。并对部队作了调整，将红246团1个精锐连补入红28军，红28军精简下来的人员编入红246团，坚持皖西地区的斗争。

会后，高敬亭率红28军向鄂东行动。14日进至固始县南的五尖山，遇国民党军第106师3个团的前堵后追。部队顽强抗击，后乘夜幕转移。15日，进至商城县三里坪前、后榨子凹地区。高敬亭抓住有利战机，率部全歼孤军冒进的河南省保安团第1团第1大队，缴各种枪200余支，子弹2万余发。18日，部队通过光山、经扶至麻城公路封锁线，进至罗山县杨店以东地区。国民党军第112师第636团第3营2个连进行阻击。红28军乘敌未及展开，进行迂回包围，将其全歼，俘敌150余人，缴枪200余支，子弹万余发。

5月19日，红28军抵达罗山县白石山，与中共鄂东北道委会合。高敬亭向鄂东北道委传达了黄尾河会议精神，指示道委继续坚持鄂东北地区的斗争。并将第二次组建的鄂东北独立团和特务第1、第2营大部编入红28军，任命梁从学为红244团团团长，张生先任团政委。22日，高敬亭率领红28军越过平汉铁路，离开鄂豫皖边区，途经应山、随县、桐柏县，向桐柏山区转移。

（七）五道岭会议，东返鄂豫皖边坚持斗争

5月28日，高敬亭率领红28军抵达河南省泌阳县东南约25公里处的五道岭，获悉红25军在陕西南部活动的消息，立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决定部队次日出发，到陕南与红25军会合。29日，部队刚刚行动，就遇到国民党军的前后夹击。高敬亭于五道岭紧急召开第二次营以上干部会议。会议主要分析形势，讨论部队的去向问题。与会大多数同志认为：一是前有敌重兵防守，后有追兵紧跟，去陕南途中，尚须经过广阔的平原，沿途有重兵阻截，不好通过；二是鄂豫皖省委给予红28军的任务，就是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拖住蒋介石10多万正规部队，以减轻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压力。会议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毅然作出部队东返，回到鄂豫皖边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正确决定。这一决定，是高敬亭等红28军领导人在认识到坚持鄂豫皖边区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后作出的。因此，这次会议，是红28军和鄂豫皖边游击区历史上的转折点，对后来鄂豫皖边游击区游击战争的坚持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会后，高敬亭率红28军从五道岭东返。回师途中，由于目标明确，意志坚定，连续打了几个胜仗。

桃花山伏击战 1935年5月31日，红28军行至湖北省随县桐桥畈东南地区时，国民党第25路军独立第5旅第614团和第613团第2营探踪而至。独立第5旅是国民党军装备精良、专门从事“追剿”红28军的部队。该部跟踪“追剿”红28军，从平汉路东到平汉路西的桐柏山，又从桐柏山追踪到随县境内，虽被红28军拖得疲惫不堪，但红28军也深感活动不便。决心利用桃花山有利地形伏击，给独5旅以沉重打击。6月1日，当独5旅尖兵排进至随县华石咀时，红28军排哨边阻击，边后退，诱敌深入。独5旅第614团第2营以后三角形推进，由于道路狭窄，兵力无法展开。红28军排哨稍作抵抗，佯作失败，沿螺丝臼向桃花山深处退却。此时，隐蔽在螺丝臼密林中的红28军主力第244团第1营突以猛烈火力向独5旅后续部队攻击。接着，连续打退敌多次反扑。红244团第2、第3营向正在向桃花山上攀登进攻的独5旅第614团2个营和第613团第2营猛烈射击，将其击退。红28军特务营和手枪团一部投入战斗后，由两翼向螺丝臼758高地进攻的独5旅第614团、第613团各一部出击。随后，红244团第2、3营跳出工事，与第614团第1、第3营和第613团第2营展开肉搏。战至15时，敌不支渐渐后撤。在红28军手枪团的打击下，进攻桃花山的独5旅第614团第2营根本未能上山。此伏击战，红28军共毙伤国民党军6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王园反击战 6月13日，红28军行至河南省光山县境内，遇国民党东北军第109师第627团（欠1营）的截击。红28军决定集中兵力，组织反击，以获得战斗的主动权。即以红244团、手枪团和特务团迂回至光山县东南约15公里处的王园地区，待机破敌。当敌627团进至王园地区，并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红244团第3营阵地发起进攻时，遭到红244团的迎头痛击。此时，红28军特务营于627团左侧发起进攻，敌摸下清头脑，顿时乱作一团。红28军手枪团乘机迂回到郭凹附近，逐渐形成合围。第627团见状不妙，遂在炮火掩护下奋力突围。红244团第2营除以部分兵力继续进攻外，其余断敌退路。红244团第1营、第3营、手枪团分别从王园南侧、正面、东北侧发起攻击。经激战，红28军将敌第627团2个营全部歼灭，缴获各种枪500

余支，迫击炮 2 门。红 244 团政委张生先在战斗中牺牲。

段水山阻击战 6 月 18 日，红 28 军进至湖北省麻城县段水山、铺儿山、毛家坳一带休整，得悉国民党第 25 路军独立第 5 旅第 614 团跟踪已至，其 613 团、615 团正向殷家园、滕家堡运动，企图进击红 28 军。红 28 军决心利用段水山区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便于隐蔽之有利地形，进行阻击。遂部署手枪团之第 1、第 3 营和红 244 团第 1、第 3 营在段水山、铺儿山南侧集结，待机破敌；以特务营置于毛家坳南侧埋伏；将红 244 团第 2 营配置在铺儿山附近，为预备队；军指挥所设在铺儿山东北侧。15 时许，敌第 613 团在左、第 615 团在右，进至毛大利、滴水岩附近。红 28 军手枪团、第 244 团第 1、第 3 营立即居高临下，发起猛烈攻击。敌前卫队受阻，后续部队即在炮火掩护下，分路向红 28 军阵地进攻。红 28 军顽强阻击，不断跳出工事与敌肉搏，敌炮火优势失去作用。红 28 军适时组织反击，经 6 小时激战，全歼国民党独立第 5 旅 200 余人，缴枪 100 余支。此战，给拼命“迫剿”红 28 军的独 5 旅再一次沉重打击。

上述几次战斗的胜利，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军企图两个月内消灭红军游击队的第二次“清剿”，而且，再次坚定了红 28 军全体指战员坚持鄂豫皖边区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二、制定新的斗争方针，灵活开展游击战争

（一）店前河会议，确定新的斗争方针和战术原则

1935年7月2日，红28军抵达安徽省太湖县店前河，与中共皖西特委、红246团、一路游击师以及中共赤城县委书记石裕田率领的商北大队会合。为了总结红28军这次西进东返、行程700公里，取得桃花山、王园、段水山三战三捷的经验，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高敬亭在店前河主持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在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听取各方面不同意见的基础上，认真总结了红28军重建以来，特别是往返平汉路、开展游击战争的体会；并根据敌军指挥不统一和战斗力强弱有差异之特点，提出和制定了以“拣弱敌打”和一切供给取之于敌为核心思想的“拖垮25路，相机打11路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的基本作战方针，以及“敌情不明不打，地形不利不打，伤亡过大不打，反之则打”的战术原则。不久，又补充了“缴获不多不打，反之则打”（简称“四打四不打”原则）。这一作战方针和战术原则的提出，是高敬亭在游击战争实践的基础上，集中集体智慧而制定的。它的制定，对鄂豫皖边区游击战争的开展直至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会后，1路游击师、商北大队、红246团2个连编入红28军。石裕田被任命为红82师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熊大海于1936年2月霍山县深沟铺作战牺牲）。随后，红28军灵活运用店前河会议制定的作战方针和作战原则，以皖西游击根据地为依托，在蕲春、宿松、太湖、潜山、霍山、桐城等县之间，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失时机地歼灭多股敌人。7月7日，红28军在舒城县乌沙街黄巢尖，歼灭安徽省保安团1个营。12日晚，红28军手枪团在潜山县殊屋庙利用夜暗占领有利地形，伏击国民党军第102师第656团给养护送队，俘60余人。15日，红28军手枪团第1分队以伪装战术，在太湖县冶溪河，俘国民党第25路军别动队130余人。8月13

日，红28军进至霍山县燕子河地区（今属金寨），获悉国民党军第65师第195旅第390团1个营由流波疃移驻花凉亭。红28军乘敌立足未稳，于当晚悄悄到达花凉亭南侧地区，22时许向敌发起攻击，重创其1个营，毙伤俘国民党军300余人，缴步枪200余支，轻重机枪7挺，迫击炮1门，子弹万余发。天将拂晓时，主动撤出战斗。月底，红28军转至桐城县唐家湾，歼灭桐城县保安大队270余人，随后又在该县纸棚全歼县常备大队。接着，巧扮国民党部队，于青草壩将安徽省保安团1个连缴械。这些战斗的胜利，充分证明了店前河会议所制定的新的斗争方针和战术原则的正确，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正规军及反动地方武装的嚣张气焰。

红28军游击战争的开展，经历了由集中兵力作战到分散游击作战的转变过程。9月13日，由于红28军集中行动，在潜山县妙道山，遭到“追剿”之国民党军第32师第95旅的前后夹击，被紧缩压迫在陡险的山岭上。红244团第2营营长林维先率第6连奋勇阻击，掩护了主力安全转移，然而林维先和1个排却被逼至山崖边上。林维先果断率该排跳崖。结果，林维先等20余人幸免于难，其余壮烈牺牲。当晚，高敬亭在潜山县茅山召开会议，会议鉴于国民党军队采用堡垒线对红军实行重点封锁和“追剿”、“围剿”，红军集中行动十分不便。同时，又因高敬亭患病在身，不能随军行动，便决定：留下红244团第2营在罗田、英山、潜山游击，并负责掩护高敬亭和收拢战斗失散人员；红28军主力则由红82师政委方永乐率领，到潜山、霍山、六安、舒城等县活动。10月，方永乐率部在舒城境内与红246团会合。方永乐

为使部队精干，将红 244 团第 3 营中强壮者调入第 1 营，第 1 营中老弱病残者编入第 3 营。亲率彪悍的第 1 营前往赤南、霍山等地游击。第 3 营交由徐成基暂时带领。后徐成基将第 3 营编为 2 个连，改称五路游击师，在潜山、太湖一带活动。12 月上旬，方永乐令红 82 师参谋丁少卿率特务营和手枪团 1 个分队到蕲春县三角山与高敬亭会合，自带第 1 营和手枪团主力进军靠近长江的浠水、黄梅一带游击。丁少卿率特务营和手枪团 1 个分队在天堂寨与五路游击师会合后，即转向蕲春。12 月 7 日到达安徽省立煌县中畈湾地区。国民党军第 32 师第 189 团第 1 营经杨家山、凉亭庙跟脚而至。特务营和手枪团 1 个分队在丁少卿率领下，占领中畈湾有利地形伏击该营。中午 12 时许，敌第 189 团第 1 营进至中畈湾北侧，特务营突然开火。国民党军独立第 5 旅第 615 团 5 个连赶来增援，进至中畈湾北侧山梁时，手枪团分队迅速迂回至其左翼和侧后，发起攻击，当场击毙敌团长。敌失去指挥，队伍骚乱。手枪团分队乘机分两路夹击该敌。特务营则在中畈湾东侧向第 189 团发起进攻。经 1 小时激战，共毙伤国民党军 300 余人，缴枪 200 余支。12 月底，到达三角山，与高敬亭会合。方永乐率第 1 营和手枪团主力在浠水、黄梅、太湖等县境内活动。不久，向湖北蕲春县转移。

（二）三角山会议，开展内外线结合的游击战争

1936年1月5日，红28军所辖各部在湖北省蕲春县三角山会合。五路游击师恢复红28军第244团第3营番号。此时，红28军军、师领导人深感部队在近3个月的分散活动中，要比集中活动机动灵活。为及时总结这一经验，高敬亭在三角山主持召开干部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的斗争形势，充分肯定了部队以分散活动对付敌“追剿”的成功经验，制定了部队继续分散活动和前出到平原地区去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斗争方针。会议还讨论并制定了具体的斗争策略和游击战术。这就是：战术上要以伏击为主，以长途奔袭、化装智取为辅，力争出敌不意，歼灭敌人；作风要英勇顽强，进攻要勇猛突然，勇于短兵相接同敌肉搏；防御时机智顽强，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适时反击；转移则迅速隐蔽，使敌人迫不上，堵不住。三角山会议制定的斗争方针、策略和游击战术，使鄂豫皖边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它的运用，逐步改变了红28军长时间以来难以摆脱的强敌跟追的被动局面。红28军以后从集中到分散，从山区到平原，从内线作战到外线作战，纵横驰骋在以游击根据地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对游击战术的认识和运用也越来越自觉、越来越灵活，从而把鄂豫皖边区游击战争的开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会后，方永乐率红244团、特务营和手枪团两个分队到黄梅、蕲春、浠水、黄冈、宿松、太湖一带活动。2月20日，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方永乐再次分兵。自率红244团第1、第3营和特务营到宿松、太湖地区活动；派1营营长林维先率1个加强连插入敌后，到平原地区活动，以进一步摸清平原地区的虚实。林维先率领加强连从木湖山区奔赴浠水、黄冈等平原地区作战，采取伪装战术，连克浠水、黄冈一带敌据点。于25日机智地越过封锁线，西渡巴河。又冒充“国民党第25路军别动队”，歼灭团陂保安部队1个排，智俘敌第25路军秘书长。当天下午，又装扮成第25路军秘书长及其随员，奇袭上巴河，一举歼灭湖北保安第8团第10连80余人。26日，加强连进至黄冈县马鞍山东南的炮烛铺，歼灭前往上巴河换防的湖北保安团第11连70余人。3月3日，林维先率加强连行军百里，出敌不意，夺取国民党第25路军浠水县下巴河军需仓库，缴获大批弹药和军需物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红28军的物资困难，更重要的是，取得了出击平原作战的宝贵经验。与此同时，方永乐率部先后击溃黄梅县保安队200余人，威逼黄梅县城，轻取该县重镇孔垄镇，全歼守军1个保安分队。尔后南下。

高敬亭率手枪团1个分队到达鄂东北地区。2月，在经扶县茅草尖召集道委、特委、县委、独立团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三角山会议精神，研究布置了鄂东北地区的军事斗争。会议决定扩大游击区域，发展游击战争。为此，将鄂东北地区的主要武装分3路行动，以分散和牵制敌人，配合红28军作战。3路分别为：第3路游击师到光山、商城、麻城、黄安一带活动；鄂东北独立团赴平汉铁路以西桐柏山地区活动；第1、第9路游击师在罗肢孝游击根据地和大悟山一带活动。这次会议，加强了对武装斗争的领导，使鄂东北各级党组织和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主力游击有了明确的行动目标。红28军与鄂东北、皖西地方武装力量在战略行动上的配合更趋协调一致。

（三）国民党军新的“清剿”，红28军四面出击

由于贯彻了三角山会议精神，高敬亭、方永乐兵分两路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灵活机动，越战越强，不仅挫败了敌人的“清剿”，而且建立了一些新的游击根据地，并使部分老苏区得到恢复。1936年2月，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免去了梁冠英“清剿”总指挥职务，任命卫立煌为豫鄂皖边区“清剿”总指挥，调集9个师另1个旅共49个团的兵力，向鄂豫皖游击区发动第三次“清剿”。卫立煌认为梁冠英的失败，在于不善山地战。他一上任，即调整部署，从贵州省调来善于爬山的国民党军第102、第103师，置于黄陂、麻城一线，担任“追剿”、“搜剿”任务，以增强山地作战能力；令新调进的国民党军第58、第82师配置在平汉铁路两侧，担负护路、阻截红军跨越平汉铁路并对周围地区实施“清剿”的任务，尤防红28军西进；以其嫡系第14军所辖之第10、第83师分别负责鄂东、皖西两地“清剿”，第11路军和第25路军原任务不变。为了配合这次“清剿”，卫立煌加强碉堡设施，在大别山原有的碉堡封锁线的基础上，又加修37条，形成纵横交错的碉堡网络。并针对红28军及地方武装、便衣队活动特点，抽调精锐部队，组成5个“追剿”队，不分防区界限、没日没夜地“追剿”。一旦发现红军游击队进驻某防区，某防区即行全力配合，先包围后合击。在政治上，依然实行“移民并村”组织民团防守；安插密探，监视群众行动。在经济上，严密封锁，禁运粮食、布匹、医药和油、盐等进山。力图在“最短期内肃清”活动在鄂豫皖境内的红军游击队。

柴家山会议制定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斗争策略为了对付国民党军的“清剿”，1936年3月上旬，红28军各部在安徽省太湖县柴家山会合，高敬亭召集营以上干部举行会议。会议首先由林维先详细汇报了率领加强连出击平原开展游击战的经过。接着，总结了部队由集中到分散、由山区到平原作战的经验，提出了“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的作战方针，作出3项决定：一是继续贯彻三角山会议制订的战略方针，深入敌后，到敌兵力薄弱的平原、丘陵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二是缩小目标，以营为单位分散游击。部队在今后较长的时间内，以分散活动为主。军领导会在适当时机决定主力会合或集中行动的时间；三是进一步加强便衣队建设，有计划地从部队抽调骨干，放到地方建立便衣队组织，支援和配合主力行动。

柴家山会议是继三角山会议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它不仅对三角山会议所制订的战略方针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充实了新的内容，使其更加完善，从而对游击战争的指导更加具体化了。

分散游击，插向敌后柴家山会后，高敬亭将红244团原第3营改编为红245团，任命梁从学为团长，杨克志为政委。下辖2个连和1个手枪队。随后，根据会议决定，红28军兵分3路，分别由高敬亭、方永乐、梁从学率领，避开敌军主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

1936年3月14日，高敬亭率红82师特务营及手枪团1个分队，由宿松县二郎河，黄梅县亭前、渡河桥、苦竹口向广济县蚂蝗干、尖山方向行动。途经苦竹口时，遭湖北省保安第12团第3营袭击，经2小时激战，重创该营，歼其一部。22日，拟经广济县打捋口去蕲春、广济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国民党湖北省保安第7团1个营从梅川镇（时属广济县）出发，先行到达打捋口地区，并控制了张家湾南侧高地，企图截击红28军。红28军特务营和

手枪团分队遂迅速展开，以1个连在张家湾东北侧利用田坎发起攻击，从正面牵制敌人；以1个连迅速抢占张德英村东南侧高地，向保安团右翼进攻；手枪团分队由张家湾向保安团左翼迂回；另1个连作为预备队。战斗打响后，保安团三面受击，伤亡惨重，其1个营大部被歼，余部逃回梅川镇。战后，高敬亭率部向横冈山以北转移。下旬，部队进抵麻城县境。高敬亭命手枪团团长沙化雨、政委刘远臣带领特务营去孝感、黄陂、黄冈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自己带领手枪团1个分队去鄂东，到罗山、黄陂、孝感等原老苏区检查工作。

3月中旬，方永乐率领红244团第1营和手枪团两个分队到达预定地区黄冈大崎山后，便从部队中抽出9名指战员组成便衣队，留在大崎山地区活动。然后，令红82师参谋丁少卿带领第1营到鄂东北活动。自带手枪团两个分队在黄冈、麻城地区游击。部队分散活动后，第1营于4月12日在光山县西北12公里处的寨河，截获1辆由信阳开往潢川的国民党地方政府汽车，俘虏并处置了13名土豪劣绅。20日，第1营进至湖北省礼山县老山寨西北的陈家冲，闻知国民党军第102师1个团在老山寨围攻鄂东北独立团。经了解，得知国民党军约有2个营分别向老山寨西北和西南侧进攻；有1个营在三屋冲西侧高地集结。第1营决定支援鄂东北独立团，先歼灭三屋冲之国民党军。遂令第1、第2连沿张家冲西侧进至三屋冲侧后；以第4连占领张家冲东侧高地，与第1、第2连形成对敌夹击之势；第3连作为预备队，迂回至三屋冲东侧，防止该部向老山寨之国民党军2个营靠拢。尔后，第1营向三屋冲之敌发起攻击，敌突遭打击，慌乱之中无法组织有效抵抗。经1小时激战，三屋冲之敌死伤愈百，其余大部缴械投降，少数向老山寨方向溃逃，被我第3连歼灭。红244团第1营乘胜向进攻老山寨之国民党军发起进攻，鄂东北独立团适时反击，将敌击溃。此战，全歼国民党军第102师500余人，缴枪400余支。战后，红244团第1营转至黄安县境。21日，第1营又化装成国民党军第102师的“清剿”部队，连闯孝感县青山口、涂门港、东阳岗三关，俘敌1个连又1个排，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军。

与此同时，梁从学率红245团活动于黄梅、蕲春、太湖、宿松等县。他们利用国民党部队多、番号杂、互不了解等弱点，多次化装成国民党“清剿”部队，施计用谋，巧袭、奇袭、突袭敌据点。3月25日，梁从学率红245团从蕲春县桐山冲出发，奔袭太湖县徐家桥（铁笼镇），歼灭湖北省保安第7团1个营。4月初，又化装成“剿匪”部队直插平原，先后攻克潜山县黄泥港、怀宁县三桥头、王家河、小市冈以及高河埠等集镇。在高河埠（安庆北部重镇）战斗中，红245团以“剿匪军”某部名义进入该镇，巧妙地将守军引出住房。当敌集合时，战士们一举占领碉堡，抢占火力点，歼敌100余人。红245团在平原连克5镇，大大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影响，直接威胁了国民党安徽省府安庆。

护儿山遭遇战与方永乐牺牲 1936年5月中旬，高敬亭、方永乐、梁从学所率红28军三路主力部队（欠特务营和第1营第4连）在立煌、麻城两县交界之长岭关会合，约千余人。尔后，经河南商城向湖北麻城运动。14日上午约8时许，在麻城县护儿山东北雾露塘坳口与国民党军第103师第3团第3营遭遇。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情况十分危急。红82师政委方永乐主动要求带领手枪团第3分队阻击敌人，掩护主力转移。方永乐率部抢占护儿山制高点，向着蜂拥而上的敌人猛烈开火，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毙伤国民党军60余人。主力趁机转移。随后，方永乐率领掩护部队边打边撤，不幸中

弹，年仅 21 岁的方永乐政委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方永乐，原名方永芦。安徽六安县人。1916 年生。1929 年 11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山暴动。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 年任少共六安县委书记。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皖西北区少共书记、红 25 军第 75 师少共书记、鄂东北道委少共书记。1934 年 11 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 25 军西征后，率鄂东北独立团，克服重重困难，前往皖西寻找高敬亭，传达了省委临行前关于鄂豫皖边区坚持斗争的指示。1935 年 2 月，与高敬亭所率红 218 团会合后，组建红 28 军，任红 28 军第 82 师政委。由于他严于律己、平易近人、骁勇作战、善做思想工作，对红 28 军的建立、成长、壮大有卓越的贡献，深受指战员的爱戴。他的牺牲是红 28 军和鄂豫皖边游击区的重大损失。

三河口集中与大崎山再度分兵 1936 年 5 月 16 日，红 28 军各部在麻城县三河口会合，尔后集中在麻城、罗田、黄冈一带活动。28 日，部队进至黄冈县大崎山。鉴于国民党军重兵在边区“清剿”，不利于红军集中活动，高敬亭遂决定部队继续分散活动。

5 月 29 日，詹化雨率红 28 军特务营和手枪团 1 个分队从黄冈大崎山出发，经罗田、麻城、商城至潢川县。6 月 2 日，化装奇袭潢川县桃林铺镇河南保安团 1 个大队，歼其一部，缴获部分枪支及军需用品。中旬，手枪团随高敬亭行动。刘远臣率特务营转战在鄂东、皖西广大地区，打了很多胜仗，并协助黄冈党组织建立了 4 个区委和黄冈战斗 1 营。11 月中旬，在太湖边境的界岭附近歼灭国民党军第 32 师 1 个营，俘敌副团长以下 100 余人。

梁从学率红 82 师第 245 团到蕲春、英山、罗田、黄冈地区活动。8 月下旬与高敬亭会合。

林维先率红 244 团第 1 营，于 6 月上旬首次越过平汉铁路，攻取了应山县（今广水市）平林团防局围寨，奇袭刘家河据点，毙国民党军和团丁 100 余人，俘 50 余人，缴武器、弹药和一批军用物资。7 月，林维先率红 244 团第 1 营第 2 次越过于汉铁路，在平汉铁路西侧奇袭安陆县第 2 区公所驻地赵家棚，俘该区区长及团丁 50 余人。尔后向西，活动于应山、随县、安陆、云梦、应城、京山、钟祥、枣阳等地区，不断打土豪、割电线、截军车、打击地主反动民团，造成国民党军和民团的恐慌。9 月，林维先率部第 3 次越过平汉铁路。6 日，在稀水县刘家坳，歼灭湖北保安 7 团 1 个营另 1 个排，缴枪 300 余支，子弹 1 万余发。28 日，又在黄冈县黄家畈与湖北保安 7 团及国民党军第 103 师 1 个营遭遇，经激战，歼其前卫连大部，毙敌 100 余人。至 10 月中旬，胜利返回岳西县鹞落坪，与红 28 军政委高敬亭及所率部队会合。

12 月，高敬亭率红 28 军手枪团两个分队和第 1 营转战于蕲春县龙井岸地区，采取诱敌深入战术，一举歼灭尾追之国民党军第 32 师第 94 旅第 187 团 1 个营，毙伤敌约 400 人，缴轻重机枪 10 挺，步枪、子弹各一部。

由于柴家山会议后，红 28 军时而分散，时而集中，以分散活动为主，迅速、灵活、主动地歼灭敌人，致使国民党军痛感其“行踪飘忽”，“忽现忽隐”，“分股流窜”，“清剿”难以奏效，无可奈何地宣告第三次“清剿”归于失败。

抓住时机，痛击国民党军第 33 师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发生。国民党军政当局为了对付力主抗日、实行“兵谏”的张学良、杨虎城，将第 10、

第 83 师从鄂豫皖边区西调，以第 33 师接替其防务。鄂豫皖边区兵力减少，而国民党军新的“清剿”尚未部署就绪，这给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以可乘之机。红 28 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狠狠打击敌人。

啄立山战斗 1937 年 1 月初，高敬亭率红 28 军第 244 团第 1 营、特务营和手枪团两个分队自商城县城南下，在麻城两路口地区，与国民党军第 33 师第 198 团 6 个连遭遇，红 28 军勇猛作战，与之激战 4 个小时，后主动转移，迂回经扶，入麻城县境。敌第 33 师紧追不舍。高敬亭即率手枪团两个分队到黄冈地区检查工作，让手枪团团长詹化雨率余部牵着第 33 师兜圈子，寻机歼敌。2 月 5 日，部队到达麻城县西北的啄立山一带。6 日里，第 33 师第 198 团第 1 营和 1 个保安大队也追至啄立山。詹化雨当即决定利用啄立山有利地形歼灭当面之敌。遂令特务营在啄立山的树林内隐蔽待机，以第 1 营在徐家里东北侧担任阻击。当第 33 师第 198 团第 1 营与保安大队进至徐家里西北侧田冲时，红 244 团第 1 营即以猛烈火力向其射击，迟滞其前进。特务营则从树林中杀出，并以 1 个连向敌侧后迂回，断敌退路。红 244 团第 1 营分别由徐家里、李家冲出击，与特务营形成合围，并边战边缩小包围圈。经 2 小时激战，第 33 师第 198 团的 1 个营和 1 个保安大队，除保安分队队长和 1 名连长等 18 人逃脱外，其余被歼，毙伤敌 100 余人，俘 100 余人，缴枪 200 余支，轻机枪 3 挺。此战，给刚调入麻城不到两个月的第 33 师以迎头痛击。

王通战斗 1937 年 3 月上旬，为了扩大啄立山战斗的战果，进一步调动敌人，高敬亭将红 28 军（欠手枪团第 3 分队）集中在黄安、麻城地区活动。国民党军第 33 师师长冯兴贤获悉后，严令各部对红 28 军“分途跟踪，不得放松，一致行动，设法聚歼”。10 日，当红 28 军主力进至麻城县西北的梅花山、骆家堰地区时，第 33 师 3 个团分别从麻城、中馆驿、黄安包围过来，企图对红 28 军实施合击。红 28 军立即向黄安县转移。12 日，当敌第 33 师 193 团 2 个营追踪到麻城县王通地区时，高敬亭决定“杀回马枪”，利用有利地形，痛击追兵。遂令手枪团第 1 分队在王通南侧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阻击；第 1 营和特务营迂回至敌侧后，以一部断敌退路，一部将敌拦腰斩断，分割围歼。经 4 小时激战，全歼背水作战的第 33 师第 193 团 2 个营，击毙敌团长秦丹云、营长宋宝珠，缴获各种枪支 400 余，子弹 8000 余发，电台一部。此战，不仅达到了调动敌人、扩大战果的预期目的，而且体现了红 28 军领导人将分散作战与集中歼敌相结合，必要时集中兵力作战，给敌以重创的军事指挥艺术，从而沉重地打击了“追剿”之敌。

国民党军第 33 师虽迭遭失败，但师长冯兴贤并不甘心，重新组织进攻，调集 19 个连的兵力，组成 2 个“追剿”纵队，继续跟踪“追剿”。另有国民党军第 32 师第 190 团，第 65 师第 388 团、第 390 团，第 102 师 2 个营以及湖北省保安第 4、第 7、第 8 团各一部相配合，于王通战斗之后，分 3 路对红 28 军合击。3 月 31 日，红 28 军在黄冈县接天山一带经 4 小时激战，突出合围，向麻城夏家湾方向转移。敌发现后，调整部队再追。高敬亭为了保存红 28 军的有生力量，并摆脱敌人的“追剿”，决定再次分散活动：令第 1 营到黄冈大崎山，将黄冈战斗 2 营（1937 年 1 月中旬，中共皖鄂特委将蕲春、黄梅、广济一带红军游击队合编而成）改编为红 244 团新 2 营，随第 1 营出击平汉铁路两侧；红 244 团副团长林维先率特务营和手枪团第 3 分队到鄂东一带活动；高敬亭亲率手枪团第 1、第 2 分队到光山、罗山一带游击。

（四）实行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便衣队三结合，开展反“清剿”斗争

以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便衣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开展游击战争，反击国民党军“清剿”，是鄂豫皖边游击区斗争的主要特点和优点。

在红 28 军主力分散到外线作战的同时，鄂豫皖边游击区各地党组织领导地方武装，在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内，积极开展游击活动，袭扰和打击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鄂东北地区 1936 年 2 月，为反击卫立煌发动的“清剿”，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陈守信调在平汉路以西活动的鄂东北独立团，迅速回到鄂东北地区，与鄂东北地区的游击师、便衣队一起，开展游击活动，配合红 28 军作战。3 月，独立团与道委特务队在礼山县以东的彭店、新府、高店、王店一带活动。26 日，与红 28 军手枪团第 1 分队会合，发现国民党“清剿”部队第 102 师约 1 个营的兵力正由高店向王店开进。4 月 20 日，独立团和特务队根据道委决定，首先占领附近雷虎寨阵地，由手枪团第 1 分队化装成国民党第 25 路军别动队迂回敌之侧后，与独立团、特务队前后夹击敌人。协同作战的结果，歼灭国民党军第 102 师 2 个连，毙俘敌 140 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5 月，鄂东北道委第 3 次组建了鄂东北独立团，熊先春、洪益万分别为独立团团团长和政委。下辖两个战斗连和 1 个手枪队，共 200 余人。在人民群众配合下，独立团转战在鄂、豫两省十几个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歼敌 600 余人，缴枪 200 余支，牵制了国民党军第 10 师、第 58 师各一部和一些反动民团的兵力，减轻了红 28 军的压力。鄂东北的 3 路、9 路游击师，也在便衣队的配合下，四处出击敌人，烧掉不少敌碉堡，攻克不少敌据点，还翻墙入寨，歼灭反动民团武装。部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鄂东北道委特务队，通过活捉铁路监工刘文松，勒令其父（腰缠万贯的国民党军某部师长）交纳 5000 块银元、100 匹灰布和一部分药品及枪支弹药，不但震慑了敌人，而且为红 28 军筹集到一笔可观的经费和军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红 28 军作战。

皖西和皖西北地区 1935 年 2 月，中共皖西特委成立。特委书记徐成基十分重视组建游击武装，先后组建了潜北游击队、潜山游击大队、皖西独立营、4 县游击师和 29 个便衣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反动民团势力。同时，注重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发展新区。是年 6 月，赤城、赤南地区的 1、2 路游击师转战到皖西后，与皖西游击队配合作战，使皖西游击根据地扩大到 1.5 万平方公里。特别是在以大岗岭、鹞落坪为中心的纵横百公里的区域内，地方党和便衣队可半公开行动，红军指战员甚至可以穿军装单独行动。1936 年初，便衣队还在岳西县磨刀坪办起一所供穷人孩子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的学校。该校一直坚持到 1937 年 6 月，教师查瑞林遭国民党当局逮捕方停办，斗争形势很好。

1935 年 4 月，中共皖西特委与 1931 年 4 月成立的、并拥有一块游击根据地的中共皖西北特委取得联系。皖西特委书记徐成基便几次带领手枪队化装后到合肥附近的白区会见皖西北特委和游击师的领导人孙仲德，介绍敌情，配合工作，帮助皖西游击师开创游击战争局面。当时，皖西游击师有 4 个连队，皖西北特委特意将游击师各连送到皖西游击根据地进行整训和协同作战。后有一个连还补充进红 28 军。为巩固皖西游击根据地，高敬亭

还派一名副营长到皖西北游击根据地担任副师长，传授游击战争经验。这位副师长后来就牺牲在皖西北地区。皖西和皖西北游击根据地的游击队并肩作战，互相策应，不断打击敌人，扭转了皖西北游击根据地被国民党军残酷“清剿”所造成的被动局面，两地游击队也都得到了迅速发展，1935年5月14日，徐成基曾通过皖西北特委同党中央作过一次联系，就有关皖西特委和部队情况向党中央写了一份工作报告，同年8月，高敬亭和徐成基还是通过皖西北特委，向中共中央汇报了鄂豫皖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

皖鄂地区 1936 年秋，中共皖西特委书记徐成基在湖北英山县被反动民团杀害。9 月，高敬亭在英山县桃花冲主持召开会议，将中共皖西特委改为中共皖鄂特委，任命何耀榜为特委书记，领导湖北省英山、罗山、蕲春、黄梅、广济等 10 余县的斗争。特委机关设在岳西县鹞落坪。在中共皖鄂特委领导下，皖鄂地区人民群众积极支援红军，送情报，抬担架，缝军衣，做军鞋，安置和照顾伤病员等。在大岗山、鹞落坪、沙村河、小河南、将军山等地，建立了许多红军野战医院，又称“山林医院”，还建立了小型修械所和被服厂等，人称是红军的小后方基地，对红 28 军坚持游击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1936 年 9 月 6 日，红 28 军第 244 团第 1 营在浠水县刘家坳歼灭湖北保安 7 团 1 个营另 1 个排，缴枪 300 多支，子弹万余发。接着，又在黄冈陈家畈与湖北保安 7 团和国民党军第 103 师 1 个营激战，歼其前卫连大部，毙其 100 余人。红 28 军主力的作战行动，调动了敌人的“清剿”部队，迫使国民党军将进入山区的正规部队，龟缩于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只留民团和保安团驻守碉堡。鄂豫皖边游击区各地党组织，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带领地方武装，攻围寨，打碉堡，破坏敌碉堡封锁线。如鄂东北独立团，有一天从黄安县熊家河出发奔袭黄陂站。黄陂站守军是国民党军第 103 师的 1 个连和民团 50 余人。独立团以 1 连攻击该镇北头大庙敌连部，2、3 连担任主攻。战斗打响后，1 连牵制镇北之敌，2 连将民团迅速歼灭，3 连和手枪队猛攻镇南碉堡，迫使第 103 师 1 个排投降，余敌仓皇逃走，独立团缴获各种枪 40 余支。10 月，独立团连续作战，从熊家河出发，到陡山河、来家河和光麻公路沿线，横扫大小碉堡 100 余个，攻克敌围寨 20 多个。皖西地区，仅赤南、赤城两地，就破敌碉堡 60 余座。中共商南县委书记张泽礼，于 11 月 26 日亲率便衣队配合红 28 军手枪团第 3 分队，伪装成国民党第 11 路军的伤兵和护送队，攻进赤城熊家河一座碉堡后，将守敌枪栓卸下，令其背上枪带路，去攻第二个碉堡，由带路的敌军将碉堡喊开。用这种办法，一日内摧毁熊家河一带碉堡 10 余座。此后，又在赤城、赤南攻克 7 个围寨和摧毁 50 余座碉堡。红军游击队高兴地总结为“敌集中，我分散，敌上山，我下山，回过头来再把炮楼端”，这是当时游击战争蓬勃发展的真实写照。

与此同时，在鄂豫皖边游击区，一种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便衣队开展的游击活动，在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便衣队最早在鄂豫皖边区诞生，是 1932 年。红 25 军西征后，高敬亭根据游击战争的特点，十分重视便衣队的组建和扩展，亲自规定便衣队的任务。这也是鄂豫皖边游击区克敌制胜的重要策略。据不完全统计，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便衣队曾发展到 111 个。主要分布在皖西、鄂东北和豫东南 3 个地区。便衣队的主要作用在于：1. 发动、宣传、组织、武装群众。由于便衣队是土生土长于群众之中，最善于与群众接近，关心群众的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宣传革命道理，坚定人们的斗志。如：当革命处于低潮、群众对弱小的红军产

生疑虑时，便衣队就宣传说：“红军不会垮，将来不久就会回来的，总有一天会出头。”讲解红军必胜、国民党军必败的道理。通过亲连亲、邻接邻的串联，首先从成立秘密农民小组入手，逐步发展成为不脱产的小便衣队。潜山县的便衣队，一次夜袭回龙庙，将得来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解决了断炊之苦，群众更加信任和支持便衣队。

2. 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便衣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把被打散的革命力量集聚起来，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发展新党员，建立新的党组织。黄冈便衣队和地下党组织发展了100多名党员，建立了十几个党支部、4个区委，成立了中心县委。鄂东北道委便衣队还在白区发展了50多名党员，恢复了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基层组织的恢复和建立，使许多游击区或新区有了党的领导，并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建立起一支由党员为骨干，便衣队、游击队、战斗营为武装力量，共同保卫游击根据地的根深基厚的群众队伍。

3. 扩大游击区，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便衣队因隐蔽分散、灵活精干、善于联系和发动群众，较容易避开敌人的“清剿”和搜捕，在当地立足生根，因而开辟出一块块小的游击区，以后联成一片，形成一块新的游击区域或游击根据地。1935年冬，鄂东北独立团团团长陈守信在灵山冲放下一支10人便衣队，这支便衣队在独立团、游击师、特务营的支持和配合下，经过艰苦的工作和多次战斗的胜利，在平汉铁路两侧的罗山、信阳、应山3县间，开辟出二块游击根据地，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给红28军和鄂东北独立团以很大支援。

4. 保障红军给养，安置红军伤病员。红28军主力分散于外线作战时，其给养主要是靠便衣队解决。便衣队通过打土豪和发动群众支援等措施，源源不断地将衣服、鞋子、牙刷、牙膏、电池、电筒、雨伞等生活必需品送与红军。1936年3月，罗山便衣队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将罗山县税务局长活捉，向其筹款1000块银元。黄冈便衣队抓到人称“百万富翁”的土豪毛竹字，筹款5万元。这些款项，或购成粮食，或直接送至红军，解决了红军的急需。红军的伤病员，也是靠便衣队安置在群众家里或山林中，负责安全，医疗护理，无微不至。灵山便衣队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共接收70多名伤病员，在其精心掩护下，无一被敌人发现。保证了主力红军轻装上阵，提高了机动作战的能力。

5. 镇压反动分子，掌握乡村政权。便衣队在乡村中，注重斗争策略，对于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分子，坚决镇压；对于开明绅士和有正义感者，以及迫不得已给敌人做事者，晓以大义，争取中立；对听命守法、为我做事者予以保护；对乡村中一些联保主任、保甲长和国民党的一些基层组织，经过工作，使其为我所用。在便衣队的控制下，光山、商城部分地区，地富收租多少，红军家属免租，村长保长的任免，都是便衣队说了算，便衣队实际上掌握了不少乡村的基层政权。

6. 补充红军兵员，配合红军作战。在便衣队的支持下，有大批兵员和地方武装接连不断地补充进主力红军。如1936年秋，黄冈县组建了战斗1营，后发展至200多人，补充到红28军第82师特务营。1937年春，黄冈又组建了战斗2营，后发展到300余人，改编为红28军第244团新2营。皖潜独立营、蕲黄广游击大队等，也都上百人，陆续补入红28军。便衣队还对所在区域的敌情经常调查，有多少据点，多少敌人，是正规军还是民团，战斗力如何等等，搞得一清二楚，将这些情况提供给红28军，使主力部队掌握主动权，行动自如，打胜仗。同时，便衣队又经常破坏铁路，砍电线杆，散发传单，

袭击敌人据点，直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皖西鹞落坪游击队经常到敌人据点周围活动，一般5人一组或10人一组插入敌后，进行骚扰。有时打一枪，敌机枪一夜不停。有时几个便衣队员能缠住敌人1个营打几个钟头。便衣队白天无影无踪，夜间摸岗打碉堡，搞得敌人惊恐万状，心神不安。

总之，三角山会议后，红28军在地方武装和便衣队的配合下，边战斗边总结经验教训，战略战术也日臻成熟，游击战争蓬勃开展。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红28军进行较大和较有影响的战斗就有34次，歼敌5000余人，缴各种枪4000余支（挺），游击区也扩大到3省边界45个县，成为鄂豫皖边游击区三年游击战争中的最好时期。

三、最艰苦的岁月

（一）国民党军强化“清剿”，斗争形势恶化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根据其在“西安事变”后确定的“北和南剿”，方针，于1937年4月27日下令设立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委任刘峙、陈诚、孙连仲、庞炳勋、卫立煌、何柱国、王树常、刘茂恩、胡宗南等19人为委员，刘峙为主任委员。同时，将“豫鄂皖边区主任公署”撤销，成立“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卫立煌任公署督办。下辖岳西、信阳、经扶3个督办公署。督办可任意调整撤换辖区的地方官员，以强化对“清剿”的指挥。卫立煌集多次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红军游击队所以能够“行动自如、飘忽无定”，是因为其成员“多系本地土著，所到之处，又有人从中勾引通窝”所致，因此，改变了“分区驻剿、追堵兼施”的办法，采取“剿抚并施”、“军政并进”之方针。要求鄂豫皖地区国民党各级政府要切实做到和正规军相配合，协力“防卫”。强调对红军主力、地方武装、便衣队的“清剿”要同时进行，并将“清剿”的重点放在红28军所在地——鄂东北地区。

在这次“清剿”中，国民党军部署的正规部队有第32、第33、第47、第64、第65、第102、第103、第167师和独立第5旅，共计38个团。为保证对鄂东北地区的重点“清剿”，卫立煌将鄂东北地区的4个保安团相对集中，又将原在平汉铁路以西的湖北保安部队8个团调进。这样，在鄂东北地区共集中了12个保安团，协助国民党正规军作战。在兵力配备上，还采取了两项强化措施：一是将原驻城镇的部队改为进山扎寨，重要地区广筑碉堡，以正规军驻守；二是抽调精锐部队组成“迫剿”纵队，由“督办公署”统一指挥，施行“深入穷追”、“分头兜剿”。国民党各级政府则以“移民并村”、“埋雷霸路”、“跟路”追踪、伐林搜山、半夜“摸鱼”（半夜摸进村搜查）、造谣欺骗、安排侦探等多种办法予以配合。5月，向鄂豫皖边红军游击队，发动第四次大规模“清剿”。

面对敌人新的“清剿”，红28军领导人思想准备不足。虽然红28军所在的鄂东北地区，中共鄂东北道委在闻知国民党军即将有新的“清剿”后，及时采取对策，针对以往敌人在“清剿”中常派侦探、坐探的情况，散发《为肃清国民党侦探、坐探告劳苦群众书》等传单，宣传西安事变后的革命形势，号召贫苦群众起来，反对敌人用侦探、坐探进行“清剿”的阴谋活动，采取了一些反“清剿”的措施，却没有引起高敬亭等领导人的足够注意。高敬亭在率领红28军挫败国民党军前三次“清剿”后，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敌人可能发动的新的“清剿”上，而是在革命队伍内部开展错误的肃反斗争，搞“整顿”道委，先后将鄂东北道委和军队的一些优秀领导人错判、错押、错杀，削弱了反“清剿”的领导力量，造成人心不稳。又由于红28军长期停滞在鄂东北地区，正是国民党军这次“清剿”的重点地区。红28军行动迟缓，延误了转移的时机，陷入敌重重包围之中，斗争形势十分严重。

（二）红军游击队受挫，百折不挠坚持斗争

1. 中共鄂东北道委和独立团受挫与独立团重建

1937年5月，当鄂豫皖地区碉堡密布、新的“清剿”开始时，高敬亭对中共鄂东北道委和鄂东北独立团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任命胡继亭为道委书记（未到职），陈希堂为独立团团团长，李远明为独立团政委。新任领导既不熟悉部队，又缺乏实际指挥作战经验。上旬，当独立团在黄安县老君山、天台山一带活动时，遭到国民党军第102师1个团的包围。由于部队连日冒雨行军，粮弹不足，疲惫不堪，被迫分散突围。6月7日，又因行动路线选择不当，部队进入反动势力十分猖獗的礼山县以东之高庙、沙河店一带，再次遭到国民党军第47师1个团的包围，部队被压迫在两义河内。适值山洪爆发，大雨倾盆，不少战士于突围中被洪水冲走。最后，仅30余人突围成功，其余大部壮烈牺牲。这是鄂东北独立团三年游击战争中损失最重的一次。与此同时，由于鄂东北道委书记胡继亭未到职，道委成员对敌情不明，机关和直属队200余人以及手枪团第2、第3分队，便在游击根据地内陷入重围。后向北突围，进入凌云寺以北地区时发现北进道路已被敌堵死，遂折返卡房，又遭从老君山、三角山方向来敌之袭击，道委机关和直属队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部分重伤员被敌杀害，部分受伤或被俘，共计损失40余人。6月中旬，鄂东北道委及时组织力量反击国民党军“清剿”，在人民群众和便衣队的协助下，将鄂东北3路游击师同独立团从高庙、沙河店突围出来的30余人及部分痊愈伤病员在门坎岭合编，第4次组建鄂东北独立团，团长顾士多、政委李士林，下辖两个连和1个手枪队，共140余人。在鄂东北道委领导下，继续坚持鄂东北地区的斗争。

2. 红28军艰苦转战

在敌人新的“清剿”部署尚未完成之前，红28军主力基本上以营为单位在鄂东北地区和平汉铁路两侧活动。在蕲春、黄冈一带活动的红28军特务营和手枪团第3分队，在敌“清剿”初期，曾给敌一定打击。

洪武塢伏击追敌5月10日，红28军特务营和手枪团第3分队进至蕲春县清水河西侧地区时，湖北省保安7团尾追而来。为了摆脱追敌，特务营和手枪团第3分队决定利用洪武塢起伏的山地和茂密的树林作掩护，伏击该敌。15时，当保安7团进至特务营和手枪团第3分队伏击阵地前沿时，特务营和手枪团第3分队一齐开火，并切断其前卫营退路。激战2小时左右，将其前卫营全歼，俘敌100余人。

望兵寨勇猛退敌6月5日，红28军特务营和手枪团第3分队进至黄冈县望兵寨地区，遭国民党军第33师第193团拦截。特务营和手枪团第3分队决定予以反击。遂以特务营一部抢占望兵寨制高点，并向寨子北端及迂回之国民党军猛烈射击，很快将敌压了下去。特务营主力沿周家冲东北侧山岗向敌前卫营主力侧后迂回，左右夹击，激战约2小时，击溃其前卫营，歼其大部。但很快陷入困境。

瓜儿山受挫突围望兵寨战斗后，红28军特务营和手枪团第3分队向天台山方向转移，欲与红28军主力会合。6月6日，卫立煌和鄂豫皖边区巡视员袁德性到麻城亲自调兵，组织第11路军和第32师各3个团，以及第47、第102、第103师各一部，在湖北省两个保安团各一部的配合下，以数十倍之兵力，秘密合围红28军特务营的手枪团第3分队。而特务营和手枪团第3分队

此时全然不知，当行至黄安县瓜儿山附近时，遭敌合击。经两昼夜激战，方突出重围。部队行至杨真山南侧仰天窝时，又遭敌拦击，虽英勇冲击，奈寡不敌众，部队被冲散。后在当地便衣队帮助下，收拢 190 余人，暂编 2 个连，向黄冈一带行动。7 月 5 日，在黄冈县戴家湾附近，与高敬亭派往寻找特务营和手枪团第 3 分队的手枪团第 1 分队会合。特务营随即在黄冈县白羊山进行了整编，将在这一带活动的潜山战斗营编为特务营第 3 连。

白羊山围歼战白羊山整编后，国民党军第 103 师 1 个营于 7 月初向特务营和手枪团第 1 分队袭击。特务营和手枪团第 1 分队决定利用白羊山陡险的有利地形，将这股孤军深入之敌聚歼。遂将队伍迅速展开：手枪团第 1 分队和特务营第 1 连占领白羊山北侧高地；特务营第 2 连抢占右翼甘塘湾东北侧高地；特务营第 3 连隐蔽在白羊山西北侧鞍部，负责侧后安全，并待机出击。当敌两路分别向甘塘湾进攻，一路向小白羊山迂回进攻时，遇到红 28 军特务营和手枪团第 1 分队的猛烈攻击。甘塘湾方向之国民党军在红军夹击下全部被歼，其他两路也在特务营第 3 连投入战斗后被击退。是役，毙伤国民党军 300 余人，缴枪 200 余支，子弹 1000 余发。使遭受挫折后的红 28 军特务营和手枪团第 1 分队士气为之大振，随即在薪春县何铺乡又消灭国民党驻军 1 个连及多股反动民团。

清河冲伏击战白羊山战斗后，红 28 军特务营和手枪团第 1 分队进至蕲春县将军山西南的朱家冲地区。7 月 7 日，得知何铺乡驻有国民党军 1 个连和区乡自卫队共 200 余人，决定将其引出，予以歼灭。8 日，以 5 名便衣队员前去“侦察”诱敌，部队埋伏在清河冲地区。何铺乡国民党驻军发现红军侦察便衣后，全部出动追赶。当其进入红 28 军设伏阵地后，特务营和手枪团第 1 分队一齐冲出。敌除少数逃跑，其余悉数就歼。

新 2 营遇难卢家河畔虽然红 28 军特务营和手枪团第 1 分队等打了几个胜仗，但总的反“清剿”形势还是十分严重。6 月 12 日，高敬亭欲扭转不利的斗争形势，派红 244 团第 1 营和新 2 营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以期调动敌人。第 1 营和新 2 营还未过铁路，即在门坎岭以西遭到国民党军第 102 师的围追堵击。第 1 营奋勇拼杀，冲过铁路；新 2 营被敌割断，被迫向东南方向转移，沿途多次遭敌截击，连连受损。26 日拂晓前，余部 100 余人在麻城县卢家河附近山上一座大庙里宿营，沉睡中遭敌袭击。惊醒后与敌展开肉搏，给敌以很大杀伤，自己亦伤亡惨重，除少数人脱险外，其余全部损失，新 2 营番号自此不复存在。第 1 营冲过铁路后，跳出敌人包围圈。随后在应山、钟祥、京山、枣阳、桐柏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战，先后袭击了国民党军 30 多个据点。7 月 24 日，部队在河南省信阳县，与周骏鸣率领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相配合，拔除地主围寨蔡冲，控制了炮楼，将乡丁全部缴械。这次战斗，对困难中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是及时、有力的支援，同时也加强了与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联系。

高敬亭率部转战岳西 6 月下旬，高敬亭率从鄂东北突围出来的红 28 军手枪团第 2、第 3 分队转战至河南省光山县南向店附近的鹭鸶湾，击毙反动民团头子易本应，歼团匪 100 余人，缴获各种枪 100 余支。后经湖北省麻城、黄冈、浠水、罗田等县，于 7 月中旬，转移至安徽省岳西一带坚持斗争。与此同时，皖西北和皖鄂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敌反复“清剿”下，被分割包围，与上级失去联系，遂各自为战，在人民群众掩护下，前赴后继坚持斗争。

3. 便衣队的斗争

在国民党军新的“清剿”下，便衣队也面临了空前严重的局面。

首先，国民党军为了割断便衣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达到困死饿死便衣队的目的，采取了“移民并村”政策。便衣队对付敌人“移民并村”的对策，一是领导群众，在敌人未修好并村的碉堡和围寨之前，发动组织群众拆毁或拔掉，破坏敌人并村计划；二是隐蔽在深山中，靠群众想方设法与便衣队取得联系，送饭送水。群众的办法很多，如穿着新鞋上山，赤着脚回村，鞋就留给了便衣队穿。国民党规定上山干活只准带一顿饭，群众就饿着肚子留给便衣队吃，等等。

其次，国民党军还采取了“霸路”、“跟路”等阴谋诡计。“霸路”，即国民党军在便衣队活动的主要道路上，埋上大量地雷，作为报警的信号。便衣队便细心观察，设法绕开；或轻轻取出，埋在敌人行进的道路，打击敌人。所谓“跟路”，就是敌人采取寻便衣队脚印的办法，跟踪尾随。便衣队便注意不留下痕迹。走在后面的便衣队员，小心翼翼地用树枚扫平脚印。遇上烂泥之地，则倒穿着鞋走，将敌引到相反的道路上去。

再次，国民党军经常倒林烧山、搜山。即强迫成千上万的群众，到便衣队隐蔽的大山周围，将树林全部砍光，晒上几天，用火烧掉，使山变秃，以便围捕便衣队。便衣队为保存力量，每天需易地数次，或躲进山洞，或钻入墓穴，或藏在水塘中，隐蔽在荷叶下。人民群众则舍生忘死掩护便衣队员。当便衣队员隐藏在老百姓家，遇敌搜查躲不过时，妇女就称便衣队员是自己的丈夫，老人就称是自己的儿子。皖西长岗岭农民曾少山，在敌人搜山时，全家掩护便衣队藏进山洞。孩子被惊哭后，他含泪捂住孩子的嘴，以免暴露，招致不测，结果孩子窒息而死。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便衣队的勇敢机智，终于度过了重重难关。至1937年9月七里坪集中时，便衣队仍保留有近600名队员。

1937年6月至7月，是鄂豫皖边游击区三年游击战争中的最艰苦岁月。红28军及鄂东北地方武装虽然遭受较大的损失，但是并没有动摇红军游击队的斗志，他们重新组织队伍再战，顽强地坚持斗争，终于使国民党军“清剿”计划化为泡影。红军游击队战胜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清剿”后，迎来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

四、谈判改编，奔赴抗日前线

（一）青天畷谈判，签订停战协议

1937年7月上旬，高敬亭率部转战在鄂东北地区时，偶然发现国民党报刊中登有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消息，将信将疑。为了证实这一消息，高敬亭率部从鄂东出发，前往皖西，寻找中共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7月13日，在岳西县甫田村，高敬亭见到何耀榜，并看到了姜术堂带回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和《中央关于抗日救国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高敬亭当即反复阅读，认真分析和研究，确信无疑后，立即主持召开干部会议。会议传达和研究了中共中央文件，根据中央文件的指示精神，商讨了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具体方案。并决定，争取主动，立即以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名义，向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停战谈判的倡议，并派何耀榜为红28军的正式代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同时，指示各地党组织、游击队、便衣队立即行动起来，散发有关谈判的传单、标语，提供有关情报，配合谈判。

15日，高敬亭派便衣队交通员金孝广将关于停战谈判问题致卫立煌的函件，送至岳西县第3区蛇形岗炮楼。当天下午收到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岳西办事处“愿意谈判”的回复。何耀榜还代表红28军与该办事处进行了初次接触。

16日，安徽省政府奉国民党南京政府之命，派皖西保安司令部办事处郭副官作为地方代表参加停战谈判，当日到达岳西县城。

卫立煌表面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实际想利用谈判之机达到三年“清剿”未能达到的消灭红军游击队的目的，遂命第32师等部将高敬亭、何耀榜所率部队包围于岳西县鹞落坪、大岗岭、南田村一带，妄图以武力胁迫红28军就范。同时玩弄政治阴谋，用高官厚禄拉拢红军官兵，说什么“若归顺国军，官晋一级，给优厚薪俸”，“交1挺重机枪500元，轻机枪150元……”高敬亭、何耀榜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对国民党重兵包围、无和谈诚意的阴谋予以揭露的同时，做好应付敌军搞突然进攻的军事准备。并坚持国民党军必须后撤10公里方可谈判的立场。高敬亭更是自始至终未暴露身份，使敌“活捉高敬亭者赏洋5000元……”的阴谋没能得逞。

在全国抗日形势的压力和鄂豫皖边区红28军领导人及谈判代表的坚决斗争下，卫立煌不得不于18日派出全权代表、高级参谋刘刚夫到达岳西县城，并下令第32师后撤10公里。20日，红28军代表何耀榜前往岳西县政府大厅会见卫立煌的全权代表刘刚夫、安徽省政府代表郭副官，就停战谈判、部队集合地点、时间进行了初步磋商。谈判商定由双方代表组成谈判代表团、停战谈判委员会、协议起草委员会，由何耀榜、刘刚夫和郭副官3人为停战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委员。决定22日起，在红28军控制区——岳西青天畷上青小学举行谈判。

21日，何耀榜返回南天村，将谈判磋商结果向高敬亭作了详细汇报。高敬亭和何耀榜共同对谈判中应坚持的原则和条件做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并

姜术堂，原系国民党第11路军某团少尉排长，1936年投诚参加红军。后经规劝返乡河南，照顾年迈的寡母。“西安事变”后，持中共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给他的身份证明前往西安，见到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任弼时听取了他关于鄂豫皖边区斗争情况的汇报，并交给他一些中央文件。姜术堂于1937年夏从西安七贤庄携中央文件返回皖西，找到中共皖鄂特委。

拟定了具体方案。

7月22日，谈判正式开始。在4个问题上，争论比较激烈。一是红军游击队的领导问题。国民党方面认为：既然红军游击队同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就应属国民政府领导。红军代表坚持，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必须保持独立系统，只能属中国共产党领导，如果国民党方面不接受此条件，就无从谈判；二是红军的作战行动问题。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只能在规定的地区范围内活动，不得超越。红军方面坚持说，抗战不分地区界限，哪里有日本人，红军就要到哪里去打。红军的作战行动不能受任何地区限制；三是红军的兵员补充问题。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不能随便扩充军队，发展势力。红军代表坚持：人民群众自愿参加红军，红军必须吸收。群众愿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抗日游击队，红军就要积极领导和支持；四是红军收容部队问题。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收容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便衣队可以，但不准留人在那里活动。红军代表表示：只要国民党接受红军方面的条件，红军就按协议执行，绝不留人在那里活动。但国民党方面必须保证，红军在收容部队时，国民党军和民团不得阻击和追击。经过反复商讨，国民党方面同意何耀榜提出的4项条款作为谈判的基础，即1.应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作为共同遵循的方针；2.红军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3.同意番号暂定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但正式番号应由两党中央决定；4.红军集中，在3个月内完成。经过7天的谈判，27日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

红军代表提出的12条款：1.红军的集中地点以黄安县七里坪为中心，以及礼山县的宣化店、黄陂站，罗山县的张家湾一带地区；2.红军游击队在鄂豫皖3省设3个办事处，分别驻湖北省黄安县、河南省确山县、安徽省立煌县；3.允许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4.释放政治犯；5.红军的武器弹药和给养由国民政府补充；6.驻地如有土匪扰乱或违反社会秩序者，红军有权予以镇压；7.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的交通工具由国民政府负责；8.若有老弱病残者探亲返乡者，所在地政府不得歧视，应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如认为可疑者，应交红军办事处处理；9.过去被没收的红军指战员的房屋、土地，一律归还原主，被罚之款，如数退赔；10.红军指战员家属一律享受抗日军人待遇；11.红军游击队在集合途中，国民党军队不得堵击或追击，如发生冲突，由国民政府负责；12.上述条款限于鄂豫皖地区，凡属全国性的问题以及红军番号的最后确定，应有两党中央决定。

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的8项条款：1.未经许可不得扩兵；2.不打土豪；3.不破坏交通；4.军事行动要事先呈报；5.彼此不得报复以前战争仇恨，停止一切敌对活动，以利抗日；6.友军集中后不得在各地保留便衣队；7.不得在国军中发展中共党员；8.鄂豫皖所有红军便衣队一律于3个月内到黄安七里坪集中。

28日，国共双方代表在岳西县九河朱家大屋举行停战协议签字仪式。高敬亭以红28军“军政治部李主任”身份和李守义的化名，与何耀榜代表鄂豫皖边区红军游击队出席签字仪式。高敬亭和刘刚夫分别代表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至此，初步实现了鄂豫皖边游击区的国共合作。

在红28军与国民党鄂豫皖边区地方当局达成停战协议后，由于分散在各地活动的红军游击队还不知道情况，国民党的“清剿”也未停止，因此“清剿”和反“清剿”的斗争，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才渐渐停止。

（二）鹞落坪会议与七里坪集中整训

鄂豫皖边游击区党和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平谈判的过程，也是鄂豫皖边党和红军游击队从反对国民党军“清剿”的游击战争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红 28 军领导人在了解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后，及时跟上了形势。但在红军游击队指战员中，还有部分人员的思想一时未能转过弯来，这是因为国民党军长期的残酷“清剿”造成的。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罪恶恨之入骨，也不相信国民党军能真的坐下来和共产党谈判，共同抗日。也有少数人产生了“革命到了底”的情绪。为了使广大党员、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尽快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新的斗争形势，迅速统一到党的联合抗日旗帜之下，肩负起历史赋予的新的使命，1937 年 7 月底，高敬亭在岳西县鹞落坪召开干部会议。会议着重阐明了在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举国一致抗敌御侮的必要性，统一了与会人员的认识。会议同时提出了要提高警惕性，防止国民党军背信弃义，搞突然袭击。会后，高敬亭分别派出人员到鄂豫皖边游击区各地所属部队、地方武装和便衣队，宣传党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政策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说服教育，迅速提高边区军民的认识，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与此同时，传达了部队到黄安七里坪集中整编的指示。为了确保集中顺利、安全，重新规定了各部队进驻七里坪的时间和行动路线。8 月底，高敬亭派胡继亭、林维先率特务营和手枪团第 2 分队去平汉路西，向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传达国共合作的精神。

9 月上旬，红 28 军所属各部队及各地党组织领导下的地方武装、便衣队陆续向以黄安七里坪为中心的地区集中。部队在开进途中，以中国工农红军第 28 军名义沿途张贴布告：“当此国难日亟，民族危亡之际，凡本部同仁愿抗日者，一律到黄安县七里坪集中。”这既是集合队伍的口号，又是政治宣传，让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官兵都知道，红军游击队是真正抗日的，绝非投降。并号召愿抗日的志士仁人和失散的红军游击队人员迅速集中起来抗日。不久，除红 28 军第 82 师特务营及手枪团第 2 分队在确山县竹沟地区外，其余集结完毕。红 28 军军部和手枪团集中在黄安县七里坪；红 244 团第 1 营集中在礼山县宣化店；鄂东北独立团集中在礼山县黄陂站；各地便衣队集中在黄安县两道桥。

对于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鄂豫皖边区的斗争和国共和谈，党中央十分关心，并给予了具体指导。9 月 7 日，高敬亭、何耀榜收到由郑位三转交的中共中央指示信，喜不胜言。9 日，即将鄂豫皖边区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详细的报告，并请示与国民党谈判的有关问题。毛泽东在收到报告后，两次致电林伯渠，就鄂豫皖边区谈判和集中应坚持的原则，作了重要指示。如：在部队谈判改编中，一定要坚持独立性；不要收回各县便衣队；不让国民党派人插到红军游击队中来，以及严防国民党军偷袭等。中共中央还派郑位三、肖望东、张体学等人从延安来到七里坪，看望鄂豫皖边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进一步传达和明确中共中央关于谈判、改编、国共合作等有关问题的方针、政策，巧妙而策略地将国民党任命高敬亭为“工农抗日联军挺进司令”的委任令退掉。并向刘刚夫声明，红 28 军改编番号必须由两党中央共同决定，原谈判中所定番号无效。这样，鄂豫皖边游击区的国共和谈，就在中央具体的指导下，胜利而圆满地完成。

9 月下旬，鄂豫皖边红军游击队和近 4000 人民群众在黄安县七里坪召开

祝捷大会。郑位三在会上报告了全国抗战的形势和前途，通报了平型关大捷的喜讯，表彰了鄂豫皖边区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三年来坚持游击战争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报告再次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号召边区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夺取抗战胜利而继续努力奋斗。10月下旬，红28军特务营和手枪团第2分队从确山县竹沟回到黄安县七里坪，与红28军主力会师。至此，红28军各部和鄂豫皖边游击区各地党组织所属之地方武装、便衣队全部集中，共1800余人。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部队集中后，在郑位三、肖望东等具体帮助下，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进行了短暂、全面的整训。在七里坪秦家祠堂举办了连以上干部轮训班。学习的主要内容有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文章。还举办了青年训练班，培养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近600人。中共中央先后派聂鹤亭、郭述申、戴季英、方毅、彭康等到七里坪，检查部队的集中整编工作。郑位三、方毅、彭康分别为轮训班和青训班授了课，高敬亭也多次到训练班探望受训干部和学生。通过学文件、学政策，轮训班、青训班的干部和学生，对抗战形势和党的统战政策，对抗战的持久性和必胜的前途，对进军皖东，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义等，有了明确的认识。干部结业回到连队后，组织部队战士学习、讨论，提高认识，武装思想，并积极、普遍地开展了游击战术和技术的训练。

12月29日，高敬亭、何耀榜到汉口参加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的关于讨论各游击区党及部队工作的会议。长江局负责人听取了高敬亭关于鄂豫皖边区军事工作的报告，并对鄂豫皖边区目前的工作重点作了具体的指示。

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从汉口到达七里坪，视察了红28军整训情况和东进抗日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叶剑英向高敬亭详细讲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分析了皖中、皖东地区的形势，部署了东进抗日的作战意图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三）编入新四军第4支队，东进抗日

1938年1月22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作出关于鄂豫皖边区工作的决议，责成鄂豫皖党组织在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尽力扩大部队，以增加抗日力量，决定由高敬亭、郑位三、吴先元、郑维孝、林维先、胡继亭及政治部主任等7人组成新四军第4支队军政委员会，高敬亭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同时，成立中共鄂豫皖特委，郑位三为书记，继续领导鄂豫皖边区的斗争。

2月中旬，遵照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指示，鄂豫皖边红28军以及鄂东北独立团等地方武装、便衣队，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一起，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4支队。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未到职，后由戴季英接任），经理部主任吴先元。支队下辖第7、第8、第9团、手枪团和一个直属队。第7团由红28军第82师第244团、新兵营组成，下辖2个营，团长杨克志，政治委员曹玉福，参谋长林英坚，政治处主任胡继亭；第8团由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组成，下辖3个营，团长周骏鸣，政治委员林凯，参谋长赵启民，政治处主任徐祥亨；第9团由鄂东北独立团、红28军第82师特务营组成，下辖2个营，团长顾士多，政治委员高志荣，参谋长唐少田，政治处主任郑重（郑如星）；手枪团由红28军手枪团和部分新兵组成，团长詹化雨，政治委员汪少川；直属队以原红28军司、

政、供、卫人员为基础，组成支队参谋处、政治部、经理部、卫生部，下辖特务连、通信连、交通队等。全支队共 3100 余人。

与此同时，新四军第 4 支队留守处也在黄安七里坪成立，由郑位三、何耀榜、刘名榜、吴名杰、江子英、田东等 33 人组成，郑位三任书记，田东任主任，领导部分武装，保卫边区根据地。

3 月 8 日，新四军第 4 支队奉军部命令，在七里坪召开东进抗日誓师大会。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涌集到七里坪，含泪相送人民子弟兵。会后，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率支队第 7、第 9 团和手枪团从七里坪出发（随后第 8 团从确山县竹沟出发），东进皖中、皖东抗日。至此，鄂豫皖边红军游击队胜利地完成了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十五章 鄂豫边游击区

鄂豫边游击区又称桐柏山游击区或豫南游击区。它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红军主力退出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一年之后，由中共鄂豫边省委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创立的。

鄂豫边游击区位于豫南、鄂北交界的桐柏山主脉以北地区，包括确山、信阳、泌阳、桐柏4县边界和唐河、新野县一部分，面积约2700平方公里。这里桐柏山支脉纵横交错，地势险要，物产丰富，游击战争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处在远离中心城市的“三不管”地区，国民党统治力量较为薄弱；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较深，早在1922年就有了党的活动，1925年开始陆续建立党组织，党的八七会议前后，曾爆发过著名的确山、刘店、四望山、桐柏等10数次农民武装暴动。这就使鄂豫边区游击战争的成功发动与顺利开展，建立在了坚实的基础之上。

鄂豫边游击区的建立，经过了几起几落、艰难曲折的历程。她是在豫南、豫西南地区革命处于低潮的严酷形势下，在没有主力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作基础的困境中，由当地地下党员和农民组成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经过与地主武装、土匪和国民党军队的反复较量，逐步开辟和发展起来的。游击队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初创时的7个人发展为1300余人。抗日战争初期，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成为新四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地区成为党在中原地区的一个战略支点。

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大致经过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4年4月至1936年1月，是鄂豫边游击战争的酝酿准备阶段；第二阶段，从1936年1月到1936年9月，是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和游击区的巩固、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1936年10月到1937年9月，是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在曲折斗争中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第四阶段，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3月，是鄂豫边红军游击队通过谈判斗争，促使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阶段。

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以其对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特殊贡献，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一、酝酿发动游击战争与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创建

（一）中共鄂豫边工委为发动游击战争而斗争

鄂豫边区原包括鄂北襄（阳）、枣（阳）、宜（城）革命根据地和豫西南南阳地区，中共在该地区的领导机关先后为鄂豫边区特委和鄂豫边区临时省委。1932年春夏之间，鄂北根据地在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下沦为白区。鄂豫边临时省委机关被迫由鄂北转移到南阳后，由于叛徒出卖，于1933年6月再次遭受严重破坏。在边区党组织失去领导机关、面临全面解体的危急关头，原鄂豫边临时省委委员张星江、技术书记仝中玉等人挺身而出，于1933年7月召开了由泌阳、新野、方城、枣阳等县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建立了中共鄂豫边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危难时刻挽救了鄂豫边区党组织，担负起继续领导边区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使命。

1934年1月，根据中共上海中央局的通知，鄂豫边临时工委书记张星江和河南省委委员王国华（河南省委另指派李前、杨治启、段永健、王春义等人随同王国华赴江西中央苏区学习），分别作为本地区党组织的代表，到江西瑞金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共同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这之前两人还一同列席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大会期间，红军总司令朱德亲切接见张星江和王国华，在认真听取他们关于组织夜聚明散的农民游击武装，分别在唐河、桐柏、泌阳和驻马店一带开展夺粮、打“坏货”斗争的情况汇报后，朱总司令明确指示两人：要把游击队拉到山上去，选择地形复杂、敌人统治薄弱的“三不管”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朱总司令的谈话凝结着游击战争的宝贵经验，为发动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二苏”代表大会之后，王国华等留在中央苏区学习。张星江则由瑞金转赴上海，向上海中央局汇报了鄂豫边区的工作，并接受了中央局3月16日发出的《中央给鄂豫边工作委员会的指示信》。中央局在信中表扬了鄂豫边临时工委在党组织遭受破坏、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斗争的精神，指出工委今后的斗争任务是：健全党的组织和领导机构；以唐河、泌阳、镇平、新野等县为中心，发动群众开展抢粮分粮和抗捐抗税等斗争，并注意在斗争中建立纠察队之类的武装组织；在群众斗争开展的情况下，要坚决地领导群众发动游击战争。指示信还就开辟城市工作、恢复鄂北苏区等问题向工委提出了要求。1934年4月初，张星江由上海返回边区。中旬，鄂豫边临时工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上海中央局指示信精神。会议经过认真学习讨论，根据中央局指示信精神作出了决议案，同时根据上海中央局的指示，正式建立了中共鄂豫边区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之后，工委接着召开了第一次常委会议，重点研究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局指示问题。4月20日，鄂豫边工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贯彻工委各项决议精神。同时，工委领导张星江、仝中玉、张旺午等分赴各县区，检查中央局指示和工委扩大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具体指导。在鄂豫边工委领导下，边区党的工作得到恢复与发展。工委先后建立了中共唐河县委（并领导桐柏），泌阳、镇平县委（不久改为镇平邓县联合区委）和南召县特别支部，并与鄂北枣阳、襄阳、钟祥等县的党组织沟通了联系。边区群众工作也有了新转机，唐河、泌

阳县党组织积极发动农民开展抢粮和抗捐、抗税斗争；南召县党组织领导学生举行了罢课斗争。由于这些斗争采取了秘密与合法相结合的方式，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均赢得了胜利。

1934年夏末，鄂豫边工委开始把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发动武装斗争上来。七八月间，工委两次常委会议均明确提出建立游击队、发动游击战争问题。随后，工委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禅寺召开边区各县代表会议，进一步讨论研究了发动游击战争的实施办法。会议根据张星江对中央苏区及边区斗争形势的介绍，决定加强边区中心地区的工作，筹备建立游击队，发动游击战争，以积极配合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会后，工委派宣传部长全中玉赴上海，向中央局汇报了在桐柏山区发动游击战争的计划，取得了中央局的赞同与支持。

1934年11月，鄂豫皖边区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途经桐柏山区。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向红25军副军长徐海东等详细介绍了桐柏山区的地理环境和敌情，并和韩本清担任向导，途经方城、鲁山等地，将红军送至豫陕边界卢氏县。红25军领导在与张星江接触期间，建议鄂豫边工委应在桐柏山区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这更加坚定了工委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张星江返回时，红25军向鄂豫边区党资助了300元活动经费，还交给张星江一封信，让其转交鄂豫皖边区红28军。这以后，鄂豫边工委多次派人往返于鄂豫皖、陕南地区传递信件，为沟通红25军与鄂豫皖红28军的联系做出了贡献。

鄂豫边工委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准备，发动游击战争的条件已基本成熟。1935年7月13日，工委在桐柏县程湾西南的白莲洼召开扩大会议，具体研究组建游击队，发动游击战争问题。工委还特邀在此地养伤的鄂豫皖边区红28军部分伤员列席会议，请红军伤员王连长在会上介绍了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由于会议时间延长，目标暴露，15日凌晨，会场遭当地反动民团包围。除张星江、全中玉等5人脱险外，泌阳、唐河、新野、桐柏等县党组织负责人和红军伤员共11人被捕，红军连长牺牲。这次事件使边区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发动游击战争的计划因此受到严重挫折。

（二）豫南党组织的恢复

豫南地区民风强悍，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此起彼伏，历来是河南革命斗争开展较好的地区之一。1927年前后，党在这里发动的农民武装暴动相继失败后，各县党组织和广大民众并未被国民党的残酷镇压所吓倒，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1932年至1933年秋，在中共河南省委所属豫南特委的领导下，汝南、确山等县纷纷组织夜聚明散的游击武装，掀起轰轰烈烈的抢粮分粮和打“坏货”斗争，狠狠打击了当地反动势力，有力地配合了鄂豫皖苏区的斗争。1934年9月，由于信阳县委书记李剑森被捕叛变，使豫南等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团负责人被捕，党在豫南各县的活动基本停止。11月下旬，中共河南省委为恢复豫南工作，向确山中心县委下发指示信，要求县委立即恢复活动，健全党的领导机构，巩固扩大基层党组织，积极发动和领导开展群众斗争。并要求县委立即建立游击队指挥机关，做好游击队的整顿与扩大工作。同时帮助游击队选择利于生存的游击区域，力争使其向西发展，以便同鄂豫边区的游击队配合行动。但就在这封指示信刚刚下达，河南省委代理书记张国诚和团省工委书记李毓华等先后被捕叛变，致使河南党团组织再次遭受极大摧残。在敌人的疯狂搜捕和镇压下，豫南各县党组织和游击队相继解体，党的工作陷于瘫痪状态。

在豫南革命面临危机的严重关头，原中共河南省委委员王国华偕同段永健于1935年2月从江西中央苏区回到郑州，因省委已不复存在，两人只好分

别返回家乡确山、叶县寻找党的关系。当时国民党在豫南仍到处搜捕共产党人，还在驻马店张贴布告，悬赏捉拿王国华。在这种严峻形势下，王国华毫不顾及个人安危，他日夜不停地奔波于确山、汝南、正阳、信阳等县，秘密联络失散的党员，并很快与刘茂林、王春义、肖章、康春、孔卡子等人接上关系。是年夏，王国华在汝南县薛台村主持召开党员会议，鼓励大家扫除悲观情绪，振作革命精神，恢复整顿党的组织，继续发动群众同反动派作斗争。经过王国华等人的艰苦工作，汝、确、正、信边界地区的党组织得到初步恢复，群众工作也取得了进展。与此同时，段永健、兰德修、李子健等也在叶县建立了中共叶县工委，使党在该县的工作有了一定恢复与发展。

（三）建立中共鄂豫边区省委，红军游击队诞生

1935年5月，王国华在确山县傅楼村遇到了来豫南寻找上级党关系的鄂豫边工委组织部长张旺午。逆境中的相逢使两人倍感亲切，彼此详细通报了各自地区党组织遭受破坏及重新发展等情况，使两地党组织由此建立了联系。7月下旬，王国华赴唐河县毕店乡找到张星江，进一步交流了工作情况。鉴于两地党组织已与中央失去联系，得不到上级指导帮助，而且遭敌人破坏后均感势单力薄，两人都有联合起来的愿望，并初步议论了合并两地党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问题。同年8月间，王国华赴唐河县再次同张星江会面。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适应斗争环境的需要，两人正式商定将鄂豫边、豫南党组织合并，成立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并商定由张星江任省委书记，仝中玉任组织部长，王国华任宣传部长。当时省委下辖的地区包括唐河、桐柏、泌阳、南阳、南召、镇平、邓县、新野、内乡、浙川、方城、遂平、确山、信阳、正阳、汝南、新蔡等县。鄂豫边省委建立后，除了继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之外，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积极筹划游击战争上。省委主要领导以及张旺午、王春义等，多次开会讨论研究游击队的建立问题，分析在桐柏山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还采取分头开展工作的办法，深入唐河、新野、确山、信阳、泌阳等县发动群众，寻找适合于发动游击战争的区域。依靠地下党和群众的帮助，建立了多处游击据点或群众堡垒，从而加快了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建立和发动游击战争的进程。

1935年9月，原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周骏鸣从国民党开封监狱出狱后回到豫南。他向王国华汇报了河南省委遭受破坏和本人被捕的情况，以及国民党利用叛徒组成假省委，妄图彻底破坏党的各级组织的罪恶阴谋。王国华经征求省委同意，将其派往信、确边界地区开辟工作。周骏鸣到达信阳吴家尖山后，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吸收进步青年入党，很快建立了尖山党支部，打开了工作局面。王国华到吴家尖山检查工作时，发现这里的工作已有相当基础，而且该地处在信阳、确山、泌阳、桐柏县边缘，四面环山，地形复杂，敌人统治薄弱，属于朱德总司令所讲的“三不管”地区。鉴于这一地区的有利条件，省委决定集中力量，首先在这里发动游击战争。1935年12月，省委先后在信阳县吴家尖山、小王庄等地召开会议，反复分析鄂豫边区的形势，认为发动武装斗争的时机已完全成熟，遂决定立即筹措枪支，组建红军游击队。同时决定采取武装斗争和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方针，秘密活动，隐蔽发展，运用“滚雪球”的办法，在打击消灭敌人的斗争中逐步开辟鄂豫边游击区。

1936年1月4日夜，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在信阳县吴家尖山北侧的东小石岭村成立。参加游击队成立会议的共有7个人，武器仅有两支长枪和一支短枪。会议决定由省委书记张星江兼任游击队指导员，周骏鸣任队长，王春义任副队长。此时的游击队尽管力量十分弱小，但掀开了边区革命历史的新篇章，标志着鄂豫边区游击战争的开始。

二、鄂像边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一）游击队成立后的形势和斗争策略

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夹缝中诞生的，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极其险恶、复杂的斗争环境。当时，东边沿平汉路的驻马店、确山、明港、信阳等城镇，均驻有国民党正规军；西、北边的南阳、泌阳、方城、叶县等县，驻有国民党第40军。尽管其防范目标主要是针对鄂豫皖边游击区，但随时都会向游击队发动进攻。而且豫南各县城均驻有数百至上千人的保安团（队），各区、乡及联保处亦有人数不等的武装，他们与地方豪绅等封建势力相勾结，到处构筑碉堡、围寨，厉行保甲联防制和户籍连坐法，不断强化反动统治，疯狂地摧残革命力量。再就是由于国民党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造成桐柏山区土匪如麻，仅数百乃至上千人的大股土匪就有数十股。土匪中不乏地痞流氓，然多数为生活所迫、被“逼上梁山”的贫苦农民，他们毫无政治目标，啸聚山林，打家劫舍，既抢掠地主豪绅，与国民党为敌，也骚扰乡里，危害穷苦万姓。因土匪习惯于夜间活动，与昼伏夜出的游击队时常遭遇，对游击队的生存发展无疑也构成了威胁。

针对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省委和游击队领导多次开会研究应敌对策，使游击队积极适应环境变化要求，坚持实行了一系列灵活的斗争策略和游击战术。其基本点是：

第一，在生存中求发展。或称先求生存，再图发展。根据这一策略原则，游击队在活动方式上，坚持昼伏夜出，流动游击，藏身于民，隐蔽发展。在斗争对象上，尽力避免同国民党正规军及保安团（队）作战，而主要打击人民群众最为痛恨的保长、联保主任、土豪劣绅等反动分子；对那些民愤不大的地主豪绅，则坚持实行酌情罚款和教育争取相结合的政策，亦即“打坏货、拉土豪”。这些策略方针实施的结果，不仅使游击队争取了民心，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而且通过“拉土豪”罚款，也使游击队得到了经济上的补充，保证了生存、发展的需要。

第二，“广交朋友，少树敌人”。无论地主豪绅、保甲长或联保主任，甚至民团头目，只要不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游击队均以礼相待，并利用各种机会同其打交道、交“朋友”，争取他们弃恶从善，转变政治态度，站到人民一边。这一策略的施行，使鄂豫边省委和游击队在实践中成功地分化瓦解了国民党基层势力，使得其中的一部分人由敌视共产党和游击队，转变为保持中立或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还有少数保甲长、地主豪绅及民团头目经我方教育争取后，与反动阵营决裂，走上了革命道路。

第三，争取、利用和改造土匪武装。鄂豫边省委和游击队在认真分析土匪队伍状况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对象及游击队自身力量的变化，对土匪武装采取了“拉大股”和“打小股”、争取利用和打击消灭相结合的斗争策略。游击队建队初期力量弱小，难以与大股土匪抗衡，对其主要施以教育争取手段或实行军事上的暂时妥协，而对那些作恶多端的小股惯匪则坚决予以打击，坚持“拉大股，打小股”。随着游击队力量的壮大，对待土匪的斗争策略也随之改变，除发动群众加强自我保护外，无论大小土匪武装，均依其政治态度区别对待，或者教育利用、改造收编，或者打击消灭。在教育 and 争取土匪的斗争中，鄂豫边省委曾派陈香斋、邓一飞、周国林等人深入土匪内部做工作，主要从启发阶级觉悟入手，帮助他们认清地主豪绅、国民党反动派是所有穷苦人的共同敌人，懂得穷人不打穷人，更不能把矛头对准为穷人打

天下的共产党等道理。同时利用土匪的江湖义气，学用他们的黑话暗语对话，或同他们换帖、拜把子等。以加深他们的信任。由于高度重视对土匪的工作，游击队建队不久便与李合、高殿卿、朱六排长等数支大股土匪交上了“朋友”，使这些土匪有的不再到游击区祸害百姓，有的还为游击队提供一些帮助，有效地减轻了来自土匪方面的威胁。与此同时，游击队对那些不听劝告、骚扰群众的小股惯匪坚决予以打击，先后消灭了余老九、高栓柱、小老李、王长腿等 10 多支土匪，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二）游击队初建时期的斗争

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成立当晚，即在小石岭村采取行动，处决了该村作恶多端的反动保长汪心乐，缴步枪一支，为民铲除一害。尔后，张星江、周骏鸣率队连夜转移到桐柏山东麓之天目山区活动。在其后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游击队频繁出没于确、信交界地区，运用夜间突袭、里应外合等战术，“打坏货、拉土豪”，接连袭击了宋冲、何大庙、大桥凹等地的保长和联保主任，狠狠打击了这一带民愤极大的反动势力，在群众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游击队经过多次胜利斗争，至1936年2月底顺利地发展到30多人、10多支枪，并初步开辟了以桐柏山的支脉——天目山为中心的一块游击区。随着队伍的扩大，鄂豫边省委和游击队领导针对游击队员多为当地农民出身、不可避免地带有散漫保守等不良习气的实际，开始重视从各个方面加强部队的自身建设。为贯彻党指挥枪的原则，游击队根据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原则，建立了队党支部，由省委书记张星江兼任支部书记；同时建立了由牛德胜任主席的游击队战士委员会，在实行民主建军、民主管理和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方面迈出了第一步。游击队除加强军事技术的教育训练，提高队员的军事素质外，还坚持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管理教育部队。为应付残酷复杂的斗争环境，游击队特别作出决定，吸收队员必须经地下党组织介绍，并严格进行审查，凡有劣迹或政治历史不清的均不收留，以保证游击队组织上的纯洁。这些措施、办法的贯彻实施和逐步推行，大大提高了游击队的战斗力和适应艰苦斗争环境的能力，为促成这支土生土长的农民武装向着正规红军部队的转变，奠定了良好基础。1936年3月初，游击队为开辟新的游击区，决定暂时离开天目山游击根据地，转移到确山县北部的乐山一带活动。乐山属伏牛山东麓延伸之山脉，山高林密，临近平汉铁路。6日傍晚，游击队经长途跋涉，到达乐山脚下的杜庄村宿营。但其行踪被到该地追剿土匪的国民党遂平县保安队发觉。是日深夜，保安队分数路悄悄包围了杜庄。由于敌人来得突然，在村外担任警戒的哨兵康春于慌乱中忘记鸣枪报警，致使游击队发现敌情后已难以集合队伍，被迫分散突围。混战中，张星江、周骏鸣及多数队员利用夜幕掩护安全脱险，并击毙了敌保安队长桑体振。但副队长王春义及炊事班却被敌人堵在了屋内。在经过顽强抵抗之后，因子弹打完，王春义和一名队员壮烈牺牲，司务长张旺午等7人被捕（后张旺午等2人被押入开封监狱，于抗战爆发后获释；另5名队员被捕不久均遭敌人杀害）。凶狠的敌人还割下王春义等人的头颅，悬挂在确山城门楼上示众，其残状目不忍睹。当夜，游击队为避免再遭受损失，即速向天目山区撤退。次日，游击队撤至确山县南部瓦岗一带山区后，队党支部在这里召开了党员骨干会议，认真总结失利的教训。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杜庄遭受袭击的主要原因是，游击队远离根据地，地形不熟，敌情不明，失去了党和群众的掩护。再就是执勤哨兵严重失职，负有重大责任。随后，根据队领导的提议，战士委员会召集全体队员开会，研究对哨兵康春的处分。鉴于当时斗争环境恶劣，为使游击队能保持铁的纪律，队领导尊重多数同志意见，忍痛下令将入党多年的康春处以极刑。这件事使全体队员受到极大震动和教育，组织纪律观念得到明显增强。在以后的斗争中，无论环境多么险恶复杂，游击队再没有发生过此类事件。

在游击队遭受挫折的严重关头，鄂豫边区党及时给予了深切关怀和有力

支援。省委宣传部长王国华和一些党员、群众纷纷赶到部队驻地进行慰问，鼓励大家树立战胜挫折和困难的勇气。为加强游击队的领导，省委及时抽调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泌阳县委委员陈香斋任游击队副队长。一些县区党组织也按照省委的通知，积极动员进步青年参军，为游击队输送新鲜血液。一个多月时间里，游击队又恢复发展到 30 多人，部队情绪也日渐高涨起来。

（三）平氏夺枪

1936年3月下旬，鄂豫边省委为扩大武装力量 and 解决游击队的枪支短缺问题，动员边区数县党员群众与游击队联合行动，在桐柏县平氏镇发动了一场计划周密的夺枪斗争。

平氏镇位于桐柏县城西北约30公里处。镇子四周为开阔地，镇西南不远处有一座平地拔起的山丘，名曰孤峰山。山上古柏参天，庙宇矗立，蔚为壮观。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至初五，这里照例举办三天传统庙会。庙会期间，方圆百里的香客以及赶会的、看戏的、做生意的蜂拥而至。当地一些土豪劣绅、达官显贵也骑马坐轿，带着保镖到会上逞威风，借机敲诈勒索。因这一带常闹土匪，镇上驻有两个连的民团负责维持庙会秩序，实则是为维护地主豪绅等的利益不受侵犯。由于庙会庞大杂乱，人山人海，利于隐蔽作战，张星江等认为这是“混水摸鱼”、夺取敌人枪支的极好时机。在对庙会情况进行认真考察之后，省委决定发动唐河、桐柏、确山、泌阳4县的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配合游击队开展庙会夺枪斗争。为保证这次战斗的胜利，省委制订了周密的行动方案，并进行了认真充分的准备。

3月27日（农历三月初五）上午，按照预定方案，游击队短枪队员和百名党员群众分别扮作香客或赶会的，在张星江、周骏鸣和王国华的带领陆续进入孤峰山庙会会场。副队长陈香斋则带游击队长枪队员隐蔽在孤峰山南侧的苗化村担任接应掩护。夺枪群众进入庙会，每人买了一根木棍作武器，与游击队员混在人群中，暗暗寻找各自的打击目标。下午4时许，张星江、周骏鸣选准夺枪时机，即鸣枪为号，指挥游击队员和群众统一行动，突然袭击带枪逛会的土豪劣绅、狗腿子及民团团丁。顿时，会场上棍棒飞舞，枪声骤响，陷入一片混乱。负责“镇会”的民团团丁无力控制局面，只是不断地对空鸣枪告警。经过短暂战斗之后，游击队共夺得长短枪9支及部分银元布匹，群众亦夺得部分枪支物资，一并随着混乱的人群迅速撤出会场。尔后，游击队与负责接应的长枪班会合，顺利地摆脱了平氏镇民团的追击，沿着崎岖不平的丘陵地，连夜向东北方向转移。这次平氏夺枪的胜利，对扩大游击队的声威，鼓舞桐柏山区人民的斗志，产生了十分积极、深远的影响。

次日中午时分，游击队于转移途中在桐柏县安棚东南的牛庄村宿营时，不幸与追剿土匪的国民党保安团并一个营的国民党正规军遭遇。游击队边阻击边撤出牛庄向东转移，国民党军则在其后紧追不舍。当游击队撤至桐柏县姬岭寨的马道岭后，又遭增援之敌拦截。在此危急关头，张星江果断决定让陈香斋率队突围，由他和周骏鸣等5人殿后掩护。战斗至黄昏时分，游击队在陈香斋的带领下突出敌人重围，爬上了附近的大山。但负责掩护的张星江、周骏鸣等人仍未摆脱敌人。战斗中，张星江的腿部、头部先后中弹，不幸壮烈捐躯，年仅31岁。周骏鸣的左腿亦负了伤，后冲出敌人包围与游击队会合。夜幕降临，等候在山头上的战士们听到张星江牺牲的噩耗后无不痛哭失声，陷入了极度的悲痛和深深的哀思之中。张星江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战士，是鄂豫边区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卓越领导人，他的牺牲，是鄂豫边区党的重大损失。

张星江牺牲及周骏鸣离队养伤后，对部队的情绪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游击队转移到确山县高庄一带休整期间，王国华、仝中玉在泌阳县张楼村找到养伤的周骏鸣，召开了一次省委会议。会议决定由仝中玉任省委书记，王国华任组织部长，周骏鸣负责宣传工作。游击队工作由副队长陈香斋主持。会

后，全中玉即赶赴游击队做稳定部队情绪工作。4月22日，全中玉、陈香斋率游击队智取泌阳县出山王地主围寨，抓获5名土豪，缴枪数支，鼓舞了部队的士气。不久，陈香斋因患腿病离队赴驻马店治疗，游击队工作暂由邓一飞负责。

（四）反“清剿”斗争的胜利

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在桐柏山区卓有成效的斗争，引起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的不安和仇视。1936年5月，国民党豫南“剿共”指挥部发布《豫南清乡计划》，调整驻豫南的国民党正规军4个营及省保安第10团两个大队，向鄂豫边游击区展开了疯狂“清剿”。敌军进驻临近交通要道的集镇村庄，采用“篦子”战术，分进合击，日夜“搜剿”，并令各县保甲、民团严密配合，致使游击队处境十分险恶。在此情况下，省委通知周骏鸣返队主持工作。周骏鸣腿伤尚未痊愈即赶回部队，经过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他向省委提出建议：为避敌锋芒，保存实力，游击队可暂时“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活动，待敌人主力撤走后再“集零为整”，将游击队集中起来活动。省委同意了他的意见，遂决定将20名队员分为3个小队，由全中玉、周骏鸣、邓一飞各带一队，分别向泌阳、确山、信阳县境内转移。

全中玉带8名队员坚持在泌阳县东部山区活动。因该地属于敌人“清剿”的重点，游击队难以隐蔽，随时面临着被敌人吃掉的危险。为此全中玉决定带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外线活动。在征求王国华意见后，全中玉即带3名队员向敌情较为缓和的唐河县转移，留下5名队员暂时分散隐蔽。全中玉带队先在唐河县活动了一段时间，然后转移到了新野县。每到一地，游击队都得到地下党和群众的掩护支持，有的主动介绍敌情，提供情报，有的积极参加游击队的战斗行动。在党和群众的有力配合下，游击队频繁打击敌人，先后袭击了唐河县孙庄地主围寨、古城联保处和新野县沙堰镇区公所。在短短两三个月中，游击队共袭击敌人10多次，缴获长短枪9支，有力打击了当地的反动分子，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邓一飞带领6名队员到达信阳县吴家尖山地区后，因缺乏游击战经验，人地生疏，又时值春夏青黄不接，粮钱难筹，队员不堪忍受饥饿，相继离队走散。邓一飞被迫只身到确山县，参加了周骏鸣小队的活动。

周骏鸣带6名队员转移到确山县石滚河一带后，利用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顺利地打了两个“坏货”，首先解决了部队给养问题。不久，确山县进步青年崔振刚策动驻县城的国民党新编第5师一个班起义，并带领他们参加了游击队。这期间，中共叶县工委书记段永隆、宣传部长李子健等人经与王国华联系，离开叶县到鄂豫边区工作，也加入了游击队。1936年6月，经王国华等的努力，成立中共确山县委，由段永隆任书记。随后，县委接连建立了石滚河、孤山冲区委。县区党组织建立后，深入发动群众，积极配合游击队开展斗争，使周骏鸣这一小队很快发展到20多人。其后，因国民党河南省保安第12团进驻确山县“清剿”，游击队在陈冲与敌发生遭遇战，牺牲了2名战士，另有3人负伤。确山县委也随之遭敌破坏。游击队被迫转移至确、泌、桐交界地区活动。

1936年8月，敌“清剿”红军游击队的计划破产，主要兵力陆续撤离游击区。王国华、周骏鸣根据这一形势变化，决定将游击队“集零为整”活动，以集中力量打击分散薄弱之敌，并带队重返确、泌边游击区。全中玉接到王国华关于集中游击队的信件后，与牛德胜等由唐河赶回泌阳与周骏鸣部会

合。8月23日，应群众的要求，游击队夜袭泌阳县八门庄地主围寨，毙敌7名，缴获长短枪4支，取得了集中后的首战胜利。至此，游击队由“化整为零”时的23人增加到30多人，长短枪增至30余支。不仅赢得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而且获得了发展。

游击队“集零为整”以后，王国华、周骏鸣等抓紧敌情暂时缓和的有利时机，于9月30日在确山县黄路沟召开会议，总结部署工作。会议针对过去一度出现单纯依靠游击队打仗，对组织和武装群众有所忽视等问题，作出了整顿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斗争和进一步扩大游击队等决定。同时商议对省委领导进行改选，拟由王国华接替仝中玉任省委书记，周骏鸣任组织部长，邓一飞任宣传部长。会后，周骏鸣、邓一飞率游击队深入各村寨，边打“坏货”边宣传发动群众。王国华等分赴各县检查工作，整顿恢复县、区党组织，动员党员、青年参军。至此，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度过了最艰苦时期，迎来了不断发展壮大的新阶段。

三、在曲折斗争中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一）北方局指示与玉和寨会议

1936年10月，李子健受省委委派在确山县做群众工作期间，从地下党那里意外得知，原中共确山县委书记徐子荣经党营救由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后，现正在家乡确山县傅楼村探亲。李子健即找到傅楼村与徐子荣见了面，并向其介绍了鄂豫边区党的情况及与中央失去联系的困境。应李子健的请求，徐子荣答应为边区党与上级建立联系提供帮助。随后李子健向省委作了汇报。鄂豫边区党此时已与中央失去联系达两年之久，由于处在国民党四面封锁的边远山区，对全国的时局变化、特别是对中央的策略方针全然不知或基本不了解，所以省委十分重视这一情况，经认真研究，决定派李子健赴北平寻找上级党。

李子健带着徐子荣的介绍信，在北平顺利地与中共北方局的代表刘子久等接上关系，并向其详细汇报了鄂豫边区党和红军游击队的斗争情况。北方局对鄂豫边区的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边区省委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仍能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其精神是可贵的。而且坚持从实际出发，制订了诸如“广交朋友、少树敌人”等正确的斗争方针，基本符合中央的政策精神。同时还向李子健介绍了当前党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鄂豫边省委和红军游击队实施工作重心转移指明了方向。在北平期间，李子健曾撰写了一篇《豫鄂边区红军游击队的发展》的短文，发表在北方局的内部刊物《火线》杂志上。从北方局转回时，他带回了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及有关文件刊物。

鄂豫边省委和游击队对李子健与北方局接上关系并得到党的指示的消息兴奋不已，大家都有一种失散多年的孩子突然回到母亲怀抱的感觉，无不沉浸在幸福与激动之中。随后，省委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了“八一宣言”和北方局的指示，使大家了解了全国抗战形势和中央的基本策略方针，思想豁然开朗。但也有部分同志对同国民党讲统一战线存有疑虑或不甚理解，因为在当时的鄂豫边区，国民党不仅不承认共产党和游击队，而且正处心积虑地加以消灭。12月上旬，鄂豫边省委为能正确领会、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再次派李子健赴北方局汇报工作和接受指示。李在天津宁园受到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接见，并简要汇报了游击队的情况以及白区工作不好开展、存在关门主义倾向等问题。刘少奇在充分肯定鄂豫边区工作的同时，指示边区省委要适应全国的抗战形势，特别要注意防止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两种倾向，广泛发动民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为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刘少奇十分关心鄂豫边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及省委、游击队领导的学习，李子健离开时，还特意让其带回了一部留声机和3支“派克”金笔。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和北方局指示精神，促进边区抗战形势的发展，1936年12月上旬，鄂豫边省委在泌阳县玉和寨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中玉、王国华、周骏鸣和邓一飞等。会议期间，李子健由天津返回，向会议汇报了受到刘少奇接见等情况。会议在认真学习讨论中央、北方局及刘少奇指示精神的基础上，决定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为指导，全面加强边区党的建设和游击根据地建设。同时正式对省委进行了改选，由王国华任书记，周骏鸣任组织部长，邓一飞任宣传部长。全中玉改任游击队指导员，陈香斋任队长，李子健任游击队秘书。

玉和寨会议之后，鄂豫边省委和游击队全力投入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工作。省委接连重建了唐河、泌阳县委及新野中心区委，在游击区建立了榨楼、邓庄铺、王店等区委，并积极吸收进步群众入党，使边区党的工作呈现出日益活跃的新局面。经省委和各县区党组织的努力，确山、泌阳、桐柏交界地区纷纷建立农民抗日自卫会、自卫队及农民联庄社，其中以确、泌交界地区最为普遍，达数十个村庄。这些群众武装组织均制订有行为规章，担负着防匪自卫，掩护支援游击队，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类似于党领导下的基层苏维埃政权，为巩固加强游击根据地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期间，省委还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与瓦岗、冷水铺、邓庄铺等地的开明士绅及小陈庄民团中队长陈子爵建立了统战关系，并以陈子爵的名义在泌阳县王庄、罗沙坡开办“枪铺”，为游击队修造枪械。省委还分别向国民党叶县民团司令崔冠卿、西华县绅士胡晓初写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争取他们共同抗日。与此同时，仝中玉、陈香斋率游击队在泌阳县东部的邓庄铺以北地区，发动群众建立了3处农民抗日自卫队。尔后转入确山县活动，利用春节年关敌人疏于防范的机会，连破张楼等3个地主土围子，共缴枪10余支，筹款4000多元，进一步鼓舞了士气民心，为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这期间，确山、泌阳、唐河、新野、桐柏、信阳、叶县等县区党组织为游击队输送了诸如冯景禹、文敏生、张文歧等一大批党员骨干和进步青年。原宛属工委组织部长张明河接到王国华信件后，经请示北方局同意，也带领数名同志参加了游击队。1937年初，游击队迅速发展到了130人左右，扩建为鄂豫边红军游击大队，下辖3个长枪队、一个手枪队和一个少年先锋队。游击区以确、泌、信、桐4县交界处为中心，纵横五六十公里。

（二）开展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与暂时困难局面的出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局面初步形成的形势下，中共北方局于1937年3月给鄂豫边省委和游击队下发了一封指示信，要求停止执行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停止打土豪和向国民党政权进攻；游击队可通过和平谈判改编为合法的地方民团，也可就地解散。北方局的指示在省委和游击队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和争论，多数同志认为这一指示难以在鄂豫边区执行。不久北方局又下发指示信，要求省委不要解散游击队，并要求派两人到北方局汇报工作。为此省委派周骏鸣、邓一飞去了北平。在向北方局汇报工作后，邓一飞返回边区，周骏鸣则转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解决鄂豫边区工作方针与政策的转变问题。

国民党中央政府在“西安事变”后虽然表面上接受了我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实际上并未真正贯彻落实，而是继续顽固推行“北和南剿”的方针，加紧调兵遣将，“围剿”我南方各游击根据地。1937年5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全面“进剿”鄂豫皖、鄂豫边游击区。其东北军第129师受命进驻泌阳后，将所辖王理环团部署在王店、高邑、马谷田一带，对省委和游击队构成了较大威胁。面对国民党的重兵“清剿”，鄂豫边省委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特别是第129师的情况，认为该师曾参加“西安事变”，受共产党影响较深，且因家乡东北沦陷，多数官兵怀有较强的抗日情绪，即决定主动对其开展统战工作。省委先后派上中玉、李子健同王理环团的代表田作舟谈判，经多次磋商，双方达成如下秘密协议：1.东北军应向红军提供军事情报，对付国民党及地方顽固势力的进攻。2.双方任何一方受到袭击，对方有协助反击的义务。3.必要时东北军应支援红军枪支弹药。4.东北军不侵犯游击区群众利益，并有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之义务。5.红军方面不封山，保证山货、柴草、粮、菜、肉、蛋等在城镇上公买公卖，以解决东北军给养问题。秘密协议签订后，游击区的紧张局势遂告缓和。但这一情况很快被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得知，刘电令129师立即向红军进攻，“违者撤职，严惩不贷”。王理环团长曾派人向游击队报告了刘峙电报一事。但在省委机关尚未安全转移的情况下，该团三营反动营长吕伟绩突然带人袭击了省委机关及设在管驿村的文印室，逮捕了省委宣传部长邓一飞及多名党员和进步群众，使该地区的形势骤然发生剧变。为避免再遭受损失，王国华带领游击队转移到湖北应山、随县一带活动。不久，129师撤离泌阳，游击队重返确、泌边游击区。这期间，游击队由于执行北方局的指示，停止了“打坏货、拉土豪”，致使经济来源断绝，思想极度混乱，还接连发生了两次队员逃跑事件，为此，游击队被迫精简人员。6月11日，在追击邓庄铺联保主任王廷杰的战斗中，队长陈香斋不幸牺牲，游击队的处境更加困难。7月初，游击队锐减至59人，干部战士思想茫然，士气异常低落。

（三）中共中央对鄂豫边的指示和碾盘沟会议

正当鄂豫边省委和游击队几乎陷于绝境时，周骏鸣带着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到了边区。他于1937年4月随同北方局联络员到达延安后，向中央组织部及负责筹建河南省委的朱理治汇报了鄂豫边区和红军游击队的情况。之后参加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并听取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报告。中央十分重视鄂豫边区的工作，针对国民党不承认游击队，而且加紧“清剿”的实际，朱德总司令明确指示周骏鸣，要猛烈地扩大游击队，待扩大到国民党消灭不了时，他们就会主动同你们谈判的。毛泽东主席还亲自审批了朱理治拟订的关于发展鄂豫边区的工作方针，即在消灭和争取当地土匪的斗争中，大力扩充游击队，并注意和当地开明士绅及政府建立统战关系，以便争取合法存在，作为将来的抗日武装。为加强鄂豫边区的领导力量，中央和北方局分别派胡龙奎和刘子厚到鄂豫边区工作。

1937年7月中旬，周骏鸣偕同胡龙奎回到鄂豫边区后，为尽快扭转被动局面，边区省委在泌阳县碾盘沟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在听取周骏鸣、胡龙奎传达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指示精神的基础上，结合鄂豫边区的实际，作出了大力扩充游击队，恢复整顿党的各项工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决议。同时决定调整边区省委和游击队的领导，由仝中玉任省委书记，胡龙奎任组织部长，刘子厚任统战部长，周骏鸣、王国华分别担任游击队队长和指导员。碾盘沟会议是鄂豫边游击战争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她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游击队，端正了党在这一地区的斗争方向，为该地区的发展和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保证。会后，随着会议精神的逐步贯彻落实，边区各县党组织和农民自卫武装经过整顿普遍恢复活动，并不断得到发展。尤其是通过大力加强抗日宣传工作，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日益深入人心，已经或正在转化为每个党员干部和爱国志士的具体行动。在各级党组织的积极动员下，一批进步青年参加了游击队，原被遣散的一些游击队员也主动归队，重新回到革命的怀抱，使游击队迅速恢复到100多人。

（四）红 28 军对鄂豫边的两次支援

在鄂豫边区形势开始出现转机的重要时刻，游击队得到了鄂豫皖边区红 28 军的有力支援。1937 年 7 月下旬，红 28 军第 244 团第 1 营在营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的带领下，越过平汉路抵达桐柏山区。数日后，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在桐柏县老虎爬村与 1 营会合。为了帮助游击队扫除发展的障碍，1 营决定与游击队联合作战，拔除信阳县西北最反动的地主土围子蔡冲。7 月 24 日，游击队和 1 营经长途冒雨行军接近蔡冲外围。按照预定战斗方案，游击队化装成“土匪”，先行抵近蔡冲喊话，以武力要挟大土豪蔡守恭捐献枪支、钱粮。1 营当时身着国民党军服，则冒充国民党军紧随游击队之后佯装剿匪，诱使蔡冲守敌开门迎接。1 营和游击队乘机冲入寨内，一举攻克了蔡冲，共缴枪 20 多支，子弹 5000 多发，还有大批的钱粮和衣物。其中粮食、衣物分发给当地群众，枪支弹药全部装备了游击队。

9 月中旬，鄂东北道委书记胡继亭、红 28 军第 244 团副团长林维先根据军政委高敬亭的指示，率军部特务营和手枪团 2 分队，来鄂豫边区传达红 28 军已同国民党达成停战协议等情况，并带给鄂豫边红军游击队部分活动经费。红 28 军部队在信阳县吴家尖山地区与游击队汇合后，应队长周骏鸣的要求，决定长途奔袭泌阳县，拔除邓庄铺、马谷田等反动据点。9 月 17 日上午，身着国民党军服的红 28 军部队抵达邓庄铺南门，声称是东北军某部路过此地，要求门卫通知联保主任王廷杰出寨迎接。然后乘机尾随门卫进入寨内，以快速动作解除了守寨保丁的武装，并逮捕了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反动联保主任王廷杰，将其押赴王楼村附近处死。接着，红 28 军部队和游击队乘胜出击，又连克马谷田、高邑等反动据点。尔后，红 28 军部队在确、泌边界驻扎了半个多月，掩护、支持游击队的斗争。红 28 军部队的两次支援，极大地震慑了当地反动势力，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为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和开创边区团结抗战的新局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五）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成立，鄂豫边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为了巩固发展鄂豫边区的形势和促进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7年9月下旬，鄂豫边省委和游击队领导在泌阳县召开会议，决定将游击队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制作一面团旗，公开打出抗日旗帜开展活动。并作出了加强抗日宣传、扩大群众抗日武装、争取瓦解土匪队伍，以及进一步号召广大青年参军等项决定。会后游击队在邓庄铺进行了改编，由周骏鸣任团长，王国华任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冯景禹任副团长，文敏生任政治处副主任。独立团下辖两个营和一个手枪队、一个少年先锋队。为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团政治处下设组织科、宣传科和民运科。各连队还建立了俱乐部，具体组织部队的政治、文化学习。独立团团部与省委机关一并设在泌阳县邓庄铺、焦竹园，使这一地区成为领导边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和后方。为便利开展斗争，独立团成立不久即兵分两路，在周骏鸣、王国华的带领下边宣传武装群众，边清除顽固势力，并连克信阳县大梨园，泌阳县王店、贾楼等反动地主围寨，使纵横五六十公里的游击区连成一片。

以独立团成立为标志，鄂豫边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呈迅猛发展之势。在边区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在抗日形势的感召下，泌阳、确山、桐柏、信阳、新野、唐河等县的抗日自卫会、自卫队组织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边区各县的抗日救亡组织如抗敌后援会、青年救国会等，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一些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民团及游击区内的多数联保主任、保长顺应抗战形势要求，纷纷向我党靠拢，积极与省委和独立团建立统战关系。与此同时，边区各县党组织掀起动员青壮年参加独立团的热潮。有数支土匪武装在地下党的争取下接受了独立团改编。中共河南省委亦陆续选送了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到鄂豫边区工作，使独立团迅速发展成为一支600余人的抗日武装。尤其是各地青年学生到达邓庄铺、焦竹园后，朝气蓬勃，斗志旺盛，充分发挥特长，组织编印宣传材料和识字课本，开办妇女、儿童识字班，帮助群众学习文化。还在机关、部队和群众中教唱抗日歌曲，举办晚会，演活报剧，揭露日军的暴行，《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犹如战斗号角响彻桐柏山区，激励、鼓舞着边区人民用高昂的抗日救国热忱，去迎接团结抗战新局面的到来。

四、鄂豫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独立团胜利实现和谈与改编

（一）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斗争

全国抗战爆发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协议的达成，使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在新的形势推动下，国民党河南省地方政府开始寻求与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举行“和谈”，预谋削弱乃至消灭独立团。由于他们对谈判毫无诚意，并另有他图，使整个谈判过程充满着尖锐、复杂的斗争。

1937年10月间，国民党河南省第9行政区公署专员武旭如在确山、信阳、桐柏、泌阳、罗山县县长的陪同下，到信阳县邢集寻找独立团谈判，同时秘密将上述5个县的保安团和一个国民党正规团部署在邢集附近，欲借谈判之机对独立团实行“会剿”。鄂豫边省委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根据中央有关谈判注意事项的指示，决定独立团主要领导暂不出面，由团政治处副主任文敏生作为谈判代表，并迅速将独立团调离信阳地区。还要求把谈判地点改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吴家尖山。在文敏生赴吴家尖山谈判期间，武旭如等发现独立团去向不明，而且又是初次与独立团代表接触，未敢轻举妄动。第一次谈判遂告收场。

11月下旬，武旭如带原班人马气势汹汹地来到确山县竹沟镇，再次要求与独立团会谈，并提出要亲自与周骏鸣团长谈判。企图利用谈判扣留周骏鸣，迫使独立团缴械投降。为防止敌人故伎重演，边区省委和独立团决定派独立团1营政委张明河作为代表到竹沟谈判。武旭如见无法诱使周骏鸣出面，便大施淫威，扬言要在3日之内消灭独立团。张明河针锋相对，当场揭穿吴旭如假和谈真反共的阴谋。武旭如无奈，只好提出独立团今后只准在泌阳县邓庄铺、信阳县吴家尖山一带驻扎。其它问题独立团可与确山、泌阳县县长具体洽谈。尔后即离开了竹沟。次日，张明河到确山县城与确山县县长全子杰等继续谈判，因双方意见存在严重分歧，谈判未果。事隔不久，省委派统战部长刘子厚作为独立团谈判代表，在信阳县芦庄与确山、信阳、罗山等县县长举行了第三次谈判。经刘子厚据理力争，双方达成如下协议：部队改编问题由独立团同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谈判解决；在同省政府谈判期间，独立团应暂驻泌阳县邓庄铺、信阳县吴家尖山一带；国民党军队不再向独立团进攻；独立团给养由信阳、罗山、确山、泌阳、桐柏等县政府负责供应。按照该协议，谈判后除确山、泌阳县政府送给独立团少量经费和粮食外，其他各县均未付诸实施。

为争取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和促进边区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1937年12月初，鄂豫边省委在邓庄铺召开会议，重点研究了同国民党的谈判问题，决定派刘子厚为代表，并由张明河陪同，赴开封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谈判。会议根据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拟定了独立团听编不听调，干部自配，以及国民党方面必须保证供应独立团给养等谈判条件。刘子厚、张明河达到开封后，以共产党谈判代表的身份公开露面，陆续接触了一些社会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期间张明河曾在街上遇到已叛变投敌的原鄂豫边临时省委组织部长郝久亭，并从他那里得知武汉设有八路军办事处等情况。经与刘子厚商量，张明河即返回鄂豫边区向省委汇报。省委很重视这一情况，决定派张明河等两人到武汉汇报请示工作，并要求他们先绕道鄂豫皖边区，通知到那里领取服装的省委组织部长胡龙奎尽快带部队返回。刘子厚则在开封继续为谈判斡旋。他先通过关系会见了国民党第1战区抗日预备军总司令张钫，尔后经张钫引见会晤了刘峙。刘峙得知刘子厚来意后，表示同意谈判，并将

谈判事宜交由张钫代理。张钫原为国民党第 20 路军总指挥，因该部在江西、鄂豫皖苏区“围剿”红军时大部被歼，余部亦被蒋介石嫡系部队吞并，其时正想收编队伍，扩充实力。在刘子厚申明我方谈判条件时，张钫尽管心存顾虑，但还是基本上接受了。为表示诚意，张钫答应拨给独立团 1000 套军装和 3000 元钱。谈判结束后，张钫调专列把钱和服装运到了确山县，同时还派他的部下孟参议随车到鄂豫边区点验部队。鄂豫边省委和独立团在邓庄铺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接受孟参议的视察，同时庆贺停战谈判顺利达成协议。

（二）粉碎国民党顽固势力的进攻

在鄂豫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渐形成的局面下，一些国民党反动势力置团结抗战大局于不顾，继续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其中竹沟镇联保处主任徐景贤猖狂之极，扬言要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仍不断派打手骚扰群众，拦路截杀无辜，偷袭我地下人员。为此，省委和独立团决定拔除这颗钉子，给予国民党顽固派以有力回击。鉴于竹沟镇寨墙坚固，内设4座炮楼并拥有七八十人枪的反动武装，易守难攻，独立团决定派周庆鸣潜入竹沟，发动该镇群众举行暴动，从内部攻破这个堡垒。周庆鸣受命潜入竹沟后，秘密串联了10多名青年作骨干，很快将暴动队伍组织起来。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争取了徐景贤和另一保长两人的护兵。独立团还派王勋到竹沟镇北狮子口尖山一带，依靠地下党建立了一支30多人的农民自卫队，从外围配合、策应竹沟暴动。11月29日，正值竹沟逢集，大街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常，一些保丁倒背着枪在人群中转悠。上午8点多钟暴动战斗打响，周庆鸣带领暴动队员迅速控制了竹沟东门楼，凭借有利地形向敌人射击，当场打死一名保长和数名保丁。枪声引起竹沟镇大街小巷一片混乱。保丁们不明何故，纷纷夺路向寨外仓皇逃命。经过数小时战斗，暴动队伍击毙徐景贤及多名保丁，顺利地占领了竹沟镇。次日为扩大战果，周庆鸣让张运才等人留守竹沟，自己则带暴动队伍直扑徐景贤的老巢大罗庄。但当周庆鸣率队返回时，内奸张运才勾结当地土匪头子王占奎抢占了竹沟，经多次交涉，王占奎拒不撤出。省委得知这一情况后，即派宣传部长邓一飞及周凤泉到竹沟谈判。王占奎非但拒绝谈判，还残酷地将邓一飞、周凤泉杀害，焚尸灭迹。后王占奎因惧怕我独立团将其歼灭，在逃跑之前带土匪外出抢劫时，被马卜寨农民抗日自卫队击毙，余匪则四散溃逃。从此，竹沟镇回到了人民手中。

1937年12月中旬，中共河南省委派组织部长林恺到鄂豫边区检查指导工作，同时传达中央关于将鄂豫边省委改为鄂豫边特委的决定。在林恺主持下，省委在泌阳县邓庄铺召开扩大会议，具体研究了改组事宜。会议决定由仝中玉任鄂豫边特委书记，周骏鸣任军事部长，王国华任组织部长，李子健任宣传部长，刘子厚任统战部长。林恺还传达了河南省委的指示精神，要求特委在发动与武装民众的同时，工作重心应放在大力扩充党的组织，特别是加强军队和农村党组织建设上。并要在舞阳、驻马店、汝南等地建立党的中心县委机关，加强对游击区以外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然而就在会议结束不久，泌阳县顽固势力头子王友梅与宛（南阳）西民团司令别廷芳相勾结，纠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欲对我特委和独立团驻地邓庄铺、焦竹园发起了突然袭击。当时，独立团主力正在信阳、桐柏等地剿匪、扩军，留守邓、焦的仅有副团长冯景禹及独立团新编第6连和少年先锋队。留守部队幸而察觉了敌人的阴谋，事前对防范工作作了部署，同时派人通知王国华、周骏鸣速带主力部队返回。

1938年1月8日中午时分，敌人兵分数路，向邓庄铺、焦竹园包抄而来。冯景禹副团长指挥第6连战士在台山一线顽强阻击敌人，掩护特委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到邓庄铺、焦竹园以东山丘地带，然后退守焦竹园。敌人占领邓庄铺后，遂集中兵力向焦竹园进攻。留守部队在当地农民抗日自卫队及群众配合下，多次打退敌人进攻，战斗至天黑时方主动撤离。次日，王国华率部分主力回师焦竹园，积极动员附近一带的农民抗日自卫队参加战斗，待机歼

敌。第3日，独立团佯装撤退，诱使敌人兵分两路，沿东、北两个方向追击。待敌人进至设伏地后，独立团与农民抗日自卫队占据有利地形联合夹击敌人，迫敌退回邓庄铺。第4日，周骏鸣团长率主力部队赶回，汇合全团人马和农民抗日自卫队，将抢占邓庄铺之敌团团包围。为了团结抗日之大局，我军并未马上向敌人发起进攻，而是开展政治喊话，对其晓以一致抗日、共赴国难的道理，同时主动放开了一条生路。傍晚时分，敌人狼狈逃回泌阳县城。邓、焦保卫战是鄂豫边三年游击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又是一次抗日武装力量的大检阅。她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势力，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有力地加速了鄂豫边区抗战形势的发展。

（三）改编整训，东进抗日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2月28日，中共长江局在武汉召开会议，具体研究各地区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张明河、胡龙奎代表鄂豫边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张明河汇报了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情况。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听取汇报后代表中央宣布，江北鄂豫皖、鄂豫边两支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由高敬亭任支队司令员。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编为该支队第8团队。1938年1月11日，张明河携同长江局派往8团队的10多名红军营团干部返回边区，向特委和独立团汇报了长江局会议精神及独立团的改编问题。根据张明河等的汇报，长江局拟发了《中共长江局对鄂豫皖、鄂豫边、湘鄂赣三区目前党的工作决议草案》和《长江局对鄂豫边工作决议》，对鄂豫边区的工作方针、任务及独立团的改编问题，均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1月14日，长江局进一步对鄂豫边区工作作出决议，指示河南省委要以鄂豫边区为中心工作区，并力争向平汉路和鄂北地区发展；加紧发展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抗日；利用与张钊已有之关系，积极对付反动势力的进攻；同时开办教导队，培训抗日骨干。并指示鄂豫边特委具体负责第8团队的巩固与扩大工作，使其迅速完成开赴抗日前线之准备。1938年1月中旬，鄂豫边区特委遵照长江局和周副主席的指示，在确山县竹沟镇宣布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队，团长周骏鸣，政治委员胡龙奎（后为王盛荣、林恺），参谋长朱茂绪（后赵启民），政治处主任谢有才（后徐光华）。团以下编两个大队（后称营）和一个特务连。2月10日，8团队获悉吴稍股匪千余人流窜至确山县烧杀抢掠、滋扰百姓，即在农民抗日自卫队的配合下发起剿匪战斗，将该土匪包围在竹沟镇西南之新庄、冷水铺一带。经围追堵截，吴稍股匪被彻底击溃。独立团除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马匹外，还解救出遭土匪绑架的300名“肉票”。此战的胜利对其他股匪起到震慑作用，有的闻风远逃，有的主动交械投诚，使游击区的匪患基本上被肃清。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和适应对日作战需要，8团队开赴信阳县邢集整训。

中共中央、长江局及河南省委十分重视中原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陆续派遣和动员了大批党员骨干、进步青年和爱国学生来到鄂豫边区。1938年2月，党中央又派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以及张震等数十名军政干部来到竹沟，有力地加强了对该地区抗日活动的领导和8团队的整训工作。2月下旬，经地方党的教育争取，安可祥、段永祥率土匪部队两个团共千余人开到邓庄铺一带待命接受8团队改编。因部分土匪恶性难改，不时发生骚扰百姓事件，彭雪枫、张震、王国华、周骏鸣等人经周密策划，决定将安、段两团分别调至竹沟、邢集两地进行彻底整编。此后整个整编工作进展顺利，部分惯匪被遣散，另挑选出二三百人编入第8团队序列。至此，全团扩大到3个营10个连，共约1300余人。

1938年3月15日，周恩来副主席派罗炳辉由武汉赶赴邢集，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要求新四军第4支队集结皖东，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命令。3月29日，第8团队在邢集结束整训，召开了东征抗日誓师大会。会后，在震耳的锣鼓、鞭炮声中和人民群众的夹道欢送下，第8团队全体官兵在团长周骏鸣、政委林悄的率领下，告别了桐柏山区的父老乡亲，途经河南信阳、商城

等地开赴安徽抗日前线。

第十六章 琼崖游击区

琼崖游击区，位于海南岛（又称琼岛）境内，地处祖国南疆边陲。岛上物产丰富，与大陆相隔仅一衣带水，它与雷州半岛相毗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帝国主义和两广军阀所垂涎。红军游击队活动范围主要在岛上的琼东、乐会（今琼海）、万宁、文昌、陵水、崖县、临高、澄迈、儋县等部分地区，其活动中心在琼（山）文（昌）、乐（会）万（宁）地区。境内的母瑞山、六连岭是红军的主要根据地。这里山岭连绵，古树参天，峰峦险峻，道路崎岖，地势十分险要，便于红军游击队隐蔽，与敌周旋，对于开展游击战争极为有利。

琼崖游击区是由琼崖苏区演变成的。琼崖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早在1921年底，这里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活动。1926年6月，成立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后改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简称琼崖特委）。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后，共产党在这里领导了多次农民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和琼崖苏区。1927年7月，建立了琼崖讨逆革命军，9月，全琼武装总暴动后，琼崖特委将讨逆革命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后又改称工农红军）。1928年，创建了以乐会四区和六连岭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随后，成立了琼崖苏维埃政府。正当琼崖革命斗争不断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军第11军第10师来琼发动了第一次“围剿”，琼崖根据地和红军受到很大损失。特委被迫带领红军上母瑞山，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1930年，琼崖革命斗争得到了恢复和发展，8月，在母瑞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独立师（简称琼崖红军独立师）。1931年5月，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即红色娘子军）。年底，独立师发展到2,000多人，地方武装发展到近6,000人，7个县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琼崖革命斗争再次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1932年秋，国民党第1集团军警卫旅来琼，对琼崖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由于敌强我弱，加之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独立师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致使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军独立师解体。苏区沦为白区或变成游击区，各地党组织和革命武装遭到严重摧残，琼崖革命斗争进入了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时期。

从1933年春到1938年冬，琼崖红军游击队在以冯白驹为书记的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琼崖的游击战争，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3年初到1933年6月，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军游击队分散在母瑞山等地，坚持艰苦奋斗；第二阶段从1933年6月至1937年7月，积极开展游击活动，革命力量不断得到恢复和发展；第三阶段从1937年7月到1938年冬，同国民党当局开展谈判，经过艰难曲折斗争，最终达成协议，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

琼崖游击区的斗争，与大陆14块游击区的斗争相比，有它自身的许多特点，首先是坚持游击战争的时间比大陆游击区要长将近3年。大陆各游击区的斗争一般从1934年秋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撤离苏区起，即1937年冬，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止，前后一般经历3年的时间。而琼崖游击区的斗争，开始的时间，即由苏区转入游击战争的时间，比大陆游击区早将近两年，从1933年初开始；而结束的时间又比大陆游击区晚了一年，即1938年冬，才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前后长达6年之久。其次是大陆14块游击区在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合作抗日协

议后，各地红军游击队均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苏皖抗日前线；而琼崖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后，则改编为抗日独立队，继续在琼岛坚持斗争。

琼崖游击区的6年游击战争，是在远离党中央、孤岛奋战的条件下进行的。它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最终胜利地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保持了革命的“火种不灭”、“红旗不倒”，实现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格局。琼崖游击区之所以获得生存和发展，主要是以冯白驹为首的中共琼崖特委，能够审时度势，正确决策，坚持了对全岛革命斗争的统一领导；善于发挥集体智慧，总结经验教训，制定了一套符合实际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从而有效地克服了“左”的消极影响，推进了革命力量的恢复和发展；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略战术，将游击战争与隐蔽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有效地打击敌人；依靠革命群众，团结少数民族，发挥广大青年特别是妇女的作用，形成了特有的铜墙铁壁，在祖国的最南疆，保持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力琼崖革命斗争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一、琼崖红军反“围剿”失败后分散坚持斗争

（一）国民党军大举“围剿”，红军独立师失败

国民党反动派对琼崖红军的迅速发展，苏区的逐步扩大，深感恐慌。1932年7月，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第1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派其警卫旅旅长陈汉光率所部3个团和特务营及空军第2中队的一个分队，共3000多人，从广东徐闻县的海安急速渡琼。在海口港、东水港登陆，进驻海口、府城、加积、定安等重镇。同年8月1日开始，陈汉光旅在空军、琼崖警卫队、各县民团、地方豪绅反动武装的配合下，向琼崖各苏区和红军发动空前规模的“围剿”。陈汉光旅是陈济棠扩编军队时所编的直属第1集团军总部的部队，不受军、师节制，兵员没有一定的限制，可以任意扩编，武器装备也比较精良。旅长陈汉光是陈济棠的侄辈，警卫旅就成为陈济棠部队中的一支嫡系部队，是巩固陈济棠反动统治的“陈氏皇家军”。陈汉光在海南身居中将旅长、琼崖区绥靖委员和琼崖抚黎局局长等三要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当时，海南岛只有沿海的13个县，岛的中部是黎族聚居地区，未设县治。岛上交通干线的环海公路尚未建成，从海口市向东只通到崖县，向西只通到儋县。陈汉光的旅部、绥靖委员公署、琼崖抚黎局都在海口市。陈汉光“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是以海口市为基地沿着公路分东西两路由北向南推进。他对红军的“围剿”，采取“分进合击，各个击破”的战术，分兵向母瑞山等地搜索前进，向红军根据地全面开展攻势。

此时，琼崖工农红军武装力量，除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直接所属的地方赤卫队以外，正规武装就是红军独立师王文字部和闻名中外的娘子军庞琼花部。红军独立师师部和红1团300多人，同琼崖特委、苏维埃政府机关驻琼东（今琼海县）根据地；红2团约400人，分驻琼山县羊山、郭儒山根据地；红3团400多人，驻乐万

（今万宁县）根据地；红军行营指挥部的600人，驻澄（迈）二（区）、琼（山）十九（区）根据地。此外，还有赤卫队分驻各地。

陈汉光旅对琼崖红军“围剿”，采取了“军政并举”、“剿抚兼施”的方针。他在对红军、赤卫队军事“围剿”的同时，还深入海南各县、区、乡、圩、镇进行反共宣传，企图瓦解革命群众的战斗意志。陈汉光又部署修建碉堡，移民并村，加强保甲制度，扩大地方“自卫”力量，并强行推行“五户联保连坐法”，其内容是：（1）不做“匪”，不济“匪”；（2）知情不报同通“匪”论罪；（3）探亲者早去午归，违者以通

“匪”论罪；（4）发现可疑男女，立即报告甲、保、乡长，否则同通“匪”论罪；（5）一户犯法，五户共同论处。陈汉光还散发瓦解和“宣抚”的

反共传单和标语，主要内容有：（1）出来投诚自新者不杀；（2）携械出来投诚自新者重赏；（3）全班、全排、全队携械投诚者量才录用。又在每家大门上贴上永久性的“反共证”。上面书写“军民合作，杀灭共匪”的字样。

面对国民党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根据地广大军民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下，奋起抗击，用战斗来保卫根据地，保卫苏维埃政权，顽强地进行了反“围剿”的斗争。琼崖地区的红军独立师第2团被敌人包围在羊山、郭儒山一带，激战一个星期，损失惨重，仅有200多人在突围中脱逃回到师部。接着，国民党军又集中力量向琼崖特委等领导机关驻地琼东苏区进攻，经过两天战斗，虽给敌人以一定的杀伤，但因敌众我寡，敌又有飞机配合，红军

独立师难以退敌。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独立师第1团主力即向母瑞山撤退，留下一部分红军和娘子军在原地活动，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

琼崖特委和琼苏机关及红军独立师退到母瑞山后，敌人又进驻母瑞山地区，派重兵把母瑞山重重包围起来，企图在这里一举消灭红军独立师。敌人一天天紧缩着包围圈，每个山头，每个峡谷，都在进行着殊死的战斗。敌人飞机在盘旋轰炸扫射，枪炮声震撼着山岳丛林，到处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红军各路战士在师长王文字指挥下，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经过半个月的残酷战斗，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红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主持召开了特委紧急会议，分析敌我形势，研究制定对策。会议认为，敌人竭尽全力围攻母瑞山，毫无撤退之意，其明显意图是要在这里把琼崖革命力量一举消灭。如若一意死守母瑞山则正中敌人下怀。冯白驹指出：目前形势异常险恶，为挽救琼崖革命，我们必须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只有这样才能保住革命火种不被扑灭。会议最后决定，由师长王文字、政委冯国卿率领主力突围，分散敌人；冯白驹率领特委、琼苏机关和警卫分队100多人仍留在母瑞山坚持斗争。

1933年1月，红军独立师从母瑞山突围的战斗打响了。一天深夜，红军主力悄悄地摸下山去，不巧被敌人发现，突然山下响起了“哒哒哒哒、哒哒哒……”的机枪声，紧接着在母瑞山的各个方向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大作，火光四起，流弹四射，突围与反突围的战斗全面展开了，一直坚持到天亮。第二天，从山的远处仍断断续续地传来一阵阵枪声。由于敌人前堵后截，黑暗中红军主力被敌打散，师政委冯国卿带领几个人好不容易突围出去，可是在到达乐会县的一苗村时又被迫上来的敌人重新包围，全部壮烈牺牲。师长王文字率领60多人冲出重围，到乐会县山区后，他患病不能走动，因其警卫员叛变出卖而不幸被捕。在敌人的屠刀和利诱威逼下，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于同年7月在府城英勇就义。师参谋长郭天廷、特委秘书林树芹也因受伤被捕，惨遭敌人杀害。零散突围出去的人员，流落各地暂时隐蔽起来。至此，红军反“围剿”斗争归于失败。

琼崖特委和红军独立师之所以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围剿”，有其主客观的多方面原因。从主观上说，当时琼崖特委按上级指示在党内和红军内部开展肃反运动，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搞扩大化，错杀了一批党政军干部，使反“围剿”斗争失去了一批骨干；在作战指挥上，特委和红军领导采取了与敌人硬拼，打阵地战、消耗战的错误方针，没有发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加之当时琼崖各根据地发展不平衡，红军所在地区未能连成一片，这就给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造成了有利之势和可乘之机。从客观上讲，敌我力量悬殊过大。敌军不仅人数多，装备好，还有空军的配合，而琼崖红军武器装备既少又差，弹药极端缺乏。因此，尽管红军作战十分英勇，也给敌人以一定的杀伤，但就反“围剿”斗争的全局来说，一直处于被动挨打、步步败退的形势。至1933年初，琼崖红军独立师被打散，损失惨重，琼崖各个革命根据地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中共琼崖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遭受严重破坏，琼崖特委同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党组织的联系也被切断。敌军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抢劫，强迫群众移人堡垒据点中心村。原来的许多革命

村庄变成了焦土废墟，被划作“无人区”。无数革命战士家属和群众惨遭杀害，到处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琼崖苏区和红军受到了一次最惨重的损失和挫折。但是，中共琼崖特委及其分散在各地的武装力量，仍在母瑞山和其他地区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二）坚持斗争在母瑞山上

母瑞山位于安定、琼东、乐会三县交界处，面积约100多平方公里。它是五指山系的一个主要山峰，四周悬崖峭壁，谷深流急，山中林木参天，道路崎岖曲折，地势十分险要。1928年琼崖特委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就曾带领红军游击队转向这里屯兵养息，积聚革命力量，后来又在这里成立了红军独立师，成为向反动派斗争的重要革命根据地。红军独立师被敌人打散解体后，冯白驹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又一次来到母瑞山。母瑞山再次成为保存革命火种的基地，领导琼崖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坚持革命斗争。

冯白驹带领特委、琼苏机关和警卫分队在母瑞山上坚持斗争。在敌人的封锁下，同党中央、省委以及岛内各地党组织和红军的联系已完全中断。而敌人的“清剿”并没有放松：在军事上，国民党军以超过红军游击队数十倍的兵力，对母瑞山进行层层包围，并在回周修建碉堡炮楼，疯狂进行“搜剿”；在政治上，采取法西斯高压政策，在母瑞山周围“移民并村”，建立保甲制度，实行“一家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的联保连坐法，并颁布所谓“十杀”政策；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不许群众上山，不许接济红军，使山上红军游击队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红军游击队遇到的困难首先是粮食短缺。开始每人每天还能分到一个拳头大的饭团，后来每人只能分一椰壳碗的稀粥或饭水。再过一阵，粮食吃光了，米粒全光，大家只能靠野菜、野果充饥。除了对付搜山的敌人外，大家就是满山遍野地寻找能吃的东西。凡是叶软、无毒、无异味的野菜，就采来煮成野菜汤喝。在敌人没有搜山时，有的人还下到山沟里、河水边抓鱼虾，有的人上树摘野果，掏鸟蛋，女同志则去采蘑菇，挖木耳，挖野竹笋，等等。后来大家在采野菜时发现了一种形似蚕豆、茎软叶嫩的野菜，天天采它，顿顿吃它，成了充饥的主食，被大家赞为“革命菜”。100多人几个月来主要就是靠它填肚。

琼崖的深秋，台风多，雨水大。每当刮台风，疾风夹着暴雨，干部战士栖身的茅草屋被刮得无影无踪，全身被淋湿，大家只好紧紧地靠在一起，同狂风暴雨搏斗。琼崖的冬天虽无冰雪，但在深山野林里，寒气逼人，又加上经常下毛毛雨，战士们破烂不堪的衣服被雨淋湿后，浑身冻得发紫，夜晚无法入睡，就点起火来，把芭蕉叶烤热当草铺、当被盖。当火柴用完了，火种也被雨淋灭时，他们就学着古人钻木取火。红军战士栖身之处常常是在石崖下或山洞里，山蚊、山蚂蟥、山蚂蚁以及毒蛇的威胁也是令人十分苦恼的事。

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不少战士病倒了，有的患腹泻，有的得了疟疾，大部分人患了夜盲病和水肿病。

红军游击队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还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清剿”。有一次与搜山的敌人遭遇，大家在冯白驹的带领下，突出了重围，摆脱了敌人。但携带的东西全都丢光了，只剩下身上穿的一套破旧衣裳。

尽管环境如此险恶，生活如此艰苦，作战如此频繁，但红军游击队的革命意志却非常坚强。冯白驹带头吃苦，处处想着别人。每当分粥时，他总是让每个人吃到之后自己才吃；如果不够就把自己的那份让给别人，自己煮些

野菜充饥。他还亲自给病号找食物，觅草药。当一些人情绪低沉时，他组织大家讲故事，唱革命歌曲，有时还带头哼几句海南戏。他鼓励大家说：“环境恶劣，生活困难，都丝毫不能动摇我们革命的决心和斗志。我们坚决相信，革命一定要胜利的。只要我们坚持下去，黑暗是暂时的，光明总有一天会到来的。我们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对恶劣的环境，没有任何悲观失望。”正是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战胜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使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顽强地坚持着斗争。

在母瑞山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为了弄清情况，寻找散落在各地坚持斗争的红军战士，冯白驹、符明经、王业熹等人商量，决定派出少数武装人员分批突围下山。但先后派出的4批人员，有的遭到敌人袭击牺牲了，有的下落不明，只好暂停执行这一决定。

在国民党军重重封锁、不断“搜剿”袭击的情况下，加上饥寒、疾病的折磨，母瑞山的红军游击队减员严重，100多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冯白驹、符明经、王业熹、刘天佑（红军庶务长）等4名干部，以及林天宽、林天德、刘茂松等20名红军战士，还有王惠周（冯白驹的妻子，后于1935年春牺牲）、李月凤（红军炊事员）等2名女同志，共26人。他们百折不挠，在母瑞山度过了极其艰苦的岁月，一直坚持到最后突围，终于保存了琼崖党政军领导骨干，留下了可贵的革命火种。

（三）琼崖各地的斗争

当冯白驹、符明经、王业熹等人在母瑞山坚持斗争的同时，分散在琼崖各地的红军配合当地干部，在与特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以各种形式隐蔽力量，坚持斗争。

东部的乐万根据地，红军排长陈姪九带领红3团突围出来的10多名战士，历经艰辛，与中共万宁县委书记肖焕辉带领的县委干部及几十名赤卫队员汇合一起，在六连岭上与敌周旋，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琼崖特委委员王白伦不畏艰难险阻，深入到被敌人摧残的红色村庄进行个别联系，开展秘密工作，找到了在乐万地区坚持斗争的原红3团政委冯甲，并与肖焕辉会合共同成立了中共乐万临时委员会（后改为乐万县委），统一领导乐会、万宁两县的斗争。

南部的陵（水）崖（县）根据地，红军被打散后，中共陵崖县委的张开泰、林克泽、林诗耀、林鸿蛟等人，几经周折，找到了40多名失散的红军战士。同仲田岭转移下来的陈文光、陈世德带领的红军游击队会合后，于1933年3月在崖西合编为琼崖工农红军第5连，以光峰岭为基地开展活动。后在陈汉光旅和反动民团加强“围剿”的情况下，红5连又化整为零，隐蔽在崖县、陵水、感恩等地坚持斗争。

在琼东北和中部地区，原琼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冯安全、中共琼文县委书记李黎明（又名黎民）和红军连长朱运泽，带领红军的一个短枪班，在琼文地区开展活动。中共琼东县委书记黄魂、县经委主任许道中、文昌县委书记刘炎喜、文昌县文南区委书记黄一清，与红军连长冯振冠一起，在琼东、文昌、定安一带坚持斗争。

在琼西北，红1团1营3连副排长王永信先后在临高新盈、儋县新州等地以职业为掩护开展活动。琼山五区干部李元球、李之光在临高县秘密开展活动。中共党员黄金容在信县以办农场为掩护，训练党员骨干，积蓄革命武装力量。

在琼西，中共党员马白山、马秋江等，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在昌江、感恩等县学校和农村秘密开展工作。

此外，还有一些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在敌人的监狱中坚贞不屈，坚持斗争。

以上事实表明，在国民党军疯狂“围剿”，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坚持在母瑞山与琼崖其他各地开展斗争的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没有被敌人的凶残强暴所吓倒。他们不畏艰险，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琼崖革命“红旗不倒”的强大支柱。

二、琼崖革命力量的恢复与发展

（一）母瑞山突围，冯白驹重整队伍

为了摆脱困境，重新打开琼崖革命斗争的新局面，1933年春，在母瑞山坚持斗争的冯白驹、符明经、王业熹等领导人经过研究，决定待机突围下山。春节期间，冯白驹带领25名红军指战员，机智地穿过敌人的封锁线，由女炊事员李月凤带路转移到了澄迈县2区。这里是李月凤的家乡，冯白驹派她先进村了解情况。不幸，李月凤被捕遇害，冯白驹等只好连夜撤离，重返母瑞山。

向何处去，从哪里突围，这是摆在冯白驹等面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冯白驹经过重考虑，认为还是向琼山革命老区转移比较合适。那里群众基础好，自己在那里工作多年，情况比较熟悉。他的这一想法在取得大家的同意之后，于同年4月再次突围下山。经过几天的昼伏夜行，秘密通过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胜利回到了冯白驹的家乡琼山县大山乡长泰村。经过联系查找，终于同在琼文地区坚持斗争的李黎明、冯安全、朱运泽、刘秋菊和先期从母瑞山突围回乡的冯建亚、李汉等人会合。接着又同在琼东、乐万等县坚持斗争的王白伦、黄魂、肖焕辉等取得了联系。

冯白驹等人突围成功，并与琼文县委胜利会合，是琼崖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琼崖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进入了恢复发展时期。

冯白驹等人从母瑞山突围，与琼文县委胜利会合后，摆在他们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如何恢复工作的问题。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争，冯白驹等决定首先健全党的领导核心。增补李黎明、朱运泽为特委委员，与原来的特委书记冯白驹、特委委员王白伦、符明经等5人组成特委新领导。1933年6月，在琼山县塔市乡茂山村召开了琼崖特委临时会议（吸收琼文县委的同志参加）。会议总结了琼崖红军第二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当前斗争形势，研究了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迎接新的斗争等问题。会议除确定派特委交通员陈玉清到香港、上海等地寻找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党组织领导机关外，并作出4项决定：1.以母瑞山下山的红军和在琼文的红军为骨干，编成4个红军游击小组，分散到各县活动，寻找失散在各地的同志，恢复党的组织，伺机打击敌人；2.派出部分人员到琼崖西部新区各县，以社会职业作掩护进行公开活动，开展新区工作。组织琼西南临时工作委员会，由符明经主持，领导新区工作，恢复和新建西南各县党组织；3.冯白驹留在琼山，负责领导全琼党组织和武装斗争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并直接领导琼文县委，开展琼文地区的革命斗争；4.在进行恢复工作过程中，注意在群众中组织武装队伍，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主动袭击国民党区乡反动武装。

琼崖特委临时会议所作出的4项决定，为恢复和建立琼崖党的各级组织，发展红军游击队，积极打击敌人，开创琼崖游击战争新局面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特委根据临时会议精神，决定首先在琼文地区进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由冯白驹、符明经、王业熹、冯建亚、冯安全等在演丰、塔市、茄芮、三江、苏寻山、坡园、道崇、土道一带乡村活动；李黎明、李汉、刘秋菊、林茂松、张忠诚、林天德、吴玉香等在昌城、博罗、迈银、礼让、茂山、迈德、美蓝、灵山、大林等乡村活动。起初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常有敌人冒充红军游击队或共产党员蒙骗群众，然后加以杀害，造成群众真假难分，对琼崖特委派出

的人员不敢接触，给恢复工作带来很大困难。针对敌人的恐怖政策和欺骗阴谋，琼崖特委强调：一方面要揭露敌人，做好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另一方面恢复工作要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只有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才能让群众放心，克服恢复工作中的阻力。为此，冯白驹和中共琼文县委的同志带领红军游击小组，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声东击西，飘忽不定，采取伏击或突击等战术，寻机袭击国民党地方武装，摧毁敌炮楼据点，打杀叛徒、土豪劣绅和地主土匪。弄得敌人草木皆兵，寝食不安。人民群众听到袭击敌人的枪声，喜形于色，奔走相告：“红军回来啦！我们又有盼头了！”极大地鼓舞了游击区的军民同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与信心。

（二）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袭击国民党地方武装

在琼崖特委临时会议制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红军游击队在开展游击活动中，吸取了反“围剿”斗争失败的教训，采用更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主动出击，寻机袭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化装奇袭 1933年，国民党军队在琼崖游击区周围到处建据点，设关卡，妄日困死红军游击队。文昌县潭牛圩炮楼，就是国民党煞费苦心建起的据点之一。这个据点控制着琼山、文昌公路干线的交通要道，国民党军队和民团以此为据点，横行乡里，鱼肉人民，无恶不作，民愤极大，群众纷纷要求红军游击队为民除害。但这个炮楼因地处交通要道，敌军来往活动频繁；四周又是平原，如果红军游击队采取强攻，势必造成很大伤亡，而且难以夺取。后来经过大家出谋献策，决定乔装奇袭。正当1934年农历年关时节，人们忙于办年货过年，潭牛墟上集市熙熙攘攘。敌人在炮楼下也张贴了告示，悬赏5000光洋，买共产党红军刘秋菊的头颅。驻炮楼的敌军、民团乡丁为得到这笔重金过年，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一部分被派到附近村庄去追捕刘秋菊，一部分则去市场盘查和搜刮年货。据点门口只有一个无精打采的哨兵站岗。当红军游击队摸清了反动乡长确实在炮楼里的情况后，刘秋菊不顾个人安危，和红军排长陈英等率领游击队员，乔装赶集群众前往文昌县潭牛墟。游击队按照作战部署，由刘秋菊当向导，先派一名侦察员挑着豆腐花在炮楼门口叫卖，负责观察据点内外敌人动静，监视和控制敌人哨兵。哨兵吃着豆腐花，刘秋菊等与之周旋；其余红军游击队员化装成担菜挑柴的村民，陆续进入集市，到达敌据点周围。

这时，几个游击队员假装吵架相互扭打起来。刘秋菊立即喝叱：“大白天的，你们胆敢打架，还不到炮楼找长官评理去！”这句话是暗示游击队员行动的信号，只见游击队员们你推我操，一窝蜂地拥进了炮楼。陈英一个箭步转到反动乡长身后，拔出手枪，“呼”的一声，结束了他的性命。反动乡长的文书，也被刘秋菊当场击毙。哨兵在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时，就被游击队员收拾了。红军游击队火速地把在据点里缴获的枪支弹药背上，在门窗上浇上煤油，点了火，然后把炮楼大门锁好，胜利撤离现场。这次战斗打得干净利索，当外面的敌人赶回炮楼时，一个个呆若木鸡，哭丧着脸，乱成一团。赶集的群众闻讯后，一个个喜形于色，无不称赞红军游击队大智大勇，奇袭敌据点，为民除害。

1934年清明时节，活跃在六连岭地区的红军排长陈坏九等，化装成上坟的群众，前去万宁县菠萝据点侦察敌情。他们扛着锄头，携带香烛和祭品向据点附近走去。敌人哨兵向他们发问：“你们是干什么的？”陈坏九放下锄头，镇静地回答：“扫墓的！”他们一面锄着墓上的杂草，一面侦察敌据点，只见据点是六角形的，四周是围墙，围墙外面有一层铁丝网和一条断沟，中间是炮楼。要拔掉这座炮楼，看来困难不小，干起来很棘手。他们决定在原地附近多方侦察，待摸清敌人的活动规律后，再决定采取行动。当陈坏九等人连续几天来摸清了有几个敌兵总是从牛蹄林方向出现，然后乘坐汽车，开进菠萝据点这一活动规律后，陈坏九于当天晚上带着十几个红军游击队员，在鸡啼时分，到达牛蹄村附近，蹲在路旁的莽莽堆里，待到天亮，果然远远的坡上又出现了5个敌兵。当敌兵进入伏击圈后，陈坏丸等人紧握驳壳枪，

射出了一阵密集的子弹，5个敌人应声倒地。他们换上了敌人的服装，化装成敌人哨兵，向菠萝据点进发，并截获一辆汽车，装扮成运送国民党伤兵的便衣队，冲进敌人据点，击毙敌民团团董，俘团丁10多人，烧毁了敌据点。

1934年夏，琼崖特委交通员陈玉清，化装成担水群众，潜入文昌县罗豆村敌炮楼，缴获短枪2支。红军排长陈英等乔装成风水先生和避雨群众，带领游击队员奇袭琼山县灵山村一地主庄园和云龙乡北公山的民团炮楼，毙敌数人，并缴获一批枪支弹药，惩治了一名反动地主。

1935年秋，红军游击队员林茂松、林天德、王月波、傅烈军等入，巧入文昌县翁田赤狗铺剧场，将国民党文昌县地方民团巡逻队长击毙。第二天，他们又化装成国民党的“清乡队”，到附近的国民党炮楼，以调查“剧场事件”为名，采取突袭行动，缴获短枪2支。红军游击队化装奇袭，使敌人真假难辨，防不胜防，整天处于惶恐不安之中，有效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选点伏击 1934年7月，红军干部林天德、中共琼文县区委干部李苏文带领游击队员先后惩办国民党塔市盐警队长，处决道崇民团团团长王志学。1934年秋，红军游击队员林茂松等人，在琼山县岭脚乡处决反动乡长黄赞仕之后，在地下党员和群众的配合下，埋伏于大致坡公路一线，将国民党文昌县抱罗区的税收车截下，毙伤敌3人，缴枪4支，缴获光洋2000多元。1935年夏，中共陵崖县崖西区委接到望楼港支部的报告，说是国民党县长王鸣亚的武装走私船停在望楼港的海边。区委立即布置由区委书记林克泽同陈文光、陈世德、林鸿蛟率领的崖西红5连，立即日夜兼程，前往突袭，于敌船到达港口的头一天埋伏在港口周围，准备等天黑后动手。崖西红5连武器不多，只有2支驳壳枪和10多支长枪，其余的都是短刀。下午5点多钟，潮水快涨上来了，红5连一声呐喊，出其不意地冲到王鸣亚的走私船上，除一人反抗外，其余的都慌忙举手投降。这次战斗缴获长短枪16支，小炮6门，还有200多元光洋和几十箱鸦片。被俘的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游击队会在这里出现。

1936年春节期间，中共琼东县委书记肖焕辉带领4名游击队员，潜伏在下田茵林的椰子树上，准备截击故乡乡长何老大和民团团董何老二。两敌虽诡计多端，极力躲避，绕道回家，但终被游击队员击毙。

由于红军游击队的伏击很有威力，敌人不敢随意出动，开始改变红军游击队被动挨打的局面。

游击活动与城镇地下斗争密切配合为了发展群众武装，坚持武装斗争与地方工作相结合，琼崖特委在城镇组织了一批“在业红军”。平时以职业为掩护，不脱离生产，一有任务就与游击队一起参加战斗。完成任务后，仍回家从事生产。这种方式既便于隐蔽，也易于解决给养，为持久作战，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创造了一种好形式。1934年夏，潜伏在文昌县的中共党贝林坚和蔡孝先等人，在得到上级的指令之后，巧妙地捕获了国民党永新乡反动乡长符儒书，并缴枪3支。“在业红军”的活动，使敌人腹背受敌，惊恐不安。特委还派人在一些重要地区设置了联络站，搜集情报，沟通联系，运送物资，配合红军游击队的活动。1934年夏，中共乐万县委指示李居民（梁森生）、陈明钦、符我江、谢汉宛等，在乐万冯家铺子、贡举墟等地，以开设杂货店为掩护，联系失散的红军，使红1团的代理团长黄大猷、连长符家熙等先后找到了党组织，尔后转上六连岭，从而充实了这一带红军游击队的领导力量。

团结黎、苗同胞，共同反抗剥削压迫，还击敌人的“清剿”1933年春，兴峰岭下的黎、苗族侗长在红军的影响下，不怕敌人的威胁，动员和带领黎、苗族青年参加红军的行列。陵水县仲田岭（今三亚市林旺镇）数十名黎族青年，自动组成了武装赤卫队，在深山密林中用粉枪、弓箭、砍刀等原始武器同国民党军队对抗，先后打退了陈汉光旅的多次进攻，有力地配合了红军游击队的军事行动。后来这支武装突破敌人的重围，到乐万六连岭游击区参加了红军。

在开展游击活动、恢复各级组织的斗争中，以冯白驹为首的中共琼崖特委不仅重视枪杆子的威力，同时也很注意舆论的作用，积极做好宣传鼓动工作。1934年底，琼崖特委恢复印刷所，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版了《特委月刊》、《红旗报》。这对传播胜利消息和宣传革命道理，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团结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鼓舞革命斗志，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红军游击队的积极活动，和各方面工作的紧密配合，中共琼崖各级党组织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三）琼崖红军游击队司令部成立，游击战争广泛展开

1934年7月至10月间，国民党广东省当局由于种种原因，陆续将陈汉光警卫旅分批调离琼崖，移驻粤北和广州外围。这时，琼崖敌情出现了暂时的缓和，这就为恢复琼崖共产党组织和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琼崖特委为了加快恢复、发展工作，充实特委的领导力量，和加强各县委书记的领导，对分散在各地坚持斗争的领导干部，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原中共琼文县委书记李黎明到乐万县任县委书记，恢复以六连岭为中心的琼崖东部地区工作。原在这里坚持斗争的琼崖特委委员王白伦回特委工作。琼崖特委和琼东县委书记黄魂等人取得联系后，1935年派肖焕辉任中共琼东县委书记，调黄魂回特委工作。同年，琼崖特委派冯安全到临高县任县工委书记。原中共琼西南临委，因工作不力，于1935年底解散。翌年春，琼崖特委派杨启安到儋县、昌江、感恩等县工作，不久重建中共琼西南临委。新临委派李汉组织中共儋县县工委，派刘秋菊和林茂松到崖县莺歌海一带负责党组织的恢复工作。杨启安、陈克文找到马白山、马秋江、王唯一等人后，在昌江、感恩两县的广大乡村建立起一批中共党支部。1936年秋，琼崖特委派林克泽、林诗耀到海口开办“月华鞋店”，筹组中共海口市工委，开展城市斗争。

为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1936年5月，琼崖特委在琼山县演丰乡锦山村召开了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会议由特委书记冯白驹主持。鉴于1930年琼崖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以来，特委领导绝大多数人已牺牲，特委领导力量急需充实；同时，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急需建立全岛统一的红军游击队领导机构，以便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会议作出了健全琼崖特委领导和成立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司令部的决定。会议经过选举，产生了新的琼崖特委领导机构。特委委员由原来的5人增至7人。他们是：冯白驹、王白伦、黄魂、肖焕辉、黄一清、朱运泽、陈根（符和益）。冯白驹、王白伦、黄魂为常委，冯白驹继续担任特委书记。同时成立琼崖红军游击队司令部，由朱运泽任司令员，王白伦任政治委员。下辖7个支队。第1支队（特务支队）支队长由朱运泽兼任，第2支队长林天德，第3支队长王永信，第4支队长陈美深，第5支队长陈英，第6支队长林天贵，第7支队长黄大猷。每个支队开始人数虽不多，少的六七人，多的十余人，但他们都是经受过各种考验的骨干，并且全部配备短枪，战斗力很强。红军游击队司令部的成立，不仅使琼崖红

军游击队有了统一的领导指挥机构，同时也壮大了红军的声威，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使人民群众进一步增强了斗争的信心。

中共琼崖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是冯白驹等从母瑞山胜利突围后，特委召开的又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加强了琼崖特委的领导力量，组建了全琼红军游击队统一的指挥机构，为中共琼崖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根据琼崖特委关于“积极活动，积蓄力量，再接再厉，坚持斗争”的指导方针，红军游击队各支队广泛深入开展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灵活机智地打击敌人，积极筹备经费，缴获武器弹药，发展壮大队伍，接连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

1936年夏，琼崖红军游击队政委王白伦和支队长林天德、林天贵，带领第2、第6两个支队到琼定、善集等县活动，强缴善集县中兴乡大园村大地主黄敦诗的枪支10余支，光洋500元。陈英带领红军游击队第5支队，在琼山、文昌、琼定等县袭击国民党区乡武装和民团据点，击毙石桥乡乡长和乡下乡各1名；缴获短枪2支。并协助中共琼澄县委组织一支10多人的游击小分队，陈英兼任队长。小分队积极开展活动，袭击敌人据点，缴获一批武器弹药。黄大猷带领的第7支队，以六连岭为基地，在乐万一带多次袭击国民党驻军及民团。同年秋天，第2、6支队又在善集县加乐地区袭击民团，缴枪10余支。1937年1月，他们还在定安县龙塘至屯昌镇途中的鹧鸪岭一带公路，击毁国民党运载年货的汽车1辆，毙敌连长和士兵各1名，缴获短枪3支，年货一批。琼崖红军游击队司令员朱运泽带领第1支队随同特委机关在琼山、文昌一带开展活动，打击敌人。王永信带领的第3支队，活跃在文昌、琼东一带，他们偷袭国民党乡公所和文昌东郊的盐警队，化装袭击清澜联防队，先后毙敌多人，缴获长短枪数支。

红军游击队各支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有效地打击敌人，扩大了红军的声威，进一步推动了中共琼崖各级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的发展。到1937年上半年，全岛已恢复和建立起中共琼文、文昌、琼东、琼定、琼澄、善集、乐万等7个县委，海口、陵水、临高3个工委，以及中共琼西南临委，支部50个，发展共产党员600多人。这些地区的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组织也相应地建立起来。全琼还成立了乡一级的群众武装自卫委员会350个，约2500人。红军游击队也得到了进一步壮大和发展，仅不脱离生产的“在业红军”就扩大到200人。这就为琼崖特委和红军游击队转入抗日战争，实现琼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准备了力量，创造了条件。

中共善集县委（以纪念杨善集烈士而命名）于1936年上半年成立。辖澄迈县5区和屯昌县的新兴、西昌一带。后于1937年秋撤销。

三、顺应抗日潮流，实现谈判改编

（一）与南委建立联系，贯彻团结抗日行方针

正当琼崖特委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军针锋相对地开展反“清剿”斗争的时刻，国内政局发生了急骤变化。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摆在琼崖特委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亟需取得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了解党中央的新方针新政策。

早在1935年春，琼崖特委就派交通员陈玉清携带冯白驹给中共中央的信件，前往上海，虽未找到党中央，但获得中共中央公开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936年春，陈玉清从沪返琼后，琼崖特委获悉中央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1937年上半年，琼崖特委再派陈玉清去香港，找到了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至此，中共琼崖特委和上级组织中断了5年之久的联系，终于得到了恢复。7月，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到香港向南委汇报琼崖斗争情况。薛尚实、云广英等负责人听取冯白驹的汇报后，传达了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要点，指示冯白驹回琼后要争取同国民党琼崖当局进行和谈，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抓紧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组织，扩大红军武装力量；提高警惕，防止在谈判中被国民党乘机吃掉；要善于适应形势的转变，带领琼崖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斗争。

鉴于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琼崖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南委的指示，于1937年7月致函国民党琼崖当局，提出琼崖国共两党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共产党愿意改编红军游击队，以效命于抗日卫国保家事业；建议双方派出代表进行和平谈判；要求国民党当局对琼崖特委的抗日主张和要求在报纸上公开给予答复。

（二）府城谈判及其波折

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和社会舆论，由第152师师长陈章很快在琼崖《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同意琼崖特委关于国共两党举行谈判的消息。之后，中共琼崖特委即派乐万县委书记李黎明为代表，同国民党当局举行谈判。

1937年8月，李黎明前往琼山县府城镇，与国民党琼崖当局代表、第152师政训处主任林序东举行谈判。谈判之前，琼崖特委领导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与南委的指示，对谈判、改编红军游击队等问题作了研究。行前，冯白驹代表特委向李黎明交待了谈判中必须坚持党的立场、原则和方针，特别强调了提防国民党通过谈判吃掉红军的阴谋。

谈判开始，李黎明首先表明琼崖特委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的方针和决心，阐述迫切要求琼崖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愿望，并提出在团结抗战的前提下，琼崖特委愿意改编红军游击队的条件：1.国民党停止进攻红军，停止逮捕中共党政人员；2.红军改编为抗日部队；3.改编后，红军保持独立性，不与国民党军队混编；4.红军改编后，有单独的防区，不同国民党军队混驻在一起；5.红军改编后，当局要一视同仁，要同国民党军队一样发给粮饷、被服及其他各种军需品；6.给红军补足枪支弹药和各种装备；7.红军是琼崖人民的子弟兵，誓在琼崖抗击日本侵略者，卫国保家，当局不得以任何借口将红军调离琼崖。

但是，国民党琼崖当局对中共琼崖特委提出的以上条件都避而不谈，而是坚持要琼崖红军游击队赶快集中，编到国民党的部队中去，妄想吞并琼崖红军。李黎明据理批驳，极力坚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琼崖地方性的抗日部队，以保持中共琼崖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

由于国民党琼崖当局采取欺压、威胁、指责、引诱的手段，导致几轮谈判均陷入僵局，毫无结果。最后，李黎明代表中共琼崖特委重申对谈判的态度：1.琼崖特委对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方针坚定不移，对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是真诚的；2.必须先谈妥条件，双方同意，签定协议，琼崖红军游击队才能出山改编；3.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琼崖特委愿意同当局继续谈判。国民党当局什么时候改变无理要求，郑重其事地谈判，我们就什么时候来，我方随时等候通知。

在谈判过程中，为了及时掌握情况，领导斗争，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于9月间移住琼山县塔市乡演村。琼崖国民党当局闻讯后，竟背信弃义于10月26日非法逮捕了冯白驹及其妻子曾惠予，妄图以此为压力，迫使琼崖特委和红军游击队让步，以获得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

冯白驹被捕后，特委千方百计地进行营救工作。一方面派李黎明向琼崖国民党当局交涉，严正要求立即释放冯白驹；另一方面，将冯白驹被捕的情况向上级报告，设法营救。同时，以各种方式将冯白驹被捕的真相公诸于众，揭露琼崖国民党当局不顾民族利益，破坏国共谈判的罪行。

中共中央获悉冯白驹被捕的消息后，十分关切。周恩来亲自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指示南委迅速向广东省国民党当局提出交涉。叶剑英也写信给广东省国民党当局，要他们顾全大局，无条件释放冯白驹。同时琼崖各阶层人民对国民党的卑劣行径非常义愤，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表达了一致要求释放冯白驹的强烈愿望。要求实现国共团结抗日的呼声响彻全琼。港澳琼

胞和海外琼侨以及爱国人士也都纷纷写信、打电报或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立即释放冯白驹和一切政治犯，恢复谈判，并商定抗日大计。

冯白驹在狱中不顾个人安危，坚贞不屈，同国民党琼崖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当局软硬兼施，时而用高官厚禄引诱，时而用枪杀威胁，企图诱迫冯白驹交出全部红军。冯白驹理直气壮，严词驳斥了国民党蛮横无理的要求，重申琼崖特委要求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正确主张，揭露国民党琼崖当局破坏抗日谈判的行为，并表示要当局保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琼崖红军游击队愿意接受改编。

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叶剑英等的反复交涉下，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强烈抗议要求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12月下令琼崖国民党当局无条件释放了冯白驹。

冯白驹被捕期间，特委书记由特委常委王白伦代理。不久，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派李明（林李明）来琼任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出狱后任特委常委。

冯白驹出狱时，会见了国民党琼崖军政当局负责人，重申了举行谈判，团结抗日的诚意。国民党当局无奈，表示愿意继续谈判。

（三）重开谈判，琼崖国共合作抗日协议签订

1938年1月，中共琼崖特委派冯白驹为全权代表，同国民党谈判代表、琼崖师管区司令杨永仁、参谋长吕承文等重开谈判。谈判开始，又围绕红军改编后独立自主等问题展开争论。杨永仁仍坚持要将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军第52师的特务营，直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和管辖。冯白驹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要求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琼崖抗日自卫部队，改编后政治上独立自主。双方争论激烈，谈判又陷入僵局。

为使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了解情况，指导谈判斗争，琼崖特委利用国共谈判的间歇时间，派冯白驹前往广州八路军办事处汇报谈判情况。上级党组织充分肯定了琼崖特委在谈判中所坚持的正确立场，并指示：红军改编一定要坚持政治上组织上独立自主的原则。冯白驹返琼后，继续同国民党琼崖当局谈判。由于国民党琼崖当局企图趁和谈之机吞并琼崖红军游击队的顽固立场没有改变，经过几轮谈判仍无进展。

在谈判期间，琼崖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加紧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和对国民党中下层人士的统战工作。1938年下半年，全岛各县普遍成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和团体，出版各种救亡刊物，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文昌、临高、儋县、昌江、感恩等县的国民党县、区、乡长支持共产党和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全琼抗日救亡运动还得到了海外琼侨和港澳同胞的广泛支持。他们在港澳和东南亚各国先后成立了“援冯（冯白驹）委员会”、“援八（八路军）援四（新四军）委员会”、“华侨赈济总会”、“华侨回乡抗日服务团”等各种抗日群众团体。还有数百人从香港、越南、新加坡、泰国等地经过琼州海峡回琼参加抗战。

全琼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海外琼胞对琼崖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援，对琼崖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1938年下半年，日本侵略者的矛头指向琼崖。9月24日，日军飞机轰炸琼崖重镇海口、府城。9月30日，日本军舰窜犯榆林港。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琼崖危在旦夕。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在举国上下抗日救亡运动更加高涨的推动下，国民党琼崖当局出于形势所迫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同意接受琼崖特委的主张，于同年10月22日达成琼崖国共合作协议，冯白驹和杨永仁分别代表琼崖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协议书上签字。协议的主要内容是：1. 琼崖国共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共同抗日；2. 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简称抗日独立队），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独立自主；3. 抗日独立队为一个大队建制，下辖3个中队。冯白驹任抗日独立队队长，抗日独立队和3个中队的副职可由国民党选派，但须经共产党同意；4. 抗日独立队队部设政训处（或室），人员由共产党选派；5. 国民党按一个营的编制，每月发给抗日独立队军饷8000元。

至此，延续了一年多的琼崖国共两党谈判斗争宣告结束，琼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从而出现了团结抗战的新局面。

（四）云龙墟改编与誓师抗日

琼崖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后，中共琼崖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积极着手做好改编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特委决定按一个大队建制 300 多人枪，编成 3 个中队和一个特务小队（短枪队），每个中队辖 3 个小队，每个小队辖 3 个班，每班编制员额为 9 至 12 人。不足部分由县武装加以补充。独立队的干部配备，主要从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各级党组织中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干部中选定。关于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地点问题，特委选定在琼山县云龙墟。这里靠近公路干线，共产党组织较坚强，群众基础好，便于对付突然事变，随时转入农村游击。同时，经特委同意，国民党方面可派一名独立队队附和 3 名中队附。根据这一安排，改编后的抗日独立队，队长为冯白驹，队附为马白山、刘振汉（国民党派来）。政训室主任张兴，政训员李黎明，副官谢李森、陈玉清。抗日独立队下辖 3 个中队，第 1 中队长黄大猷、队附符荣鼎（国民党派来，系中共地下党员），第 2 中队长黄天辅、队附陈卓（国民党派来），第 3 中队长张缙薪（后吴克之）、队附吴定中（国民党派来）。陈克邱、林豪、莫逊分别任 3 个中队司书，负责党务和政治工作。抗日独立队队部和第 2 中队驻云龙墟，第 1 中队驻云龙墟附近的儒来村，第 3 中队驻云龙墟附近的多能村。

根据双方协议，琼崖红军游击队于 1938 年 12 月 5 日，在琼山县云龙墟举行改编和抗日誓师大会。当日，抗日独立队官兵 300 多人身着自卫团制服，全副武装，在吴克之指挥操练下，精神抖擞，威武雄壮。上万名群众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携带慰劳品、锦旗等，敲锣打鼓，前来祝贺。写着“抗日先锋”、“人民救星”的锦旗和彩匾布满整个会场。爆竹齐鸣，锣鼓喧天，口号声、欢呼声此起彼落，响彻云霄。国民党琼崖当局守备司令王毅、副司令杨永仁和琼山县县长云振中等军政要员参加了大会。王毅宣布“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 14 区独立队”成立的命令后，给抗日独立队队长冯白驹授军旗、印章，并发表讲话。冯白驹代表独立队全体指战员讲话，表示决不辜负全琼 300 万同胞的希望和重托，誓死抗日，保卫琼崖。这次大会既是红军改编大会，也是独立队誓师抗日的大会。

琼崖红军游击队胜利实现改编，是琼崖特委和全体军民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长期斗争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在琼崖的胜利。它体现了琼崖 300 万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共同愿望，增强了人民群众抗日的决心与信心。1939 年 2 月，日本侵略者侵占海南岛，琼崖抗日独立队开赴抗日前线，投入新的斗争。从此，独立队在团结抗日的旗帜下，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壮大自己，成为琼崖抗战的中流砥柱。

后记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又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胜利和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60周年。在此之际,能够把记录与再现南方8省红色游击健儿光辉业绩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一书敬献给军内外广大读者,感到无比欣慰。

此书是在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首长的亲切关怀下,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领导、曾亲身参加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老红军陈丕显、叶飞、饶守坤、江渭清、卢胜、段焕竞、李世安等关心和指导下完成编撰的。与此同时,还完成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人物论》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纪事》。

本书各章分别由阎景堂(绪论和第十章)、袁旭(第一章、第三章、第六章和第七章)、何春华(第四章、第八章和第十四章)、徐言莫(第五章、第九章、第十二章和第十六章)、张海(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姜廷玉(第二章)、李岱峰(第十五章)等撰写。由阎景堂和袁旭统改全稿。

此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的热情帮助,特别是得到了中央军委办公厅、全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办公室、军事博物馆、总政直工部编研室和南京、广州、济南军区政治部编研室,以及各有关省军区政治部的大力支持。此外,在本书的运作、审稿、编辑与出版中,还得到了张治家、梁国淮、孙亚夫、盛和泰、张奎杰、李必清、阮家新、刘汉中、张东霞、彭新云、李光文、丁星、李德平、马洪武、郭德宏、佟英明、刘武生、张景堂、徐占权等同志的关心和帮助。本书责任编辑孙阿冰同志,为书稿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许多心血。在此,谨向以上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这部50余万字的书稿中,我们试图对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作一全面、完整和系统的叙述。但由于所占有的史料和水平所限,在史实叙述的详略、论断的准确、材料的运用等方面难免有不当的地方。我们恳请参加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老同志,党史、军战史工作者,以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